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31418)

一九一四年後之世界一冊

The World Since 1914

每冊定價國幣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Walter Conzuelo
Langsam

譯述者

謝元達
翁之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林仁之)

弁言

時至今日，已非昔比，各處的國民殊應通曉世界各國當前的顯著爭點，蓋為世界和平起見，不得不爾也。一四一四年以來的時期充滿着非常重要的事件以及關於戰罪、賠款、戰債、裁軍、復興、少數民族、領土的重整、經濟的恐慌、與獨裁制度等等的複雜問題。人們的心思頗易為這種種問題的重大性及其專門方面所擾亂。可是，祇有普及關於這些要因的來源與沿革的知識，方能對於將來的國際和睦有真正的希望。

本書的目的即在幫助讀者明瞭上述的問題，並將世界的種種發展作一易讀的、有組織的、和簡明的解釋。作者屬稿時，世界大勢似乎是最有希望的——或是最不吉祥的。

一九三三年二月藍森 (Lans) 於

目次

第一篇 國際場面

第一章 走進死谷.....一

世界大戰的基本原因.....一

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一四

最後通牒.....一六

第二章 世界大戰.....一二一

燎原之勢(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一二二

美國參戰.....一二三

(甲)思想與行爲上的中立.....一二三

(乙)國際法等.....一二三

(丙)五個月：從和平到戰爭.....

四二

關於「琉西退尼亞」事件.....

四六

第二章 戰神的祭壇.....

四八

「全國應戰」.....

四八

軍事行動(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

五一

軍事行動(一九一六年).....

五七

軍事行動(一九一七年).....

六二

海軍作戰.....

六八

空中戰爭.....

七二

毒瓦斯.....

七四

宣傳.....

七六

和平運動與戰爭目的.....

七九

結局(一九一八年).....

八四

戰爭的代價.....

九一

新世界·····九二

第四章 媾和·····九七

和會中的人物·····九七

和會之組織·····一〇三

和會所遇到的一般問題·····一〇七

草約·····一一一

簽約·····一二一

第五章 五種著名的條約·····一二五

凡爾賽·····一二五

聖澤曼·····一三四

渥宜·····一三七

特喇儂·····一三八

色佛爾·····一三九

關於少數民族的條約.....一四一

第六章 國際聯合會.....一四二

設立國際聯合會的早期計劃.....一四三

國際聯合會的機構.....一四七

國際聯合會與和平的維持.....一五五

各種爭端的和平解決.....一五七

土地的管理.....一六三

委任統治地和少數民族.....一六七

國際聯合會的价值.....一七〇

第七章 賠償.....一七一

起初四年(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一七一

專家(道威斯)計劃(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一七七

楊格計劃(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一八一

延期付款之期限(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	一八八
洛桑會議(一九三二年).....	一九六
第八章 兩種需要：安全保障與裁軍	一九八
法國的新霸權.....	一九八
俄國的預防策.....	二〇三
意大利的條約.....	二〇五
日內瓦——洛迦諾——巴黎.....	二〇八
裁軍的進行.....	二一五
第九章 非洲和亞洲的不安	二二七
覺悟的非洲.....	二二七
輓近非洲的各種發展.....	二三一
西方與亞洲.....	二三三
亞洲與大戰.....	二三五

第二篇 列國場面

第十章 大不列顛.....二二二九

戰爭與和平.....二二二九

包爾溫與麥唐納.....二四三

保守黨執政之五年.....二四九

第二次之工黨政府.....二五六

全國聯合政府.....二六一

英格蘭與各自治領.....二六六

第十一章 不列顛帝國的幾個問題.....二七〇

愛爾蘭自由邦.....二七〇

(甲)「英國的窘困就是愛爾蘭的機會」.....二七〇

(乙)自由邦與共和黨.....二七四

(丙) 科斯格果甫的統治·····	二七七
(丁) 伐勃拉總統·····	二八〇
「獨立的」埃及·····	二八三
印度·····	二八九
(甲) 印度與世界大戰·····	二八九
(乙) 「聖雄」甘地·····	二九三
(丙) 繼續的奮鬥·····	二九五
巴力斯坦·····	三〇二
第十二章 勝利的法蘭西 ·····	三〇八
法蘭西的政治·····	三〇八
佛郎和牠的救星·····	三一—
困苦的那個年頭(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	三一五
法國與羅馬教廷·····	三一九
亞爾塞斯——洛林問題·····	三二〇

同化敘利亞的工作.....三二四

法國的實力.....三二六

第十三章 法西斯蒂的意大利.....三二九

戰勝的報酬.....三二九

墨梭里尼.....三三四

「向羅馬前進！」.....三三六

使意大利法西斯蒂化.....三三九

建立合作一體的國家.....三四五

法西斯黨在國內之功業.....三五〇

阿爾托——阿地基(前南提羅爾)問題.....三五四

政教妥協.....三五七

國家主義與人口.....三六三

法西斯黨的外交.....三六五

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三六八

第十四章 西班牙……………三七一

歷史的要因……………三七一

西班牙與世界大戰……………三七四

國內的不安和殖民地的戰敗(一九一七—一九三三年)……………三七五

獨裁政治(一九二三—一九三〇年)……………三七九

西班牙共和國……………三八四

第十五章 德意志……………三九一

從帝制到共和政體……………三九一

韋瑪議會的工作……………三九八

共和政體的維護……………四〇五

敗政的正面觀……………四〇八

失望與希望……………四一二

政黨與政治(一九二四—一九三二年)……………四一七

希特勒主義..... 四二三

經濟的復興與衰落..... 四三〇

外交..... 四三八

第十六章 海布斯堡皇朝的兩個繼承者..... 四四四

奧地利共和國..... 四四四

(甲)崩潰(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四四四

(乙)國民議會..... 四四七

(丙)狂風暴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年)..... 四五〇

(丁)國防衝鋒隊與保護同盟..... 四五三

(戊)對外問題(一九二七—一九三二年)..... 四五五

(己)合併運動..... 四五八

匈牙利王國..... 四六一

(甲)自由主義的失敗..... 四六一

(乙)赤色與白色的狄克推多制..... 四六四

(丙) 財政與經濟…………… 四六九

(丁) 復辟與疆界之改正…………… 四七一

第十七章 兩個斯拉夫民族的共和國…………… 四七七

捷克斯拉夫…………… 四七七

(甲) 獨立之勝利…………… 四七七

(乙) 憲法與改革…………… 四八〇

(丙) 少數民族問題…………… 四八四

(丁) 經濟與外交…………… 四八七

波蘭…………… 四九〇

(甲) 背景…………… 四九一

(乙) 畢爾蘇資基…………… 四九二

(丙) 國內的政務(一九一九—一九三二年)…………… 四九五

(丁) 財政與經濟的改革…………… 四九九

(戊) 少數民族…………… 五〇二

一九一四年後之世界

(己)但澤與波蘭迴廊.....五〇六

(庚)維爾那：另一個疆界爭執.....五〇八

(辛)外交.....五一〇

第十八章 蘇俄.....五一二

帝制時代.....五一二

一九一七年的兩次革命.....五一八

列寧與托洛茨基.....五二四

外戰與內戰之終止.....五二六

蘇聯的政治組織.....五三三

共產黨.....五三九

純粹共產主義之試行(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五四二

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一九二八年).....五四六

黨內的政見與衝突(一九二二—一九三二年).....五五〇

五年計劃.....五五六

教育與宗教·····	五六四
國際事務中之蘇俄·····	五六八
(甲)共產國際·····	五六八
(乙)衝突與休戰(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	五七一
(丙)曲線的外交政策(一九二五—一九三二年)·····	五七五
第十九章 東南歐羅巴 ·····	五八〇
歐洲的「魔釜」·····	五八〇
羅馬尼亞·····	五八一
保加利亞·····	五八八
希臘·····	五九五
南斯拉夫·····	六〇二
第二十章 土耳其人的土耳其 ·····	六〇九
從色佛爾到洛桑·····	六〇九

土耳其人希臘人古的斯坦人	六二六
獨裁者——凱末爾	六一八
宗教的改革	六二〇
婦女的地位	六二二
法律的改革和教育的進步	六二四
『土耳其的有爲的土耳其人民』	六二六
土耳其的國際關係	六二八

第二十一章 中國與日本

中國革命的經過	六三二
二十一條	六三六
中國與世界大戰	六三七
華盛頓會議	六三九
現代中國的教育	六四三
國民黨的勝利和種種問題	六四五

東三省的經濟利害關係……………六四七

日本的經濟問題……………六四九

中日衝突（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六五一

第二十二章 美國……………六五八

多難的時期……………六五八

『回到常態』……………六六三

『安全和穩健的』政策……………六六九

外交（一九二三—一九二九年）……………六七二

一九二八年的選舉運動……………六七九

胡佛的統治……………六八一

廣泛的興趣……………六八八

第三篇 最近的局面

第二十三章 歧路……………六九一

最近的發展述要……………六九七

附錄……………七一五

一九三三年十月以來世界局勢的演進……………七一五

一九一四年後之世界

第一篇 國際場面

第一章 走進死谷

世界大戰的基本原因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午前不久，奧匈帝國皇太子斐迭南（Francis Ferdinand）大公及其妃蘇菲（Sophie）被暗殺於波斯尼亞（Bosnia）之塞刺耶服（Serajevo）城，兇手為普靈西浦（Gavrilo Princip）六個星期之後，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就同塞爾維亞（Serbia）、俄羅斯、法蘭西、比利時和英格蘭捲入戰爭的漩渦了，鎗聲兩響，數星期恐懼和希望的交併，於是乎世界大戰！然而衝突的直接原因，不過是波斯尼亞一個有精神病的學生的病態舉動。至其根本原因，卻要回溯到一百多年前。

大戰的第一個基本原因，就是法國大革命時代與梅特涅（Meternich）時代所遺傳下來的國家主義和領

土回復主義的口頭禪。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間歐洲的政治史大半是由維也納（Vienna）會議一般外交家的行動所造成的，他們都排斥不顧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原則。維也納會議未能組織一個統一的德國；祇是容忍了日耳曼人、波蘭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捷克人、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等龐雜的民族所構成的中歐聯邦；再度瓜分了波蘭。這個會議又把比利時給與荷蘭；讓巴爾幹（Balkan）人繼續受制於土耳其；並將意大利分給奧地利、教皇和那不拉斯（Naples）國王統治。到十九世紀之末，民族主義的勢力對於這種領土的錯誤處分，自然已經矯正了一些，但在改善的過程中，又造出了若干為別的民族主義者所認為的創痛之點。

例如在一八七一年，新興的德意志帝國從法國取得亞爾薩斯（Alsace）州及洛林（Lorraine）州的大部分。德意志對於這兩州的要求理由僅不過說，這兩州原是法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和路易十五世先從「神聖羅馬帝國」奪取來的，兩州的居民，在種族上和語言上大多數是日耳曼人。不過事實上語言與歷史，在這個例子中是無關重要的，因為當一八七一年轉讓時，這兩州的居民多數寧願自認為法蘭西人，而不願為日耳曼人。因之第三共和的政府使竭力使本國人民時時刻刻保存那種復仇的精神和光復失土的希望。矗立於巴黎巽果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的史太師堡（Strasbourg）之黑衣塑像使法國人一見就想到失去的兩州，都德（Daudet）的最後之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使法國學童讀了都一灑同情之淚並引起同仇敵愾之心。除了上面所說的愛國情緒和復仇的志願之外，法國還有經濟的動機，想要取還亞爾薩斯——洛林。大家都曉得，德國工業上顯著的進步大部分以洛林州的鐵礦為基礎。所以法國的鋼鐵企業家一想到德國新增加的財

富，是來自本當屬於法國的土地的時候，就覺得難於抑制滿腔的義憤。

正當亞得利海 (Adriatic Sea) 之東，達爾馬提亞 (Dalmatia) 諸山的後面，又是一個同「亞爾薩斯——洛林」同樣的糾紛地——那就是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 兩州。在一八七八年，這一帶南斯拉夫區域爲奧匈帝國所占領。三十年後，竟不顧塞爾維亞的嚴重抗議，公然加以合併。塞爾維亞國內就發生了一種騷動，目的在強迫奧地利放棄這兩州，並准許以之歸併入於塞國彼得王的版圖。實際上，波斯尼亞人之欲與塞爾維亞聯合，還不如他們欲從奧匈帝國取得其獨立之熱切，但是塞爾維亞人的援助總是他們所歡迎的。

意大利也希望取得海布斯堡 (Habsburg) 皇族所統治的土地，因爲當伊瑪努兒二世 (Victor Emmanuel II) 在一八七〇年進羅馬的時候，意大利的統一並未完成。有很多意大利人民居住的特稜鐵諾 (Trentino) 及脫里斯德 (Trieste) 港四周的區域仍舊「未恢復」。所以「未恢復的意大利」(Italia Irredenta) 之呼聲是戰爭的呼聲，而非和平的呼聲。此外，意大利除了想完成國家的統一，同時又想和奧地利競爭對於亞特利海的支配權。這兩個對頭祇有在合謀阻止塞爾維亞取得海口的當兒，纔有一致的海上政策和海軍政策。

復次，奧匈帝國的本身，就是對於國家主義和領土回復主義的一種挑戰。這個「聯合帝國」(Dual Monarchy) 的統治者，爲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受治者有波蘭人、捷克人、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小俄羅斯人和羅馬尼亞人，情形龐雜，勢必歸於崩解而後已。其所以能暫時合作，似乎祇賴老皇約瑟 (Francis Joseph) 的威望及人民對於他的年高德劭的尊崇心。一旦老皇崩駕，聯合帝國即將趨於解體，這幾乎成爲家喻戶曉的事了。

最後，「近東問題」裏面，隱患方興未艾。土耳其之失政，希臘、塞爾維亞、保加利亞三國對於支配肥沃的馬其頓區域及其種族成分極其混雜的居民之互相敵視，巴爾幹所有基督教諸國之互相嫉視，俄羅斯所堅持的干涉與支配之企圖，汎斯拉夫主義的熱情，奧德的「東進政策」(Drang nach Osten)，列強對於「歐洲病夫」的將來在經濟上與外交上之敵對，以上種種實際上已注定巴爾幹半島為戰爭的火藥終有一日在那兒燃着的地方。

民族主義的問題，還有其另一方面。過分誇張民族主義，和違棄民族主義一樣，對於和平有極大的危險。到一九一四年，所謂「愛國者」，一般人漸以為就是那樣的人，他把本國擡在其他各國之上，輕視外國的文化，極口揄揚自己的習慣風俗，把自己當做上帝新的選民，並對鄰邦採取一種即非欺凌，亦為傲慢的態度。

雖然多賓乞克(Preischke)張伯倫(Chamberlain)本哈第(Bernhardi)這些人給與了德國人的「愛國熱」(Vaterlandsliebe)以一種特色，但德國人最壞亦不過比法國人、英國人或日本人稍為多受了一點國家主義的襲擊而已。汎斯拉夫主義也許不比汎日耳曼主義那樣有組織，但不見得比後者欠激烈。退職的騎兵將官本哈第將軍在他的德國與下次大戰(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一書內，稱贊戰爭足使適者生存，並預言德國文化當廣播於全世界之千年期。和他一樣，英國人李荷馬(Homer Lea)也在撒克遜人之時代(Day of the Saxon)一書內，使他自己和其他英國人確信這種建設文化事業有待英國人來完成。此種國民自大心不免生出惡意，使外交談判困難，並引起國際的糾紛。每一個大國和許多小國都有特殊的「戰爭崇拜」，這種崇

拜常給一般退職的海軍將官，受年金的將軍和過度的愛國家所領導着，激起了國家間的衝突。

戰爭的第二個基本原因即爲黷武主義的流行和軍事同盟的制度。凡是一個軍國，它的人民總准許軍人的權力壓服文官的權力。到一九一四年，歐洲完全軍國化了：法國同德國一樣，奧國也不亞於俄國，英國被海軍界所統制的程度，僅僅稍差於歐洲大陸被陸軍界駕馭的程度。一個軍國，特別是與仇敵密切接觸的軍國，自然要尋求軍事同盟國。所以俾士麥（Bismarck），認定軍國主義爲他所建立的強大德意志帝國的基礎，並知道法國不能馬上忘記它的恥辱，於是創造了同盟的制度。這種制度卒將歐洲分爲兩個敵對的軍壘。德國一有了同盟，法國必定也作同樣的準備。

德國爲了地理上與戰略上的理由，並因政體相同之故，起初選定俄羅斯與奧匈帝國爲其同盟國。一八七二年「三帝聯盟」（Three Emperors' League）之成立，俾士麥實負其責。然而俄與奧在巴爾幹的利益是互相衝突的，故當俾士麥在柏林會議席上表示袒護奧國的時候，這個聯盟事實上已告終了。雖然從一八一一至一八八七年間三帝重溫舊夢，但一八七九年德意志與奧匈的同盟終於代替了三帝聯盟。德與奧匈約定，如遇俄國攻擊德國或奧國，兩國應互相幫助。於是俾士麥又在一八八七年與俄國另外商訂了一個再度擔保條約（Re-Insurance Treaty），承認俄國在東巴爾幹的優越利益。

其時，意大利急於要他國承認它是列強之一。它與法國在突尼斯（Tunis）問題及關稅政策上發生齟齬，因之就四顧求助。意人記得俾士麥曾在一八六六年使奧國把威尼西亞（Venetia）讓與他們，所以再度與舊友接

近。於是在一八八二年，意大利得加入德奧同盟一系，而「兩國同盟」(Dual Alliance)變成了「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這個三國同盟重訂了四次，當世界大戰爆發時，仍爲有效。

三國同盟屬於防禦的性質，並規定倘其中一國受第四者一國的侵略時，其餘兩國應守善意的中立。如其中一國受盟外兩國之攻擊，三國均應共同作戰。此外，意大利承允遇法國攻擊德國時幫助德國，德奧兩國亦承允遇意國受法國攻擊時援助意國。奧國與意國最後並同意於在巴爾幹之「相互酬報」就是說，任何一國在巴爾幹有土地進益時，其他一國在該地或他處應得同等價值的報酬物。此外並確切規定，三國同盟並非對英國而發，——因爲意大利的綿長而無掩護的海岸線將使此種舉動顯爲有勇無謀。這樣一來，中歐造成了一個強固的集團，孤立的祇是東部與西部諸國。(註)

(註)在一八八三年羅馬尼亞(Rumania)也加入了這個集團。最後續訂的四國協定(Quadruple Agreement)係簽署於一九一三年二月，其有效期限至一九二〇年七月爲止。

三國同盟的弱點在於奧意兩國的態度與利益之相衝突。第一，兩國之間向有仇恨，這是與人統治意大利半島的長時期內所釀成的。第二，奧國仍保有若干未恢復的意國疆土。第三，兩國對於亞特利海(Adriatic Sea)的霸權之爭奪，勢成對頭。這個盟約的脆弱，第一個表徵也許即是意大利與法蘭西間一九〇二年的祕密條約之簽訂，其中規定任何一國受第三國侵襲，或「因受直接挑釁之結果」，該國「自覺爲防護本國之名譽或安全計不得首取宣戰之步驟」時，其他一國應守中立。(註)

(註)俾士麥對於意大利是否忠於盟約一問題，看得很明白。早在一八八〇年，有人講到與意大利訂立條約的時候，他說：「意大利的諾言，如非爲其己身的利益着想，是無價值的。」

一八八二年的三國同盟成立之後，英、法、俄三國覺得自己站在非常不利的地位。一遇緊急之時，它們祇好各自爲計，而中歐卻能行動一致。這個局面的重要馬上被大家所認清，當威廉二世 (William II) 撤下一八九〇年與俄國所訂的再度擔保條約的時候，法、俄親睦的障礙就掃除了。這兩國的友誼開始於法國之投資於俄國鐵路與軍事的經營，而完成於一八九一年的「法、俄協商」(Franco-Russian Entente)及一八九四年的「法、俄同盟」。(註)後者的有效期限與三國同盟同，它是一個防禦性質的協定，其中規定兩國如遇中歐諸強侵襲時，應互相援助。

(註)在一九一四年之夏，俄國所欠於法國投資家的款額達九十億以上佛郎。

現在單剩英國仍舊孤立着。由國內的政治家看來，這樣的情形不久就會失去其光榮。自威廉二世表示德國的將來有賴於海洋以後，超然孤立的危險更爲顯明了。再者，無畏艦之採用，實際上使以前的一切戰船成爲無用，因之大大地減少了英國所加過於其他國家的海軍威力之界限。(註)因爲所有英國人——軍人，帝國主義者及和平主義者——都明白英國依賴於進口的原料和食糧，所以他們相信本國必須具有無敵的海上霸權。反之，德國國內人人覺得英國所以有對於這種莫與之京的海軍的欲望，大半由於想穩握商業優勝權。每一種看法都有他們的說法，但最重要的，就是英國開始畏懼德國的威脅了。使事情更糟者，俄國與法國在一九〇〇年前對於

英國都是不友誼的。同俄國，有關於波斯、阿富汗、西藏及海峽（The Straits）的爭端。同法國，有關於蘇丹（Sudan）及其他殖民地的齟齬。所以，繼續的孤立似乎使英國的地位越發不安穩了。（註二）

（註一）第一艘無畏艦係於一九〇六年在英國造成。到一九〇八年，英國已批准着手建造十二艘無畏艦，德國則造九艘。前乎此，英國戰艦與德國的比率差不多為是七對三。

（註二）在一九〇二年，英國曾與日本簽訂同盟條約。

自畏德的德爾卡舍（Delcasse）入長法國外交部（一八九八年）及親法的英皇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繼承大統（一九〇一年）以後，使情形為之大變。這兩個人很順利地立下了一九〇四年「友誼協商」（Entente Cordiale）的基礎，兩國藉以解決久懸未決的殖民地爭執，並成為外交上的夥伴。此後，法國祇須從事調解英、俄的不睦，使言歸於好。在一九〇七年，「英、俄協商」果然成功了，這是法國所引為欣幸的。

所以，從一九〇七年起，歐洲分為兩個敵對的武裝集團：「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與「三國協商」（Triple Entente），每一個有許多黨羽。雙方都實力充足。雙方都亟於博得外交上的勝利。並且每一方準備着訴諸武力以恐嚇他方。假使任何一集團喚起其他一集團的恫嚇，戰爭就不可避免。這種陣容的直接結果，就是造成連續不斷的國際緊張局面，自一九〇五年的摩洛哥事件起，而終於一九一四年奧皇儲斐送南之被刺。這些危機必須加以簡單的討論。

德國外交部恐怕德國在北非洲的利益被英、法間所訂的一九〇四年協定所危及，並想試驗協商各國的實

力，不惜違反威廉二世的本意要他巡遊摩洛哥（Morocco）的坦支爾（Tangier）地方（一九〇五年）德皇在那裏的演說，說着重於土著統治者的獨地位，及德國要保護本國在北非洲的利益的決心。他警告摩洛哥，如未經在摩洛哥享有利益的列強所開國際會議之事前認可，不得接受法國所提議的某種改革。德爾卡舍及其同僚對於德國這種「干涉」非常憤怒，並準備率與德國兵戎相見，而不願出席會議。然而鑒於俄國最近與日本作戰的慘敗，料想得不到俄國的援助。法國內閣因之同意於舉行國際會議，德爾卡舍即行辭職。至此，德國算是勝利了。但在阿爾幾西拉斯（Algiers）會議席上，德國唯一氣味相投的朋友祇有奧匈帝國。反之，法國卻有英國、俄國、美國與意大利為之聲援。這次事件大大地增加了德法之間的惡感與猜疑。

阿爾幾西拉斯會議後經過比較安靜的兩年，又發生一九〇八年巴爾幹的危機。奧匈帝國利用青年土耳其黨革命的騷亂，把它自一八七八年以來所占領的波黑兩州加以合併。這次合併是依照奧國外交大臣阿蘭塔爾（Aehrenthal）伯爵與俄國外交大臣伊士伏爾斯基（Izvolski）於一九〇八年九月十五日在摩拉維亞（Moravia）的布克勞（Buchlau）所訂的協定。「布克勞議定」（Buchlau Bargain）認可奧國合併這兩州，俄國不加反對，作為報答奧國准許俄皇戰艦自由出入海峽的美意。施行這個協定的時間並未規定。當伊士伏爾斯基漫遊各地，以便取得其他歐洲國家對於開放海峽之同意時，聽說阿蘭塔爾已於一九〇八年十月七日實行了他邦一方面的計劃，大為憤懣。等到曉得英國願意將海峽開放給所有的國家，單將俄國除外的當兒，他更為狼狽。

這位俄國外交大臣為欲顧全面子起見，堅持舉行一個會議來追認奧國的行動。當阿蘭塔爾拒絕這個提議

的時候，戰事似乎迫在眉睫了，但是俄國還沒有作戰的形勢，法國也表示不願借巴爾幹的問題開火。反之，德國卻預備做奧國的後盾。伊士伏爾斯基覺得自己受了屈辱，對於德奧這種外交上的勝利，怒不可遏。他懷了怨恨，無處發洩，就鼓勵塞爾維亞人把波黑兩州認作他們的「亞爾薩斯——洛林」，並拚命激動世人來反對中歐各強。塞爾維亞受了俄國這種坦白友誼的激勵，越發強聒不休了。

在一九一一年，我們看到第二次的國際大危機。德國人因為不滿意於與法國在一九〇九年所成立的關於摩洛哥的妥協之執行，就在那年派遣戰艦「豹」號到阿加竇（Agadir）港，表面上爲了保護德國的利益。在天之內，英國和法國也開出戰艦到那個港口。當德國堅持這件事單宜由德法兩國解決，與英國無涉的時候，英國財政大臣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即揚言欲戰。他在倫敦市長官邸的演說詞裏面宣稱：「倘使大不列顛在涉及它的利益的問題上被人輕視，一若它在國際內閣裏爲不足輕重，那末我就要堅強地說，用那種代價得來的和平是一種恥辱，非我們這個大國所能容忍的。」幸而雙方會加相當的解釋，所以在一九一二年，又成立了另一個妥協。德國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重要利益，法國則將剛果（Congo）的莽叢地十萬方哩讓與德國。然而法國的人民都不滿於這個協議，兩國的新聞界和輿論界都極力抨擊本國當局，說他們竟受別人的欺瞞和陵辱。其時，一般政治家的頭腦，更爲土意戰爭之緊張所纏昏了。意大利將有些是糊塗的，有些是實際的各種要求爲其行動的根據，在一九一一年進行確立其保護權於的黎波里（Tripoli），這個地方本屬於土耳其宗主權之下。德國對於土意的戰爭，大感惶惑，認爲這確實是屬於中歐同盟一系的兩個國家的衝突，因爲那時土耳其正和

德國交歡。這場戰爭並且將使巴爾幹的現狀不免於改變，特別是當意大利在達大尼爾（Dardanelles）攻擊土國的時候。諸強國也非常恐懼，怕的是土耳其會被瓜分，而歐洲的大戰會因分贓不均而促成。事實上的黎波里的戰爭直接引起下次的危局——即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而巴爾幹戰爭差不多就是世界大戰的序幕。

當時少年土耳其黨的心神正為國內事務及對意的爭鬪所攝而無暇他顧之時，鼓勵了希臘的首相芬尼最（Venizelos）去聯合希臘、塞爾維亞、蒙特尼格羅及保加利亞，組織「巴爾幹聯盟」（Balkan League）（一九一二年）。這個聯盟在一九一二年和土耳其打得很順利，但因爭執報酬而卒歸解體。隨之發生的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傾覆了巴爾幹半島的均衡，並在歐洲政治家中產生了「過敏的神經」。再者，巴爾幹戰爭減弱了德國的友人——土耳其，而使奧國的敵人——塞爾維亞的疆土擴大了一倍。

俄羅斯和塞爾維亞對於這場戰爭的最後結果自然是歡欣鼓舞的，但是德國卻大為懊惱。一九一三年，德帝國會議通過了陸軍新法案（New Army Bill），增加了服兵役的人數，法國馬上報復，增加兵役的期限自兩年至三年。俄國同樣擬定了許多計劃，以改編陸軍，並每年增募新兵十三萬五千人。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六大國的常備陸軍與海軍共有四百二十五萬人，不必說有上千萬的受過訓練的預備兵。在一九一四年，事實顯然可見，若再有有另一個危機，就很難平和地度過了。一般人都恐怕下一次的糾葛就是大戰了。果然不出所料，塞刺耶服地方的危機竟促成空前的大衝突。（註）

(註)自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四十年中，各國陸海軍軍費增加如下：德三三五%，俄二一四%，意一八五%，英一八〇%，奧一五五%。
注一三三%。

經濟對立與帝國主義可算是大戰的第三個原因。事實上，這兩個要素都見於前面所述大多數危機中。十九世紀之末與二十世紀之初數年中的世界史，其特徵即為對於市場，原料來源，食糧來源，可投放過剩資本和安置過剩人口的地方等等之爭奪。這些因素，終於促成瓜分非洲和侵入近東與亞洲的企圖，並引起國際的競爭和惡意。英、德間商業的拮抗，奧、匈帝國與俄羅斯間相衝突的利益，甚至於奧、匈帝國與意大利的交惡，其由來大部分都可追溯到現代經濟帝國主義的崛起。

這件事說來太長，此地無暇詳述，但我們應該指出，一八八〇年後每一年過去，英國的戒心與之俱增，它惟恐德國在世界商業與貿易的競走場上超越它。英國人在一九〇〇年與一九一四年間所以發出許多唐突不客氣的話，實緣於商業上的嫉妒。一般焦急的英國實業家時時刻刻準備，贊助商業的和海軍的宣傳，他們事實上亦極欲如此。英國當時大受真正「德國製造」(Made in Germany)的複雜心理的痛苦，這是歐洲和平的凶兆。巴爾幹方面的經濟對立，同樣足以挑起奧皇約瑟(Joseph)、俄皇尼古拉斯(Nicholas)及意皇伊瑪努爾(Emanuel)屬下的人民的怒燄。

大戰的第四個基本原因即在缺少支配國際關係的任何組織。這種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畏懼，外交之流行，往往甚至有連閣員或整個內閣都不知道本國與他國政府間有某種協定存在的。

會，它完全被瞞住，對於書面的或口頭的外交與軍事約定，毫無所聞。因之葛萊（Sir Grey）爵士能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公然否認對於下院議員的行動自由有任何限制，實際上當時他已與法國有極重要的約定。外交家所握的權力太多了，他們全為個人的動機或弱點所支配。人民的福利常常不在他們考慮之中。

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及秘密外交，造成了像龐孫貝（Ponsonby）在一九二七年對衆議員所講的情形：「偷天換日，宵小行爲，誑語欺人，苞苴賄賂和營私舞弊是世界各國的外交部與使領館祕書室共有的現象」。這種情形自然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現出不安不定的樣子。爭點與責任被蒙蔽了；混亂與狂熱竟以沈着與誠實為犧牲而統治了一切。

『國際法律與道德』的典則自然是有的，但施行的機關全付缺如。海牙（Hague）會議所採取的許多決議，僅僅是些伴爲虔誠或偽善的希望。各國對於「主權」皆有其誇張的解釋，也覺得祇有自己負責。所以某一個同盟的份子之一與其同盟諸國的敵人祕密磋商，並無人認爲不當。例如，意大利雖爲三國同盟的一份子，同時卻與法國（一九〇二年）和俄國（一九〇九年）有友好的協定。再如，羅馬尼亞的國王可以爲威廉二世的盟友，而其人民與國會則似乎寧願與俄國交歡。

我們記住歐洲大局的這種背景，就容易了解德國駐法大使房雄（Freiherr Von Schön）於一九一四年所說的「和平現在祇能聽命於意外的事變了」這句話。在那年六月二十八日，那件意外的事變發生了。

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

世界大戰的直接緣由就是奧地利與塞爾維亞之間的仇恨。單是這個因素並不能釀成大戰——它祇是決定武裝衝突的爆發時間罷了。塞爾維亞人覺得他們對於奧地利心懷不平的地方很多。第一，他們想把奧匈帝國的南斯拉夫部分劃入大塞爾維亞的範圍。第二，奧國（和意大利）有好幾次阻撓塞爾維亞取得亞得利海海口的企圖。事實上，奧國控制着塞爾維亞的出口貨，因為塞國的貨物必須通過奧土而至奧國的出路。好幾次，塞爾維亞冒犯了奧國，奧國就留難塞國的貨物（大半為豬口），不准運出去。奧國對付塞國行為過失的豬口檢疫的慣技，有個特別名詞，叫做「豬口政治」（Schweinepolitik），在一九〇五年，事實上發生過一次「豬的戰爭」。

有這個緣故，難怪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境內的斯拉夫人要組織祕密會社，來威脅奧國承認汎斯拉夫主義者及塞國的國家主義者的志願了。其中有所謂「黑手」（Black Hand）或「團結或死亡」（Union or Death）黨者，計劃行刺波斯尼亞州長坡提奧勒克（Potiorek）將軍。（註一）然而該黨黨人一聽說斐迭南大公將於一九一四年六月蒞臨波斯尼亞，就決定放棄坡提奧勒克而行刺斐迭南。其時塞國陸軍部人員，特別是參謀本部偵探科科長地密特里其維區（Dimirjievitch）上校與坦科西區（Tankositch）少校，供給武器及火藥，並代請教師，使那一羣自告奮勇的，因犯革命被配流的玻州少年可成爲放鎗和擲炸彈的能手。（註二）

（註一）「黑手」黨的鈐記刻有骷髏，兩骨交叉，七首炸彈，和一瓶毒藥的圖形。

(註)在一九一七年之夏，地密特里其維區，大概因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被控犯陰謀傾覆塞政府的罪而遭槍決，其被控告的理由是
很虛弱的。

斐迭南大公在奧皇朝廷不大得人心。在奧的德國領袖和在匈牙利的匈人領袖對他深表不悅，因為他贊成建立奧——匈——南斯拉夫帝國以代奧——匈帝國。他在朝廷又和一般老年人不相投，因為他堅持對於政治和軍隊的改革。在一九〇六年，他為霍參采夫(Hörsendörfer)謀得參謀總長的位置，以繼年高的貝克(Beck)男爵，但那個人是奧皇所不歡喜的。約瑟皇為了討厭霍參采夫所擬對塞「預防」戰的方法與計劃，於一九〇九年取消成為慣例的親臨閱兵的典禮。斐迭南乃於一九一四年往波斯尼亞視察六月大操。

依照預定的計劃，斐迭南大公與其妃將於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幸臨波斯尼亞的首城塞刺耶服。這一天為聖維都斯紀念日(St. Vitus' Day)，恰巧又是塞人追悼並紀念科索伏(Kosovo)戰爭(塞人之喪失獨立於土耳其，即在此戰)的一天。當奧皇儲一行人在早晨出發向市政廳前進的當兒，突有一個波斯尼亞的學生對着皇儲的汽車擲炸彈。這個學生和其他兩個同伴是在塞國官吏的保護之下越過塞國境界來到波斯尼亞的。那個炸彈也許自動跳起，也許被甩出車外，落在車身背後的路邊爆裂。後面一部汽車卻給炸毀一部，傷官吏一人和旁觀者若干人。刺客察布林諾維區(Chabrinovitch)當場被逮。皇儲一行仍繼續前進。

及抵市政廳，由市長致歡迎辭(一)後，皇儲下令扈從按照原來計劃出發參觀該城博物院。運命注定，這次可難逃了。皇儲所乘的車，滑錯了街，車夫得把車子掉過頭來。因轉動困難，耽擱了一下子，恰恰給與三個刺客中另一

人名普靈西浦的一個很好的機會。他馬上從人羣中走上一部，對準汽車連放兩鎗。第一彈射入皇儲的頸部。第二彈或者原以坡提奧勒克爲鵠的，卻誤中太子妃蘇菲。

最後通牒

奧國當局在一九一四年並不知道塞國官吏與刺客有關的確實程度。他們不曉得塞國的國務總理帕盧區 (Pashitch) 在事前數星期早已知道行刺的祕謀；也不曉得他並會下令阻止那三個學生重入波斯尼亞境，但是邊境上的守衛兵，因爲他們自己是「黑手黨」的黨員，竟不睬這道命令，嗣後聲稱命令到達太遲；更不曉得塞爾維亞政府顯然協助了主凶之一——西加諾維區 (Giganovich) 於慘劇發生後逃去。奧人雖然缺乏確定的證據，仍以爲塞爾維亞即無縱容的形跡，也有重大疏忽的嫌疑。所以接着的一個月是很困惱的。

歐洲盼望奧國能够得到滿足，但希望它的要求能合理。一週復一週地過去，未再發生事故，一般人漸漸安心了。大家以爲奧國的鳴冤狀所以遲遲未行草定，顯然是因爲它想平心靜氣地思索一番。不幸這一層並非延緩的真正原因，真正的緣故乃在奧國政府中人意見的紛歧。

奧國外交大臣栢耳喜托特 (Berchtold) 伯爵覺得永遠擊破俄國與塞國的陰謀的時機降臨了，因爲非如此，聯合帝國的完整總常常感到威脅。他相信，除非奧國要求嚴酷的報償，塞國仍會繼續它的破壞的奸謀。他明知俄國爲塞國的後盾，但他希望沙皇的政府終會像在一九〇八年一樣讓步。他要草擬一封不能接受的哀的美敦

書，於是不等到其他國家干涉之前，就將奧國的軍隊壓服塞爾維亞。這樣一來，一切危險就會很快地過去。

栢耳喜托祇求這場戰爭是「局部的」，並希望德國的威勢會使俄國生畏而守中立。從他的觀點看來，這個辦法是一種自衛自全的舉動。要做約瑟的忠藎之臣，他認為舍此別無良策。參謀總長霍參采夫和栢耳喜托完全同意，但他着重於這一點：必需德國一定擔保，遇俄國加入戰爭時，決意助奧。反之，約瑟和匈牙利首相替士沙（Thersa）伯爵甚至反對局部的戰爭。奧皇熱望和平，替士沙則怕塞國疆土之合併於兩個民族構成的帝國會變成三個民族的帝國，因之減少匈人的勢力。

德國在七月五日答應助奧，同時警戒它不要向塞國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這張著名的「空頭支票」連同塞國官吏與新聞紙所發的「簡直不可容忍的」激論，最後改變了約瑟和替士沙的見解，使他們和栢耳喜托特歸於一致。那位外交大臣於是進行起草哀的美敦書。他想，唯一的危險就怕俄國這次不致於被嚇退，但是倘遇此種情形，可依賴德國的援助。德國人看見他們的忠順的盟友將被人打敗，顯然不會袖手旁觀。

在七月二十三日，塞爾維亞接限四十八小時答覆的最後通牒。在將這封通牒送交塞國政府前，其中所定條件的大綱已給德國外交部知道，但等到德國要設法叫奧國加以修正或撤回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此刻德國纔感覺到自己已把頸子放進圈套裏，而以繩子的另一端授與奧國了。德皇威廉二世披覽那些要求條件的時候雖然大驚失色，但仍不搖動他所許於必要時援助奧國的意向。

那封通牒譴責塞國政府不遵守一九〇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協定，規定塞國與奧匈帝國「在將來應以友

善的鄰誼共處」者。要求塞國鎮壓國內報紙、書籍、學校與政界中一切反奧的宣傳；逮捕並審判有共謀行刺嫌疑的官吏；解散「團結或死亡」黨；並允許奧匈官吏在塞國共同審判塞刺服耶慘案的嫌疑犯並鎮壓反奧運動。

在塞爾維亞接到通牒後一日，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Sazonov)照會駐俄的塞國大使，告以「俄國在任何情形下決不許奧國侵犯塞國」。塞國得到這樣的鼓勵，決定不全部接受這封通牒。恰在限定時間屆滿前，它送出覆文，承諾若干條件，但拒絕准許奧國裁判官在塞國境內行使職權這一項規定，認為侵犯本國的主權。又表示願意將整個事件提交海牙公斷法院或列強會議處理。

歐洲大多數國家，連德國在內，都認這個答覆很合理。威廉二世相信它已解去了「造成戰爭的各種理由」。他和首相柏特曼和爾味(Bethmann-Hollweg)德惠維也納方面試行和解。但柏耳喜托特獨執拗到底，宣稱這個答覆不滿意，在七月二十八日，奧——匈對塞宣戰。由此可見奧——匈是第一個宣戰的國家。它所以出此，蓋因深信這是維持其將來安全的唯一途徑，並渴望此戰限於局部。塞國政府在拒絕全部接受通牒的時候，早知戰事將隨之發生。實在，塞國在送達覆文於奧國前兩小時，就下總動員令了。

此刻英國和德國正在熱狂地設法使戰爭不致成爲普遍的。然而在隨起的一切談判中，德國人記牢下面一事：假使戰爭不免於擴大，德國要求勝利，主要希望即在實施「舍利芬計劃」(Schlieffen Plan)這是參謀總長毛奇(Moltke)的前任者所草擬的。這個計劃預料到德國終有一日和法國及俄國同時發生衝突，算定德國兵力的大不如人一弱點可賴俄國動員的遲緩來彌縫。一遇戰事，德國當集中其主力於西疆，以便乘法國不備而迅速

擊破之，同時在東疆祇設單薄的陣線來抵禦俄國。等到法國被打敗之後，然後將大隊人馬調回東疆，猛攻俄軍。這個計劃又企謀假道盧森堡（Luxemburg）和比利時侵入法國，以免費力攻打法國的強固堡壘及其東部的佛日山（Vosges）之天險。因之，如果多耽擱一天，就使俄國多一天出師的準備，這樣減少了德國因動員比較迅速及軍用品比較完備而生的優勢，而使德國感到危險性日益增大。

德國既然明知法國與俄國已曉得它的「舍利芬計劃」，所以對於俄國在七月二十八日後遷延時日並使戰事遲緩若干日蔓延開來的機巧行動，深為懷疑。反之，法國知道德國會被迫首行宣戰，以着俄國動員之先鞭。因此法國確信，如果它祇是等候着，德國就會成爲戎首而侵入比利時。這樣一來，這場戰事在德國一方面是取攻勢的，而意大利在三國同盟下所應負的一切義務就會被解除。如果德國侵犯比利時，就可期望英國出兵抗德。

當德國於七月二十八日後竭其全力設法約束奧國之際，俄人正在祕密加緊準備。俄國軍界因法國的態度而倍增勇氣。從七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三日，法總統普恩加賽（Poincaré）曾聘問俄國。他滿口答應，俄國如着手遏阻奧國屈辱塞國，法國決爲助力。他說：「塞國在俄國人民中有親密的朋友，俄國卻有一個同盟者，法國」在七月三十日下午，俄國下總動員的命令。於是德國致通牒於聖彼得堡，要求俄國於十二小時內停止動員，否則以兵戎相見。俄國置之不覆，德國乃於八月一日下午五句鐘對俄宣戰。「促成最後那場大禍的，第一還是俄國的總動員，那時德國尚在試行使奧國覓取和平解決的途徑，但俄國這樣一來，竟使德國也動員，繼之宣戰」。（註）就德國而言，戰爭是自衛的最後一着了。

(註)這段話引自 S. J. P. P.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War, 1908, Vol. 2, p. 555. 奧匈對俄之宣戰則在八月六日。

在英國，外交大臣葛萊爵士曾經設法維持和平，並主張以「直接談判」代替戰爭，但實際上他未能抓住這兩個防止衝突的可能機會之一。他也許可以坦白地告訴德國說英國將助法、俄，或警告法、俄說英國將守中立，來防止大戰。如試行第一法，威廉二世與栢特曼和爾味也許可以對栢爾喜托特加以更大的壓力。如試行第二法，普恩加齊、伊士伏爾斯基、薩佐諾夫及法、俄的其他領袖人物也許會把腳步放得慢一點，好戰性減輕一點。然而葛萊並不這樣做。他不能公然允許幫助法國與俄國，因為他的內閣的意見是分歧的。他也不肯公然承諾中立，因為以前所成立的秘密約定和關於海軍的默契使英國不得不防護法國的北部與西部海岸，以禦德國海上的侵襲。他更無意於冒着與俄破裂之險，恐怕沙皇的政府會退出一九〇七年的「英、俄協商」。葛萊在答覆國會的質問時，從容不迫地公然否認英、法之間有任何秘密的諒解，並直言衆議院所有關於交戰各國的行動自由無論如何不受秘密協定的拘束。

葛萊本人相信爲英國商業上和海軍上的利益計非依附於協商(The Entente)方面不可。他不願有戰爭擴大，但如情勢必不免於一戰，他預備站在法、俄方面。然而英國的輿論反對因巴爾幹問題而戰。英國國內一般人對於塞爾維亞人很少有同情心，因為他們認爲，大體言來，塞人當負危機之責。可是不久，德國自己使英人改變了觀念。在八月四日，德軍侵略比利時。此項行動發生於德國，因法國不允守中立並拒絕交出其東部幾個要塞以作誠意的擔保，而對法宣戰（八月三日）之後，德國初向比國要求准許德軍通過它的國土進攻法國，附有領土完

盟及賠償損失的擔保。比王亞爾培德 (Albert) 認爲此舉破壞本國的中立（這是一八三九年的國際條約所保證的），遂向英國求援。所以當德國軍隊於八月四日開入比境的時候，英國立刻對德宣戰。

世界大戰是在進行了。是誰之咎呢？沒有人能說。但在各交戰國的京城裏面，人民都歡喜若狂！

第二章 世界大戰

燎原之勢（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四年尙未過完，更有三國加入戰爭。蒙特尼格羅（Montenegro）於八月七日聲援塞爾維亞。八日後，德國接到日本的最後通牒。它「勸告」德國將其所有戰艦開出中國與日本的領海，並以在一八九八年租自中國，限期九十九年的膠州地方讓與日本，「以便最後轉還中國」。日本所以取這種機巧行動，有幾個動機。在一九〇二年所訂，又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一年重訂和修正的條約中，日本與英國承允遇英、日任何一國在遠東屬地受敵國侵襲時，互爲援助。現在德國既然準備利用山東半島上的膠州作爲海軍根據地，來破壞英國在遠東的商業和運業，英國當然要請日本履行同盟的義務。這個請求，連同想承繼德國在華利益的希望及圖報復德國於中日戰爭後的不友誼態度（一八九五年）的欲望，乃致令日本發出這封最後通牒。日本因德國未能於限定的八日之內答覆，即行宣戰（八月二十三日）。

到十一月七日，日人已奪取青島，德國在山東的第一要塞。守衛青島的德軍有四千五百人，其中多爲後備兵。此後日本的軍事行動祇限於與英軍合作巡邏太平洋；供給糧食與軍需品於各協商國，特別是俄國；並出戰艦數

隊協助護送船舶通過地中海和東方諸海的潛水艇地帶。

其時，德國的希望因土耳其加入本國一方參戰而增高。當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外交的危機達於極點的時，德國與土耳其簽訂了一個秘密條約，遇德俄開戰時發生效力。根據雙方協定的條件，土國應援助德國，而德國以領土完整之保證為報。因為協約國（註）不知道有這個條約存在，所以他們還同土國磋商，要它守中立。土耳其政府顯然以此種談判為奇貨可居，協約國越是肯出價，土人越是誅求無厭。同時，有了德國的軍官和金錢的濟助，祕密的和大規模的軍事準備也在進行了，因為土耳其認為阻止俄國在海峽的計劃，打擊汎斯拉夫主義以及終止英國在埃及和塞浦路斯（Cypus）的威權之時機已成熟了。

（註）大戰爆發後不久，協商各國即被通稱為「協約國」，而德與其同盟國則稱「中歐同盟國」。

在一九一四年十月，有兩艘德國巡洋艦，「古班」號（Göben）與「勃利斯勞」號（Breuar）被協約國的軍艦驅入土耳其的海港。雖然德人拒絕在國際法所限定的二十四小時內離開那個港口，土耳其人仍不加以拘留。協約國因提出抗議，土國政府於是「購買」那兩艘巡洋艦並編成土德艦隊，以德國海軍大將蘇春（Souchon）為司令，來答覆協約國。十月二十九日，這個艦隊不經宣戰就破擊黑海中俄國的幾個海口，十一月三日，俄國乃對土耳其宣戰，兩日之後，英國和法國也對土宣戰。

土耳其的步驟似乎對於德國非常重要，有一個時期且使協約國極感苦惱，俄國與其友國間經過海峽的通路現在被截斷了，其結果使協約國覺得要取得極需要的俄國穀類並以軍需品接濟沙皇的軍隊，很不容易了。再

者，一般人都預料土皇之宣告「神聖戰爭」，會引起菲亞兩洲英法屬地回教徒的揭竿叛變。但事實卻相反，神聖戰爭的呼籲影響至微，而英國的官吏如勞倫斯（Lawrence）上校及栢爾（Bell）等人實際上倒能引誘許多阿拉伯回教徒反叛土皇。

各協商國既不能羅致土耳其為同盟者，不久即依照現代帝國主義的公認原則先在紙上瓜分土耳其帝國，聊以自慰。一九一五年三月的秘密條約實際上已掃除了歐洲部分的土耳其。他們將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及海峽劃歸俄國。亞德里雅那堡（Adrianoople）與歧耳克·歧利舍（Kirk Kilisse）四周的小區域留着不動，大概用作誘惑保加利亞（Bulgaria）之餌。亞洲部分的土耳其則保留於英法，由兩國以後另訂協定處分之。在同一條約中，俄國准許英國伸張其勢力於波斯的中部或中立地帶，這是一九〇七年的默契所設定的。這個盟約直至一九一七年，當布爾扎維派人將帝俄檔案保存中所發現的一切秘密條約公布的時候，纔為世人所知。

意大利早已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宣告中立，其理由則謂這場大戰在中歐同盟國方面是取攻勢的，故意國本身而言，三國同盟的條款已經失效。意大利的屹立不動對於法國有直接的利益，因為法國此刻可以放心密集所有的軍隊於北部與東部邊疆，來止住勢如潮至的德軍了。復次，意國既為中立國，就不會干涉法人自北非輸送軍隊於本國，也不會妨害英國在地中海的交通線。反之，德國和奧匈帝國都沒有真正期望意大利在這次大戰中出力援助他們，所以對於他們的「同盟者」之守中立，也很滿足。可是當意國將它的軍隊從法國邊界上略為向後撤退，並集中其大隊戰艦於亞得利海的時候，奧國就有點耽心了。

於是交戰國兩方面齊向意大利獻媚，大施拉攏手段，這使意國處於舉足輕重的優勝地位。它很可以袖手旁觀，待價而沽，祇在認為於本身有利的時候纔加入惡鬪。雖然國中強有力的一派贊成與協約國提攜，但仍有很多人覺得大可不必要捲入漩渦而能坐收漁人之利。第三派人則指出意大利殊少與德國爭鬪的理由，反之，兩國之間卻有很強的經濟上，精神上和政治上之關係。

當意大利於戰爭之初，根據三國同盟協定第七條，宣布本國應享有奧國在巴爾幹所得土地或利益的報償時，事情終究成熟了。所以，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奧國已佔領塞爾維亞的土地之後，意大利就伸展其支配權於阿爾巴尼亞（Albania）之阿扶落那（Avlona）城（在亞得利海之口）。這事的成功，毫末費力，因為阿爾巴尼亞國王新近離國他適。意人於是向奧皇約瑟要求「未恢復的意大利」之一部分，以作奧國獲得土地的報償。意政府一聞（一九一五年一月）德國德惠奧國聽從它的要求，甚至於全部特提諾亦不惜讓與，更得寸進尺。在二月二十一日，意大利「拒絕將來同意於奧、匈帝國在巴爾幹之軍事行動，除非對於報償問題事先成立一種協定，而此項協定之成立，除以奧、匈帝國目前所占土地之讓與為根據外，徒屬空想」。至三月九日，奧國因震於俄國之進佔加里西亞（Galicia），表示願意依據這個原則與意國談判。

在這幾個月中，協約國一方面並未偷閒。他們陸續進行了許多談判來發現可使意大利加入己方的善價。在競爭出價的當兒，協商國頗占優勢。奧國究竟不願將它的土地讓與它的「友人」。反之，協約國卻完全無此顧慮，他們願讓意大利儘其所欲取得奧國的和亞德里海的土地。

經過多次的往還電商後，意國終於四月八日以含有十一條的條約草案送達奧國，作爲它保守中立的代價。這些要求遠超過奧國最大的讓步條件。維也納的內閣願給與意國提羅爾（Tyrol）的南部；沿伊孫左（Inn）河東北角一小部分地方；在阿爾巴尼亞的自由行動；並允將的里雅斯德（Trieste）改爲自由城，予該地意大利居民以特別權利，意大利大學及地方自治權。這些條件不能使羅馬滿足。因之意國一面與奧國磋商，一面卻於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和英、法兩國在倫敦簽訂了祕密條約。

根據這個祕密條約的條款，英、法爲酬答意國於一個月內加入協約國起見，意國應收受下列諸項：（一）特提諾的里雅斯德與南提羅爾及其居民約二十五萬德人；（二）革立齊亞（Gorizia）格拉的斯加（Gradisca）伊斯的里亞（Isuria）及夸內洛灣（Gulf of Quarnero）諸島嶼，其中所有居民意大利人占三分之一；（三）北達爾馬提亞（Dalmatia），其居民百分之三爲意人；（四）對於阿扶落那及其內地，亦即對於阿爾巴尼亞之保護權；（五）對於愛琴海（Aegean Sea）中希屬多地坎尼斯諸島（Dodecanese）（一九一二年後所占領者）之完全所有權；（六）在亞洲部分的土耳其的勢力範圍；（七）英、法兩國如取得德屬非洲殖民地時，意國擴張其在非之殖民地；（八）特別戰債及軍事賠款之一部分；以及（九）不准羅馬教廷採取與意政府志願相反的外交行動之約定。這樣一來，亞特利海將成爲意大利的內湖；奧國將與海洋隔絕。未恢復自由的意大利人將得解放；將近五十萬的德意志人、南斯拉夫人和巴爾幹人將受意大利的統治；而意大利的國旗將飄揚於較大的非洲屬地了。

一星期後，意國宣布廢棄「三國同盟」，並恢復「完全的行動自由」——其理由則謂奧國曾經彰明較著

地違背盟約的字句和精神。在五月二十三日，伊瑪努爾的政府發出對奧宣戰書，於第二日早晨發生效力。直至十五個月之後（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它纔對德國宣戰。引用班茲（Barnes）教授的話來說，意大利也「響應理想主義的呼聲」了。可是如此做法，它不比其他交戰國壞，也不比他們好。

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意大利加入倫敦公約（Treaty of London），這是英、法、俄三國在前一年九月四日所簽訂的協定。這個協定，後來又得日本加入，把三國協商變成了戰時的同盟，並規定無論那一個協約國，如未經其他簽約國事前之同意，均不得接受和平的提議或停止戰爭。在意大利參戰後一日，那個僅有人口一萬二千弱，深藏於亞平寧山（Apennine）中的聖馬力諾（San Marino）共和國也對奧宣戰了。

曾經幾次續訂的一六六一年條約，使葡萄牙不得不給與英國軍事上的幫助，假使後者有所請求。因之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葡萄牙政府決定一等到接着英國的邀請，馬上以英國同盟者的資格參戰。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九日，葡政府議決給與英國軍事上的援助，並遣送軍隊到非洲去作戰。在一九一六年二月間，自德國的潛水艇對於協約國的運送業大施破壞後，及當四十隻德、奧的商船停泊於葡萄牙的港口的時候，葛萊爵士就要求葡國奪取這些船舶。葡國迅速從命，德國乃以宣戰（一九一六年三月九日）報復之。

當斯之際，交戰國雙方都在進行與巴爾幹各國談判並從事宣傳工作，以求多得友人。在競爭保加利亞的援助之中，德國頗占優勢。保加利亞人並未忘記本國在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中所受的恥辱。他們第一歸咎於塞國，因之直爽地在等待打擊這個不共戴天的仇敵的機會。然而事情不能着急，保國細心地注視着戰事的進展。

當協約國在加里波利 (Gallipoli) 一役失敗而俄軍從加里西亞 (Galicia) 和波蘭逃走 (均在一九一五年) 的時候，保加利亞決定加入中歐同盟國。它承認它的政策和選擇乃迫於要完成它的「國家理想」一慾望，這就是說，要將塞屬馬其頓 (Macedonia) 大部 and 希屬馬其頓 一部分併入本國版圖。等到德國強迫土耳其答應改正其疆界以利保加利亞之後，保國就與奧國簽訂了同盟盟約 (時爲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它將軍隊橫過塞國國境之後，接着就在十月十四日對其鄰邦宣戰。

保國的助力對於中歐同盟國有很大的直接利益，因爲這樣一來可使塞爾維亞和蒙特尼格羅完全崩潰。就戰略上講，其結果使德國藉此取得從柏林到君士坦丁堡甚至於到巴格達 (Bagdad) 的一條交通與輸送的直線。博得保加利亞的援助是中歐同盟國在外交上的最後一次勝利。其餘參戰的十五國則加入協約國一方面。

在羅馬尼亞，和在他處一樣，兩方面的代表都在拚命拉攏當局來幫助自己。國王卡羅爾 (Carol) 與德帝同出於霍亨索倫王室 (Hohenzollern)，所以要遵照他的條約義務加入中歐同盟國。內閣卻寧取中立的態度，特別是因爲它不能決定究竟從俄國抑從奧國取得土地來得更爲切要。使協約國更覺棘手的事，莫過於俄國堅持爲塞國保留若干奧國的土地，這是羅馬尼亞所覬覦的。然而卡羅爾之子斐迭南 (Ferdinand) 的襲位 (時爲一九一四年十月) 卻有利於協約國，因爲新王比較能熟慮人民對協約國親善的感情。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一五年間德——奧軍事的勝利使羅馬尼亞人踴躍躊躇，莫所適從，但當中歐同盟國於一九一六年在法意俄和近東的前線遭逢逆運的時候，斐迭南王的政府就決定現在加入戰勝一方的時機來到了——如果能够得到够高的代價

的話。

像在意大利和其他後來加入者的情形中一樣，中歐同盟國和協約國兩方面都樂於出價。這一次奧匈帝國對於贈與土地一層，復猶豫不決，而協約國又佔上風。再者，俄國頗能在羅京不加勒斯多（Bucharest）加外交上的壓力。於是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七日英、俄、法、意與羅馬尼亞簽訂了一個秘密條約。依據這個條約，羅馬尼亞當立刻參戰，而協約國以下列諸項為報：（一）德蘭斯斐尼亞（Transylvania），其面積約當匈牙利之半，其居民匈牙利人與羅馬尼亞人約相等；（二）奧屬布柯維納（Bukovina）大公國，其居民三分之一為羅馬尼亞人；（三）特默斯發的巴納特（The Banat of Temeswar），其居民亦祇有三分之一為羅人。在八月二十七日，羅馬尼亞對奧宣戰。它抄意大利的老文章，以情勢變遷作為恢復了行動自由的理由，來說明它所以不能履行從前的同盟義務之故。（註）

（註）當德國在一九一五年以一千五百萬元的借款付與保加利亞的時候，倫敦的每日新聞用大字標題曰：「德國賄賂保加利亞」，但當一年後英國以二百五十萬萬元之款類借給羅馬尼亞的時候，該報卻說：「英國借款與羅馬尼亞，英國銀行應允墊款五百萬鎊。」（見 C. Willis, England's Holy War, 1928, p. 212）

現在祇剩希臘為巴爾幹半島中唯一重要的中立國了。希臘國王君士坦丁（Constantine）因與威廉二世是親戚，並且怕保加利亞的侵略，所以他雖不和德國結盟，也贊成中立。但是汾尼最羅斯（一九一〇年以來希臘的首相）認為希臘祇有和協約國提攜纔能完成它的統一。因之他極力主張希臘履行戰前與塞國所訂的條約

——其中規定一遇保加利亞侵襲，兩國應互為援助——的義務。復次，法國與英國以阿爾巴尼亞和土耳其的一部分土地以餌希臘。至於說這同一部分的阿爾巴尼亞和土耳其早已許給意大利，那是英人和法人所不管的，與希臘意，在他們看來都是一樣。事實上，他們更以塞屬馬其頓的一部分贈與希臘啦！希王固執到底。他得了以德人為背景的參謀本部的助力，在一九一四年又在在一九一五年兩次將芬尼最羅斯逐出內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總選舉時，芬尼最羅斯一派人拒絕投票，然而政府的中立政策終得其餘選舉民的承認。

到這個時候，協約國不能忍耐了。他們要在薩羅尼加 (Salonica) 取得作戰根據地，並想從南方援助塞爾維亞。遲至一九一五年之末，法國薩拉依 (Sarajevo) 將軍武力奪得薩羅尼加，並設協約軍司令部於此。另一根據地亦在中立的希臘所轄科佛島 (Corfu) 建立。當君士坦丁王抗議這種破壞希臘中立的行動，並拿德國破壞比利時中立的例子來比較的時候，協約國的答覆說，希臘的中立從來未經條約所擔保。於是協約國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實行封鎖海口，要求希臘軍復員，承認在薩羅尼加的芬尼最羅斯派政府，並於一九一七年夏下令廢掉君士坦丁王，強迫他的長子遜位。此外，協約軍更向雅典——一個仍在守中立的國家的首都進兵。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二日，君士坦丁終究禪位於其第二子亞力山大 (Alexander)。嗣後，芬尼最羅斯被召主政，組織新政府。凡與德國表同情的人，都被放逐。一九一七年七月二日，希臘正式成為協約國之一。(註)法國和英國至此重申前議，允許將先已訂約讓與意大利的土地酬報希臘。

(註) 芬尼最羅斯在薩羅尼加所設的非法政府曾於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對德宣戰。

美國參戰

(甲) 思想上與行爲上的中立

大多數美國人慣常曬曝在地球另一面的太陽光裏，過着平和的日子，聽見大戰爆發的消息，非常驚奇。當時一般人還在談論海牙和平會議；國務卿布賴安 (Bryan) 正在和世界上比較重要的國家磋商仲裁條約；一般和平主義者，經濟學家和外交家正大不以戰爭爲解決國際爭端的圓滿方法；設立和平基金的事情差不多成了時尚；一位炸藥發明家所創辦的諾貝爾 (Nobel) 和平獎金是大家垂涎三尺的國際賞資——在這個時候，說戰爭可以促成的話，在美國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所以在大戰的初期，一般人都覺得美國決不能成爲參戰的一國。它也許會做一個調停者或公斷人，但萬不致於積極參加，因爲這是和它的傳統慣例大相刺謬的。

依照這種精神，美總統威爾遜 (Wilson) 乃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宣布美國的中立。五日之後，他向國人呼籲，「極誠懇地向他們主張那種可保衛國家使不遇危難的言語和行動」。他請求他們「以真正中立精神，亦即對於一切關係者的不偏不倚，光明正大及敦睦和好之精神，來說話和行事」。他要他們記住「美國的人民是來自許多國家的，大都是來自目前正在交戰的國家的，並警告他們「凡感情易於激動起來，難於和緩下去」。所以美國「在事實上和在名義上都得守中立」，而美國人民「在思想上和在行動上皆須不偏不黨」。

這種呼籲一時頗得人心。就是前總統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和親英的駐英大使佩治 (Page) 起初

也都同意。但是思想上和行爲上的中立幾乎是不可能的。用一位雜誌編輯者的話來說，「祇有心智上變性的或麻木不仁的人」纔能够對於任何一方沒有一定的取擇；有如佩治後來所言，「政府能够中立，人卻不能」。

絕對中立之不可堅持，其理由至爲顯明。第一，美國是一個外來移民的國土，其中許多居民有的生於外國，也有是外國人的子女。其大多數來自正從事蠻觸相爭的國家；他們判然爲德意志人、愛爾蘭人、俄羅斯人、英格蘭人或其他外國人，各各對本國表同情。即使那些已歸化的人，也明明左祖其祖國一方面，而傳統的偏私心也很容易露出來，以致常常大動「真正的」美國人的公憤。有些真正的美國人，例如羅斯福，實際上主張逐出那般公然表示祖謔交戰國任何一方之情緒的「歸化美國者」。

第二，美國既爲最大的中立國且爲最能供給主要軍用品的國家，它就不能不與諸交戰國密切相交，特別是因爲雙方都爲關於美國的兩重目的所激動。它們意在儘量取得美國的食糧和軍火，可是同時又想阻止敵國拿到任何東西。第三，美國因是一個最強的中立國，不久就被認爲替全世界擁護中立權利的戰士。第四，英國與德國的宣傳家在美國的活動，使美國繼續中立的政策日益困難。協約國的代表，就大體觀之，是精明伶俐的，並且懂得美國人的心理；德國人和奧國人卻毫不機警圓滑，並傾向於蠻幹。實在德國之缺少一個像俾士麥的人物來照料這種「微妙關係」，是很明白痛切感到的。

(乙) 國際法等

在一九一四年之秋，美國、德國和英國所處的地位與美國、法國和英國在拿破崙時期中所處者類似。德國感

到要打敗英國，必須截斷它的海外接濟。大不列顛也覺得祇有使德國的人民餓死並斷絕它的軍需品之供給纔能打敗德國。各交戰國所着手用來完成其目的的政策，其經濟上直接受犧牲者就是美國的商人、運貨業者、製造家和勞動者。

最初違犯中立國權利者，在很多月份中並且是最重要的違犯者，就是英國人。他們藉政府的命令武斷地並連續不斷地增廣違禁品的名目，其理由則謂現代戰事的變遷情形甚至使一九〇九年的倫敦宣言（*Declaration of London*）那種協定也成爲無效。（註）結果英人將送往德國或其中立的鄰邦的一切東西差不多都奪取過來。英國這樣干涉中立國間貿易的例子很多，其最有趣味的一個即發生於一九一六年三月。當時有一箱婦女絲襪由紐約一家各貨分部的大商店用瑞典船裝運到瑞典的哥騰堡（*Gothenburg*）去，中途被英人奪去，因爲他們懷疑那箱貨物或許是送交德人的。裝運的人於是憤怒地提出抗議，說婦女們的襪子不應類別爲軍用品。英人又扣留並開拆從美國寄到德國的郵件，誣賴美國的親德者將銅和其他違禁品郵送德國。

（註）當戰爭爆發時，英國和德國都尙未批准這個宣言，宣言中開列如於送往敵國的途中被發現時應作違禁品沒收者的軍用品名目。在一九一四年，美國企圖使雙方接受這個宣言，德國表示同意，但英國模稜兩可。

英國爲求迅速飢困敵人，乃宣布封鎖德國。依照國際慣例，祇有「有效力的」封鎖纔算合法。換言之，凡實行封鎖時，必須在受封鎖的海口前面備置一隊巨型的巡邏艦，以阻止任何船舶出入該海口。可是，自從潛水艇出世及海岸防禦工程改良後，英國就不能依舊法封鎖德國的海岸，它祇好將艦隊配佈於英吉利海峽及自蘇格蘭至

挪威的北海入口，距德國的海岸有幾百里之遙。這樣一來不單是德國，就是中立的荷蘭和斯干的那維亞（Scandinavia）三國（瑞典、挪威與丹麥）也被「封鎖」了。再者，英人又捨棄在公海上搜索中立國船舶的慣例，而先勒令一切船舶駛入英國港口，然後加以搜查，往往耽擱數星期之久。美國竭力抗議這種不合法行為，並聲明保留賠償損失之要求。英人對於美國的恫嚇，並未提出嚴重的反對。

英國船常常掛着美國的國旗，作為一種戰略（*ruse de guerre*），並藉以躲避德國的潛水艇。美國再提出抗議，但毫不生效。在一九一六年七月，英國公布一紙「當受罰者名單」（*Black List*）將八十所美國商店，被認為屬德人所有或親德者，一齊列入。英政府命令國民不准與這些商店交易，又叫運貨業者不許裝運它們的出品。中立國的運貨業者亦受到警告，不得載運所規定的各公司的貨物，否則即喪失在英國碼頭添煤的權利。那些商店或公司一被列入那張「當受罰者名單」之內，就難向銀行借款。英國這種不智的行為引起美國人民猛烈的抗議，後來美國在一九一六年九月制定巨大的海軍經費法案（*Naval Appropriations Bill*），一半亦由於此。此外，英人在大戰初期中最可厭的舉動，就是對於美國抗議書的淡然漠視，他們往往數星期或甚至數月置之不覆。

英國這樣悍然不顧華盛頓的疊次抗議而繼續侵犯美國的中立權利，其唯一解釋也許可於葛萊爵士對佩治大使的談話中找到。葛萊在一九一六年間向佩治說：「美國必須記得我們英人是為自己也是為美國而戰。你們決不敢相逼太甚。」其含意自然是說，德國之為美國的商業勁敵，與其為英國的同樣危險，而條頓族強國之戰敗實際上於兩個英語的民族都有利。據說，當威爾遜總統聽見葛萊這番話的時候，他說過下面幾句話：「（葛萊）

是對的，美國與英國戰爭不啻爲德國的勝利。我決不會使英國爲難。」

英人的非法行動在美國人民中造成強烈的反協約國情緒。反英的抗議書如雪片一樣從各處飛到威爾遜處。許多南方人反對英人的封鎖和將棉花列爲違禁品的政策。芝加哥的包裝者與西北的農民敦促威爾遜「爲他們的貨物闢出一條到飢餓市場的路徑」。在東部，紐約的批發商憤憤不平地訴着苦，說他們的營業竟須「得到英國的允許」方能進行。結果有幾件關於禁止裝運軍火往英國的法案提出於國會。在一九一五年的春天，蒙斯（House）上校奉命赴歐洲代總統觀察一切，乘機告訴英國人道，他們所取的途徑將發生嚴重的結果。傷害着許多美國人的錢包和情感。」美國人對英的糾紛祇有在遇到與德國的爭執來遮掩時方能被忘記。

事情既達於此種難境，恰好德人來解圍了，在一九一五年二月四日，德國政府聲明如下：

「環繞大不列顛與愛爾蘭的領海，連英吉利海峽全部在內，茲經宣布爲戰爭地帶。自一九一五年二月十八日起，凡在該地帶被尋見之敵國商船皆當毀滅之，事先並不使船上水手與乘客感到威嚇，致常有逃出危險之可能。卽中立國之船舶在該地帶內亦難保安全，蓋鑒於英政府於一月三十一日命令准許濫用中立國國旗一事及海戰之意外，總不免於攻打敵船時誤擊中立國之船也。」

德國人覺得這種手段恰可拿英國的非法封鎖來辯護。這是求戰勝的孤注一擲，但爲戰術上的失算。美政府立刻警告德國，假使潛水艇的戰事損及美人的生命，「德意志帝國政府應負嚴格的責任。」

德國之乞靈於無限制的潛艇戰也許是美國參戰的直接原因。國際法上規定，如事先無警告及不爲水手與

乘客之安全作準備而擊沈商船者，在所禁止。然而潛水艇不能履行這種規定。早年的潛水艇，是一種身小而堅固的兵船，可以用軍艦前的衝角來撞碎或對準潛望鏡發砲來毀滅它的。它祇有在潛伏不見而作戰時纔能發揮威力。如果潛水艇在放射水雷前告警船舶，那些不幸的水手和乘客大概都不能被救到潛水艇上來，因為艇上無餘地可容。潛水艇在一九一四年前祇是還未完全發達，故不及為國際法所承認。所以，德人惟有不是服從國際法並拋棄這種新式而極有威力的武器（那時僅德國一國充分備有），就是違背國際法而拼受中立國的怨恨，兩者必擇其一。中立國的態度則以為如以潛水艇為武器，必須依照戰時的規則，否則應舍而不用，這真是德國的不幸。（註）

（註）等到戰後所有大國（除德國外）都備有了大隊的潛水艇以後，各國外交家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卻改變了。

在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日，美國企圖要求各交戰國同意不埋設浮流水雷，除依照戰時規則外不使用潛水艇，且不冒用中立國國旗，成立一種「暫定的條約」（modus vivendi）。它更要求英國准許美國商人裝運食糧到德國，由在德的美國的代表監視着祇用於養活平民。然而雙方對於這個計劃都有異議，因之毫無結果。（註）

（註）美國既拒絕德國無限制使用潛水艇之權，以為此項使用權對於國際法不免為戰時之改變，它同時又向英國發出一九一五年三月

三十日的照會，聲明「美政府當然不致忘卻自從關於正當封鎖的規則制定之後海戰的情形和方法上所發生的大變遷。美政府準備承認，配佈軍艦警備線於敵國港口洋面的那種舊式封鎖法是不復適用的了，因為敵國儘有使用潛水艇、水雷和飛船來作有效的防守方法與機會。」

在大家紛紛討論各交戰國所依仗的各種手段的是非之中，忽有英船「發拉巴」號（Falaba）被擊沈（時爲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並死美人一人的消息降臨。在五月一日，美國運油船「灣燈」號（Guldfish）被水雷炸沈，喪船員兩人。華盛頓當局對於這兩件事還未及取一定行動的時候，邱那德（Curran）公司的一隻定期船「琉西退尼亞」號（Lustania）又在五月七日遇難。這隻船事先得警告就被炸沈，地點在距愛爾蘭東南海岸七英里的海面。此次喪失性命者在一千一百以上，其中有一百多個美國人。美國許多人民嚷着要求馬上對德宣戰，但威爾遜總統覺得美國還未準備作戰和準備受戰爭之苦難。他費了一星期的工夫搜集證據，然後向德提出抗議。

美總統在抗議書內歷述關於潛水艇的全部爭論，聲稱沈船的舉動爲違反人道的犯罪，堅持處罰炸沈「琉西退尼亞」號的潛水艇艇長，要求德政府對於這種行爲作正式的取締，並要求它承諾將來如再有此種行動決不宥恕。在覆文達到華盛頓前，德國駐美大使本斯托夫（Bernstorff）說明德國並不存心炸沈中立國的船，祇要這些船不抗拒搜索和扣留。然而他的擔保並不能保護在交戰國船上的乘客，因之不適用於與「琉西退尼亞」事件相同的事件。

德政府致威爾遜的覆文中申述威爾遜並未認知這件事變中的一切事實。德人辯訴「琉西退尼亞」船藏有鎗械，它是英國的補助巡洋艦，載着很多軍火，並屬於運輸艦一類，因爲它又載有加拿大的兵士。據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擊沈它，是一種正當的自衛行動。

美國認上面這個答覆不滿意，兩國接着交換文書有三個多月之久。德國和美國對於這件事的「事實」所陳述的不同之點從未得到解決，但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德國應允將來如未先發警告並救出非戰鬥員的生命，決不將船擊沈，惟須該船不企圖脫逃或抵抗。威爾遜於是受到大眾熱烈的歡呼，因為他以和平方法博得如此卓著的外交勝利。（註）

（註）在兩國爭論之中，美國國務卿布賴安（Bryan）忽行辭職。他不贊同威爾遜的意見，以為美國國民有權利堅持乘坐交戰國商船的權利來危及本國的和平。更有關於「琉西退尼亞」事件的資料見本章之末。

「琉西退尼亞」事變引出一個中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美國「不屑作戰」。威爾遜總統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十日的演說中宣稱：「美國的榜樣必然是一個特殊榜樣。美國的榜樣必不僅是因為不願戰爭而做出來的和平榜樣，並且是爲了深信和平是世界上最使人得救的和使人高尚的勢力而戰爭則反是，然後產生出的和平榜樣。有如一個人傲然不屑戰爭的事是有的。有如一個國家自覺非常正當而不需以武力強人信服本國正當的事也是有的。」如果我們能信賴總統秘書屠墨而臺（Tunulty）的證言，則威爾遜之不欲戰爭，另有其內幕在。據說威爾遜對於赴戰所以躊躇不決，第一因為他「不能確定美國目前的感情表現是否能長久維持下去，使他在國會可以提議任何行動，而一遇政府失敗他是否會失去那種應付非常之事時所不可少的後盾。」

然而有幾種勢力正在發生作用，漸漸使公衆傾向於干涉這一觀點。這幾種勢力就是：第一、羅斯福、伍德（Wood）將軍與陸軍總長伽利孫（Garrison）這般人以及「保障國家安全同盟」（The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 和協約國代表的反德活動；第二、德國和奧國在美代表的暴烈的宣傳方法；第三、美國一般金融業家的利益關係。

在一九一五年五月間，紐約一羣著名人物致電總統表示他們的信念，「認為美國的利益和榮譽絕對需要適當的政策，來取得因德國過去侵犯美國權利所受損害的賠償，並擔保將來不再受侵犯」。在同月中，這個團體（人數視前大增）又決定，該團團員站在愛國者的立場上，目前所可效忠於國家的最善途徑莫過於到夏季野營裏去受軍事訓練。伍德將軍那時正為東部聯隊區的統領，竭力贊成這個計劃，因之為一般愛國家和專門家所設的軍事訓練班，即於一九一五年之夏在普拉茨堡（Plattsburgh）兵營開辦了。

這種盛舉引起全國的注意，其他各處不久也成立了同樣的野營。因為預備到野營中來表現其愛國情緒的人數為巨額的經費所限，所以國會在一九一六年六月三日授權陸軍總長供給制服、薪給、運送費和糧食於一切願意「服役」的人。全國從軍熱情之增高與野營的日益流行恰好相稱。到野營中受軍事訓練的青年成千成萬——有些是圖好玩的，有些卻非常認真。

因野營所生出的備戰精神及名人的演說更為歐洲代表的活動所鼓勵，而愈有蓬勃的氣象。協約國的使者進行着巧妙的運動（大半為津貼報館，和傳播德人殘酷的謠言），德奧的代表卻在施展陰謀、欺詐，甚至於強暴的錯誤手段，他們顯然不懂得美國人的心理。奧國的大使鄧巴（Dumba）博士和德國大使館陸軍武官巴本（Paben）大尉與海軍武官波埃德（Boyed）大佐被控共犯陰謀炸毀兵工廠和運送船，煽動彈藥製造廠工人罷

工並損毀機件，爲德國軍官和後備兵偽造護照，及阻止鋼鐵廠製造軍用品等罪。民衆的憤怒馬上如火燄高張，在一九一五年，美國要求德、奧政府撤回這三個人。

當一九一六年之秋，協約國的戰運正在退潮的時候，摩根 (J. P. Morgan) 公司的台維孫 (Davison) 遊歷歐洲。回美後，他報告協約國的處境非常危險。這個消息使美國的金融業者大起惶慮，因爲碰巧在一九一五和一九一六年，英、法的十五億以上的借款是在美國募集，大半由摩根公司經手。反之，德國向美所借者甚少。事實顯然可見，「對於保證並參與英、法借款的人，其金融上之聲名及其本利金全靠債務國的繼續償付能力者，那一邊戰勝一問題不是可以漠不關心的。」所以金融也和協約國站在一條線上了。

其時，威爾遜總統覺得若干干涉的方式是不可免的，但仍舊相信他自己「不能超出民衆所許可的範圍更走快一步」，乃於一九一六年一月間出巡全國，到處作備戰的演講。當德國於二月九日聲明它將命令本國的潛水艇指揮官不發警告而擊沈一切交戰國的武裝商船的時候，他提出過警告。到這個時候，因爲英國的每隻大商船皆有武裝，美國許多地方的人就覺得政府應禁止國民乘坐這種商船，怕與德國發生戰爭。俄 克拉何馬 (Oklahoma) 的參議員哥爾 (Gore) 和得克薩斯 (Texas) 的參議員馬克勒摩爾 (McLemore) 立刻提出國會的決議案，擬以禁止美國人乘坐武裝商船旅行。然而威爾遜運用他的勢力將這種決議案擱置不討論。所謂「豪斯 備忘錄」 (House Memorandum) 或「豪斯——葛萊 協定」 (House-Grey Agreement) 之草定於倫敦，即在此際。

豪斯上校曾在一九一六年再度赴歐，以便觀察局面是否有進行和平的可能——特別是有利於協約國的和平。在二月二十二日，他贊成葛萊的意見，由威爾遜提議舉行會議來終止戰爭。如果協約國接受這個提議，那就不用說，如果德國拒絕它，美國大概就會加入戰爭，以抗德國。葛萊說道：「豪斯上校表示他的信念，以為這個會議倘能召集成功，就會以非不利於協約國的條件取得和平，如果不能取得和平，德國無可理喻，美國就會離開這個會議，加入協約國一方面為交戰國。」豪斯備忘錄並未生出什麼效果，大半因為協約國希望美國因潛水艇的爭端而與德開戰，這樣一來協商各國在分贓的當兒比較不會受理想主義的困累。

在一九一六年三月，一隻未具武裝的海峽汽船「塞塞克斯」(SSEX)號未受警告而被襲擊，傷害美人數名的時候，似乎協約國的願望或可得償了。美國馬上發出一封通牒，其結尾有下面這個最後要求：「除非德意志帝國此刻立即宣布並實行捨棄以潛水艇攻擊載有乘客與貨物的船舶之方法，美國政府除與德帝國完全斷絕外交關係外，不能另有選擇」。

德國於五月以宣言書答覆上面的通牒，聲稱他們當「竭其全力在其餘戰期內將軍事行動限於對抗交戰國的軍隊」，並已命令海軍，「如事先未發警告且未救出人命」，不得擊沈商船，「惟各該商船企圖脫逃或抵抗時，不在此限」。然而，這個讓步——它祇是政策的說明，毫無「保證」的意義——還得靠美國要求英國遵守國際法規則纔生效力。這個條件未為美國國務部接受，國務部反警告德國，它必須不顧其他任何政府的行為而「審慎施行」那個新政策。許多地方的人士都認「塞塞克斯」事件是威爾遜的另一次的外交勝利。他於一九一六

年六月在民衆的歡呼中再被推舉爲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在威爾遜再度被推舉前數日，國會通過了國防條例(National Defense Act)(一九一六年六月三日)。這個條例規定擴充常備軍的兵額，編制國防軍約五十萬人，及設立軍官預備團。國會又以同樣的備戰精神於三個月後通過海軍經費法案，規定支撥五〇二、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巨款(國防費之獲一次通過者，數目以此爲最大)並規定建立幾與英國相等的海軍。政府並成立一個國防會議，由閣員六人及專家七人組織之，以草擬戰時的防禦計劃。此外又設立美國海運局，以發展極大的商船隊。

在一九一六年的選舉中，威爾遜手下一般從事選舉運動的策士頗着重於政府所取保障國家安全的強硬政策，並意氣揚揚地促人注意「我們的大總統所成就的光榮之外交勝利，他保全了我們政府的重要利益，並使我們避免戰禍」。這個觀念——「他使我們避免戰禍」——造成一個極好的標語，當然也博得不少票數，尤以西部有選舉權的婦女及由德國歸化的美國人所投者爲多。

共和黨的候選人休士(Hughes)矢言擁護美國的中立權利，「非因畏懼，也非因市恩。」他謹慎地避免偏向於任何一方。選舉的結果雙方非常接近，最後視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的報告爲轉移。投票後數日，消息傳來，威爾遜以多得幾千票在該州獲勝了，雖然那個共和黨的參議員候選人約翰生(Johnson)以三十萬票也得勝利。

(丙)五個月：從和平到戰爭

前線連戰皆捷的中歐同盟國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提議舉行會議來討論和平條件，但沒有說出它們所願意以開談判的確切條件。協約國拒絕這個提議，以為它不過是「緩兵之計」，而非和平的提議。「目的在於分化協約國。在十二月十八日，威爾遜總統建議由美國出任調停，並逐一請求雙方說明其戰爭目的，蓋希望以之作一比較，或可從中得到諒解。次月，協約國發出了和平條件陳述書，而德國仍只作概括之論。協約國一方面說，他們因欲「根據自由與公平的原則來擔保和平」，所以要求：恢復比利時、塞爾維亞和蒙特尼格羅三國，並附損害賠償；將軍隊撤出法蘭西、俄羅斯和羅馬尼亞，「並附正當賠償」；「歸還從前以武力自協約國奪去的土地」；解放在外國統治下的意大利人、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和捷克斯拉夫人，及「宛轉於土耳其血腥的專制之下」的民族；將土耳其人逐出歐洲；公平地和穩固地改造歐洲大陸。

上面這些目的的根據自然是各協約國之間所訂立的秘密條約。我們很難預期中中歐同盟國會認真考慮這些要求，就是威爾遜也認之為虛張聲勢的把戲。故他於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參議院演說，主張唯一持久的和平是「同等者之間的和平」，「沒有勝利的和平」，並且是磋商的而非強加的和平。他準備以美國人民的名義來擔保任何用「國際協調」來達到的公正的和平，並且那是根據於承認各國為平等及「施治者的正當權力都來自受治者的同意」一原則的。

中歐同盟國的一般外交家如果聰明的話，那時就當馬上發出他們的戰爭目的陳述書。他們卻不如此做，直到在通知全世界德國將再依仗無限制的潛艇戰前兩天的一月二十九日纔發出。就軍事的情形看來，德國所提

出的條件是很合理的，可是提出得太遲了，無復嗟商之餘地了。

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日，美國與德意志帝國絕交，以報復其潛水艇政策。二月二十六日，在許多美船未受警告而被炸沈之後，威爾遜總統請求國會授與權力，以便把所有的美國商船武裝起來，抵抗潛水艇。參議院中有一部專門妨害議事的議員，即威爾遜所稱爲「一小羣故意搗亂的人」，很順利地將這件授權的議案延遲不表決，直至國會休會（三月四日）。未幾，檢察長發現一件舊法令，其中規定總統有此權力，威爾遜乃得如願以行。接着經過一個「武裝中立」的時期，但那祇不過算是武裝干涉的序幕罷了。

後來又發生兩件事，使美國人民同情於戰爭政策：一爲德國之寄送親麥曼公文（Zimmermann Note），一爲俄國的三月革命。當國會正在討論武裝商船的議案的時候，政府公布了一封中途截獲而由巴爾福（Balfour）爵士交與佩治大使的德國羽檄。這封羽檄是德國外交總長親麥曼寄給德國派駐墨西哥公使的公文書，其中說明潛艇戰在最近將來即當重振，「但雖有此事，仍須竭力設法使美國保守中立」。其中繼續說，如果這一層辦不到，德國預備向墨西哥提議締盟，約定共同與美開戰。爲報酬墨西哥起見，德國准許墨西哥取回它在前世紀的墨西哥戰爭中喪失的土地若干部分。日本亦將被邀請加入這個同盟。可是「在對美戰事爆發前，且慢將此事通知墨政府」。

就事體之真相一加思考，這個所謂「親麥曼的陰謀」一點也不非法或狠毒。德國殊有權利在和美國開戰時另外尋求同盟國。但依參議員洛治（Lozier）的話說，這封公文書似乎「差不多有無限的用處於促成戰局」。

一九一七年版的「戰鷹」巧妙地用了「愛姆斯急函」(Ems Despatch)的形式，將那封公文書的內容大加竄改。它着重其中若干部分，而不顧或略去其他部分，這樣一來乃能增強戰氣，特別是在素不熱心的西南部，居然也發生影響。

現在祇剩一個大障礙使美國不能馬上參戰了——即專制的俄國。依威爾遜在他一月二十二日的演說中所指出的，此刻協約國常常在複述的話，如果公正的和平祇有靠各國承認「一切施政者的權力來自受治者的同意」這個原則纔能達到，那末要美國和極端專制的俄國站在同一方面來作戰不是很爲難嗎？幸而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中旬，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退位，一個開明的臨時政府掌握政權了。如此一來，對於「戰爭所以擁護民主政治而反對專制」這個主義的最後障礙被掃除了(國務卿藍辛(Lansing)的話)再以近來美國的商船頻頻爲德國的潛艇擊沈一事看來，這個新局面愈加重要。威爾遜乃召集國會，舉行特別會議，「以便聽取關於國家政策的重大事件的交換意見」並費了十三天工夫來擬定戰書。

威爾遜總統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之晚，立在肅穆的人羣中，現着莊重的儀容，力請國會「宣告德意志帝國政府近來的行徑事實上簡直是對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和人民作戰。」他歷述與「這個天生的自由之敵」的長期爭論之經過，並說明這場衝突已變成了民主勢力與專制勢力間的生死決鬥。這個世界應該「謀民主政治的安全」而美國的義務即在供獻其鮮血與金錢於此項偉業。

四月四日參議院以八十二票對六票通過一決議案，宣布美國與德國之間已具戰爭狀態。同樣的決議案亦

於四月六日以三百七十三票對五十票獲通過於衆議院。同日，威爾遜宣告戰爭。(註)

(註)至一九一七年美國始對奧——匈宣戰。但它未對保加利亞或土耳其宣戰。

協約國對於美國的參戰，不勝欣喜。其民氣與士氣因之大爲振作。在德國，卻沒有多大的感情表示。許多德國人覺得，反正美國在各方面都會援助協約國的戰事。就軍隊一層而言，美國的得力軍隊能投入戰場，至少當在一年之後。

古巴(Cuba)與巴拿馬(Panama)於美國宣戰後一日亦對德宣戰。希臘、暹羅、賴伯利亞(Liberia)中國和巴西之加入，則於同年中較後時期。在一九一八年，危地馬拉(Guatemala)、尼加拉瓜(Nicaragua)、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海地(Haiti)與渾杜刺斯(Honduras)亦步前者的後塵。一共算起來，爲二十三國對四國。這場戰爭真真成爲世界大戰了。

關於「琉西退尼亞」事件

關於「琉西退尼亞」事件的全部真相也許還不會大白。許多大約一樣可靠的證人的證言非常不一致，特別是關於幾個重要之點。英國官場的調查是可笑的，而麥爾西(Mersey)的報告雖然剖析得很詳細，也祇可算是一種上乘的戰事宣傳品。

至於這條船是否已加武裝或載有加拿大兵士，尙未得到滿意的證明或反證。我們知道它是英國的補助

巡洋艦亦卽一種構造上極易變爲戰艦的汽船。它裝載着幾百萬發子彈及很多噸的榴霰彈。再者這許多彈藥竟公然被放在船上，不顧美國法律曾禁止客船或客車載運爆炸性物質之事實。於此可見該船船長與簽發出港執照的紐約港吏都故意犯有違背美國法律的罪了。（據聞參議員拉福雷特（La Follette）曾經說過，威爾遜在「琉西退尼亞」啓旋前四日就知道這件非法的事情。然而這一層不能辯護未加警告而擊沈船舶的舉動，也不能作爲德國的口實來洗刷它於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發出特別通知，警告美人不得乘坐英國或其他協約國的船舶駛經戰爭地帶而以生命爲嘗試一事。

我們更知道，「琉西退尼亞」的船長忒涅（Turner）雖接到英國海軍部所發關於德潛艇出動於不列顛羣島的海中的警告，他仍不遵從關於預防策的官方「勸告」。他又不繞灣子，也不改故道而行，走的速度又祇有平常的四分之三。復次，當局既曉得這條船在特別危險之中，卻不派護送艦或命平常巡邏艦護送它經過戰區，而讓它冒險越過大洋。我們一讀忒涅在官方研訊時對於這幾點問題的答案，就不禁感覺到這位船長（他是堅定的愛國者）所隱匿不說的比他所吐露出來的要多得多。

或者英人覺得船上既有數百中立國人，卽足以保護所載的軍火。他們也許又想，德國決不會冒這樣的大不韙來炸沈幾百個美國人和其他中立國人。但是德國人居然轟沈了那隻船，其影響於全世界對德之感情者極大，這對於協約國也許比彈藥筒更爲有用。

第二章 戰神的祭壇

「全國應戰」

當大戰爆發的時候，很少人實在覺到這場衝突將如何與從前的戰爭全然不同，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這四個年頭足以證明一個全新的歷史觀念——「全國應戰」的觀念之發展。這個觀念使人們徒然再視國家僅爲「將其援兵傾注於軍隊中的蓄水池。」反之，每一個國家當被認爲「分出許多支流的大河，而軍隊不過是支流之一。」各交戰國政府不久就覺得這次的結果之單靠以打仗爲本職的良好軍隊，和勇敢的軍事領袖，遠不如依賴於幾無限制的物質來源之利用。所以各戰國狂熱地一面下令將士動員，一面集中全國的科學家、工程師、組織者、理財能手、手工工人、宣傳家、發明家、藝術家、教員、農人、製造者、婦女以及生產與運輸上的種種便利，準備應戰。

在作戰上，雙方都有若干優點。關於物質上的準備，德國駕乎各國之上。德國的鐵道系統與軍隊的調動極相關聯，所有路線都在參謀本部的縝密監視之下規劃成功的。在一九一四年，已有十三條雙軌鐵路通到西部邊疆，一天可以開出五百五十列車橫過萊茵河上的橋。在開戰後最初兩星期中，位於科倫城（Cologne）的鐵路橋上

每十分鐘總有一列車通過。

德國的軍隊是大陸上訓練得最精並且紀律最佳的勁兵。就是龐大的後備軍也經過嚴格的訓練，因之最高軍事當局在開戰之初毫不遲疑地將他們投擲到前線。站在德國軍事金字塔之頂點的爲參謀本部，這個團體因爲經過嚴格的挑選和訓練，其專門知識與手腕是無與匹敵的。此外，還有一團能征慣戰的軍官，都是上駟之材。這般軍事領袖雖然常常夜郎自大，非常殘暴，可是嫻熟韜略，並渴欲保持他們引以自豪的勝利口碑。輔助這般高等將領的，尚有許多下級士官，他們都富於軍事學識並善於駕馭士卒。

雖然德國的同盟國的軍隊，遠不如它自己的精強，但這種情形適足使它能夠左右一切。前線的重要作戰計劃大多數是德國軍官擬定的，其實施亦常受他們的監督。固然，德人在戰爭中常有戰術上的失錯，而決成敗的陣仗往往不由統帥出面而由下級軍官指揮，但這並不能減損我們對於他們的那種軍事制度的驚奇。這些弱點在協約國的壁壘中反更爲顯明。

在軍備上，德人於戰前已充分改良並應用榴彈礮、機關鎗和潛水艇，其所達程度視其他各國爲高。它那種非常有威力的重礮（比利時列日（Liège）的堅厚城牆卽爲所攻破），敵人當之輒靡的機關鎗鎗火，及對於商船蹂躪性極大的潛水艇使協約國望而生畏，覺得不容易對付。在「國內戰線」上，德國因爲它的工業極度發達，也比其他協約國（英國除外）更能充分輸送必需的軍用品於戰地。巨量的原料和準備金在德國是現成的，商業品的工廠都很迅速地變爲鎗礮、子彈、炸彈、醫院備品、軍用機械和其他戰時必須物的製造廠。改變的過程敏捷而

精當，但也因此使國家經濟的規制大爲紊亂，以致和平重現後大受其困。

在地理上，至少有一個時期，優勢亦在中歐同盟國一方面。自塞爾維亞崩潰及保加利亞加入戰爭後，德國和它的同盟國形成自北海到阿拉伯的一個打成一片的地理單位。軍隊、軍需品、命令，都可順利無阻地從某一區域，或某一戰線遞送至另一處，並且比較不遭受協約國干涉的危險。整個軍隊極易調動，或自法國移至加利西亞，或自加利西亞至意大利障地，或甚至於自普魯士至近東。俄國完全被敵人阻住或冰塞住的海洋隔斷，不能和它的友邦來往。它既不易輸入因本國工業落後而不能在國內製造的物品，復不能以本國所剩餘的貴重穀類供給英法兩國。

然而協約國所具的優勝之點亦很多。它們的兵力準備之充足遠超過中歐同盟國，換句話說，它們有的是人。單是俄國一國的人口就幾等於一切敵國的人口合攏來的數目。「中歐同盟國總共的面積爲二、二二五、〇〇〇方哩；其總人口爲一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常年歲入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各協商國與其同盟國占面積三七、二六七、〇〇〇方哩；人口數計一、三九二、〇〇〇、〇〇〇；國課每年有六、八八一、〇〇〇、〇〇〇元。」至經濟上和工業上的財源情形也是同樣。德國的資源能够較迅速地比較有效地集中，但協約國有更大的寶藏，取之不盡。協商國知道戰爭越拖得長久，雙方的人力與物力的懸殊愈大，而協約國的戰勝機會愈增加。復次，祇要英國的海軍（全世界最大最強的）能維持海上霸權一日，協約國就能從各中立國取得供給物，並阻止德國同樣得到接濟一日。對於德國的封鎖，最後顯爲決勝負的要因之一，而這個偉績是英國的海上霸權。

的貢獻。財政上，協約國也有較光明的希望。除掉少數可能的例外，特別是英國，一般協約國都貯有充足的準備金，以應將來戰爭的需要。此外，它們能够募集公債於中立的國家。這樣募集得來的款子常存於出借的國家，以添購軍用品而直接用去。

在大戰的時期中，國民的心理實爲主導力，這是從前所未有的。各交戰國的政府想盡種種方法，來振作民氣和士氣。自然，戰爭一天一天拖延下去，這種工作也逐漸發生困難，但是一般標語口號創作者卻越來越靈敏。然而比國內宣傳更爲重要的，還是將雙方的事件在中立國作「正當的」表現之必要。講到這一層，又是協約國占優勢。它們的宣傳家較德國和奧國的爲老練，並且他們比敵人更懂得中立國國民的心理，特別是美國人的。到現在，還流行着大戰時協約國對於德國所傳播的許多「殘酷兇暴之怪談」，爲一般人所深信不疑者，這就是英法美諸國宣傳人員的能力之鐵證。

軍事行動（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

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間，德國軍隊的最高統帥爲毛奇將軍，他是以普法之役著名的故毛奇大將的侄兒。德軍的作戰計劃即爲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間任參謀總長的舍利芬將軍所擬定的，他早已注視到將來有兩條戰線，同時發生戰事的可能。他這個計劃的精華，即在竭力利用德國動員迅速一優點。因之他規定東疆祇設稀薄的陣線以拒假定上行軍遲緩的俄軍，一面儘量調遣軍隊於西疆，迅速掃蕩巴黎。軍部的時間表上限定六星期內務

必完成這個「勢如破竹的攻擊。」然後在巴黎陷落之後再將可從法國省下來的軍隊送往東疆，痛擊俄軍。

德軍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初依照上面的計劃沿着從荷蘭到瑞士的一條線前進。誠如預料所及，左翼不久即在凡爾登 (Verdun)、都爾 (Toul)、厄比納爾 (Epinal) 和栢爾福 (Belfort) 的堅固堡壘及佛日山 (Vosges) 的崎嶇之地前面停駐。至於右翼，因為要避免法國東北部險峻的要塞，即侵入比利時，那裏地面比較平坦，堡壘比較稀少，故所向披靡。第一次遇到的阻礙在防護周密的列日城 (Liège) 之下，但德軍所攜口徑十六吋的攻城榴彈砲在三日之內就把城牆打破。此後經過東南部的比境，簡直無阻。那時雖有英國的遠征勁旅和法國的援軍開到，德國仍長驅直入，連查勒羅 (Charleroi)、蒙斯 (Mons)、那慕爾 (Namur)、羅汾 (Louvain) 和布魯塞爾 (Brussels) 等地。到八月尾，他們已行入法境，猛攻里爾 (Lille)。他們穿過畢伽的 (Picardy) 和香賓 (Champagne) 向前進展，超出軍部時間表所規定的時間，並壓迫英——法——比聯軍自蒙斯 至凡爾登 的全線退卻。九月初，法軍遁出瑪倫 (Marne)，德軍距巴黎 僅十五哩，法政府遷至波爾多 (Bordeaux)。在協約國 聯軍極西的小隊英軍，殊有被德將克魯克 (Kluck) 所統率的第一軍掃滅的危險，蓋第一軍進展至速，想從西北角直薄巴黎。

當此千鈞一髮之際，法軍總司令霞飛 (Joffre) 元帥決定在瑪倫 之南招集散亡的軍隊並止住德軍的推進。瑪倫 第一次大戰酣鬪了一星期（自九月五日至十二日）。法軍中開到兩路援兵，一為繼意大利 之宣告中立而被解除南邊防守職務的軍隊，一為以徵發的摩托車急運至前線的巴黎 衛戍軍。反之，德軍在這個要緊關頭因須將瑪倫 的駐軍一部調往東普魯士（那裏正受俄軍的侵掠）而勢弱。援救東部危急的兵士開拔後奉命來填防

的則爲右翼軍——這一軍恰是舍利芬所堅持爲主力所在之線的一部分，目前適當法軍攻擊之衝。這個調動的結果使德人覺得非移轉中央軍來扶助右翼不可，於是福煦 (Foch) 大將率領法軍乘其中央之瑕而擊卻之。德軍最後退至恩河 (Aisne) 的戰線，秩序很整齊。他們在這裏進行掘壕工作並在後面築成縱橫交錯的塹壕和有棘的鐵絲網——這是現代戰爭上的革新。所以在時間表所規定的六星期之終，德軍雖然處優勝的地位，可是在巴黎。所謂勢如破竹的攻擊未達目的而失敗了。

在瑪倫之戰後，雙方覺得自阿拉斯 (Arras) 西向至海間一百多英里寬的那個大峽谷非常重要。德軍和聯軍馬上開始「向海的競走」，他們實施多次的攻擊，互相包抄，以便達到並占領英國海峽的港口。如果德軍能够達到這個目標，他們就可以控制比國全境並能阻礙英國對於法國的援助。有一個時期德軍又似乎所向無敵，在十月初旬中，他們陸續攻取了根脫 (Ghent) 布魯日 (Bruges) 俄斯坦德 (Ostend) 最布魯革 (Zeebrugge) 和安特衛普 (Antwerp)。但到比利時西南和法國西北一隅的法蘭德斯 (Flanders) 地方，他們就在伊泊爾 (Ypres) 第一役中被止住了。這一仗的結果，協約軍仍舊保有比利時的一長塊土地並控制着卡雷 (Calais)、丹克 (Dunkirk) 和布倫 (Boulogne) 三城，直至大戰告終。從戰略上和心理上的觀點看來，這些都是重要的資產。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的冬季，敵軍祇從事鞏固他們在全長六百哩的陣線（自比利時西南至阿爾卑斯山 (Alps)）的地位。偶然的無關重要的壕溝戰祇足以表明雙方已達難解的停滯的狀態。實際的優勢當然是

在侵略者一方。他們支配了比利時的大部分與其工業非常發達之區及富有煤鐵礦山及鋼廠的法國北部。德軍在占領地的統治是殘暴的，但外人對於受難者的同情及對於征服者的野蠻行為的憤怒多有是根據於巧妙而不真實的宣傳的。

當這個時候，俄國的動員居然比它的敵人或同盟者所預料者迅速，它並且開出兩大隊人馬從波蘭的凸角進攻德國和奧——匈。沙皇軍隊的進行有如此神速，以致俄京（其名稱本為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因愛國的理由，被改為彼得格勒（Petrograd））一般熱心家踴躍贖資，懸賞十萬元，以與第一個插足於柏林的俄國兵士德政府聞之大駭，立召興登堡（Hindenburg）出而拒敵。

興登堡曾於一九一二年因年老致仕（他生於一八四七年），但大家認他是東普魯士的戰略和軍事地理的泰斗。他開命立起，重綰兵符。一個比較年輕的軍略家，盧登多夫（Ludendorff）被任命為興登堡的參謀長。這個時候一般宿將也從西線被派到東線。在連續幾次的大勝利中，興登堡和他麾下的將領把敵人逐出德國並向俄境推進。從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一日，德軍在坦能堡（Tannenberg）的地方大捷。接着俄軍又有馬祖梭湖（Masurian Lakes）一帶卑溼地之敗績（九月五日至十五日）。一九一五年二月，俄軍在澳谷斯圖夫（Angustovo）遭逢第三次的厄運，遂一蹶不振。俄軍在這幾役中的喪亡人數計達一百五十萬人，並損失無數的鎗礮。

但俄人對於其他的敵人，則比較順利。奧——匈的軍隊中，種族成分非常複雜，都來自這個含有無數國籍的人民的帝國。雖然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隊伍很忠心，但此不足以語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的分遣隊。後者覺得

要他們盡忠於壓迫自己的人，殊有難色，他們多有出於叛變或逃亡兩途者。(註)所以，儘管俄軍的裝備不齊全，他們仍迅速地攻進奧屬加利西亞並將該地防軍驅回至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s)。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俄軍奪得普贍密斯爾(Przemysl)的大礮臺。

(註)到一九一六年，單是捷克人和斯拉夫人已有十萬投到協約軍的隊伍中作戰。

盡出可用兵士以抗俄軍的必要，使奧國不能克服塞爾維亞。直至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日，塞國京城栢爾格雷德(Belgrade)方被攻陷，但祇給奧人保守了兩星期。到聖誕節，塞政府就覺得很可平安回京，是年將終，奧人即被擊退。然而塞人也不能滿足侵入波黑兩州的願望。

一九一五年的春天，九百哩長的東戰線上的戰役又由中歐同盟國重新開始了。一等天晴，與登堡就率領大軍浩浩蕩蕩地殺奔彼得格勒。同時德奧聯軍統帥麥根生(Mackensen)將軍正計劃着將俄軍趕出加利西亞。自五月十五日到十七日，麥軍在散(Dan)的一戰獲勝。在數星期之中，俄人不得不放棄前九個月所略取的土地。到九月間，沙皇軍隊完全被從加利西亞掃除，單剩該地的東尖尚在他們的掌握之中。他們又被驅出俄屬波蘭、庫爾蘭(Courland)和沿波羅的海(Baltic Sea)的立陶宛(Lithuania)大部分。將士死傷的數目非常之大，軍需品亦委棄殆盡。後方受訓練的新兵每三人祇有一枝鎗，軍火的供給額幾將告竭。俄國差不多需要一年工夫，纔能恢復一九一五年的大損失。

保加利亞於一九一五年十月加入中歐同盟國，並和麥根生合作來對付塞國，這是使協約國更加大感棘手。

在兩個月之內，塞國就被征服。同樣的厄運不久又降臨到蒙特尼格羅。在一九一六年春天，戰事已移至阿爾巴尼亞北部。

俄國既感物質上的極端缺乏，於是協約國覺得要接濟它，非進攻加里波利（Gallipoli）半島及達達尼爾來打通一條各協商國間的交通孔道不可。這種冒險舉動同時可以牽制若干正在圍逼俄國的土耳其軍隊，使協約軍在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行動比較容易，如果順利，又可使土耳其與其友邦隔絕，並鼓勵那幾個還在守中立的巴爾幹國家投到協約國一方面來。

於是英法組織一個強大的艦隊，開往上面所說的區域。在一九一五年二月九日達達尼爾（Dardanelles）入口的防禦工事受着猛烈的礮轟。礮臺不久被毀，艦隊乃駛入海峽。可是在這裏，這些兵船忽然大遭其殃，因為觸着浮流的水雷並受到隱伏在德人所計劃的許多大礮壘後面的克魯伯（Krupp）礮礮火。協約國艦隊損失了幾條船和幾千人之後，祇好引退。接着有陸上的進攻。進攻的軍隊多為英法殖民地的隊伍及澳洲與新西蘭（New Zealand）軍團的兵士所構成，在漢密爾頓（Hamilton）爵士統領之下。兵士很勇敢，毫不費力地奪得半島上的平原，但他們不能攻陷控制着平原的許多小山。結果土耳其人雖設備劣弱，但因統率得宜，卒獲勝利，英法軍祇好撤退（十月）——自此土皇繼續保守海峽地，直至大戰之終，未受侵略。一九一六年四月，協約國更得到令人捏氣的消息，德將哥爾支（Goltz）所統率的土軍已經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庫忒爾——阿馬拉（Kut-el-Amara）地方獲坦增德（Townshend）將軍和五萬人。當時英人法人所得到的一點小安慰，祇是在中立的希臘攻占薩羅

尼加(Salonica) 1事。

東線的戰事正鬧哄哄的時候，西線則比較平靜。兩方面都會打過幾仗，想突破法蘭德斯(Flanders)的停頓局面，但沒有一仗有顯著的發展。協約軍於一九一五年三月間在涅浦沙栢爾(Neuve Chapelle)地方稍獲勝利，但至次月，德軍即施猛烈的反攻，促成伊泊爾的第二次大戰。四月二十二日，德軍在這裏初次大規模地使用毒瓦斯。綠氣的雲霧毀滅了很多毫無保護的英國兵，在短時間內協約軍的陣線裏面就造成四哩的缺口。然而前幾次毒氣比較用得少的時候，結果不大可觀，竟使德軍對於這種新毒瓦斯的價值有點懷疑，他們竟沒有準備利用協約軍陣線裏面的這個大缺口。德國後備兵的缺乏使協約國能够盡量徵調援軍來固守陣地。在六月和九月，協約軍疊次衝鋒，想打退敵人，但祇是增加了傷亡之數。德軍因欲保存實力以備用於東線的大進攻，故僅以力守塹壕爲滿足。所以意大利的參戰是協約國的一九一五年戰紀的一線強光，但意大利的助力在次年中並不重要。

軍事行動(一九一六年)

正如一九一五年的特徵表示爲東戰場的多次取攻勢之戰，一九一六年也就被注定向西線的大進攻而顯著。雙方都進行大規模的攻擊，自二月至七月，德軍進攻凡爾登；自六月至十一月，協約軍進攻索謨(Somme)。德軍所以要取凡爾登，有幾個理由。那時在該地的德軍司令，至少在名義上，爲皇太子威廉。如果在他指揮下的軍隊大勝，自然就會挽救霍亨索倫王室在祖國的威信之陵夷。復次，凡爾登是法國所餘最大的一個要塞，法蘭西的

心臟」。它如果失陷，就不能阻當德軍之深入法境。此外，假使法人失掉凡爾登，對於雙方精神上的影響是很大的。反之，即使這個要塞不能攻下，德人以為法國至少會耗盡它的精力和錢財，而它的人民也會預備罷戰。最後，凡爾登區域在法人手中，總使德國的鐵路交通和洛林的產鐵地受到威脅，這個眼中釘必須拔去。

在二月二十一日，經過許多星期非常的和祕密的準備之後，德軍以猛烈的礮火開始進攻。據說，在開戰的最初十二小時內，有上百萬顆的開花彈從幾千尊大礮投擲到法軍方面。於是步兵在掩護的「火幕」後面前進。起初的進攻很容易，因為礮彈已經掃除了障礙。但凡爾登是一個天然險要之區，居高臨下，敵人仰攻至難。四周有許多礮壘為輔翼，其形如環，都很堅固。法軍司令官幾番畏縮逡巡，並擬撤退，但不讓部下知道他們有此念頭。後來他們反而激勵士卒死戰，人人充滿着「他們不得通過」這句壯語所表現的精神。

在六月間，德軍距凡爾登僅四哩。然而像從前進攻巴黎時一樣，他們不在城內。再者，他們覺得要應付協約軍在索謨的反攻，必須減省此地的人馬和軍火。因此，雖然他們奪得一百多方哩的土地，其大進攻終究失敗。凡爾登是阻擋德軍前進的第二個要地，而瑪倫是第一個。這次雙方的代價都很大，各損折五十餘萬人。

凡爾登之戰可算激烈而犧牲很大，然而差不多在各方面——交戰的人數，彈藥的耗費量，死傷的衆多，和戰術上的種種困難——索謨一役都卻超過它。英軍和法軍因為一半要解凡爾登之圍，一半想竭力利用俄軍和意軍同時的猛襲，所以謹慎地準備這個進攻，其戰略上的目標即在索謨兩邊的巴坡謨（Bapaume）和佩綸（Péronne）。在一九一六年的上半年，英軍已因本國採用徵兵制（一月間事）而勢力增強，鉅量的軍需品亦經積儲。英

軍乃於六月的最後一星期，開始擊德軍的陣線，「每日所用的彈藥多過於英國在大戰的起初十一個月內所製造的總額。」

此外，英軍又於九月間拿出一種全新的武器，「坦克」車，用在戰場上。英國陸軍部恐怕這種新武器正在某工廠製造的祕密洩漏出來，就揚言英政府曾經定製若干具坦克（*Tank* 水槽也）。結果這個不適當的名詞竟被繼續用作裝甲戰車的名稱。此種戰車係裝於兩個循環帶推進的牽引車上，不用輪子，行動時能越過壕溝，鐵絲網和泥濘之地，並能掃除荆棘和樹木等障礙物，而無被陷住或傾覆之虞。如果英人等到造出大批數目後纔拿出來使用，這場戰爭或可結束得更快一點，因為德軍初見此種穿鋼的怪物的確非常震駭。德人不久也照樣造了許多坦克車，並發明抗拒坦克車的大礮和地雷。

索謨之役使協約軍獲得一百多方哩的土地，但不能使他們奪取巴坡談和佩綸。在他方面，德軍卻給協約軍擊退幾哩，被迫解凡爾登之圍，並因之不能調遣西線的軍隊來對付東線的俄軍。在這場盧登多夫所謂「偉大的扭鬪」中，生命的損失共計達一百二十五萬以上。其中協約軍一方面死傷過半，但他們比德軍出得起人，所以還能支持這個大損失。誠然，這種可怖的犧牲使德國一部分軍官覺得戰事不能再有不當的延長，否則德軍難免敗績。

西線發生兩場大戰的那一年中，奧意的戰線上也有第一次的大衝突。這裏的地勢使行軍非常困難。奧國的特稜提諾（Trentino）州突出於意大利境內，但這個區域多山，崗巒起伏，形勢險峻，遂使雙方的惡戰，不久成爲

「目的在奪取山頂的雲端機關鎗之決鬪」也可說是真正的「長廣厚三方面的雪中混戰」。有些時候，必須在六千尺至八千尺高的崎嶇不平的山路上用人力將大礮拖來拖去。這個多山區域的東面爲意屬威尼西亞州 (Venetia)，向北伸展到卡尼鄂拉境的阿爾卑斯山 (The Carnic Alps)。威尼西亞之南卽威尼斯灣與亞得里亞海，而伊孫左 (Isongo) 平原與朱理亞 (Julian Alps) 山脈則在其東，在那些山上安上重礮就很容易控制各方的進路。

當奧軍爲保存實力起見，暫取守勢的時候，意軍司令卡多那 (Cadorna) 則擬定一個沿伊孫左 (Isongo) 進攻的計劃。他認爲與其趨向不利待軍的特提諾州諸山，不如朝東邁進。因爲意大利備戰草率 and 天氣壞的緣故，意軍直至本國參戰後若干星期後方纔出師。於是在一九一五年六七兩月間有伊孫左的第一戰。意軍的攻擊雖然損失很大，但所得甚微。第二役開始於十月，繼續至十二月。防守的奧軍有優於意軍的礮隊，但意軍的人數超出奧軍一倍。在這一役中意軍實際上又得不償失。接着雙方入於壕溝之戰，繼續到次年五月。在一九一五年中，意軍損折二十五萬人，而奧軍之死傷僅及其半。

一九一五年冬初，奧人曾向德國最高軍事當局建議合攻意大利。德人對於這個意見，嗤之以鼻。當奧人於一九一六年重申前請時，又遭拒絕。然而奧人決意獨立進行攻擊計劃。他們決定從特提諾的突角進兵，並侵入有兩條鐵路穿過的威尼西亞平原。如果奧軍的進攻順利，意軍的兩翼就會被擊破，而那兩條專供載運兵士和糧食用品到伊孫左戰線之用的鐵路也會奪到手。奧國乃集軍四十萬人，置之皇太子查理斯 (Charles) 大公 (斐迭

南大公死後所立)的指揮之下。五月十四日，兩千多尊礮沿着三十哩長的戰線開始初次的轟擊。

不出所料，意軍果然倒退，至六月，奧軍距微森紮 (Vicenza) 僅十八哩，那個地方是保護北方鐵路線的最後一個要塞。在這個當口，忽然俄軍入犯，來勢甚猛，奧軍不得不調開精兵若干師往加利西亞禦敵。所餘奧軍，兵力大弱，就不能繼續進攻了。未幾，意帥卡多那得到五十萬援軍，乃開始向奧軍反攻。奧軍不能抵當，退入特稜提諾，於是意軍的重礮和大軍移至伊孫左陣地。八月，他們在這裏又開始攻擊，是月九日，河東高岡上的哥里擦 (Gorizia) 城失守。以後幾次的進攻沒有多大結果，祇足以因疲奧軍而已。在一九一六年中，奧軍的傷亡之數為二十六萬；意軍的為四十八萬三千。

使奧軍不得不從意大利退兵的加里西亞的急變，就是布魯西羅甫 (Brusilov) 的進攻，此事開始於一九一六年六月五日。這場攻勢戰——俄國在大戰中的最後一次的大努力——原擬在七月間發動。俄國軍事當局算定本國如果到那時挽回了從前的失敗，就能博得大勝。但是法人要求俄國趕快進攻以緩和德軍之圍困凡爾登，意人也懇乞俄國進攻來逼迫奧國放鬆威尼西亞。布魯西羅甫之提前發動，即所以應法、意之請求。

奧軍是這個意外之變的犧牲者。他們的許多重礮和勁旅最近已移往意境前線的一部分。因之俄軍能够昂然前進，比較不受阻力。他們再度克服東加利西亞，占領布柯維納 (Bukovina)，直趨勒謨堡 (Lemberg)。在攻擊未完成前，他們已擄獲三十萬人和四百尊礮。俄軍自己頗吃驚用兵之神速，惜無便利的後備隊來乘勝追擊。他們的後備兵遠在北方，而貫穿南北的鐵路交通又可悲地不勝輸送之任。反之，奧軍不久就從意大利調回許多人馬。

和破隊。德國的援軍也馬上開到，而最高指揮之責由奧人交與德將法爾懇亥因（Falkenhayn）與麥根生擔任。這樣一來，俄軍立被截住，不能前進了，但當羅馬尼亞響應協約國的時候，協約國的希望復活。然而這個樂觀又祇是一剎那間的事。羅馬尼亞馬上遭遇德奧猛烈的反攻，麥根生以保加利亞軍從南邊打來，法爾懇亥因從西北要擊。在不到四個月之內，羅馬國的京城就落在敵人之手，當翌年開始（一九一七年）的時候，全境祇剩東北一角未被征服。這次大勝利對於中歐同盟國非常重要，因為它們現在可以利用羅馬尼亞大宗的小麥收成和豐富的油源了。

軍事行動（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七年之初，德國的地位似乎很躊躇滿志。在上年八月間與興登堡（現為陸軍元帥）已被命為中歐同盟國所有軍隊的統帥。軍需總監盧登多夫是他的參謀長，並且是一個軍事天才。塞爾維亞、蒙特尼格羅、羅馬尼亞、波蘭，大部分比利時，法蘭西北部，都在德人的手中。俄國是被打倒了，意人正在勉力掙扎。可是在四月間，協約國卻找到了歡喜的原因——即美國參戰了。最初幾個月美國主要以金錢、物品、戰艦、商船、標語口號和高尙的道義幫助協約國。但在十月後，美國的兵士也加入戰鬪最激烈之處了。

一九一七年西線之活動以德軍戰略上的總退卻開始，這不免使他們自動放棄差不多一千方哩的土地。退卻的目的乃在整頓並鞏固戰線，及節省兵力。後一層尤為其最要動機，因為他們祇有二百五十萬人在法國，卻須

用來對抗協約軍的三百九十萬人。當退卻之際，他們將舊陣地與新戰線之間的一切悉加破壞。這條新戰線係順着隆斯—聖昆墩—理姆斯（Lens-St. Quentin-Rheims）的方向，成一弧形，是現代防禦工事上的一個奇跡。德人呼爲「栖格夫里戰線」（Siegfried Line）協約國則以「興登堡戰線」稱之。

這一年中西疆的戰事，取攻勢者都是協約軍。四月間，英軍在阿拉斯（Arras）附近開始攻擊，法軍則在隆（Laon）的附近衝鋒。雖然起初得到若干勝利——英軍奪得維美嶺（Vimy Ridge），法軍奪得瑟芒堤（Chemin des Dames）的兩端——但純淨的結果終難償巨大的損失，尤以法軍爲甚。是時法軍的統領爲尼味爾（Nivelle）將軍，他在凡爾登始露頭角，並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繼霞飛爲總司令。霞飛所以被撤換，因爲法國一部分人對於他所持過於謹慎的戰術（即慢慢耗費兵士和物質來打敗德軍）已感厭倦。尼味爾主張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其心目中另有較廣大的目標，即終止濠溝衝突，急戰取勝。新上臺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雷孟梭（Clemenceau）他們自己是積極和勇往直前的人，所以都竭力擁護他的主張。

不幸有許多因素對於尼味爾的成功成爲有力的反證。德軍在各處都據着凜然不可犯的地位，他們藉所獲俘虜身邊的文件知道了他的若干計劃。法軍的士氣又很不振，於不知不覺間漸爲種種弊害所襲。此外，他們的兵士認爲尼味爾的戰術徒耗生命，於事無補。在五月間就有十個師團叛變，雖然這個消息因有嚴密的新聞檢查制度不爲人民所知。未幾，尼味爾被免職，代以善於操縱士卒的貝丹（Pétain）將軍。在這個新領袖之下，守壕溝的職務比較分配得均平，休息營則經創設，兵士告假亦多獲准（有些兵士竟有兩年未獲一假），軍法不如從前之嚴

酷，傷兵藉美國紅十字會之助得有妥善之看護。而貝丹本人亦常臨視軍官和士卒。叛變者中祇有二十三人被處決，雖然也有二百多人被流放到法屬殖民地。在一九一七年其餘的時間中，法軍的動作限於沿謬司（Meuse）河與恩河（Aisne）的小接觸及克復凡爾登與亞松（Soissons）四周的地方。

英軍比法軍略為積極。從七月到十月間，他們與德軍有伊泊爾的第三役，最終奪得帕斯痕達勒嶺（Paschendaele Ridge），這是一個極貴重的斥候所。接着在十一月，他們不經初步的砲擊，遽而猛襲空布累（Cambrai），以四百輛坦克車助戰。他們的進展固然迅速，但德軍的勢不可當的反攻又幾乎恢復了原狀。一九一七年西線的戰事即如此告一段落。雙方在戰略上或地理上都少有所獲。

比法軍的叛變和重大的犧牲更使協約國沮喪的，莫過於俄國的崩潰。俄國軍隊中的狀況一向是壞的，自一九一六年的連次大敗後，情形每況愈下，簡直不可收拾。據估計，自戰爭爆發時至一九一七年一月，軍中的逃兵共達一百二十萬人。軍紀之敗壞無以復加，而一般士卒且對於其長官深致猜疑，以為他們當負戰事延長之責。從軍的農民極欲回到田間去，因為那時的田地正待耕種。其他的兵士渴望歸家，因為家中老小正嗷嗷待哺。同時，後方的人民，特別是中等和工人階級，看到官場的淺見和腐敗，並受着政府的壓迫（這在平時已惡名藉甚，戰時愈令人不能容忍），怒不可遏。

在這些憤憤不平的分子中，穩健派勢力最強，他們於是逼迫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於一九一七年三月間退位，並設立臨時自由政府，以李窩甫（Львов）為首領。然而前線戰事繼續不利，激烈派人運動更進一步的改革，極端

激烈派，稱爲布爾札維克黨者，組織兵士、工人和農民的會議或「蘇維埃」(Soviet)，要求承認爲人民的代表。是年夏季，李窩甫政權失墜，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Kerensky)起而改組政府。

克倫斯基所抱的宗旨在於改革俄國，同時繼續對抗中歐同盟國的戰事。他覺得俄國人民不會同意再作犧牲，除非勸誘他們爲一個理想而非僅爲充裕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的囊橐而作戰。所以他設法進行協約國的會議來提出戰爭的目的，而這種目的當注視到一個「不割地不賠款」的和約。協約國對於他這種發狂的籲求毫不理會，克倫斯基於是決意開始一個最後的，背城借一的攻擊。以布魯西洛夫代科泥羅夫(Kornilov)總司令之職，軍中的紀律稍復舊觀，而戰事定於一九一七年七月發動。

但這次進攻在開始前就被注定必趨失敗。德、奧的間諜很順利地在俄軍的前線和後方煽動叛變心。布爾札維克黨同樣忙於傳播逃亡和抗命的瘟疫。兵士有時大開辯論會，討論是否執行長官的命令。再者，俄軍的作戰計劃被洩露於敵人。因之奧軍不久就擊退那些不攜貳的俄軍，並在八月尾將他們逐出加利西亞和布柯維納。德軍同樣趕退他們的敵人，並在九月攻陷里加(Riga)城，一直衝進愛沙尼亞(Estonia)。當這個時候，布爾札維克黨人更利用軍事的失敗搗亂，並大喊「和平土地麵包」及「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的口號，使民衆集合於他們旗幟之下。是年十一月，克倫斯基政府卒被推倒，布爾札維克黨人在列甯(Lenin)與托洛茨基(Trotsky)的領導下奪得政權。

數日之後，布爾札維克政府向協約國提議各國訂約休戰，並以具體表現着「不割地不賠款」及「民族自

決」之原則的條約來結束戰爭。協約國料定俄國人民會否認十一月革命，所以不注意這個提議，事實上他們也拒絕承認布爾扎維克政府。布爾扎維克政府於是在十二月十五日單獨與中歐同盟國議定休戰，一星期後，舉行和平會議於波蘭的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 (Brest-Litovsk)，出席者有德奧——匈保加利亞土耳其和俄羅斯諸國的代表。所成立的和約是強定的，因為布爾扎維克政府遇到非接受德國的條件即任俄國再受侵略這兩個歧途。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各國代表正式簽定和約。

根據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 (Treaty of Brest-Litovsk) 的規定，俄人承諾以下各項：(一)不在中歐同盟國所有或所占領之地宣傳其主義；(二)退出亞美尼亞 (Armenia) 之喀斯 (Kars) 阿達罕 (Ardahan) 與巴統 (Batumi) 三省，此三省之改造「當與鄰邦，特別與土耳其商定」；(三)退出愛沙尼亞、里窩尼亞 (Livonia)、芬蘭及阿蘭羣島 (Åland Islands)，並放棄波蘭、庫爾蘭與立陶宛，後三地之將來地位由中歐同盟國「商同各該地居民」決定之；(四)清除烏克蘭 (Ukraine) 境內的俄軍，承認新成立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並與之媾和，及預先承認該共和國與中歐同盟國間所締結之任何條約。依照一九一八年八月的增補條約，俄國更須繳付十五億元之賠款，給與德國最惠國的商業待遇，且不得禁止或賦課未砍或已砍木料之出口。總算起來，俄人放棄了五十萬方哩的土地及六千六百萬人民。這個條約證明了德國人的脾氣，它也足以表明，如果中歐同盟國得到最後的勝利，所可訂立的和平是怎樣的一種。(註)

(註) 德人與俄國媾和後，立刻進行確立他們對於俄國所放棄的北方諸地的支配權。芬蘭的寶座被獻於德皇的親戚赫斯 (Hesse) 諸侯。

查理斯·威廉二世本人成爲愛沙尼亞的國王，立陶宛則贈與烏拉克(Urach)諸侯威廉。烏克蘭設立了一個親德的獨裁政府，這個政府依據所謂「麵包和約」將四萬三千部貨車滿載的穀類讓與中歐同盟國。大戰終止與德國革命後，以上這些地方都成爲共和國。

自俄國退出戰爭後，羅尼馬亞的希望遂絕。因之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它祇好接受布加勒斯忒條約 (Treaty of Bucharest) 多布魯查 (Dobrujia) 和喀爾巴阡山脈的山麓小邱和山道都經割讓。重要的油田開採權都給與中歐同盟國，羅馬尼亞並承諾修正有利於它們的關稅稅則。羅國境內的回教徒和猶太人得享有與基督徒同等的權利。中歐同盟國則允許羅國伸展其勢力於肥沃的俄屬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省，並得經由多布魯查 內的指定路線自由出入於黑海。

俄國中途變節的那一年又以另一協約國——意大利之危殆而顯著。意國前方的軍隊，兵工廠裏的工人和後方的平民都不滿意於戰爭的進行。他們厭倦了毫無軍事上利益的不斷犧牲，況且他們對於德國並無深怨。俄人所立的榜樣造成一個深刻的印象，而中歐同盟國的工具們又在加緊散播叛亂的種子。德人很知道意大利國內「戰敗論者」(Defeatist)的氣焰，決定利用它，於是在前線最難到而出對方所不料的一點突行攻擊。

奧軍在德將貝羅 (Below) 的指揮之下，並特新到的六師團德國援軍的力量，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開始對朱理亞陣地施放毒氣並加礮轟，勢甚兇猛。加波勒多 (Caporetto) 地方不久被打開一個裂口，在四日之內，他們攻陷奇微戴爾 (Cividale) 和哥里潔 (Gorizia)。威魯烏第涅 (Udine) 並擄獲十萬人和七百尊礮。意人潰不成軍，直向皮阿味 (Piave) 奔竄。到十一月十日，意軍於再度損失十五萬人和一千一百尊礮後，被迫退至河

南。

然而意軍的退卻至此而止。英法聞訊，急遣軍至，力助他們抵抗。意帥卡多那（Cardona）被免職，易以第阿斯（Diaz），他比較懂得兵士的心理；陣地經十七八歲的少年熱心軍人投入，亦趨鞏固。國家之突告危急，在後方造成了團結一致的愛國情緒，這種情緒很快地撲滅了先前的「戰敗論者」之氣焰。反之，此時德奧軍的糧食和軍火有點接濟不暇，他們並且因為過速的侵略感到疲倦。所以，儘管在「加波勒多之禍難」中損失了六十萬以上的兵力，意軍此刻倒能奪回若干失地。諸事未了，而大雪已降，是年的戰事，遂告終止。

在一九一七年中間，協約國祇是在近東纔能自誇勝利，蓋前次坦贈德將軍的失敗，業經大事報復。三月，茅德（Maude）將軍奪得巴格達。十二月，阿蘭貝（Allenby）侵入耶路撒冷。再者，英人藉一般老練的宣傳家的活動和政治利益的口惠，很順利地離開了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Syria）、巴勒斯坦（Palestine）和漢志的許多酋長。對於他們的政教大君主——土耳其皇帝的忠心。在大戰的外交陣容上，錚錚露頭角的為勞倫斯（Lawrence）上校。他是一個牛津大學的畢業生，少年英俊，在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從事考古學的發掘時曾學習幾種阿拉伯方言。

海軍作戰（註）

（註）除德屬東非外，德國殖民地的戰爭所經過的時間都很短。中國的膠州係於一九一四年為日本所占領，這在上面已經說過。同年，英國

艦隊得到日本、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援助，奪取了太平洋中所有德屬諸島。非洲的多哥蘭（Togoland）以一九一四年失於英、法殖民軍隊，喀麥隆（Cameroons）則以一九一六年失去。德領西南非洲於一九一五年為英將斯穆次所征服，他曾參與鎮壓英屬南非洲，得衛戎（De Wet）所領導的部耳人之叛亂一役著有功績。德領東非獨負隅頑抗，當時進攻該地者皆來自南非，比屬剛果（Congo）英屬東非、洛諦西亞（Rhotesia）、印度及葡屬東非的軍隊，雙方一直戰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即休戰協定簽字後三日。德軍司令雷托窩肯克（Lettow-Vorbeck）手下祇有幾千人，大半為土著。可是需要十三萬協約軍和三萬五千萬元的軍費來迫他降服，其英勇可知。

當大戰爆發時，德國的海軍還沒有像陸軍那樣充分準備着應戰。一八九八年與一九〇〇年的海軍法所擬定的大規模造艦計劃此時尚未完成，而英國的海上霸權是一個當然的事實。同樣，法國的海軍也大於奧——匈的。因此德國海軍部將它的公海上的艦隊撤退到本國的領海內，受着基爾（Kiel）和黑耳郭蘭島（Heligoland）上的砲臺的保護。其計劃乃在等候機會，以便集中勢力向英艦的分隊攻擊。

當這個時候，英艦實行對德封鎖，頗有效驗，雖然這是非法的。德國的商船隊很快地被掃滅，船隻非沈沒即被擄獲。在海戰開始泊在警備線外邊的德國戰艦，也遭同樣的厄運。德國海軍大將司皮（Spee）所率領的一隊巡洋艦方從太平洋歸來，在智利海岸外距科洛奈爾（Coronel）不遠的地方雖然遇到和戰敗了一小隊英艦（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但行至福克蘭羣島（Falkland Islands）洋面，卻被另一隊勢力雄厚的英艦毀滅（十二月八日）。

大戰的最初幾個月，德人幾次圖襲英國沿海的城市。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日，他們遣出一隊巡洋艦攻打諾福克 (Norfolk) 海岸，十二月十六日，另一隊又破擊約克 (York) 郡海岸。這兩隊於大施破壞後都得安然回來。第三次入犯的艦隊則於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多革岸 (Dogger Bank) 的洋面遇敵，混戰很久，結果被英艦擊退，略有損失。比這些活動稍為順利的，則為許多孤立海外的商船襲擊隊（大率為輕快巡洋艦）的戰績。其中最以戰功著名的有「摩威」(Möwe) 號，曾於十五個月內擊沈或捕獲三十八條船，這在大戰中比其他任何軍艦所為者多過一倍；「愛姆敦」(Emden) 號，曾於三個月內在印度洋中擊沈十五艘巡洋艦或驅逐艦；「卡而斯魯希」(Karlsruhe) 號，曾擊沈十七條敵船；及「西埃德勒」(Seeadler) 號，曾毀壞十條。

以上的戰績，雖然够壯觀，終不能飢困英人。反之，英國的封鎖政策卻很順利地切斷德國的貨物入口。於是德人因海軍大將替爾匹次 (Tirpitz) 的堅持，竭力使用潛水艇或「U字船」來達到他們的目的。關於德國因潛艇活動的結果與中立各國所發生的糾葛，上一章已經討論過。至於以潛艇用作戰具的效力，至少暫時，是毫無疑問的。一九一四年的四月是潛水艇耀武揚威的旗月。在該月中每四隻離開不列顛羣島的船舶中，總有一隻被毀。總共算起來，德國的海底船所擊沈的協約國和中立國的商船和漁船達五千隻以上。海面軍艦和水雷所擊沈的又七百多，這樣一來，被毀船隻的總噸數達一千五百萬。德國的潛艇祇被擊沈了二百十六艘。

在大戰終止前，協約國已想出幾種抵抗潛艇的利器。電警器可以報告尚在幾哩外的潛艇出現。海底炸彈早經發明，重量的水雷防禦線亦經敷設。電網滿佈於英吉利海峽。商船皆有強有力的軍艦護送，特別是在美國的海

軍加入服務之後。著名的美國「神秘船」或「Q字船」曾經將不小心的潛水艇誘出而擊破之。掩飾的技術也很精巧，以致極大的船在短距離也難辨別。再者，德國的受過訓練的潛艇水手人數有限，職務的繁重很快地影響到功作過勞的艇員個人。

大戰中唯一的海軍大戰即為著名的遮特蘭 (Jutland) 之役 (德人則稱為斯加基拉克 (Skagerrak) 之役) (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德國的公海艦隊此時由海軍大將斯拆阿 (Scheer) 指揮，他是一個相信積極行動的人。在他的命令之下，海軍中將希帕 (Hipper) 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早晨帶領幾艘斥候艦駛出洋面，並在離挪威西南海岸不遠的地方顯示進攻的動作來逗引英國大艦隊的一部分。他預料英艦一定會出來受攻擊，然後由斯拆阿所統率的主力艦隊 (跟在希帕的後面約五十哩之遙) 來消滅它。恰巧英人曉得德艦從根據地駛出的計劃，雖然他們不明白這種伴動的目的。因之他們早於三十日下令集中艦隊於北海。

在三十一日下午，希帕的斥候艦隊不期而與海軍中將比德 (Beatty) 所帶領的英國斥候艦相接觸。希帕假裝向本國主力隊敗退，比德同時也這樣做，想引誘德艦走向海軍大將澤力科 (Jellicoe) 所統率的英艦主力隊。澤力科和他的艦隊已於傍晚追上，並在德艦隊與本國海軍根據地之間占得地位。

這場海戰從噸數和武裝的觀點看來，是歷史上最大的一場。英國一方面共有一百五十一艘船，包括三十七艘主戰艦。德國一方面有一百零一艘船，包括二十一艘主戰艦。斯拆阿覺察到英國的實力較強，就決定於敵艦不

覺察之際溜之大吉，回到本國海口。在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的晚間，德艦乘大霧瀰漫之際閃避了英艦全隊。在這個意義上，及從雙方所受損失的見地看來，德人在遮特蘭之役是順利的。他們用了較小的艦隊加敵人以較重的損失。德人在此戰中失去一艘大艦和十艘小艦，並折軍官和兵士二千五百四十三人。英人則喪失了三艘大艦和十一艘小艦，將士傷亡者六千二百七十四人。雖然，英國仍繼續掌握着海上的支配權。

德國的艦隊，儘管甲裝堅厚，射擊準確，然此後簡直毫不活動。斯拆阿在一九一六年八月間，曾再度試行出擊，但一接徐泊林式偵察飛艇的通知，告以英國艦隊正嚴陣以待的時候，就馬上逃回。德艦的最後一次突圍係向挪威而行，時爲一九一八年四月。可是仍毫無所得，結果還是駛回海口，這一次則因「毛奇」號巡洋戰艦的暗輪發生意外。

空中戰爭

大戰時所採用的許多新式武器中，其非常重要者莫過於飛船和飛機。德人第一個認真使用飛船來攻擊敵人。在一九一五年之初，他們派出很多可駕駛的大氣球或「徐泊林」（以其發明者徐泊林（Zepelin）而得名），飛往英國空中，向沿海的城市拋擲炸彈。於此更可表明一般人認現代戰爭的危險祇限於特選的「戰鬥者」是徒然的。徐泊林飛船的襲擊不僅達到毀滅工廠，糧食倉，軍火庫及交通機關的實際軍事目的，並有震撼平民神經的效力。一九一六年的夏季是徐泊林出動特別勤的時期，但此後就不大使用它了。這種飛船的身子太大，易爲新

出世的高射礮所中。再者，爆裂子彈的發明亦使這種專靠裝滿輕氣的大囊之浮力來航行空中的東西非常不適於戰爭之用。

不久，一種較小較廉較快而比空氣較重的飛機就取「徐泊林」的地位而代之了。從一九一七年之初以往，這種飛機在英國，特別是在倫敦的空中進行擲彈的襲擊。德軍和協約軍兩方面都認它是軍隊的「眼目」，用以偵察敵軍的陣線，指示射彈的目標，警告敵方攻擊的準備，以照相機攝取敵軍的地位，並向敵軍的壕塹和城市散發宣傳品。接着抵抗飛機的武器也很快地發明了，抵禦空中偵察的掩飾術也試行了，然而飛機仍屬有用。

最初，飛行者身邊祇備有手鎗或來福鎗，但不久機上也裝有輕便機關鎗了。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一位二十五歲的發明家福叩（Fokker）發明了一種遮斷的裝置，這可使飛機駕駛者開放機關鎗時不致有子彈誤擊暗輪翅之虞。有一個時期這種巧妙的裝置使德人的空中勢力優越於協約軍。起初的空中戰爭大都為雙方駕駛者之間單人的短兵相接，往往同歸於盡。一種有豪俠氣概的空中慣禮流行了，空中的「好手」也成為民族英雄。這些好手中最著名的有德人利希陀芬（Richthofen）男爵，「德國的紅武士」；法人封克（Fouck）及美人李根栢荷（Rickenbacker）。

然而以一敵一的決鬪不久就讓位給有組織的飛機隊戰爭，而正規的空戰往往發生於每方有十架至五十架飛機的飛行圈之間了。各交戰機隊由一隊長率領，他自行挑選駕駛者，並以身作則來表演技巧和勇敢。這種飛機隊於窘困敵軍退卻的隊伍或阻礙預備隊前進時，亦有用處。

毒瓦斯

毒瓦斯雖由德人用起頭，不久就成爲雙方盛行的武器。總計起來，各交戰國在戰場上試驗了將近六十種的毒氣或其混合物。每一種的效果或致人於死，或使人流淚。其放射的器具爲手擲榴彈或鎗放榴彈、毒煙燭、礮彈、三吋口徑的前膛礮，壕中臼礮及空中炸彈或圓筒。這些毒瓦斯有的是不持久的一種，分散後與空氣混合並很快地失去效力；有的是持久的一種，於分散後仍能維持幾小時或甚至於幾天，其效力曾不稍減。在第一種（大半用於戰爭之初期）中，我們可以找到刺激感官的毒氣如催淚氣、噴嚏氣和嘔吐氣等，及刺激肺部的毒氣如氯化苦（chloroform）、氯化炭氣和氯氣等。芥臭液（硫化雙氯乙烷）則爲第二種的代表。

我們很難估計戰時因毒瓦斯而致傷亡的精確人數，因爲許多人之成殘廢，由於好幾種原因。此外，還有不少人走出陸軍醫院後不到幾年就因從前中過毒氣而卒不免於死。被毒瓦斯殺死或傷殘的人數既不能確知，一般化學戰爭的宣傳家就據此宣傳以爲毒瓦斯是最合人道的武器。但「駐法美國化學戰事部」部長弗黎斯 (Fries) 將軍說道：「當然，那些由於其他原因而死在戰場上的人們中有許多亦由於毒氣而致命。除非你稱火藥爲戰時的基本元素，沒有一種其他的元素能夠說明美國軍隊中這許多傷亡之數。誠然，我們相信較大的傷亡之數不是陸軍的其他任何一臂（步騎、礮兵爲陸軍之二臂）所致的，除非可以說是步兵，就是這樣說，我們也須將子彈、機關鎗和手榴彈來說明一切兵士受傷之故。我的這種論斷是不錯的，儘管事實上當美軍在聖米業爾 (St. Mihiel)

和阿爾貝 (Argonne) 開始攻擊的時候，德軍的毒氣幾乎完全用盡，而在聖米業爾一戰中大概沒有因毒氣而致的傷亡，卽有之，亦祇在阿爾貝之役一星期後，並且很少很少。」(註)

(註)見(Eriss, A. A., and West, C. J., Chemical Warfare, 1921.)

氯氣也許是最常用的一種，但破壞性更大的芥臭液不久就取得「毒瓦斯之王」這個無可豔羨的名稱。這一種瓦斯可以鑽入手套，衣服和面具之內，一和皮膚接觸，就能將它全部燒成可怖的水泡。依照美國化學戰事部另一軍官的計劃，擬將盛有一噸芥臭液的容器用飛機帶到德國城市的空中，並附以定時爆炸的信管，從離地幾百尺高的所在拋下來。預料一噸重的容器會波及一畝多的地方，這樣一來，「所有地面上的生物，即使是老鼠，將無一得活」。幸而在能將這個計劃實施之前，休戰之局已成。

發明有效的防毒面罩的科學略比新瓦斯的製造落後，而這種面罩保護力又有限。有些毒氣非常刺激感官，以致在狂亂中的人們不得不將面罩卸下，於是致命的毒氣更能迅速發生效力。以例言之，德人在一九一七年發明一種二苯氯肺 (diphenylchlorarsine)，這種東西一經爆炸卽化爲微塵，祇要凝聚其中千萬分之一，就會使人發生痙攣並覺鼻、肺和咽喉中有如火焚，痛苦不堪言狀。如果它凝聚得更強一點，卽致大嘔大吐。在將協約軍所用的面具加以改良，以防禦此種毒氣（這是從著名的「藍十字榴彈」中投射出來的）之前，需要很久的時間。據弗黎斯將軍說，這次世界大戰中毒氣的利用及其破壞性，「與它將來的情形一比，簡直是小孩的遊戲」。

(註)

(註)據報告，包爾溫(Balwin)曾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下議院宣稱：「在上一次大戰終止之前，本國(英國)已有三種發明物，其破壞力非常之大，我們因為良心上的關係，並沒有拿出來使用。但在下次大戰中，卻顧不得許多了。」

宣傳

在好久以前，「戰爭一經宣告，真是第一個犧牲者」這句話已經是老生常談了。所以宣傳並非大戰時一種新的武器。有若干世紀，它已被用作改變民衆的心理，使傾向於所希望的觀點的方法。一百多年前，奧國首相梅特涅說道，半打受拿破崙津貼的小冊子著作，對於這位法國皇帝，與三十萬人的軍隊有同等價值。然而大戰時期的宣傳工作，其範圍之廣大，方法之科學化，真是空前的。各國政府都網羅本國的宣傳專家，編成有組織的，受監督的團體，日夜從事工作，務使全國人民都覺得戰爭的合理，公正與必要。

他們用無量的精神來說服人民：本國的主義是正義；敵人的動機是嫉妬，貪婪和殘酷；本國的領袖是受了理想主義的感召，而敵人是自私自利的物質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將廢物（指敵人）掃除於世界的犧牲並不算太大；以及諸如此類令人作嘔的話。一般可敬的說教者和尊貴的導師互相競爭着來醜詆敵人，而所謂敵人也者，原與他們同奉一個上帝且具有同等的文化。一般專門的演說家和雄辯家都在搖舌鼓唇，如中風狂，來博得那些預備將來做「礮糧」（即礮灰）的人們的喝采，而其所造謊語簡直太有惡意，太可笑了，所以有時相信的人也不少。妖怪精靈的故事再也不能使小孩子嚇得安靜了——因為有以敵人為題材的更恐怖的故事使它們害

怕。甚至於戰後許多年，一般人對於那時所流傳下來的最荒謬的假話和誤述，還深信不疑，於此可見那般宣傳藝術家的手腕是多麼高強。政府所虛報的軍情是用超等的公布方法來傳播的。後來更正的消息則刊於報章上不顯明的地方或夾在廣告欄的縫中，使人不注意。

於是在大戰時期中，謊語也像其他許多犯罪行為一樣，成爲「愛國的道德」，而宣傳家也可以毫不疚於心地說假話——惟須他「固執到底」。在各國，政府都設有宣傳機關：在德國爲「報界會議」(Pressekonferenz)；英國有北巖爵士(Northcliffe)所領導的「克魯會館」(Crewe House)；在法國，則爲以「天主教徒委員會」(le Comité Catholique)爲輔的「報界俱樂部」(la Maison de la Presse)；在美國，則由克里爾(Creel)監督「情報委員會」的工作。當大戰將終時，又成立了一個「協約國國際情報局」，在北巖爵士的指揮之下，管理這個科學化的說謊系統。

報上所載的殘酷的怪談極爲各國人民所喜閱讀。正如協約國的男女們津津有味地談說德軍斬斷小孩的肢體並強姦「婦女」那種可怕的行爲一樣，中歐同盟國的人民也渴欲聞知關於法軍、塞軍、或俄軍的殘暴的最新消息，以及比人以盛有火藥的雪茄煙給與德兵，或法國教士將咖啡與馬錢素（一種有機性植物鹼，性猛毒）混和以供德軍軍曹之飲等等奇聞。當時偽造的相片（上面印有「照相機不能說謊」這個標題）充斥於全世界，「維也納且有一家投機的店舖供給許多空出標題的殘暴寫真片，俾交戰國雙方都可買來作宣傳品」。攝影機也獲得爲宣傳利器的大成功。

戰事的新聞給雙方無限制地加以曲解和牽強附會，那些由於無知或出乎惡意而譯錯敵方文字的投機宣傳者，也做出了不少不公不正的勾當。例如，協約國方面有一個愛國者聽見幾個德國人唱着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著名的讚美歌，「我們的最堅固的堡壘就是上帝」（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卻報告道，他聽見一羣崇拜偶像的「匈奴」（Huns）唱着「興登堡是我們的上帝」（Hindenburg ist unser Gott）而戰慄。另一個愛國者則大造謠言，說德人將兵士的屍體運到以融解法提取脂肪的工廠裏去。他的故事乃根據於處置馬屍的德軍命令。

下列一段係摘自龐孫貝（Ponsonby）的戰時的虛偽（Falschhood in War-Time）一書中，它給予我們一個最有趣的關於「新聞之製造」的例子：

安特衛普（Antwerp）之失陷（一九一四年十一月）

當安特衛普失守的消息傳出時，教堂的鐘聲響了（意思是說在德國的教堂）。——德國哥爾尼日報（Kölnische Zeitung）。

據哥爾尼日報載，當安特衛普城被攻佔時，該地教堂的教士被迫鳴鐘——晨報（巴黎）（Le Matin）。

據晨報自科倫所得消息，安特衛普被佔時拒絕鳴鐘的比利時教士已被驅出教堂。——泰晤士報（倫敦）（The Times）。

據泰晤士報經巴黎所得科倫的消息，安特衛普被佔時該地不幸的比利時教士因拒絕鳴鐘而被罰作苦

工——塞拉郵報（米蘭）（*l'orriere della Sera*）。

據科倫地方所傳出，經倫敦而達塞拉郵報的消息，業已證實安特衛普的野蠻征服者，已將不幸的比利時教士作爲鐘舌倒懸於鐘中，以懲其拒絕鳴鐘之英勇行爲——晨報。

所有這種宣傳不單順利地打起各國人民的犧牲精神，並且引出真正的暴虐狂。對於「有敵人嫌疑者」的攻擊和逮捕，真是數見不鮮，並且很兇暴。許多無辜的人往往因姓氏「系出敵方」被人咒罵，迫得祇好將它改成一一個更「本地的」姓氏。在美國，一個主婦在鄰近珍珠店無心地叫出酸醃菜（德國字爲 *sauerkraut*）的名稱要買，（她忘記自美國參戰後這件食品已變成「自由椰菜」）就犯着重大的嫌疑。同樣，德國的麻疹也被改稱「自由麻疹」。

「仇恨的種子」從來沒有像這樣廣播過。人民的恨心也從來沒有像這樣透澈地和科學地被動員過。各國政府在國際間互相詆毀的遊戲中，也很少這樣下賤過。而這一切，據說都是爲了要保持文明的幸福。這場大戰，由其信徒，特別是由一般坐在後方安樂的辦公室中的偉人先生們說來，是「神聖之戰」及「十字軍之征伐」！

和平運動與戰爭目的

在雙方的衝突因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休戰協定而告終止的好久以前，每一方都已提出許多和平的建議。其最早而最重要者，爲由中歐同盟國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提出。此後，各國人民所表現的戰敗論和厭戰的態度

既漸趨顯明，停戰的意見更不斷地接踵而至。實在，有一個時期內許多人——資本家，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基督徒及外交家——的呼聲是和平而非戰勝，他們在為文化和人類的將來擔憂。

中歐同盟國在他們戰事很順利的時候提出的和平建議，及美國總統威爾遜氏探求各國的戰爭目的之企圖，前面已經討論過。協約國於回答美國的請求中，卻加德國以存心離間協約軍而非有誠意終止戰爭的污名，同時公布了一紙大半根據於祕密條約的講和條件（時為一九一七年一月）。雖然雙方的外交家的立場是不能投合的，威爾遜仍乘此時機向參議院作樂觀的演說，竭力主張「沒有勝利的和議」，並誓以美國的助力來擔保一個公平的，永久的解決。

約在威爾遜作上面的宣言後五個月，德奧——匈、保加利亞、俄羅斯和幾個中立國的社會黨與工人團體的代表，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城討論勞動者協助結束戰爭的方法。協約國的同樣團體，起初頗以為這種運動是德國的宣傳詭計之一面，但當疑團盡釋的時候，他們也遴選人員來代表英、法、意和美國。這四國的政府拒絕簽發護照給於代表，故斯德哥爾摩會議遂告失敗。

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羅馬教皇本尼狄克特十五世（Benedict XV）發表文告，籲求「公平的與永久的和平」。他提議國際的事件應以「公理的道德力」代「強權的武力」來解決，歸還一切占領地，互相放棄賠償的要求，保證海洋自由使用權，規定以仲裁方法解決將來的國際紛爭，裁減軍備，及和平解決一切土地的爭執，如亞爾薩斯——洛林、波蘭及特提提諾等地之歸屬問題是，必要時以民衆投票決定之。威爾遜以協約國代言人的

資格，於八月二十七日答覆教皇的籲求，認爲以任何條件與德帝國政府作和平的談判是毋庸置議的。祇有在德國人民屏棄他們的「不負責的」政府時，協約國纔會答應議和。中歐同盟國對於教皇的一般條件頗表贊同，但對歸還土地及放棄賠償要求兩項，則守緘默。

俄國的布爾扎維克政府則於一九一七年公布俄所參與的許多祕密條約原文，以圖促成和議。這種公布不啻揭發各帝國主義者的陰謀計劃，所以很喚醒了英、法、意三國人民的迷夢，覺得他們已經上了大當，若再爲此犧牲，未免太傻。協約國政府於是手慌足亂，總算由威爾遜和其他各國領袖作了許多理想主義的言論，纔將失望的民衆所受此種震動的影響加以抵消。

一九一七年，奧、匈帝國發生兩個重要的和平運動。中歐同盟國中爲首的兩國（指德、奧）之間的關係，再也不像戰爭初期那樣親睦了。這兩國的軍官對於配置軍隊，計劃作戰，和分派軍用品等事，已發生衝突了。奧皇約瑟於一九一六年崩駕後，少不更事的查理斯即行登位。他看見國內的各種民族漸漸不滿現狀，並有叛意，爲之驚惶失措。愛國的奧人，深恐戰勝的德國勢力駕乎本國之上，竟至在德人的禱告語「上帝其譴責英國」（Gott Strafe England）後面加上一句——「並佑我奧人使不受德國之欺凌」（Und Schütze uns vor Deutschland）！所以我們毫不驚異，查理斯居然會在一九一七年之春企圖馬上成立和議，即使這個和議是與德國分開而成立的，亦所不顧。查理斯在寫給他的內兄西克思特（Sister）的信中，要求他將本人準備承認法國對於亞爾薩斯——洛林的「正當要求」並同意於恢復比利時與塞爾維亞這番意思轉達法總統普恩加齊。然而此舉沒有什麼結

果。後來奧國外交大臣拆富 (Czernin) 伯爵又於十二月含糊其詞地重申奧國的戰爭目的，也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當俄國的中途變節和意大利的厄運這兩件事尚在人們的記憶之中的時候，勞合喬治在他向「英國職工組合」的演說中，說明本人對於協約國的戰爭目的最近感想。雖然他此刻的立場比從前的稍為緩和，但其條件仍不外要中歐同盟國一方面受重大的犧牲，而讓協約國來占便宜。他略述他的理想的預定案如下：(一)給與奧——匈帝國各民族「真正的自治」；(二)退出並恢復法國北部，意大利北部，比利時，塞爾維亞，蒙特尼格羅及羅馬尼亞；(三)歸還亞爾薩斯——洛林於法國；(四)恢復未恢復的意大利；(五)復興獨立的波蘭；(六)承認土耳其帝國中非土籍民族之「各別的國家地位」；(七)將達達尼爾海峽變成國際的地帶；及(八)適用民族自決的原則於所有德屬殖民地。可是沒有一個字講到協約國統治下的民族或不安的殖民地！最著名的戰爭目的之聲明，為威爾遜總統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所提出。他在國會的演詞中以「十四點」總括他的預定案如下：

- (一)「開誠佈公訂立公正之和約」，並廢止祕密外交。
- (二)除以國際行動干涉外，「平時及戰時公海上之航行應有絕對自由」。
- (三)「就可能範圍撤除一切經濟障壁（關稅），並規定平等的貿易條件」。
- (四)「充分擔保……軍備應縮小至最低額，以適合保衛公共安全者為限」。

(五)「以自由、坦白及絕對公正之態度處理殖民地之爭執」，並須適當地顧及「殖民地人民之利益」。

(六)「將軍隊撤出俄國所有土地，並共同解決關於俄國之一切問題，務使世界其他各國給與最良善與最自由之合作，俾俄國有不受阻難之機會以自行決定其政治發展與國家政策……」。

(七)退出並恢復比利時。

(八)退出並恢復法國，並歸還亞爾薩斯——洛林。

(九)根據明白的民族界限，重訂意大利之疆界。

(十)給與奧——匈帝國內各民族「最自由的自動發展之機會」。

(十一)退出並恢復羅馬尼亞、塞爾維亞與蒙特尼格羅；使塞國得自由出入於海；以友誼之磋商決定「各巴爾幹國家彼此間之關係」；國際保證各巴爾幹國家的經濟與土地之完整。

(十二)蘇丹治下非土耳其領土之自動發展，並開放達達尼爾海峽，收為國際公有。

(十三)復興獨立之波蘭，並使有出海之自由。

(十四)「根據特殊公約組織萬國聯盟，其宗旨在國際間互相擔保大小國家之政治獨立與土地完整」。

(註)

(註)威爾遜擬定這十四點時也許受了邊沁(Bentham)所著(Plan for a Universal and Perpetual Peace, 1796)一書的

影響。

在一九一八年整個一年中，威爾遜會屢次以種種方式反復申言這個預定案中所表示的主要見解，以求說服協約國和敵國的人民，這十四點纔真是目前的戰事所因而繼續的目的。他把這「十四點」印就幾千萬份，由協約國的飛機分散於德軍塹壕和敵國城市，以搖動霍亨倫王室政府的權力。然而英、法、意三國的當局從未正式接受這十四點，雖然他們非常乖巧，在戰爭時期中不敢公然反對它。因之在將至的和平會議中威爾遜與協約國各政治家之間，就免不了發生長期的爭論。

結局（一九一八年）

在一九一八年之初，奧登堡與盧登多夫向德帝國議會的祕密會議說明他們所擬的一個作戰計劃，據說這可使戰事在本年內告一段落。但其代價將再犧牲一百萬人。議會認可這個建議，而軍事準備也馬上開始。那些久經戰陣的勁旅都被從俄國調到西線，其兵力之超過協約軍，以此爲第一次。英軍在一九一七年中的四十萬傷亡之數，此刻尙未補充，而美軍又姍姍其來遲，每月祇開到二萬五千人。德軍因而希望在四個月內即將戰事結束，不等到美國的兵力來即發生效力。

第一次的進攻開始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係順着阿拉斯——聖昆墩——拉費阿 Arras—St. Quentin—La Fère) 的五十哩長之弧戰線而行。德軍擬在各自指揮的英軍與法軍之間楔住，並將前者擠退到海。在不多幾天之內，英軍果被驅退三十五哩，不得不放棄一千五百方哩的地方，並損失三十萬人，其中有十萬人被俘。一

時之間，似乎德軍所希望的裂口可以造成，但英軍整隊而退，未被衝潰。當德軍拿出四十萬磅的重砲來作戰（這種砲曾在七十五哩的距離之外轟擊巴黎）時，協約軍更喪膽了。然而這種「大白太」（Big Bertha）（白太為德國克虜伯鋼廠廠主，此處即以其名稱呼此種大口徑之遠射砲）所加於心理上的損害究比其所加於物質上的損害來得多。

德軍這次進攻的所以勝利，原因之一即在於法軍統帥貝丹之未能急調法國援軍以助英軍所致。協約軍領袖受了這個大教訓，終不得不謀統一軍隊的指揮。不錯，在上一一年十一月，協約軍自加波勒多退卻後，英、法、意三國總理會聚集於刺帕羅（Rapallo），設立了一個「最高軍事會議」，以求協約軍事權之統一。但這個軍事會議，與其說是從軍事行動一致的觀點看來有價值，毋寧說是從經濟和財政的合作的觀點看來纔為重要。因之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福煦大將（他的戰功頗卓著並以富於判斷力和意志力有聞於世）奉命指揮在法的一切協約軍隊。數星期後，他正式受任為協約國聯軍總司令。嗣後雖然各國的司令仍直接統率其本國軍隊，卻祇由一個主帥和軍師居最高的地位了。

統一的指揮大大地增強了協約國的軍事能力。此外，英國又通過了一件嚴格的徵兵法，並在一個月中續遣三十五萬五千人渡過海峽，這個助力也不小。美國亦以一九一七年之選拔兵役法（Selective Service Act）採用徵兵或選拔兵士的制度，而在一九一八年，人民之被召並準備服軍役者，其數突飛猛進。適值法國告急，美政府乃於是年四月至七月之間陸續遣送了六十七萬五千人赴歐。四月二十八日，有一師美軍第一次正式被配置於

畢迦的 (Piercy) 兩軍激戰所在的前線。美軍總司令潘興 (Pershing) 將軍毅然拒絕將其軍隊用作填補英、法軍之傷亡的替代兵。他堅持美軍應與英、法軍負同等的義務，以整個部隊獨當一面作戰，即使這樣一來美軍必須在戰事沈寂的前線受長時期的戰爭馴化，亦所不顧。潘興因這個主張頗遭友軍同僚的非難，說他無合作精神，祇圖個人的光榮，但美國一般人卻很嘉許他。

其時，盧登多夫已於四月九日開始向英軍作第二次的進攻——這一次在里爾 (Lille) 之西，介乎拉巴賽 (La Bassée) 與阿蒙提亞耳 (Armentières) 之間——其目標又為英吉利海峽的海口。防守的英軍，在海格 (Haig) 爵士的指揮之下，失去了阿蒙提亞耳和帕斯痕達爾 (Paschendaele)，並被逐退十五哩。然而貝沌 (Bethune) 與伊泊爾兩突角幸得堅守，故海口亦免於危。

德軍獲得局部的勝利，勇氣倍增，更拚命邁進。盧登多夫得到從醫院裏治愈出來的傷兵和一九二〇年級的少年，馬上以之補充最近傷亡數四分之一，並能藉以作第三次的鎚擊（時為五月二十七日）。這一次當攻擊之衝者為法軍，戰事發生於耍松 (Soissons) 與理姆斯 (Reims) 之間。不到兩天工夫，耍松就陷落了。此後不久，德軍進至瑪倫，安然越過。沙托帖里 (Chateau-Thierry) 也被占領。離巴黎祇有四十四哩了。但理姆斯之圍，急切不能下，而福煦所飛調的數萬美軍已至，將敵人擋住。在栢羅 (Bellevue) 森林區域，美軍實際上奪回若干失地。六月九日至十五日間德軍重振的猛烈攻擊，祇使他們得到蒙第對 (Montdidier) 與訥永 (Noyon) 之間的六哩地方。七月中旬，德軍以絕望的勇氣開始最後一次的進攻。理姆斯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該地如失陷，就可以直破

法軍的陣線，並容易經過自瑪倫至巴黎的谿谷前進。盧登多夫知道理姆斯一經奪到手，此戰即勝。福煦也曉得。從七月十五至十八日，雙方酣鬪甚烈。美軍在沙托帖里與亞伯內（Epenay）間的頑強抵抗，使敵人大為驚異，因之德軍在最前進的一點，也不過獲得六哩之地。於是他們力竭了，支持不住了。七月十八日，德軍最後一次的襲擊，倒成爲協約軍的大反攻。此後經過多次慘酷的惡鬪，直至休戰協定簽字時始止。

當福煦於七月間下反攻命令的時候，美軍在法者已將達一百萬人。在此後幾個月中，續增的軍隊每日平均開到一萬人。所以一到十一月，美國已有兩百零八萬五千兵在法國。軍用品也陸續從美國運來，其數量之多，誠屬空前。多謝英、美海上巡邏隊的警戒，運輸船的橫禍和損失也很少了。這樣一來，福煦就無須慮及保存兵力。他可以疊二連三地進行攻擊，不用停止，也不讓敵軍休息。

協約軍取攻勢後起第一次接觸，就是第二次瑪倫之役，雙方自七月十八日酣戰至八月三日，參與的美軍有八萬五千人。此役的結果，沙托帖里與亞松復入協約軍之手，德軍被迫退至恩——惠斯爾河（Aisne-Vesle River）後面。八月八日，協約軍又順着畢伽的索謨地方開始另一猛烈的攻擊，將德軍自前線驅退十哩。是月將終，蒙第對巴坡謨與諾永皆經奪回，並獲德軍俘虜十三萬人。佩綸（Peronne）失陷於九月一日，隆斯（Lons）則於四日。兩星期後，美軍五十餘萬人將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業爾地方戰壕線之凸出部加以掃清。

九月快要完了，德國的軍事似乎毫無希望了。興登堡陣線正在破裂。軍隊的士氣日就衰頹。軍火糧食的供給額很快地減少。後方以感到革命的震顛。潛艇戰顯然失敗。盧登多夫的自信心已經搖動，他在九月二十九日一接

到保加利亞將近崩潰的消息，神經突受打擊，幾致暈過去。那一天他通知正出席於斯巴(Spa)會議的德皇，說戰事已經失敗了。兩日後，興登堡堅持德國提出和議。十月二日，思想開明的巴登(Baden)諸侯馬克西米連(Maximilian)被任爲首相。這位首相延攬了兩個社會主義者入閣——這是德帝國歷史上破天荒之舉。他於是進行與威爾遜磋商和議條件，表示他贊同「十四點」中所規定的原則，並力言德國正在變成民主帝國的進程中。然而威爾遜繼續和他交換文書有一個月，漸漸坦然暗示德國必須推倒霍亨佐倫王室。

當一般外交家正在談判的時候，協約軍仍繼續前進。聖昆墩、喀姆布來(Cambrai)、里爾、隆等地很快地陸續被圍困，到十月之終，法境的德人已經很少。有幾場苦戰發生於讓司——阿爾良(Meuse-Argonne)區域的崎嶇地面，美軍一百二十萬人在該地從事切斷德軍的交通要線。那時全部戰線五分之一已由美軍防守。

德軍的處境已不良，那知它的同盟國的地位更壞。在六月間，奧軍開始最後一次的決死戰，希望把意大利解決。不幸攻擊者的機謀不密，意將第阿士已探知他們的計劃，並準備應敵。開頭奧軍頗能進展若干哩。可是皮阿味河(Piave)忽然氾濫，河上的十四架橋樑被狂流衝去十架，使入犯者大爲狼狽。第阿士此刻調到大隊の後備軍，勢不可當，奧軍祇好遵來路敗退。十月二十四日，意軍開始向特梭提諾進攻。在維托利沃威尼托(Vittorio Veneto)奧軍卒被擊潰，至十一月三日，意軍已占領的里雅斯德。他們捕獲三十萬俘虜。

當其時(九月三十日)，保加利亞已經無條件降服，並在薩羅尼加簽定休戰協定。保軍之變弱，蓋因德軍被調往法國，奧軍被調往意國。其勢既孤立無援，故深恐法——塞——希聯軍從南邊入犯。他們要避免這個萬一的

變故，乃宣告願意罷戰。根據休戰協定，協約軍得利用保加利亞全境爲軍事根據地。復次，保國之退出戰爭足使土耳其和中歐同盟國隔離，並使蘇丹政府驚惶失措。土國不單有被敵軍從西面攻擊亞得里雅那堡（Adrianople）和君士坦丁堡的危險，其東面之達馬士革（Damascus）、貝魯特（Beirut）及阿勒頗（Aleppo）亦均陷落，而敵軍已迅速向摩蘇爾（Mosul）前進。因之土皇表示願意屈服。十月三十一日，穆得洛斯特休戰協定（Armistice of Mudros）經雙方簽字，於是土耳其亦可被利用爲協約軍作戰的根據地了。

保土兩國的不幸自然是對於奧匈帝國的致命傷，這個帝國的本身，因爲境內各民族的分離運動，已呈土崩瓦解之象了。在一九一七年初，帝國中的南斯拉夫族人民已和塞爾維亞人簽訂了科佛宣言（Declaration of Corfu），承諾與後者聯合成立一個新南斯拉夫邦。一九一八年之秋，匈牙利人、波希米人、斯拉夫人和波蘭人都宣布獨立。這種種困難幾使奧皇查理斯不能再抵抗前進的意軍。所以在十一月三日，他的代表和第阿士將軍根據於無條件的投降，簽定停戰協定。此後祇剩德意志一國獨自作困獸之鬪了。

在奧國降服後兩日，威爾遜通知德相馬克西米連，教他向福煦元帥請示停戰條件。協約國也很願終止戰爭，這不但是因爲要止住殺戮，並且因爲就是福煦元帥也認爲在他們能將德軍驅至萊茵河（Rhine River）之東以前，還須「四五個月」。自然，正在退卻的德軍雖不切望爲繼續占領比利時而甘就死地，但事情臨到成爲捍衛祖國的問題時，他們也會拚死奮鬥，不顧一切。福煦因而擬定了可使德國一旦接受以後即不能再啓戰端的停戰條件。他又預先聲明將來的和議當以修正的「十四點」爲基礎。這個修正案如下：（一）在將來的和平會議席上

如有關於海洋自由使用權之問題發生，協約國保留「完全之自由」；(二)被侵土地之「恢復」，應包括德人所加於平民生命財產之損失的賠償；(三)爲奧——匈帝國各民族「要求自治」改爲「要求獨立」。十一月八日，協約國將停戰條件交與德國代表。限令三日內無條件接受之。

停戰條件包括三十五款。在十四日內德國應退出法蘭西、比利時、亞爾薩斯——洛林及盧森堡；在一個月內退出萊茵河之西所有土地。協約軍得占領德軍撤退後之德國土地以及流經科倫(Cologne)、科不林士(Coblenz)和馬因斯(Mainz)諸地的萊茵河橋頭堡壘，在萊茵河之東深度達三十基羅米突之處。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與不加勒斯多條約應歸廢棄，所有德軍應退出俄羅斯、羅馬尼亞、土耳其和奧——匈。經規定數目的戰艦及所有潛水艇均應交出，在兩星期內協約國當接受未壞的火車頭五千具，鐵路車十五萬輛，運貨汽車五千部。所有協約軍俘虜應即送回其本國，但不行交換，而對於德國之封鎖仍繼續施行。鉅量的大砲和軍用品亦應交出。

簽訂停戰協定前之一星期是德國國內騷動的日子。盧登多夫失權了。海軍叛變了。分離的運動爆發於巴威(Bavaria)。德皇與皇太子逃往荷蘭。馬克西米連首相被迫退出內閣。亞栢特(Ebert)所領導的一羣社會主義者奪得新德意志共和國的政權(十一月九日)。這般社會主義者既然無意繼續或重振戰爭，所以便接受了協約國所提出的停戰協定。十一月十一日早晨五句鐘，兩個德國代表在停於黑暗的康派泥(Compiègne)森林中的火車裏面簽署了終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公文。在十一句鐘，雙方的屠殺正式停止。全世界的人民纔又歡欣若狂。

戰爭的代價

世界大戰經過的時間有一千五百六十五天，這自然是有世界以來流血最多，代價最大的一場惡戰。在戰爭的過程中，約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動員，並被迫長期或短期參加於經濟上不生產的，有組織的破壞工作。在這許多人當中，有九、〇〇〇、〇〇〇人——七人中一人——死於戰場或因傷畢命。二二、〇〇〇、〇〇〇人——三人中一人——則皆受傷，其中且有七、〇〇〇、〇〇〇人永久成爲殘廢。再者，許多受傷者於戰後不多幾年內因傷重而卒不免於死，同時有成千成萬的受礮彈震動或中毒氣的退伍軍人繼續過着苦痛的日子。據報告，有五百多萬人於戰後「失蹤」，大概其中不少可以說是已被炸爲微塵，所以無跡可尋。

在世界大戰時期中死於戰場的人數超過一七九〇年至一九一三年間所有大戰爭——包括拿破崙戰爭，克里米亞(Crimean War)戰爭，一八六四年之丹麥戰爭，普奧戰爭，美國南北之戰，普法戰爭，部耳(Boer War)戰爭，日俄戰爭及巴爾幹戰爭——中所死的總數兩倍。動員者三分之二和被殺者三分之二都在協約國一方面。因大戰而死的平民人數略爲超過兵士死亡之數。非戰鬪者都成爲飢饉、疾病、屠殺、流行症和劫掠的犧牲者。此外，各國的出生率大爲退減，有時減至非常之低的數字。

同樣令人發抖的是金錢上的損失和陸海財產的破壞。所有交戰國在起初三年中平均每日要耗費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一八年，平均每日的耗費爲二四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即每小時超過一〇、〇〇〇元。

〇、〇〇〇〇元用於佈置戰事的直接純淨數共計爲一八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協約國花去一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中歐同盟國花去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除這個數額之外還得加上幾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陸上財產損失；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海上損失；約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生產損失；及戰爭救郵費和中立國的損失共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實際的經濟上之耗損總計爲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如果在這個數字上還增加六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是一般對因戰事的直接結果而喪失的生命之經濟價值的估計）則達三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個數目尙未算入因大批兵士與平民的殘廢和元氣毀傷所致之經濟損失，各交戰國所積欠的債務上應付的利息若干億元，或以後世世代當繼續撥充負傷將士扶養費的巨款。這個數目又超過美國外任何一交戰國的國富之投資價值兩倍。的確，那般在世界大戰後會晤着來討論和議條款的人們遇對了一個重大責任——卽如何來解決現狀，使這種可怕的生命財產之損失不致完全成爲沒有意義。

新世界

在講述使大戰正式終止的和平會議的故事之前，我們也許有興味來注意一下大戰對於世界一般情狀所發生的若干顯著效果：

(一) 四個大專制國家被掃除了，即德意志、奧——匈、俄羅斯和土耳其四帝國。

(二) 共和政體的波浪盪激於歐洲。在一九一四年，大陸上祇有法蘭西、瑞士、葡萄牙、聖馬力諾和安多拉 (Andorra) 等共和國。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二年，又產出十二個新共和國。社會主義者和勞工的政府成爲平常之事。

(三) 與共和政體之擴張幾乎同時發生的現象，即爲一般人對於民主政治的不信任，這大概因爲新政府不能解決戰後的複雜問題之故。因之出現了幾個獨裁者，他們要拿有力的，甚至於專制的政策來救國救民。

(四) 兩個很大的經濟與政治的實驗開始舉行了：即布爾扎維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五) 歐洲各國之比較的重要性大有變遷。自奧——匈帝國崩裂，德、俄的土地變更後，就有幾個新興國出現，如波蘭、捷克斯拉夫和巨哥斯拉夫等國是，這幾國此後在國際事務中都將占重要的地位。在大戰前，決定歐洲的國際關係者爲六大強國：德、俄、奧三國之隕落及許多二等國家之出現增加了國際舞臺上的角色，並使國際問題之解決愈趨複雜。

(六) 大戰時國家主義的精神之過分誇張及民族自決的觀念之廣布，使戰後政治與經濟的國際關係更爲困難。每一個新得解放的國家都切望着盡量享受新得到的主權。其結果，政治的陰謀，經濟的對立，嫉視的爭執新的關稅和新的壓迫又煽動了宿怨舊恨的火焰，並使歐洲因受另一個危險的歇斯的里亞症 (hysteria) 而大爲委頓。

(七) 國家主義和民族自決這兩個原則之廣布，助成了協約國所有海外屬地，如埃及、印度、朝鮮、非列賓羣島、東非及他處的不安和騷動。協約國現在還沒有把這種理想主義的原則適於這些區域的企圖。

(八) 儘管一般外交家熱烈地保證世界大戰將成爲「以戰止戰」的末一次戰爭，然而最後所鞏定的和平條約仍造成許多新的創痛，與它所醫好的舊傷相等。這個和約且不能終止久已籠罩於各國外交界的猜疑和畏懼。新的軍事同盟不久又成立，取舊的而代之，歐洲馬上重分爲幾個敵對的軍壘，一九三二年的兵額超過一九一三年的數目好幾百萬，而世界的陸海軍軍費預算繼續增加，使骨子裏艱窘而表面上忍耐的納稅人的負擔愈重。

(九) 謀國際合作並圖和平解決國際爭執的媒介，成立了國際聯合會和世界法庭兩個機關。至於這兩個媒介是否會被完全利用來作一番造福人類的事業，還是一個問題。

(十) 在許多國家中，民治的改革漸漸在着手，特別是在參政權的擴大一方面。一半因爲一種新的精神，一半也因爲她們在大戰時期中貢獻了勞績，婦女也多半有選舉權了。

(十一) 至少就暫時而言，勞動在世界大勢中取得新的重要性。這顯然是因爲一時缺少熟練的工人，並因爲大家實覺到在戰場上的人如果沒有在工廠裏的人的幫助，就會一籌莫展，更因爲戰後經濟恐慌的時期中激烈的宣傳很旺盛。再者，東歐前此被踐踏的農民，在有幾國現在竟取得了支配政府之權。

(十二) 宗教暫時復活了。這也難怪，許多青年人時常受着死神的包圍，自不免求庇護於宗教，並以相信有另一較好的世界而得安慰。神祕說與唯神論在戰後數年中也很風行。

(十三)在大戰時期和戰後困苦窮乏的數年中，教育大受損害，幾瀕破產，但一般人覺得要擔保下次不再演慘劇，莫要於施青年以適當的教育。所以，凡是有錢可利用的地方，一般人對於兒童和成年的教育也多加注意了。

(十四)青年運動頗為流行，尤其是在中國、德國、意國和俄國。全世界的青年男女因大戰所生出的外交危機和經濟危機，變得更認真並關心政治了，他們渴望本國人民洗心革面，趨於復興之途。但就一般而言，他們所受的教育，第一還是軍事的！

(十五)大戰給與各國關於合作和「團體工作」的有益教訓，其價值到和平重現後毫未失去。往往遇到要解決重大的國際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時，總是善為利用戰時的合作經驗。世界會議現已成爲屢見不鮮的事情。

(十六)美國在一九一四年尚居於債務國的地位，戰後就一躍變成爲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了。然而他新得的重望，也就是許多惡意和嫉妬的標的。

(十七)拉丁美洲諸國因參加大戰，並爲國際聯合國會員國，及漸成重要的世界市場之故，在國際事務中也慢慢占有了新的和更卓越的地位。

(十八)大戰適足激勵科學和商業的發展及更犀利的殺人利器之發明。醫藥界的重要發現層出不窮，造船術和航空術亦有長足的進步。新工業得到獎勵，特別是在因戰時的情形被奪去國外輸入貨物的國家，例如美國之不能從德國取得生色精染料，反引起它本國的重要染料工業之發達。

(十九)大戰促進了普遍的裁軍運動，但這方面的進展非常遲緩。

(二十)普及於全世界的經濟之完全改造與重建因大戰而成爲必要，因爲各參戰國甚至於各中立國的經濟組織給戰事攪得凌亂不堪。大戰及其萌蘗的直接結果，遂使世界於一九二九年之終發生了不景氣的現象，一直到現在還未復蘇。這種現象將世界失業的字數推至二千五百萬，使許多國家破產，並引起向來所未有的不安。這個世界決沒有如許財力可給大礮每小時轟掉幾百萬元。不景氣不過是用以償還四年大殺戮之浪費的代價之一部分。

第四章 媾和

和會中的人物

在舉世慶祝停戰的熱狂消散以前好久，巴黎已被擇定為議和的地點，並準備這個新的祝典。起初大家認為和平的談判當舉行於中立國瑞士洛桑（Lausanne）或日內瓦（Geneva），但法人置若罔聞。四十八年前，德人曾在巴黎屈辱他們，所以他們現在也要在巴黎施以報復。因之法京忙着預備迎接協約國幾個最有名的政治家，法學家和學者，來合作強定和約，以授戰敗者。會議將不許任何德國人、奧國人、土耳其人或保加利亞人出席。祇要最後召喚他們在草定好了的和約上簽一個字而已。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威爾遜首途赴歐。他不顧良友的忠告，決意離開將命運完全付託於他的本國，親自出席和會。這位最晚出的「神人」之降臨歐陸，不但為許多政治家所切望，且為民衆所渴待。當時一般人似乎都覺得只有威爾遜是與衆不同，能够「超乎感情激動」的一個人。

威爾遜在歐洲所受到的歡迎頗與其富有魔力的盛名相稱。各國人民對於這位「第二個救世主」的蒞止，歡喜若狂。在英國，成千成萬的倫敦人士擁擠到街中，以求一瞻偉大的威爾遜的丰采。據說，法國人見到他歡喜得

流淚。在意京，自從古羅馬帝國的光榮時代以來，從來沒有看見像這樣爲優禮外國元首所舉行的凱旋遊行式。甚至於在德國，他也被認作救星。怪不得他自以爲對於巴黎的事務，已有絕對的把握。

但是這個魔力是靠不住的。實際上威爾遜連本國國民的後盾都沒有。雖然他宣稱他以「極大的熱誠和愉快」接受美國人民所給與他草擬本人所想的一種和約的「委囑」，可是事實上，他的一黨已在一九一八年的國會選舉中競爭失敗了。假使他沒有特地要求美國人民選出一個民主黨的國會，使他在將來幾個月的要緊關頭得到援助，那末，他也不致如此慘敗。因爲共和黨在國會中，時常比他自己一黨人還要多擁護總統的戰爭策略些，而他這種不友誼的態度，卻引起了公正國民的憤怒。共和黨人奪得兩院的過半數，因之新國會——亦即有權決定接受或拒絕巴黎和會所訂條約的國會——對於現政府是反對的。使事情更糟者，即威爾遜總統到歐洲去的時候，並未邀一個共和黨內有勢力的議員偕去。（註）

（註）威爾遜更有一件事大失國內人心，即命令郵務總長勃利遜（Burke）氏統制所有橫斷大西洋的海底電線，以便檢查往來於歐、美兩洲之新聞。

和總統同去的爲國務卿藍辛（Lansing）和懷德（White）。懷德是一個退休的、有錢的共和黨外交家，法國話說得很流利，衣服穿得很漂亮，並曾任駐法大使，但他在歐洲人中沒有多大勢力，在他自己一黨裏面也幾無發言權。其餘兩個代表早在歐洲：一爲白黎斯（Biss）將軍，他是一個學者，也是一個軍人，但他的本領當時尚少有人知道；一爲豪斯（House）上校，他已先總統在歐準備一切事宜。所以就美國的政治而言，這個和議將爲民主黨的

但有些共和黨的參議員將單爲忠於本黨之故而投否認和約之票。如果威爾遜是一個真正機敏的政客，他就當邀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洛治 (Lodge) 或前總統塔虎脫 (Taft) 這一流人物一同去纔是。

威爾遜的策略上的錯誤多少是由於他的性情和人格關係。他的理想主義往往超過大多數人的頭腦，可是他不大肯費力去使人理解他。他以爲自己有一個理想即足，並且他極願爲他的理想犧牲一切，即友誼亦所不惜。他對於歐洲問題及其事務的知識已經有限，然而他時還毫不省覽一般專門家（他們是由他帶到歐洲去，在各種專門問題上作他的顧問的）經若干月的調查和探討所草定的報告書。在外交術上，威爾遜決不是在巴黎的一般老奸巨猾的外交同事的對手。勞合喬治、克雷蒙梭和汾尼最羅斯奉承他，甘言欺騙他，直到後來終把他從所站的臺上推倒下來。

英國的首席代表爲勞合喬治，他是自由黨的首領，一九一六年以來的首相。「小大衛」(Little Davey)（英人對勞合喬治的親熱稱呼）覺得在他往大陸出席和會前，他的政府應該取得英國人民的信任票，所以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召行選舉。他在這個情緒猛烈的「茶褐色選舉運動」(Khaki Campaign) 中所用的口號——他也很知道這些口號決不能實現——爲「叫德國賠償」，「絞殺凱撒」，及「以先令還先令，以噸還噸」。北巖爵士所有而爲其弟洛得密爾 (Rothermere) 爵士所主持的倫敦每日郵報 (London Daily Mail) 也大聲呼號「他們還會欺騙你的——這些匈奴」來援助勞合喬治。首相於選舉中博得大勝利，他的一黨取得二百六十席的過半數。

勞合喬治是巴黎和會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有蓬鬆的白髮，無限的精力，暴躁的性情，活潑的精神，如閃電般的判決力，遇事當機處斷，毫無遲疑，討厭一切瑣碎的事情，富於幽默和機智，感情熱烈，心思靈敏，不關心於自己做錯的事，並且有信任其專門助手所貢獻的意見的智慧——這位威爾斯地方的辯護士既具有這許多美質，即使他不代表英國而代表一個比較不重要的國家。他也在和會中出人頭地。勞合喬治對於他的直接諦聽者的「虛榮弱點或自私」，決不窮於作最動人的言論。他能够找到「對手的綜統（通線具）上脆弱的接縫」，不爽毫釐。

再者，這位英國首相和他的團員消息靈通，關於和約的逐日進行狀況，比美國或法國的代表知道得更快。其理由毫不神祕。和約的條款是由許多委員會草擬的，每個委員會擔任某一節，並在各旅館開會。英國的委員每晚必須將當日議程造具報告，送往設於「大華飯店」(Hotel Majestic)而由哈定基(Hardinge)爵士主持的總辦公處，所有議事錄的報告都在這裏用複寫版繕就。於是再將這些報告用高速力的汽車當晚分送於所有英國代表。這樣一來，英國的委員在消息上自然優勝於其他各國的代表。

法國代表團由總理克雷蒙梭領導，他的綽號為「老虎」與「勝利之父」(Père la Victoire)。前章已經說過，克雷蒙梭有一個憧憬——法國，還有一個希望的幻滅——人類，連法國人在內。這隻「老虎」是老了。當國南北戰爭時（距巴黎和會時幾六十年），他曾在美國做報館的通信員。他看得多，閱歷得多了，所以變成一個激頭激尾的懷疑者和憤世嫉俗者。他在柄政以前，曾經激烈地反對政府的壓迫和檢查，他一生中屢次賣過氣力

來幫助傾覆幾乎二十個內閣。可是當他自己上了臺，成爲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間的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的時候，他就悉反從前的主張，變本加厲地箝制輿論，完成了一種嚴密的檢查新聞制度。

克雷蒙梭自然是和會中超類拔萃的外交家，他對於世事的洞明，人情的練達，遠非其儕輩所能及。他與威爾遜開小玩笑開得最多，也最會侮辱人，受他的氣的真不少。他雖然常揀小國的代表來做他的靶子，有一次也公然對威爾遜咆哮道：「就是上帝也不過以十誠爲滿足，威爾遜卻堅持十四！」又有一次說道：「勞合喬治不過自信爲拿破崙，威爾遜總統卻自信爲耶穌基督。」態度儘管如此，他仍舊很小心，很有外交手腕，來滿口顧及美國的理想和英國的希望。

克雷蒙梭沒有一次不注視着他在和會中所立定的目標：擡高並保障法國，及使德國變弱。他的愛國心顯然是他唯一認真的事情，他的許多努力無疑地是在極力慰悅各國代表，使他們更能就範，表同情於他的見解。

奧蘭多 (Orlando) 總理和孫泥諾 (Sonnino) 男爵是意大利代表團的首領。奧蘭多是一個博學的、有口才的和狡猾的外交家，他是西西利 (Sicily) 人，以前當過法學教授。然而他不嫻習英語，因之在大會中比較沒有多大影響。此外，他常常因爲堅持履行秘密條約（這是意大利參戰的代價）而觸怒威爾遜。孫泥諾的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蘇格蘭人。他雖通常被認爲傑出的代表，但太固執，太迂闊了，不能算是一個良好的外交家。後來代替這兩個人爲意大利代表的，爲尼蒂 (Nitti) 和提托尼 (Tittoni)，他們倆比較能使本國的正義得伸。

其他次要的代表也構成一羣有趣的人物。克雷蒙梭的同僚，在暗中活躍的，有畢助 (Pichon)、泰狄歐 (Tur-

(tien) 和康榮 (Cambon) 因為克雷蒙梭「依性情和經驗不願他人分其權力」，所以他的助手也不欲與他爭雄長。然而普恩加寶總統和福煦元帥雖非和會的正式代表，卻有很大的勢力。這兩個人也都存心想一勞永逸的壓倒德國，並切望比較黠的克雷蒙梭更進一步來達到這個目的。普恩加寶所持反對威爾遜的意見的政策，事實上使美國總統非常着惱，竟致威氏在留法的最後一星期中對於法總統邀宴於愛理雪宮 (Elysee Palace) 的請帖遲疑於接受。

與勞合喬治偕來者為巴爾福 (Balfour) 爵士、羅波那 (Bonar Law) 和年金部總長巴涅斯 (Barnes)。從希臘來的為汾泥最羅斯，「和會中的猶力賽斯」 (Ulysses) 〔古伊大卡 (Ithaca) 之王，特洛埃 (Troy) 戰爭中希臘領袖之一，以智謀口才著名〕。波蘭則派地摩夫斯基 (Dmowski) 為總代表，但當他不能使會議中人承認他的要求為正當的時候，波蘭人就改派大鋼琴家帕得勒夫斯基 (Paderewski) 來看看是否能夠調和本國國民與鄰邦間相衝突的利益。不幸帕得勒夫斯基馬上覺得本人不是那般羣集於巴黎的國際政客的敵手。西園寺侯爵和牧野男爵所領導的日本代表團在和會玩了一套很伶俐的把戲。他們對於歐洲問題因不願樹敵，沒有什麼話說，但當討論到遠東的事情時，他們便比別人饒舌。就一般而言，他們和英、美兩國一鼻孔出氣。

久受痛苦和久被迫害的亞美尼亞人派牛巴 (Nubar) 為主要代言人。他要求自裏海伸展至黑海和地中海的一長片土地。他以動人的語氣，概述亞美尼亞人在各時代所受的屠戮，來增強他的籲求。從比利時來的為外交總長海門士 (Hymans)；從新興的捷克斯拉夫國來的為總理克拉馬士 (Kramars) 和外交總長彭尼士

(Banes) 從巨哥斯拉夫 (註) 來的爲帕虛區 (Pashich) 和前總理特蘭比區 (Trumbitch)。羅馬尼亞則由其總理布拉提安努 (Bratianu) 代表，而南非洲所派的則爲斯穆次 (Smuts) 將軍與波塔 (Botha) 將軍，這兩個人都是有本領的政治家。主張復國運動的猶太人由倫敦的惠士曼 (Weizmann) 博士代表。葡萄牙人和暹羅人，愛沙尼亞人和里窩尼亞人，黎巴嫩人和喬其亞人都派了人出席，就是很遠的高麗人也選派了兩個代表。這兩個高麗代表因爲多半步行而來，所以到達巴黎的時候和會已在結束其事務。

(註) 爲簡便起見，「巨哥斯拉夫」一名稱當用以指一九二九年前正式通稱爲塞爾維亞人——克洛特人——斯拉夫人之王國的區域。

和會之組織

在停戰前好久，各交戰國政府已經派定專家來搜集材料並類別統計，關於可預料在將來的和會中當屬於討論範圍的一切問題者。因爲各協約國未企圖使這一方面的工作趨於一致，並因爲這種工作多由屬官或與本國陸軍部或外交部毫無關係的人來辦理，所以有些勞力是白費了，後來也沒有達到一定的目的。然而，其中大部分是非常貴重的，而「出現於和會中的意見往往可以追溯到當德軍似乎無敵時的辛勤的筆墨工作」。

美國的一羣專家，由豪斯上校所羅致，其總機關設於「美國地理學會」的紐約辦事處，所研究者爲中部與東部歐洲史的語言學上、經濟上和人種誌上的因素。這一羣人的工作，成爲「十四點」的背景，他們並供給威爾遜總統解決土地紛爭的試驗計劃。其他各國也有同樣的準備，此外如波蘭人和捷克人等民族並且有工作效能。

很好的宣傳委員會做了同樣性質的事業。其結果蒞臨巴黎的每個代表團，都帶了許多雜亂的統計表和備忘錄。和平會議的第一次大會或全會舉行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世界所有的國家大多數都出席，共有七十個代表和全權代表，及許多替代人。與代表團借來的爲一大羣祕書、顧問、新聞記者、商業界代表和隨從者。就是小國，都有五六十位代表，每一國至少要一個旅館作爲特別辦事處。英國的代表團就占了五個旅館。許多同來的「專家」偶而祇是有名無實的。譬如，「在和會開始的時候，英國的專家中專門研究一國的，沒有一個到過那一國」。

這樣龐大而難指揮的一羣，辦起事來大概不能敏捷有效，全會實在祇開了六次。爲實際上的便利起見，和會由「最高和平會議」或「十人會議」而成，該會議以美國總統和國務卿及英、法、意、日四國的總理和外交總長組織之。當這「十巨頭」行使權利來決定何者爲當提出，何者爲不當提出於和會大會的時候，那五個所謂主要協約國和次要國，也都堅持要在所指定的每一個委員會中取得一席。誠如克雷蒙梭所說，諸大國有一千二百萬兵士的武力爲後盾，不難使小國知道各大國的無上利益。

不久大家都覺得就是十人的團體也嫌太大，有礙辦事的迅速和祕密，於是他們在三月間斷然宣稱，此後當工作之衝者將爲四人會議，以美、英、法、意四國的首領組織之。這「四個巨頭」一共開了一百四十五次會議。日本對於這種措置不表示反對，因爲日本的代表反正不大出席會議。在四月間，意國總代表奧蘭多憤然離開巴黎，因爲威爾遜不理睬他而向意大利人民致呼籲之辭。此後「三巨頭」於嚴守祕密之中舉行會議，好在克雷蒙梭懂

得英語，就是不要正式的通譯員幫忙，也能進行

和會的日常事務和審查工作係由指定的五十八個委員會所舉行，一共舉行過一千六百次會議。這些委員會中比較重要的為國際聯合會委員會，賠款委員會和土地問題委員會。

在討論和會所遇到的一般問題前，我們也許有興味來談談幾個總代表所不得不踐的約會，這些約會是千差萬別並且令人厭倦的。威爾遜最忙的一天為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該日的時間表包括下列的約會：

上午十一點 顧維鈞博士引見中國代表團於和會。

上午十一點十分 代表法國國會的伏格 (Vogel) 侯爵及其他七人貢獻關於處置萊茵河左岸的意見。

上午十一點三十分 亞西利亞 (Assyria) 與加爾底亞 (Chaldea) 代表團，攜有亞西利亞——加爾底亞的文書。

上午十一點四十五分 達爾馬提亞 (Dalmatia) 代表團，以意大利人所占領的達爾馬提亞地方的民衆投票之結果呈報總統。

正午 聖馬力諾 (San Marino) 國代辦巴奎 (Bucquet) 將本國行政院以聖馬力諾共和國之名譽公民身分授與美總統的行動轉達總統。

下午十二點十分 瑞士外交總長科倫賓 (Colander)。

下午十二點二十分 美國全國婦女職工聯合會代表希尼德曼 (Schneidermann) 女士與安德生

(Anderson)女士。

下午十二點三十分 君士坦丁堡大長老、希臘教東方教會之總主教。

下午十二點四十五分 阿爾巴尼亞代表厄薩得 (Essad)，提出本國之要求。

下午一點 希臘派駐意大利公使科羅馬斯 (Coromilas) 晉謁請安。

午餐 美國陸軍總長培克耳 (Baker)。

下午四點 胡佛 (Hoover)。

下午四點十五分 羅馬尼亞代表團首領布拉提安努 (Bratianu)。

下午四點三十分 前葡萄牙公使、現任葡萄牙出席和會的代表科斯塔 (Costa)。

下午四點四十五分 亞美尼亞民族代表團主席牛巴 隨同參見者為阿哈羅門 (Aharoman) 及羅伯

(Robert) 學院的教授哈哥賓 (Hagopian)。

下午五點十五分 塞爾維亞總代表帕盧區 (Pashitch)。

下午五點三十分 美籍愛爾蘭人代表團之華爾士 (Walsh)。(註)

(註)以上見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八日巴黎版之每日郵報。又見 (Dillon, E. G.,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1920, p. 111.)

我們很可以想像到，在巴黎的許多領袖會接到成千成萬的報告書和請求書。這些文書自科西嘉 (Corsica)

人之要求自治至暹羅人之要求賠償及阿拉伯酋長之要求加俸等等，可謂無所不包。自然，高級的代表決不會遍閱這些請願書，但有許多必須加以特別考慮，否則恐有傷友好的感情。在這種情形之下，這般致力於和平的人居然能够神志清明，方寸不亂，寧非奇事？就他方面講，這種情形又足以說明許多代表在社交上所表現的放縱不羈。

(註)

(註)當時和會中上自各國總理，下至旅館的寢室下女，每人都沾染着跳舞的狂熱，這竟使克雷蒙梭挖苦道：「我從來沒有看見這樣憂愁的面孔和快活的臀部！」

和會所遇到的一般問題

和會所遇到的困難問題，可說是無數。巴黎的會衆不但須草擬至少可使二十三個協約國中較重要的數國滿意的和平條款，並商定可使四五十個不特別友好的國家接受的國際聯合會盟約，並且須設法救濟中歐和東歐千百萬饑饉的生靈。(註)駕馭不安定的戰勝軍隊，滿足國內情緒猛烈的輿論，並調解在大戰終止後仍各自互相衝突的十幾個國家。在緊接着戰爭的一個時期中，歐洲簡直像一個滾沸的大鍋，這是歷史上任何時代所比不上的。波蘭人和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塞爾維亞人和蒙特尼格羅人，捷克人和日耳曼人，俄羅斯人和亞美尼亞人，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他們彼此都在拚命要把對方從世界消除。諸大國本身也在互爭種種政策和觀點，弄得面紅耳熱，照這樣情形，假令德國有第二個俾士麥或塔力藍(Talleyrand)來照

顧本國的利益，最後草定的凡爾賽和約 (Versailles Treaty) 也許不能簽字。現在我們回想起來，在這個大混亂的場所——即一九一九年的歐洲，居然有條約訂出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

(註)胡佛(即後來之美總統)時在巴黎為協約國的「賬務總監」。協約國對於德國的封鎖直維持到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四日，彼時布魯塞爾協定(Brussels Agreement)已訂立，准許德人向國外購買食糧。這一部分不必要的報復手段大為德人所痛恨，當他們發覺協約國在布魯塞爾讓步之本意，僅欲使德國不致「赤化」時，他們的憤怒更有增無減。

「公開」問題是有待解決的第一大問題。威爾遜所持「公開成立的公正盟約」的主張似乎暗示着，凡所為所議之事皆不應守秘密。實際上，大多數的重要會議都是關起門來開的，而「三巨頭」在會議中所進行的事情大概沒有人會曉得。新聞記者祇准在全會和大會旁聽，給他們的報紙發表的東西也是預先準備好的。其他會議室的門祇偶然有開，通常為攝影者而破例。

所有從法國寄到美國或從美國寄到法國的文書和報告都經政府官吏檢查過，一方恐怕美國人聞知歐洲方面的意見紛歧，一方恐怕歐洲人發覺美國人漸漸不大贊助威爾遜。這種秘密往往是合理的。要曉得，當時戰爭的熱狂情緒，不但不因停戰協定之簽字而趨於消滅，似乎反隨着會議日子之拖延而提高。每次關於土地或其他問題的調整發生裂痕後，就有苛刻的斷斷爭論，這也使局面愈為緊張。

在新聞記者所能到的全會中，語言的混雜使人難於準確地聽到什麼東西。凡是所說的話都須經過傳譯，而舌人往往改變語氣，鋪揚誇張，或增加說話的人的錯誤。其中有一個最有本領的通譯員，叫曼圖(Mantoux)的，總

算以自由而有見識的譯法保全了許多發言者的體面。

至於用那種文字來作法定的一種，又成爲使一般外交家疾首蹙額的問題。克雷蒙梭主張未來的對德和約當以法文本爲定本。英國和美國的代表則堅持英文本應有同等的價值，而意代表也要求將意文本加入。結果大家同意認英文和法文本皆爲「真本」，意人的要求則完全置之不顧，彼時奧蘭多已離開和會，其餘較小的條約則用三種文字草定，但遇有爭論時，以法文本爲準。

各代表所碰到的最大困難，也許即在調和各協約國在祕密條約中所商定的各種處置與威爾遜在其「十四點」中所規定的，而爲德國所承諾爲和議基礎的理想原則。這些祕密條約與沒有勝利的和議一觀念是不相容的。然而威爾遜於一九一九年之秋當着一羣美國參議員之前辯護最後草定的凡爾賽條約的時候，卻說，當他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作關於十四點的演說時，毫不知道有什麼祕密條約，並且直到抵歐時纔第一次看見這些條約。可是證據具在，他殊難自圓其說。

巴爾福爵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因使命到美國的時期中，至少與豪斯上校和威爾遜總統討論到倫敦條約 (London Treaty)，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又直接寫過信給威爾遜，言及「他對於意大利人根據一九一五年所訂的倫敦條約而提出的土地要求之感想」。是年三月，他在英國下議院陳述協約國常以完全消息告知威爾遜的事實，五月，他又對下議院說道：「我對於威爾遜總統一點也不守祕密。我所有的關於戰事而着眼於外交的思想絕對公開於威爾遜總統」。復次，布爾扎維黨於革命成功後，曾將在帝俄的檔案室所找到的一切祕密條約

公布於世。原文均經刊載於曼徹斯特導報 (Manchester Guardian) 數星期後，又登於紐約晚報 (New York Evening Post)。照這樣看來，這些條約在停戰之前，早已成爲衆所共見了。再者，最早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威爾遜曾致函豪斯，大意謂美國的經濟能力當可使協約國必定屈服於美國的壓力，並接受美國的和平計劃。他又說英法兩國「無論如何決沒有和我們一致的和平見解。等到戰爭一過去，我們能夠強迫他們同我們一樣想法」。

此事的難點似乎即在於此。威爾遜好像想過，他能夠強迫協約國和他一樣想法，因此不介意於記住祕密條約。這些條約在他看來是不重要的，故亦易於忘卻。當他在一九一九年又遇到它們，且成爲他的和平計劃的障礙時，它們的存在也許很使他大吃一驚。其結果，有如他的朋友豪斯上校在九年後所指出，威爾遜在腦筋混亂和煩惱之中，並在糾問的參議員的對詰之下，他的否認早已知道這些條約，也許「本於良心說話」因爲他不能登時復憶他「在什麼時候首先聽見這類條約的」。

不管怎麼樣，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在和會中當然與協約國的實利主義極相衝突——而在許多情形中，實利主義卻戰勝了。有時威爾遜是很堅決的。譬如，在關於薩爾問題的難局中，他揚言除非依他的意思，他就回國。再有一次，他堅決地拒絕將阜姆 (Fiume) 給與意大利。然而這些例子究居少數，而其中若干不但不能止住美總統威名之失墜，且促成之。

和會進行的最後一個阻礙，即威爾遜與勞合喬治之暫時各回本國，時爲一九一九年二月與三月。威爾遜所

以返美，蓋欲考慮國會在本人離職期中所通過的法案，並向參議院說明國際聯合會盟約的試驗草案。勞合喬治之返英，乃急於安撫數目激增的失業民衆，許以光明的將來。在這個擱淺的時期中，克雷蒙梭忽被鎗擊，幸未致命，醫生認爲應讓子彈留在他的身體內。刺客叫做科丁（Cottin），不久即以「謀殺罪」被處決。（註）

（註）與德國所訂的停戰協定曾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續訂，在二月十六日又加展延。

草約

在草擬和約條款之中，很長的時間耗費於爭論國聯盟約之字句，法國安全的問題與萊茵河左岸的運命，意大利人和波蘭人的要求，德國從前的殖民地與土耳其帝國從前的屬地之處置，及將從德國勒索的賠款等等。

關於應否將國聯盟約併入和約的問題，意見紛紜，莫衷一是。威爾遜堅持要併入，蓋恐各國在自私情緒猛烈和實利主義中漠然拋棄盟約。他的主張勝利了，於是第二次大會指定他爲盟約起草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代表着十四國，其主要人物爲薛西爾（Cecil）、爵士、斯穆次將軍、部耳追斯（Bourgeois）、奧蘭多和牧野男爵。

該委員會的工作根據於許多盟約草案，以前的陳述書和大綱，例如斯穆次草案，非力摩爾（Phillimore）爵士草案和威爾遜的演說稿。二月十四日，威爾遜以草成的報告提出於和會的另一次大會。該項報告遇到很多批評，在最後一個盟約草案被採用前（四月二十八日），一共經過了二十六次的修改。這個盟約中新加了一條（即第二十一條），第一次在外交文書中承認孟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本盟約中之一切規定不得認爲影

響爲維持和平而訂立的國際協定，有如仲裁條約或屬於一區域的諒解如孟羅主義等等之效力。這一點大違法國之意。日本人企圖於國聯盟約中加入一條修正案，承認國際平等及公平待遇各國人民的原則。威爾遜對於這個提議加以拒絕，大概是受了英國和澳大利亞的慫恿，蓋深恐這樣一規定，會引起無限制的東方移民運動。

與盟約的字句問題同時發生的爲給與法國安全保障的問題。法國代表回想到拿破崙一世與拿破崙三世的時代及一九一四年沿萊茵河邊疆所發生的事情，並恐怕德國或因在和會所受的待遇而圖報復，乃急於設法使將來的侵略不致實現。由他們看來，達到此種安全保障的唯一方法，即在削奪德國的勢力，使它在政治上、軍事上、土地上、經濟上和商業上都再無能爲他們可愛的法國之害。尤以普恩加齊和福煦兩人的心中，尤深受這種觀念的影響，在和會進行之中，福煦元帥曾經說過：「我們第一須仰助於大自然所供給的一切方法，而大自然在侵略線上祇安置了一個障壁，即萊茵河」。

福煦及其附和的人依照上面的見地，要求將德國的西陲劃定於萊茵河，並以介乎東邊的萊茵河與西邊的荷蘭、比利時和法蘭西之間的一萬方哩地方建立一自治的中立國家，多少受法國的保護。這個計劃之將爲該地居民所深惡痛絕是顯然的，但法國的一般愛國者管不了許多。實在，法國早已料到有這樣一個好機會，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就和俄國簽訂了一個協定，規定將來建立這樣一個緩衝國。然而這個協定從未得到英國的同意，因而在和會中英、美兩國代表極力反對成立「另外一個亞爾薩斯——洛林」。

經過長時間的磋商後，克雷蒙梭答應了一個妥協辦法。上面所說的那個區域於和約簽定後由協約軍占領

之，其年限則經規定。北面的三角形地方，連科倫的橋頭堡壘在內，占領五年；中央地帶與科不林士（Coblenz）的橋頭堡壘占領十年；南邊的弧角，包括馬因斯（Mainz）的橋頭堡壘，則占領十五年。然而所有的限期要視德國馬上履行和約的其他部分纔能作數；否則當無限期地占領下去。此外，萊茵之東約長五十基羅米突（三十一哩強）的地帶當「解除軍備」。換句話說，該區域內不得建築堡壘，亦不得屯駐軍隊。萊茵河的戍兵應即撤除。

爲更進一步使法人放心起見，威爾遜與勞合喬治允許簽訂特別條約，擔保萬一法國受德國「侵略」時，美國與英國當出而援助法國。復因克雷蒙梭的堅持，「侵略」兩字改爲「攻擊」，於是「老虎總理」乃得滿足。所以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不管威爾遜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演詞中雖說過：「在國際聯合會的萬國一家之團體內不能有聯盟或同盟之組織或特別盟約與協定」一句話。當凡爾賽條約簽字之時，同時簽訂了兩件補充的條約，一爲英、法之間的，一爲美、法之間的，皆所以擔保法國東面疆界的安全。（註）

（註）關於這兩件條約的最終運命，見以下第八章。

當這個時候，與法國安全保障的問題有密切關係的另一問題也發生了；此即薩爾（Saar）盆地之處置一問題。這塊萊茵河流域位於洛林之東，一半屬於普魯士，一半屬於巴威，它是世界的最大產煤地之一。它有七百二十三方哩的面積，七十一萬三千居民（據一九二二年的調查），是一塊非常有價值的土地。在一九一三年，其煤產額超過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噸——等於法國的全部產額百分之四十。同年，該地又產出二、〇〇〇、〇〇〇噸的鋼及鉅量的玻璃和陶器。據估計，薩爾盆地的煤儲量爲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噸——超過全法之所

有量並等於德國的戰前儲量五分之一以上。德國既已損害了法國北部的許多煤礦，所以協約國現在就覺得非叫它給與受害者相當的現品賠償不可。克雷蒙梭因之即要求割讓該盆地。

從歷史和人種的觀點看來，法人對於該區域的要求差不多全無理由。薩爾的極西一部分在路易十四時代曾經有一個時期屬於法國，其餘的大部分在革命戰爭與拿破崙戰爭時期中給法人征服過。拿破崙顛覆後，該地全部均歸普魯士與巴威所有。其所有居民，在種族上和感情上幾皆為德國人。從賠償的觀點看來，則法國的要求比較站得住，特別是因為薩爾的煤是洛林產鐵地正當發展的要件。這兩個區域在大戰前已成爲一牢固的經濟單位。

所以，和會目前的問題即在如何以該地之煤給與法國，而不給與其土地或人民。大會於是派定英、法、美三國的專家組織一委員會來解答這個謎。這個委員會所提議的辦法，頗能合理地貫徹和會的意向，因而被容納爲這個問題的解決法。根據這個辦法，法國應有薩爾一切煤礦及煤礦附屬地之完全所有權，聽它自由使用。全部區域包括於法國稅關境界，法國貨幣亦得在該地自由流通。此外，並准許法人設立學校以教育礦工的子女，課程概用法文教授。凡從該盆地所取出的煤的價值，當記入德國的賠款帳內。

一方面把若干重要權利給法國保留，薩爾的土地則由國聯的委員會統治之，該委員會具有廣大的行政權、立法權與司法權。土著人民將失去其在德國國會及普魯士與巴威的立法議會的代議權。十五年後，居民應「由市區或縣區」投票決定「願屬何國主權」，或爲受國聯支配的自治邦，或歸法國，或歸德國。所有二十歲以上之

男女，於簽訂和約時居於該地者，皆得參與民衆投票。投票後國際聯合會當斷然決定該地主權之歸屬，「一面顧及居民以投票所表示的意願」如果薩爾復歸德國，德國應以專家委員會（法人一，德人一，國聯所派定一人）所規定的價格，從法國重新購得煤礦管理權。除法、德兩國於彼時之前另有商定外，該項價格應於一年內以金幣償付之。

單單一個條款而比其他條款更使四巨頭會議及其他小會議費去不少時間的，即爲發生於意大利與新興的塞爾維亞——克羅特——斯拉夫國（Serb-Croat-Slovene State）之權利衝突。意大利除了堅持履行倫敦條約的條款外——根據這個條約，它應有自提羅爾的布理納（Brenner）山道伸展到阿爾巴尼亞的阿扶羅那海口的土地，再加上多地堪尼斯羣島和菲亞兩洲的若干地方——它現在又要求前屬於奧、匈帝國的阜姆港及達爾馬提亞海岸。雖然事實上提羅爾有二十五萬德國人；意人在東北角所獲得的地方，連哥里擦、格拉的斯加（Gradisca）和伊斯的里亞（Istria）在內，有三十萬南斯拉夫人；而多地堪尼斯羣島的居民幾乎全屬希臘人，但仍不能遏制意大利要求合併達爾馬提亞土地（其地之斯拉夫人超過意大利居民數倍）的野心。

意大利之覬覦阜姆，不但爲了商業上的原因，並且因爲要阻止一個新興的強敵出現於亞特里亞海。戰前意奧兩國互相仇視，原因之一，即在於爭奪亞特里亞海之霸權。現在奧國的禍患是除去了，意大利決不欲讓另一勁敵起而代之。意國知道巨哥斯拉夫沒有阜姆，就不能成爲海上的大國。

奧蘭多和孫泥諾提出了對於這塊他們亟欲取得的額外土地的許多要求。他們提醒他們的同僚說，當倫敦

條約簽訂的時候，同時成立了另一協定，其中約定以阜姆給與塞爾維亞，作爲它答應於保加利亞加入協商國一方面時將本國土地若干贈與保國之報酬。現在這個交換條件既然不會成立——因保國已揀錯了友人——故意大利認爲阜姆應屬於本國。據懷德說，意大利代表又明言意大利在大戰時期中實際上「救過」協約國五次，而俄國之中途變節使戰事拖延得比意大利所預料者長久，因之使它蒙着更大的犧牲，它初意決不至如此。最後，意大利又提出軍事上和地理上的理由來確定它對於阜姆的要求，據說那個海口以海與意大利直接「相連」，而與巨哥斯拉夫中間有山的「隔離」。

斯拉夫代表於貢獻他們對於這件事的見解時，也不甘居人後。他們指明本國所有的鐵路中，僅僅幾條好一些的都直達阜姆。他們引證民族自決的原則，並舉數字來表明住在達爾馬提亞的斯拉夫人遠超出在那兒的意大利人，同時在阜姆本身，如果將蘇薩克（Susak）的近郊也包括在內，兩國的人民至少相等。意大利反對在該地舉行民衆投票的事實，適足證明此項主張之可信。最後，誰也不能否認這個新國需要並應享有一個海口；而它唯一可利用的良港就是阜姆。所以斯拉夫人誠不解意大利何以一定要更將已經蔚爲大族的斯拉夫少數民族，放在它的管轄權之下。

四巨頭會議已聽取雙方的辯論之後，決定了一個方針，以略少於倫敦條約所許者的好處給與了意大利。奧蘭多和孫泥諾知道如果接受了這個方針，他們的政府將因之而被國人推倒，所以毅然拒絕這個「威爾遜」或「美國的方針」。威爾遜就不顧他們直接訴諸意大利的人民。他們遂憤然而回國，雖有他們的選舉者之擁護而

聊以自慰，他們的內閣卒於六月十九日被推翻。繼奧蘭多與孫泥諾之任的尼蒂與提托同樣不能得到一個圓滿的解決，而阜姆——亞得利亞的爭論於和會休會後仍在相持着。最後由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兩國直接談判解決。

波蘭的問題，雖然是很糾紛的，可不如阜姆問題那樣令人困惑。因為協約國已經預許恢復統一的和獨立的波蘭，並讓它有出海之路，所以該管委員會所須爲者，祇在劃定相當的疆界。很少人對於波蘭代表所提出的誇張要求認真考慮，但當他們發覺如果要給與波蘭到海的出路，必定將東普魯士從德國分開的時候，就碰着暗礁了。此外，又須設立一個迴廊，包括但澤（Danzig）城及其三十萬的純粹德人，以之給與波蘭。這樣一來顯然有違民族自決的原則，但和會中人認爲與其犧牲波蘭的商業權力，不如犧牲德國國民之爲愈。因之波蘭得到大部分的西普魯士，該地的德人和波蘭人已經混合得很好，因為德國歷來的政府早在這個原爲波人的土地培植了殖民政策。

上面這個安排法，恰巧投合法國的兩重計劃，即削弱德國，並建立一個強大的東方同盟國，以代俄國在戰前的同盟系統中所占的地位。用畢助的話來說，法國要造成了一個「偉大而強固，且非常強固的」波蘭。後來大半因爲勞合喬治的反對（他對於強大的波蘭毫不感到興趣，並怕將來有德波之戰），規定維斯杜拉河（Vistula River）之東的馬里安威德（Marionwerder）區域非經民衆投票不給與波蘭。再則，但澤被弄成一個自由城，經濟上受制於波蘭，但由國際聯合會統治。

對於德國從前的殖民地及土耳其帝國昔日的屬地之處分，也是一個煩難的問題。協約國政治家中有些贊成公然瓜分和併吞，但有些反對這個解決法，以為過於顯露帝國主義者的面目，且違反協約國所表示的戰爭目的。可是，因為物歸原主的辦法從商業的觀點看來未免不智，且對於受虐待的千萬土著也有失公正（譬如這樣的說），就須引出其他的方式。^註打出這個窮境的途徑，終由斯穆次將軍想出，即見於他所著的國際聯合會（The League of Nations）一本小冊（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印行）內者。

（註）關於德人虐待殖民地土著的情形及不能讓它繼續這樣做的話，說的人很多。這種感想皆根據於西南非洲土人及其受德國待遇之情形報告書。這本報告書係作為南非聯邦的藍皮書而銷行的，其內容足使猶豫的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堅信德國的殖民地不能歸還於它。然而在一九二六年，西南非洲議會一致通過決議案，請求英國政府和南非聯邦政府將藍皮書撤出政府公文檔案，並銷燬公共圖書館和書局中所存之本數，其理由則謂該項公文書係「於戰時出版」，因之「有戰爭工具の意味」。

斯穆次在這本小冊子裏面討論到一種計劃，後來有幾個人在和會中提起過，並被通稱為委任統治制。此制擬將從俄國、奧、匈和土耳其取得的土地交與國際聯合會處置。國聯於是「委託其權力」於被指定為「國聯代理者或受委託者」的國家，惟須受若干監督的限制。威爾遜採取了這個計劃，並以之應用於土耳其帝國內所有原非土屬的領土及除膠州外的所有德國屬地。

這樣一來，約有一二四四、〇〇〇方哩的土地，一八、〇〇〇、〇〇〇人口及一六六、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每年貿易額落入國際聯合會之手，國聯則以之轉授於各受委任的國家。這些國家算是國聯的管家，從事保護那

般尚不能獨立於這個殘酷而複雜的世界的落伍民族。實際上委任統治的分配，有暗合秘密條約中所詳述的帝國主義的目的與計劃之嫌疑。一切國聯會員國在委任統治地都享有均等的商業與貿易機會，而受委任的國家每年應具報告於國際聯合會委任統治地委員會。(註)

(註)關於委任統治地之處分，見第六章「委任統治地與少數民族」一節。

膠州租借地的處分問題發生很大的困難，因為中國（亦為協約國之一）要求將它歸還本國，而日本不肯放棄。威爾遜起初祖護中國的主張，但當日本揚言非承認其占領即將不參與國聯的時候，威爾遜動搖了。勞合喬治和克雷蒙梭也向威爾遜說明，他們從前因欲取得日本艦隊的幫助來對付德國的潛水艇時，曾於一九一七年答應日本保有膠州。因之最後大家商定將德國以前在山東半島的權利讓與日本。可是同時東京方面已允許歸還該地於中國，祇保留若干重要的經濟特權。中國代表團反對這個決議並拒絕簽字於凡爾賽和約。因而中國在簽署協約國與奧國所訂的聖澤曼條約 (Treaty of St. Germain) 之前，並未成為國際聯合會會員國。經過了若干時期，日本纔踐約交還膠州於中國。

最先被提出的而最後待解決的條款之一，就是賠償問題。協約國因為臆斷地認定德國當負大戰的主要責任，所以在停戰前的照會（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中曾經特別規定，德人應賠償「德國在陸海空三方面的侵犯對於協約國人民的生命及其財產所加的一切損害」。當和會的賠款委員會開會的時候，英法的代表堅持德國應負賠償所有大戰軍費，兵士扶養金及實際損害之責。美國人依據於停戰前的談判，認為這種口實有欠公

平，於是訴諸四巨頭會議。在這個當口，威爾遜頗能取得一個妥協辦法，即除比利時之情形外，不將軍費加入於損害賠償項內。然而因了斯穆次將軍所提關於這個問題的有力的備忘錄，兵士扶養金終算入損害賠償額而不作爲軍費之一項。「損害賠償」被分爲十類，現在祇剩德國應付的數額沒有規定了。

賠款委員會的美國委員拉蒙脫 (Lamont)、貝刺克 (Baruch)、台維斯 (Davis) 和馬克科米克 (McComick) 等人主張規定一個確定數目，及償付的一定時間與方法。他們相信明確的規定，對於雙方都有好處，因爲一方可藉此知道有好多來源可依賴以從事復興的事業，他方也能因此準備清償其債務的一定計劃。然而其餘的委員拒絕提供其確定的損害賠償額預算書。他們以爲任何數額，無論開得如何大法，決不會使國內的全體選民滿意，因之會致令現政府被推倒。復次，他們要德國竭其能力來償付，並恐怕把數額定得太低。再者，事實不久就很顯然，就是那般贊成規定數額的人也不能商定一個滿意的數字，其要求自一百五十億元至兩千億元。其間相差太大，終難一致。

所以，最好最快的解決法，莫如將此事擱置一旁，以待將來解決，目前祇暫定馬上先付之數。因此，即規定德國到一九二一年五月應以現金或其等價物付出二百億馬克（幾達五十億元）。當這個時候，又設立了一個特別賠款委員會來規定總數並釐定將來的付款。

上面許多主要的障礙物既經掃除，和約也就很快地草成了定式，現在要命令德國來領取這件公文書了。

簽約

在協約國將草定的和約條款向德人提出之前約三星期，懷德曾經寫信給參議員洛治，說道：「福煦元帥已當巴黎斯（Paris）將軍之前明明白白說過，假使德人拒絕簽字於和約，那就他再快樂也沒有了，因為這樣一來他可以首先帶領協約軍完全掃滅德國，占領金融中心地，並榨取德國全境所有的錢財，連一個子兒也不放過。」這種敵對的態度在他們將和約交與戰敗國的代表的傲慢模樣中，很明顯地反映着。

德國一接到對方要它派代表來自取和約的命令，就倔強地遣出幾位祕書為使者，去將那件公文帶到柏林待當局考慮。協約國認為這是一種侮辱，並警告德國，叫它馬上改派組織完備的外交代表團。這個警告發生效力，四月二十九日，前德意志帝國駐丹麥大使，現任共和外交總長的烏爾立喜（Ulrich）伯爵所領導的德國代表團六人到達凡爾賽。這六個代表的所有行動均受周密的限制：他們都由協約國軍官監視着，被軟禁於鐵絲網後面的旅舍中，且不得與任何協約國代表通消息。

在五月七日，即「琉西退尼亞」船被擊沈的四週紀念日，克雷蒙梭於凡爾賽附近的特喇農宮（Trianon Palace）中以和約正式授與德國代表。當每一個協約國和美國的代表團蒞臨的時候，儀仗兵都舉鎗致敬。但德國代表一被召到，這隊兵就撤去了。於是克雷蒙梭稱呼德共和國代表為「德意志帝國代表先生」（一）說道：「在你們的前面有世界所有大小國家所派遣的全權代表，這些國家都是在被你們德國殘忍的暴力所加的戰

爭中連合作戰的。我們算帳的時機已經到了。你們曾經請和。我們現在準備給你們講和。

德國總代表烏爾立喜伯爵大概因為過度的興奮和將發的疾病，祇是笨拙地答覆克雷蒙梭，卻並未起立。他承認「他本國人毫未幻想到他們的失敗和無告竟至這步田地」，但他否認德國當單獨負大戰之責，並聲稱德國雖孤立無友，仍有公道與正義在自己一方。這種態度祇足以增強協約國中「我教你如此」這一羣人的主張，並被普遍地認為德國除武力外不能懂得任何言語的另一證明。

克雷蒙梭知會德國代表團，准予三星期的時間來考慮和約，不許向協約國作口頭討論，一切申訴當以書面為之。在這個訓誡之下，德國每日平均有一封照會直抵協約國，凡有討論都登在報章的新聞欄中。誠不出所料，和約條款之宣布在德國引起猛烈的怒號。共產黨和反動派齊聲痛斥協約國為「背信背義」與「欺騙奸詐」。民衆的感想很可從希德曼（Scheidmann）（社會民主黨人）的話中見到，他說：「什麼手不會癱軟失力呢，如果那隻手要把它自己和我們放在這種桎梏之中？」（註）在限期略有展緩之後，德國代表團乃於五月二十九日送達一封詳細的備忘錄於協約國。這裏面載有對於和約的精密的評註，否認德國當單獨負大戰之責，並力言履行全部條款之不可能。和約的篇幅有巨帙二百三十頁，但德國的覆文卻有四百四十三頁！

（註）德人對於和約中，要求饑餓的德國於簽署和約後三個月內將十四萬頭乳牛和十二萬隻羊交與法比兩國的一條特別攻擊得厲害。這項要求載於和約第八章附錄四中，可是在官方送交協約國新聞紙刊登的和約摘要裏面，卻並未發表。

許多委員會於是開始做審查德國備忘錄的工作，六月十六日，他們審議的結果被編入協約國的覆文中。這

封覆文對於和約修正的地方很少，並且還多半是因了勞合喬治的緣故，纔有這點修正，他漸漸不大趨於極端了。主要的修正案是關於留住上西利西亞不與波蘭，直至該地的民衆已投票表示其志願時爲止的。德國被限定五日，以後又加兩日，接受這個修正的和約。假使不能辦到，即認爲侵略。

雖然大多數德人準備重啓戰端而不肯簽字於和約，興登堡卻於六月二十日宣稱，至少西線的抵抗是再也不能了。同日，希德曼政府，連烏爾立喜在內，辭職不幹。然而時機急迫，已無傷感的餘暇了，二十一日，另一個社會民主黨人鮑歐 (Bauer) 繼爲總理。翌日 (星期日)，德國的威瑪 (Weimar) 國會表決了有條件的接受，祇反對使德國獨負戰罪及違背戰爭規則之責，並要它交出德皇威廉與興登堡「兩罪魁」，令其在協約國法庭受審判的條文。

協約國此刻重申無條件接受的主張，並拒絕再寬放時限：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晚上七句鐘即爲決定順從或侵略之時。所以在五句鐘後幾分鐘，德國的新代表哈米爾 (Hamiel) 宣布德國接受和約。他說，他的國家乃屈服於「不可抗的勢力，但不因此拋棄它對於這種向所未聞的不公平的和平條約之見解」。

然而德國尙須物色願意往凡爾賽簽字的人。最後外交總長米勒 (Miller) 和殖民總長柏爾 (Beil) 答應前去作使者。這一次，德國代表一到巴黎，又被限制行動的自由，且如囚犯一樣的受着監視。協約國決定的在差不多五十年前普魯士王在此加冕爲德意志皇帝。「鏡廳」 (Hall of Mirrors) 中舉行最後的儀式，當德國代表離開巴黎到凡爾賽去的時候，法國的暴衆在路上拿石頭亂擊他們，一面惡罵不絕口。

在六月二十八日午後三句鐘（是日適爲奧皇儲斐迭南大公被刺的五週年忌日），德國代表被許走進「鏡廳」。米勒面如土色，神經錯亂。柏爾卻很鎮定，不改常態。他們兩人首先簽字，協約國代表則依本國國名之法文字母第一個的次序順簽。美國被列爲 *Amérique du Nord*（北美），所以威爾遜的簽署居先。（註）

（註）協約國與德國之和約批准書最後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巴黎交換。和會又草定了其他四種條約，即與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及

土耳其所訂者。這五種條約（連與德所訂者在內）總稱巴黎和約（Peace of Paris）。

六月二十九日，即和約簽字後一日，豪斯上校離法赴英，從事使國際聯合會快點實現。那一天，他在他的日記上寫道：「我與其有這種和約，寧取另外一種」。

第五章 五種著名的條約

凡爾賽 (Versailles)

凡爾賽和約的宗旨，依照其序言，是在「以穩固、公平與持久的和平」來替代戰爭狀態。這件公文含有十五章，四百四十條及附錄幾二十。(註)

(註)第一章包括國際聯合會盟約二十六條，當於下章加以討論。

亞爾薩斯和洛林算是歸還給法國了。比利時經過比國政府所主持的「民衆投票」後，得到軍事上極爲重要的三個地方，即歐本(Eupen)、馬耳美第(Malmédy)和摩勒斯涅(Moresnet)及居民共七萬人。另一民衆投票的結果，丹麥得到奧、普兩國於一八六四年從本國奪去的什列斯威(Schleswig)北部，而其南部則經民衆表決仍屬德國。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的小部分送給捷克斯拉夫。波森(Posen)和西普魯士的大部分——一塊長二百六十哩，廣約八十哩的土地，其居民有三分之二不到一點的波蘭人，則由德國割讓於獨立的波蘭。經過多次有利於德人的民衆投票後，東普魯士的馬里安威德和阿楞斯泰因(Allenstein)兩地仍歸普魯士所有。

工業區的上西利西亞，奉命在協約國委員會和法意軍隊的監視之下舉行民衆投票。投票結果的報告表明有七十萬以上的票贊成屬德國，四十八萬以下的票贊成屬波蘭；各地方自治團體的票有七百五十四贊成依附德國，情願合併於波蘭者有六百九十九票。波蘭人於是要求住有大多數波蘭人的一切地方，德國則謂該區域全部是一個無形的經濟單位，而依權利應屬於德。雙方爭持不息，特別是在英法對於解決的辦法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後來將這件事提交國際聯合會行政院處理。行政院接受特別委員會的條陳，將西利西亞加以瓜分，祇讓德國保有一半多一點的人民和土地，但以大部分的經濟富源給與波蘭。這樣一來，波蘭獲得了六十七處煤礦中的五十三處，十四所鍊鋼與展鐵廠中的九所，所有的銻鉛鑄造廠，約四分之三的產煤地，及十六處銻礦與鉛礦中的十一處。

但澤，其居民幾全為德人，變成了在國聯統治下的自由城，但波蘭在該城有特殊的外交權與經濟權。默麥爾（Memel）區域則讓與協約國。在一九二三年，轉給立陶宛。

德國「爲有利於主要與次要協約國而放棄本國對於海外屬地之一切權利」，這些屬地後來被分與法、日本、南非聯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作爲國聯的委任統治地。德國對於膠州的統治權則放棄於日本，它所有在中國、暹羅、比利亞、摩洛哥和埃及的特殊權利與特權亦完全拋棄。各主要與次要協約國保留「留存並清算一切財產，權利與利益」權，這些財產，權利與利益原來都屬於德國國民私人或公司，在協約國所管理的土地及新近割讓之土地內者，給與各該所有主的賠償則由德國政府擔負之。（註）德國在土耳其帝國與保加利亞的一切

財產與特權及其在奧地利與匈牙利的特殊利益，完全喪失。

(註)這種財產的若干部分，特別是在美國的，後來都歸還了德國所有主。

德國答應廢止擔保比利時中立的一八三九年條約，並承認盧森堡與德國關稅同盟分離。盧森堡的「中立制度」亦告終止，而德國開發或利用這個大公國的鐵路的權利不復存在。德國不得在「萊茵河左岸或在向該河之東所劃長五十基羅米突的一條線之西之右岸保有或建築防禦工事」。該區域內不得屯駐軍隊，亦不得舉行操演，現有之防禦工事均當撤除。

德國以薩爾盆地煤礦之「完全與絕對所有權及開拓之專有權利」讓與法國，「作為破壞法國北部煤礦之賠償及德國對於因大戰所致之損害應付之賠款一部分」。薩爾的政權，當委託於「代表國際聯合會之委員會」十五年。期滿時應舉行公民投票。黑耳郭蘭(Helgoland)羣島的礮壘與港口皆當加以破壞。德國同意承認將來協約國與前屬俄羅斯帝國各部分之土地所訂立的任何條約協定，並承諾尊重奧國之獨立。

和約的第五章載有關於陸海空軍的條款。德國參謀本部裁撤。軍隊的兵額限定為十萬人，軍官最多不得過四千人。這些軍隊當「專用於維持境內治安及邊陲防衛」。又怕德國用狡猾手段，所以條約中規定官吏的人數，如關吏、森林衛兵、海岸衛兵，不得超過一九一三年所雇用之數。憲兵隊與地方警察隊的數額祇能按一九一三年以來所增加的人口之比例增加。

軍器、彈藥和軍用品的製造皆經嚴格限制，而這些軍用品祇能依「通知於協約國政府之項目」儲藏。凡軍

用品皆不得入口或出口，毒氣、鐵甲車與坦克車亦禁止製造或購買。強迫兵役應即廢止，祇准有連續十二年的兵卒與下士之自動入伍及連續二十五年的軍官之自動入籍。每年中不得遣散現役軍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再者，「凡教育機關、大學、退伍軍人團體、打靶會或旅行社以及各種會社，不問其份子之年齡大小，均不得從事於軍旅之事」。

關於海軍的條文也是同樣嚴酷。德國祇許保留戰艦六艘，輕巡洋艦六艘，驅逐艦六艘，和水雷艇十二艘。它不得保有潛水艇，除為替換之用途外，亦不得建築新戰艦。海軍人員限定為兵士一萬五千人，軍官與弁目一千五百人。入伍的年限與關於陸軍所規定者同。凡商船上之人員不得受海軍訓練。所有超過定數之戰艦均應毀除，或改為商船，或交與協約國。（註）德國且不得保有陸軍或海軍中之航空隊，一切航空術的軍用品都應交出。

（註）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被交出的德國軍艦奉命開往奧克尼（Orkney）的斯卡拍·弗洛（Scapa Flow）後，有五十三艘被艦員打開活栓，送到海底。雖然這個保全德國海軍榮譽的最後舉動阻斷了協約國對於一部分戰利品的爭奪，可是使英人非常憤怒。德國因之被迫加造若干隻商船，以與協約國。

協約國又保留着指定委員會以監視裁軍條款之執行的權利。這些委員會（其經費由德國負擔）有廣大的調查權。然而到一九二七年，就全被裁撤了。雖然關於陸海空軍的限制原擬與條約並存不朽，但實際上有許多條款早已被變更了。大多數的修正案，是得到「大使會議」（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的同意而制定的。再者，和約默示着對於德國軍事設備的限制其用意不但在使德國不能恢復「軍事上的攻勢」，且為傾向於全

世界裁減軍備的第一步驟。這也就是國際聯合會所欲促進的第一義務。

和約中對於「前德意志皇帝，霍亨佐倫皇室之威廉二世」公然彈劾爲犯「有違背國際道德及條約之神聖的大罪」。協約國當組織特別法庭來審判他，「確使他有自衛權所必需的擔保」。然而當荷蘭拒絕引渡威廉的時候，替協約國省卻了許多麻煩。德國又須交出一羣指定爲「被控犯有破壞戰時法律與習慣之罪的人」，在協約國法庭受審。興登堡元帥卽爲被指爲「殘忍好殺」的「人」之一。結果協約國准許在來比錫（Leipzig）（德地）舉行審訊，在那裏的法庭程序自然是馬馬虎虎的。祇有十二來個比較不重要的「戰事犯」受審，而他們被判的刑罰也很輕。

要求德國賠償的法律上的理由，卽置於和約之「罪條」裏面，這就是第二三一條：

「協約國與其友邦之政府確認，而德國亦承認，德國與其同盟國當負責於協約國與其友邦之政府及各該國之人民因戰事所遭受之一切損失與傷害，因此次大戰乃德國與其同盟者之侵略所致也。」

第二三二條又承認德國之資源不足以「完全賠償所有此種之損失與傷害」，德國祇應「賠償在陸海空三方面所加於協約國與其友邦之平民及財產上之損害以及和約附錄一所明定之一般損害」。

附錄一列舉了十類損失與傷害，包括協約國政府所應付與從軍者家屬之扶養金與津貼。此外，德國當以五釐利息償還比利時在戰時貸自協約國政府之一切款項。

賠償委員會當由協約國派定，以決定賠款之總額並「草擬一個付款的表格，規定在三十年內（自一九二

一年五月一日起)取得並解除全部債務的時間與方法」到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德國當以金幣、船舶、證券或貨物付償五十億元的等價物。在這種先付的款額中,占領軍隊的軍費當第一支付,其餘數則用於賠償。

因爲全部的賠款顯然不能都以現金來付償,所以條約中規定德國可以一部分用特定的幾種貨物付償。至於協約國的權利,關於「復置因戰事所損失或毀壞之一切商船與漁船,以噸還噸,以類還類」者,亦經承認。德國因之被迫交出它所有常噸數在一千六百以上的商船;所有自一千至一千六百常噸的船舶依總噸數之一半;及所有括網捕魚汽船與普通漁船依總噸數四分之一。如經賠款委員會要求,德國並應爲協約國建築每年最高噸數達二十萬之船舶五年。

復次,德國的經濟財源當直接用之於「被侵略地物質的恢復」。因之協約國得向賠款委員會提出載明下列各項的目錄單:

(甲)動物、機械、裝置、器具及屬於商業性質之同樣物件,以上一切皆因軍事行動之直接結果爲德國所奪去,消費或損壞者,且爲協約國政府所欲於本和約施行之日將現在德國境內之同樣動物與物件加以替換,以應目前之急需者。

(乙)重新建築之材料(石、磚、耐火性之磚、瓦、木材、窗戶玻璃、鋼、石灰、水泥等等)機器、溫暖裝置、家具,及屬於商業性質之同樣物件,以上一切爲協約國政府所欲在德國產出並製造,並以之交與協約國,以便恢復被侵之地者。(註)

(註)德國當於三個月內交出下列之牲口，作為以動物預付之賠款：(一)交與法國政府者：牡馬五百匹(三歲至七歲)；小牝馬與牝馬三千匹；十八個月至七歲，種類：亞爾丁、布倫或比利時種；牡牛兩千頭(十八個月至三歲)；乳牛九萬頭(兩歲至六歲)；公羊一千隻；綿羊十萬隻；山羊一萬隻。(二)交與比國政府者：牡馬兩百匹(三歲至七歲)；比利時種；牝馬五千匹(三歲至七歲)；比種；小牝馬五千匹(十八個月至三歲)；比種；牡牛兩千頭(十八個月至三歲)；乳牛五萬頭(兩歲至六歲)；未生犢之幼牝牛四萬頭；公羊兩百隻；綿羊兩萬隻；牝豚一萬五千口。所交出之牲口皆應為健全無病者。此項牲口與被奪去者不能合一時，其價值當記作德國賠償之債務一部分。

德國又承諾依下述每年交煤，為期十年：與法國七百萬噸，與比國八百萬噸，與意大利平均七百七十萬噸，如「賠款委員會有命令時」，並以較少之量給與盧森堡。此外，法國「於不過十年之期內每年當收受等於諾爾特 (Nord) 和帕得卡雷 (Pas de Calais) 兩地煤礦(因戰事被毀者)在戰前的常年產額與該兩地煤礦在此十年中的產額之差額之煤量。該項交付在先五年中每年不超過二千萬噸，在後五年中每年不超過八百萬噸」。在和約施行後的三年內，法國每年又當收受三萬五千噸的燐，五萬噸的煤黑油，三萬噸的硫酸銨。賠款委員會有選擇權來決定染料與化學品的交付，其數達「德國所有或在德人支配下的各種染料與化學藥品的存貨總額」百分之五十。

和約中有幾條特別規定，要求德國歸還在一八七〇年之戰中從法國取得的戰利品、旗幟和藝術作品，給與羅汾大學 (University of Louvain)。「在數額與價值上」等於大戰時期中被燬者之史料與抄本，歸還漢志 (Hedjaz) 王國國王陛下鄂斯曼 (Othman) 王之原本，可蘭經，被土耳其政府從麥地那 (Medina) 取去，據說已

獻於前德皇威廉二世者；並交與英皇陛下政府蘇丹姆夸華(Mikawa)之頭蓋，被德人從德屬東非保護地取去者。(註)

(註)最堪玩味者，這個頭顱骨竟不歸還東非而交與英國政府。直到一九三二年，還未交出，德國政府辯明不知其所在。柏林的人民阻止將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之戰中所擄獲的旗幟交還法國，卻拿來在「菩提樹下街」(Unter den Linden)上一齊燒掉。

賠款委員會又有權遇德國不履行任何條款時條陳任何辦法，又經特別規定，「凡協約國與其友邦於德國違約時有權採取之手段，為德國承諾為非戰爭行動者，得包括經濟上與財政上之禁令與強制手段，以及各該國政府決定為種種情形所必要之其他一般之手段」。

和約的其餘部分則解決各種專門問題如被戰事擾亂的國際金融事件、商業關係、條約、債務、財產權、契約與判決、工業所有權、航空、基爾運河(Kiel Canal)海港、水道與鐵路。依據第二六四條，協約國製造業的出產品，在德國應受最惠國之待遇。易北(Elbe)、奧得(Oder)、尼門(Niemen)和多腦(Danube)諸河被「宣布為國際的」。這些河流連同萊茵河都置於國際委員會的管理之下，以便中歐許多被陸地包圍的國家可以自由出入於海。

德國又被迫在漢堡(Hamburg)和斯德丁(Stettin)海口以自由地帶租與捷克斯拉夫九十九年。協約國的貨物當受「最惠國的待遇」，在德國鐵路上的內地運輸亦然。基爾運河及其入口，應依均等條件開放於與德國和平相處的國家的商船和兵船。國際勞工組織亦經設立，以助進作為世界和平之基礎的「社會正義」。(註)最

後，德國預先承認協約國與德國以前的友邦之間所訂的任何條約或處置。

(註)見下章。對於德國的關稅限制在一九二五年即歸無效。

實施和約的保證載於第十四章：「位於萊茵河之西的德國土地以及橋頭堡壘，當由協約國軍隊占領之，自本和約施行日起，為期十五年」。如果德國信實履行和約的條款，該項占領時期或可陸續縮短，五年後便可退出科倫的橋頭堡壘，十年後退出科不林士的，十五年後退出馬因斯的堡壘。反之，如德國舉止乖方，該項占領當無限期的延長下去。

實際上，占領軍隊七萬五千人中最後一批，在一九三〇年，即採取楊格賠款計劃之後，即已撤退。在占領地帶的英、美軍隊與當地的德國居民相處得很融洽。可是法國的軍隊卻激起了不少的仇恨，因為他們大事宣傳，打算離開居民對德的感情；使用黑種人的軍隊於該地帶，並命令德國政府維持以德國女子為娼的妓院，以供這些軍人娛樂；又對於土著犯有輕微之罪者，輒加不相當的重罰。

概括地說來，凡爾賽條約使德國減少了在歐洲的面積八分之一，並喪失了六、五〇〇、〇〇〇人口，它又奪去了它的一切殖民地及在海外所投的資本與保有的財產。（在一九一三年這些海外的資產總計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等於國富百分之十）。它損失了它的耕地的百分之一五·五，牲畜百分之十二，及生產機關約百分之十。它的商船從五、七〇〇、〇〇〇噸減到五〇〇、〇〇〇噸。它的海軍，從前僅亞於英國的，實際上被掃滅了，而陸軍竟減至等於法國的兵力七分之一——雖然德國的納稅人對於這兩項是應當感謝的。因為

在歐洲的種種割讓，它又喪失了木灰、鐵、煤、鉛和食糧。它交出煤儲量約五分之一，鐵礦苗幾三分之二，銻十分之七，鉛一半多。殖民地的喪失，使它所有巨量的橡皮、煤油和織絲的供給額也連帶失掉。再者，土地的重新分配，毀壞了戰前的工業與商業之組織，因之有好久時候就是仍歸德國所保留的工廠，也不能接着從前的效率工作。最後，它簽了一張空白的賠款支票。

聖澤曼 (Saint Germain-Laye)

巴黎四巨頭會議的草約工作並不限於德國的情形。在威爾遜和勞合喬治離開巴黎（時爲一九一九年六月尾）之前，「四巨頭」已經擬定了對奧的初步和約草案，決定了匈牙利的疆界問題，並商議過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事件。但是對德國的同盟國所訂的條約，最後還是由五巨頭的特別會議來完成的。這個新的最高會議由克雷蒙梭及英、法、美、意四國所派的代表各一人組成，而以克氏爲主席。它行使職務一直到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克雷蒙梭一辭職，這個會議即不存在。（註）所有一切不甚重要的條約與凡爾賽和約大同小異。

（註）此後條約之實施則歸大使會議負責辦理，這個會議由英、美、意和日本派駐巴黎的大使及法國代表一人組成。

奧國和議代表團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日接到和約草案。凡有申訴，限定只能以書面提出。當時發生很有趣的爭論，奧人堅持說，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成立的，目前協約國正在對付的奧地利共和國是一個新與的國家，它從來沒有和協約國交戰過——至少和捷克斯拉夫、波蘭或其他全部或一部從奧——匈帝國產生出

來的國家所處的地位一樣。因之他們抗議，新的德人的奧地利共和國不能負責舊聯合帝國做作的一切行動。協約國對於這個頗感不便的法律上的巧妙理由置之不理，並在最後草定的條約（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簽字）的序言中加上一句道：『前奧——匈帝國現已不存在，並已有奧地利共和國取而代之。』再者，在第一七七條中「奧地利」被迫承認「因奧——匈帝國及其同盟國之侵略所加於協約國之戰事」致令協約國遭受損失與傷害的責任。

儘管事實上德、奧兩國的新政府贊成這兩個種族上或語言上有密切關係的鄰邦之合併（Anschluss），也許正因為此項事實，聖澤曼條約第八十八條禁止德、奧兩國合併為一邦，並加奧國以「不得作直接或間接或以任何方法妨礙其獨立之行動」的責任。實際上，奧人又被迫將他們的國名從「德人的奧地利」改為「奧地利共和國」。協約國的目的，即在阻止德國因增加數百萬奧人而變強，並保護捷克斯拉夫，使不受德國的包圍。

要決定重新分配前海布斯塔王的領土的問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有待應付的不單是奧地利和匈牙利，並且還有舊聯合帝國的一切嫉妬的承繼者：捷克斯拉夫、塞爾維亞、波蘭、意大利和羅馬尼亞，至少須使它們得到一部分的滿足。其間並無明晰的人種上的，民族上的或甚至於經濟上的界線，差不多有一打的新舊民族集團嚷着要求給與相當的承認。實在把土地分給許多「戰勝者」，沒有像從奧匈兩國直接取去那麼容易。無聊的時間都耗費於決定某某鐵路終點，運河和軍事突角的運命，弄到結果還是沒有一國完全滿意。

奧國讓與意國南提羅爾（South Tyrol）、特稜提諾（Trentino）的里雅斯德（Trieste）、伊斯的里亞

(Istria) 和達爾馬提亞 (Dalmatia) 附近的諸島。南提羅爾雖住有二十五萬德國人，意大利卻依特秘密條約並藉口阿爾卑斯山既爲「意國的天然防衛」，它就需要戰略上的要害布里納山道 (Brenner Pass) 以保衛國境。捷克斯拉夫國由前奧國土地如波希米亞 (Bohemia)、摩拉維亞 (Moravia)、下奧地利 (Lower Austria) 一部分及幾乎所有奧屬西利西亞構成，這些區域約有三百萬德人。波蘭得到奧屬加里西亞。波蘭與捷克斯拉夫所互爭的非常工業化的特申區域，結果由大使會議分與兩國。羅馬尼亞獲得布柯維納 (Bukovina)。波斯尼亞 (Bosnia)、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 及達爾馬提亞的海岸和島嶼則歸巨哥斯拉夫。一共算來，聯合帝國的奧屬一半，減少了四分之三的土地和人口。

聖澤曼條約 (Treaty of St. Germain) 其餘的三百八十一條，大抵都是凡爾賽條約的複寫品或適合物。國際聯盟和國際勞工組織的條文都是從對德和約上抄來的。奧國同意於協約國與它從前的友邦所訂立的一切條約；放棄非歐洲土地內的一切權利與特權；承諾空白的賠款支票；接受關於多瑙河之航行及鐵路線與貨物之移交的特別章程；承認協約國審判指定的奧國「戰事犯」之權；並授與捷克斯拉夫以其火車通過特定的奧境路線而達亞得利亞海邊的權利。舊聯合帝國在大戰前的債務當依比例分配於前海布斯堡 (Habsburg) 王朝的各領土。奧國交出它所有的海軍，祇保留三隻駛於多瑙河的巡警船。它的陸軍祇准有三萬志願兵，其入伍與退伍的限制與所加於德國陸軍者同。

涅宜 (Neilly)

保加利亞，預防受懲罰，就在對本國的和平條款決定前造具了一篇很長的備忘錄送交巴黎和會。它說明（一）保加利亞之加入大戰大部分當歸咎於前王斐迭南，他已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四日退位；（二）保國因之不當被認為應受處罰；（三）因人種上和歷史上的理由，保加利亞有權享有廣闊的土地，特別是在馬其頓和多不魯甲（Dobruja）的。協約國冷淡地拒絕接受它這種見解，並提醒它說，保加利亞究竟是一個戰敗國。保國除簽字於涅宜條約（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外，沒有選擇的餘地。

爲了戰略上，軍事上和鐵路上的緣故，這個條約給與巨哥斯拉夫在西部保加利亞的四塊小地方。割讓地之一即爲斯特魯密察（Strumitsa）突角，這塊地方在大戰時期中曾使協約軍大感煩惱，而這四塊地方的居民大多數爲保人。希臘得到西部色雷斯（Thrace），保希兩國之間的疆界也略有變動，其結果使保國失去愛琴海的海岸線。然而協約國允許「擔保保加利亞有到愛琴海的經濟方面的出口」。

保國的陸軍限於兩萬人，其他的武裝公務員限於一萬三千人——「俾所用來福鎗之總數……不得超過三萬三千枝」。它的海軍完全被廢除，惟爲了「警務與捕魚之職務」，准它保留「四隻水雷艇和六隻摩托艇，但皆無水雷與水雷設備之裝置」。關於經濟、政治和國際的協定與對奧所訂者同。保國除將若干家畜交與希臘，前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外，還須接受賠償的義務。賠款數額最後規定爲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應自一九二一

年一月一日起，於三十七年內清償之。保加利亞的土地損失與人口損失總算比較小，但這些損失和它被陸地包圍的地位合攏來，已足使它成爲巴爾幹諸國中最弱的一國。

特喇儂 (Trianon)

對匈牙利的和約一直到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纔在凡爾賽的特喇儂宮簽字。其遲緩乃因匈牙利的國是未定，蓋自海布斯堡王朝顛覆後，國內的保皇黨、共和黨、社會黨和共產黨發生激烈的政權的爭奪。(註)當時的騷亂因時起的和激烈的反協約國運動而增加，這種運動發生於草擬條約之際，其影響祇使協約國作一個重要的讓步而止，即准許這個新國取名「匈牙利」而不稱「匈牙利共和國」。但協約國警告匈人，海布斯堡王室的復辟「決不能承認或容忍」。

(註)見第十六章。

環繞於匈牙利四周的國家都分得舊匈牙利王國的一片土地。羅馬尼亞得到德蘭斯斐尼亞 (Transylvania) 及特默斯發的巴納特 (Banat of Temesvar) 的三分之二，包括總數幾達一百五十萬的匈牙利人。哥羅西亞——斯拉窩尼亞 (Croatia-Slavonia) 與特默斯發西部的三分之一，連同五十萬匈人則歸巨哥斯拉夫。羅發基亞 (Slovakia) 成爲新興的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的一部分，這個國家又取得喀爾巴阡山脈 (Carpathian Mt.) 之東南的若干土地，差不多有一百萬匈牙利人和五十萬小俄羅斯人就這樣被合併於捷克斯拉夫。奧地利

得到部耳根蘭特 (Dungenland) 或德人的西匈牙利，於此顯然可見，「土地的安排很難與任何一種明晰的原則調和」。

這件條約的其他條款與對奧對保者同。匈牙利的陸軍被裁至三萬五千人，其海軍亦減到祇剩幾隻巡邏船的地步。它也應負賠償之責，這是載於戰罪條款內的。

色佛爾 (Sèvres)

勞合喬治曾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宣稱過：「我很高興土耳其人違反人道的邪惡的長期經歷，現在可以算一筆總帳了。」不到六年之後，他對下議院說道，將來和土皇所訂的條約中所計劃的協定辦法當最後解放「一切非土籍人民，使不受土耳其的支配」。他在那次可沒有說，這件條約擬定了一個反轉的情形，即將土耳其人置之歐洲人的支配之下。對土和約所根據的原則大部分為祕密條約中所具體表現的，雖然因了布爾札維黨的革命和俄國因之而暫時退出帝國主義者的場面，又因了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主張及意大利與希臘間相衝突之利益而不得不略有修正。

在色佛爾條約 (Treaty of Sèvres)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 中，土耳其承認它在埃及及蘇丹 (Sudan) 塞浦路斯 (Cyprus) 的黎波里 (Tripoli) 摩洛哥 (Morocco) 和突尼斯 (Tunis) 所有的權利之損失。它又放棄對於阿拉伯、巴力斯坦、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的一切權利。士麥拿 (Smyrna) 和愛奧尼亞 (Ionia) 內地當皆由希

臘統治之，這個國家又得到若干愛琴海中土屬的島嶼及東色雷斯的一部分。意大利則取羅德斯 (Rhodes) 與 多得卡泥斯 (Dodecanesia) 的占領權，雖然它允許將來仍以後者讓與希臘。

達達尼爾海峽地帶撤除軍備並成爲國際公有地。協約國起初希望美國擔任對於君士坦丁堡的委任統治權，但美國人民對於巴黎和約的反感，顯然使威爾遜沒有後盾，來負起這個責任。所以君士坦丁堡和歐洲大陸一小部分地方至察塔爾查 (Chatalja) 分界線爲止，仍屬土耳其的主權所及之地。

土耳其其同意於承認亞美尼亞爲「自由獨立之國家」，其疆界由威爾遜在埃爾斯倫 (Erzerum) 達拉布松 (Trebizond) 凡 (Van) 和比特利斯 (Bitlis) 諸省之面積內劃定之。古的斯坦 (Kurdistan) 得享有自治權，但它的疆界當加改正，以利波斯。所留給土耳其的祇有多山的阿那托力亞 (Anatolia) 與歐洲之一隅。再者，在簽訂色佛爾條約的那一天，英法、意的代表又訂立了三國協定，因此在阿那托力亞的勢力範圍全爲法、意兩國劃定。法國的勢力圈及於敘利亞之北；意大利的則及於士麥拿之東南。

雖然這件條約經諾德六世的代表簽字，雖然土皇被駐在君士坦丁堡的協約國軍隊和破艦所懾服，願意批准條約，有一羣由基瑪爾 (Kemal) 所領導的強有力的土耳其國民黨員，決定來阻止批准。他們的成功歷史，當於另一章中敘述之。(註)

(註)見第二十章。

關於少數民族的條約

以上許多條約中所包含的疆界整頓，造成了一個極難解決的少數民族問題。大戰與和平會議煽動了民族的精神，激起了民族間的猜忌。懷着仇恨心的報復行動，可料其必定發生。用威爾遜的話來說：「沒有比在某種情形下所與少數民族的待遇更能擾亂世界和平的事情了」。爲防止糾紛起見，必須使少數民族得到相當的保障。至少應爲許多少數民族擔保種族上，宗教上，社會上，語言上和經濟上的少許平等。

關於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土耳其，所有的保證都包括在和約中。接着波蘭、羅馬尼亞、希臘、巨哥斯拉夫和捷克斯拉夫也被迫簽訂特別條約，將同樣的保證具體表現之。雖然它們曾大加反對。大多數關係國對於這種條約所以表示異議，蓋以爲違反它們的主權，且足以鼓勵國內分離運動的氣燄，但是幾個大國堅持到底，因之它們祇好擔負了所加的義務。在每一個例證中，少數民族的監督權概歸國聯維持，而這種保證祇有經國聯行政院之同意方可更改或修正。卒之，立陶宛、拉特維亞（Latvia）、愛沙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都和國聯訂立了相同的協定。這些條約的模型差不多都是一樣的，所有不同之處乃由於各別的地方問題。其中包括對於一切人民之生命與自由的保障，不問其種族、國籍或宗教；准許私人與公衆信奉任何宗教或教條，惟以不妨害公共道德者爲限；又保護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在某種情形下之得使用於商業上和學校中。

簡單地說來，以上就是發生於「以戰止戰」的大戰的條約之規定。它們顯然是片面的。它們充滿着不穩固

的妥協。它們反映着處處染有理想主義的實利主義——但亦帶點偽善色彩。它們播下將來衝突的種子。草擬條款的方法是新穎的，其他許多規定亦然。我們希望這些新事物和條款最好會少被認為先例。

可是，在估定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一般創制條約者的工作之價值時，我們必須記住他們在勞作時所遇到的許多物質上和心理上的重大困難。他們的錯誤有些在當時就顯然可見，但有許多要在經過幾年後纔更為明晰地露出來。仇恨與敵愾，偽善與勢力，當然很多，但這些因素是「人性」的一部分，且為當日之「文明」。流血和泥濘的四年，並沒有增加理性，也沒有減輕脾氣。

然而有一線之光，「新世界」的強力，出現了——即國際聯合會。固然，這祇是一個脆弱的組織，但這是數百年來的幻夢之第一次的具體實現。有一天和約的其他條文被忘掉的時候，這個組織也許還會留在人們的腦海中。

第六章 國際聯合會

設立國際聯合會的早期計劃

常言道，「太陽底下無新事物」，這句話之剴切適當，在設立國際聯合會的計劃的沿革上，有顯著的例證。自古希臘人時代至二十世紀的許多最重要的國際仲裁與國際組織之計劃，原文都經搜集，彙成一書，可占密行細字的篇幅約一千頁。(註)歷史上大多數代價很大的戰爭，事實上頗足以刺激起排除武力用仲裁方法維持和平，解決國際爭執的新計劃之提議。

(註)此書即 W. E. Darby,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3 ed., 1900。

大詩人但丁 (Dante) 憫於意大利各城邦與日耳曼皇帝之間常動干戈，曾經建議統一西方各基督教國，置之於一個強有力而敬懼上帝的君主統治之下。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有一位法國法學家名叫皮埃爾·杜步亞 (Pierre Dubois) 的 (綽號為觀念主義者與無賴漢的)，也提議組織羅馬天主教徒聯盟，以厲行西歐的和平，並設立以教皇為首領的國際法庭。可是他恐怕「那些墮地獄者的人數大為增加」，就主張這個法庭祇應加俗世的，而非宗教的刑罰。杜步亞以為，如果任何基督教徒不改好戰的心，他們應當轉移其銳氣於征伐占領聖地

的異教徒。

幾世紀後，對於和平的著述又有三大種貢獻，這是法國宗教衝突與「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年至一六四八年）的騷亂的結果。在一六二三年，克魯采（Oruce）指出抑制戰爭之商業原因的必要，並主張在威尼斯（Venice）設立一個永久的「大使會議」來解決基督教國家之間的紛爭。最有趣者，他又以為武裝衝突是與一切文明國家有關係的重大事件——這個論點就是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所採用的盟約第十一條的精粹。

格老秀斯（Grotius）在一六二五年發表了第一篇有系統的關於國際法之基本原則的論文（戰時與平時國際法論）（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並略述了一個平時仲裁的很有意思的計劃。十三年後，得·薩立（De Sully）主張一個「偉大的計劃」，不幸這個計劃太高深了，不能引動當日一般野心勃勃和互相猜忌的君主之心。其學理即為創立歐洲聯邦，由「七十人會議」統治之。該會議有解決爭執的最後權限，其決議於必要時得以國際警備軍為後盾而厲行之。得·薩立的觀念後經聖皮耳長老（Abbe de St. Pierre）於一七一三年加以發揮並廣佈。

教友派教徒是公然擁護和平的人，在一六九三年，潘威廉（William Penn）著了一篇關於歐洲目前與將來之和平的論文（Towards the Present and Future Peace of Europe），主張設立一個具有廣大仲裁權力的大會。在日耳曼帝國，來布尼茲（Leibnitz）——哲學家、數學家和外交家——提議組織天主教徒的歐洲聯盟，由神聖羅馬皇帝操持政權，而教權則歸教皇。「七年戰爭」和美國革命的大破壞，使激進的知識分子邊沁

(Bentham)大發悲天憫人之心，公布了一篇世界永久和平的議案(Plan For an Universal and Perpetual Peace)，他建議國際法庭之創立，軍備之限制，及秘密外交與其附帶的罪惡、賄賂和猜疑之廢除。

德國大思想家康德(Kant)對於和平運動也貢獻了兩篇短論，即世界一家主義史(Universal Cosmo-Political History) (一七八四年)與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 (一七九五年)兩文。他認為專制君主的敵對野心是戰爭的主要原因，因之建議設立比較合乎民主的政體。他又相信我們祇要辦到廢止常備軍，禁止一國以武力干涉他國之事務，並聯合各國成爲一個大團體，就很可能以保持國際的親睦和諧。

在某一個意義上，俄奧普三國於一八一五年所成立的「神聖同盟」是一個維持和平的組織，和發生於一八一四年的「四國同盟」的所謂「歐洲協商」(Concert of Europe)一樣，後者之以會議而不以戰爭解決十九世紀歐洲的重大爭端，多少有點成功。在十九世紀，世界和平的主義頗得一般著名人物如英國和平協會創立者阿倫(Allen)、穆勒詹姆士(James Mill)、穆勒約翰(John Mill)、伯倫智理(Bluntschli)和諾貝爾(Nobel)等的有力的贊助。在一八九九年與一九〇七年，在海牙曾經開過兩次高唱入雲但不十分順利的和平會議。

和平運動之在美國，也有很多主張者。多治因一八一二年之戰爭失去很多財產後，乃於一八一五年創立紐約和平協會。同年，馬薩諸塞(Massachusetts)州也有同樣的組織。一八二八年，拉德(Ladd)設立了「美國和平協會」。若干時候，拉德寫了一篇著名的論文，叫做創立萬國會議以調和國際紛爭而不訴諸武力論(Essay

on a Congress of Nations for the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Without Resort to Arms)。他想組織一個國際的自動團體，其中每一會員國當保留其個性。到一九一四年，約有一百五十個和平團體散佈於西方世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位出版業者琴氏 (Ginn) 在波士頓 (Boston) 所設立的，經費充裕的世界和平基金會，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世界大戰之爆發，有一個時期使一般人對於和平事業的價值，失去了信仰。然而不久，大戰的異常的破壞性，以一種新的力量灌注於理想主義者的心中，使他們更熱烈地進行創設一種可代武裝衝突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法的工具。在大戰起初兩年內，美國即有「美國限制軍備聯盟」，「美國反軍國主義同盟」，「婦女和平黨」及「促進和平同盟」等等之組織。上述最後一個團體以馬爾堡 (Marburg) 前總統塔虎脫 (Taft) 哈佛大學校長羅威爾 (Lowell) 及獨立評論 (Independent) 編輯者霍爾特 (Holt) 算為它的主導人，並且馬上取得英美兩國 第一流政治家的贊助。在一九一六年，它造具了幾種防止戰爭並裁斷爭執的國際聯合會盟約的草案。

威爾遜總統 公然認可促進和平同盟的許多條陳，最後並以「國際大團結」的觀念併入於「十四點」內。當這個時候，英國 以菲力摩爾 (Phillimore) 爵士為首領的一羣法學家也草擬了一件盟約；到美國 參戰的時候，大家都曉得將來的和平會議當與此件事以認真的考慮。

在第四章中，我們已經詳細講述巴黎和會 草擬並採用最後一個盟約的故事。不單這件公文被弄成五種條約每一種的整個一部分，它所創造的國際聯合會並且有監視許多條約條款之履行的權力。實在，國聯 被委託了

「結束戰事並完成和平」的任務——這個任務之困難因美國未成爲會員國而愈甚。

國際聯合會的機構

關於國際聯合會的宗旨，除引證盟約 (Covenant) 的前言外，不能有更好的說明：

「各締約國爲促進國際之合作並成就國際之和平與安全計，爰本承諾不訴諸戰爭之責任，規定坦白公平與光明正大之國際關係，確定國際法之約束爲各國政府行爲之準則，及於各國相互之交際往來中維持正義並嚴格尊重一切條約義務等等先決條件，議定本國際聯合會盟約」。

國聯的基本會員國就是盟約附錄中所列的簽字國及於盟約施行日起兩個月內毫無保留而承諾本盟約的被邀請國。會員國的資格又得以國聯大會三分之二人數之表決給與完全自治的國家，領地，或殖民地，惟須後者確實擔保有誠意遵守其國際義務並願接受國聯對於其軍備所規定之章程。

凡已履行盟約所定義務的會員國得於先兩年發出通知後退出國聯。到一九三二年之終，祇有兩個國家——巴西和哥斯達黎加 (Costa Rica)——利用過這個特權，剩下的會員國共有五十七。盟約本身，是一件有伸縮性的公文書，得以行政院 (Council) 全體一致的表決及大會 (Assembly) 過半數的表決修正之。有很多修正案，大半是關於程序的，業經採用。

國聯一九三二年的預算約達六、五〇〇、〇〇〇元，此一九二二年的預算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會員

國所分擔的經費依照特別委員會所擬的等級而定。全部會費分爲九百八十六個單位，每一會員國應繳納若干單位。英國所出者最多，計有一百零五個單位。法國和德國各任七十九個，像阿爾巴尼亞和中美諸邦這種小國家則祇出一個。行政院及各種委員會的會議都在日內瓦國聯祕書廳舉行，即從前的「國民飯店」(Hotel National)。至於大會，因人數太多，必須在日內瓦湖另一邊的「宗教改革紀念堂」開會。現在有一所大廈已在建築中，位於亞里安那公園(Ariana Park)，到它造成的時候，將成爲大會的永久會址。

國聯經由大會，行政院及常置之祕書廳執行職務。大會由所有會員國的代表組成，每一國得出代表三人的最高額，但祇有一票表決權。這些代表以及國聯的一切職員都享有外交官的特權。普通會議每年在日內瓦舉行，開始於九月間的第二個星期一，如果這一天適在該月十日之後，則開始於第一個星期一。特別會議得於緊急時舉行之。第一次大會由威爾遜總統召集，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舉行。

大會的每次新會議由行政院院長主席，至常任院長及副院長六人當選時爲止。此後由這七個人連同六個常置委員會的主席組織總委員會來負責處理事務。常置委員會以每一國之代表一人擔任委員，其職務有關下列各項：(一)法律和組織法的問題，(二)各種專門組織的工作，(三)軍備之裁減，(四)預算及內部行政，(五)社會問題，及(六)政治問題。在這六個團體之外，還有許多輔助的和特別的委員會。

大會得於其會議討論「凡在國聯行動範圍之內或涉及世界和平的事件」。從開始以來，「大會已成爲加入國聯的各國代表每年互相表示其意見，申訴其冤苦，發表其批評並表白其志向的講壇」。明細言之，大會的任

務即在選舉行政院的非常任理事，審核預算，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與行政院同時選舉世界法庭法官，並於認為適當之時勸告會員國重新考慮已成爲不適用的條約。

國際聯合會的行政院，由有代議權的每一會員國所派代表一人組成，彷彿各國政府的最高行政機關。本來盟約中規定設置五個常任和四個非常任理事席，前者歸於美、英、法、意、日五國；後者待大會選擇，歸於比利時、巴西、希臘和西班牙。後來因爲美國拒絕加入國聯，所以在一九二二年前，行政院中祇有八個理事。在那一年，大會將非常任理事增至六席，使較小的國家成爲多數。四年後，理事全數增至十四席，當時德國也取得一個常任席，並有三個續增的非常任理事。非常任理事的任期業經規定爲三年，且經加以調整，俾每年必有三國退職。就一般而言，退職的會員國未有馬上被連選的。

自一九二九年以來，行政會每年舉行常會三次——在一月，五月與九月間——地點通常爲日內瓦。特別會議得隨時召集之。行政院的主席職是依會員國國名第一個法文字母的順序由各國代表於歷次會議中輪流擔任的。除關於程序之事件外，行政院所有決議案，都須全體一致通過。遇着討論關於非行政院理事之國的問題時，該國得暫時出席。和大會一樣，行政院得商議有關世界和平或危及國交之親睦的任何問題。因爲這個團體比大會來得小，並能迅速召集，所以它常被請求來處理大多數緊急的局面。第一次的行政院會議也是由威爾遜總統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在巴黎召集舉行。那一年又陸續開了十次會。

盟約所賦與行政院的特別職務，爲草定裁減各國軍備的計劃，從事研究委任統治國所造具關於其所任事

務之執行的常年報告，及設法保障各會員國之土地完整，使不受外來之侵略。它又須調查所提出於該會的國際爭執，並得以之取決於大會。再者，它必須於「國聯盟約」需要保護時勸告各會員國出其有效的貢獻。

國聯的第三個代理機關，就是設於日內瓦的常置秘書廳或「文官處」。秘書廳由秘書長一人（他又以該項資格在行政院和大會的會議行使職權）及秘書長經行政院同意所選選的職員組成。第一任秘書長為德魯蒙德（Drummond）爵士，其姓名載於盟約附錄中。德魯蒙德於盟約原文被採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後——即凡爾賽條約簽字前兩個月，就取得協約國的許可，召集他的副手，在倫敦設立臨時辦公處。他不久就被公認為具有非常能力，圓通周到，工作努力，公平正直和辦事幹練的公務員。將來的秘書長則由行政院經大會同意任命之。

襄助秘書長的職員為副秘書長一人，秘書三人，及從五十餘國所聘用的職員約七百人。所有幹部人員皆由國聯任用並給俸；至少在理論上說來，這些人都並不代表其本國的利益。秘書廳分為十一科，其職務涉及委任統治地、裁軍、衛生、少數民族及經濟與財政的問題等事項，並搜集有關此種事項的材料。秘書長應負責登記並公布國聯各會員國之間所訂立的一切條約或非會員國自動寄送給他的條約。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尾，業經登記的條約達二二三〇件。其原文均以其本國文及英、法文公布。

國聯為減輕這三個主要機關（即大會，行政院與秘書廳）的工作起見，曾經創立了幾個輔助機關，稱為專門協會和顧問委員會。前者之中有經濟與財政協會，交通與運輸協會，和衛生協會。顧問委員會中則有關於委任

統治地，鴉片買賣及學術合作者。此外，還有若干臨時的組織，如裁軍會議籌備委員會。又有好幾個原來不屬國聯管轄的國際局，如設於摩納哥（Monaco）的「國際水路測量局」，亦由國聯主辦了。

除上述者外，尚有兩個大機關多少當認為國聯的機構的一部分：那即是常置國際法庭或世界法庭及國際勞工組織。依照盟約第十四條：

行政院應草定設立常置國際法庭之計劃並以之分送國際聯合會各會員國，以備採用。該法庭得審訊並判決屬於國際性質之爭端，為當事國向該法庭所提出者。該法庭並得對於國聯行政院或大會所提交之任何爭執或問題，貢獻其意見。

行政院為執行此項委囑起見，乃於第二次會議（一九二〇年二月）指定一個委員會，由第一流法學家組成，來草擬這種法庭的規程。該委員會集會於海牙，並在五個星期內（六月十六日至七月二十四日）一致商定了一個詳細的草案，包括所擬設立的法庭之組織、程序及裁判權。在全部審議之中，美國委員，前國務卿魯特（Roo）最露頭角，發表的意見頂多。這個計劃馬上被送交行政院，經略加修正後，即以之提出於第一次大會。大會又加上若干修正案，並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三日一致採用為世界法庭的規程。

行政院接着造具議定書，以前項規程附載於其中，並以之送達各會員國。一待各會員國之過半數已批准該項議定書，這個法庭即告成立。到一九二一年九月，已經得到規定的最少批准國數，行政院和大會乃同時，但分別選舉第一批法官。（註）海牙被擇為法庭的所在地。它的經費，每年約五十萬元，則由各會員國照比例負擔之。

(註)此後的批准進行得比較慢。在以後的九年中，祇有十四個國家續表同意。

直到一九三二年，服務於國際法庭的美國人有三位。摩爾(Moore)是最初當選者之一，但他在一九二八年就辭職。休士在那一年當選為摩爾的繼任者，但於一九三〇年亦辭職。被選補其缺者為開洛格。至於美國對於世界法庭的態度，見本書第二十二章。

世界法庭最初由法官十一人，助理法官四人組成，他們都是行政院和大會的絕對過半數所選出的，任期九年。庭長與副庭長由法官自行推選，任期三年。法庭的常年庭訊期，於六月十五日開始，第一期(即一九二二年的)祇持續了兩個月。爲着重世界法庭的永久性起見，行政院所指定的法學家委員會乃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建議法官之人數應增至十五位，助理法官之職應裁撤，再者，除規定之假期外，法庭應全年開庭。因有法官輪流出庭的辦法之制定，所加於各個法律學者的責任就有相當的限度了。載有這些條陳的議定書，即提出於各法官，在一九三一年之初，即見施行。

世界法庭的裁判權有兩種，一是自動的，一是強迫的。當兩個以上國家遇有爭端發生，以之委託該法庭審斷的時候，就算是在請求該法庭的自動裁判。然而有幾個國家已經簽訂了一種「隨意的條款」，這是附在世界法庭草約的後面的。這個條款規定批准國在關於條約之解釋，國際法之任何問題，國際義務之違背或因該項違背所定賠償之性質與範圍的一切法律爭論中，必須承認常置世界法庭的裁判權，「事實上爲強迫的，且無須特別之制定」。所以世界法庭的裁判權，對於該項條款之簽字國是強迫的。到一九三二年，批准這個條款的國家已有三十九個，包括德、英、意在內。大戰後所簽訂的許多雙務和解與仲裁條約中，規定把爭端委託於世界法庭的裁判

亦爲強迫的性質。

世界法庭的程序與普通法庭的相同。訴訟事件要領書必須呈案，辯論必須聽取，證據必須審查，而判決則經秘密商議後以法官過半數之投票下之。祇有國家可以提起訴訟於世界法庭，凡一個未能應原告之傳喚到案受審時，得下缺席之判決。

除上述者外，世界法庭尚有另一作用，即對國聯行政院與大會貢獻勸告的意見。特別是行政院，它已經利用這個機會獲得了關於法律上的論點的意見。這些意見是經過通常的法庭程序而提出的，對於任何人都沒有拘束力，但大抵皆經承認爲有效。這樣利用世界法庭的法子，曾經遇到若干批評，第一因爲行政院本身尙未能決定它是否必須一致表決徵求勸告的意見，第二因爲這種辦法似乎多帶點國際政治的特色而少有法律的性質。

常置國際法庭還沒有完全取一八九九年所設立的海牙法庭的地位而代之。海牙法庭祇是一百三十二個著名的法學家的名簿或名單，從這裏面可以遴選人員來組織一個法庭，以公斷海牙協定 (Hague Convention) 的各簽字國之間的爭端。世界法庭並不公斷爭執；它祇是解釋國際法並判決關於違背條約之事。到一九三二年，約有二十件判決和勸告的意見曾經交下。

國際勞工組織雖然是完全自治的團體，並祇對其本身和輿論負責，但也是國聯的一個機關。它的成立，乃爲勞工謀利益，且經凡爾賽條約第十三章規定。因爲根據國聯盟約第二十三條，國聯誓當「保障並維持男女及兒童勞工之公平與合乎人道的狀況」於世界各國，所以行政院和大會議定供給資金於該組織，並規定入會之資

格限於國聯會員國。然而實際上，德國在加入國際前幾年，已有代表出席於勞工組織，巴西於退出國聯後仍爲國際勞工組織的會員。

勞工組織的機構與國聯本身相同。它有一個全體會議與國聯大會相合，又有一個理事會，彷彿國聯的行政院，至於國際勞工局則與國聯的祕書廳相似。全體會議每年開會一次，它是由每個會員國所派代表四人（一爲勞工所選，一爲資方所選，兩爲政府所派）組成的。表決方法係以各個代表爲單位。

全體會議沒有實際的立法權，但它很容易集中世界的注意於若干弊端並指出改良勞工狀況的途徑。它得三分之二之票數通過建議案或協定草案。建議案通常成爲極廣泛的原則，作爲指導各國的勞工立法的原则。協定則爲詳細的法律條陳，希望可爲各會員國所採用。建議案和協定都經由國聯祕書長轉送各國政府，而每一國必須將此種條陳提出於本國立法機關，以待審議。

理事會每三個月至少須開會一次，它由二十四個人（工人代表六人，雇主代表六人，政府代表十二人）所組成。爲求各重要的工業國家在勞工組織的事業中可有永久的發言權起見，規定比利時、加拿大、法、德、英、意、日本和瑞士的代表各一人應始終列入理事會的十二個政府代表之中。其餘四席則由除上述八國外的其他政府代表於全體會議中選舉之。全體會議中工人和雇主的代表則各自選舉其理事。理事之任期爲三年。他們的主要職權卽爲選舉並監督國際勞工局局長。

勞工局的總辦事處設於日內瓦，服務人員男女共達三百餘人。它的職務爲搜集關於工業界及勞工的各種

狀況的報告，造具事務順序表，以備提出於全體大會之常年會議，並與全世界各種自願的勞工協會時相接觸。它又發行兩種刊物，一為國際勞工組織公報（Official Bulletin），一為國際勞工評論（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一直到現在，國際勞工組織所提議的協定，大多數是關於勞工狀況之一般改良的。所討論到的為工作時間之長短、失業、女工與童工體格檢查、夜工、衛生狀況、農業工人中之聯合權等等。草案的批准進行得不大快，尤其是在西方各工業國中，但有幾種改良已經發生，特別是在東方。舉例來說，在波斯，毛氈工業中的童工的不良現象已經減少，日本和印度的工廠狀況亦略有進步。把它作為工業界幸福史的哩程標來看，國際勞工組織已表明其本身為顯然有益的機關。它給與勞工一種積極的，如果是保守的，指導。

國際聯合會與和平的維持

為國際聯合會會員國的，每一個國家都訂立了三十四種根據於盟約的特殊協定。其中有十九種是直接或間接關於和平之維持的。第一，各會員國「承諾尊重並維持國聯所有會員國之土地完整及目前之政治獨立，以拒外來之侵略」（第十條）。遇有此項侵略時，行政院應「條陳履行此種義務之方法」。為求有效力起見，凡行政院所定關於此事之決議案，應由全體一致通過。這樣一來，凡在行政院有代議權的國家都不能被迫違反該會的意志而啓戰端，俾可履行該條所定的責任。

再者，「凡戰爭或戰爭的威脅，無論是否直接影響國聯之任何會員國」，皆認為與國聯全體有關，而每一會員國皆有「便宜的權利」引起「國聯大會或行政院對於涉及國際關係的任何足以擾亂國際和平或和平所依賴之國際諒解的情形」的注意（第十一條）。盟約的簽字國，承諾將彼此之間所發生，而適於和平解決的爭執提交仲裁或法律解決，或向行政院申訴其困難。

為進一步使大家採取這種行動的方針起見，各會員國又承諾不與接受仲裁的判斷及世界法庭的判決或行政院的報告（假使該項報告是一致通過的）的國家交戰。如果行政院不能通過報告，會員國保留「採取本國所認為維持權利與正義所必要之行動」的特權（第十三與十五條）。然而無論如何，在仲裁判斷或行政院報告宣布後三個月前，不得訴諸戰爭（第十二條）。

行政院被請求解決爭端時，將該項爭端提交大會。在大會，一個決議案必須經過在行政院有席次的各國代表及其他各會員國之過半數一致的同意。然而，假使行政院覺得爭端係發生於「依國際法純屬當事國之一國內裁判權之事」，則不得議定任何種解決辦法（第十五條）。

國聯盟約並且規定了違背誓約的罰則。凡遇一個國家違背盟約之規定而訴諸武力時，「依事實即認該國已犯有對抗國聯全體的戰爭行為」。倘有此事，犯罪國當受與國聯會員國及非會員國「斷絕一切貿易關係或經濟關係的處分」。這種「經濟的武器」可適用於犯罪國的國民之私人事務及該國之政府（第十六條）。

為求減少實行經濟絕交的國家因此項辦法所遭受的損失和不便起見，國聯會員國又互相約定在對於違

約國所取的經濟政策之中，彼此扶助。萬一經濟的制裁對於頑梗的國家不發生效力，行政會甚至可以勸告各關係國政府「各出國聯會員國所應出之陸海空軍兵力，組織國際軍，以保護國聯盟約」。

遇有非國聯會員國對會員國施攻擊時，第十六條的保護規定同樣有效力（第十七條）。再者，倘遇兩個非會員國發生衝突時，行政院亦得「採取適當之手段並制定適當之辦法以防止敵對行動並解決紛爭」。

各種爭端的和平解決

國際聯合會在成立後的最初十二年中，曾經被請求審理三十多件政治的爭端，其中大多數大抵為大戰的遺物。照例所有事件由行政院處理，但有幾件是提交大會，大使會議或常置國際法庭的。若干爭執，有如一九二三年意大利與希臘之間對於幾個意大利官吏在希土被害的案件的爭執，實際上是對於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其他的比較不大重要的，如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芬蘭與蘇俄之間對於待遇東部卡累利阿（Karelia）的居民一事之爭執。有幾件，包括波蘭與立陶宛兩國對於維爾那（Vilna）的爭執，匈牙利與羅馬尼亞的「國籍選擇者」（optants）之困難問題，國聯皆不能解決。自全體觀之，誠如我們所能料到的，國聯在牽涉小國的事件上已能更有力地發展其使命。大國似乎認國聯的調查為侵犯它們的主權，它們也更能加各種方式的壓力，使結果有利於己。

引起行政院注意的第一批爭執（註）之一就是關於阿蘭羣島（Åland Islands）的，該島位於瑞典與芬蘭

之間，並控制着波斯尼亞灣（Gulf of Bosnia）的進口。芬蘭和阿蘭羣島（其人口在一九二〇年爲二七、〇〇〇）皆曾一度屬於瑞典，但在一八〇九年，就歸於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前，俄國以之爲單個行政區域而統治之。此後，當芬蘭宣布獨立時，該國即將其統治權伸展至該羣島。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瑞典承認芬蘭的獨立地位，對於阿蘭羣島不作任何保留，雖然該羣島的居民大半爲瑞典種並通用瑞典的語言。

（註）此處所討論者外之爭執都是提交國聯解決的，此當於述及各關係國之歷史時連帶討論到。

但過了幾個月後，阿蘭人要求自決的權利，開始運動與瑞典合併。他們所着手的兩次非正式的民衆投票，表明大多數人贊成歸順瑞典。瑞典政府並未給與分離派運動任何幫助，但瑞典人民卻表示對於此事有極大的關心，尤其是當公然的叛變似乎不免的時候。芬蘭人終於派遣軍隊到該島，並逮捕了兩個主要煽動者。於是瑞典人要求本國政府採取斷然行動，有一個時期簡直像戰爭。可是在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九日，那時芬蘭尚未加入國聯，英國就行使盟約所定的「便宜權」，促秘書長德魯蒙德對於此事加以注意。

在七月間，行政院召開會議於倫敦，並命爭執者雙方各陳述其相齟齬之點。芬蘭的代表說道，這件事純屬內政性質，瑞典在承認芬蘭的時候並未插入關於阿蘭羣島的任何保留條件，因之戰爭的危險是不存在的。瑞典的代表則指出，阿蘭人顯然願與瑞典合併，瑞典在任何方面都沒有援助分離運動，而行政院自有各種權利來考慮這件事，因爲它顯然危及和平。他主張舉行民衆投票，作爲解決之法。這個局面因大家不能決定一八五六年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的規定（依此規定，阿蘭羣島乃經解除軍備）是否仍有效力而更趨複雜了。

難之點集中於摩蘇爾州之處置，那個地方富有煤油，雙方都要據爲己有。在穆德魯斯停戰協定（Armistice of Mudros）（一九一八年十月）成立的時候，英人祇佔領了該州的南部三分之一，但在以後數月中，未經土耳其的任何挑釁，他們向北進展了約九十五哩。此刻英人要求以上全部的占領地，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六日，他們向國聯提出申請。他們又利用這個機會要求摩蘇爾之北，哈喀利（Hakkari）州的一部分。

英國在對行政院申訴之中，力言伊拉克需要所爭之地以爲天然疆界，並以供給無限制的穀類產額。表面上煤油與此事沒有多大關係。土耳其人那時在國聯研詢期中已得到出席行政會的權利，他們則提出異議，以爲該地在大戰期內從未被征服過，而摩蘇爾的人民大致都贊成歸土耳其管理。

當國聯正在聽取雙方的意見的當兒，兩造同意維持邊境的現狀。不幸兩國對於現狀的解釋，各異其說，其結果邊界上發生許多麻煩的事件。這個危急的局面，使行政會不得不於一九二四年十月在布魯塞爾（Brussels）舉行特別會議，藉此劃定了一條暫時的界線，以待最後的判決。一面叫土耳其負責維持此線之北的秩序，叫英國負責此線的南部。這條臨時的疆界，不期而與英人在停戰後的最遠的軍事占領線相合。

當這個時候，國聯已經派定了一個調查團，以瑞典人、匈牙利人及比利時人各一人組成。這三個團員先到倫敦聽取英國的陳述，然後到安哥拉（Angora）徵求土人的觀點；在一九二五年之初，他們蒞臨爭執的地方。在從事徹底調查的時候，發生幾次騷擾的事件，到一九二五年九月，該團將報告提出於行政院。

那件報告書確認土耳其在摩蘇爾州的主權，並說明英國和伊拉克都沒有以戰勝要求該地的權利。然而，行

政院如果以土著的最善利益爲決議根據的話，該州就當劃歸伊拉克，惟英國對於該王國的統治須展至約二十年之期。除非英國的監督權仍舊繼續下去，伊拉克會感受非常的混亂。摩蘇爾的人民在土耳其的統治下或者能過些比較好的日子。報告書暗示着該地居民大多數贊成英伊兩國的共管，但主張土人所提議的民衆投票不當實行，因爲該地的人民太落伍尙不够投票程度。再者，如果行政會決定袒護英伊一方，則在道義上應予該委任統治地以可資防衛的疆界，這就是說，應該給它英人所要求的全部區域，或至少布魯塞爾會議所定之線的南部地方。

當西班牙、瑞典和烏拉圭在行政院的代表奉委研究這些建議時，世界法庭亦被請貢獻對於土人所提下面兩點的意見：（一）行政院的決議是否將被認爲仲裁的判斷，或建議，或祇是調停？（二）單單行政院的過半數表決就會使最後的判決發生效力嗎，要不要經過全體一致的表決，爭執國的代表是否享有投票權？世界法庭所表示的意見，謂根據洛桑條約的條款，行政院的決議對於當事國兩造都有拘束力；最後的決議應經全體一致通過，但不將爭執國之票算在內。緊接着這項宣告就有摩蘇爾發生新的騷亂的謠言，行政院於是派了一個特別調查員，一個愛沙尼亞國的將軍，到那裏去調查。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他提出了一篇不利於土耳其人的報告。

六天後，行政院再開了一次會，這次是來處斷爭執的。土耳其代表拒絕出席，以說帖說明他未經本國政府認可來參與這個處置，因爲它是基於土耳其不能否認所提出的任何解決法之說的。這種固執的態度，連同調查員的不利的報告使土國的主張失敗，行政院馬上通過了判決，將袒護伊拉克的調查團的意見也併入判決書規定

布魯塞爾會議所定的界線應成爲土伊兩國的永久疆界，英國應取相當步驟延長其對伊拉克的委任統治權二十五年，惟該王國提前加入國聯爲會員國時不在此限，再者，對於古的斯坦的少數民族，應給與委任古的斯坦人爲地方官吏，並使用古的斯坦的語言文字於其學校之保證。

英國和伊拉克自然馬上接受這個判斷，接着在一九二六年訂立延長英國的委任統治權二十五年的條約。三月，行政院正式注意這件協定並確認其上年十二月的決議。土耳其當然很憤怒。它漸漸非常懷疑國聯，並與俄國接近了。可是英國竭力想和它修好，於是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兩國商訂了一件條約，把摩蘇爾州的一小部分重新讓與土國，訂正的疆界被承認爲最後的定局，而摩蘇爾油田的若干使用費也經確定給與土耳其。

在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行政院在防止拉丁美洲所發生的一件國際事變擴大爲戰爭中，又占了一個顯著的地位。先是是年十二月八日，報章上宣布，大廈谷（Chaco）已發生武裝衝突，這塊地方是玻利維亞（Bolivia）與巴拉圭（Paraguay）兩國爭執很久的廣原區域。嗣後記載敵對行動之發展的電訊斷斷續續地常見於報上，似乎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玻利維亞共和國（它認爲本國是受不當的侵略的犧牲者）拒絕阿根廷（Argentina）及恰巧在華盛頓開會的「汎美仲裁與和解會議」的調停之後。

幸而國聯行政院預定在十二月十日舉行會議，而大廈谷的爭執馬上被列入議程，雖然兩造都沒有將此事提出於國聯。行政院迅速地發出通電，表示行政院「深信簽字於盟約之兩國，既已矢言力求以和平方法解決彼此間所發生之爭執，自當憑藉此種方法以遵守其國際之義務，並當在目前之情形中表示，其甚願意維持和平

與解決紛爭」。

兩國的答覆皆謂它們並無有違背盟約義務的意思，但玻璃維亞堅持有要求滿足的權利，並得採取必要的防衛手段。事實上，在第一次驚人的報章消息披露後十日內，兩國都同意於接受汎美會議的斡旋。汎美會議派定了一個調解委員會，它不久就解決了直接的爭執。

戰爭就這樣避免了，但因爭執的基本癥結仍舊存在，所以到一九二九年五月，又發生糾紛。在兩國與日內瓦之間交換了許多電報之後，前者重申和平的意向，並允在會議桌上而不在戰場上解決它們的根本的困難。卒之，玻璃維亞與巴拉圭的代表會晤於華盛頓，訂立了兩國互不侵犯的盟約。

用烏拉圭（Uruguay）派往行政院的代表的話來說，國聯在這件爭論中所採取的行動，即「承認拉丁美洲為構成國聯的一個整個部分。（它足以）消除一般人所感覺那種真正的變則的事情，即相信，儘管美洲各國為國聯的會員國，國聯似乎對於有關美洲的問題不採取任何行動……這種行動已發生使美洲更接近國聯的效力」。（註）

（註）玻巴的衝突在一九三二年重新開始，國聯、美國及南美諸邦中數國又進行設法防止戰爭。

土地的管理

我們當記得，凡爾賽條約曾加國聯以國際統治薩爾盆地與但澤自由城的責任。所以在一九二〇年之初，行

政院就設立了統治這兩個區域的必要機關。就薩爾而言，和約規定應指定一個統治委員會，以委員五人組織之。一爲生於法國且爲法國之公民者，一爲該地之土著，三爲法、德以外三國之公民。其任期皆爲一年，滿期後得連任。行政院在它的第二次會議任命了這五個委員，到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各該委員卽行就職。

統治委員會中的法國代表卽主席牟爾特 (Rault)，他是里昂 (Lyon) 的前任市長並且是一個頑固的愛國者。薩爾的委員爲波哈 (Boch)，一個極有才幹的地方官吏，其餘三個委員則爲一個比利時人，一個曾在巴黎居住二十年的丹麥人，和一個加拿大人。波哈非常討厭他的同僚對於一切問題所取的親法態度，所以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就提出辭職。其繼任者卻爲極願與主席合作的人。所以，統治委員會在其行政的起初六年中，很難稱爲不偏不倚的機關。

該委員會於第一次告薩爾居民書中，力言決定「嚴格實行凡爾賽條約的條款，並在文字上和精神上大家尊重這些條款」。此外，該地居民受着如下的告戒：「他們應下極大的決心來尊敬其長官，（本委員會）當毫無畏懼地鎮壓一切擾亂或炫惑民衆的企圖，不問其來源爲何。決不容忍公然的暴動，陰謀或消極的抵抗。和約並未聽任本委員會無必要的威權而施治，所授予的權力當准許本委員會致力於其任務，不受一切無益的和犯罪的反對之爲難」。可是結語卻使當地的人得到安慰，蓋該委員會許諾，所有官吏於行使其職權時本於「國際聯合會依以成立的原則」。

和約所給與法國在薩爾的特權卽：在關於該地礦山（這已經轉讓於法國）之採掘時以法國貨幣代替德

幣的權利，爲法國礦工的兒童設立學校並以法文教授的選擇權，及將薩爾盆地完全併入法國稅關系統之內的特許。反之，土人則得到若干種保護的保證。他們有權向國聯行政院提出對抗當地統治機關的申訴。凡在停戰時施行的法律，如未經居民所選舉的代表同意，統治委員會不得修改之。治安的維持則專委託於特爲此事而編制的當地憲兵隊。

薩爾的人民不單因法國之行使其法定權力而感受困惱，他們並且對於委員會有各種的不平。舉例來說，代表的選舉一直遲延到一九二二年三月纔舉行；選舉之後，人民的代表組成一個參事會，但統治委員會在幾種最重要的行政方案上，並不徵求他們的意見。對於可以引誘他們來入法國學校讀書的德國兒童，予以各種特權。再者凡遇土人草定訴願書時，必以之經由統治委員會轉達國聯行政院，委員會就得減少其中的種種反對論調。當法國政府向宰爾特抗議在該盆地徵收苛重的煤稅時，稅率即得優渥地並迅速地減輕。最後，儘管和約有關於編制當地憲兵隊以維持治安的規定，約自五千至八千的法國軍隊仍常川駐紮在該地。

在一九二三年，當德國的礦工爲表同情於魯爾（Ruhr）（那時該地正爲法國軍隊所佔領）的本國工人而罷工時，委員會開始用嚴厲的鎮壓手段。派遣偵察員勸阻工人上工的舉動，在所禁止。凡發反對國聯之言論者，即犯刑事罪。新聞界很有效地被箝制。正因爲委員會祇對國聯而不對居民負責，又因爲宰爾特每次總出席於討論薩爾問題的行政院會議，該地人民通常很少機會來得到一個公平的裁判。然而在這一一次，他們的抗議非常嚴重，以致英國也出來要求國聯舉行調查。

行政院似乎老是信任統治委員會的每種行動而加以認可，同樣的精神，亦見於着手一九二二年之調查方法。行政院很小心地避免調查之名。委員會全體都被邀請來參加討論薩爾的會議，而行政院的代表質問這些委員的時候，也很客氣。在議程進行之中，牢爾特承認委員會在巴黎設有辦事處，法國軍隊接受他們的協餉並奉行他們從法國發出的命令，再者，本人既為該統治委員會的法國代表，就覺得有增進本國利益的義務。

行政院故意不表示對於牢爾特的活動的批評，祇提議法軍最好撤退，而代以當地的憲兵隊。儘管這樣把事情洗刷得干淨淨，統治委員會之為公正的國際官憲的威信失墜了，在一九二三與一九二四年，它的委員資格全被修正。一九二六年，牢爾特辭職，繼任為主席者是一個加拿大人，接着又去職而代以英人威爾頓（Wilson）爵士。這幾次變動不單減少了薩爾居民的敵愾心，也消除了德人的憤恨，因為後者自然表同情於其苦惱的同胞。

在一九二七年，又發生關於駐在薩爾的法軍的問題，因為國聯的一九二三年之建議僅使一部分法軍退出。此刻德國既成為行政院理事之一，所以此事發生幾次猛烈的討論。結果大家商定法軍應即召回，代以緊急時之鐵路防護軍八百人，該軍之兵士當從占領萊茵地的英法比之軍隊中招募之。這樣一來，「薩爾駐屯軍」就被解除了，而法國將來所可派往該地的人數也被限制了。

依照和約，薩爾的將來永久地位當於一九三五年以前所有居民，在該地與德國脫離時達投票之年齡者之投票決定之。爲了這個緣故，國聯曾在一九二二年命令一個主簿委員從事搜集必要的關於投票的統計材料，並以之呈報國聯。雖然這個辦法曾經在和約中規定以求法國滿意，法國卻在一九二九年宣稱願意放棄民衆投票，並

與德國根據其他條件解決這樁事。因有此項宣言，兩國代表乃開始談判，目的在將該盆地早日歸還德國。如果代表的勞力不致虛擲，國聯的統治該地的工作即將告終。（註）

（註）關於但澤自由城的統治，見第十七章。譯者按，薩爾已於一九三五年經公民投票交與德國。

委任統治地和少數民族

根據盟約第二十二條，國際聯合會當負為住在舊德屬海外領地（膠州除外）及前土耳其帝國在阿拉伯半島所轄土地的民族謀幸福和發展之責。幾個較文明的國家，由國聯委派為委任統治國來代它行使保護權於這些比較退化的區域。委任統治國當每年造具行政報告書，以之提出於行政院，國聯本身則組織一個常置委任統治地委員會來審查這些報告並在關於委任統治權之遵守的一切事件上，對行政院貢獻意見。

各委任統治地依照它們發展之階段，地理上之地位及其經濟狀況之水準分為三類。甲種委任統治地被放在第一類中，這類包括前屬土耳其帝國的地方。這一集團被認為已「達到可暫時承認其存在為獨立國家的發展階段，惟須受關於行政的勸告及委任統治國的扶助，至其能真正獨立時為止」。在乙種委任統治地中，包括有前德國在中非洲的屬地。這些屬地被認為需要一定的政治督監，其自治希望尚屬遙遙無期。丙種則有德屬西南非洲及曾一度為德所轄的太平洋島嶼。對於各該地方及島嶼，「因其人口稀少，或幅員不廣，或離文化中心太遠，或在地理上接近委任統治國的領土，或其他情形」，則認為「最好根據委任統治國的法律，視為其版圖之整

個部分而統治之』惟須妥爲土著人民謀利益。

因爲盟約中未述及委任統治國的國名，也沒有說到分配這些地方的方法，所以此種詳細節目當於各關係國的特別會議中商討之。乙種與丙種委任統治地的分派，於一九一九年由和會的四巨頭辦理。在丙種中，德屬西南非洲被派給南非聯邦；德屬薩摩亞(Samoa)給新西蘭；諾魯(Nauru)島給與大不列顛、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共管；(註)其他一切在赤道之南的德屬島嶼概歸澳大利亞所有，其在赤道之北者則悉予日本。乙種委任統治地之分配如下：英國取得喀麥隆(Camerons)的六分之一，多哥蘭(Togoland)的三分之一，及德屬東非的大部分(坦干伊喀 Tanganyika)；法國得到所餘的喀麥隆六分之五及多哥蘭三分之二；比利時則收受東非的西北角，魯安達——烏綸第(Ruanda-Urundi)。一九二〇年四月在聖里摩(San Remo)舉行的特別會議將甲種委任統治地作如下的分派：伊拉克、巴力斯坦和特藍斯佐對尼亞(Transjordania)歸英國，敘利亞與黎巴嫩(Lebanon)歸法國。以上這些劃分皆經國聯行政會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與一九二四年九月之間核准。

(註)表面上此島之分配於三個政府的理由，係因澳洲與新西蘭不能商定其他一種滿意的辦法。然而事實真相那是因爲該島(其面積僅有八·四方哩)之藏有約計四二〇〇〇〇噸的磷酸礦物儲量一事，多少與最後的處分有關。該島的統治權操諸三個政府所共派的行政官一人。

在一九二〇年之終，有常置委任統治地委員會之設立，它的職權在詳細審查委任統治國的報告書並向行政會提出事實與意見。在一九三二年，該委員會有委員十一人，大多數來自非委任統治國，並有一個女子。國際勞工組織的代表一人得以顧問的資格出席於該委員會的一切會議。委員之遴選係以其個人之資格爲基礎，任期

無定。雖然任何委員都不得在本國兼有職務，但爲國立大學的教授者不在此限。這個委員會的權力純粹是顧問性質的，但它以消息供給行政院，使它知道各種委任統治地的目前行政是否爲土著人民謀利益及是否依照盟約中所規定的原則。在將來，它的權力也許會增加，俾可包括下判決並直接向委任統治國提出建議之權。

一九一九年以來若干委任統治地的行政實況，當於下面專述各委任統治國的數章中討論之。但在這裏，我們可以說，委任統治的制度，在集中輿論於殖民地政府的「神聖任務」，及以受託管理退化民族的觀念代替戰前帝國主義者非法營私的愚笨觀念之中，業經證明爲有很大的價值。國聯委任統治的理論，已向着略爲更負責的「世界政治之精神」開一先徑。

除委任統治地的民族之外，約有三千萬散佈於中歐與東歐全境的少數民族也被置於國聯的保護之下。此項保護是憑藉在巴黎和會或此後不久所簽訂的一批關於少數民族的特別條約與協定而有的。大多數少數民族協定規定，凡違背對於少數民族之公認義務者，得由行政院中任何理事喚起行政院的注意。國聯對少數民族的責任是重大的，特別是因爲這種責任時常會帶點政治的姿態。行政院必須庇護少數民族使不受虐待，可是同時又得避免侵犯多數民族的主權或傷害他們的國家自尊心。國聯這一方面的事業已經常常受到不利的批評。行政院爲補救若干弊端計，曾於一九二九年修正它應付少數民族之爭執的辦法。設立了一個少數民族委員會，以行政院的院長及院長所遴選的代表兩人組成。所賦與這個委員會的職務，即爲決定關於少數民族之權利的問題，應否提出於行政院。委員會與各關係國政府之間的一切交換意見，必經由國聯秘書廳的少數民族組

傳遞，後者並須負責搜集關於全部少數民族問題的切當材料與報告。一直到現在，行政院所常爲者不在對少數民族問題下判決，但在指出和解與妥協的途徑。

國際聯合會的價值

盟約所加於國際聯合會的任務，除上面已經述及者外，還有很多。國聯會以有價值的經濟助力給與中歐的窮國及巴爾幹諸邦。它在保障國家安全的組織中與裁減軍備的運動中占了一個顯著的地位。那些雖不十分壯觀而爲非常重要的工作，如在預防醫學、流行病學、國際法之編纂、販賣婦女兒童與鴉片業之禁止、及對於奴隸制和強迫勞動制之反抗等等範圍之內者，都是藉國聯所轄機關來完成的。在它的主導之下，又做了很多事，如增進國際的文化合作，便利國際的運輸與交通，調整全世界各種衛生組織與科學團體的事業。它替人類的無數活動範圍帶進了系統，永續性和效能。

也許國聯的最大貢獻，即爲傳佈國際合作觀念之影響力。今日一般人能够注意世界狀況與世界問題的存，在和打消舊日的純爲國家的與孤立無援的種種困難的觀念，國聯比任何機關都有力量。單是有定期地集全世界的代表於一堂，使代表知道他們各別的价值與前途之希望，就是一個顯然的進步。萬國聯盟的概念是舊的；但國際聯合的實際存在是新的。目前所需要的是贊助與鼓勵，而第一是合作。國際聯合會是世界各國所造成的東西——不多，也不少。

第七章 賠償

起初四年（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

我們已經看到，在巴黎和約中，協約國要求中歐同盟國，特別是德國，完全賠償大戰期中所加於協約國平民的財產損害，並負擔協約國預算中因戰事所增之兵士扶養金與分離津貼，因為它們認為中歐同盟國應負戰爭的全責。照這樣看來，戰罪與賠償分明是連在一起的。

估定損害賠償額及擬定償付方法，是和約賦與特設的賠償委員會的任務。這個機關由美、英、法、意及其餘協約國所派代表各一人組織之。可是因為美國未曾批准和約，所以沒有美國的委員。有一個比利時人被選為委員以代表各小國。在英、法兩國爭欲操縱賠償委員會的短期勾心鬭角之中，法人終得勝利。各委員應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前聽取並通過協約國所提出的賠償要求並規定其總數字。在這個期間德國應以金幣或其等價物分期交付二百億金馬克，那時每一個馬克值美金二三·八二分。

當賠償委員會從事審議的時候，協約國的政治家開了許多次會議來決定賠償收項分配的比例，並企圖不願委員會而自行商定一個賠償的總數字和償付的方法。在一九二〇年七月的斯巴會議席上，大家議定了分配

百分率，法國應分得收項總額五二%，英國得二二%，意大利得一〇%，比利時得八%，其他一切要求國則得所餘的八%。在後來一個會議中，又決定向德國提出請付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清單，但這個數目太大了，甚至連協約國的專家也大為喫驚，所以沒有逼迫德國接受。

當一九二二年一月間，德國聲稱它已以煤、車輛等物完全償清協約國所要求的二百億馬克，但此外的款項當待最後的賠款總額確定時再行支付。賠款委員會馬上調查此事，結果宣布德國的話是假的，並且是根據於將所交貨物的價格故意擡高一舉動的。照委員會的意見，德國的付款尙短少二百億元的百分之六十。因為沒有中立的仲裁機關來調解雙方的爭論，所以協約國與德國交換了很多無效的文書。到後來賠款委員會畢竟執行其權力，宣布德國故意違背條約義務。

戰敗國這一次和其他各次的近乎公然反抗的態度，激起協約國政治家的忿怒。尤其是勞合喬治，他在三月間指稱德國之供獻賠款簡直是一種「侮辱和惡作劇」。爲膺懲德共和國的大膽無忌起見，協約國的占領地帶當伸展至萊茵河的東岸，以包括重要的工業中心地如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杜易斯堡（Duisburg）和魯洛耳特（Ruhrort）（三月八日）。佔領區域的四周圍有抵制德國出產品的關稅壁壘，對於輸入協約國的德貨並抽重稅。

七星期後（四月二十八日），賠款委員會宣布德國賠償的總數應爲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即大約爲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譜。雖然這是得到正式核准的最低數目，但已三倍於和會的

經濟專家所提議的數字了。協約國不期望德國馬上交清全數，但依後來所擬定的「倫敦表」(London Schedule)，德國當付規定的年金五萬萬元，再加上相當於對其出口貨所徵百分之二十六的稅款的不定年金。關於發行三種公債以助債務之清償的專門細目亦經規定。最後的計劃於五月五日送達德國，六天後，協約國以占領魯爾區域相恫嚇後，衛特(Wirth)總理的政府終究接受了這個賠款表。

爲應付每年去而不歸的幾萬萬元支出起見，德國顯然需要有利的貿易差額。可是情形正相反，在大戰後若干時期，德國的貿易差額是不利的。巨量的原料必須從海外購買，以便補充已在大戰時耗盡或失去的存貨。因爲這些輸入品決不能立刻再輸出製造品來十足付價，遂使大部分本不十分充足的現幣不得不流出了。復因國內有些富翁如斯丁尼斯(Sinnes)等人急急將其盈餘金投資於外國證券以免政府加重稅於己身，現金的缺乏就愈感劇烈。德國在國際市場上的信用復一落千丈，以致外國都不肯貸款於它，而國外的匯兌又須以高價來償付。預算之得保持均衡祇靠大規模的通貨膨脹，而政府每次總是借外幣來償付賠款，馬克的價值也愈降愈低。

依有些專家的意見，德國雖有以上種種困難，如果它真有誠意，如果協約國也願意來幫助它，它還是能够履行其義務。無疑地，德國顯然缺乏付款的意向——這一半可歸因於規定的年金甚至不能與賠款總額的每年利息相償一情形。換句話說，無論德國如何忠實地付款，所負債額每年仍有增加。而協約國一方面也毫無意思來設法增進德國的國際信用地位或扶助它的貿易。

即使是如此，第一次的二萬五千萬元攤付金仍得於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立刻付出，雖然那時馬克的

價值續有降低，紙幣的印行更爲加速。德國因此請求在一九二二年付款時延期付款。一九二二年三月，協約國給與一部分的延期付款權之期限，並答應它以貨物來付償若干未延期的應付之款。每月的交付數業經排定，並因有七月十五日之付償而將付款表加以修正。因爲馬克到現在已降至比其票面價格百分之一還少，賠款委員會乃准許德國停止續行付款，接受其短期國庫券以爲替代。然而德國繼續要求兩年的全部延期付款權——至一九二四年之終爲止。

德國這個請求促成了兩重的暗關，一爲德國與協約國之間的，一爲英國與法國之間的，或說得更明細一點，英首相勞合喬治與法總理普恩加齊之間的。英人記得德國在戰前是他們的最好的主顧，也就漸漸感覺到德國之經濟崩潰祇有增加英國的經濟恐慌。因之勞合喬治切於重開德國的市場來銷售英國的貨物，乃準備立刻答應德國的延期付款的請求。

反之，法國人非常冒火。他們覺得不高興，因爲第一步就沒有給他們十足的損害賠償額，此刻又要他們再等兩年，收不着一個子兒。他們估計在過去兩年中法國已每分鐘耗費五七〇〇元於復興工作和兵士扶養金，而德國每分鐘祇貢獻了三八一元的細數。所以普恩加齊祇在德國肯提供「有好結果的保證」（即將萊茵地的礦山與染料工廠的管理權轉讓法國）一條條件時纔答應延期付款。但因勞合喬治無意於讓德國的經濟生命再趨崩潰，所以一九二二年的其餘幾個月都在倫敦、巴黎和柏林之間連續不斷地交換文書中度過。最後，普恩加齊決意使用「大棒」，因爲他相信，祇要德國願付，它就能付。

根據凡爾賽條約的條款，德國故意不履行其義務時，協約國可採取斷然的強制手段。普恩加齊於是急急忙忙地詳查付款的紀錄來搜求德國的違約之處。他不久在木材一項中找到了德國欠交十四萬根電信桿。後來他又發現煤與牲口兩項的交付額有短少。他馬上通知賠款委員會並命犯人說明一切。德國自辯此項短少是暫時的，且非故意的，這是因為本國鑒於通貨行情不穩且趨降落，必須與木材公司訂立新的契約之故。英國委員幫着德國，提出熱切的抗議，據說他指委員會的處置為特羅埃（Trocy）城的「木馬計」以來最大的木材怪事。但委員會不顧英國委員的抗議，仍宣布德國於電信桿一項上有違約之處。此後不久，又宣告它總違約之罪。

在一九二三年一月，法比意三國的軍隊進占魯爾區域，一直最東到多特蒙德（Dortmund）。有幾隊法軍不是白種人。該地的行政則委託於一個國際機關，其名稱依其法文第一字母為M.I.C.U.M. 英國的皇家法官認為這種占領是非法的，英國因此拒絕參加此項盲動。

魯爾正是德國工業的中心，該國的煤、鐵、鋼有百分之八十出產於那兒，其鐵路運輸業亦佔全國的百分之七十。所以經此佔領，法國實際上斬斷了德國的經濟命脈，可是它同時還要德國繼續付款。

德國人自然因這個事變痛恨益深。他們雖不能戰，但開始實行消極抵抗的政策，各界人民的代表，自主要的實業家至飢餓的激烈派，都來參加。這個嚴重的局面使德國一位著名人物批評道：「使德國人民團結者有兩個人——一八七一年的俾士麥和一九二〇年的普恩加齊」。

儘管佔領軍如何粗暴和殘虐，魯爾的居民堅決地拒絕奉行侵略者所頒發的命令。電話、電報和鐵路機關均

告停頓。工人離開工廠和礦地。新聞紙不肯公布法軍和比軍的布告。地方官吏不聽外國的號令。人民以堅固的忍耐心順受徒刑，並以輕蔑的態度拒絕爲外人服務，雖有報酬，亦毫不爲動。結果該區的許多德國市長都被監禁起來，不到一年工夫，有一四七、〇〇〇土著不是被放逐，就是自動離開魯爾故居，遷徙到德國其他地方。

復次，德國政府停止一切付款，禁止魯爾居民與侵略者交易，並以衣服、食品及大批印好的紙幣接濟罷工的礦夫與工人。結果法人不得利用其軍隊來掘礦和開車，但少有成效。這些法國人覺得很難運用德國的機械，因之發生很多不測。在佔領期間中，法國實在祇得到了一九二三年前同時期內所得的魯爾之煤量四分之一。在憤怒與絕望之中，侵略者宣布戒嚴，禁止魯爾貨物輸往德國，奪取私人的和公共的款項，並從事大掠。血也流了，被殺者約一百人，重傷者一百五十人。

當這個時候，馬克繼續猛跌，在八月間，一塊錢值至五百萬馬克。無疑地，德國人所以拚死命來從事這種力不相俾的苦鬪，其原因可以從他們的信念中追求之，他們認爲普恩加齊之關心賠款，不如他關心「魯爾煤與洛林鐵之聯姻」一事之甚，因爲法國北部煤礦所產的煤不適於洛林的鐵礦苗。這個「聯姻」的計劃實際上已在法國衆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達里阿克(Daricac)於一九二二年五月向普恩加齊所提出的私人報告中熟慮到。

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之冬，法人和比人企圖在萊茵地建立兩個分離的國家，忠於德國的居民稱之爲「手鎗共和國」(Revolver Republics)爲了這個目的，不安分的工人和急進黨員，以及釋放的犯人和暴徒都被從德國全境輸入萊茵地，並被鼓勵着來宣布該地的獨立。但在這裏又碰到英國的強硬反對，更不必說那

些義憤填膺的土人，於是法人覺得還是罷手爲善策，乃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停止幫助這種運動。那般不幸不能在法國的保護下趕快逃走的分離派人，受到愛國者的虐待。

在未被佔領的德國地方，一九二三年中的情形幾乎成爲同樣不可容忍的。破產和崩潰的現象發見於經濟的水平線上，政府迫得祇好於完全降服或總瓦解兩途中任擇其一。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柏林當局宣布立刻並且無條件停止消極抵抗。普恩加齊顯然勝利了，但勝利的代價是很高的。和英國友誼的幾瀕破裂；各處的中立意見被法國的暴躁政策離開了；而德國賠款之全部停付，連同外國對於法國的方法之不信任，使佛郎的價值一落千丈。所以法國認爲最好還是馬上重開談判，並採取了一個建議，指定一個不偏不倚的國際專家委員會，以便研究德國付償能力的問題，並造具關於全部賠償問題的報告。委員的人選當爲經濟學專家而非政客，所造具的報告書當根據於事實而不基於情感。雖然設立專家委員會的計策此時是德國提出的，但它早由美國國務卿休士 (Hughes) 於一九二二年規劃過了。

專家 (道威斯) 計劃 (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

遴選一羣經濟學專家來討論賠款問題的任務，委託於賠款委員會辦理。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賠款委員會指定了兩個委員會：第一個，以美、英、法、意比各國所派代表各兩人組織之，其工作在研究並報告關於平衡德國的預算並穩定馬克價值之途徑與方法；第二個，以上述五國的代表各一人組織之，其工作在估算業已輸出的德國

資本之總數，並想出將這些資金拿回德國來的方法。

這兩個委員會於一九二四年一月開始工作，在柏林與巴黎兩地進行調查，並於四月九日向賠款委員會提出報告。那個較小的委員會，在英人馬甘那 (McKenna) 主席之下，報告道，在一九二三年之終，投於國外的德國資本數達一、六八七、五〇〇、〇〇〇元，同時德國保有約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外國通貨。至於其餘的資本，這個委員會僅僅是認較大的一個委員會的意見。那個較大的委員會，在美國理財家道威斯將軍 (Charles Dawes) 主席之下，造具了一篇詳細而綿密的計劃書，共達一百二十四頁。

草擬這篇道威斯或專家計劃的委員，乃以「商人切於得到有效的結果」的態度從事他們的工作。他們是用取得債務而非科罰的見地來觀察賠償問題。他們相信，「因大戰的結果，既然德國的債權人都在視其能力繳納稅項，所以德國亦應視其能力繳納稅項」。雖然這些專家，祇負尋出平衡德國的預算並穩定其馬克價值的方法之任務，他們自然必須規定包括於常年預算案的籌度中的德國賠款的數額。委員會在研究各方面的情形之後，得到一個樂觀的結論：德共和國「富有財源並具有開發這些財源的方法」；它如果能克服了信用的萎縮，就「能够在世界的競爭中恢復有利的地位」。

摘要言之，專家計劃包括下列的建議：(一)經濟的和財政的完全主權當歸還於德國，這就是說，軍隊應撤出魯爾；(二)應設立一個中央發兌銀行 (Reichsbank) 以為賠款的存貯處，補助之資本定為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有五十年發行紙幣的專利權，其董事會由七個德國人和七個外國人組織之，以外國董事一人為主

席(三)交付之賠款第一年應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以後四年之期中漸增至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之「標準」年金(四)此項標準，將來可按照以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之基本時期爲根據而計算的「繁榮指數」之漲落提高或減低之(五)德國應立刻訂借外款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六)賠款的來源應爲運輸稅鐵路公債工業社債及來自酒精、煙葉、啤酒、糖類和關稅的有擔保的預算國課(七)爲監視德國對本計劃之施行起見，應派定一個賠款總代理人(外國人)。此外，並以移交委員會及外國特別委員會數人襄助之，來掌管有擔保的稅款、鐵路、鐵路和工業公債及發兌銀行。

賠款委員會接受這個報告，作爲解決賠償問題的基礎，並以其決議通知德國(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德國於五日之內贊同這個計劃，接着英、意、比三國也在一週內表示同意。法國獨持異議，直至五月選舉結果，普恩加賽下台，較溫和的赫里歐(Herriot)爲總理時爲止。於是各國在七月間舉行會議於倫敦，來草擬提早施行專家計劃的議定書，因爲那般專家曾經提出警告，反對「無故延遲該項計劃之施行」。

會議的進行是不很順利的。在英、美兩國的代表能够以「准許任何國家將來爲自己的利益而使用軍事的制裁是如何不宜」這層道理使法人認清以前。有一場激辯。結果大家決定，嗣後這種制裁當單用於德國公然違背其義務的時候，並且祇可以由各協約國舉行特別會議後的一致行動來實行。祇能以賠款委員會的一致表決，纔能宣布德人違約。

一九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前項議定書於倫敦經各國代表簽字，施行專家計劃的必要法律亦在德國公布。

次日道威斯計劃即發生效力。魯爾區域之撤兵馬上開始，到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該區域內已無一外軍。在簽訂凡爾賽條約以來所經過的許多年中，歐洲的外交緊張局面之得鬆弛，這是第一次。

在總代理人美人吉爾勃 (Gilde) 將軍的監督之下，專家計劃的運行，頗有轉好之望，德國的商業漸漸復元，賠款之交付至為迅速，一般人對於德國的將來，亦恢復了信任之心。照這樣情形看起來，德國似乎連那鉅數的「標準」年金，也終能泰然付償。(註)

(註) 道威斯計劃中所定交付之款，及其最初五年中之來源，有如下表(單位為百萬馬克)：

來源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鐵路債券	二〇〇	五九五	五五〇	六六〇	六六〇
賠款公債	八〇〇				
運輸稅		二五〇	二九〇	二九〇	二九〇
工業社債		二二五	一五〇	三〇〇	三〇〇
鐵路股票之出售		二五〇			
普通預算			一一〇	五〇〇	一二五〇
特別預算之賦稅			三〇〇		
合計	一〇〇〇	一三二〇	一五〇〇	一七五〇	二五〇〇

雖然，我們即不必為財政家就可以覺得專家計劃祇是一個暫時的解決法。它有若干極顯明的弱點。道威斯

委員會並未規定賠款的總額，因為它沒有這種的權力。所以在技術上講，賠款委員會在一九二一年五月所定的總數，而（二）德國在不知道付款的程序將維持多少年以前，決不願長此每年拿出鉅額的款項來。再者，計劃中所規定的非常細密的國際經濟統制之制度，是雙方所嫌惡的。

以上這些缺點在總代理人吉爾勃將軍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所作的報告中曾經指出，他說道：「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實際的經驗亦隨之累積。藉此經驗，我們更明白除非不假外國監督也不需匯兌上的保護讓德國自行責任執行一定的工作，則賠償的問題及由此發生的其他問題，都不能得到最後的解決。」此外德國還有一種不平，與賠償問題密切連接的，就是萊茵地之繼續被占領，這在各方面看來，將維持到一九三五年。

在一九二八年，關於宜求得一個更滿意的賠款協定並解決萊茵地的難局的談論，甚囂塵上。當國聯的第九屆大會在日內瓦開會的時候，德、英、法、意、日各國的代表聚首一堂（九月十六日），並一致議決派定一個國際銀行專家委員會來籌劃「完全的與最後的賠款問題解決法」。後來大家商定邀請美國加入這個委員會，在適當時期中，一羣世界的重要銀行家被選為委員，來竭力應付這一個世界的最困難的問題。

楊格計劃（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

新設立的專家委員會不久被稱為楊格（Young）委員會，這是因為主席為美人楊格所致。它的第一次會議

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在巴黎舉行。它開始就碰到一個困難的工作，因為妥協辦法當從許多非常分歧的要求中擬出來。德國主張將每年應付的賠款核減至道威斯「標準」的水平線下。法國贊成發行鉅額的德國公債來馬上清償賠款，並依照斯巴會議所定的百分率來分派所收的款項。英國希望廢止以現貨交付，因為這種辦法妨害它的製造業。德國和銀行家力請終止以政治力支配賠償問題。四月，因德國的代表沙希特（Schacht）博士堅持一個比協約國應付與美國的戰債總額稍為多一點的賠款數字，會議幾瀕破裂。

委員會花了十七個多星期工夫於聚精會神的勞苦工作之後，纔準備了一篇報告。在六月七日，這篇約有四萬五千字的文件被送交各關係國及賠款委員會。專家委員會於提出其意見之中，確言各委員係以道威斯委員會的精神來進行工作，並已設法草擬一個公平的和可以接受的計劃，「其中決定了年金之總額與付償之次數，並規定賠償之債務應自政治上的義務變為商業上的義務」。

新擬的計劃立定了約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或八、〇三二、五〇〇、〇〇〇元的總賠款清單，利率為百分之五·五，於五十八年半之時期中陸續付償之。（註）最重要者，償付年金的次數恰與協約國間未償的戰債的付款次數相符合。楊格委員會在擬定年金付款次數表之中，曾記着三個重要的原則：（一）將交付之款分爲無期限的和可延期的部分之亟宜採取；（二）繼續以現貨交付之必要，至少在最近數年內；（三）宜於擬定一個特別辦法，以便於經濟恐慌使有期限之付款必須延期時有所遵循。

（註）在實際的償付中，德國自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至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所應交與協約國之款額總計二六、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元。

最先三十七個付款年頭中所應付與各債權國的年金，平均數被定爲約四七三、七〇〇、〇〇〇元。其餘二十二個年金，平均應祇爲此數的四分之三，與各債權國的同時「付出數」相當。如此一來，專家計劃第二次把賠款與戰債連接在一起，因爲一提及「付出數」就關涉到其餘因協約國間的債務而有的攤付款。這一方面的情形又經各國代表（美國代表除外）在與楊格報告書同時簽訂的另一備忘錄中加以着重。備忘錄中許德國，如在最先三十七年之期中因各債權國享有一切戰債之核減，德國得減輕賠款負擔上三分之二，在最後二十二年中，如債權國如有任何戰債核減，德國賠款得全部減輕。

無條件的一部分年金被定爲一五七、二二二、〇〇〇元，以外國通貨按月均等攤付之。其中有一一〇、一〇〇、〇〇〇元係分與法國，「以便讓它在總年金中得到巨額的一份」。在最先三十七年中所歸於每債權國的每年平均總數規定如下：法國應得二四九、二七六、〇〇〇元；英帝國應得九七、四二四、〇〇〇元（這比根據斯巴會議之百分率所應得者略少）；意大利得五〇、九〇三、〇〇〇元；美國得一五、七四五、〇〇〇元（以償佔領軍之軍費）；其餘有要求權之國共得三二、八七二、〇〇〇元。在一九六六年後，款項之分派當與同樣之比例相近。

專家計劃中所規定的第一組年金的收入來源有兩種，即鐵路與預算案；第二組年金則完全出自預算案。據報告書上說：「鐵路公司應負一種責任，即在三十七年中應繳付一五七、二二二、〇〇〇元之直接稅（必要時

並包括運輸稅)，恰等於不延期之年金年付之數。此稅應由德國制定法律徵收之，其收項由德國政府擔保之。此項擔保之款額與年金總額之相差數應從預算案中彌補之，因此所加的負擔自第二個年金的二七〇、七〇〇、〇〇〇元之最低額增至第三十七年的四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此後來自鐵路的稅項應即停止徵收，其餘年金應從預算案中並從新設的「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中之長期存款所生而歸於德國之贏利內十足付償之。

因道威斯委員會之提議所發行的鐵路公債與工業公債應即取消，賠款委員會以及其他外人管理的機關亦應裁撤。楊格委員會堅信「償付年金的保證條件就是德國政府的莊嚴的承諾，此外不能加上任何種擔保」。為保護德國的通貨，以防因難於償付有期限的債務而致之紊亂起見，楊格計劃又規定「德國政府如至少於九十日前發出通知，即有權在到期日起兩年之內的被稱爲可延期的年金全部或一部，停止付款」。

因爲要作過渡時期的準備，並免使德國的經濟狀況受突然的打擊，委員會乃主張現品之交付應繼續十年，其數量每年遞減。在第一年中，應交付價值一七八、六五〇、〇〇〇元之貨。在第十年中，最高額爲七一、四六〇、〇〇〇元。這些交付之物當然要包括在年金總額之中，其數平均約得道威斯計劃所定現品交付額之半。在十年之內，法國當得現品交付總額百分之五四·四五，英國則得百分之二三·〇五。

其餘的工作祇在消除賠償問題的政治陰影，並準備設立一個中間機關來處理專門的細節，此種細節乃因如何把德國所付的馬克核算成爲各債權國的貨幣而起。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楊格委員會乃建議設立國際清

算銀行。

關於償付年金一事，這個銀行應為各債權國的管財人。它的職務如下：「擔任外部執行本計劃的全部工作……為收取並分配款項的機關……監督並幫助使用若干部分年金於經營商業並調集運用之」。復次，該銀行又須「為國際之運用此種款項設備種種便利，並作為增進國際金融關係之一機關」。照這樣看來，這個銀行其實就是各國中央銀行的銀行，其資本為一萬萬元，立刻繳納之數祇須四分之一。當時所希望者即國際清算銀行之設立能使信用得正當之運用，有助於「國際金融之穩定及世界貿易之發達」。

國際清算銀行有廣大的權力，包括討論關於可延期的賠款之一切問題的權限。其事務由董事會掌理之，董事會以下列人員組織而成：（一）派有代表出席於楊格委員會的七個國家的中央銀行之總裁或其被推舉者；（二）各該總裁從其本國人中所派額外之董事一人；（三）於賠款清算問題有利益關係之其他政府所提出之名單中居先十四人所選的額外董事九人以下。董事會之審議事務，當循合法的銀行業之常軌而不依賴政治手腕。

楊格計劃比一九二四年的專家計劃優勝之處，楊格委員會本身有明白的說明：

本計劃之宗旨在繼續並完成道威斯計劃所開始的工作，蓋德國之地位及其他各國之情況已使道威斯計劃除作概略的指示外，不能有所為也。本計劃因有各項規定如核減並確定德國之債務，制定累進的年金紀數法，及設立銀行以供給減輕償付年金之障礙的種種便利，已將德國之債務包括於國際債務清算之一覽表

中，使成爲不能磨滅之事實。如云本計劃不免將各債權國在道威斯計劃之繼續施行下所可預期之賠款數額略爲減少，誠不容諱言，但本計劃同時因有確定之清算辦法爲舊法之代，使債務國知其所負債務之正確限度，已將道威斯計劃所固有，且同等有害於債務國與債權國之利益的種種不定之事物（有如繁榮之指數）加以消除矣。

楊格計劃的成立，頗受外交界之歡迎，各國乃選派代表，於一九二九年八月六日在海牙開會，以便草擬施行該項新辦法的議定書。

海牙會議一直開到八月三十一日，中經休會，然後又舉行第二次會議（一九三〇年一月三日至二十日）。起初看來，似乎會議的進行將因英國的總代表，隸屬勞工黨的財政大臣司諾登（Snowden）氏之強硬態度（他反對楊格計劃的三方面）而停頓。他要求賠款中英國的一份應恢復到一九二〇年斯巴會議所商定的百分比，無限期的年金中英國的一部分應予增加，而對於以現品爲償之交付額應再加限制。但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早晨一點三十分，各國卒以實際上接受英國之要求成立了一個協定。司諾登爲本國獲得最初三十七年年增加之數約一千萬元，無限期之賠款中每年分得之數約一千三百萬元，及不准債權國以得自德國之現品交付額重新出口之禁令。

此外還有其他尙待調和的困難，但到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日，各國的代表終能簽訂一個最後議定書（Final Act），其中規定楊格計劃應於下列各項完成後立刻施行之：（一）該計劃業經法英比意日諸債權國中

任何四國批准；(二)施行該計劃之必要法律業經公佈於德國；(三)國際清算銀行業經設立。這個議定書，又以新擬的付款表追代道威斯的表(自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起)，並規定協約軍應「至遲於一九三〇年六月底」完全撤出萊茵地。(註一)最後因法人(他們震於德國的國家主義運動的再行爆發)之堅持，制裁的觀念又經議定書中的一個條款重新提起，這個條款准許各協約國凡遇常置國際法庭宣布德國故意違約時，有「完全的行動自由」。(註二)

(註一)最後一批外國兵在這個日期後若干時纔離開萊茵地，但無論如何那個有挑撥性的占領問題卒於凡爾賽條約所規定的最低時限前五年算解決了。

(註二)在這個時候，與奧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所訂的賠款協定亦告成立，每一件都延長到一九六六年。這三種協定後經合併於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所簽訂的關於東歐諸國賠款之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on Eastern Reparations)。土耳其則以洛桑條約(一九二三年)被寬免一切賠款。

最後議定書之批准發生於一九三〇年春天。祇有德國政府於獲取民衆對於楊格計劃的認可時，遇到很多困難。沙希特博士堅認爲此項賠款決不能付償，乃辭去德國國家銀行行長之職以示抗議，胡根堡(Hugenberg)博士(前克虜伯廠長及極端國家主義派的新領袖)則強迫舉行民衆投票來解決這個問題。投票的結果頗有利於政府，楊格計劃遂得施行。

這一次各國纔又得透一口氣，他們顯然覺得「完全的和最後的解決法」終究達到了。可是，在不到兩年之

內，楊格計劃所定的年金仍不得不停付。

延期付款之期限（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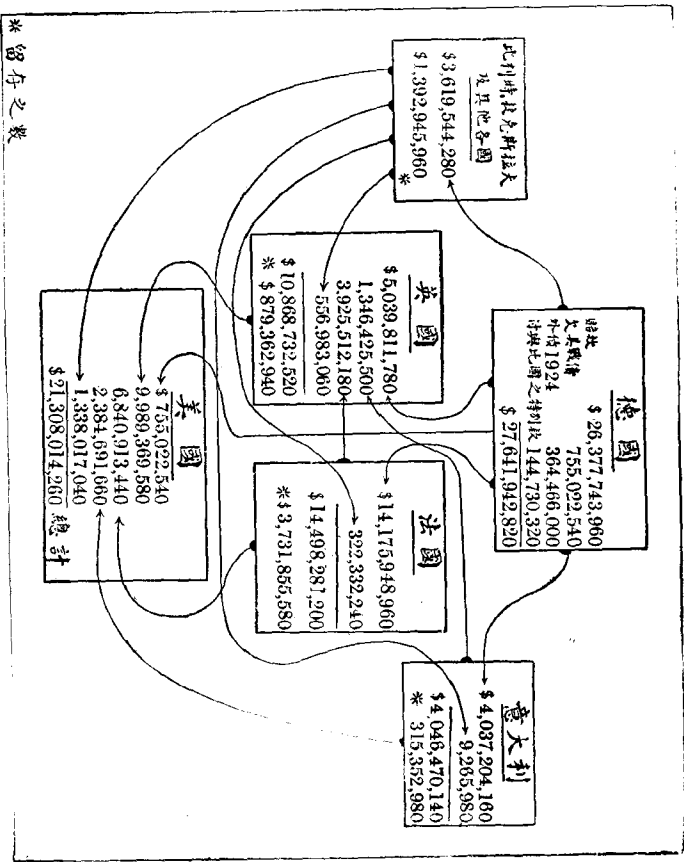
（註）關於本節的材料多係據（Lippman, W. and Scroggs, W. O.,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31, 1932.*）

在一九三〇年九月的德國國會選舉中，左右兩翼的極端派（都是反對楊格計劃的人）博得非常之多的票數。外國的投資者因之惴惴不安，結果大批現款流出德國。在幾星期內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被取去，雖然該國向紐約企業聯合會所借的鉅款頗足以穩定十一月與次年五月間的情形，但「德國的金融界之易於被擾亂」是很顯然的了。

歐洲其他各處的狀況也不見得怎樣好。全部的西方經濟組織似乎在戰後的重整的緊張之下日趨崩裂了。全世界都在長久不景氣的掌握中。救濟的方案自然是很多的，但唯一真正重要的發展，祇是創立歐洲經濟聯盟的計劃，這是法國外交部長白里安（Briand）氏在國聯大會（一九三〇年九月）所提出的。不幸這個計劃後面的動機，馬上被人發覺並非有意於復興歐洲大陸的經濟狀況，乃是在圖鞏固法國的霸權並擁護和約的處置。當時法人正在進一步增強它的邊境的防禦，並積儲鉅額的準備金，這件事實就給與了我們對於這個計劃真意的暗示。

奧國外交部長勺柏（Schöber）博士，用了極大的外交手腕向日內瓦的國聯大會勸告道，目前的局面太劇

價格計劃總年金（一九三〇—一九八八年）



*留存之數

此圖表明根據價格計劃及各協約國間債務協定之條款所預料的應付款項之流出。從這裏面可以看到大多數的款項最後俱歸美國。關於協約國所欠美國的款項的問題在第十二章中有詳細的討論。

烈了，決不容許有曠日持久的「汎歐羅巴」(Pan-Europa)談判，但走向經濟聯盟的初步計劃，應該迅速締結局部的協定來做到。他這種意見頗受歡迎，是在一九三一全年中，諸大國京城陸續舉行了許多次關於經濟與穀類的會議。然而經濟的對立和各國的互相嫉視，阻止了任何重要的諒解之成立，只有德國與奧國之間訂結了一個關稅同盟之協定。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德奧兩國同時將上述的締結條約的協定原文公佈，這個協定雖然完全維持兩簽字國的獨立，並相當尊重各該國對於第三國的義務，但同時亦稱爲它「表示歐洲經濟狀況的新制度正循着局部協定的方針在開始了」。除掉過渡時期中的少數例外外，德奧間的關稅當完全廢止。來自他國的貨物在兩國境內當課同一之稅，其稅則以共同協定訂立之。必要時，兩簽字國應與第三國商訂雖然分開的而是相同的商業條約。兩國的關稅行政各不相屬，但所有收入之款當「依額定之部分分派於兩國」。兩締約國準備「與表示此種意願的其他任何國家，談判同樣之協定」。

德國外交部長寇蒂斯(Curtius)博士恐怕發生誤會，乃說明其步驟如下：

白里安君在他聯合歐洲所有一切國家取共同行動的大計劃中所開始的企圖，除非經過長久而艱辛的努力，是不能成功的，因爲歐洲各國間在經濟制度和各種情勢上有極大的差異……如果我們訂立局部的協定，並造成各國的勢力範圍（這在後來當不難併入汎歐的大組織中），則擺在我們前面的歐陸同盟之目的就更容易實現了。德國與奧國已決定在第一個實際行動中向這條路出發……我希望，這樣做

法、德、奧兩國政府當能以極重要的姿態有所貢獻於歐洲聯邦的基本觀念，這個觀念不但注視到經濟的協商，並且注視到歐洲與世界和平的鞏固。

德、奧關稅同盟的宣布在英國頗得好評，英國的銀行家很贊成凡足以保障其外債的任何行動，但這卻成爲法國及其中歐同盟國的憤怒的原因。法國以爲此種關稅同盟不啻爲德、奧合併的先聲，乃以外交與經濟的大壓力力求阻止其完成。因之法國在當時進行頗順利的英、法、意三國海軍談判中突然採取不妥協的主張，並答應以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借款給與需款孔般的奧國，而以奧國廢棄關稅同盟草約爲條件。

當時奧國所以需要此項借款，因欲挽救「信用銀行」(Kredit-Anstalt)使免倒閉，這個銀行在外國有許多分行，管理着奧國的銀行業幾四分之三，並以股份所有權及信用墊款支配着奧國的工業三分之二。儘管形勢危亟，奧國仍拒絕這種有政治影響的法國條件，轉向英國求助。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六日，英國銀行以每隔七日可重訂的短期借款之方式墊款給奧國。一般人認此項發展爲法國外交的失敗，巴黎的當局顯然遷怒於英國。

奧國事件所發生的最嚴重的直接國際結果，就是德國的另一金融危機之騷臨，因爲「雖然德國銀行所委託於奧國的款項是它們的總資產的不重要部分，但奧國信用銀行的難關，搖動了一般人對於中歐的償付能力的信任」。有若干時期，在德國的不利的貿易差額中，它的脆弱的金融組織中，和它的入不敷出的預算中的確潛伏着恐慌。(註)

(註)德國的不利的貿易差額在一九二四——一九三一年的時期內爲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預算案中的短少之數在一九

三一年爲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同年，失業的數字增至六、〇〇〇、〇〇〇。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德共和國的短期信用借款總計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當時德國內受反動派和共產黨的困累，外遭法國的外交政策的妨害，盡力設法避免經濟的崩潰。在一九三〇年七月與一九三一年七月之間，德總理布魯寧(Bruning)有與登堡總統爲後盾，頒佈了許多緊急命令，增加捐稅，減低薪俸，扶養金和失業者的津貼，並遂行其他的節約政策，大半以教育和社會公益爲犧牲。但是，正在需要法國的好意之時，布魯寧和庫耳齊烏斯卻貿然訪問英國（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這種不合時舉動所生的不利的心理影響，連同奧國的窮困促成了新的危機。殷實的德國人，恐怕國家趨於破產，連忙投資於外國的證券，同時驚惶的美國人，荷蘭人和瑞士人也迅速地收回他們的信用借款。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中最初三星期內，德國國家銀行失去了二二七、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現幣，等於它所保有的總財產百分之四十一。到星期六（六月二十日），一般人就很懷疑德國的銀行是否會在下星期一重行開門。

當斯之際，美總統胡佛，因關心於「世界經濟之復興」，提議從七月一日起全世界停止付款一年，這包括「各國政府同所有債務之付款，賠款與救卹債務等等的本利金兩項之延期，但不包括私人所保有的政府債務」。胡佛總統在作此項宣言前，已取得內閣、國際金融專家，及主要的參議員與衆議員之同意。他又很小心附帶聲明他「毫無意思於贊成取消各國對於美國所負的債務」。

這個計劃博得美國人民熱烈的歡呼，也投合各重要國家的意思，惟法國不以爲然。法國反對的理由，則謂胡

佛的建議與楊格計劃毫無關係，後者的原狀是他們所切於維持的。因之有兩星期以上的時間，耗費於調和胡佛的方案與楊格計劃，雖然延期付款的原則因公共的同意定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施行，其最後的辦法直到五日之後纔得訂立。

胡佛的延期付款計劃之要點如下：（一）各國政府間所有一切債務付款，包括有期限的賠款到期應付之數，當緩付一年，自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二）無期限的賠款應由德國繼續付償，但國際清算銀行當將全數再行投資於政府擔保的鐵路公債，鐵路則立刻將款交還政府；（三）延期的應付數，當以十次相等的攤付金分償之，自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起；（四）對於歐洲諸小國，其金融或因賠款之停付而受擾亂者，以經由國際清算銀行借自各大國中央銀行之款項扶助之；（五）關於現品之交付，當由專家委員會從事「調和實質上的需要與胡佛總統的建議的精神」；（六）保證德國當利用延期付款計劃所免除的款項於「純粹的經濟用途」，而不以為軍備費用。

這個計劃見諸實行的時候，美國人非常樂觀，公債票也逐漸高漲。但就德國而言，延期付款的磋商不啻公開報告德國金融已到竭蹶之境，和法、德的外交關係繼續險惡。在延期付款計劃施行的那一天，德國國家銀行的危險保證金降到百分之四十二，單在六月的最後一星期內，金幣的損失已達一萬萬元以上。

在七月間，德國繼續遭受重大的損失，法國的貸款被德國拒絕，因為它的政治條件是不可接受的（條件中並要求德國承認它的東部邊疆為最後確定的界線）。在七月十三日，那個很大的丹穆斯達國家銀行（Darm-

städlerund Nationalbank) 倒閉了，次日，德國全國的銀行被政府的命令強迫暫時關門。爲應付這個新的危機起見，在巴黎舉行了幾次「談話」(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接着有倫敦的會議(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這些集會法國都佔着上風，因爲當時歐洲各國中，祇有它具有充裕的款項可利用，但它爲德、奧、英、美四國不求它的幫助而成立重要的協定一企圖激怒了。(註)法人在德所投資本很少，但他們認他們的賠款要求爲一種對德的第一抵押權，其付償較之英人、美人及其他各國人民的投機性質的投資之安全，更重要得多。

(註)在九月三日，德、奧兩國廢棄它們的關稅盟約。見第十六章。

依照倫敦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國際清算銀行於八月八日召集一個委員會會議，「來審查德國馬上所需要的第二次信用借款，並研究將一部分短期信用借款變換爲長期信用借款的可能性」。十日後，這個委員會在美國人主席威琴氏領導之下造具了報告。其中建議現有的短期信用借款應使之繼續六個月，並指出以長期外債之形式增加信用借款之必要。然而關於後一層，該委員會說明「單是財政上的補救方法，決不能恢復世界的經濟繁榮，除非許多國家所施的阻礙的政策有了根本的改變」。各國容許「一種世界金融組織的發展，一方使債務國不得不每年將鉅款付與債權國，同時又加種種阻礙使它們的貨物不能自由流動」。那是非改變不可的。所以，在國際商業不受人爲的障礙物如關稅等等的限制之前，「要想出爲德國取得長期信用借款的一定計劃」是不可能的。

委員會的第一次建議馬上被採用了，接着訂立了一個「停頓協定」(Standstill Agreement)，依此協定，

凡貸與德國的短期信用借款，當展期至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這祇是一個暫時的方案，無論如何不能認為金融危機的最後解決辦法。因之國際清算銀行應德國的迫切請求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間在巴塞爾（Basel）召開特別顧問委員會會議。這個委員會所掌有的事實資料，比威琴委員會（Wigin Committee）所有的豐富些，它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報告道，德國有正當理由宣稱——依照它根據於楊格計劃的權利——它雖然採取了維持通貨穩定的種種步驟，它仍不能於次年（一九三二年）七月開始的一年度中交付有條件的一部分金。

特別顧問委員會以為在這個因世界貿易凋敝及金價跌落而發生的，此刻已擴大至「可驚的範圍」的世界危機之中，需要一致的行動，乃進一步說明「重建經濟的穩定基礎與真正的和平之唯一持久的辦法，即在迅速整理各國政府間的一切債務，使適應現在的世界情勢」。

局面的嚴重性卒使各國政治家大為注意。關於短期信用借款的「停頓協定」，自一九三二年二月起，又展延了一年。此後不久，德總理布魯寧聲明德國雖竭盡心力，終究不能繼續償付楊格計劃所定的年金。現在不復是願不願付償的問題——德國實在不能付償了。當這個時候，英國的財政也瀕於破產，這個劇變更搖動世界對其金融組織的信任。英、法、德、意、比日諸國乃懷着希望約定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在洛桑再開一次賠款會議。據一種英國公報上說，「會議目的將在商定一個對於特別顧問委員會報告書所提出的各項問題的永久解決辦法，及足以解決其他種種引起並可以延長目前的世界危機的經濟上與財政上的困難之必要方案」。

洛桑會議（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德、比、法、英、意、日諸國的代表會晤於洛桑（Lausanne），照例來討論改良世界經濟狀況的方案。經過三星期的磋商後，成立了一個協定，規定將德國的賠款減至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或七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之總額。爲付償此項債務起見，柏林政府當以五釐公債之全數交付於國際清算銀行。該項公債應由該銀行保管三年，此後可置國際市場出售。德國可隨時以額面價格贖回尚未發行之公債，十五年後，凡國際清算銀行未能轉售之公債應取消之。公債之利息，當從其轉售日起計算。

各債權國代表所以贊同放棄楊格計劃中賠款數字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倒並非出於慈善。他們的動機原來是要使世界貿易的復興成爲可能，並消除覆蓋於各國的不安穩之雲霧。他們覺得繁榮之重返全靠商業與安全，要恢復這兩項，必須實際上廢止賠償。此外，洛桑會議又推促國際聯合會於最早的可能機會召集世界經濟與幣制會議。

當洛桑協定公布的時候，各處的報紙都歡呼着戰後歷史上新紀元之開始。在布魯寧辭職（五月三十日）後繼任德國總理的巴本，在國內外被認爲聰明而能幹的外交家。但這個故事有其另一方面。不久消息被洩露出來，據說英、法、比四國的代表已分別訂立了「紳士協定」（Gentlemen's Agreement），其中規定洛桑協定祇在各國加以批准之後方能發生效力，而此項批准必須「等到各該國與其本身的債權國之間成立了滿意的妥

協後」纔有。如果這種妥協不能商就，則「與德國所訂的協定亦不會得到批准，於是將發生新的局面，各關係國當再從事商議如何應付。倘遇此種情形，法律上的地位仍爲胡佛發表延斯付款計劃前所有的」。這些保留條件自然要通知德國。

紳士協定的各簽字國之主要債權國就是美國，而美國政府曾經反復地和始終一貫聲明賠款與戰債之間並沒有正式的關係。遲至一九三一年之冬，當法、意兩國的代表謁見胡佛總統談判修正各國間之債務一問題的時候，他堅持歐洲必須自行想出賠款的解決法，不必管美國採取何種行動。洛桑協定的意義顯然是趨向這一方面的步驟，但美京華盛頓力言，即使將賠償的債務完全廢止，取消戰債的話仍屬匪夷所思的。許多美國人對於他們所認爲歐洲的一種企圖，即想將陷世界於進退維谷之窮境的責任卸於美國身上的企圖，非常憤怒。民主黨甚至將反對取消戰債一條目加入該黨的一九三二年選舉運動的黨綱之中。

因之洛桑協定至少暫時被打消了，世界的不景氣仍舊繼續存在，同時德國的國家主義者重新開始並增強他們對於「柔弱無能的」政府的攻擊，因爲它不能從以前的協約國取得大讓步。然而有一點好處顯然是得到的，即將來的國際會議大概不能規定比洛桑會議所定的更高的賠款數字了。（註）

（註）依照洛桑會議的決議，國際聯合會從事準備於一九三三年在倫敦召開世界經濟與財政會議。因爲要得到英國的合作，所以必須將

關於賠款、戰債及關稅的談論撤出議程！在胡佛所定的停止付款的期限屆滿後幾個月，償付國際債務者很少。

第八章 兩種需要：安全保障與裁軍

法國的新霸權

在世界大戰的最後回聲消逝前好久，勝利的但憂懼的法國已着手「覓求安全的保障」——特別是預防德國再行侵略的安全保障。在人們的記憶內，已有兩次聽到德國軍隊的靴聲鞏然而行於法國的土地，而「第三共和」的人民非常恐懼德人之重臨。祇要德國從前的經濟與軍事威力的影子存在一天，而它的人口增加率長此比法國的來得速，法國就似乎必須尋求堅固的安全與援助的保障。

從事這種追求的領袖就是普恩加齊，他生長於洛林，從幼年就懷抱着對於德國——掠奪其家鄉者的深仇痛恨。他尋求保障的努力無時不如中風狂，甚至有些本國人罵他爲「異常的懦夫」。然而法國其他的總理，如保守派的泰狄歐(Tardieu)抱自由主義的赫里歐，甚至於溫和的和樂觀的白里安等人的外交政策，也都被這種恐懼心所驅使。雖然法國許多政治家對於國內政策的見地各各不同，他們在國際事務中總是始終不變地追求着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安全保障。

法國在停戰後取得安全保障的第一步實際手段，就是法、英間與法、美間兩件同樣的保障條約之簽訂（一

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們當還記得，這兩件條約規定英國和美國「於德國不經挑激而對法國作侵略行動時各應立刻援助法國」。可是法國從這種協定中所得到的任何種安慰，已被注定為不長久的。美國參議院拒絕批准法美條約，而與英國所訂的一件，雖然早經批准，也自動地歸於無效，因為法英條約之接受「有賴於美國政府承諾同樣的義務」。

比較差強人意的事情要算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法比軍事同盟，其中規定兩簽字國遇德國攻擊時均應互為援助。（註）這個軍事同盟的存在曾經通知國際聯合會，但其實際的條款始終保守秘密。在一九二九年，謠傳此項條約續有修正，荷蘭人乃大起驚惶，深恐其修正將有和對德國一樣而對荷蘭作軍事行動的可能。畏懼的理由，則因荷蘭政府曾於一九二七年拒絕與比利時訂立一種使比利時得到重要商業利益的協定，深恐比利時報復。

（註）法國答應比利時將盧森堡包括於其關稅同盟的範圍內，作為此項軍事同盟的代價，雖然盧森堡人前此已經表決與法國成立經濟上的關係。

其次，法國想找一個國家來代替俄國在大戰前的同盟系統中所佔據的地位。這個合理的候補者就是波蘭，因為波蘭也和法國一樣對於懷怨的德國大有戒心，同時又怕蘇俄。當法國於一九二〇年以兵力、金錢和軍火借與波蘭來和俄國布爾扎維黨人作戰的時候，這兩個共和國之間的自然親密程度復有增加。於是法波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九日簽訂了一個條約，並於一九二二年五月批准。這個條約規定兩國政府應互商一切有關雙方利益的國際事件，並為維護兩國所參與之一切條約而取一致之行動。為防衛彼此之土地並保障彼此之正當利益

起見，兩簽字國又承諾遇有外國攻擊時在軍事上互相幫助。

在後來的幾年中，法波條約續有半打協定加以補充，其中包括一九二二年九月的軍事協定，這顯然是對蘇俄而發的。這個軍事協定於一九三二年續訂，期限延長十年。根據其中條款，法國以上級將校與下級士官借與波蘭，並充分接濟其軍用品。

此外，法國又決定再與英國接近。它覺得從前的「友誼協商」(Entente Cordiale)仍舊存在，爲什麼不增強它呢？因之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法國的駐英大使向英國外交部提出確定的政治同盟。但隨之發生的談判是不順利的。英國祇肯於德國直接侵犯法國時纔援助法國，可是，就是普恩加賚也不得不承認在最近的將來德國決不會無故向法國復仇。反之，法國恐怕德國攻擊波蘭，倘遇此事，「第三共和國」受條約的拘束，就非援助它的同盟國不可。法國所以要求英國在條約上擔保於三十年內給與軍事助力，就是爲了要應付此種萬一之變。但勞合喬治不肯作繭自縛，故除答應與法國訂立十年的協定來幫助法國抵禦德國的侵略外，其餘一概拒絕。此項協定卒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在坎(Cannes)締結了。

其時英法之間又發生其他的困難。在華盛頓限制軍備會議(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英美所提廢止潛水艇的建議案被擱置一邊，大半因爲法國的反對。這兩個舊盟友之間的裂痕又因對於德國賠償問題的意見之分歧更擴大了。所以，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再行訂立同盟的談判終告失敗。到一九二三年之初，法國不顧英國的抗議派遣軍隊於魯爾的時候，友誼協商即割然中斷。

法國既爲了佔領魯爾以後的出乎意料之外的糾葛所困惱，馬上着手多找友國。外交上的「試探物」(Feelings)佈滿各處，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捷克斯拉夫國大總統馬薩里克(Masaryk)和外交總長彭尼士(Benes)卒被它說動，訪問巴黎。三個月後，即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兩國締結了法——捷盟約，雙方承諾以和平方法解決兩者間所發生之任何爭執；遇德、奧企圖併合或德、匈試行復辟時彼此商議對付辦法；「協議」共同政策來應付關於兩國安全或和平條約的事件。這樣一來，在簽訂凡爾賽和約及採用國聯盟約後不到五年之內，新的軍事同盟之連系中已煅造好了四個鑲圈。

一九二九年六月，法國又締結了另一安全協定，這次是和羅馬尼亞。兩國約定除爲正當的防衛或根據國聯盟約所規定的歐洲的政治地位的改變，惟須遵守國聯盟約行政院或大會所通過的任何決議。最後，兩國承諾，如果有一國無故受人侵略，兩國在國聯盟約的範圍以內，彼此商議所擬取的行動。(註)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法國與巨哥斯拉夫簽訂了一個同樣的條約。

(註)羅馬尼亞在一個特別議定書中答應不激起對俄的戰爭，蓋法國不願被牽涉於因其同盟國之侵略行動所引起之軍事衝突。

當斯之際，幾個法國的東歐同盟國彼此之間也成了夥伴。在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捷克斯拉夫、巨哥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組織了「小協商」(Little Entente)，其目的在維護特喇農條約，防止海布斯堡王室的復辟，並成立堅固的戰線來對抗匈牙利領土回復主義者的可能的爆發。接着有三個兩國同盟之簽訂，即捷克斯拉夫

與巨哥斯拉夫（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四日），捷克斯拉夫與羅馬尼亞（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及巨哥斯拉夫與羅馬尼亞（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之間的，小協商便因之發生效力。再者，一九二一年三月間，羅馬尼亞和波蘭簽訂了一個同盟條約，次年，其餘小協商國又找到機會與波蘭成立友誼的關係。（註）最後，為採取一致的政策並使經濟上的和外交上的合作成為可能起見，各協商國的外交總長決定舉行定期的會議，有時也可邀請波蘭列席。在第十屆的該項會議（舉行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以上所述的協商條約皆經續訂。

（註）一九二一年的波蘭——羅馬尼亞條約之訂立，大概為預防俄國的侵略。當這個條約於一九二六年及一九三一年續訂的時候，其範圍已加擴大，羅馬尼亞擔保波蘭的四疆不受德國的侵略的語言也包括在內。

將這些衛星繫於法國的繩索不單是條約義務，並且有財政關係。在幾年之中，法國銀行家貸與四國數萬萬元，並以巨額的信用借款給與它們，以便在法國購買軍火。一九三一年這些國家之間的金融關係最可證明這個形勢。是年三月，羅馬尼亞借得外款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大多數來自巴黎。四月，捷克斯拉夫得到法國的借款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同日兩國又結束談判，捷克的外交總長彭尼士在該國下院宣布廢棄所建議的德——奧關稅同盟。波蘭也在那個月在巴黎借到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主要的債權者為「北巴依銀行」（Banque des Pays du Nord）及希尼德——克婁梭（Schneider-Creusot）軍火製造廠。五月，巨哥斯拉夫也向法國訂借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元，用於穩定金融及建築公共工事。

像這樣以安全保障的名義所造成的法國新霸權，實際上是建立於已在一九一四年證明為無效而危險的

那一種軍壘之上的。小協商國及波蘭合攏來的常備軍，總計約八十萬人，法國則自誇有六十萬人的實力。這種雄壯的軍勢，實足爲歐洲和平的威脅並且是訂立其他兩個各以蘇俄和法西斯蒂的意大利爲中心的條約系統的一個因素。

俄國的預防策

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日，三十四國（包括德、俄兩國在內）的代表在熱那亞（Genoa）集會，籌劃改良歐洲經濟狀況的方法。這個會議似乎進行得很順利，關於各種借款與信用墊款的討論也一帆風順，忽然消息傳來，據說在耶穌復活節（四月十六日）那一天，德國的外交總長刺善諾（Rathenau）和俄國的外交人民委員翟趣林（Chicherin）在意大利的刺帕羅（Rapallo）小海水浴場簽訂了一個條約。

俄德在這個時候的彼此提攜，自有充足的原因。這兩國那時在歐洲的國際團體中尚未恢復相當的地位，因之恐怕別國訂結不利於它們的或受法國支配的聯盟，並且兩國都切於成立新的貿易關係。由許多德國人看來，這個條約似乎掃除了德、俄同盟的障礙，並可反抗協約國及其令人難堪的條約要求。由俄國的領袖看來，它的意義就是使本國與一個大國恢復外交的關係，藉此取得廣大的信用並足以減少對於法、波同盟的畏懼。

依據刺帕羅條約的條款，蘇維埃政府得到德國的承認；彼此重立領事的和商業的關係；所有一切戰前的債務與權利要求互相取消。然而如果俄國對它的其他債權國還債時，德國也當受同等的報償。這個條約的消息觸

怒了協約國的代表，熱那亞會議因之破裂，毫未解決任何重要問題。

在刺帕羅條約訂立後幾年之內，布爾扎維政府漸漸擔心歐洲各國結合雄厚的團體來對抗俄國，因之莫斯科決定與鄰邦商訂互不侵犯的盟約。第一次的成功就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俄土友好與中立條約之簽字。土耳其和俄國一樣不信任西方國家，特別是猜疑國際聯合會，因為國聯方以肥沃的摩蘇爾區域判歸伊拉克，又因為關於驅逐希臘總主教出境的問題的爭執。在該項條約中，兩簽字國承諾彼此不相侵犯，如任何一國受第三國或諸國之攻擊，其他一國應保守中立。兩國又答應不參與凡以各該國為目標之政治的、財政的或經濟的行動。

四個月後，俄國與德國在柏林簽訂了同樣的盟約。德國對於那一年國聯表決其入會時的斤斤爭論非常憤怒，因之它的外交部極力贊成與俄國發生親密的關係。柏林條約（Berlin Treaty）是以俄土條約為藍本的，其中規定，遇有未經挑激之攻擊時兩國應互守中立。各簽字國答應不參與對其他一國而發的經濟或金融絕交。因為這個時候德國加入國聯的問題尚在考慮之中，並因為根據國聯盟約第十六條，國聯有發起經濟絕交的權力，所以德國應允對此條作數項保留，務使本國除認蘇俄為侵略者時外，不對蘇俄作敵對行動。一九二六年年尾，蘇俄與立陶宛和阿富汗締結了同樣的協定，此後不久，又與波斯和拉特維亞商訂了互不侵犯條約。

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歐洲大陸的外交陣容略有變更。法國很多年為蘇俄的大敵，現在漸漸轉移它的地位了。「第三共和國」久欲利用廣大的俄國油源。俄國也在國外定有大宗買賣，法國覺得毫無理由讓這種

買賣幾乎全落到德、英、意三國的手中。再者，德國國內的反動派和保皇黨漸有勢力，殊足以威脅法國人和布爾扎維黨人，蓋德國的國家主義者公然聲言欲廢棄凡爾賽條約並熱烈地炫示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的深惡痛恨。因之，俄國雖以中立條約或商業協定仍與德意志、土耳其、意大利及其他的國家保持聯絡，它終於一九三一年發起，並於一九三二年簽定了與法國所訂的中立條約。

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俄國與芬蘭及俄國與波蘭之間，又簽訂了中立條約。它同時又與羅馬尼亞商訂了一個協定，雖然布爾扎維黨人尙未忘懷於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之喪失於那個巴爾幹的王國。波蘭與羅馬尼亞的外交政策之轉變，是因爲鑒於法國的榜樣並畏懼德奧匈三國內的國家主義派的梟張所致。（註）到終局，這個新的形勢的反應似乎頗有利於法國，因爲法國實際上已放心，俄國決不會同德國和法西斯蒂的意大利參與修改法國所寶貴的和平條約之激烈企圖。

（註）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俄——羅商訂不侵犯盟約的談判作罷。

意大利的條約

當其他歐洲大陸國家正在熱狂地覓求安全保障的時候，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法西斯蒂的意大利會孤立着不動。事實上，意大利有很大的野心和勢不兩立的敵人，所以意大利也需要友國。

在戰後的時期中，我們看到法意之間爲爭奪西部地中海的霸權，漸漸發生嚴重的苦鬪。因之兩國在軍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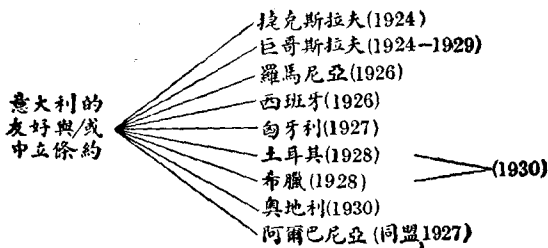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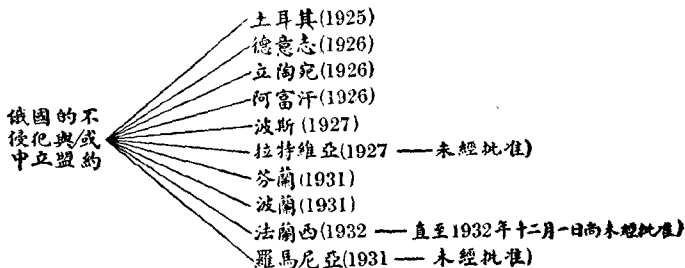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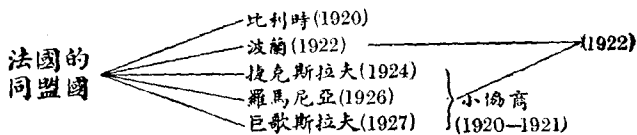
的競爭，兩國邊境上的軍事準備也日形擴大。有好幾次列強的海軍談判歸於破裂，即因為意大利堅持與法國平等，而法國則極力反對。此外，法國在歐洲及非洲北部保有許多土地，但照意大利人看來，這些土地應該是屬於他們的。最後，意大利認為本國在一九一九年所以不能取得更廣大的殖民地，大半當歸咎於法國。

所以在墨梭里尼柄政後不久，意大利就從事於建立它的霸權的各種步驟。友好與中立的條約陸續簽訂於意國與捷克斯拉夫（一九二四年），巨哥斯拉夫（一九二四年），羅馬尼亞（一九二六年），西班牙（一九二六年），匈牙利（一九二七年），土耳其（一九二八年），希臘（一九二八年），和奧地利（一九三〇年）之間。它又與阿爾巴尼亞締結了軍事同盟（一九二七年）。與蘇俄成立了非常優惠的商業關係。復因特別拉攏匈、奧兩國，及在關於和平解決的事件上公然袒護德、俄、意大利終究一躍而為主張修改和約的有力者。同時，它很小心與英國維持親睦的邦交，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又費了很大的力取得美國的好意。

這樣一來，在一九三一年，即休戰後十四年，歐洲復分為幾個軍壘。戰前不過有兩大同盟系統，每一個環繞着一羣衛星，現在卻有三個了。但是，有如從前的情形，有幾個國家同時跨着兩個相反對的同盟核心，而財政也和先前一樣成爲決定陣容的重要部分。這個景況決不是足以激發任何歐洲人民的信心的好現象。特就法國而論，它在實際上爲各種條約所束縛，不得不保護五個被保護的國家，而它們之中沒有一個是一等國，並且每一個都有許多敵人。幸而這種新的同盟組織有以妥協的方法擔保和平與安全的各種企圖與之平行，所以還能相安一時。這些企圖的大多數是發端於國聯的組織之內的。

安全保障之覓求

1920—1932



日內瓦——洛迦諾——巴黎

依照國聯盟約第八條，國聯的會員國承認「要保持和平，必須將各國的軍備裁減至與國家安全相應的最低限度，並以其共同的行動履行國際的義務」。草擬裁減軍備的詳細計劃的任務，委託於國聯行政院，另以關於陸軍、海軍及空軍問題的常置顧問委員會襄助之。就是在國際聯合會行使職務之前，強迫裁軍的工作已依照與戰敗國所訂的和約中的軍備條款開始了。再者，協約國於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致德國的說帖中，亦坦然說明德國的裁軍，當確定地認為傾向於世界普遍裁軍的「第一步驟」。

行政院因國聯第一屆大會的正式請求，乃於一九二一年二月指定了一個臨時混合委員會，來草擬縮減軍備的意見書。當該委員會從事工作的當兒，第二屆大會提議該項意見書當合併於一個條約草案中，接着第三屆大會又要求在草案中規定給與各國幾種相互保障的一定方式，以為限制軍備的交換品。委員會乃根據這種見解進行工作，最後草定了一種互助條約 (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 草案，後給第四屆大會於一九二三年九月一致通過採用之。

前項條約規定各簽字國遇任何一國受外國攻擊時應起而援助，作為安全之擔保。各簽字國得訂立補充的局部盟約，但這些盟約不得與該項條約相牴觸，並須為國聯所可接受者。於任何衝突中決定誰為侵略者之權屬於行政院，行政院須於戰爭爆發後四日內下判決。關於裁軍問題，其中規定行政院應擬定各國縮減軍備之等級，

「以能保障國家之安全者爲限」。凡於公布後兩年之內不依照國聯行政院之計劃限制軍備的國家，不得享受相互擔保的利益。

當這個條約草案分送於各國的時候，它未能取得一個國家的簽字。有幾國準備在原則上加以承認，但有許多，包括英、德兩國在內，斷然加以排斥。大多數國家抗議該項條約中沒有明確規定「侵略」或「侵略者」的意義，缺乏仲裁的方式，並且關於軍縮的條文亦嫌含糊。英國特別不高興擔任其中所含的無定限的軍事義務。在這種情形之下，一般人都覺得，該項條約中未能規定爲大規模裁軍之先決條件的安全保障之要素。

當這個時候，英、法兩國政府各在麥唐納 (Macdonald) 和赫里歐的領導之下，這兩位政治家都是相信穩健與和平的人。他們兩人似乎真真決意想出幾種方式，使「仲裁，安全保障和裁軍」可以成立，作爲將來一切國際關係的基礎。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他們在國聯第五屆大會提出一個共同決議案，重新提起安全保障與裁軍的全部問題。因有這個動議，大會乃於次月一致贊同「這個最抱奢望的和平計劃」——即和平解決國際爭執議定書 (Protocol for the Pacific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這個議定書不久被稱爲日內瓦議定書 (Geneva Protocol)，它稱侵略的戰爭爲國際的犯罪。爲防止這種戰爭發生起見，其中規定凡是遵守條款的國家必須承諾下列各項：(一) 不對恪守國際義務的其他簽字國交戰；(二) 將一切可辯解的爭執提交世界法庭，並將一切政治紛爭提出於國聯行政會或特別仲裁委員會解決；(三) 當爭執在仲裁之進行中不作動員行動；(四) 對於拒絕以和平方法解決紛爭或拒絕仲裁判決並訴諸戰爭之國

認爲『侵略國』(五)承認國聯行政會有對於此種侵略國宣布經濟絕交的權力；(六)凡戰爭所耗的軍費當由侵略國就其能力的範圍負擔之；但該項賠償不包括土地的割讓；及(七)參與裁減軍備的國際會議。在此項會議的努力至少有局部的裁軍結果以前，本議定書中的任何部分不發生效力。

雖然有幾個小國表示極願批准日內瓦議定書，英人卻拒絕接受它，因之終未施行。麥唐納於返倫敦後不久，就因內政問題下臺了，其繼任者保守黨的首相鮑爾溫(Baldwin)和外交大臣張伯倫(Chamberlain)決無意於是認這種普及於全世界的約束和制裁。再者，他們也不大相信強迫的仲裁爲保持和平的有效方法。自然，此項議定書未經英國批准是無價值的。幸而此種以一般的條款明定將來一切衝突中的侵略者的第一次重要企圖雖被拒絕，不久就有另一個計劃被接受了，這個計劃對於在歐洲最傷心的地方——萊茵地，至少可以決定誰是將來的侵略者。

因爲希望減少法德兩國對於彼此的每種行動的相互猜疑，柏林好幾次(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九二三年五月；一九二三年九月)向巴黎提議談判保護的協定，其具體方式爲邊疆的保證，反對戰爭的誓約及仲裁的計劃。然而每一次法國都很冷淡。德國毫不爲這種挫折和日內瓦議定書的厄運所沮喪，復於一九二五年二月由它的外交總長史德萊斯曼(Stresemann)向法國重申前請。

史德萊斯曼提議英意法德四國間訂立一種盟約，以擔保目前的萊茵邊境，並以仲裁而不以戰爭解決將來的國際紛爭，他又主張德國與其東西兩面的鄰邦訂立一批仲裁條約。這一次法國的和平家白里安，甚至於英國

的張伯倫都肯傾聽這個計劃，但在開始談判前，法國堅持（一）德國須應允請求加入國聯爲會員國；（二）比利時成爲該項盟約的簽字國；（三）凡該項盟約中之規定，不得解釋爲有妨礙法國對其同盟國——波蘭之義務或協約國在國聯盟約下之義務；及（四）捷克斯拉夫與波蘭亦當邀之出席此項談判。史德萊斯曼接受了這些條件，因爲他那時切於借得新外債，並以安全的感覺來代替籠罩於歐洲的不安空氣。

從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至十六日，德、法、英、意、比、波蘭及捷克斯拉夫的代表會集於瑞士的洛迦諾（Locarno）。自大戰以後各國立於對等的地位來開會議，這是第一次。議事的進行是非正式的和談話式的，其狀況與前次各種會議大不相同。就是最紛亂困難的論點，也是以和善的討論及坦白地交換意見來解決的。各國代表在這一天的態度既如此大異於通常的外交姿勢，故一般人特造「洛迦諾之精神」一名詞來形容它。

以此精神，卒有七件條約或協定之締結，其宗旨在保護各簽字國，使「免於戰禍」，並規定「以和平方法解決後來或將發生於各簽字國之間的各種爭執」。他們所提議的條約包括德、法、英、意、比五國相互保證之條約；德國一方面與比、法、波蘭和捷克斯拉夫各方面之間的仲裁條約四件；及法國與波蘭、法國與捷克斯拉夫之間的特別保證條約兩件。

在總公約中各國「集合地和單獨地」擔保「維持凡爾賽條約所規定之德比疆界與德、法疆界之土地現狀」，及維持該條約的規定。萊茵河東所劃長五十基羅米突一線之西的德國領土的武備撤除。德、法、比三國又承諾除下列情形外，彼等「無論如何決不互相侵犯或攻擊或訴諸戰爭」：（一）爲「正當防衛」；（二）遇「公然違

背」廢除武備之定則者；(三)履行國聯盟約第十六條之制裁；或(四)因國聯對於首先攻擊該團體中之一份子之國採取某項行動。復次，該三國又承諾用和平方法解決「彼此之間所發生而非可以通常外交方法解決的一切問題」。

所有一切簽字國皆負幫助因他國違背條約而受害的國家。如遇違背條約之事有疑點，應由國聯行政院決定。各簽字國為國聯會員國時之義務無論如何不受該公約之影響，國聯本身亦無論如何不受其限制。該項公約於德國加入國聯後即應發生效力，其施行期限至國聯行政院以三分之二之過半數議決國聯「擔保以充分之保護給與各締約國」時為止。

上述之四件仲裁條約中，規定所有發生於德國與各連署國之間的一切爭執，「不能以通常外交方法和平解決者，當提交公斷法院或常置世界法庭解決之」。此項規定不適用於「發生於訂立本協定前之事件且屬於過去的爭執」，因之，凡遇如波蘭迴廊問題等，它並無拘束力。其餘幾件條約，即法國與其兩同盟國所訂立的，則規定各簽字國因他國不遵守洛迦諾之保證而受害時，「如此項不遵守之行為兼有未經挑釁而訴諸武力之行動，各該國應立刻起而互相援助」。

洛迦諾會議所成就的事業大為世人所讚美，稱為世界歷史新紀元的先聲。白里安甚至發出極樂觀的言論，預言戰爭之終止及祇有「妥協、仲裁、和平」的將來！不幸這些公約和洛迦諾的精神，都非真正的和平保證。不錯，萊茵的邊境顯然得到保障了。德國放棄了對於亞爾薩斯——洛林的一切要求，法國也拋棄了萊茵地保護權的

一切希望。可是德國東部邊疆的問題依然未解決，而誰也不能真正擔保它會得到和平的解決。再者，洛迦諾的親睦與妥協精神，祇是在一九二五年後的國際事務中纔偶而顯見的。在第二年，即當德國加入國聯的請求尚在審議中的時候，它似乎就完全被忘記了，但在一九二七年它又欣欣然有生意。

在一九二七年春天，法國外交總長白里安致文華盛頓提議訂立「互相排斥戰爭」的協定。經過幾個月的函電往還後，美國國務卿開洛格（Kellogg）建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美兩國共同努力來勸說許多國家共同簽訂一個非戰公約。要使國聯會員國贊同這個計劃是不難的，因為這些國家在簽字於國聯盟約時已自動約定以訴諸戰爭為最後憑藉的方法。八個月後，即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十五國的代表在巴黎簽字認可非戰協定。這個協定含有一篇短序和三條條文，它即被稱為開洛格公約（Kellogg Pact）或巴黎公約（Pact of Paris）。

在第一條中，各締約國嚴肅地「以其本國人民之名義宣布本國反對以戰爭手段為國際紛爭之解決法，並否認其為國際關係中的國家政策之工具」。在第二條裏面，它們承諾「一切爭執或衝突，不論其屬何種類，有何來源，決不以和平方法外之方法解決之」。第三條則略述批准與加入之條件。依照其序言，「凡簽字國嗣後以戰爭手段增進其國家利益者，不得享受本公約所給與之利益」。所以，如果任何簽字國背棄誓約，其他簽字國當對該背約國恢復行動之自由。該公約的副本及所附邀請書由開洛格寄送其他四十八個國家。到一九三二年八月，接受者總計有六十二國。（註）

(註)俄國非常盼望這個公約施行，所以它勸說愛沙尼亞、拉達維亞、波蘭和羅馬尼亞同它加入李維諾夫議定書（一九二〇年二月）規定，不願其他國家的行動。非戰公約馬上發生效力，此後不久，立陶宛、土耳其、波斯和但澤自由城也都加入了。

非戰公約的談判有種種情形環繞着，使它的外觀頂多是一種姿勢而已。開洛格在談判之際所寫的公函裏面，表示美國的見解道，非戰條約不能載有「限制或損害自衛權的事項。自衛權是每一主權國家的天然權利，並且是暗合於各種條約之內的」。顯然，凡是不能歸於「自衛」一類的行動，實在是很少的。再者，非戰公約並未排斥戰爭；它不過否認戰爭為國家政策的工具。一般國家仍舊可以自由從事於它所認為必要的煙火術之展覽。此外，公約中沒有施行的規定。它祇是建立於一種希望之上，以為輿論或許有很大的勢力與影響，甚至於在危急之時也足以制止某一國違背它的道德上的義務。最後，美國參議院於批准公約後三星期，接着就通過一件法案，規定以二億五千萬元建築十五艘新巡洋艦的時候，全部的事件似乎是可笑的。此事使一位批評家說道：「政府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和平，以及更多的兵艦來厲行它。」

雖然，非戰公約之得到普遍的接受是一個前進的步驟，即世界傾向於排斥戰爭，不認為「一種理想和目標」的合作步驟。復次國聯第十屆大會因欲使國聯盟約與非戰公約更能調和，乃於一九二九年九月建議將國聯盟約中強令各簽字國至少在受理某項爭執之仲裁機關或司法機關造具報告後三個月前不得從事戰爭一條款，加以修正，其文如下：「各該國（爭執國）承諾無論如何不訴諸戰爭」。然而這個提議未能迅速博得一般的贊同，並且到一九三二年之終還未經正式採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中，日衝突的事件，似乎表明着不能擔保

實現沒有戰爭的將來，除非巴黎公約（或此項公約的替代物）具有相當的「牙齒」，使一般國家認違背盟約之舉罪有甚於非道德的行爲者。

裁軍的進行

一九二五年九月出席在日內瓦來舉行的第六屆國聯大會的代表，遇到了一個嚴重的責任。大會已舉行，商議和解散了五次了，可是裁軍的問題仍舊和一九二〇年一樣離解決之目的還遠。不錯，他們試行過兩種企圖——互助條約和日內瓦議定書——來履行軍備的限制，但這兩種企圖都遭各會員國摒棄。因之到這個時候必須採取某種一定的行動，務使一般國家恢復對於國聯的信任，並使全世界的政府都可接受。大會用了這種精神請求行政院「以籌備裁減並限制軍備會議爲目的從事初步的研究，以便在滿意的（安全保障之）條件得到擔保後……可以召集該項會議，並實現普遍的裁軍」。

行政院接受這個請求，於是指定了一個軍縮會議籌備委員會，預定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開會於日內瓦。出席於該委員會者有行政會全體理事，其他國聯會員國若干，德國和美國。俄國亦被邀請加入，但它拒絕參與。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它與瑞士的爭執，因一個蘇俄外交家於一九二二年在瑞士遇刺而引起者，得到解決後爲止。籌備委員會的議程爲行政院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所擬的一組問題（Questionnaire）。當時大家相信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必須在草定裁軍協定前先得到的肯定的答案。（註）

(註)這些問題可以在(G. W. Wheeler-Bennett's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Since Locarno. 1925—1931* (1932))書

內找到。在該書內我們又可看見一篇關於各大國國民對於裁軍的態度之簡明摘要。

籌備委員會將這些問題分爲兩部分，並以之連同其本身所附加的問題交付於兩個副委員會，這兩個機關有許多專家的特別團體相助爲理。在籌備委員會於一九二九年九月所舉行的第二次全體大會，這兩個委員會被催促加速工作，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對於上述問題的答案都經分派於有代表出席於籌備委員會的各國。

英、法兩國政府各自根據這些答案造具了草約，作爲在籌備委員會下屆大會（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月）談論的出發點。這兩個草約幾乎在每個重要論點上都相牴觸，因之以此爲據的談話很少有調和的餘地。裁軍問題的專門方面常被畏懼、猜忌、國家的自尊心，和經濟推到後邊。就一般而言，表決時美、德、英常站在同一方面，而法國和它的黨羽卻站在另一方面。

有三個問題顯見得特別棘手。雖然大家一致承認陸軍軍備之限制必牽涉到軍隊之限制，但他們對於估計兵士人數之法卻意見紛歧了。法國和其他實行徵兵制的國家，反對將受過訓練的預備兵包括於軍隊一類中，而志願兵制的國家則以爲在軍隊中剛剛完畢幾年兵役的人，在各方面與尙在軍隊中操練的人一樣有戰鬥的能力。關於海軍的限制，英、美兩國以爲每個國家當有總噸數的限制，再加上每類軍艦噸數的限制。然而，法國與意大利雖贊成限制總噸數的觀念，但認爲每個國家在總噸數之限制下可以自由分配建築本國所認爲適當之任何種船舶。講到國際監督的問題，法國和它的「平素的扈從」(Cortège habituel)切望成立一個很精密的國際

監督制度，可是其他各國主張裁軍計劃之施行，必須以各關係國之誠意爲憑。

籌備委員會既不能成立一個最後的協定，乃擬就一個草約，將得到一般同意的各點和意見各不相合的一切條文之原文合併在內。此項草約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兩年後，尙未經提出二讀。當斯之際，在安全保障與裁軍的範圍內，發生了許多事情。

我們要了解一九二七年的裁軍程序的故事，必先略述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的情形。和平會議既已不理睬海洋自由使用權的問題（這大概因了英國的請求），美國國內一部分有勢力的人士即於戰後從事運動建設不亞於任何一國的海軍，俾可於將來的戰爭中行使美國的權利。有一個時期，似乎戰前英德兩國海軍的對立會被同樣危險的英、美競爭取而代之。再者，因有英、日同盟之故，日本自然會站在英國一方面。爲免除此種禍患起見，美總統哈定乃發出邀請書給一羣國家，要求它們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之冬出席華盛頓會議，來討論限制海軍的問題以及太平洋與遠東的全部問題。

華府會議草定了並簽訂了七件條約，其中有兩件五國條約是關於限制海軍的。在第一件中，五國（美、英、日、法、意）承諾潛水艇應遵守適用於水面軍艦的海戰規則，並且排斥使人窒息的毒氣，不以爲戰器。第二件條約則限制軍艦的噸數，並規定五國中每一國應有之主力艦與飛機母艦之比量。（註）主力艦之噸數限制如下：美國，五二五、〇〇〇噸；英國，五二五、〇〇〇噸；日本，三一五、〇〇〇噸；法國，一七五、〇〇〇噸；意大利，一七五、〇〇〇噸。這些數字確立了五：五：三：一·六七：一·六七的比率。爲實行華府的規定起見，大多數國家必須

廢棄早已造好或在建築中的軍艦。

(註)主力艦爲具有超過一萬噸的排水量並裝有口徑大於八英寸的大砲的軍艦。

在採取前項條約五年之後，柯立芝 (Coolidge) 總統又於一九二七年邀請英、法、意、日四國同美國舉行一個國際會議，來商議限制巡洋艦、驅逐艦和潛水艇的事件。他提醒這幾個國家，華府會議對於主力艦和飛機母艦已經加上噸數的限制，並暗示着以同樣方法對付其餘各類戰艦的時機現在也到了。祇有英、日兩國接受他的邀請，其他兩國宣稱此種國際會議，祇足以增加軍縮會議籌備委員會所遇到的困難。法國並進一步指斥此項邀請有不顧小國的權利之處，特別是和它一樣有投票權的國家。因之在一九二七年六月舉行於日內瓦的會議祇是三國會議。美國的總代表吉卜生 (Gibson) 君當選爲該會議的主席。

美國人提議上述三類兵艦中每一類的總噸數都應加以限制，並主張照從前對於主力艦和飛機母艦所決定的三國間之比率，即五：五：三，適用其他兵艦。雖然日本大體上在這一層和其他事件上與美國的意見一致，但在保守黨內閣統治下的英國卻堅持異議。它堅持它和美國在數學上的均等無論如何不能與實際上的均等量齊觀，並以爲英國之必須保護長達八萬哩的貿易線與交通線，使它不得不主張它有無限制建造裝六吋口徑大砲的小巡洋艦（重七五〇〇噸）的權利。可是它切望對於一萬噸的巡洋艦（裝有八吋口徑的大砲者）的建造加以限制——這種巡洋艦最適於美國的需要，因爲美國缺乏海軍根據地和有綿長的海岸線。

在八月間，會議宣告決裂，對於再加限制海軍軍備的事情，毫無成就。反之，此項會議卻重新引起英、美之間的

猜忌與惡感，這在簽訂華府條約後本已暫時歸於退消的。三國會議結束後一年，美國人的猜忌更進一步變為憤怒了。

紐約美國人報 (New York American) 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將倫敦與巴黎在是年之初所成立的陸海軍秘密妥協披露了。依照該項協定的條款，法國允許在將來一切軍縮會議擁護英國的關於海軍限制的立場，英國則撤回它對於將受過訓練的預備兵摒除於軍隊一類之外的主張之異議。此項協定之公佈，引起英、美兩國人民猛烈的抗議，以致倫敦與巴黎的外交部終不得不在政府公報上解釋它們的行動。雖然英、法兩國申辯它們的行為純出於促進裁軍運動一意願，但美國人民非常懷疑英國的誠實。在一九二九年二月，美國國會制定一件法案，預備建造一隻新的航空母艦和十五艘英國海軍部所極力反對的那一種巡洋艦。建造的經費規定為二七四、〇〇〇、〇〇〇元。(註)

(註)至於那家報紙如何發現這件秘密協定，無人知道。在一九三〇年，法國政府不准紐約美國人報主人赫斯忒 (Hearst) 遊歷法國，以為報復。他被稱為「法國之敵人」。

當以上這些事情正在發生的時候，籌備委員會仍繼續它的審議工作。儘管「國際的憤怒與譏笑如何厲害」：那般代表仍舊孜孜於辯論大霧對於戰爭的影響，在討論一個國家的軍備時仔細剖析應給與豬子的食物定量，並透澈地研究國際氣候的歷史。在一九二八年，當蘇俄代表李維諾夫主完全的和絕對的裁軍，廢除一切陸海空軍及軍部，並毀滅一切重兵器、砲臺及兵工廠的時候，發生了若干衝動。此種澈底裁軍的工作當於一年

或四年內完成之，並須準備設置必要的國家警察隊與海上警察隊以維持國內的秩序並保護財產。

俄國的提議於寇賢登 (Cushenlin) 爵士之作譏刺語後被擱置起來，寇氏諷示道，這個提議的真正動機，不過在使布爾扎維黨人更能實行其國際宣傳。當李維諾夫因之提出第二個計劃，打算依照規定的比例逐漸裁軍的時候，籌備委員會的主席勞頓 (London) 請求蘇俄代表「以積極的精神，而不以破壞已完成的工作」的念頭「來出席將來的會議。祇有德國和土耳其贊成俄國的見解，而事實上也很快地顯明，柏林漸漸不耐從前的協約國之遲遲不履行其在凡爾賽條約中之誓約，即認德國的裁軍為「普遍限制世界各國軍備之初步」者。

在一九二九年一年中，當籌備委員會於其第六屆大會第二次宣讀一九二七年的協定草案並實行調和前此所爭執的數點時，美、英兩國間的意見接近了。開洛格公約之簽字恢復了若干好感，美總統胡佛與英首相麥唐納都表示着再行裁減海軍軍備的新希望。十月，麥唐納聘問美國，因之而發生的友好談話之結果，即為召集五大海軍國的倫敦海軍會議，日期定為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差不多恰在該項會議開幕後三個月，美、英、日三國簽訂了（四月二十二日）倫敦海軍條約 (London Naval Treaty)。法、意兩國因為競爭西部地中海的支配權，未行簽字。該項條約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公佈。

倫敦條約的有效時期至一九三六年為止，它總算以妥協解決了巡洋艦的比較力量的問題。美國取得保有十八艘一萬噸，八吋口徑砲一種的大巡洋艦及小巡洋艦一四三、五〇〇噸（總計三二三、五〇〇噸）的權利。英國可保有十五艘大巡洋艦及小巡洋艦一九二、〇〇〇噸（總計三三九、〇〇〇噸），日本願意接受所

定十二艘一萬噸的大巡洋艦及小巡洋艦一〇〇、四五〇噸（總計二〇八、八五〇噸）之最高額。驅逐艦的噸數分配額，則規定英、美兩國皆爲一五〇、〇〇〇噸，日本爲一〇五、〇〇〇噸。三國各得保有五二、七〇〇之潛水艇噸數。在一九三六年前，不得着手建造新主力艦航空母艦的數字被修正爲英美各一三五、〇〇〇噸，日本一〇五、〇〇〇噸。

倫敦條約中最著名的部分，也許就是第二十一條，即所謂防護的或「自動梯」條款。此條准許各簽字國於自身認爲本國之安全有被任何非簽字國一方面之建造新艦危及之虞時，得增加本國任何一類軍艦的噸數。遇此項情形時的唯一要件，即該簽字國須迅速通知其他簽字國。後者即因之得隨意在本國海軍中作相準之增加。雖然該條約明顯地給與英、美兩國對等的地位，並阻遏眼前的軍備的競爭，但它殊不配受它在各界所得到的歡迎。依照倫敦的協定，美國的海軍噸數分配額爲一一、一四六、〇〇〇噸——祇比它在倫敦會議開幕時所有的海軍力量少七千噸。復次，爲替換陳舊的軍艦並建造新艦以達對等的水準起見，我們估計美國在一九三一——一九三六年之時期內當耗費十餘萬萬元。最後，因爲沒有擔保安全的特別規定，法國於離開會議後就決意保持優越於意大利所可趕造者的艦隊。意國也決定建造可與法國的海軍對等的艦隊。

當倫敦海軍會議正在進行的當兒，軍縮會議籌備委員會已將其第六屆會議延期舉行，希望海軍的難關或可打破。法、意之未能簽字於倫敦條約及一般人對於國聯大會開會期（一九三〇年九月）內可能的新發展之期望，將該委員會的休會時期延長到十一月。可是第六屆會議接着就重新舉行了，到會的代表也決意設法得到

結果。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九日，最後的軍縮會議協定草案卒被採用。但表決的票是不一致的，而一兩國在許多實際上極重要的條文後面，幾乎都附有重要的保留條件。

一九三一年一月，國聯行政院擇定日內瓦爲世界第一次軍縮會議的會址，並規定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爲開會日期。四個月後，行政會又派定英國的第二次勞工政府的外交大臣漢德森(Henderson)爲該會議的主席。在八月間，勞工政府顛覆，漢德森成爲反對黨勞工黨的領袖，但當軍縮會議開會時，他仍以主席資格出席。國聯的第十二屆大會因意大利外交大臣格蘭第(Grandi)的動議，通過了一項決議案(一九三一年九月)，要求行政院推促各國政府爲證明各該國亟切希望將來的會議的成功，承諾在一年內「不取任何涉及軍備增加的政策」，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此種軍備的休戰(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起發生效力)業經五十四國(連美國與蘇俄在內)承認。當軍縮會議開幕的時候，出席的代表有兩百多人，代表着約六十個國家。

在一九三二年二月被提出於軍縮會議的協定草案是一件極浮泛的公文，它指出所可採取的限制方法，但它將此種方法之應用，及關於比率與數字的決定，留由軍縮會議去解決。它是一具「沒有血肉的骸骨」，並祇供給了許多空白和「——」形的符號，以代數字。其中逐一舉示的意見有下列諸項：軍備之預算限制；兵役年限之限制；陸海空軍兵額之限制；接受倫敦條約中所規定之海軍限制方式；設立常置裁軍委員會於日內瓦以便將各國履行所定裁軍條約(Disarmament Treaty)之進行情形報告國聯行政院。

比各國對於以上諸點和其他許多地方所提出的大批保留條件更足爲軍縮會議的進行之不祥預兆者，也

各大國的軍備經費表

	單位百萬元		自1913-14 至1930-31 之增加或減 少的百分率	1930年之 批發價指數 (1913=100)	1930-31年 每人的 軍備費用 (單位為元)
	1913-14	1930-31			
英.....	375.1	535	+ 42	116	11.48
法.....	348.7	455.3	+ 30	105	13.13
意.....	179.1	258.9	+ 44	100	7.92
日.....	95.5	232.1	+142	131	4.04
俄.....	447.7	579.4	+ 30	185	3.58
美.....	244.6	727.7	+197	118	6.84
合計(除去德國)	1690.7	2788.4	+ 65
德.....	463.3	170.4	- 63	122	2.70
合計(包括德國)	2154	2958.8	+ 37

的軍備當減少三分之一。他主張廢除一切坦克車，轟炸飛機，可行動的大砲，及化學戰爭；將超過警察部分的最低額之一切陸軍及潛水艇與戰艦的噸數減少三分之一；將一切航空母艦，巡洋艦和驅逐艦的噸數減少四分之一。他說：「現在是我們應當斬除荆棘並採取廣大的和確定的裁軍方法以減輕世界勞苦者所荷重負的時機了」。此項裁減，不但會增加和平的保證，並足使「全世界的人民在將來十年中節省一百至一百五十億元的無謂耗費」。

意大利、德意志和俄羅斯歡迎這個計劃，但英國和日本反對完全廢除坦克車、爆炸飛機和可行動的大砲。法國「表同情」於這個計劃，但提醒大會道，軍備之裁減仍與國際安全保障之組織有不能脫離的關係。它又說明這個計劃是不完備的，因為其中並無遇有從事侵略之國時適用國際制裁之規定。於是會議又成僵局，經過幾個月月的幾無效果的討論後，乃宣告休會至一九三二年一月。（註）

（註）在關於賠款問題的洛桑會議（舉行於一九三二年六月、七月）之進行中，英、法兩國找到機會成立一個協定，準備「以完全的坦白態度」互相交換關於幾個未解決的問題如賠償、經濟復興與裁軍等的意見。道在起初，被其他國家認為已在一九二三年歸於無效的「友誼協定」的重訂，但在以後數月內，其他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也加入了這個協定。

因第一次軍縮會議之實際失敗和法國之態度而發生的最不幸的結果，其中之一就是在意、俄、德三國所引起的反響。前兩國的當局對於國聯和國際和平會議之無能，比先前更鄙夷和不耐了。在德國，一般人對於歐洲各國的軍事準備和同盟組織之恐懼，對於法國的不肯讓步之厭惡，及希冀祖國達到與其他大國完全平等的地位

之熱望，增強了這般暴躁的國家主義者的勢力。他們借國防部長施萊轍將軍的口斷然要求（一九三二年八月—九月），世界各國如不將其軍備裁減至凡爾賽條約中爲德國所規定的水準，就應該承認德人爲一個大民族的平等地位，且不阻礙他們擴充武備到他們的鄰邦的程度。德國政府也宣稱本國無意於再參加軍縮會議，除非德國人在國際間的絕對平等之權利得到其他各國承認之後。

照上面看來，在「以戰止戰」的戰爭結束後十四年，世界的軍備情形隱然爲新戰爭的最大威脅之一。世界上武裝的人數在任何一刻都比一九一三年中任何時間的人數多得多，而當着這種普遍於全世界的經濟恐慌，各大國政府還在將國家的預算經費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專用於付償過去的戰費，支持目前的防禦，和準備將來的戰事。千百萬民衆的呼聲仍舊是「安全保障與裁軍」。

第九章 非洲和亞洲的不安

覺悟的非洲

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德國向協約國提議，在戰爭期中非洲殖民地的中立應予維持，其理由則謂歐洲在非洲霸權之保全，全賴白種人一致團結。協約國拒絕此項提議，於是戰事終波及非洲和地球上其他部分。這樣一來，隨着長期的武裝衝突而有的普遍紊亂，連同其他許多原因，竟使非洲自摩洛哥至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在戰後發生很大的不安。

這些原因中更有挑撥性的要算下面幾種：第一，土人對於白人的長期虐待的反動；第二，宗教教義的影響；第三，白人與黑人在比較開化的區域，有如南非，漸起對於工作的競爭；第四，少許教育的效果。

當泰西民族在十九世紀計劃開闢這個黑暗大陸的時候，他們確實知道他們對於落伍的非洲人的道德責任。在一八八五年之初，西歐各主要國家的代表曾於柏林會議的總決議書 (General Act) 裏面商定，爲人類與文明之故來「保護土人的精神上與物質上的幸福；合作從事禁止奴隸制度與奴隸買賣；增進土人的教育與文化程度；保護傳教師，科學家與探險者」；並保持信教的自由。但推促柏林會議限制酒類與軍火之販賣的企圖，除

使會衆有願意贊成取締這種貿易之表示外，毫無結果。

柏林會議的協定和志願都沒有人遵守，有很多年，威士忌酒、軍火和奴隸的貿易非常繁盛。雖然當時有許多人講到不久被稱爲「白人的責任」的一句話，但在戰前，向着「負起這個責任」一方面所做的事情比較來得少。實在，白種的特許權所有者，自比利奧坡爾得(Leopold)至倫敦人伊薩克斯(Isacs)，因欲使他們的投資賺得肥利，曾經使用種種不道德的和非人道的榨取手段。非洲的天然富源和土人的體力都被他們無情地剝削着，直到土人受壓迫不過，於絕望中羣起反對「黑人的重負」。

舉個例來說，在墾雅(Kenya)地方，即從前的英屬東非，不安的情形到一九二一年竟達到了頂點，當時白種的雇主因普遍的經濟恐慌，宣布減低所有黑種工人的工資，至原值三分之二。黑人起初是束手無策的，但後來有一個在政府當書記的土人叫圖苦(Thuku)的，起來創立「東非土人聯合會」，並召集會議，以便提出抗議。圖苦的言論漸漸有激烈的和反歐人的氣味，雖然據說他犯了很多罪案，他的會議有時居然有五千之多的土人出席。在一九二二年，他被控謀叛而遭逮捕，當羣衆圍集獄前，想要干涉警察的行動時，守卒立刻放鎗，射殺暴動者約二十人。圖苦未經審判就被流到周巴蘭(Juba land)，此後那般失去領袖的土人祇好組織一個無害的「黑人職工協會」來保護他們的公共利益，而聊以自慰。

雖然在非洲的教士所傳佈的教義常常被認爲足使土人自安於比其白種主人較低下的地位，有些道理卻得到相反的效果。聖經中的故事如大衛(David)之戰勝歌利亞(Goliath)等類之複述，「人類皆爲上帝的兒

女」一語之保證及如「前進啊，基督的戰士們，像赴戰一樣前進」之詩歌中所表現的情緒，在在使黑人感奮。我們鑒於黑人之易傾向於「信仰復興者會議」這一種的感情的運動，就毫不驚異非洲各處竟會有演神蹟的人和所謂先知者出現，這般人吸引了很多土著的徒衆。這種運動往往成爲極端反歐人的。

這些表示中最有威脅性的一次，莫過於在一九二一年發生於比屬剛果（Congo）者，那裏有一個成爲浸禮會教徒的木匠，名叫金彭古（Kimbangu），他做夢受着聖靈的感召，叫他去治療病人。他遵從這個神諭，也許醫好了幾個人，因此他的信徒馬上大增。「金彭古黨人」於是自行設立禮拜堂，教會和學校，更糟糕者，他們又阻止田野的工作以便親近先知金彭古。這位先知口若懸河地援引聖經中的章句並大吹法螺道，他的敵人無能力來加害於他。這個運動漸漸變成更激烈的和更革命的運動，住在剛果的白人爲之膽戰心驚。金彭古不久被捕，經過情景如繪的審問，被判處死刑，雖然他從未主張用激烈手段抵抗白人。後來他的刑罰被改爲終身監禁。因有這一次和同樣的事件，下剛果（Lower Congo）的地方官乃頒佈告示，禁止任何土人未領得新教或天主教教會的執照而傳道或說教。

在南非聯邦，引起不安的乃黑人與白人競爭工作一事。該地的黑人，其人數以四或五對一超過白人，漸漸熟練於前爲白人所獨占的各種職業。這種對於白人之優勢的挑戰成爲非常嚴重的情勢，以致在一九一八年白人的職工協會揚言除非將有色人種的工人解職，他們就將發動罷工。

雖然南非的最高法院對於單因人種之故而歧視有同等能力的人的法律抱反對的態度，職工協會還是連

同南非勞工黨繼續騷動，直至勞工黨執政權時為止。接着在一九二六年，通過了排斥有色人種法案（Color Bar Bill），斷然擯除黑人於數種職業之外。白人和黑人雖做同一的工作，而白人的工資往往五至十倍於黑人所得一事實，自然是表明着有些雇主寧願雇用黑人。然而劇烈降低的一般生活程度之危險是很重大的，這足使比較奢華的白種勞工至少暫時能夠維持其優越地位。

非人所受的少許教育，結果使土人中幾個領袖人物感覺到非洲的狀況需要根本的改良，並須立定主張來求得較公平的待遇。果然，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三年，來自非洲的黑人代表和來自美洲的幾個，陸續會集於巴黎，倫敦與里斯本（Lisbon）在「汎非大會」的主持之下，草擬了黑人自由憲章。（註）所提出的要求中有關於政治上，經濟上和教育上之平等；被沒收的土人土地之發還；白人在工業上與特許權上對於黑人的巧取豪奪之抑止；及由國際聯合會直接委派外交代表，賦與調查委任統治地的權力等等。

（註）出席大會的國數自三十一（一九二一年）減至十三（一九二三年）。

這幾大會雖然不能生出直接的改良，但已立定了漸起的種族自覺心之基礎，並足以使世人知道黑人也認知「他們的」大陸之經濟價值。當然，非洲有人口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之多，其面積幾等於歐洲與北美洲之併合，它的價值祇有與年俱增。金子、金鋼鑽、出自植物的油類、可可、咖啡、木料、銅、錫、橡皮、糖、棉花，其巨量都可在非洲找到或產生，更不必說象牙、牲口、肉類、煤、果實和胡椒等物了。有知識的土人自然認為這種寶藏是值得一爭的。他們決意使「白種人的非洲」這個呼聲最後被他們自己的一個呼聲：「非洲人的非洲」壓倒。

輓近非洲的各種發展

在戰後許多年，不但非洲的黑人取了一種新的態度，白人也改變了他們對於土人地位的若干方面的觀點。不錯，在大戰期中，傳統的實利主義的政策曾經反映於協約國對於德國殖民地的祕密處置中。然而在巴黎和會，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卻和這種帝國主義者的野心相衝突了。後來雙方成立了一個妥協，而在國聯盟約中，那些「尚不能獨立於現代世界之奮鬥情形下」的民族，「幸福與發展」被指定為「文明的神聖義務」。因之，協約國未成為藉口德國虐待土人而從之奪取過來的土地的公然所有主，倒做了國聯所派處理各該殖民地的受託人或管家。

儘管事實上我們對於此種處置法易於取譏笑的見解，特別是因為委任統治地之分配幾乎不爽毫釐地遵循着祕密條約所定的方針，但我們必須承認，對於受託國義務之書面提醒及常置委任統治地委員會之設立，無疑地使白種的統治者想到他們的道義上的責任——教育殖民地人民並為土人與歐人的利益發展海外的土地。此種覺悟頗有助於若干殖民地改革案之提出，而委任統治國對於其非委任統治之屬地的政策，偶而也受到這種受託精神的影響。

白人畢竟漸漸感到土人勞力之濫用及土著人口之滅亡，完全與西方之經濟利益不調和。一般特許權所有者也覺得橡皮種植地非有土人來加以耕作，是毫無價值的。關於金剛石礦與金礦及水果園地，情形也是一樣。因

之白人恐怕經濟上受損失的心理，亦足使若干地方改善對於土人的待遇。

自一九二〇年以來，法國致力於鼓勵其海外屬地的經濟發展。它希望從殖民地得到大部分的輸入品，特別是原料。然而進步很慢，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包括在巴黎舉行的一次盛大的殖民地博覽會（一九三一年），法國的殖民地輸入品差不多有十分之九仍是來自其他各國的屬地的。（註）

（註）在一九二〇年，法國所用的棉花祇有百分之一來自該國殖民地，至一九二五年，則達百分之二。

法國當局開始注意到非洲屬地的職業教育之普及。因為課程係用法語教授，所以此種改革附帶地足使任何法國軍官能够直接指揮土人的軍隊。就事實而言，大戰後法國在非洲所有的殖民地都已採用了徵兵制。據一位法國歷史家說，土人所組織的外援軍被激勵着來博取「保護法國國旗的榮譽」。法國又決定以公民權給與在大戰期內以文官資格或在軍隊中卓著勞績的土人，作為同化其非洲「子民」的獎勵辦法。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時期中，法屬西非的土人中祇有八十八個接受這個懸賞。然而教育與經濟改良的示惠政策，其影響力有時仍為向土人問罪之師所用的嚴酷手段所掩。

英國國會曾於一九二五年組織一個調查團到東非洲去遊歷，該團回來報告道，他們深信「受託者的地位含有一種道德的觀念，這就是說，這種地位賦與受託者一種道德上的義務和道德上的態度」。雖然英國政府不能完全遵守這個報告的精神，但有幾處殖民地對於土人犯小過者所加的刑罰，比先前來得輕了。土人受教育的機會亦有增加，政府並充分地幫助屬地來維持其教會。可是，概括地說來，凡遇土人的利益與白人的利益相衝突

的時候，白人總是謹慎的設法保持優勢。

在其他區域，一般無情的非法利用土人者的行爲，常常傳入能厲行改革方案的一羣人的耳中。譬如，美國人羅士（Ross）教授在一九二五年遊歷葡屬非洲後，將他所目擊的當地情形著成一書，發表出來，馬上引起國聯的注意。其結果使葡萄牙政府不得不於一九二六年在各殖民區域設立一個保護委員會。非洲的其他地方也有同樣的改良。

簡言之，目前的非洲問題，和歐洲在非洲的問題，似乎不出下述：如果給與土人相當的教育和經濟機會，他們當然至少會要求自治，假使不是獨立。如果叫他們仍處奴隸的地位，不使受教育，且不給與出頭的機會，則於開發非洲的天然富源之中，他們就沒有多大用處。人道主義和利他主義上的種種理由，固足爲推廣精神的與實際的教育之激勵，同時已傳播的有限教化亦有助於各處要求平等待遇的呼聲之出現。西方世界顯然必須聚精會神來找出一個解決非洲難局的可行辦法。非洲必須繼續從歐洲學知一切，而白人的義務似乎是在爲世界之進步與文明起見，以最大可能的友誼態度來啓迪非洲。

西方與亞洲

西方與東方在亞洲的衝突的主要特點之一，即在使那個大陸過速地工業化之企圖。龐大的和保守的亞洲民衆，佔世界的全人口之半；他們被古老的文化（其中有達兩千年之久者）所束縛；受專制政治，階級制度和原

始的遺傳法式之壓制；在有些地方被分裂於新起的民族主義與貪婪的西方帝國主義之間，但在其他部分卻尚未蒙白種人光臨存問；他們的言語殊不統一，其宗教上的信仰也很分歧——這個龐大的亞洲因與西方接觸而極受攪亂，特別是在二十世紀。外來的民族如歐洲人與美洲人之力求支配亞洲人一事實，適足迫使亞洲人越發尊敬和崇拜他們自己的傳統法式與習慣。他們以熱烈的不屈不撓之精神固持他們的老法子——自然常常因此自貽伊戚。在這種環境之內，西方人卻設法火急地帶進火車路、電流、大工廠、工業機械、西方的「效能方法」，以及歐美資本主義的所有裝飾具。

歐洲在達到目前的文明狀態之前，經過了一個文藝復興，一個宗教改革，一世紀的宗教戰爭，一個法國大革命時期，和一個工業革命——但在亞洲，目的卻在把中古的塔塢馬上變為二十世紀的工業蜂房。亞洲被迫着在同一个時候感受十重革命的一切痛苦。

使亞洲加速工業化的企圖，並非亞洲人所不得不目擊的唯一令人迷惑現象。他還被迫來環顧許多困惑的和可怖的特異事物的對照。在他看來，這是多麼令人驚異的事，因為他有時幾乎同時聽到傳教師的甜言蜜語和機關鎗的射擊聲；一面有人告訴他威爾遜的十四點和自決的原則，一面又看到外國的兵船橫行直撞於中國的內河，外國的戰鬪機飛來飛去於阿富汗村莊的空中，或外國的軍隊昂然而行於印度的城鎮。他見到西方人很容易將高尚的理想主義與卑陋的物質主義混和，又見到仁慈的右手與貪婪的左手之間全不相合，一定也很錯愕。他聞知他的專制政體已被排斥，可又看見更專制的政府成立。更使他大惑不解者，在大戰之後，他從幾個歐洲人

聽到工業制度的種種神奇，資本主義的種種利益，但又從另外幾個歐洲人聽到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種種罪惡，及根據於共產制度的世界大同之光榮。不特此也，他對於自己的現狀也不滿意。他將何所適從呢？

亞洲人不曉得他們所要的是什麼，這就是他們的不幸情形之一。他們不滿意一切，同時又受壓迫和挫折。他們祇是在黑暗中摸索，當他們非無感覺的時候，又很氣惱。他們的最大的躓石，即在缺乏勝任的領袖。往往雖有此種領袖崛起，不是毫無經驗的人，即為懷抱着誇大而神祕的計劃與夢想的幻想家。那般有利害關係的一羣人，大概不難設法抵制這些領袖的勢力，不是譏笑他們為幼年的學童，就是將他們投入牢獄。充其量，這種勢力不過為反抗衝風爐與裝甲坦克車的演說與詛咒而已。然而這個定則也有若干顯著的例外，尤其是聖地和「中國的華盛頓」孫逸仙博士。（註）

（註）關於巴力斯坦、印度、敘利亞、中國與日本在大戰後的發展情形的討論，見第十一、十二與二十一各章。

亞洲與大戰

構成亞洲的鉅數人口的十來萬萬民衆，覺得他們的日常生活不因世界大戰的軍事情形而有多大改變。就是印度和中國也祇稍稍受點影響。在印度，有一百多萬人站在英國一方作戰，但有三萬萬以上的人民仍留在家裏，其中大多數還不曉得世界大戰正在進行。說到中國，正式宣戰的結果，祇沒收了少數停留在中國港口的德國商船及派遣了苦力到歐洲後方作工。

大戰的進行在亞洲所生的效果，比較重要的還是經濟上和心理上的。許多溫和的印度領袖起初相信忠心的印度當受政治自治之報酬，但在戰後，卻感失望而變爲激烈派和懷恨的人了。同時有幾個領袖，因參加巴黎和會和幾次英帝國會議而增加了不少經驗與名聲。再者，在大戰時期中，印度的鋼鐵工業因鼓勵而大有進步，印度與日本之間也成立了新的商業關係。這兩種發展附帶地對於英、印之間的貿易差額，發生了不利的反作用。

在中國，因膠州自德國轉入日本之手，重新煽起少年中國的民族主義之火焰，一般民衆力求保持本國的權利。然而日本和其他關係國家馬上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加以外交的壓力。因之由中國許多真正的愛國者看來，雖然民族主義在西方被頌爲國民的崇拜對象，但這同一的精神，在出現於所謂落伍國家的時候，就被踐踏於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在波斯，即在英人、俄人和土人混戰過的中立國土，大戰後國民的憤怒是非常強烈的，以致柔弱的君主終被斥逐，而成立了在李香可汗（Riza Khan）的獨裁下的愛國政府，他終於一九二五年被宣布爲波斯國王。

遼遠的荷屬東印度，其人口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在一九一九年後的數年中，也感到很大的不安。當地政府責難俄國的鼓動騷亂，姑不問其言是真是假，誰也不能否認該地蔓延着普遍的不滿。然而荷屬所派來的幾隊兵馬上使那般懷怨政府的人確信他們還沒有被包括於民主的世界。

雖然「亞洲人的叛亂」——對於歐人的統治的憤怒，及對於改變的經濟與社會情形（發生於亞洲之「現代化」者）所致的痛苦之不平——有各種不同的表現方法，但土人所能用以對抗西方的機器與軍器的唯一

有效之武器是經濟上的絕交，或排貨運動。亂事是可以壓倒的，炸彈確比弓箭或槍矛來得有破壞性，坦克車也較蠻勇更爲致命——但打敗東方的經濟絕交的唯一途徑祇有讓步。有好幾次，當日本對華的要求非常引起反感的時候，它不勝中國絕它的貿易與商業的威脅，迫得祇好放手。英國也屢次感到印度的排貨運動的勢力可怕，雖說它實際上從未屈服，它也寧願不要來對付這種不快的現象。但這裏又因缺乏適當的領袖，以致阻塞了團結的路子，來向西人提出公平待遇的要求。

大戰後有一個時期，亞洲的不安情形之普遍引起了關於「汎亞細亞」運動的談論。西方有些地方的人，恐怕亞洲人會造成一個等重的勢力來對抗國際聯合會，接着斷然將東方和西方分爲兩個強有力的而互相敵視的同盟。可是「汎歐羅巴」似乎是遼遠的了，「汎亞細亞」當更屬遙遙。例如，有人說過，印度與中國之間的心理上的差異，比西歐與中國之間的一樣差異還來得大。被歐洲人泛稱爲「亞洲人」的許多集團，其實彼此之間是給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和宗教的裂口分開得很遠的，而這種裂口比歐洲各民族之間的裂口還大得多。

有更直接的重要性的事情是亞洲與國聯的關係。日本自然不但成爲會員國，且爲主要的會員國，在國聯行政院中獲得常任理事的席次，在國際事務中亦有有力的發言權。中國也成爲會員國，並當選爲非常任理事。同樣，波斯、印度與暹羅各以其本身權利加入國聯，並且都在國聯的事業中有積極的行動。

當我們想到國聯在根本上被認爲一種組織，所以預防並挽救發生於歐洲大勢（而非亞洲的大勢）的發展的敵愾心者時，以上這些關係更堪注意。（註）亞洲對於國聯將來的信任多賴於後者對於亞洲許多奮鬥的國

家（有如中國）的態度——這些國家正以極大的努力來吸收東方與西方的衝突之震動，並達到兩者間的妥協。

（註）日本的情形是不足驚異的，因為日本的本身是一個「軍國化、工業化、商業化的一等國家」。

從實質上的見地看來，亞洲需要幫助，必須學得西方的進步，並無疑地應以相當的速率來採取西方的若干方法。人民應受教育，穩固的政府應即設立，機器必予利用，耕作方法必加改良，若干宗教的儀式應有修正，較廣的見解應加採取，而經濟的制度當使與世界一般經濟組織相調和。但這不是一日的工夫所能成就的，也不能強制不願意受領的人來辦到。亞洲人的傳統法式也不必完全加以排斥而代以歐洲人的慣例。反之，亞洲人的傳統法式當使從中古的風氣變化出來，漸使適合現代的情形。第一是要有新的見解與態度，然後要有新的方法——這在風俗習慣佔重要地位的區域中，似乎是最有效的捷徑。

第二篇 列國場面

第十章 大不列顛

戰爭與和平

在英國加入大戰的時候，亞斯基司 (Asquith) 領導之下的自由黨得愛爾蘭國家主義黨和工黨的擁護統制了政府。但是，這個內閣不久就不孚衆望了。當時的輿論對於報紙的檢查，遲鈍的軍火運輸，因戰爭而獲利者的活動，徵兵制度和加利波利 (Gallipoli) 地方的敗仗，大聲攻擊。亞斯基司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就覺得改組內閣較爲妥當。新的政府就此成立了，這個政府是以自由黨，保守黨與工黨的大聯合爲後盾的。大衛·勞合喬治被任爲軍火部部长。

這個改組的內閣證明爲太無統治的能力並過於迂緩，不能使活動的勞合喬治滿意。他在一年半的時間之內，設法將自己陞到亞斯基司的地位，做了首相。因此政府的種種事務之進行迅速地得到新的力量。因爲大戰經久的關係，國會的生命就延長了。國會曾嘗試解決久懸不決的愛爾蘭問題；印度的情狀也經調查研究，意在向政

府建議種種改革；修改選舉制度，使三十歲以上的婦女有選舉權；通過斐雪（Tilator）所提的兩個教育案，使初等教育為兒童應受的強迫教育，並限制工廠中的童工，但實施這些法律所需的經費卻不能立即籌得。

一九一八年秋季之末，勞合喬治覺得全體選舉人應該再投票一次以表示意見，於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召集新的選舉。這次選舉是從幾星期內敵對行動的順利結束得來的，他自然盼望牠的結果它能使政府得到輕易的勝利。在這些「茶褐色選舉」中，勞合喬治向人民呼籲，要求人民憑了戰時政黨聯合政府的成績而擁護牠，他與人民相約，假如他們贊同，他主張把威廉第二絞死，並向德意志索取巨額賠款。他保證將通過幾種法案以阻止外貨的傾銷和保護「主要的實業」。最後，勞合喬治預許解決愛爾蘭問題，改組上議院，並妥善照顧退伍將士。

在選舉運動之中，一部分自由黨、保守黨黨員和工黨全體黨員，脫離了這個政黨聯合政府。可是，以這個政綱的立場，聯合政府竟在下議院得到總數三分之二席。工黨佔了六十三席，成為正式的反對黨。這個聯合政府的開員，百分之七十是保守黨黨員，因此，首相雖是自由黨黨員，保守黨在內閣中仍佔優勢。勞合喬治立即到巴黎去，但在簽訂和平條約之後，他忙於處理帝國行政的種種事件。不久，他的注意力又為英國危急經濟形勢所吸引。

在大戰後的前數年中，不列顛的實業昇到繁榮的頂點。全世界正在傾向於「補足耗盡的貨物，只想到購買」。物價和工資扶搖直上，受雇人員的數字迅速地增加，而當時有縮短一星期中工作日數的普遍趨向。一九二〇年之中，英國註冊的公司的數目，三倍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十月，生活費用較大戰前高了二·六七倍。但是，

這種情形是暫時市價飛漲的結果並不能持久。

將近一九二〇年年終的時候，種種情形遇到突然的變化。許多嚴重的罷工發生了，失業人數增加得非常之速，以致國會通過了新的失業保險條例以替代一九一一年的失業保險條例（Unemployment Insurance Act）。在一九二一年七月，英國四千二百萬人口之中有兩百萬人是閒散的。這種不幸之事有許多原因。大戰使英國貨物的幾個最好顧客，包括德意志、俄羅斯和多瑙河畔諸國家，成爲貧乏。於是，當不列顛努力恢復金本位並使金鎊重新達到大戰前的價值的時候，而大部分大陸（歐洲）政府都採取通貨膨脹的手段。在世界市場中，這種情形的意義就是說，英國貨物的價格非常昂貴，因爲不列顛的製造費大大地超過了那些通貨膨脹而勞工價值低落的國家。並且，英國的機器與工廠在大戰期內未遭損傷，這種情形並非一種幸福。因爲現在，英國雖然擁有許多機器，但許多機器之中大部分是虛舊不堪的了。與美國和德國所應用的較新式的方法與工具相競爭，因此更爲困難。（註）

（註）有一個時期，當德國國內五分之四的煤是用機器淘出的時候，英國的煤礦只有四分之一是用機器的。

在大戰期內，不列顛喪失了許多市場，給更幸運的勁敵（最顯著的爲美國與日本）搶去。美國在拉丁美洲佔去了許多不列顛的市場，而日本在中國與印度也是如此。並且，在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一九年之間，成千成萬英國婦女加入了勞工界，佔據以前留給男子的職位。當遣散的兵士歸來尋求工作的時候，婦女自然不肯全體放棄她們的職位。復有一點，新興的和具有濃厚國家主義色彩的幾個大陸國家所設的很高的關稅障壁，重重減削了

不列顛的出口商業。因爲一九二二年不列顛的人口與生產能力較在一九一三年的大爲增加，她的出口商業的普遍縮減引起很大的憂慮。她的外國顧客在一九二四那一年，確較大戰前少去三分之一。

除了這些因素之外，英國在大戰時的巨額損失必須計及。這種損失遠過於大不列顛帝國的其餘部分合併起來所遭的損失。她約有七五〇、〇〇〇人死於戰爭，而有兩倍於此數的人受傷。她的戰爭費用總數超過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她的內外債務在大戰終了時竟十倍於一九一四年所有的債務，約有二二〇〇隻船舶，共有八、〇〇〇、〇〇〇噸的排水量者，也被毀壞了。這個因素也許對於造船業發生刺激的作用，但德國之被強迫交出她的大部分船隻，抑制了此項發展。到一九二一年，英國造船業所雇用的人員，幾乎有三分之一無工可作。不列顛人不像俄羅斯人和法蘭西人，不能在工業不景氣的時期回到農業；這種事實使失業問題益爲劇烈。英國本來是一個製造業國家和出口國家。她的人口之中只有百分之七從事農業，她的糧食的百分之六十必須有待外國輸入。因此，這種危機的唯一解決方法，祇有復興商業與工業。

首先須應付這種複雜情勢的政府就是勞合喬治領導下的政黨聯合政府。牠最初依賴兩種暫時的權宜辦法。一種辦法是失業保險津貼比例的重行支配，以便將每星期十五先令的「賑濟物」分配給被迫失業的男子，以十二先令給被迫失業的婦女，每年最多以十五星期爲限。這種辦法不免增加每年數百萬鎊的開支，充其量不過有一時的價值而已，絕不能救濟長期的失業。第二種辦法是，政府鼓勵無業的工人移殖到帝國的其他部分去，尤其是到加拿大。但因爲勞工們通常不熱心於移殖，並因許多領土設有嚴酷的入口限制，這個計劃並不能有所

裨益。

但是，在一九二一年，政府曾作兩次企圖，想從復興實業入手，謀這種困難的根本解決。在三月間英國和俄羅斯簽訂了商業協定，互相保證彼此不得利用宣傳相對抗。後來，得到勞合喬治的勉強同意，通過了實業保障條例（Safeguarding of Industries Act）。此項條例是聯合政府中保守黨份子所堅決主張的；其中規定徵收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的保護稅以保護某數種主要工業，這種工業被認為「在另一大戰時所不可缺少的」。該項條例對於由錢幣跌價的國家所輸入的貨物亦行徵稅。英國這樣背離它的傳統自由貿易政策，引起了許多不利的批評。

包爾溫與麥唐納

同時保守黨漸漸不悅勞合喬治所佔的優勢。他們厭惡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中與愛爾蘭所簽訂的條約，（註）而贊成與法蘭西發生更密切的合作。他們對於英國正在近東與中東所遇到的煩擾大鳴不平，而攻擊政府奢侈浪費。因此保守黨在一九二二年十月於「卡爾登俱樂部」（Carlton Club）舉行政黨會議，決定退出聯合政府。勞合喬治為此辭職，由保守黨首領安德烈·達涅·勞（Andrew Bonar Law）組閣。因為保守黨在國會中所能操縱的議員僅僅是多數（而非大多數），所以必須舉行新選舉。於是規定十一月十五日為選舉日期。

（註）參看本章自由派與共和黨一節。

保守黨以統一的陣線和預許「安靜穩定」的政綱加入選舉運動。自由黨的陣線卻很散漫。勞合喬治爲所謂「國家自由黨」的首領，重又指出他在大戰時期的成績，預許經濟掙節，並贊揚強有力政府的優點。亞斯基司對於那個威爾斯人（指勞合喬治）在大戰時所用的策略仍懷怨恨，乃組織「獨立自由黨」，贊成自由貿易與節約政策。許多選舉者以前曾選舉自由黨黨員，現在準備選舉工黨，工黨的政綱帶有溫和的社會主義的色彩。其中主張礦山與鐵路收歸國有；通過進步的社會法律；和採取和平的外交政策。

選舉的競爭結果，使保守黨大獲全勝，竟得到一半以上的席數。工黨在一九〇〇年僅獲得兩席，現在得到一四二席。自由黨佔可憐的第三位。逢涅·勞保持首相職位，但他的病軀使他不得不在一九二三年五月間辭職。他的繼任者是經驗較少的斯忒來·包爾溫（Stanley Baldwin），他以前是一個商人，一九〇六年加入政界，在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二三年之間曾數任財政上的重要職位，並曾在一九二三年正月規劃英國償還美國的戰債資

金。

包爾溫常常喜歡說：「我不是一個聰明人」，他卻須應付失業的嚴重情形，這在此時已成爲「長期的痼疾」。他有些慌張了，遂欣然採納他同事中幾個極端派的意見，以爲保護政策與帝國優先權（帝國幾部分之間的優先關稅率）爲實業不景氣的唯一救濟法。但是，因爲逢涅·勞業已保證如不經人民的同意決不變更關稅率，包爾溫覺得爲顧及榮譽信用計，勢必解散國會，乃定於十二月舉行新的選舉。這樣，一個穩定的大多數爲了關稅問題竟有搖動的危險了。

這種出乎預料之外的事件，激使自由黨黨員入於更新的行動。亞斯基司與勞喬治兩人和好了，努力從事於繼續自由貿易的運動。假如他們不能使保守黨失去政權，自由黨人希望至少把以前給工黨佔去的席數重新爭奪回來。保守黨指出全世界處處設有妨害英國貨物的關稅障壁，英國已成爲外國製造品的傾銷場所了。他們以爲不列顛帝國可以自給，一種帝國內部優先稅率制度可使帝國各部分不致依賴外國的好意與商品。保守黨縱然盼望對於製造品課以重稅，但他們預計對於原料、小麥、或肉類不徵稅，並贊成對於幾種物品（最顯著的是糖）減少稅率。工黨重又對公衆表示他們的社會主義的見地。他們贊成自由貿易，建議將礦山與鐵路收歸國有，要求政府資助房屋建築與電力發展，主張對於所有超過五千鎊的財產徵收資產稅，並提議修改凡爾賽條約。因爲選舉陷於三角的局面，故保守黨所得普選票數雖與以前的選舉相同，但竟失去九十席之多。雖然他們仍爲下議院中最大的政黨，現在卻不能操縱所需以支配下議院的大多數了。反之，工黨卻增加了他們的代表席數達一九一席，而自由黨以一五七席居第三位。

當國會在一九二四年正月開會時，自由黨與工黨聯合起來對包爾溫政府投不信任票。勞喬治——亞斯基司團體寧願與未曾嘗試過的工黨組成聯盟，而不願鼓勵保守黨內閣以其「紊亂、猶豫、無能」等特色爲治。因此詹姆士·拉姆西·麥唐納（James Ramsay MacDonald）（工黨的首領）成爲英國首次工黨政府的領袖了。^(註)

（註）不列顛工黨的勃興是比較迅速的。這個政黨是全靠一個勞工代表委員會的努力而組成的，委員會在一九〇〇年第一次開會時努

力爲工人獲得適當的政治代表地位。牠雖則並不真正表同情於社會主義，但牠得到知識階級的社會主義者的會社——例如「費邊協社」(Fabian Society)與「獨立勞工黨」的悉心協助；獨立勞工黨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組織，爲前礦工技爾·哈第(Harley)在一八九三年所創立的。下表表示工黨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三一年所獲得的總票數，和黨員中被選爲下院議員者的數目：

年 份	票 數	當選爲下院議員之黨員
一九〇〇	六〇,〇〇〇	二
一九〇六	三二三,〇〇〇	二九
一九一〇(正月)	五〇五,〇〇〇	四〇
一九一〇(十二月)	三七五,〇〇〇	四二
一九一八	二,二四四,〇〇〇	五七
一九二二	四,二三五,〇〇〇	一四二
一九二三	四,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
一九二四	五,五〇〇,〇〇〇	一五一
一九二九	八,三八〇,〇〇〇	二八九
一九三一	七,〇〇〇,〇〇〇	五二

(數目減少原因在後面講及)

(數目增加一部分由於婦女獲選舉權關係)

這個政黨願意藉國會的方法實現社會改革，贊成實業收歸國有並與業主以補償，擁護目前的君主立憲政體，主張帝國依地方自治的方針發展，反對階級戰爭。

麥唐納生於一八六六年，爲工人之子，誕生地在蘇格蘭的羅西謨斯（Rossiemouth）小漁村。他有一個時期做過通學生，但其大部分教育是從上夜課和勤讀得來的。後來他擇定新聞家的生涯，時常遊歷帝國的各地方。在一八九六年，他與一個大學教授的女兒結婚。麥唐納夫人的叔父就是著名的化學家克爾文（Kelvin）爵士，她使她的丈夫獲得上等的社交和許多財富。

麥唐納在他事業的早期，對於知識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和英國職工組合派在政治上的融合，曾盡力促其實現；他也是不列顛工黨的發起人之一。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二年，他是工黨的祕書，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四年，爲工黨的黨魁。在一九一四年，因爲他對於工黨擁護大戰的主張覺得不能贊同，他辭去黨魁的職位，他因自認爲和平主義者，曾有一個時期被社會摒棄並遭監禁。在「茶褐色選舉」中他失去了國會議員的地位，但在一九二二年重又得到一席。他是一個誠懇而富有修養的紳士，並且是頗能感動聽衆的演說家。

首次工黨內閣內首相的幹練助手之中，有司諾登（Snowden）與漢德孫二人。司諾登任財政大臣，他以前做過書記，爲熱心的和平主義者與主張自由貿易者，又是一個理財的能手和倔強的國會議員。漢德孫被委爲內務大臣，他從前是鐵匠出身，以在大戰期內做勞合喬治的副手而著名。他根本是一個「職工組合主義者」。

這個首次工黨政府在嚴重困難情形之下執行政務。儘管麥唐納堅決申述「勞工運動絲毫沒有試取捷徑以達到大同世界的傾向」，當時仍謠傳私人財產將被沒收，家庭制度將遭廢除。於是投資者大爲慌張，美國的金融家開始從倫敦收回他們的餘款。這種金融上的行動一部分由於一般人理論上不信任社會主義，一部分由於

不明瞭工黨是反對革命的，而牠的宗旨僅僅以國會的辦法來增進勞工階級的幸福，且不明瞭牠「否認階級戰爭」，雖然牠「承認階級的自覺」的確，麥唐納政府也有很實在的理由禁用革命的方法；牠的任期限依靠自由黨的投票。這種環境上的需要緩和了牠的政綱而妨礙了牠的行動自由。

工黨政府在國內行政方面的成就並不特別驚人。在工黨統治九個月之間，失業形勢益為嚴重而不見進步，失業的救濟更須推廣。徵收資本稅的觀念是打消了。國會通過了惠脫雷法案（Wheatly Bill），規定利用政府的補助金建築數千所房屋，每間的租金為每星期九先令。大戰時所課的幾種稅已被廢止。茶稅、咖啡稅和糖稅也減輕了。

工黨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功績較為壯觀。牠在最後接受道威斯計劃之中，居於顯著的地位，麥唐納又德惠各國容許德意志加入國聯，並贊成英國與國聯發生更密切的關係。他擁護一九二四年的日內瓦草約（Geneva Protocol），此約意在用闡明「侵略國」的定義的方法，來保證國際間的和平。政府議決再造幾隻新的巡洋艦，但同時為表示減縮軍備起見，停止新加坡（Singapore）海軍根據地的建築。英國與赫里歐統治之下的法國的關係是改進了。最後，一般的條約與通商條約的結果使俄國得到外交上的承認，而不列顛貨物在俄國市場上亦得到優惠的待遇。

不幸工黨政府不能繼續存在，牠不久被民衆疑心屈服於布爾塞維黨的壓力。當政府停止審問共產黨的工人週刊（Workers' Weekly）代理主筆，激動不列顛兵士叛變的案件的時，一般人對於通商條約大加攻擊，接

着發生許多騷動。國會動議委派一個委員會來調查政府的這種政策後，麥唐納又因自由黨的背盟而告失敗。他就解散國會，下令舉行新選舉。

在此次選舉運動（一九二四年十月）中，工黨的主張，因所謂「齊諾維埃夫或赤黨的函件」（Zinoviev or Red Letter）的公布，大受攻擊。該項信件據說是一位布爾塞維黨首領寫給不列顛共產黨的，其中催促後者準備革命。五年之後，此信始經證明爲偽造的，但在當時，工黨受牠的害不淺。許多投票者心中頗覺不快，以爲工黨內閣顯已縱容共產黨毫無拘束地自由宣傳，他們因此不願意另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繼任。並且，工人們也表示不滿，因爲工黨政府很少改進經濟的情狀。他們沒有想到這種不景氣全世界都是如此的。

保守黨在選舉中保持了四百以上的席數，而工黨與自由黨所得的合起來還不到二百席。保守黨獲得超過二百席的大多數，雖則牠實在僅得到少數的普選票。這種奇異的情形，實又由於三角的選舉和缺乏比例的代表額制度的關係。麥唐納自然就辭去首相之職。包爾溫重執政柄，張伯倫出任外交大臣。

保守黨執政之五年

包爾溫在重任首相後不久，就履行他所謂「保障職業」的任務；但他的敵黨稱之爲趨向提高關稅率制度的「後門」步驟，因爲他們記得包爾溫在選舉運動中曾保證不提出保護貿易主義的法律。他設法通過了一種條例，規定任何工業如欲得到保護，就可以把牠的事件呈報商務局。商務局中就派一個特殊委員會調查情形，

報告國會。假如該委員會核准保護的請求，國會就在下次財政法案中核定適當的稅率。保守黨政府雖有這種辦法和其他方法來減輕不景氣，但不久遇到嚴重的勞工危機。

此時不列顛的各種工業中最困苦的，就算煤業了。在大戰之前，英國每年在她本國工業方面消耗幾百萬噸煤，此外又售與外國幾百萬噸。但在大戰之後，尤其是在一九二〇年之後，煤在燃料上的重要性開始低落了。煤油之爲燃料的來源漸成普遍，水力電的日常應用亦漸有增加，狄士爾 (Diesel) 機器益見發展；這都是煤的需要降落的原因。並且，根據凡爾賽條約的條款，德國每年供給鉅量的煤與法國、意國和以前依賴英國煤的其他地域。俄國因爲國內種種困難，在一九二五年所買的煤，比大戰前各年平均所購的煤少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噸。同時，英國商業的普遍蕭條，減少了國內對於煤的需要。(註)

(註)在一九二八年，工業轉運局估計不列顛煤業的過剩人員達二〇〇、〇〇〇之多。

在一九二四年，礦工強迫礦主簽訂工資協定，其有效期間至一九二五年夏天爲止。但是在契約滿期之前，情勢愈趨惡劣，以致許多礦山歸於倒閉。到了一九二五年六月，煤業中保過險的人員約有四分之一失業了。當礦工拒絕接受技術師所提出的建議——延長每日工作時間從七小時到八小時和發放較低工資時，礦主即以將不再繼續施行工資協定制度的並將在一九二五年七月採用新的工作時間與工資標準爲恫嚇。工人們不管這種恐嚇，並且自得鐵路工人願於一旦礦主宣告停工時即不運輸煤產作爲援助的消息後，他們更鼓着勇氣堅持他們的立場。包爾溫政府爲防止各礦停閉起見，即暫時承諾資助煤業，俾現行的工資協定在國會調查委員會調查期

間可以繼續有效。這種補助費的總數（共支持了九個月），計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

煤業調查委員會的主席是赫伯特·撒母耳（Sir Herbert Samuel）爵士；它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中提出報告。照各委員的意見，假如要使煤業興盛，必須根本改組。此項報告極力主張政府將各礦收歸國有，私人可向公家租得，然後由私人經營。它又建議：若干煤礦應當關閉，因為挖掘過深，難得利益；若干礦應當合併。政府之繼續補助煤業被指為不合理，工資的減低卻被認為不可避免。

這個報告不能使任何方面滿意。當政府發狂似的竭力安排再舉行和平會議的時候，技術師發出通告，工資協定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之後將被認為滿期失效。工人們揚言要罷工；當工會（礦工同盟會是牠的附屬機關）的總理事會宣稱除非礦工的要求在五月三日之前均經接受，即將實行總罷工，情形更為凶險了。礦主們依然無動於中，因此總罷工就依了規定時間開始。以下各業都為總罷工所波及：運輸業、印刷業、重化學工業、鋼鐵業、金屬業及除掉私人房屋和醫院的建築業。政府頒發特殊命令防止電氣、煤氣、衛生、清潔與糧食事業中的罷工，並禁止一切暴動。

這次總罷工實際上牽涉了工會一小半的會員及工人總數六分之一弱。但它已使政府驚惶失措，迫得宣告國家入於緊急的狀態。（註）成千成萬的志願者努力設法使火車與公共汽車繼續駛行，並維持各業的進行。政府並委派了二五〇、〇〇〇特務警察保護這些志願者。軍隊與兵艦駐紮在各軍事要地。但當時並沒有暴動。反而可以看到一種愉快的幽默，大概由於新奇的情狀之故。非常之際的公共汽車和電車的駕駛者，彼此爭顯談諧的

才智，而印有下列字句的招貼到處皆是：「不要阻止我！我不能再開始了！」

（註約有二百五十萬工會會員罷工了。工會會員的總數是六百萬，工人的總數約有一千六百萬。）

九天之後，在五月十二日那一天，總罷工結束了。工會大會下令總罷工停止，但以政府進行再度的磋商，為復工的條件。包爾溫要求彼此不得採報復手段，那些工人應仍歸以前的僱主雇用。這又引起新的困難。有些僱主覺得要將所有志願的代理人員解僱，殊為困難。而繼總罷工而呈現的工業界的紊亂，暫時減少了應做的工作的數量。煤礦礦工則繼續罷工，直到十一月十九日纔止，前後共有六個月，英國有一個時期，的確必須從美國與德國運煤入口，使她的工廠和鐵路事業得以維持。

其時，礦工的困苦漸至顛苦地步。他們的財源是竭盡了，冬天正在降臨，而政府似乎對於礦主比較對於工人更為親善。這般飢寒交迫的工人，漸漸依從了業主的條件恢復工作，罷工只得結束了。爭鬪的實際結果，就是延長工作鐘點，減少工資，和完全不理會撒母耳（Samuel）委員會的種種建議。罷工者之所以缺少一般的同情，一部分必須歸罪於「罷工大王」科克（Cook）所採用的不聰明的策略，科克是礦工同盟會的秘書而為罷工運動的領袖。

就政治而論，這次罷工使工黨與自由黨的勢力都變薄弱。工黨的極端派指出煤礦罷工的失敗，證明有採取更直接行動的必要。但是，麥唐納能夠維持工黨的團結。自由黨當亞斯基司（此刻他是鄂斯福（Lord Oxford）爵士了）與勞合喬治對於援助罷工者的問題發生意見的時候，就重又分裂了。反之，保守黨卻比以前團結得更

堅固，決心用法律使英國將來不再有總罷工。因此他們在一九二七年在國會中設法通過了工會與職工糾紛條例 (Trade Unions and Trade Disputes Act)，其中規定總罷工為不合法，禁止罷工糾察，並保護拒絕參加非法罷工的工會會員，以防工會使此種會員喪失資格或蒙不利。此項條例並變更舊法律（舊法律准許各工會爲了政治的用途向會員徵收捐款，除非他們正式提出抗議），這使工黨大爲驚駭。現在政治的捐稅被禁止了，除非會員事先提供書面的同意。此項條款竟使一位勞工領袖批評該條例爲「對於整個勞工運動的宣戰」。

保守黨又想從罷工的情形收穫另一種利益。他們建議鞏固保守黨的大防禦線，即上議院。依照一九一一年的國會條例 (Parliament Act)，上議院的權力在幾方面被剝奪了。關於經費的議案，在下議院通過之後三十天內即成爲法律，不管上議院的態度如何，而下議院的議長具有決定一種法案是否屬於經費議案的權力。在通常的立法程序中，上議院僅有一種停止的否決權。保守黨對於這些辦法向不贊同，現在他們覺得「社會主義者的危險性」非常嚴重，這殊足爲充實上院的權力的理由。即使一時的輿論或者要使工黨政府執政，但老大英國的命運仍能有適當的保障。

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包爾溫提出一個方案，依照這個方案，上議院中的席數，應當從八百席減到三百五十席，以圖增進效能。這的確不致釀成重大的變動，因爲在現行制度之下，上議院的出席人數很少超過二百人。此項方案並規定上議院中有些議員應由英皇委任，爲終身職，其餘的議員由貴族選舉。英皇在國會陷於僵局之時，任命新貴族之權應即放棄，而上議院的立法權應當增加。這個整個計劃在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年國會辯論中備

受青年保守黨員，工黨黨員與自由黨黨員的激烈反對，以致永不能編成議案。的確，自由黨發出了一個宣言，警告政府道，如果採取這種制度，必致使國家不得不在「無限制的遺傳議院與革命」二者之間選定一種。

在包爾溫政府所通過的較開明的改革方案之中，有關於寡婦孤兒的撫卹金與老年人的養老金，以及推廣婦女參政權的種種新規定。一九一八年的選舉法，曾限制祇有滿三十歲的婦女始有選舉權。因為恐怕大戰後大超過男子人數的婦女在政界中佔優勢。該項法令是爲了承認婦女在大戰期內所盡的可貴任務而通過的，牠同時將男性投票者的其餘財產上的資格限制完全取消。或許也是民主政治的一般趨勢，這種趨勢是大戰後歐洲許多地方的特質。英國的婦女自然不滿於這種很高的年齡限制，並認這種辦法爲對於她們的智力與成熟的蔑視。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當國會以選舉權給予二十一歲以上的婦女時，她們十年來的積極運動總算得到勝利了。自有此種「黃毛丫頭投票者」(Ripper voter)的增加，英國的全體選舉民就約達一一、五〇〇、〇〇〇男子，和一四、五〇〇、〇〇〇婦女了。

在保守黨統治期內，發生了一種很有趣味的宗教爭論。有很多年，英國教教會的領袖卽已從事於修訂普通禱告文的舊本。在一九二七年，一種修正的禱告文（它很適合於盎格羅天主教的新潮流）被提出國會，以待核准。上議院議員立卽接受修訂本，但下議院卻加以否決。接着此項禱告文略經修改，但下議院又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對之投反對票，此項禱告文之遭否決祇在經過國會內外的冗長而熱烈的辯論後纔發生，從「禱告書有一個時期爲銷路最廣的書籍」的事實看來，可以證明民衆對於此事之感於興趣了。

禱告書所以不能通過，最重要由於一般人對於「羅馬教」行將恢復的恐懼，因為新本禱告書比舊本更為包羅宏富，而更富有天主教意味。英國國教的主教們一覺察他們的著作之不獲接受，大半由於立法機關內的浸禮會教徒，美以美會教徒，猶太教徒和「不可思議論者」所投的反對票，就很傷心，因此他們得到一種刺激，發起撤廢教會國立之性質的運動。此舉將剝奪教會的很多聲望和收入，但也將使教會在行動上能夠獨立，或使教會事業更有生氣。

關於外交政策，保守黨並沒有盡英勇的本分。英國與法意兩國的戰債協定是成立了，而洛迦諾公約（Locarno Pact）——一部分為麥唐納在一九二四年中赴日內瓦活動的結果——也締結了。英國在關於准許德國加入國聯的磋商之中，祇是取模稜的態度，它又為了海軍軍縮問題與美國發生齟齬，兩國的邦交會一度非常緊張。最嚴重的為英俄間的關係。張伯倫設法發現一大批俄國到處（從英國到中國）反英的陰謀，一九二七年五月，倫敦與莫斯科間的外交關係遂告斷絕。最後，英國外交大臣對於開洛格公約亦不甚熱心。

長期的工業不景氣之成為保守黨政府的棘手問題，與其為工黨政府的難題毫無二致。提高關稅稅率，在英國南部創辦幾種新工業，由政府給予外國的商業廣告與商業宣傳積極的協助，使本國得到美國遊歷家的歡心：這一切辦法都不能恢復實業的元氣。反之，不合理的組織，古舊的方法和對於必要的合併與合作的衝動的反感，依然存在，同時各處只有少數人指出美國與德國的種種發展足為利用「合理化」與集中法所得到的益處的榜樣。（註）

(註)參看第十五章「經濟的復興與衰落」一節。

使情形更糟者，當時的報告斷言不列顛的實業決沒有將來的希望，祇有將資本向國外而不向國內投資，纔可以得到較多的利益。結果，即使爲了急切需要的設備而想籌措充足的經費，也時常感覺困難。一九二七年的英國出口額減到一九一四年的價格水準，總計僅等於一九一三年出口額的百分之七十九。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七年，不列顛的出口額降落百分之二十一，而全世界的出口貿易在同一時期內卻昇起了百分之十八。在一九二七年正月，英國共有一、五〇〇、〇〇〇失業的人民。到了一九二八年七月，煤業中的人力百分之二九·一是閒散的，此外造船業的百分之二八·三，鋼鐵業的百分之二一·二，和棉業與羊毛業的約百分之一五亦然。(註)

(註)此項總計數字係採自 André Siegfried's "England's Crisis 1931" 一書。

第二次之工黨政府

所以，失業和實業困難兩問題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的成爲國會選舉中時所標榜最重要的問題是不足爲奇的。包爾溫政府——牠足足保持五年的任期——的攻勢的外交政策和一般的保守主義對於工黨和自由黨是絕妙的宣傳資料，但失業問題成爲更好的口頭禪。包爾溫、勞合喬治和麥唐納舉行了無數次的演講，他們對於最近始有投票資格的五百萬「閨閣婦女」特別下工夫訴說一番，因爲大家感覺她們在這個首次的投票機會中，將有強有力的影響。

保守黨採取「安全第一」爲他們的口號，並且驕傲地指出他們在總罷工時期內所持的態度，及反對社會主義與其禍害的堅定立場。他們贊成容許工業界「自救」而政府不加以干涉的政策，但也極力主張較高的保護政策，反傾銷的辦法和極端的帝國優先權。他們注重增進雇主和工人間的更進一步的合作，並預言這種因素再加上合理化的效果，繁榮不久可以恢復。他們反對在沒有關於宣傳和債務的特殊擔保條件之前承認俄國，他們不贊成超乎國聯盟約，洛加諾協定和巴黎公約所規定者之外的約束。

自由黨所以受勞合喬治的支配，大部分因爲他在該黨的『戰櫃』(War chest)中有私人掌管的數百萬元經費，此刻該黨又以爲他們已看出從堙沒無聞中穎脫而出的機會。在一本稱爲我們能征服失業問題(We Can Conquer Unemployment)的小冊子中，他們建議一種龐大的公共工程計畫，以爲解決種種困難的最速辦法。但其他兩政黨竟因此聯合起來進行反對自由黨的可笑行爲的運動。保守黨和工黨在演說中，報紙上，和諷刺畫中，攻擊勞合喬治的計畫認爲從費用和便利的兩種觀點上看來，這個計畫總不免滑稽可笑。自由黨復再三申述他們對於自由貿易的永遠尊重，並主張與國聯和德國發生更密切的合作。他們贊成英國和美、俄友好，並主張立刻撤退萊茵地的駐兵。

工黨印行了勞工與國家(Labor and the Nation)一書，並在利用生動的口號和標語方面特別得到勝利。許多口號與標語是特別爲了吸引青年投票者而施用的。工黨主張主要實業收歸國有；開始廣大的公共工程計畫，延長兒童強迫教育的期限，開發天然富源——尤其是水電力，並委定特別經濟委員會以協助政府擬訂種

種政策。他們預許縮短工作鐘點，提高直接稅率，增加社會法律，並修訂一九二七年的職工協會條例（Trade Unions Act）。

關於外交政策，工黨幾乎完全贊同自由黨的見解。在有些地方，他們甚至準備採取更協調的政策，尤其是願意與美國訂立一種海軍協定——這一層不獨是為和平着想，並且也顧到經濟。此外，他們加重他們的決心來阻止未來的戰爭。麥唐納說：「這是對於我們所有基督教各界多麼大的恥辱呀！——甚至到今日，各國對於付償過去戰爭和準備未來戰爭所用的經費，竟比用於訓練青年人的德性，預防我們父母陷於貧困，和安慰老年人的暮年的經費來得多！」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合格的選舉人中有二二、〇〇〇、〇〇〇以上的人參加選舉。工黨得到二八九席，保守黨得二五九席，而自由黨僅獲五八席。雖則沒有一個政黨得到大多數，雖則保守黨確實獲得的普選票數比工黨多二五〇、〇〇〇票，但人民之棄絕包爾溫政府是很顯然的了。因此，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那一天，麥唐納再度擔任首相之職。但是他重又依靠自由黨的票數以維持其職位。自由黨準備擁護他而不願協助包爾溫，大概因為反對包爾溫的外交政策。自由黨的軟弱表示附帶引起了一般人的感想，以為自由黨的使命業已完成，或者至少勞合喬治的領袖地位命數已盡的確，在選舉之後，有些自由黨黨員加入了工黨，深信唯有麥唐納的黨是居於執行人民意志的地位。

內閣各部長官的支配與一九二四年間的大概相同。司諾登重任財政大臣，漢德孫——「亞搭爾老伯伯」

(Uncle Arthur)任外交大臣。詹姆士·托馬斯(James Thomas)被任爲掌璽大臣。托氏之居此職，在職務上是有名無實的，政府希望他將他所有的時間專用於調整救濟失業的計畫。當他的努力證明爲不能勝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他就另任他職，而他的原位置則以莊士敦(Thomas Johnston)接充。再者，英國歷史上婦女之被委爲不列顛內閣閣員，以此爲第一次：蓬德飛爾德(Margaret Bondfield)女士竟做了勞工大臣。

當擁護工黨的自由黨黨員分裂成左右兩派的時候，工黨的統治變成不穩固了。左派在勞合喬治和撒姆耳(Herbert Samuel)領導之下，雖則並不完全贊同工黨的政策，依然寧愛工黨政府而不好任何保守黨政府的。右派爲西門爵士(Sir John Simon)所引導，準備在任何時候投票反對現政府。當百萬富翁的社會主義者摩斯力(Oswald Mosley)和他幾個友人覺得麥唐納並未十分努力救濟，失業的時候，工黨本身又遭受半打黨員脫黨的損失。

工黨政府不久集中力量於有關外交政策的緊急事件。牠竭力設法消弭印度、阿剌伯和埃及的土人的怨恨，而不偏袒袒護英國的地位。英國和俄國的外交關係恢復了，而廣大的俄國市場有到手之希望了。楊格賠款計畫亦經接受，司諾登因能爲本國的經濟權利堅強奮鬥，獲得許多民衆的贊揚。麥唐納曾到美國去拜訪胡佛總統，遂爲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會議開一先路。在一九三〇年的帝國會議中，麥唐納拒絕加拿大首相所提出的優先關稅辦法（依照這個辦法，外國小麥即當納稅），因爲這種辦法將使英國的麵包漲價並因爲工黨向來保證自由貿易。在一九三一年春夏兩季中，漢德孫在世界軍縮運動中和在一九三二年軍縮會議的籌備方面始終出力。

以前一般人認工黨爲鹵莽的國際主義者和「小英格蘭人」的懷疑業已冰釋，反而感覺麥唐納的努力確實是爲了世界和平而非爲了世界革命。

在內政方面，工黨依然沒有驚人的功績。政府曾考慮提出一種法案，規定兒童入學讀書須到十五歲爲止（當時祇至十四歲爲止），但當形勢表明有許多天主教的工黨黨員將與反對黨聯合對此案投反對票（因爲天主教學校抗議牠們沒有適當的設備）時，這件事就中止了。政府又曾企圖修訂一九二七年的職工協會條例，但政府在關於該項法案中某一條款的審查委員會遭失敗之後，此舉也作罷了。農業僅得到一些補助，煤業則因政府頒行一九三〇年的煤礦條例（Coal Mines Act）而略獲改進，此條例規定煤礦出產品的銷售必須有某種限度的合作。在自動車輛的運輸制度方面，復施行了許多改革。照許多團體的意見，司諾登的預算案很有相當的成功，但他所提關於較高的所得稅和更重的土地稅的建議，自然易於引起某幾方面的仇視。自由黨左右派對於應否贊成土地稅的問題，依然意見相距甚遠。

在工黨這次執政的時期中，也曾採取幾個重要步驟來反對軍國主義。政府撤回許可公立學校施行軍事訓練的明令，對於本着良心反對世界大戰的人完全恢復他們的公權和政治權利，並廢棄處罰軍隊中私逃者或膽怯者的死刑。世界法庭草約的「隨意條款」正式簽訂，英國就這樣擔保她將來遇到涉及條約之解釋或關於國際法問題的任何國際爭論，必付國際法庭聽候裁判。

工黨在選舉運動中所擔保實施最重要的政綱大部分仍未履行，那就是失業救濟。當時並不缺乏恢復商業

的企圖，但這些企圖毫無用處。英國皇太子曾作多次表示好意的旅行，最顯著的是到拉丁美洲去的一次，他希望自己或者可充有效的社交性質的售貨經理。當他回國的時候，他連續舉行了幾次坦白的演講，在講辭中他力勸不列顛商人醒悟，速即採用近代商業方式並出國尋求貿易，不要株守國中，靜候主顧光臨店門。有位閣員曾到過加拿大，努力爲不列顛的貨物招徠定貨單，但是白費心力。英國曾幾度與大陸各國磋商，要求牠們顧全一般的商業復興而減低牠們的關稅率，但結果又祇有失敗。

公共工程亦經開始，而關於救濟失業的津貼復經多方整理，目的在隨時周濟一、〇〇〇、〇〇〇失業人民。布施事業繼續實行，以致每年耗去千百萬元。到一九三一年八月底，失業者的人數計達二、七〇〇、〇〇〇人，一個月後，增至二、八二五、〇〇〇。民衆到了這時候，始明瞭這種情形是全世界的不景氣的情形之一，並非限於英國一國，但工黨政府必須承認牠所預許的多於牠所能辦到的。工黨在補缺的選舉中失去了許多席數，麥唐納的首相地位，即在政敵的心目中亦不足引起妬忌了。

全國聯合政府

在一九三一年夏季之末，政府注意到國家的準備金迅速減少，大爲震驚。商業衰落的一般影響和外國政府——尤其是法國——收回巨額存款，使情勢愈趨嚴重。此外，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會計年度的預算，短少至一八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之鉅。麥唐納與司諾登因此起草了一個計畫，增加歲入，減輕歲出，以挽救國家的信用。計畫

的要點在於徵收較高稅率 and 更事掙節。政府人員的薪俸、恩給金和失業津貼費，亦經核減。但是，內閣中大多數閣員不贊同這些建議，因為這未免以勞工的利益為犧牲。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麥唐納向英皇呈遞內閣總辭職書。此後不久，他以三個政黨組成的新「國民」內閣，重起執政。

在這種驚人的發展的消息公開之後，工黨不久即舉行會議，將麥唐納、司諾登、托馬斯和其他少數領袖人物開除黨籍。漢德孫被選為工黨的首領，以繼麥唐納。麥唐納正式與他們便成了對抗之勢。這些事件，雖則似乎來得突兀，但確已在人們預料之中。有好些時候了，當工黨全體黨員日益傾向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目標時，麥唐納和他的親密同伴漸變為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了。這班被逐的工黨首領雖則依然極關心於人民的前途幸福，但他們似乎對於本國的社會現狀很為滿意。他們不復能被稱為工人階級的真實代表了。

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國民內閣向國會提出並促其通過一件財政案，此案包括首相在數星期前所提出的大部分建議。政府主張該項新法律向各界公民（不論其階級與地位）要求同等的犧牲，但工黨堅以為新律所涉及的儲金十分之九確實是從工人的犧牲得來。當此項條例的條文公布時，英國遇到多年所未有的情狀。成千成萬的教員、郵務員和其他政府雇員舉行抗議的會議，反對減縮薪金。當時有幾百次失業者的民衆大會，在倫敦、利物浦（Liverpool）、塞爾福特（Salford）、格拉斯哥（Glasgow）和其他大城市中，都曾發生過暴動。威脅性最大的就是海軍的叛變，這次叛變發生於印味戈登（Invergordon），牽涉到八七〇〇人。幾隻軍艦上的海兵深信他們所受的損失在比例上較軍官們重得多，因此拒絕服從長官的命令，除非當局糾正了這種不平等的待遇方止。他

們的要求卒得到勝利。

這樣的事件影響所及，自然搖動了外國對於不列顛的穩固的信心。國家的信用猛然跌落，在九月中某一個時期，外國向英國銀行收回的存款每天達百萬鎊之多。像上面早已敘述過的，這些存款的收回其中有些大概是由於外交上的動機，但是不論其原因如何，結果使英國黃金庫存大大的空虛，以致國會迫得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廢止規定政府須發行鈔票並照票面價格出售現金的法律。換句話說，英國「放棄了金本位」。英鎊的價值幾乎立即從四·八六元美金跌到三·四九元，自此以後就在三四元之間漲落不定。這次變動之主要安慰，第一在於相信生產的成本可因而減低，不列顛貨物因此可以在世界市場上得到銷售的便利，第二在內債的真實確有可觀的減少。

到這個時候，大家都感覺，應該給人民發表他們對於國民政府的政策意見的機會。國會因此被解散了，規定於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舉行新的選舉。擁護國民政府的候選人為保守黨，國家勞工黨，和國家自由黨。反對黨的候選人仍保留他們固有的工黨和自由黨名稱。就黨綱而論，諸政府黨事實上非空泛一點不可，牠們要求人民投信任票，贊成保護稅，並且索取空白支票，以便進行他們認為最有益於國家的工作。工黨沿用他們慣常的黨綱，但因為缺少舊有的領袖，他們似乎難於使投票人明瞭他們的要點。實在，麥唐納和司諾登和保守黨一樣預料萬一工黨勝利，國家必有災禍。

這次選舉的結果即在最有經驗的聰明政治家看來，都認為十二分可驚的。諸政府黨在下議院中從六一五

席總數中獲得了四九三席。單單保守黨一黨已有超於所有其他各黨的三二七席之大多數，因此牠就成爲下次國民政府的脊骨。各黨所得普選票數如下：保守黨，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票；工黨，七、〇〇〇、〇〇〇票；自由黨，三、〇〇〇、〇〇〇票。麥唐納在栖漢姆港（Seaham Harbour）選區中奮鬥之後，以國家工黨黨員之資格重又當選；他就擔任組織另一內閣。這個內閣包括四個國家工黨黨員，五個國家自由黨黨員，和十一個保守黨黨員。涅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他是一個保守黨黨員而爲很有能力的主張高率關稅的人——任財政大臣。自由黨黨員西門爵士任外交大臣。極端派保守黨黨員，如張伯倫或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之流，沒有一個得任內閣的關員。

雖則麥唐納保持首相的地位，但他的統治權力全仗保守黨黨員的扶持。包爾溫爲保守黨的首領，他堅毅效忠於麥唐納，雖則他很容易使麥唐納傾覆。事實上，爲延長國民政府的生命，並在「英國和全世界正遇着嚴重問題之際」維持國家的統一起見，必須採行特殊的步驟，允許各個內閣關員在國會中利用「演講和投票」來表示與內閣大多數關員意思相反的見解。這樣一來，具有一百四十八年歷史的憲法上的一種原則就打破了。

政府草擬了大批法案，很樂觀地希望這些法案可以恢復繁榮。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政府對於生棉、羊毛、肉類、魚類和小麥以外的一切進口貨品，都徵收百分之十的最低關稅。接着通過了新的「穀律」，實際上擔保國產小麥每蒲許耳（ushel）的最低價爲一元。在三月分和後來數月中，海關稅則中各項目表示進口貨更有加增，於是政府授權特別關稅委員會提高任何種稅率至百分之百，以對抗歧視不列顛貨物的國家。（註）爲減少支出起見，

不列顛戰債（約計有一百億元）業經變換，利息亦經減低，俾可每年節省數千萬元的利息。政府一面勸人民在法定日期之前先行繳納所得稅，並以私有的金子售與當局，以協助政府。此外，並從印度運入大量的金子。

（註）有一個時期，保護政策和經濟的國家主義似乎已變成不列顛人民的真實崇拜物了。在廢棄自由貿易的初期，「購買不列顛國貨」運動之推行達到極端，甚至不列顛廣播公司亦被勸告抵制外國音樂而採用本國音樂。

關於外交事件，政府的政策大半為經濟的利益所支配。在一九三二年夏季所舉行的洛桑賠償會議席上，英國切實企圖與債權國的法國更加親近，但同時與債務國的德國和奧國仍保持良好關係，因此重訂從前的「友誼協商」（Entente Cordiale）之說甚盛。在鄂大瓦（Ottawa）舉行的帝國經濟會議（一九三二年七月至八月）席上，英國和各屬地的代表們想以交換通商的特許和特權的辦法，來改善帝國各部分的經濟情狀。當時有一打雙方的通商條約簽訂了，但這些條約殊不足以完成經濟會議所希望實現的事情。此項會議的特質，即在代表方面（尤其是各屬地的代表）所表示的要求犧牲之心過於願作犧牲的心，它又證明帝國各部分之間有嚴重的經濟對立存在。英國所作的小小讓步，以為對於帝國各部分之特惠者，終使主張自由貿易的國家自由黨黨員退出了國民內閣（九月），由保守黨黨員頂替。在一九三二年九月，英國給與俄國十八個月的信用借款。希望這樣一來，蘇俄送往德國的定貨單中，可以有一部分被吸引到英國來。

但是，所有上述種種努力，仍不足恢復英國的經濟健康。工資繼續低落，紡織業和其他各業均有嚴重的罷工，而失業的數字昇到三百萬，為本國歷史上最高的紀錄。一九三二年後半年的國債約計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元。所以，人民重又開始驚訝：「英國的光榮是不是已成過去了麼？」

英格蘭與各自治領

構成不列顛帝國的各部分之間的關係，在大戰和戰後時期內遇到幾次堪注意的變化。從一九一一年起一直到現在，舉行了無數次帝國會議，英格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紐芬蘭及愛爾蘭自由邦的首相均行出席，而這些會議除因戰事的起伏暫時中止之外，從未間斷。在這些並未具有法定權力的會議席上，英國和各自治領地的代表們討論整個帝國所遭遇的和關於帝國各部分彼此之關係的種種問題。出席者所用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即在一般的原則上求得協定，並將種種協定納入所草擬的決議案中，然後再努力使帝國各部分的本身政府接受這些決議案。

大戰的緊急情形，英國之依賴各自治領地所供給的助力，各自治領地之獨自簽訂和平條約，及各自治領地之成爲國聯的合格會員國的情形，很足以變更祖國與各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在各自治領地的新地位所涉及的法律上之難點得到解決之前，各自治領地早已推進了許多，通常被認爲應屬於統治權範圍以內的行動。

例如，加拿大在一九二三年與美國簽訂了哈力柏漁業條約（Halibut Fisheries Act），其中僅有美國代表和加拿大代表的簽字。後來加拿大與美國之間，和加拿大與歐洲各國之間的許多條約之簽訂皆按照這個先例。有幾個自治領地且自行委派外交使到外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洲各以其名義並自行負責頒行種種訓

令。一九三〇年，澳大利亞人民力爭他們所擇定的總督——那次所選定的偶然是個土人——應被接受，他們竟獲得勝利。一九三一年，愛爾蘭一個總長竟直接向英皇上奏章，愛爾蘭自由邦且採用了自己的國璽。

這些行動，在原則上大半都經一九二六年的帝國會議認可。這次會議曾在一種名叫巴爾福報告書（Balfour Report）的文件中宣稱：「牠們（大不列顛和各自治領地）爲不列顛帝國中的自治集團，地位相等；它們雖因共同矢忠於英皇的關係而團結一致，但在牠們內外事務的任何方面，彼此絲毫不相統屬，並自由結合而爲不列顛聯邦國的各分子」。所餘的問題就是將此項原則制定爲帝國法律，在一九二九年，一個代表大不列顛和各自治領地的委員會組織成立，牠的任務即在對於如何調和舊的法律限制和新的憲法設施的方法，提出報告。委員會的報告經一九三〇年的帝國會議接受，於是各自治領地和英國都採行種種步驟使此項報告具有法律的力量。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經國會通過韋斯敏斯德法令（Statute of Westminster）之後，這一點就終於達到了。

此項法令承認各自治領地與祖國地位相等，這樣一來不啻在實際上許可牠們獨立。其中並規定各自治領地議會將來所通過的任何法律，不能以「違反英國法律」或違反大不列顛國會的現行條例或將來條例的理由，認爲無效。各自治領地議會有全權通過具有治外法權作用的法律，也就是應用於僑居外國或在公海上旅行的各自治領地人民的法律。凡大不列顛國會的法律皆不得施行於任何自治領地，除非該自治領地特別請求和允許那種法律推行於牠的區域。英皇不得再根據了他的大臣的建議，「不核准」自治領地議會的條例，並且此

後關於皇位繼承，皇族爵位繼承的法律，如無大不列顛國會和所有各自治領地國會的許可，不得變更之。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不列顛獨立各邦聯邦國」(British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Nations)，牠是一羣單獨的政治實體，大家公認忠於一個共主：英皇。英皇爲帝國人民自覺同出一種族的自愛心所寄，也是英國與各自治領地之間的主要連結者。但是，所不可忽視者，牠們祇要不與不列顛完全脫離一天，牠們就得享受強有力的海軍的保護，而這種海軍的軍費大部分是由大不列顛人民負擔的。

給與各自治領地的這種極大自由，已使幾個觀察者深信不列顛帝國——他們所稱爲「最脆弱的政治組織」——的命運業經注定。不列顛國際年鑑的編輯漢斯脫 (Sir Cecil Hurst) 爵士對於這種見解回答得好：「事實上，我們所以不信帝國的運索會折斷，乃因我們完全承認帝國中各個大自治團體有支配自己的命運之權；這種對於各屬地的自治權之完全承認，其功效即在從各自治領地與祖國的關係中消除那種損傷各自治領地人民的情緒並使之不快的元素，而那些元素實有使帝國的運索變爲脆弱或終致折斷的害處……祇要不列顛帝國尙能達到有用目的的一天，祇要她的各構成分子自安於附屬於她而不願獨立的一天，她就將永久存在。」(註)

(註)見 Wright Q., *Great Britain and the Dominions*, Harris Foundation Lectures, 1927。

雖則英皇的主要職權，在於爲帝國的統一象徵，但他在本國也佔重要地位。在理論上，他仍能否決國會所制定的法律，但他沒有實際行政權。像愛德華七世 (Edward VII) 那樣性格強的英皇，可以利用他與主要官吏的

私人關係，運用很大的政治影響力。一個性格較弱的英皇，至少可以滿足不列顛人民對於社會的遺傳法式的愛心和有貴族傾向的觀念。一九二八年冬季，英皇喬治五世（George V）頓患重病，同時耶誕節各店銷貨的數量較之往年大為降跌，這件事很可以證明他的人民對他個人的忠誠。英皇太子同樣能孚衆望。英國如無皇帝，似乎太不相稱；可是在一九一四年，也很少人想到德國或俄國竟能在四年之內變成共和國家。

第十一章 不列顛帝國的幾個問題

愛爾蘭自由邦

(甲)「英格蘭的窘困就是愛爾蘭的機會」

一九一四年夏季，不列顛國會通過了愛爾蘭地方自治法案 (Irish Home Rule Bill)。政府希望此項法案可以結束愛爾蘭地方自治的運動，這種運動在愛爾蘭成爲「聯合王國」的一個完整部分的時候（一八〇一年）已開始了。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英首相葛拉德士頓 (Gladstone) 曾兩次企圖給予愛爾蘭自治，以解決這種困難，但他的第一次提案在下議院中不能通過，第二次提案復遭上議院的否決。一九一二年，下議院通過了第三次地方自治案，這一次雖則仍遭諸貴族的反對，但此項法案卒於下議院依照一九一一年國會條例在兩年的時期中將它連續通過三次後成爲法律了（一九一四年）。

倘使該法律的種種規定見諸施行，愛爾蘭必然因內戰而致分裂。愛爾蘭島內東北方的六個「烏爾斯德」(Ulster) 郡（這些地方正在工業化而人民大部分是新教徒）決定不服從愛爾蘭國會的管轄，這個國會的大多數議員將爲南方二十六郡的天主教農夫所選舉。南方諸郡的人民同樣決定應由一個國會統治整個愛爾蘭。

島在上述法案通過的時候，雙方都組織了軍隊準備武裝衝突，但在流血之前，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不列顛政府暫時停止自治案的實施。南方愛爾蘭人民的軍事團體（他們自稱爲愛爾蘭國民黨）的領袖勒德曼（John Redmond）向葛雷爵士保證他的黨徒在大戰期內一定依然效忠英國。至於烏爾斯德諸郡的人民的忠誠，那是預定的結局。

不列顛當局對於愛爾蘭所用的策略是極不妥當的。雖則容許烏爾斯德人自行組織一軍赴海外服役，但對於愛爾蘭國民黨所提出的同樣要求卻加以拒絕，而鼓勵南愛爾蘭的新募兵加入英格蘭聯隊。南方諸郡人民常無緣無故備受瑣碎的煩擾，以致他們變成狂怒。一九一六年，這種不滿終於結晶而成所謂「復活節的叛變」。這次騷動實出於一羣過激派的工作；他們脫離了依然正式擁護不列顛政府的愛爾蘭國民黨，另行組織了一個極端的「愛爾蘭共和兄弟黨」。兄弟黨中大多數人又加入「新芬」（Sinn Féin 即「我們自己」）黨，新芬黨最初是爲了改進工人福利並發展愛爾蘭人的愛國情緒而組織成立的。在一九一四年，此黨加入政界活動，在大戰時期內，一變而與共和運動完全一致了。共和黨黨員因此通常以新芬黨黨員著名。

在一九一六年復活節的星期一，新芬黨黨員在都柏林（Dublin）奪得幾個公共建築物，並以「愛爾蘭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名義發表宣言。德意志曾經允許在「海陸空」三方面幫助叛黨，但不列顛嚴緊的封鎖政策，使這種幫助無從實現。在一星期內英格蘭人就撲滅了這個叛變，槍決了十五個領袖，連卡斯門爵士（Sir Roger Casement）在內，並將愛爾蘭全島置於戒嚴法之下。成千成萬的男女被逮捕了，其中有許多被流徙到英格蘭去。

這種激烈的手段，僅足以增多同情於新芬黨者的人數罷了。

一九一七年，勞合喬治企圖與代表領袖們舉行會議來解決愛爾蘭問題，但未成功。愛島暴動與紊亂繼續增加，至一九一八年，不列顛國會對愛爾蘭適用徵兵條例（Conscription Act）事勢已達最緊張之境，而愛島人民反對此舉非常強烈，以致不列顛當局看來沒有希望施行此項條例，因此他們建議：倘使愛爾蘭人民自願服務軍役者達到充分的人數，政府就停止施行此項條例的規定。但是應募者的人數很少，未來的光景自然很凶險。幸而休戰協定的簽字及時實現，因此防止了待發的災禍。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不列顛國會選舉（愛爾蘭仍行參加）在南愛形成了國民黨與新芬黨之間的競爭。前者堅要自治，後者堅要獨立。在烏爾斯德地方，贊成與英格蘭密切聯合的合併派佔最優勢。在愛爾蘭所應得的一〇五國會席次之中，合併派得二十五席，國民黨得七席，而新芬黨佔七十三席。在選舉之後，新芬黨議員拒絕出席於韋斯敏斯德（Westminster）國會，他們寧願以他們的當選認為人民的一種委託，叫他們另行設立愛爾蘭國會的委託。他們就在一九一九年正月在都柏林設立了這個國會。這些代議士自稱為愛爾蘭共和黨，而稱他們的國會為 Dáil Éireann。

在這個立法機關的首次會議，有二十九個議員出席，其餘四十四個或被監禁在獄，或在被押至牢獄的途中，或躲藏起來。但這個國會毫不懼怕，選定了三個代表，參加巴黎和平會議，揭櫫愛爾蘭民族自決的正義。但是，和會拒絕承認這些使者。愛爾蘭國會在第二次集會中委定了一個內閣，並選舉伐勒拉（Fa'monn de Valera）為總

統。

伐勒拉以一八八二年生於紐約；父親是西班牙人，母親是愛爾蘭人。他在孩提之年，就被擄歸愛爾蘭。長成之後，爲數學教授。他是一個口齒流利的演說家，熱情的愛國者，而爲「復活節叛變」的領袖之一。他爲了此案被逮捕，並被判死刑，但此項判決後來減輕爲終身監禁。一九一七年，他受大赦之賜被釋，但在一九一八年又爲了其他革命活動重遭監禁。這一次，他逃到美國，在那裏獲得了許多金錢上的幫助以進行他的計畫。在大戰之後，他回到愛爾蘭，不久就升任爲共和黨黨魁。

愛爾蘭國會的挑戰引起了「愛爾蘭共和國」與大不列顛之間的真實戰爭狀態。英格蘭軍隊和武裝警察不得不與年青而幹練的叩林斯（Michael Collins）所率領的愛爾蘭共和軍發生大小戰爭。雙方都犯了殘忍暴虐的行爲，在一九二〇年，科爾克（Cork）城的大部分被焚燬了。愛爾蘭人所特別痛恨的，就是英格蘭所派來幫助武裝警察的「援兵」。這些援軍不久被稱爲「黑色與茶褐色的傢伙」（Black-and-Tans），因爲他們所穿的制服是一種帽子上與手臂上纏有黑帶的茶褐色裝束。愛爾蘭人宣稱這些軍隊之中，有許多是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的罪犯，英政府派他們來的目的顯然在於威脅愛人屈服。不論這一點是否屬實，事實不久就證明武力不足以解決愛爾蘭的地位的問題。

勞合喬治爲結束此項爭鬪起見，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設使法國會通過了另一地方自治法。它所給與愛爾蘭的地方自治權比以前的更多，但牠規定南北愛爾蘭各設一個國會。烏爾斯德人接受此項法律，並進行使之實

施。其他愛爾蘭人卻失望了。他們不再僅僅以自治爲滿足，並反對將愛島劃分爲兩部分。英格蘭不理會這種反對，明令在一九二一年春季舉行選舉，新芬黨黨員在南愛爾蘭所應得的一二八席中獲得一二四席。這個議會開幕時，祇有都柏林大學的四個議員爲唯一到會的代表，其餘代表即拒絕出席，於是議會立即休會，以後永不再舉行會議了。

勞合喬治對於愛事依然抱有希望，他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延請伐勒拉到倫敦討論和平的解決。結果舉行了一個會議，但勞合喬治的種種建議在愛爾蘭人看來是不能接受的。十月，又舉行了第二次會議，希望或可從中找出方法使「愛爾蘭與不列顛帝國的聯合可與愛爾蘭的民族自決意志相調和」。這次的愛爾蘭代表團，是以新芬黨的創辦人格利斐司（Arthur Griffith）爲首領的。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日的清晨，不列顛的全權代表和愛爾蘭的全權代表簽訂了一件條約，此項條約在實際上就是新愛爾蘭自由邦的產生證書。

（乙）自由邦與共和黨

前項條約中規定「愛爾蘭在不列顛帝國中應與加拿大自治領，澳大利亞聯邦，新西蘭自治領及南非聯邦占有同樣之憲法地位，並得設立具有權力制定關於愛爾蘭良好政府，和平與秩序之法律的國會，及對該項國會負責的行政機關，且定名爲愛爾蘭自由邦」。自由邦的官吏就職時必須宣誓效忠於英國國王，但英王所派監督（Lieutenant）之職被廢除了。和在加拿大一樣，國王在愛島的代表爲總督。愛爾蘭的海岸歸不列顛艦隊保護，而英格蘭對於愛爾蘭許多海港仍繼續管理，以爲海軍根據地。自由邦得自行組織軍隊，備有稅關巡邏船，並分

負保衛海岸的責任。牠並須分擔不列顛的國債，其數目以後再行決定。北愛爾蘭得憑自己的意見，參加自由邦或仍繼續維持一九二〇年的法令所規定的英愛關係。烏爾斯德擇取了後一種途徑，因之，南北愛爾蘭間的適當疆界線仍有待劃定。

當簽訂條約的消息傳到愛爾蘭的時候，新芬黨內部突然分裂。伐勒拉否認此項條約，並在愛爾蘭國會以六十四票對五十七票接受此項條約之時辭去總統之職。由格利斐司和叩林斯起而領導組織自由邦運動，接着組織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其任務爲起草一個適當的憲法（一九二二年正月）。伐勒拉和他的黨徒因此退出愛爾蘭國會，一面自誇道：「我們使不列顛政府無法統治愛爾蘭，我們也能使不列顛當局所支配的愛爾蘭政府無法統治愛爾蘭」。在退出國會以後十二個月之中，伐勒拉和他的共和黨「非正規軍」從事恐怖行動，暗殺、縱火、劫掠和對於烏爾斯德邊境的侵犯，使傾向和平的居民感覺生活變成夜中惡夢。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新的臨時國會之選舉舉行了。當時所討論的主要問題就是接受或拒絕新訂的英愛條約。共和黨以各種巧妙的方法擾亂此項選舉，掘壞鐵路軌道，恫嚇投票者，並暗殺演講者。但是，此項條約的同情者在投票時終大獲全勝。

「非正規軍」有些時候依然能夠繼續他們的非法活動，而不致投入法網，因爲臨時政府中有許多人，不願過於嚴厲來對付他們，他們和這些人在反抗英格蘭的奮鬥中本是同志。但在一九二二年八月間，共和黨人忽然在半路上邀擊叩林斯，把他殺死，在此事發生數天之前，格利斐司曾因操勞和憂慮過度而逝世，因之科斯格累甫（Cosgrave）和阿希京（O'Higgins）成爲國會派的首領，他們決意鎮壓此種騷亂，毫不姑息。在一九二二年九

月召集的臨時國會擁護這個立場，並選舉科斯格累甫為總統。隨後雙方發生惡鬪，甚至比在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與英格蘭的爭鬪更為凶惡而殘酷。被捕下獄者盈千累萬，很多人遭暗殺或被處死刑。結果，自由邦派勝利了，在一九二三年春季，伐勒拉命令他的黨徒屈服。此次爭鬪所致的損失幾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伐勒拉及其黨徒頗自約束，避免暴動。他們組成共和黨（Fianna Fail），推舉國會議員候選人，但這些代表在當選時即拒絕依照憲法之規定宣誓效忠於英皇而自行辭職。有一個時期，這種現狀對於科斯格累甫實際上倒有益處，因為這樣一來，立法機關中就沒有強大的反對派了。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科斯格累甫的助手阿希京突被暗殺。阿希京為司法部部長，在數年前對於非正規軍積極取締，他通常被認為愛爾蘭的「強硬人物」。雖則伐勒拉和他的助手否認與謀此次暗殺，但政府決心防止將來再有相似的情事發生，並阻止共和黨的反對活動。國會通過了公安條例，授權當局用強硬手段處置故意非法的行動，又修正選舉法，俾事先未聲明願意履行憲法之規定者不得為議員候選人。換句話說，所有國會議員的候選人應於當選時先行同意將來宣誓效忠英皇。

到這個時候，南愛爾蘭的民衆意見顯然厭惡伐勒拉的種種辦法。再者，許多曾在經濟上幫助他的美籍愛爾蘭人爲了最近一次暗殺（此次暗殺被公認為共和黨的策略的結果）與他疏遠了。伐勒拉因此很聰明地宣稱他願意在國會中做一個合乎憲法的反對派首領，於是政治空氣就立刻緩和了。在一九二七年九月的選舉中，業已發誓拋棄暴動的伐勒拉黨在國會的一五三席中獲得五十七席。這種勝利使他成爲國會中第二位的最大政

黨牠所佔的席數祇較科斯格累甫的自由邦派少六席。

(丙) 科斯格累甫的統治

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召集的並選舉科斯格累甫為總統的臨時國會又採取了一種憲法（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這種共和性質的憲法已由不列顛國會全部接受，毫無修改。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英皇喬治五世就據此宣布「愛爾蘭自由邦」(Saorstát Éireann)正式成立。英政府隨即將最後一枝不列顛駐軍從這個最新的自治領地撤退回來。

在理論上愛爾蘭自由邦的行政權是屬於總督的；但在實際上它卻屬於一個負責的行政院。兩院的立法機關(Oireachtas)成立了，它包括上下議院。上議院(Seanad Éireann)有六十位議員，任期為十二年。最初，所有年齡達三十歲以上的公民都可以選舉上議院議員，但自有一九二八年的修正案之後，這種權力就移到兩個立法院去了，兩院對於它們所提出的同數名單，共同投票。上議院無權修改財政案，它通常只有一種擱置的否決權而已。下議院(Dáil Éireann)議員由所有年齡達二十一歲以上的公民依照比額代議制的原則選舉，任期四年。行政院的主席由下院選舉，他為自由邦的最高行政長官。宗教自由得到保障，愛爾蘭語被採為國語，雖則英語在官場上仍享受平等的待遇。

依據此項憲法的首次選舉，於一九二三年八月舉行。科斯格累甫的政黨在下議院僅僅佔得多數（而非大多數），但伐勒拉的共和黨代表的缺席，使他能夠保持對於國會的統制。一九二七年的選舉舉行之後，即當共和

黨黨員在國會中就議員之職的時候，他們曾幾番企圖排除科斯格累甫。有一次，賴有議長的表決票纔得阻止不信任案的通過。自由邦採取青白金三色的國旗，並自派外交代表於美國、法國、德國、比國和日內瓦。一九二三年九月，自由邦被准加入國聯，不久即被選為理事會非常理事。愛爾蘭此刻在不列顛帝國會議並得派代表團出席。

一九二一年的條約第十二條產生了一個棘手問題，有待解決。此條規定：倘使北愛爾蘭不願加入自由邦，應即成立一三人委員會，決定兩區域間的疆界，委員會的三個委員應由英格蘭、烏爾斯德和南愛爾蘭各派一位。一九二四年五月中，不列顛政府準備設立疆界劃分委員會的時候，北愛諸郡拒絕委派代表。因此不列顛政府只得替他們委派一位。委員會在一九二五年中視察邊界區域，並聽取證言，達數月之久。自由邦要求增加替倫（Ferrone）和斐曼那（Fernanagh）兩郡，但烏爾斯德人民決心保守東北六郡的每一寸疆土。委員會的判斷書從未公佈，但自由邦的代表藉口兩個英格蘭的代表多顧到政治上的事情而少注意居民的願望，也就辭職了。

在任何顯著行動發生之前，自由邦派定代表團至倫敦直接與不列顛政府進行磋商。磋商的結果，對於委員會的種種決議不予理會，另成立了一種妥協的辦法；依照此項辦法，南北愛爾蘭的疆界仍維持一九二〇年的地方自治條例所規定的界線。這種結果可算是烏爾斯德人的完全勝利。然而自由邦卻被解除了分負聯合王國所欠公債的責任。愛爾蘭國會對此辦法會有幾度反對，然終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以多數的贊同，通過接受。愛爾蘭兩部分之間的緊張狀態就此緩和了，他們並約定「彼此以鄰居友誼的精神」，互相扶助。

當時預料自由邦在獲得自治領地位之後，愛國者必有一番反響。自由邦人民進行着使結兒族語（Gaelic）

成爲愛爾蘭民族語言的強烈運動，許多家族與地方名稱都改寫結兒族文。於是威廉·科斯格累甫改爲李亞姆·麥克科斯給（Liam McCosgar），皇后鎮（Queenstown）變成柯布（Cobh）城了。同時政府採用特殊的愛爾蘭錢幣和郵票，所有全愛的郵筒都改漆青色，以替代從前所用的皇家紅色。一九二九年春季，愛爾蘭律師被強迫修習結兒文，好像以前政府官吏被強迫修習一樣。駐國際聯合會行政院的愛爾蘭代表奉命用結兒族語演說。但結兒族語複雜難解，英語顯然仍舊比較通行。自由邦具有非常嚴酷的檢查制度，許多馳名世界的主要書籍、報紙和刊物都被根據道德或政治上的理由，禁止發行。

科斯格累甫的政府一直維持到一九三二年，它自可以動人聽聞的經濟與物質的建設自豪。節約政策是以裁併重疊的機關並創設有效的濟貧方法來遂行的。警察和郵政制度皆經改組，常備軍的人數從五〇、〇〇〇人減到六〇〇〇人。公安條例（Public Safety Act）亦於一九二九年歸於無效。購買地產的特殊條款業經制定，各種農業得到補助。到一九二九年，沙農河（Shannon River）的水電力已有發展。現代化的教育制度也開始施行了，三百萬居民能達到合理的繁榮地步並感覺滿足，在許多年中這還是第一次。當時國內外深信自由邦的前途未可限量，所以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自由邦以不到五釐之利息向外所發行的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公債，不到數小時就在都林伯與紐約兩地銷售淨盡了。（註）

（註）籌款捐助愛爾蘭醫院與慈善機關的獨贏賽因經官許就獲得許多外國款子。科斯格累甫和俄勒拉二人均反對這種辦法，但一般人民很歡迎它。

(丁) 伐勒拉總統

總統科斯格累甫縱然在促進自由邦的繁榮和穩定邦基方面得到成功，但在一九三〇年他的統治的崩潰，已可計日而待了。一般的經濟衰落和當時流行的經濟國家主義影響愛爾蘭甚鉅，而政府的反對黨便利用此大部分不可避免的經濟困難大肆攻擊。在一九三〇年的上半年，科斯格累甫的內閣於反對增加養老金時，竟以兩票之差而遭失敗。總統立即辭職，但經過短時期後重又復任。然而，不久又發生其他問題，使這個政府感覺困難。

許多農夫因政府厲行禁嚴低等農業出產品運輸出口和禁止濫用劣種牡牛繁殖的法律，與政府疏遠了。電流的用戶表示失望，因為不良的電力分配器具使國家不得不對於沙農發電所供給的電力徵收高於預定的電費。政府之拒絕採行高率的關稅，觸怒了製造廠家。內閣中有幾位最幹練的閣員在辯論時所採用的粗暴的語調，又獲罪於歡喜安靜的國民。軍隊、警察和政府官吏的減薪（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使政府更加不孚衆望。

當一般的不滿形成愛爾蘭共和軍隊和其他反政府派再起的騷亂和祕密軍事活動的時候，政府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制定了一種更嚴厲的新公安法案。牠規定設立軍事法庭以審判被控犯有暴動行為或從事武裝訓練的人。這樣一來，更引起了反對派的忿怒。最後，當科斯格累甫和他的同僚宣稱自由邦可在不列顛聯邦國境內享受較大的自由和保障的時候，他們遂喪失了歷來愛爾蘭英雄引動人心的要素，即立於反對英格蘭的地位。伐勒拉卻與他們相反，現在似乎更有英雄氣概了。

將臨的一九三二年二月之選舉，似將為大家非常關心的事情。競選運動中的主要問題，就是接受抑拒絕接

受共和黨的黨綱。這個黨綱的主旨在於求政治與經濟的自給自足，牠包括下列四點：（一）一九二一年英愛條約中所有關於全體代議士在就職時應宣誓效忠於英皇的規定應即廢除；（二）依據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和一九二六年的財政協定愛爾蘭所欠於不列顛債券所有者的地產購買項下分期應付之款（每年三、〇〇〇、〇〇〇鎊）應留存愛爾蘭國庫，不再撥付；（三）一九三一年的公安條例應即停止施行；（四）高率的關稅壁壘應即設立。計算選舉票數的時候，愛爾蘭新國會將包括伐勒拉的擁護者七十二人，科斯格累甫的黨徒五十七人，獨立黨十七人，和工黨七人。當國會集會時，獨立黨與科斯格累甫攜手，而工黨代表則與伐勒拉聯合。因此後者得支配國會，但支配的餘地是很狹的。一九三二年三月中，伐勒拉當選為行政院的主席。

伐勒拉不久就覺到，預許深遠的改革易，而開始實行這些改革難。第一上議院的大多數議員依然是親科斯格累甫派，並且上院具有延擱國會所通過的條例達十八個月之權。並且，宣誓的規定是以在國聯秘書處備案的雙務條約中的一條款為根據的。再講到按年應付之款，它雖經不列顛政府擔保，卻是私債。因此，這筆款項的保留，雖則可以減輕平衡預算的工作，但同時違反財政協定並有背道德上的責任。高率的關稅壁壘固可設立，但因為愛爾蘭的繁榮依靠出口商業，萬一因此惹起保護稅主義者的報復，是很危險的。伐勒拉在選舉運動中所保證履行的政綱，只有公安條例的停止施行為一較易實行的事，所以在三月中就實行了。同時國會中工黨議員恐嚇政府，除非政府採取迅速步驟以救濟失業者的困難，他們就不再擁護政府了。

不列顛政府自然不贊成條約中宣誓條款的片面撤廢，或按年付款的抵賴。英人在公開的陳述中，通常僅着

重愛爾蘭爭點之非法，但他們的堅決立場之基本原因卻是軍事上的。英格蘭單在自衛方面着想，不能容忍愛爾蘭邦的設立，因為牠隨時可被外國利用為陸軍或海軍的根據地。高率關稅的恐嚇，在不列顛人看來毫不足慮，因為他們很易於採用同樣的手段為報復。英格蘭從自由邦購買十分之九的出口品，而所有不列顛出口貨物中只有十二分之一是運往愛爾蘭去的。

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季和初夏，伐勒拉和不列顛自治領部大臣托馬斯 (J. H. Thomas) 連續不斷地進行會議與談判，但毫無成就。托馬斯提出警告：倘使愛爾蘭按年應付之款延不撥付，英格蘭就要採取關稅戰爭的策略。許多愛爾蘭農夫與小商人見此形勢深為驚駭，但伐勒拉依然堅決。實際上，他又提出一個要求，就是南北愛爾蘭的統一。同時，愛爾蘭上議院曾抑阻國會企圖在憲法上取消效忠宣誓的嘗試，而愛爾蘭財政部部長宣稱截斷以後鉅額的付款並增加重稅。六月中，伐勒拉不允每年付給英格蘭一、五〇〇、〇〇〇鎊，而表示願意用仲裁的方法解決英、愛間的爭論。托馬斯接受此項仲裁意思，但是，當他拒絕伐勒拉所提仲裁員應在不列顛帝國外選擇充任一條件的時候，這件事又發生障礙了。其他自治領地的人民對於此次英、愛的爭論，多左袒英格蘭。(註)

(註)一九三二年六月在都柏林舉行的羅馬天主教聖餐大會，不列顛或其自治領地的旗幟未懸掛，而總督亦未經邀請參加當時正式的歡迎會。後來自由邦各部長也不加入邀請英皇代表參加的私人集會。

七月中，久已預料會發生的關稅戰爭開始了。自由邦希望她或可獲得一些經濟上的便利，因此參加七、八月間在鄂大瓦舉行之帝國經濟會議，但會議所商訂的協定對於她並無真實的利益。於是，她復企圖與德意志、波蘭

和其他國家商訂特殊通商條約，但又無結果。

共和黨在這外交失敗和經濟緊張的幾個月中，自然逐漸不孚衆望。幾個農民的團體確實決定不繳他們每年應付之款，除非英愛的爭端在最短期間得到解決。九月中，伐勒拉建議在仲裁者提出判斷書之前，將停付之款項存在國際清算銀行。但是，因為他依然堅持裁判機關應為國際性質的，這個問題依然是一個僵局。「愛爾蘭問題」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延擱，直到一九三二年的後半。

「獨立的」埃及

當土耳其與英格蘭在一九一四年發生戰爭的時候，埃及的地位成爲無可倫比的。埃及雖自一八八二年以來被大不列顛所佔，但依然受土耳其皇的統治。但是，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英格蘭宣告「土耳其對於埃及的保護權業已終了」。這樣一來使埃及及民族從雙重臣服的重負中解放出來。同時，不列顛又將保護權推廣到尼羅（Nile）河畔，廢掉克帶微·阿巴二世（Khedive Abbas II）——他恰巧住在君士坦丁堡，並立阿巴的叔父胡森·喀麥爾（Hussain Kamel）爲埃及的蘇丹。再者，英格蘭答應「獨自擔負此次戰爭的負擔，而不向埃及人民要求協助」。

英格蘭不久就違背了這個諾言，埃及人的不滿開始沸騰起來了。不列顛政府組織埃及及勞工與駱駝隊，以便利運輸派往巴力斯坦和敘利亞的軍隊。最初，勞工駱駝隊中的服役是出於自願的，並有優厚的工資，但當戰爭繼

續進行之時，隊中人員的待遇逐漸變壞，到後來竟專賴強迫招募了。因為供給不良，在巴力斯坦的嚴寒冬天，盈千累萬的埃及人凍死了，而有些強迫入伍的兵士仍被驅作戰。不列顛當局並徵發埃及人的家畜和穀類，所出代價很微。後來埃及人曾有幾次不得以昂貴的價格買還多餘的貨物。不列顛人復用曖昧的方法向無知無識的農民徵收紅十字會捐款。除了這些物質上的痛苦之外，埃及人在此次深切體會到愛國者對於異族統治的普遍的不快，和回教徒對於基督教的傳統的痛恨。美國威爾遜總統的關於民族自決的談話，復促進他們獨立的願望。但是，在戰爭期內並無公開的反叛發生，因為其時有許多不列顛隊伍駐在該地。

在休戰之後，埃及人驚愕地發覺：雖則有許多印度君王和阿刺伯酋長被邀參加和平會議，埃及人卻沒有得到這種權利。國民黨首領薩德·紮羅爾 (Saad Zaghlul) 毅然就任代表團的領袖，乘輪赴巴黎提出埃及獨立的要求。不列顛人逮捕了這個代表團，用船把他們押赴馬爾泰 (Malta)。這種行動迫使埃及國民黨不得不有所舉動，促成了一九一九年的反叛。此次暴動非常嚴重，竟使阿倫培 (Allenby) 將軍不得不率領了六〇、〇〇〇兵士，馳往恢復秩序。結果，被監禁的代表釋放出來，而阿倫培「幫助」組成了一個新內閣。此外，不列顛政府並派遣米爾納爵士 (Lord Milner) 所領導的調查團到埃及舉行調查。

這個調查團曾接到二十九封歡迎信和一一三一封表示惡意的信，牠實地調查後，就回到倫敦。米爾納又在倫敦訪問紮羅爾，其時後者早已到英格蘭了。米爾納調查團在牠的報告書中，建議埃及應予獨立，但附有多種限制。英格蘭得在蘇彝士 (Suez) 運河河畔留有常置的衛戍軍，並得在戰爭時期佔據整個領土。英格蘭復應供給埃

及財政和司法顧問，並委派一個高等委員，他具有否決涉及外國人的法律之權。最後一種限制就是：埃及與外國商訂之一切協定必須首先得到不列顛的允許。當這些條件歸納為一條約而在一九二一年向埃及提出的時候，埃及國民黨毫無猶豫地加以拒絕了。

埃及重又發生暴動，紮羅爾又復被捕，這一次他被押赴直布羅陀（Gibraltar），阿倫培再使用了他的軍隊一次。這位將軍並建議英格蘭應公布條約中的各條款，作為片面的宣布。這個建議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實行了，此項條約宣布埃及為「獨立的自主國家」。但下列各點絕對保留，聽候英皇陛下政府的裁奪：防守蘇彝士運河，防守埃及以抵禦外國的侵略，保護埃及國內的外國人民及其財產，和管理蘇丹。蘇丹的重要在於牠為粗棉花的出產地，並為控制埃及水源的區域。當不列顛政府公告不列顛對於埃及的保護權業已終了時，埃及、蘇丹、阿默德·佛阿（Ahmed Fuad）——他在一九一七年中繼胡森的位——同時改稱國王了。

「不列顛對埃及的門羅主義」自然使國民黨煩惱，但他們無力抵抗。新王國的憲法在一九二三年中起草就緒，國會選舉定於一九二四年舉行。國民黨在選舉中大獲全勝，已回到埃及的紮羅爾成為首相。他依然希望埃及真實獨立，所以邁赴倫敦拜訪英首相麥唐納，但他的追求毫無結果。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發生另一個危機，李·斯退克爵士（Sir Lee Stack）——他是蘇丹地方的總督兼埃及軍隊的總司令——在開羅被暗殺了。佛阿和紮羅爾二人對於這種犯罪都表示駭異，並允許迅速逮捕凶手處死，但英國人利用這個機會，發出嚴重的最後通牒。他們要求埃及政府正式道歉，懲罰罪犯，取締政治性質的遊行

示威，賠償五十萬鎊的款項，所有埃及官吏及軍隊立即退出蘇丹並宣告蘇丹地方的革穰賴（Fezireh）灌溉區域中的棉花種植將無限推廣。這一點對於埃及水的供給實爲一種嚴重的威脅。

紮羅爾對於英國所提出的要求，除關於蘇丹地方的條件之外，其餘均立即接受。不列顛軍隊因此佔據亞力山大里亞（Alexandria）的海關，紮羅爾就於抗議之中辭職了。他的職位即由較有手腕的西瓦·帕沙（Ziwar Pasha）繼任，他贊同不列顛的要求。後來英國允諾僅以藍尼羅河的水供蘇丹地方灌溉計畫之用，而以白尼羅河的水留給埃及人，但埃及人對於不列顛人連續的建築水閘計畫深爲震怒。國民黨所支配的國會請求國際聯合會予以補救，但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提出警告：這純粹是英格蘭和殖民地之間的內部事件。因此，國聯中沒有一個會員提出關於埃及的問題。「獨立」的埃及竟不能使她的提案獲得國際的裁判。

在以後的數年中，埃及的政治事實上依然維持固有的局面。幾個國會經召集而復經解散，國民黨的大多數對於親英的各部長所提出的一切辦法，都固執地加以否決。一九二六年，紮羅爾若非因英國高等委員魯意爵士（Lord Lloyd）的反對，就重又成爲內閣總理了。但是，這位國民黨首領直到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逝世的時候，仍統治國會。他與不列顛最後的嚴重衝突發生於他所提出的擴充埃及軍隊名額的建議，和他反對無期延長不列顛軍隊在埃及駐守時間的新條約。

雖然埃及國民黨在紮羅爾死後依然如舊，但因埃及王和他的左右近臣——他們受現行政制之賜始擁有他們的地位——都表顯親英的情感，所以該黨僅有很少的成就。並且，國王佛阿毫無意於給予人民一個民主的

政府他滿心不喜歡國會責任制度。

英國工黨政府於一九二九年六月再起執政，這重又引起了埃及的獨立希望。當不列顛以較開明的拍息·羅倫爵士 (Sir Percy Loraine) 替代魯意為駐埃及及高等委員的時候，並當英國外交大臣漢德孫在一九二九年八月六日宣稱將以新條約草案提交英國和埃及的國會的時候，埃及遍地歡欣鼓舞了。

依照所提的條約，除開蘇彝士運河的一片地之外，其餘埃及各地的不列顛駐軍均須撤退。兩個國家應成立軍事聯盟，遇到戰爭時彼此應互相協助。埃及軍隊應與不列顛軍隊受同等一律的訓練，在戰爭時英國得利用埃及為軍事行動的根據地。假如埃及決定聘請外籍的助理員或顧問，概應聘請不列顛人充任。英國幫助埃及要求加入國聯，並助埃及廢止外人的治外法權。一八九九年所確立的對於蘇丹的共同管轄權應重新開始。高等委員一職應即廢除，彼此並互相交換大使。該項條約的有效期為二十五年。

雖則對此條約的接受或可為趨向獨立的更進之步驟，但不能使紮羅爾的繼任者穆斯塔法·那罕·帕沙 (Mustapha Nahas Pasha) 滿意。因此，此項條約經國民黨內開和國會 (牠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選舉之後即掌政權) 否決。埃及及人民重又騷然不安，國會不久就被停止施行職權——這是五年中的第四次了。伊斯邁爾·息德刻·帕沙 (Ismail Sidky Pasha) 因此成為狄克推多，他在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公布新憲法。新憲法規定上議院設一百個議員，其中六十人由埃及王委派，四十人由人民選舉；下議院設一百五十人。選舉制度改為間接的，僅於初選時准許成年男子普遍有選舉權。埃及具有停止國會施行職權之權，和解散國會之權。

新憲法中顯示政府有減縮國民黨權力的企圖。由於政府的妥善監督指導，人民對於此項憲法的反響，沒有比預料的那麼激烈。但是，在那罕（Natah）領導之下的國民黨爲努力擁護一九二三年的憲法，並爲斥逐息德刻起見，此刻與埃及前內閣總理摩罕默德·馬穆德·帕沙（Mohammed Mahmud Pasha）所領導的自由立憲黨聯合起來。在此次聯合之前，馬穆德（他曾在一九二九年受過牛津大學的名譽學位）在國民黨看來，與息德刻是同樣的可厭，但現在兩黨因共同利害關係，而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息德刻新近組織的人民黨了。人民黨包括較富有的公民、商人和擅權的政客。

那罕和馬穆德雖宣稱他們有操縱百分之九十選舉票的把握，但仍揚言欲抵制一九三一年的選舉。息德刻政府表面上爲「維持公安」起見，禁止一切國民黨的集會，並取締抵制選舉運動的宣傳品。普選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十六、十八日三天中舉行了。人民每五十人中可推選一個投票者，於六月一日的國會選舉中爲選舉人。在投票以前，政府不准反對黨領袖離去開羅（Cairo），恐怕他們誘惑人民拒絕投票。在選舉暴動中有很多人被殺死了，並有更多的人受傷，因爲警察和軍隊接到嚴厲的訓令，鎮壓騷動。國民黨宣稱政府人員確曾擅入私人的住宅並強迫居民出門投票。六月中的第二次選舉引起較少的興趣，並發生較少的騷動，結果政府大獲全勝。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日，新國會開幕了，儀式甚盛。國王的演辭指出：政府最近對於國內經濟之改進，頗多設施，國內縱有不景氣的現象，但預算仍得保持平衡。當埃王未對新憲法宣誓即離開國會的時候，造成一種不歡的印象。然而息德刻批評道，既然埃王已宣誓遵守一九二四年的憲法，這次的宣誓實爲多餘的手續。於是，「爲顧慮

政界和政治爭論的安適計』，息德刻立即採行一種嚴厲的新出版法。

息德刻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兩年中，始終保持埃及的獨裁制。國會之召集與閉會均聽他裁奪，對於過分熱心的國民黨，共產黨和新工黨黨員則有嚴酷的鎮壓辦法來對付。在此數年中，人民經歷很多的經濟困苦，大部分的原因在於棉花價格的低落。

不列顛政府對於這些騷擾事件抱消極靜觀的態度。他們告訴埃及及人民，他們應當自行解決內部的種種困難問題。英政府並不企圖防止埃及和狄克推多使用軍隊來阻撓出於真正人民的志願。一九三一年中一個特別商業調查團的報告的印行，引起英國人民注意不列顛的戰後整個政策的失當。這件報告指出不列顛售給埃及的貨品在一九一三年佔埃及入口總額百分之三〇·五，到了一九三〇年就降到百分之二〇·三。這種損失，一部分原因在於法意貨物的低廉價格。但英國在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個有力的主顧中的商業所以沒有起色，埃及及人民對於不列顛的政策的不滿自然應負其咎。

印度

(甲) 印度與世界大戰

在世界大戰爆發後三個月中，印度軍隊在西線上奮力戰鬥，蓋印度與其他不列顛殖民地一樣，在大戰期內始終效忠。印度一共供給了一、三〇〇、〇〇〇兵士，他們被分別派往埃及、中國、東非洲、阿拉伯、巴爾幹半島諸國，

和法蘭西服務。並且，印度政府獻給英國資金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此外，類似獨立的印度各邦的幾百諸侯復「自願」捐助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以補不足。但是印度那時的平靜無事，不需要英軍隊的鎮壓土人的叛亂，實爲印度對於協約國最大的供獻。

不滿和不安，久爲印度政治生活的特徵。在不列顛東印度公司（一六〇〇—一八五七年）的統治之下，印度的情狀早已大壞，直到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間英政府解除那個公司的統治權之後，她在英政府管轄之下，情形始比較稍有進步。印度政府法（Government of India Act）（一八五八年）和印度議會法（Indian Councils Act）（一九〇九年）二者的目的都在於改良政治的局勢，但不能使許多印度首領感覺滿意。他們由於留學和旅行於西方的結果，漸認真正的代議政治爲一種即應達到的目標。因此，在大戰期內，印度領袖們顯然表示他們希望不列顛政府給予印度大大的讓步作爲他們忠誠的酬報。他們的力量由於以下一件事實頓然雄厚了——大戰促成印度國內回教和印度教之間的暫時和睦。

回教徒不聽從土耳其皇帝的要求對英作神聖之戰的命令，反而與印度教徒聯合協助不列顛，並要求政治的改革。在一九一六年，一般著名的愛國志士在一八八五年所組織的印度國民大會及一九〇六年所創立的全印回教徒聯合會，第一次聯合舉行會議。會議中的傑出人物爲激烈的新聞記者羅卡曼牙·底拉克（Lokmanya Tilak）和一位異常活動的愛爾蘭婦女安尼·貝山特（Mrs. Annie Besant）夫人。回教徒與印度教徒親睦的結果，即爲向英國提出（一九一六年）一種稱爲「大會與聯合會共同方案」（The Congress-League

Scheme) 的改革計劃。

(註)貝山特夫人是一個神祕的「通神會」(Theosophical Society)會長，且爲印度國家主義的熱心主張者，她因此曾幾次被逐出印度。她編輯過新印度(The New India)報以「印度自治」爲口號。

當時英人正在集中全副精神於大戰，故最初對於此項方案漠然視之。但是，布爾塞維黨在印度之宣傳，和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的演講畢竟引起許多不安，以致英政府不得不採取斷然的行動。一九一七年，印度事務大臣麥塔究(Montagu)決意調查印度事務，以便提出最後導向自治的改革案。麥塔究慎重聲言導向自治的步驟必須爲「漸進的」，他於是同了印度總督辰茲斐德爵士(Lord Chelmsford)前赴印度，與許多人晤談。

在印度的英國官場都以爲英國的權力之減少，必將引起騷亂、鎮壓和階級戰爭。在印度的歐洲商人和幾個富有的回教徒——他們深懼婆羅門教徒的統治會發生不良的結果，也抱有同樣的見解。反之，國民黨的代言者搜集並宣布不列顛統治之下的奢華浪費的罪狀，以反對不列顛的統治。他們訴說賑荒工作的弛緩，軍費的重負及不列顛人與土人交往時的傲慢態度，他們又要求對於英國的若干種貨物徵收保護稅。

經過以上的晤談後，麥塔究——辰茲斐德報告書(Montagu Chelmsford Report)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中公佈了。在此後數月中，國會各委員會依據該項報告書中所陳的原則，從事起草法律。其時印度的罷工和騷動所表現的騷動，更加激烈，卒使總督的政府頒布所謂路拉脫法令(Rowlatt Acts)，大大限制了印度人民的自由。這些法律授權政府停止陪審官的審判，剝奪上訴權，和施行嚴厲的刑罰，來抑制革命的活動。後來，一切公衆集會都

在禁止之列。至一九一九年的春季，當局與土人之間的衝突，在旁遮普（Punjab）省阿木里昔爾（Amritsar）地方達到頂點了。

阿木里昔爾地方的暴動殺死了幾個英國人，其中並有一位女傳教士。旅長帶厄（Dyer）奉命前去恢復秩序。曾有一次這位旅長發現民衆正在公共廣場非法舉行大會。帶厄率領軍隊馳往集會所在，即發命令向羣衆掃射。直到軍火告罄，方停止掃射。此次約有四百餘人被殺害，有三倍於此數的人受傷。一般民衆異常震怒，國會乃委派罕特委員會（Hunter Commission）前往調查「屠殺事件」。這個委員會的報告雖則譴責帶厄不應未予警告即行掃射，並在能把握當時的局勢之後復繼續掃射，但竭力掩飾事實的真相。印度人民聽到這個報告大爲狂怒，尤其因爲帶厄在審問之中曾承認當時可以不放一槍制定擾亂。當土人知道帶厄雖被召回國但並未失去位置或恩俸的時候，他們的憤火實難熄滅了。事實上，贊揚這位將軍的英國人反贈他一柄寶刀和鉅額款項，承認他對於帝國服務的成績。

因此，當國會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通過依據麥塔究—辰茲斐德報告而草就的印度政府法的時候，印度的民情一點也不愉快。該法僅適用於印度十五省（包括不列顛所轄的印度在內），牠增加投票人數從三〇、〇〇〇人至五、〇〇〇、〇〇〇人以上，這樣一來全人口百分之二·五有了選舉權。總督像以前一樣仍由一個全國立法機關協助爲治——這個機關包括國務會議和議會。國務會議的委員規定爲六十人，其中三十三人由限定的一羣富有的選舉者選舉。議會的議員規定爲一四四席，其中一〇三人是民選的。一切法律概須得到議會的

核准但有幾種法律只須得到國務會議的同意即足。在非常時期，總督得頒佈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總督有支配預算之權。該法並規定十年之後方可考慮更進一層的改革。

該法的最顯著的特質就是在印度產生了一種處理省政的雙重政府。在各立法省份中，凡警政、法律和行政等事之處理，均經該省省長和對他負責的官吏所「保留」。省長自然由總督委派，總督本身則受印度皇帝（即英皇）的任命。凡衛生、教育、農業等事務皆「移交」省政會議管理，牠的大部分委員是選舉的。執行這些移交的職權的官吏是對省政會議負責的。

印度國民黨黨員並不以這些改革為滿意。他們對於以下各點訴說不平：總督由於有權掌理財政的關係，依然是最高無上；該法在實行後即為印度的憲法，應在少於規定之十年內經過修改；選舉權限制過嚴；省政會議無力為推行教育和農業的計劃籌措巨額款項。於是印度立刻開始要求不列顛再予讓步的運動，他們的領袖即是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乙)「聖雄」甘地

甘地以一八六九年生於一個政界望族的家中。他在青年時代多愁多病，十三歲上就結了婚，此後，他到英國學法律，在獨身主義、素食主義和禁酒主義這三種誓言之下度生活。「他害羞、喜靜、孤寂、貌醜、衣服簡陋、語言笨拙、為異國的禮貌所惑，而在居民不大肯費事為素食者供備菜蔬的國中幾乎挨餓。他就這樣可憐地受着困苦。然而，他及時找到一家備有蔬食的飯店住下，由於三餐有規則並且豐盛，他的健康漸有改進」。甘地在得到律師的資

格後，即回到印度執行律師職業。他在這一方面沒有特殊的成就，因此當他得到一個機會到南非洲去辦理一件案子的時候，他大喜過望了。

甘地留居非洲二十餘年，努力於維護印度僑工的權利。他不久就聲譽鵲起，一躍而為成功的辯護士，不列顛政府對於他為建立印度人與帝國中其他人民的平等地位的努力，恆加以協助。甘地對於這種協助很感謝，所以在大戰期內，他頗積極從事於勸諭印度人往應軍隊的徵募。但是，在休戰之後，路拉脫法令和阿木里苦爾屠殺事件，使他轉變成了不列顛政策的著名反對者。

甘地個人實在是一個謎，他曾被更番稱為先知、狂人和政客。他是一個瘦小而衰弱的苦行者，消磨許多時間於絕食、齋戒和禱告，而對於富貴或享樂毫無興趣。他對於他的信徒的心理和行為，具有近於神祕的指揮力量，他們稱他為「馬哈脫馬」(Mahatma) 其意即為「聖雄」。他和許多其他有才能的印度人一樣，逐漸悟得以下的結論：西方工業主義的「巨大的卑鄙性質」完全與東方風尚的優美的反省精神不相合。在甘地式的人們看來，「世界大戰是一種顛撲不破的憑證，表現着西方文化的虛偽和的基督教制度之失敗」。

甘地熱烈地努力為印度求得自治，並且是第一個提倡穿着土布的人。他憎惡暴動，當他看到英國躊躇逡巡，不自動給予印度自治的時候，就開始鼓吹消極抵抗的運動。他叫他的信徒採取物質和精神上的不合作政策。不久，印度人很有效地抵制不列顛人的學校、法庭、歡迎會和貨品；不參加投票；且不理會路拉脫法律。土人很高興地希望這樣證明英人的種種改革不過是一件滑稽可笑之事，並且希望用損害英人經濟收入的方法，可以得到自

治的早日頒給。在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內，幾次不幸的事件更促進了甘地的運動。回教徒因為協約國在色佛（Sèvres）和平會議對待土耳其的惡劣態度，也羣集在他的旗幟之下。當英國國會限制印度人在非洲墾牙（Kenya）殖民地所可居留的區域的消息傳來的時候，甘地的運動獲得更多的贊助者。警察對付印度羣衆和個人的殘酷手段，也有利於甘地。

不幸印度人民焚燬英國衣服的熱心甚於製造印度土布，這實有礙甘地計畫的持久的勝利。甘地過於信任紡織機的力量，他的談話往往超過聽講者的理解力，故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有時，他以流暢的演詞激怒聽衆之後，覺得要使他們抑制鹵莽的舉動實爲不可能。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英國皇太子遊歷印度，竟成嚴重的罷工和暴動的時機；一九二二年三月，甘地爲了激動民衆暴動的罪狀，被判決監禁六年。

甘地被關入監獄之後，印度一般的反英運動頓告平靜，回教徒和印度教徒重又內鬩起來。不合作政策業已顯然表明是一種失敗。達斯（Das）所領導的許多國民黨黨員，現在決定放棄抵貨運動，決定推舉立法議會選舉的候選人在選舉運動中，他們以新組織的自治黨黨員地位，至少能够在公開辯論中對公衆表示他們的見解。因此，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自治運動大半限於立法議會的選舉。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認爲釋放甘地是沒有危險的了，時爲一九二四年一月，在甘地經過盲腸炎割治之後，在被釋放之後，退隱不出者約五年。

（丙）繼續的奮鬥

其時印度人民獲得很多機會觀察雙重政府制度的效用。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議會中一個特別委員會議

決雙重政府是一種失敗。對於這一點，英籍和印籍的委員都表同意。一九二五年九月，在達斯逝世後繼任爲自治首領的奈魯(Nehru)氏，以印度人民的名義，要求議會在印度各省設置完全負責的省政府，對於所有國家事務，除關於國防和外交者外，也設置負責的政府處理之。因此立刻就顯然，從事修訂麥塔塔改革案的委員會之委派不能再遷延到一九二九年了。

因此，代表英國三個政黨而以約翰·西門爵士爲首領的法定委員會終於一九二七年組織成立。這個團體內沒有印度代表，但西門爵士邀請印度當地的主要政治家以「聯席會議」與這個團體合作。可是國民黨因他們被政府公然除外不得參加委員會，大感憤怒，當代表團抵達印度時他們竭力加以抵制。雖則政府對於委員所乘的專車保護周密，但在途中好幾次有人謀以炸藥行刺。委員會的調查任務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終了，到一九三〇年六月，兩厚冊的報告書發表了。(註)

(註)西門委員會的調查工作限於包含英屬印度的各省。蒲脫拉(Buteh)特別委員會同時調查印度各本邦的情形。

在西門委員會進行調查的時期內，印度的國家主義重又擡頭。甘地從隱居中突然出現，爲一羣有力量的首領們所擁護，其中有女詩人奈端(Naidu)，民衆所深愛的奈魯和他的激烈的兒子。在代表愛國的回教徒和印度教徒的一九二九年全印國民黨大會席上，通過了一項決議案，要求英國立即給與印度自治領地的地位。其時並有強有力的運動，贊成絕對獨立，但這一點因甘地的影響，卒被打消。甘地覺得自治領地地位是印度所能以堅固的前線力爭的唯一政綱。在一九三〇年三月，甘地向總督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馬上給與印度自治領的地位。

當甘地的要求被拒絕的時候，他重又開始非暴力的抵抗運動。他擇取政府食鹽專賣爲消極抵抗的主要攻擊目標，決心違反禁止土人煮海水爲鹽的法律。爲了這個目的，他和一小隊志願者步行了一百七十英里，從舍棚內帝（Sabarnati）到康木拜海灣（Gulf of Cambay）上的洞第（Danti）地方，從事製鹽。他在一九三〇年四月六日首先違反該項法律。這種行動爲全印人民普遍蔑視法律的一種信號。許多印度官吏辭職了，而稅賦的徵收也遭抗拒。在各城市中，千百土人將身體臥在鐵軌上或車輛來往的路線中，以阻礙鐵路和街道上的交通。甘地又再三囑咐他的信徒抑制暴動，但他們究竟不如他溫良，所以流血的事件很多。當局相戒不逮捕這位聖雄，深恐他被認爲成仁的烈士，但五月中的形勢非常惡劣，以致政府終不得不將甘地和其他著名的國民黨黨員投入監獄。

當西門委員會建議書公布的時候，印度人民的怒焰更加高漲了。此項報告書被稱爲「在限制「建國」的實驗範圍一方面，是極端反動的和過於謹慎的」。它的目的在於擴大印度事務大臣、總督和省長的權力。它甚至故意避免提到自治領地位或獨立，它又建議使省議會成爲學校，俾土人可在其中獲得政治的「初等教育和訓練」。這簡直太無禮了，殊有傷有知識的印度人的心。民衆對於全部印度事件的經過的震怒程度，從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獄中關有三〇、〇〇〇愛國犯一情形可以想見了。後來並有更多的國民大會會員要求完全獨立了。

在一九三〇年將終的時候，領袖們的入獄和雨季的降臨抑止了亂事的爆發。各團體間的結合力，像尋常一樣，已經是很脆弱的；現在，仍逃不脫前例，回教徒和印度教徒，高貴階級和卑賤階級感覺他們結合在一起是勉強

的和缺乏力量的。

其時，總督歐文爵士（Lord Erwin）曾建議在倫敦舉行圓桌會議，以爲達到對印妥協的可能辦法，英政府也就召集了此項會議。當時大家曉得，西門委員會的種種建議對於英皇陛下的政府當無任何拘束力，大家並希望「印度的各派思想家」都會準備參加討論。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日，這個圓桌會議開會了。出席的人員有十三個英國人——首相麥唐納和三個政黨所派的各四人——和七十六個印度人。這些出席的印度人代表印度各本邦和實際上英屬印度的一切政治團體，除開所謂國民大會的國民黨黨員（包括甘地在內，他寧願留在獄中而不願合作）。印度代表團包括回教徒，印度教徒和婦女代表，甚至包括一個印度的賤民階級一份子。

圓桌會議在一九三一年正月十九日閉幕之前得到許多結果。印度本邦各諸侯宣稱他們願意與英屬印度共組聯邦。大會議定緬甸省應脫離印度，不妨礙它本身的憲法上的發展。高貴階級人民簽訂了一個誓約贊成在草擬的憲法中規定「賤民」階級有平等的政治地位。會議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回教徒與印度教徒的爭論。回教徒深懼在自治政府之下他們受到不平的待遇，因爲他們僅佔印度全人口百分之二十二。他們堅決主張分別的市鄉選區制度，並要求在有回教少數民族數目甚多之處享有一部分政府機關的位置。圓桌會議對於這個問題並未解決，但希望回教徒和印度教徒可以共同找出一個妥協的解決辦法，以便提交後來在一九三一年舉行的第二次圓桌會議。印度聯邦憲法的草案也經討論，但英代表堅持國防、外交和對外財政的責任必須依然歸總督擔負。因此，自治領地位似乎不成爲一個問題。

當出席會議的印度代表從倫敦回去向同胞解釋他們所成就的工作時，印度境內的極端派——其中有許多人是剛從監獄中被釋放出來的——表示大大的不滿。他們對於所獲的利益認爲不過是「給與餓獅的一杯牛乳」罷了。於是甘地重新開始他的非暴力抵抗運動，直到一九三一年三月，歐文—甘地協定（Irwin-Gandhi Agreement）（一種休戰的條約）成立之時方告停止。一般國民黨員答應不再從事非暴力抵抗運動，同時政府頒行許多大赦令，並准許和平的罷工糾察和抵貨運動。一個月之後，思想開明的歐文爵士去職，威靈頓伯爵（Earl of Willington）繼任爲總督。不幸雙方都沒有真正遵守休戰條約的條件，於是在整個夏季中，騷動和不滿到處皆是。英國的工黨政府，藉許多保守黨和自由黨黨員之助，提議在一九三一年九月重開圓桌會議。甘地經過許久的躊躇之後，終接受了邀請出席的帖子。他以國民大會代表的資格前往參加。

第二次圓桌會議是一件失望的事情。不獨印度代表和英國代表的衝突見解，使關於印度自治的範圍之討論難以進行，並且印度各本邦和英屬印度的代表們對於他們所需要的聯邦之種類亦不能同意，回教徒和印度教徒在關於回教徒和其他幾個印度少數民族的特殊政治保障的問題上覺得彼此意見相去更遠，此外，關於「賤民」階級所應得的實在地位的見解更爲分歧。使甘地更覺憤懣者，現任舉國一致內閣的首相麥唐納，竟巧妙地詔告印度人民道，新憲法一事須等待他們自己對於市鄉選區制和少數民族的保障的問題成立妥協之後，方可考慮。在幾月光陰化於無結果的掙扎之後，英國首相宣告閉會（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委定三個委員會，分別擬訂關於選舉權、財政和聯邦組織的詳案，並預許在各委員會的報告完成時重行召集圓桌會議。大部分

的印度代表回到印度，深信這次的集會是一種失敗。

在一九三一年中，^(註)印度人的反英示威運動層出不窮，且形成對於官吏生命的危害。圓桌會議的失敗，激動士人愈趨於暴動。情形既如此惡劣，所以威靈頓爵士不得不頒行一大批十分嚴酷的法令。甘地在返印時，竭力勸說總督取消此種法令，但當總督拒絕他的要求的時候，非暴力抵抗運動又重行開始了。因此甘地再被監禁（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月間，全印國民大會主席奈端（*Mme. Naidu*）夫人和四百個會員被捕入獄，因為他們反抗總督禁止集會的訓令。在一九三二年起初五個月中，因違反特別法令而被捕的人總數約達四八、五〇〇；而要求獨立的人數每過一星期增加一次。

^(註)本年中，自英國運往印度的貨品少於一九三〇年的三分之一。經濟的恐慌大大增加了印度的不安和騷動。

這樣的事件殊難助進圓桌會議所不能解決的各種爭論之解決，不獨英國與印度之間的關係較從前任何時期更爲惡劣，並且回教與印度教的裂痕也迅速擴大。在一九三二年五月與七月之間，孟買（*Bombay*）、加爾各塔（*Calcutta*）和其他城市中有幾次流血的宗教衝突爆發，傷害的生命達數百人之多。最後，全印回教同盟唾棄印度教國民黨的暴動，並否認全印國民大會的種種極端要求。這兩個團體所顯然同意的，祇有一個重要之點，雖則他們所持的理由各自不同：那就是他們都決定抵制預定舉行的第三次圓桌會議。這種窮境大爲英人所不耐，最後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舉國一致內開中的印度事務大臣霍爾爵士（*Sir Hoare*）宣稱，英政府本身將先擬定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的辦法，然後再召集圓桌會議，完成一切未了事務，並起草印度憲法，最後復將一切

決議編成議案提交國會討論。此項消息傳到印度時，印度人民報以再起的暴動和流血。

九月，英人的選舉計劃公布了。牠爲十二個印度團體（包括印度教徒，回教徒，「賤民」階級，賽克 (Sikhs) 教徒，印度基督教徒在內）分別設置市鄉選舉區，並在省立法機關爲各該團體確定其代表之席數。雖然此項計劃似乎對於各少數民族和各階級很爲公平，但牠的公布終引起重新的暴動，尙在獄中的甘地也竭其所能雄辯滔滔地反對此項計劃。他說明他決不擁護這種制度，因它不許印度公民以公民資格投票，反而要他們以印度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或「賤民」階級的資格投票。他以此爲這種辦法只能使宗教的和階級的爭端永遠存在，且更爲劇烈。雖則安貝特卡 (Dr. Ambedkar) 博士所領導的一羣「賤民」階級贊成此項計劃，以爲牠給予被壓迫階級和少數團體極需要的保護，但甘地在一九三二年九月二日開始「斷食至死，除清水外，任何食品都不入口」。他宣稱，他的絕食，祇在政府爲被壓迫階級所設的分別市鄉選區的規定撤消時纔停止。

五日之內，幾個婆羅門教徒和「賤民」階級的人民，找出了一個妥協的辦法。後者對於分別的選區制度放棄他們的權利，但爲補償起見，須規定他們在省立法機關所佔的席數應倍於英人所定的。後來准許他們在政府機關中佔有相當的位置，並在預算中劃撥一部分經費以充改進他們社會福利之用。雖然甘地此刻已中止絕食，選區制的解決仍未能滿足各少數民族之意，而印、回兩教仍繼續酣鬪。一九三二年後半，第三次圓桌會議在倫敦召集了，但此次甘地未被指派爲代表，因爲印度總督在他的非暴力運動存在一天，拒絕加以釋放。

我們說，目前英國在印度的地位實無可欣羨，是顯而易見的。英國既經一度關心印度的事務，她斷不能就此

退出，而一任土人爲他們自己而奮鬥。不論印度的統一趨於何種形式，這種統一大半總是由於反對共同的敵人（英國）而助長的。假如外國人立即離開印度，則種族、階級、宗教、語言、地方主義和經濟等等的問題——不必談及政治的缺乏經驗，文盲狀態，傳統的勢力——對於安定的印度人民生活似乎很易於產生危險和困難的障礙。依我們的想像，外交上的糾葛亦必發生。但是，英國在印度準備獨立生存一方面所能做的工作，自然比過去所做到的還多得多。他們在這一方面的鬆懈是舉世皆知的。印度久已被認爲英帝國的重要份子，而不思及它對於印度人民也是重要的。到今日，這種態度似乎正在迅速改變。自然，英人在將來必能較以前加倍努力進行擴充印度人的教育權和行政權。

巴力斯坦

一九二二年七月，國際聯合會將巴力斯坦劃歸大不列顛，作爲甲種國聯委任統治地。在那個時候，「聖地」約有人口七五七、〇〇〇，其中猶太人佔八三、〇〇〇人，基督教的阿剌伯人七三、〇〇〇人，其餘泰半爲回教的阿剌伯人。委任統治條件中明白肯定了一九一七年的巴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在此宣言中，英國預許在巴力斯坦設立「猶太人民的國家」，這件事使人口佔大多數的回教徒大爲失望。阿剌伯人對於宣言中所謂「凡足損害非猶太族社會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的一切設施均不得推行」的諾言，也不感覺安慰。事實上，他們實看不出這種辦法，如何能夠與英國在大戰期中預許阿剌伯人獨立的諾言或威爾遜的民族自決

說相調和的。最後，他們一覺察駐巴力斯坦的首任英國高等委員撒母耳爵士（Sir Herbert Samuel）是猶太人，更覺不甘心了。

撒母耳爵士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頒佈了巴力斯坦的憲法。此項憲法規定設置高級委員一人，總司令一人和一個任命的行政院。此外又設一立法院，以高級委員和二十二個代議士組成之。這些代議士中，十人由高級委員委派，其餘十二人（回教徒八人，基督教徒二人，猶太人二人）是用初選複選制度選舉。但是，回教徒在立法院的選舉舉行時拒絕參加，於是撒母耳爵士不得不藉一個顧問委員會的襄助，管理巴力斯坦的行政。（註）

（註）一九二八年，薩塞勒爵士（Sir John Robert Chancellor）成爲高等委員，接着（一九三一）他的職位由密可帕爵士（Sir Arthur Wauchope）繼任。

阿刺伯人對於政治、經濟和宗教的現狀十分不滿，這種不滿不久暴發爲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劇烈的反猶太暴動。幾個猶太人團體受到襲擊，有一三三個猶太人被殺害。麥唐納政府急派飛機和軍艦前往肇事地點，在數星期的時間內恢復了秩序。窩爾德·蕭爵士（Sir Walter Shaw）所領導的英國特別調查委員會確認「阿刺伯人因爲他們的政治的和愛國的企圖業已失望，並爲他們將來的經濟情形抱憂慮，故對於猶太人生出怨恨仇視的情緒」一事實爲暴動的主因。然而，國聯委任統治地委員會卻發表一個報告，宣稱此次暴動的目標亦在於反對英國，其程度正與反對猶太人相同，並責備英人未能充分準備軍隊和警察的保衛力以應付事變。英國外交大臣漢德遜嚴刻地批評國聯的報告爲傾向於「極端的猶太人的關於委任統治的意義和目標的爭論」。

無論如何，阿刺伯人確已臚陳對於當局和猶太人的某種不平。他們訴說，土地法因使猶太人能够購買大部分富饒的可耕地，實爲對於阿刺伯人生存的一種威脅。他們反對政府對於猶太族的移民的偏袒態度，因爲到一九三〇年，猶太人人數已增至一六〇、〇〇〇了。他們並且不喜歡移入巴力斯坦的那一種人。移入巴力斯坦的猶太人大部分是從波蘭、俄國和羅馬尼亞逃亡而來的，他們通常是窮困的，所以往往行動激烈——據阿刺伯人所說如此。有錢的猶太人企圖永久住在聖地的比較來得少，這是自然確實的。一般有錢的猶太人寧願捐輸金錢建設國家，並託人代爲養成猶太民族主義。

此外的阿刺伯人與猶太人的糾紛涉及耶路撒冷 (Jerusalem) 城內著名的威林堡 (Wailing Wall)。猶太人假定這個城堡爲所羅門 (Solomon) 廟的遺跡，他們向來在此處禮拜憑吊。因爲這個城堡恰巧接近奧麥寺 (Mosque of Omar，爲最神聖的回教徒廟堂之一)，當宗教情緒興奮的猶太人和回教徒各到鄰近的聖蹟同時禮拜的時候，衝突的絕妙機會就到了。這個威林堡衝突的形勢變成非常嚴重，以致英國政府在一九三〇年一得到國聯行政院的許可，就委派一個委員會擬訂解決此項問題的辦法。該委員會由一位瑞典人、一位瑞士人和一位荷蘭人組成。一九三一年六月，該委員會報告那個城堡及其附近的鋪道是回教徒的財產，但是猶太人在某種限制條件之下，得自由出入那個城堡。這些建議立經高級委員核准施行。

其時英政府與「世界猶太民族聯合會」和巴力斯坦的猶太人協會發生猛烈的衝突。一九三〇年五月，當局對於已發與二四〇〇個猶太人的移民許可證，宣布無限期地停止發生效力。當辛普孫 (Simpson) 所領導的

一個委員會從事調查巴力斯坦的經濟情形之時，此項禁令已經實施。該委員會在詳細調查巴力斯坦的事情之後，在一九三〇年十月發表了報告。英國殖民部同時也發表白皮書（White Paper），宣布政府將來管理該委任統治地的新政策。

白皮書認為建設猶太人國家的工作中過於匆促，因此產生的結果對於阿刺伯人的將來幸福大有妨礙。

【據白皮書的意見】阿刺伯農民的處境實在亟待改善，假如要實行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就先需一個開墾土地的政策。目前惟有公立私立的猶太殖民會社纔沿用一貫的政策。猶太籍的居民擁有資本、科學和組織所能給予他們的各種利益。他們的驚人進步應歸功於他們的努力和此種利益。反之，阿刺伯籍居民缺乏猶太籍居民所享有的便利，而超過死亡率生產率又迅速地增加，同時可用以爲維持生產的田地已減少二五〇、〇〇〇英畝。這個區域已落在猶太人的手中……現在可以確切地說：照目前的情形並用現行的阿刺伯種植方法，決沒有盈餘的土地可供新來的移民開墾之用，除了各猶太人會社所保留的未曾開墾的土地。

又據白皮書說：

惟有靠政府與阿刺伯人和猶太人團體的領袖之間的密切合作，始能防止巴力斯坦陷於一種危殆形勢。這種形勢在一方面足以危害力求建設猶太國家的人們的虔誠工作，在另一方面有妨人口佔大多數的民族的利益，他們現在很少有支持生存競爭的能力。

顯然，假使阿刺伯人長此感覺猶太人的移民剝奪他們的土地、工作和政治權力，阿刺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因爲，一如辛普孫的報告所指出的，「猶太基金團」（牠出租土地給猶太僑民）曾禁止在牠出租的土地上雇用阿刺伯工人，而「猶太工人總聯合會」亦曾採取一個政策，運送猶太工人進口，而不雇用無

地可種的阿刺伯人。在這種種情形之下，英政府覺得繼續停止移民是正當的。

英國的這種新政策之宣布，在阿刺伯人看來是很滿意的，他們似乎準備在一九三一年投票選舉前面所述那一種的立法院議員。但巴勒斯坦內外的猶太人都發怒了。察姆·威士曼博士 (Dr. Chaim Weizmann) 辭去世界猶太民族聯合會會長和巴勒斯坦猶太人協會會長之職。這些會社的其他有勢力的職員也同樣辭職，表示抗議。他們指斥英政府爲「一個暴虐而不公平的背盟者」，並責其「對於一個易受欺的和被蹂躪的民族……多行不義」。甚至保守黨和自由黨的首領也攻擊工黨政府，認爲違反了巴爾福宣言。但是，麥唐納政府說明牠的辦法不過是努力推行下面三種任務：使猶太人在巴勒斯坦佔得一個國家的地位（並非把整個巴勒斯坦作爲猶太國家），對於人口佔大多數的回教徒施行公平待遇，並爲聖地準備自治。

在一九三二年，巴勒斯坦政府弛緩了禁止移民的種種限制，准許帶有二五〇〇元的最低資本的農夫與大小商人自由進口。在一九三二年的休假季內，當局戒備森嚴，所以竟無因祝典而起的亂事發生。在此年中，阿刺伯人、猶太人和英國人，對於結束英國的委任統治權並代以國聯的直接管理一層，貢獻了很多計劃，但除少數有黨派的人外，沒有人認爲這些計劃是可以接受的。

巴勒斯坦在經濟方面已有驚人的進步，這大部分應歸功於猶太人的金錢和開創力。大戰之後，有超過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猶太人資本流入聖地。全聖地的電氣事業，由於巴勒斯坦電氣公司的努力，正在迅速進行。一九二七年，一個利用約但河 (Jordan) 和雅穆克河 (Yarmuk) 的水力，具有二四、〇〇〇匹馬力的電廠業

已開始建築。一個資本雄厚的探鹽公司亦經組織成立，它所探的鹽一經溶解，幾及死海中的水量四分之一。希伯來大學則於一九二五年在耶路撒冷開辦了。但是，巴力斯坦將來能否供建立三百萬猶太人民的國家之用，以達到熱誠的猶太民族主義者的夢想，還是疑問。

第十二章 勝利的法蘭西

法蘭西的政治

法蘭西政治的組織在基礎上與採用國會制度的大多數國家有些不同。法國只有少數政黨，特別是過激的政黨，纔具有確定的組織基金，並舉行定期的集會。此外，法國並有很多政治團體，牠們雖沒有上述種種特質，但牠們如能拉攏最低某數目的依附者，就可以特殊名義被列為政黨，並有推舉代表參加國會中各委員會的權利。近幾年來，法國立法機關約有十個到十五個這種政治團體，在上議院的為數比在下議院的較為少些。（註）

（註）法國下議院中的保守黨，像歐洲各國大多數下議院中的保守黨一樣，坐於議長的右邊，中和黨則坐於議長的前面，過激黨坐在他的左邊。因此「右派」、「中央派」和「左派」的稱呼表明任何政黨或政治團體的一般政治立場。

從這種情形看來，因為任何一個政治團體要在下議院中操縱大多數的票數都感覺困難，政府惟有應用政黨聯盟制度來行使職權了。一個政黨聯盟的組成，時常僅以對少數重要問題的同意為基礎，一旦有新的問題發生了，政治團體的陣線又須重行排列。因此，法國的內閣的平均壽命是短促的，到一九三二年年底，第三共和國已有過九十多個內閣。在一九二三和一九二四年十八個月的時期內，法國計有七個內閣，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

年也有同數的內閣旋起旋仆。但政府的政策所以能有相當程度的穩定，全靠各部次官多少帶些永久性，並因內閣的變更不過涉及各部部长位置的更動和重行支配而已。

在大戰期內，並一直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爲止，法蘭西是由一個自稱爲「神聖同盟」(Sacred Union)的政黨聯盟所統治。在一九一九年的選舉之後，神聖同盟分裂爲兩個政黨聯盟：「國家聯盟」(Bloc National)和「左翼聯盟」(Cartel des Gauches)。前者包括由克雷蒙梭、普恩加賽、米勒蘭(Millerand)和白里安所領導的。保守黨與中和黨，它希望使德國受經濟上的束縛，使法蘭西處於「安全」之境，它反對社會主義，並贊成與羅馬教廷發生友好的關係。「左翼聯盟」是在赫里歐和被謗爲「財魔」的開勞(Caillaux)領導之下的。它反對教會，贊成提高所得稅和推廣國家對於社會的統制權力，主張減輕上議院的權力，雖同時與「國家聯盟」一樣熱心地要使法國得到安全，但擁護開明的外交政策，包括與德、俄交好。不加入這兩大聯盟而獨立的政治團體，在最左的方面有共產黨，在右的方面有雷翁都德(Léon Daudet)所主持的保皇黨(Camelots du roi)。這兩個極端派都不十分得到民心。

法國總統的權力很受嚴格的限制，他所能運用的統治權遠不如美國的總統。但是，假如法國總統具有卓越的人格，他也可以在政治方面顯出許多影響力。例如普恩加賽在總統之職時（自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〇年）完全不是一個傀儡。

當普恩加賽的任期屆滿的時候，國會選舉戴向納(Paul Deschanel)繼任。在此次選舉中，克雷蒙梭是

個候選人，他所以失去衆望實由於一般愛國者對於凡爾賽條約尙嫌溫和（！）實在，他不久聽到民衆不稱他爲『勝利之父』（Père la Victoire）而稱他爲『勝利之喪失者』（Perd la Victoire）了。一九二〇年九月中，戴向納因身體不健康，不得不退休，由一個很有能力的，保守的政治家米勒蘭（Alexandre Millerand）繼任。

米勒蘭的任期是不幸的，他決心在立法和行政事務方面居一領導地位。例如，在一九二二年，他強迫白里安政府退職，在一九二四年採取「在下議院宣讀總統請求書」的非常步驟。因此，當左翼在一九二四年執政時，米勒蘭就不得不辭職了。他被認爲獨裁者和反動者。有一個時期，他又揚言將組織青年「藍衣團」，這種恐嚇引起人民對於法西斯蒂獨裁制的恐怖。他的繼任者爲杜美格（Gaston Doumergue）——他是一個獨身者、法律家、曾任縣長和上議院議長，並且是一個新教徒。他對於一切政黨同樣誠懇，他雖不是一個偉大的總統，「至少是一位可愛的總統」。在一九三一年，六十餘歲的杜美格在許多歌頌功德聲中辭去總統職位，結了婚隱居林下，度其優遊的私人生活。

右派佔優勢的國會現在推選上議院議長杜美（Paul Doumer）爲元首。與杜美的票數最相近的競選者爲白里安，但後者因受社會主義者的擁護並因他的中和外交政策引起了一般國家主義者的怒焰，所以喪失了許多保守派的票。像其他許多法國官吏一樣，杜美也是以過激者出身的。但事業的成熟和穩定的收入漸使他後來變成一個保守派。他在財政界是很出名的，曾一度任殖民地總督，並在白里安內閣中兩度任財政部部長。他的四個兒子都捐軀於大戰，他的當選被普遍認爲極端愛國者的勝利，頗引起了德國人的恐慌。

杜美在一九三二年五月被一個俄籍僑民行刺殞命，這種不幸的事件實使他的國人異常心痛。這個俄國人異想天開，希望他的行為可以幫助俄國脫離布爾塞維黨的統治。於是上議院與下議院重又集合，選舉總統，這一次勒布明（Albert Lebrun）當選了。勒布明以前曾繼杜美任上議院議長。這位新總統的議會經驗從一九〇〇年開始，他具有類似普恩加齊所有的政治同情心。但是，他在就任總統的首次通電中，允許對於議會中所有各政治團體做一個公平的仲裁者。

佛郎和牠的救星

我們已經看到，大戰後法國歷任內閣對於國際事務的態度，乃決定於爲共和國求得安全以反抗外國侵略一願望。（註）有些政治領袖，如普恩加齊和泰狄歐，對於推行這個政策，大概是不退讓的；其他的領袖——以白里安和赫里歐爲最，則主張妥協的政策。他們縱然有這些不同的見解，但因大家心目中永遠保持着同樣的目標，法國的對外政策顯然有相當程度的統一。然而，關於內部問題，尤其是關於經濟和教會事件，歷任內閣的意見就大爲懸殊。

（註）參閱第八章，

當大戰終了的時候，法蘭西的內政陷於紛亂的狀態。北方十分之一的地方業已荒蕪。農田、村莊、礦區、房屋、工廠、水井、公共建築物、鐵道、公路、私人地產都淪爲廢墟。錯綜複雜的鐵絲網、礮彈穴、槍子碎屑、焦牆的遺跡、壕溝、火藥

卸積處，有毒的井、水溢的礦，反到處皆是。將近三〇〇、〇〇〇所私人房屋，和六〇〇、〇〇〇餘座公共屋宇完全被毀，有四三〇、〇〇〇所以上的房屋連同一一、〇〇〇公共建築物受到很深的損傷。二百萬人民被迫離家。被破壞的工廠計達二〇、〇〇〇家之多。

因此，到了一九一九年，軍隊騷然不安而好變亂，城市中的勞動民衆挨着飢餓，嚷求麵包，中產階級深懼共產主義的傳播，這種種現象在當時是毫不足奇的。其時保守的農夫和中產階級的市民對於暴動與紊亂的恐怖非常之大，所以「國家聯盟」(Bloc National)在一九一九年的選舉中獲得勝利，中和的政府因此得以繼續維持，至少到一九二四年。

財政上的困難不久起而煩擾這個穩健的內閣。政府以前信任地期望德國可以在條件之下付償改造經費的總額，同時拒絕提高稅率，並進而耗費幾十億元之數於恢復戰毀的區域，及恢復或重建私人的房屋。特殊建設預算中的開支總額估計約在美金七十億元以上，此款的大部分是從徵募公債和加發紙幣得來的。但是，月復一月過去了，而所希望的德國賠款不見繳來。實在，在一九二一年的下半年，德國要求部分的付款延期。在普恩加齊和泰狄歐領導之下的法國極端派，因此從事於推翻一九二一年正月就任的白里安內閣。他們的運動得到勝利。(一九二二年一月)普恩加齊不久即繼任總理之職。

雷門·普恩加齊(Raymond Poincaré)以一八六〇年生於洛林。他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律師與理財家，辦事十分努力，具有精明而合乎邏輯的頭腦，並有「他的中產階級選舉民所需要的恰好程度的狹窄心腸」。他在

一八九三年第一次得到內閣閣員位置，疊任內閣總理，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二〇年曾任共和國總統。他更番得到民衆的毀譽，時而很孚衆望，時而受人譴責，但他堅定地追求着那個造成強有力而穩定的法國的目標。「有許多綽號加在他的身上——「戰神」普恩加賚，「佔據魯爾者」普恩加賚——但他並不以此自誇，祇是遵着他的合乎邏輯的軌道前進」。

這位新總理募得外債，提出財政的改革，增加稅賦，可是膨脹的佛郎繼續跌價而預算仍不能平衡。許多法國人從前依賴投資所得的利益而生活的，現在竟因他們的真實財富日益縮減而要挨餓了，所以他們對於政府也喪失了信任。並且，普恩加賚在魯爾所施的虛張聲勢之策略，和對於教廷的親善態度，也不得民心。結果，左派諸政黨希望在下次選舉中推翻他，並對投票者預許財政上的改革，多應用直接徵稅制，與國聯密切合作，及比較和平的外交政策。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的選舉中，左派獲得支配下議院的勢力，而里昂的赫里歐教授——急進社會黨的首領——成爲內閣總理。雖然他們的名稱是如此，其實急進社會黨是自由主義者，並非社會主義者。他們自稱對於共和政體有堅定的信心，並願在一切政策中保證國內外的繁榮和安定。

赫里歐爲里昂人民所崇拜的人物，曾任里昂市長二十年。即在內閣總理任內，他每星期在火車上過兩夜，來往於巴黎里昂之間，以便對於國務和市政，可以兼顧。他爲人忠懇誠實，但於國家政治缺乏經驗，而他的不拘儀式，殊有損他的令名。

在外交方面，赫里歐內閣是很成功的。牠接受了道威斯計畫，與英、俄、德三國成立友好的關係，而在擬訂日內

瓦草約的工作中居於主要的地位。牠在內政方面，比較不幸，尤其是牠的反教會政策，牠並且不能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因此，當下議院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中拒絕再贊助通貨膨脹政策的時候，內閣就傾覆了。法國隨後經過了幾個煩惱之月，在這幾個月月中，班樂衛（Painlevé）組織過兩個內閣，而白里安則組織過三次。佛郎繼續跌價，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一個佛郎只值美金兩分了，即等於牠在戰前的價值十分之一。政府公債以低於票面的代價出售，而舊公債的滿期速於新公債的發行。在這種危機之下，下議院中政治團體的界限是消滅了，成立了一個特殊的各黨聯合內閣（一九二六年），牠包括六個前任總理，以普恩加賽為首領。這位老練的內閣總理保持此職達三年之久，直到一九二九年纔下臺。在此時期中，他獲得「佛郎救星」的稱號。

普恩加賽就職後馬上通告立法機關：惟有增加賦稅和嚴格節省方可得到財政上的補救。因為下議院到這個時候逐漸趨向於凡事順受的心情，新稅的徵收立經投票議決（一九二六年八月），法國人民只得忍受西方國家的最高稅率之一的重負。一個特別自治基金委員會組織成立，解決了許多關於鉅額公債的問題；牠進行清償短期公債，整理並再募其他公債，有些公債則減輕利率——從百分之六減到百分之三。充多的地方法院、監獄和出納局都被關閉起來，軍官的人數也裁汰了不少。

在一九二六年，預算得到平衡——十三年來，這是第一次。事實上國家且保有庫存金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結果，佛郎漲價，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每個佛郎約值美金四分。一九二八年，下議院即據此為標準，固定佛郎的價值。自然，這種設施抵銷了內債的五分之四，蓋此舉將戰前和戰時的公債的價格減低到了原來票面價值的

百分之二十。在一九二八年的選舉中，普恩加齊的政策經民衆投票一致擁護。但是，左派與右派在下議院幾乎平均佔勢力，這種情形對於他的繼任者實爲不幸。在他的任內，兩派都擁護他，一年以後，當他的病軀使他不得不退休的時候（一九二九年七月），左右兩派又鬧意見了。

困苦的那三年（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

普恩加齊辭職之後，有幾個短命的內閣與困難的財政和外交問題掙扎奮鬥。首當其衝者爲白里安政府，但牠爲了財政問題，楊格計畫的採納，和萊茵地的撤兵等關係而傾覆。白里安去後，由泰狄歐繼任，他是一個新聞家和著作家，以充克雷蒙梭的助手和普恩加齊的信徒而著名。因爲白里安在這個新內閣中充任外交部長，泰狄歐政府似乎可以將普恩加齊的堅毅精神和財政上的成功與妥協的外交政策合而爲一。但是，下議院中黨派間左右爲難的平衡勢力，使各種事件難以解決，所以在倫敦海軍會議的談判中，泰狄歐就被推翻了。兩星期之後，他另組內閣，此次閣員的位置大部分以右派人員補充。左派對於這種態度，認爲是一種挑戰，因此在任何議案交付下議院討論的時候，左派常常投反對票，以窘泰狄歐。一九三〇年夏季中，這位內閣總理爲形勢所迫，不得不令下議院休會以延長他的內閣的壽命。

泰狄歐的幾次組閣縱然因任期最不穩定而生阻礙，但完成了很多工作。捐稅減少了，軍隊服務期限從三年減爲一年，軍隊的員額亦經裁縮。但是，戰費的預算卻大有擴充，以便增築防禦工事，並在沿德意國境的邊界舉行

驚人的戰爭演習。法國要使她的鄰國知道：她很明瞭這兩國法西斯蒂領袖墨梭里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的好戰演詞中所潛伏的危機。由於外交部長白里安的影響，楊格計畫得到批准，萊茵地的撤兵也就開始，而法國所發起的汎歐洲聯盟的計畫也宣布了。（註）

（註）一九三〇年春季，總統杜美格和一大羣國會議員爲慶祝征服阿爾及耳（Algeria）百年紀念，觀光阿爾及耳。後來總統復遊歷至摩洛哥和突尼斯。

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德國的選舉中，德國的國家主義各黨獲得驚人的票數。這種情形引起法國的嚴重反響，因爲德國國家主義者向爲凡爾賽條約和楊格計畫的堅決反對者。許多法國人因此對於他們所稱爲白里安的「懦弱」而「不忠」的外交政策，非常驚惶。普恩加齊再度出現，向民衆訴說道，雖則「讚美和平神聖的國際歌詩」是很悅耳的，但法國也需要「其他的東西」使她「感覺安全」。因此，當國會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中重又集會的時候，泰狄歐的許多保守派的擁護者，突然轉變而反對白里安。一月之後，政府因上議院質問牠的一般政策而傾覆了。一件銀行界的不名譽之事造成上議院挑戰的機會；這件事牽涉幾個內閣閣員和次長。

上議院議員斯提（Theodore Steeg）就此組織政府，這個內閣顯見得非常脆弱。因爲牠仍包括白里安在內，牠不能得到右派的完全擁護，而社會黨員因牠對於財政和軍事問題的態度，也反對牠。其時間始於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的全世界不景氣的狂潮，已逐漸激盪到法國來——截至現在爲止，法國工業與農業間的幾乎完全的平衡之勢，使商業低落和失業增加所引起的種種困難，得以避免——這種情形使新內閣總理所遇到的困難局面

甚至更爲複雜，斯提在首次出席國會時，藉口耶誕假期解散國會而得到片刻的休憩（一九三〇年），但當議會重又開會時，他就立被推翻。他任職了僅六星期。

另一上議院議員賴伐爾（Pierre Laval）繼組內閣（一九三一年正月）。賴伐爾是一個卓越的演說家，和藹的政治家，他雖只有四十七歲，但已歷任公共工程部、司法部和勞工部的部長。他任總理之後，第一擁護他的人員是右派，他並且委白里安和泰狄歐以部長之職。他做總理一年有餘，直到一九三二年二月爲止，但在這個時期內，他把內閣改組了三次之多。

賴伐爾內閣在內政方面遇到許多煩惱的問題。失業的數字增高，出口貨數量繼續降落，對於平衡的預算僅有極微的希望。當嚴重的財政損失使本國幾種最重要的私營商業感到威脅的時候，政府努力奮鬥，使上下議院了解牠的見解；政府有挽救這些冒險事業，使不致破產之義務。政府立即依照這個政策，以巨額的信用借款給予法國船公司（法國大西洋船公司）並墊款於法蘭西銀行，使牠容易抵抗經濟上的損失，這種損失是因一九三一年英國放棄金本位時該行所保有的英國貨幣跌價之故所遭受者。

其時國際間又發生重要事件，使總理賴伐爾用盡他的能力和忍耐。法國之竭力干涉一九三一年的德奧海關協定，並接受美國胡佛總統所提暫時停付各國政府間互欠之債款的計畫，就是他的任內的事。賴伐爾又聘問美國，與胡佛總統討論美法兩國所關心的問題。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法國派遣以泰狄歐爲領袖的代表團參加日內瓦軍縮會議。

歲月推移，賴伐爾更加依賴他的保守派的擁護者了。當白里安的外交部長一職由他自己兼任的時候，這種情形益覺顯明了。白里安的辭職，表面上是爲了病軀的關係，但其時謠傳他實是被免職的。不到兩個月，在三月七日那一天，白里安去世了。就是以前批評他的人，也誠懇地哀悼他，政府並給予國葬。泰狄歐在兩星期前被政府從軍縮會議召回替代賴伐爾任內閣總理，此時也參加葬儀。賴伐爾的傾覆，係受上議院質問選舉法的結果，這個選舉法如經過，將使右派在下屆選舉（一九三二年五月）中得到利益。

在泰狄歐重行執政和舉行選舉之間的時期內，立法方面無所事事。事實上，許多人民代表已離開巴黎以便進行重行選舉的運動。但是，立法機關採取了一個預算案，從巧妙計畫中得到約計美金一五〇、〇〇〇元的「紙面盈餘」，並規定入口貨定額徵稅制度，它對於可以入口的某某種物品的數量加以一定的限制，這樣一來使法國的實業得到若干保障。美國特別受到這種制度的影響。

一九三二年五月選舉的結果顯示民情堅決左傾。仍在赫里歐領導之下的急進社會黨在六一四代議士席數中佔得一六〇席，成爲下議院中的最大的一黨。自由黨和急進黨在選舉動運中有力地指出右派的統治所遺給國家的，祇是庫空如洗，失業數字增高，軍費負擔加重，及因政府借款與破產的商家和不穩定的外國政府之故而遭受財政上的巨大損失。並且，投票者對於賴伐爾和泰狄歐之背離白里安的外交政策的協調原則，顯然不表同情。

選舉過後，泰狄歐就辭職了，六月，赫里歐繼任內閣總理。他說明他的整個計畫在於改進國內外經濟上和政

治上的諒解。他爲了達到這些目的，遇到很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一）對於德國要求不受凡爾賽條約中軍備限制之束縛一層所須採取的政策；（二）爲防止法西斯蒂的意大利與法國的不睦釀成戰禍起見所須想出的辦法；（三）設法解決賠款和戰債的爭論；（四）平衡預算；及（五）恢復經濟繁榮。

法國與羅馬教廷

大戰之後，法國因關心文化的發展，所以政府與天主教教會有局部的妥協。在一九〇一和一九〇五年之間，法國政府在反教會派統制之下，大事裁減宗教各宗派的數目及其活動，關閉僧院尼庵和幾所教會學校，並將教會財產收爲國有。這個政策影響之一，即爲法國天主教傳教士人數的減少；他們如遠赴外國傳教，法國文化或可隨了羅馬天主教義傳播海外。並且，此項政策在國內引起了糾紛，因爲有些天主教信徒與保皇黨聯絡共同企圖破壞第三共和的穩固基礎。的確，一個天主教——保皇黨的組織名叫「法蘭西行動社」(L'Action Française)成立起來了，牠的主張在於恢復帝制和重設國立天主教會。

然而，在大戰之後，法國政府當局爲增進法國在國外的利益並從速了結國內的糾紛起見，以事實證明牠願意與羅馬教廷恢復友好的關係。梵諦岡(Vatican)教廷也表示贊成進行磋商，因爲法國政府與教廷的親睦，顯然可使教會的地位不獨在法國國內得以鞏固，並在法國文化所及任何地方都可增強。復次，法蘭西行動社現在在查理士·摩勒斯(Charles Maurras)——哲學懷疑者而在政治上主張暴動者——支配之下。他的著作於

一九一四年會有人建議應入於教廷禁書之列，十二年後，就真的被列而成爲禁書。天主教教會自然無意與他繼續聯盟了。

政教妥協的經過步驟是漸進的。一九一九年，克雷蒙梭舉薦亞爾薩斯地方的主教。次年，法國政府派遣一位代表參加貞德（Joan of Arc）女傑的宣福祝典。十七年後（在一九二一年），法國與梵諦岡之間的外交關係恢復了，此後不久，法政府允許幾個教派回到法國來。一九二七年，法蘭西行動社的刊物被列入「禁書」中，再隔一些時候，巴黎大主教頒行一教令，實際上將仍隸屬保皇黨的教徒逐出教會。國家擬將以前收歸國有的教會財產完全歸還教會一舉也引起各方——尤其是右派——的重視，但反教會派似乎決心阻止這種最後的讓步。

亞爾薩斯——洛林問題

當休戰協定成立之後，法國軍隊越過佛日山開入亞爾薩斯——洛林的時候，他們到處受到種種歡迎——民衆遊行，搖旗吶喊，設立勝利牌樓，和接吻。其時並有許多人感動得下淚，從霞飛「爸爸」以下每一個人似乎都是喜極欲涕。後來忽謠傳擁抱法國兵士的許多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女郎是特別爲了那個目的從法國派去的。並且，不久就發生了糾紛。新收回的各省與祖國之間馬上對於宗教、語言、政治權利和經濟機會等問題發生爭執，因爲法國突然違反一九一八年所給予的諾言——不干涉各該省居民的傳統習慣、風俗或地方權利。

當法國重得各該省時，各該省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土人在習慣上是講法語的，其餘四分之三都應用五種德

語的任何一種。這種情形之存在已有數百年之久：在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統治者，拿破崙和他的繼承者，及一八七一到一九一八年各德皇的統治之下都是如此。但是，在大戰之後，法國覺得只有能講法語的人民纔能爲共和國的眞實愛國者，所以竭力強迫各該省人民應用法語。因此，所有學校禁止應用德文講授。但這種使居民法國化的企圖引起了激烈的反對，以致政府不得不馬上進行妥協。結果，彼此約定兒童們應在學校第一、二年級兩年中完全學習法語。此後他們可以每週讀三小時的德文功課，關於宗教的教學也允許應用德語。

其時各該省鐵路上和公共機關內，充滿了僅能講法語的職員。這種情形釀成洛林鐵路職工在一九一九年的同盟罷工。罷工者要求將鐵路上所有法籍職員和不能講德語的工頭一律罷免。罷工首領之一說道：「倘使法國人都來奪取好差事，脫離德國實在是不值得的。」罷工者終於獲得了勝利。

各該省和法國之間，在宗教的意見上，也發生另外的糾紛。亞爾薩斯——洛林的居民大部分爲忠實的天主教信徒，在德國統治之下，這個區域被許與梵諦岡教廷廣續一八〇一年拿破崙宗教協定（Napoléonic Concordat）所確立的關係。地方政府曾經擔負教士的薪金和學校中宗教課目的經費。法國混合內閣默許這種辦法，直至一九二四年爲止，但當反教會派執政之時，內閣總理赫里歐決定：法國既已撕毀了這個宗教協定，亞爾薩斯——洛林也就應當加以廢棄。因此他建議在各該省撤廢教會，並禁止教室中教授宗教科目。

天主教學校學生因此罷課，拒絕回校，除非赫里歐取消了他的極端立場爲止。後來又成立了一個妥協。所有兒童不論其信仰如何，皆須入同一學校上課，同時宗教班教學得分別在天主教、基督新教（大多是路德派）和

猶太教學校舉行。天主教學校對於這種解決辦法尚不完全滿意，並因當時的宗教教育委託於特別由法國派來的反教會教員之手而憤憤不平。天主教教會並要求歷史一科也完全歸天主教教員教授。不過無論如何這種辦法經各方所遵守似乎也很有成效。

在德國統治之下，各該省土人享受很大的地方自治權。他們從一九一一年後即有單獨的議會，斯特拉斯堡也早由該地強有力的市政廳管理。法國人在短時期內尚能尊重現狀，並委派了一個特別長官駐在斯特拉斯堡，遙領各該省。然而在一九二五年，長官一職撤廢了，當地的議會和市政廳的權力也被剝奪了，整個行政權集中於巴黎。這樣一來又造成一種怨恨，因為亞爾薩斯人和洛林人不慣於那種極端集中的法國行政制度。例如，他們不能了解，一個農夫要在他的沿公路的地產上築一籬笆，為什麼必須先請示巴黎當局並取得內政部的許可。在大戰之前，生活遠不如現在的繁複。土人所引為最痛苦的就是亞爾薩斯——洛林的地理名稱的正式撤廢，而被重新劃分為三個新區域：上萊茵、下萊茵和摩塞耳（Moselle）。

最後，還有許多經濟上的不平。從物質上的觀點講，土人無疑地在德國政府統治之下比現在在法國政府之下情形好得多。本地的煤、鐵、絲織品、碳酸鉀等工業在一九一八年以前，比在一九一八年以後繁榮多多。各該省商品的天然出路和商業的聯絡線都在德國，而洛林的鐵礦須用威斯特發里亞（Westfalen）出產的德國煤方能產出最多的鐵。再者，德國與「被解放」區域之間新生的商業關係之常態發展，時因法、德間的政治爭端而生阻礙。亞爾薩斯——洛林的土人為這種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和社會的綜合怨恨所煩擾，時常覺得對於法國維

持表面上的忠誠是很困難的。事實上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地方聯盟」(Heimatbund)已組織成立——這在亞爾薩斯特別有力——牠要求地方自治並希望德文在學校中佔有優先地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法國政府禁止亞爾薩斯的三家德文報紙發行，所持理由就是說牠們鼓吹與德國重合。翌年五月，十五個亞爾薩斯人因不忠和謀叛而受審問，其中四人被判定有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位亞爾薩斯屠夫企圖暗殺一位從前對於上述的謀叛者曾提起公訴的法國檢察官。因有此項事件，後來當國會中的亞爾薩斯議員起身發表意見的時候，許多法國代議士就離開會場。

上面所說的形勢成爲非常危急，以致普恩加賚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在國會辯論中對於亞爾薩斯——洛林的問題作了十小時的演講。他追溯法國與各該省衝突的歷史，並暗示自治運動者受「萊茵之東」方面的道義上和經濟上的協助。(註)他承認法國確犯有若干過失，但允許將來改善種種不良情形。他的演說很受歡迎，在他講畢之後，下議院以最多數投票通過，表示信任亞爾薩斯——洛林「對於共和國和對於法蘭西的」愛國忠誠。

(註)德國外交部長史德理斯曼(Stresemann)否認德國政府對於亞爾薩斯——洛林自治運動者曾給予任何實際的協助。

雖然國會對於亞爾薩斯——洛林的忠誠有此項正式的信任票，各該省的人民依然感覺不快。他們最初很高興與法國重合，但不久又復惶惶不安，像在德國統治之下一樣。這種困難一部分應歸咎於土人的性格，從一首該地的古詩上，很可以看出亞爾薩斯人久已自己承認在習性上是永遠不感滿足的。

同化敘利亞的工作

法國在國聯委任統治地敘利亞 (Syria)——一個重要的產絲區域——的經歷，甚至比在亞爾薩斯——洛林的更爲糾紛。差不多在法國的統治權初擴充到那個區域的時候，已開始有種種困難了。

法國爲行政上的種種目的，並爲防止任何激烈的愛國情緒發展起見，將敘利亞劃分爲五個（後來四個）行政區，各區有不同的地名和不同的法律制度，但該五區均隸屬於一個最高行政長官之下。軍事戒嚴法令是宣布了，嚴格檢查制度亦經規定，法語成爲法庭上的應用語言。敘利亞的黃金漸漸流出去，新的紙幣也進行了，其價格隨了跌價的法國紙佛郎爲昇降。並且，佔全人口大多數的回教徒漸信法國人處處偏袒少數人口的基督教徒。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最高行政長官惠干 (Weysand) 將軍——他是一個保守的天主教徒，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即被派充此職——因下議院反教會的急進社會黨的堅決要求而遭罷免。惠干離職後，由薩來爾 (Sarail) 將軍繼任，他在一九二五年七月邀請不滿意的德魯斯 (Druse) 族幾位首領到達馬士革 (Damascus) 舉行談判，當他們接受邀請書欣然前來的時候，他把他們關入獄中，這樣一來，就同時觸怒了基督教徒和回教徒，這也算是他的得意之一着。

德魯斯族人於是就起而公然叛變。法人捕殺了二十四個叛徒，將他們的屍身排列成行，放在達馬士革的大

街上示衆，作爲對於其他喧嘩的土人的一種警告。城中人民見此大怒，襲擊法國軍隊，法國軍隊乃退出達馬士革。用重砲、坦克車和飛機攻打那個城池。據報告，此次約有一千人被殺害，達馬士革局部毀壞了。再者，法國人並要求達馬士革人付償四四〇、〇〇〇元罰款，並繳出三〇〇〇枝來福槍。

薩來爾後來被召回，另派上院議員提·如甫納（de Jouvenel）繼任。在提·如甫納抵達敘利亞之前，法國下級官吏已將基督教徒武裝起來，實際上更引起殘暴事件。這位新長官擬與德魯斯族談判，但拒絕他們所提「和會」的要求，因爲這種要求含有承認他們是交戰者而非叛黨的意義在內。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敵對的行爲重又爆發。五月，達馬士革又遭轟炸，復損失了另上千人的生命。

國聯委任統治地委員會於是發表報告，批評法國的政策，並宣告在委任統治地施用空軍轟炸，縱火焚燒，毀壞村莊，和徵收罰金等手段「除遇絕對必要之時外」，都是有罪的。接着提·如甫納去職，由蓬沙脫（Auguste Henri Tonsot）繼任。他不久撲滅了其餘的武裝暴動。但是，此種不安的狀況和自治的要求，仍未減少。

一九二八年，蓬沙脫召集敘利亞國民會議，起草委任統治地政府的組織法。當佔大多數的國家主義者的代表堅持建立獨立共和國的時候，此項會議就流會了（一九二九年正月）。一九三〇年五月，最高長官自行頒發了一種憲法，規定設立共和國，僅受法國的委任統治權和法國的外交管理權之限制，其中又規定設立一個四年一選的國會和一個總統。總統必爲回教徒，由國會選舉，任期五年。（註）

（註）該項憲法並不適用於大黎巴嫩，這個區域早得到建立共和國體的許可狀。一九三二年，敘利亞的人口約計二、八〇〇、〇〇〇人。

依據前項憲法的首次選舉，於一九三二年在土人的大騷動中舉行了。據說，由於法國的干涉，當選的代議士有五十四個中和派，但只有十五個國家主義者，後者自然反對委任統治權的繼續。一九三二年六月，國會又在糾紛和暴動聲中，選舉了富有的阿默德·阿利·貝·亞俾特(Ahmed Ali Bey ol-Abad)為共和國總統。

當國會辯論之際，普恩加賚重又驕矜地說：法國在她對於敘利亞的政策中顯示了「偉大的公平無私」。恐怕祇有該委任統治地的很少數的土人，能够坦白地贊同這種見解吧。許多敘利亞人深信法國第一關心於他們的絲和鐵道，他們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價值，他們個人的前途幸福和建立獨立國家的準備，是不在法國打算之中的。

法國的實力

法蘭西之從世界大戰出現，好像她從拿破崙戰爭出現一樣，是筋疲力盡的了，但能迅速地恢復她的勢力。法國的工業與農業幾乎完全平衡，有一半人口從事於農業，所以實際上在食料方面很能自給。並且，法國的土地有很平均的分配，因為國家的遺產法律規定父親的財產應平均分給子女。結果就產生了很多小地主，他們為一般民衆安居樂業的堅強的潛勢力，特別因為農民們敏銳地感覺到他們自己對於國家的重要。

自大戰後，法國工業有長足的進步。英、美戰時海港的設備是永久的資產，其他如特別河流、運河和鐵道的種種改良亦然。法國人從美國專家處學到許多乖，並大大地改進了他們的方法和機械。劇烈的外國競爭終於使個

人主義的法國製造家明瞭了信託組合的價值，尤其是在化學品、絲織品和冶金各業方面。法國全國設有許多優良的工業專門學校，其結果增進了工藝和機械的技能。

法國政府久以牠的管理商業的聰明一致之方法聞名世界。政府對於大商業有很大的監督權，國家商法中規定一切公司必須就牠們所得贏利一部分存儲起來。破產法又「非常嚴厲，以致使破產的商人成爲真正的被擯棄者」。在缺少勞工之時，外國工人——通常來自波蘭、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時——多被邀請前來，但他們的工作契約，大都限定他們無工可做時必須回國。這樣一來，失業的數字總是最底的。最後，因爲人民的性情和政府的限制，法國沒有像大戰後的德國那樣過於推廣工業的事情發生。自全體觀之，法國人喜歡「從所賺利益中一點一滴地」建設他們的大工業，而不願用掛帳的方法。

全世界的不景氣之影響及於法國，比及於其他各國爲後，大家恐慌的時候，他仍居於可羨的經濟地位。失業的數字，雖然對於法國已算很大，但與其他各國的相比，還算是小的。法國銀行的準備金數量僅次於美國、聯邦準備銀行所有的。此種財富的來源不外乎下列數種：人民的儲藏；國家不付還內債五分之四所省下的儲蓄；來自賠款、旅行業、和運輸業的收入；及製造品的出口（大部分是奢侈品）。政府以傳統的法國式的巧妙方法，抽出財富中的很大部分，以作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用途——籠絡若干窮乏的同盟國，並壓迫貧困的仇敵，使之在政治上讓步。法國對外的投資又以收穫外交的和財政的紅利著名。（註）

（註）雖然法國在一九二四——一九三〇年道七年中的入口貨超出於出口貨約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從遊歷家旅行費得

來的收入在同一時期內計有美金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此外，法國從商船業和運貨業，從超過債務的賠款，並從國外投資的利息中得到款項。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三〇年之期內，付款與收入相抵的盈餘計達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種盈餘幾乎都是現金，因之使法國能够在世界的經濟市場中和世界的外交關係中佔居主要地位。並且，法國對外的投資多為短期借款，在需要時即可收回，因此可利用為有力的外交上的武器。

我們假使無隻字提及法國人民的性格，關於法國實力的討論是不完全的。要對法國人作概括的批評，實際上為不可能之事。梅列提司(George Meredith)有一次曾提到他們，稱為「任何歐洲國家的最混雜者」。雖然，作者膽敢略予評述。

一個法國人，尤其是法國農民和商店主，是儉樸，謹慎，唯物的和個人主義的。智力的和經濟的自足自給是他的最高無上的慾望；他的夢想是在求得一點小財產，並從投資得到一點小收入——並不求多，但求足供安適而已。為達到此種目的起見，他將不停止地工作，並將犧牲快樂，甚至犧牲必需品。他好疑而善妬——「當關係他的利益之時，他是非常缺乏情感的」。並且「當他最後以為自己可以獨立，進款足夠供他自己的需要的時候，他微笑着自足，不理會與自己的一羣無關的事物」。(註)法國人的性格同時即為法國強大的根本理由，亦為代表他的利益的政府憂慮的原因，而由與法國發生關係的外國政治家看來，這實是一種不可解之謎。

(註)關於此問題在 André Siegfried's "France-A Study in Nationality, 1830" 一書中有很有興趣的討論。

第十三章 法西斯蒂的意大利

戰勝的報酬

意大利是戰勝國之中於大戰後經過政制的完全變遷的唯一大國。此種變遷發端於戰爭時期，因意大利在和平會議的種種困難和失望便加速實現了。我們已經看到，一九一四年的意大利人對於本國在大戰中應取何種途徑的意見，非常不一致。政府頒佈了中立的宣言。社會黨人在一九一三年的選舉中曾經選出七十八個議員於下議院，他們很贊成政府的主張，因為他們認大戰為資產階級和資本家的企圖，意大利不必參與。但是有許多人為物質上和感情上的各種理由，則力主參戰：他們是商人，帝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這一部分人以「神聖的自利主義」之名義，終使意大利加入了戰爭，以報答協約國之贈與他們所垂涎的土地。我們當記得，協約國會經答應意大利實際上統御亞得里亞海並擴大它的非洲帝國。

意大利人後來覺得這場大戰之費力，遠出他們的意料之外。所須動員的兵士超過五、五〇〇、〇〇〇人，其中死者六五〇、〇〇〇人，傷者一、〇〇〇、〇〇〇人。意國因戰爭所蒙的直接損失，即所耗的軍費，竟達一百二十億元以上，此外又加上三十億元的財產損失。再者，一九一七年卡波勒托（Caporetto）一役的慘敗使一九一

八年的最後勝利在意人的情緒上更有刺戟性。在這種情形之下的伊瑪努爾 (Emmanuel) 王的臣民，因不能在達爾馬提亞 (Dalmatia)、阿爾巴尼亞、近東和非洲滿足他們的極大的慾望，就感到傷心的失望。(註)

(註) 雖說意大利在提羅耳的野心因達到秘密條約 (Secret Treaties) 的規定的限度而得償所願，但這不能慰藉一般國家主義者。

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及和平會議於討論亞德里亞海東岸上的阜姆之運命時所遇到的問題。(註) 爲鼓勵南斯拉夫人於一九一八年脫離奧地利起見，意大利曾以羅馬公約 (The Pact of Rome) 對於他們在亞德里亞海的奢望作若干讓步。但當戰後斯拉夫人的奢望之一顯然爲取得阜姆的時候，意人就大爲憤怒。阜姆在有感情上的重要性，漸漸大大超出了它在經濟上和戰略上所佔的價值。當意大利愛國詩人鄧南遮 (D'Annunzio) 率領一隊穿黑衫的敢死隊 (Arditi) 大戰時期中的衝鋒隊，乘了租雇的船隻到阜姆，以武力奪取這個城市——不顧「最高和平會議」和該地居民的反對的時候，一九一九年九月的局面又加上戲劇的色彩了。

(註) 見第四章。

在一九一九年六月間奧蘭多爲首相的尼蒂大不贊成國家主義者此種矯揉造作的興奮，並與巨哥斯拉夫商訂了刺帕羅條約 (Treaty of Rapallo)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依據這個條約，雙方「永久」承認阜姆自由邦的獨立。此後不久，意大利的軍隊將鄧南遮的一隊人逐出他們的堡壘。這種如戲劇的偉業的純淨結果，祇足以再度激起民族主義者對於政府的情怒。(註)

(註) 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對於這個協定都不滿意。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之間，兩國重開談判。最後，依據馬條約 (一九二四年)

月二十七日)的規定，意大利取得阜姆城、巨哥斯拉夫取得巴洛市港 (Port Baros) 和期限五十年的對阜姆港一部分的租借權。

在大戰期中，奧地利人、塞爾維亞人和意大利人曾以阿爾巴尼亞的土地為戰場。再者，意國軍隊於停戰後繼續占領阿土有幾個月。在占領期中，意國派赴和會的代表企圖取得阿爾巴尼亞，以為意大利的委任統治地。後來他們又準備將阿爾巴尼亞由意大利、希臘和巨哥斯拉夫瓜分，作為折衷的辦法。意人特別關心於阿芙羅那 (Avlona) 海口，這是入俄特蘭陀海峽 (Straits of Oranito) 的鎖鑰。因為這個海峽的闊度還不到四十哩，如果取得了它，就等於控制了亞德里亞海。然而阿爾巴尼亞人則希望獨立。他們受着威爾遜的友好態度的鼓勵，乃從事遊擊戰以驅逐外國人。到一九二〇年夏天，意國首相喬禮提 (Giolitti) 因為他的心神全為國內的問題所攝，無暇外顧，遂簽訂了一件條約，將意大利軍隊撤出阿爾巴尼亞全境，祇剩薩森諾 (Saseno) 島還被占領着。意大利的民族主義者大聲嘆惜本國歷史上又增加了這一「不光榮的一頁」。

在近東，許多早已許給意大利的土地之餌不是落到希臘的手裏，就是仍由土耳其留住了，意大利人所得到的祇是幾種不重要的商業特權。在非洲，英、法、比三國取得德國從前所有的一切殖民地，意國卻被許以擴張土地到賴比亞 (Lybia) 和索馬利蘭 (Somaliland) 來搪塞了——而這點微乎其微的好處一半還是以埃及及為犧牲而有的。所以，儘管意人在歐洲取得了八千九百方哩的土地和一百六十萬人民，他們仍譴責他們的同盟國為「背棄信義」。他們自稱為和會的「自私與一般詭譎」所震驚，他們又因「意大利的功勳被打折扣及意大利的帝國主義被排斥」而憤不可遏。

一般民族主義者毫不客氣地對於巴黎的大多數外交家加種種醜惡的綽號。不特此也，他們馬上回過頭來攻擊本國的內閣，非難它屈服於各國對於意大利的「虐待」。他們罵他們的老政治家無能，以致有「戰爭所博得的勝利而於和平中喪失」的潰敗。烈性的愛國少年則指斥這般「老人」為「吸取國家的清潔血液的污濁寄生蟲」，並矢言所們將重新建立意大利，務使全世界「不得不起身諦視」。他們的新意大利當為「世界所不可少，否則人類的將來歷史即不堪設想的一個國家」。祇是，首先必須先將這般鑄成大錯的人斥逐。

當這個時候，政府碰到一個令人挫氣的國內局面。有幾百萬人必須復員。但要為這許多退伍的老兵宿將找到職業是不可能的，因為國內的工業已經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有一切位置都被留在後方的人民占據着。外國市場暫時失去或停閉，而國外貿易與旅行業差不多完全停頓。甚至於向國外移民的那扇「太平門」(Safety Valve)也關起來了，這是因為國內缺乏移民的資金，同時外國又有種種限制移民的立法。同時糧食的價格飛漲，而一般人對於在戰時獲取不正當利益的人，被稱為「Fascicani」或「騙子」者，照例是深惡痛絕的。此外，預算的短少和通貨的膨脹也為害不淺。尤其使從前的兵士的特殊困苦達於頂點的事情，就是他們許多人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原已被移出原位了，現在又設立了軍事法庭，進行審判那些在卡波勒托一役率領軍隊潰退的認為叛徒的將領。

在一九一九年的選舉中，社會黨人居然獲得一五七個國會席次，這是不足驚異的。這般議員始終在下院投反對政府的政策的票，因之陷國會於窮境。全國不滿的表示不久變成猛烈的罷工和暴動。無能的當局對於這種

險象袖手旁觀，他們恐怕兵士與民衆勾結，故不敢調遣軍隊來恢復秩序。

意大利漸漸趨向過激主義。據估計，到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的冬天，全國的人民約有三分之一「赤化」了。社會主義迅速地傳播於城市鄉村，一部分因為謠言無產階級的專政在俄國造成了奇蹟，一部分因為布爾扎維黨宣傳的影響，再一部分因為政府的無能。「打倒國王」和「列寧萬歲」的呼聲時常可以聽到。

「直接行動」的計劃漸漸博得大眾的贊成，許多市區都被社會黨人奪取了。農民佃戶拒絕繳地租，大地產完全破裂，從前服兵役的人各據一段地爲己有，許多荒謬的舉動，在經濟上往往是不智的，也實行了。在有些城市，當雇主宣布除非減低工資和延長工作時間，他們就不能繼續營業的時候，工人即自行接收工廠。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兩年中，因罷工和騷亂而喪失的工作日總計達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天，當時有一部分人還談到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就是西西利(Stily)教士唐·司忒佐(Don Sturzo)於一九一九年所組織的新「天主教人民黨」(此黨略爲保守)，也不能止住這種赤化潮流。

但工廠與土地「占領」的時期並未持久。工人沒有原料，沒有充足的食物，沒有管理的經驗，就覺得不易繼續工作了。農民是目不識丁的，並且本來是保守的。社會黨人則分裂爲左右兩派。有如俄人那樣的辦事的新精神馬上消耗了。大家慢慢覺得無產階級的政府不見得會比現在的柔弱政府更能對付意大利的複雜問題。如果目前的國會制度和可能的無產階級政府都不能救意大利，那末，政權付託於誰纔好呢？這是大部分人民惶然無主而欲知的。

戰時和戰後數年中的爭鬪與暴動，造成了幾個重要黨派間的同情連索。地主和財產所有者大為過激主義的短期統治下所發生的事變所感，他們決定意大利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足以保護私人的財產。大學教授、專門家及許多青年非常討厭一九一四年以來的全部事件的趨勢，他們要看見一個大規模的政府掃除運動和一個強固的與愛國的統治者出現。國家主義者與以前從軍的兵士，一想到他們參戰的結果竟會是一個無政府的意大利，就很憤憤不平了。他們希望一批新人物來掌握國家的樞機。在這個當兒，墨梭里尼（Mussolini）前來奪取政權了。

墨梭里尼

墨梭里尼以一八八三年生於羅馬納（Romagna）。他的父親是一個鐵匠，有社會主義的傾向。他的母親是一個學校教師。因母親的主張，墨梭里尼進師範學校肄業，後來成為教員。他因不安分，又因性格生來富於反抗性和浮躁，不久就離開本職，跑到瑞士去。他先後在洛桑和日內瓦讀書，常常饑殍不繼，至於乞食。後來他在一個社會黨的報館裏得到工作，但他組織勞工和煽動罷工的活動竟使瑞士政府不能忍耐，命之出境。他有一個時期回到意大利，從事新聞事業，然後又往奧國的特提提諾（Trentino），他在那裏的社會主義的活動又使他不得不離開。他再度返國，被認為革命黨人而受着監視。在一九一一年，他因鼓動民衆阻止軍隊開赴的黎波里（Tripoli）被捕下獄，不久放出。翌年，他在社會黨黨員大會作幾次驚人的演說後，成為意大利社會黨機關報先鋒（Avanti）

的編輯。大戰爆發時他贊成意大利中立，但國家主義的氣燄不久戰勝了社會主義，他於是改變論調，開始主張參戰。爲了這個緣故，他不得不辭去先鋒報的職務，接着又被開除黨籍。於是在米蘭創辦一個參戰派報紙，叫做意大利人民 (Il Popolo d'Italia)，他有好幾年還堅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但實際上他此刻已成爲關心於改良大衆狀況的意大利國家主義者了。

當他的一階級於一九一五年九月被召從軍的時候，墨梭里尼入籍當小兵。他服務於伊遜佐 (Isongo) 前線，漸陞爲伍長。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他帶着四十餘處傷，（因意軍墮壕白礮爆裂而致者）被送進醫院。傷愈後，他被免除軍役，因之得回到意大利人民報主筆的職位，並用評論欄來痛闢漸起的戰敗論 (defeatism) 之風氣。墨梭里尼是一個「天生的」領袖和行動家，具有卓越的和有吸引力的人格。雖然他的聲音很粗硬，總算是一個辯才無礙的演說家，慣於使用短小精悍的句子。他有一對炯炯閃動的黑眼睛，凜然不可犯的威容，模樣兒彷彿拿破崙。他工作很努力，並且極注意瑣碎的事件。

一九一九年三月，墨梭里尼召集以前的兵士和其他的人（關心於解決意大利的問題，並切欲保護它的戰爭紀錄，使它免受漸具「悔悟的從良妓女」"penitent magdalenes" 身分之誹謗者）開了一個會議。到會的有一羣不滿現狀的少年煽動者，其中大多數在前幾年已加入一種稱爲 *fasci d'azione* 的社黨。這種法西斯組織是一般亟欲意大利加入協約國參戰的少年「行動者」於一九一四年十月組織的。到一九一五年二月，已有一百多個法西斯成立，它們用了猛烈的宣傳方法使國人同情於參戰派的觀點。墨氏曾經領導過米蘭 (Milan) 法

西斯黨支部，他所辦的人民報也成爲該黨的機關報。此刻，從前的參戰派人在墨氏的領導之下於一九一九年的會議重新組織爲 *fasci di combattimento*。

上述的會議採取了一個革命綱領，要求普遍的選舉權；比額的代議制；法定的八小時工作日；苛重的資本捐與遺產稅；沒收若干教會財產；廢除上議院；召集國民會議以決定新的政體；將軍火製造廠收歸國有；設立有立法權的經濟會議；由工人管理某種工業，如鐵路等；立刻合併阜姆與達爾馬提亞。這個綱領的主眼，特別在訴諸歸來的兵士，「戰壕裏的大衆」。墨梭里尼說道：「在大戰時期中，我們都感覺到統治我們的人的無能，我們又曉得我們所以打勝仗，祇靠意大利人民，而非由於統治者一方面的智慧或能力。假使給與我們建立新政體的機會，我們就不必氣餒。所以我們組織法西斯黨，這種團體能够從事積極的行動，並能走出去當衆大聲疾呼道：「惟有我們纔有繼承這個政府的權利，因爲將國家推進戰爭的漩渦並使之大獲勝利的，就是我們」。

「向羅馬前進！」

儘管法西斯黨的領袖的自信心很強，法西斯主義的事業在一九一九年還是進行得很慢。在是年的選舉中，米蘭地方兩個法西斯黨的候補官吏（其一就是墨梭里尼本人），一共得不到五千的票。在共產黨占領工廠的時期中，法西斯蒂的運動靜寂無聞。然而工廠占領一告終止，法西斯主義即開始了新的生命。財產所有者，商人的子弟，失業的退伍軍人，落職的官吏及不滿現狀的專門家與學生紛紛加入黨籍。再者，殷富的同情者也慷慨捐助

金錢。

這般法西斯蒂黨員充滿着國家主義者的熱忱及對於社會主義者與共產黨員的憤恨，乃開始所謂「集團行動」(Squadism)的恐怖運動。他們用蓖麻子油、棍棒和手鎗來威化或殺卻過激派人。自然，法西斯黨員也受到敵黨的同樣待遇。這種暴行有時給與許多人報復私仇的機會。從一九二〇年夏天到一九二一年夏天，雙方打過一百多次「仗」。政府對於這種內戰，祇是袖手旁觀，因為它力不足以干涉。

到後來法西斯黨員博得勝利，社會主義者自行分化，法西斯黨員漸漸受支配於墨梭里尼的米蘭支部。法西斯黨人又從事於有力的宣傳運動，使用小冊子、報紙、書本及演說來說服一般愛國者，其言大概謂祇有該黨把意大利從俄國布爾扎維主義的恐怖中救出來，也祇有該黨能够使意大利恢復在國內得到安寧與繁榮，在國際上得到尊敬的地位。

在一九二一年五月的選舉中，法西斯黨選出三十五個國會議員，是年十一月，他們組成全國法西斯黨。然而到這個時候，他們的政綱和一九一九年所採取的大不相同了。當他們和社會主義抗爭之際，他們失去了對於小資產階級的嫌惡心和對於無產階級的信仰心。實在，該黨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所草擬的政綱非常富於中產階級的色彩，甚至建議郵政與電政也由私人經營代國家經營了。

法西斯黨此刻步其他幾個愛國團體的後塵，穿起鮮明的制服並採用一種禮儀了。因為鄧南遮的黑衫黨人，大部分已加入法西斯黨，所以就決定採用黑衫的制服。他們的禮儀摹倣古代羅馬人的習俗，其行敬禮的姿勢亦

然。羅馬時代的一種官吏 (Lictor) 常荷戰斧與木桿以象徵力量與權柄，此項戰斧與木桿即成爲法西斯主義的徽章，在大戰時非常流行的都林的學生歌 (Giovinezza，即「青年」) 成了該黨的黨歌。

當這個時候，政府日益無能，且搖搖欲墜，一般人曾經談到組織一個聯合內閣，並請墨梭里尼接受大臣的職位。但墨氏加以拒絕，說道，「法西斯黨決不由仕途加入政府」。在一九二二年之春夏，他有好幾次暗示着法西斯黨員或許會推倒無能的國會，代以強有力的國家主義的政體。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墨氏在一個愛國的慶祝典禮日，首先喊起「向羅馬前進」的口號，但馬上重申他對於君主政體的信仰，承認他要使這個王國益趨於強固。

此後不久，墨梭里尼向下議院提出了一大批要求。他警告國會，如不遵從他的要求，就難免使用武力。要求的款目爲解散下議院，變更選舉制，舉行新選舉，實行財政改革，採取強硬的外交政策，法西斯黨員應有五個內閣位置。雖然事實上新近組織和訓練有素的法西斯黨民軍漸漸占領了北部的許多大城市，下議院的議員仍不爲所動，他們蔑視這個哀的美敦書，並認爲笑談。墨氏乃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那不勒斯 (Naples) 所舉行的國家法西斯黨大會公然宣布訴諸武力。在宣讀一篇帶威脅性的演辭後，他搭火車往米蘭，同時約有五萬全身武裝的法西斯黨軍開始向羅馬集中。

當政府覺得本身不能依賴軍隊來應付這個危局的時候，那個年老而性格溫柔，但不中用的首相法克塔 (Facta) 就辭職了。事情很平靜地過去，毫未發生衝突，因爲法西斯黨的民軍懾服了一般受驚嚇的國會操縱者。十月二十九日，國王打電話給墨梭里尼，要他來組織內閣。墨氏馬上離開米蘭到羅馬來，一面宣稱，「明天意大利

將有的不是一個行政部，而是一個新政府」。十月三十日，新閣就任。至於這個內閣的構成份子，十五個被任命者中祇有四人爲法西斯黨黨員，無社會黨黨員。其所以非屬清一色的緣故，乃因墨氏意欲採取一種妥協與溫和的政策，至他能够確定一般的輿論會擁護他從事於更大膽的改革時爲止。

使意大利法西斯蒂化

國會中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一派人是很多的，但他們並不立刻表示出對墨氏的不信任。他們希望他的無經驗會使他做出策略上的錯誤，然後藉以爲口實而把他一舉推倒。但墨氏非常謹慎小心。他沒有費多大力就得到實際上的獨裁權力（一直至一九二三年之終）。於是他從羅馬派出許多隸法西斯黨的知事與副知事去統治意大利王國的各省，這樣一來，他就確信政府的行政部分會矢志於他了。他接着又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通過阿波選舉法（Acerbo Election Law），把立法機關也抓在他的掌握中。爲取得國會對於此項法律的同意起見，他提醒那般立法者道，「革命有它的權利」，而本人時常準備着使用武力。

前項選舉法規定，凡在全國選舉中取得大多數票的政黨，祇須該黨所得的佔總票數四分之一以上，就有權獲得下議院的三分之二的席次。其餘的席次，由其他各黨按所登記的票數比例分派。在這個計劃之下，那個取得最多數的政黨，就必定有絕對支配下院的權，同時決不能有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在根據這個新制度所舉行的第一次選舉（一九二四年四月）中，法西斯黨黨員果然取得大多數的票，但此項結果不無藉助於武力之處。所

以憑藉阿叟波 (Acuto) 很巧妙地所草定的選舉法，法西斯黨終在下議院中占據了三分之二的席次。

國會裏面的主要反對黨就是社會黨，其領袖之一是一個青年議員，叫做麥提沃梯 (Matteotti)。他於一九二四年出版過一本叫做法西斯蒂的真相 (Fascisti Exposed) 的書。他在這本書裏面舉出一大串法西斯黨黨員所犯的殺人案與暴行，並揚言欲揭發墨梭里尼的新聞中的某某關員為騙子與受賄者，最著名的為內政部長芬齊 (Finzi)。但麥提沃梯在尚未得到提出證據以對抗這幾個官吏的機會時，就失蹤了。兩個月後，他的屍體在一條河中發現。這件暗殺案發生於一九二四年六月間，激起了如潮的憤怒，因為這件事祇是許多暴行中最罪惡昭彰的一件。

因為墨梭里尼最近告訴過下院，「凡是國內所發生的事情都是經過我的精密與直接的選擇和根據我的特別命令而發生的」，一般人自然會謠傳麥提沃梯之被「除去」是他指使的。雖然此項攻訐沒有重大的證據，但罪狀之非無根據及高級官吏之不免牽涉在內是顯然的。此外，墨氏也難逃馭下不嚴之咎。大多數非法西斯黨員的議員都退出下院，作為抗議的表示，並誓言法西斯黨柄政一日，他們決不回任。他們在阿文丁山 (Aventine Hill) 上租借了一所廳堂，在那裏用演說和文字抨擊法西斯主義。一般人民回憶到古代羅馬平民退往阿文丁山的故事，就稱這批分離的議員的行動為「阿文丁的脫退」。在一九二六年，這般脫退者終被奪去了他們在國會的席次。

墨氏為裝飾體面起見，乃於麥提沃梯的事件發生後罷免了所有與此事有關係的人的職務，並監禁了許多

官吏，連芬齊在內。此外他重新保障法律與秩序，指定一個委員會從事於憲法的改革與改編民軍，並作若干不重要的政治讓步。可是，幾乎遲至兩年之後（一九二九年三月），暗殺者纔被緝獲，帶到法庭受審，當時爲之辯護者就是法西斯黨的書記長法里那西（Farinacci）。有幾個犯人被開釋了，有幾個卻被判處短期的徒刑。此後墨氏更取堅定的主張來對抗那般地方首領所領導的恐怖黨人。在一九二七年，他命令警察隊撲滅這般刁悍的「愛國者」的非法策略。

墨梭里尼既已挨過一九二四年的危難，就着實進行把自己造成意大利的無上權威者。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約有七千個人口不到五千的自治市都被奪去地方政治權，而置於由羅馬所派來的市區行政長官（Podestàs）的直接管理之下。翌年，實際上所有一切城市的人民政權也被無限期地停止了，它們的行政權則落於這般長官的手中。羅馬本身有總督，那不勒斯和米蘭有特別委員統治之，這些官吏皆由中央政府所遴選。國會也喪失了創制法律的權。首相祇對國王負責，並有頒發效力等於法律的命令之權。新聞紙和出版物皆經過嚴格的檢查，一切反對政府的報章非被收買，即遭禁止。凡未經法西斯黨當局認可的刊物，都不能印行。

墨氏成爲全國陸海空軍的最高統帥，法西斯黨的新黨員必須立誓「毫無問題地遵從「領袖」(Il Duce)的任何命令，並出其全力，必要時且流其熱血，爲法西斯黨之革命宣勞」。秘密會社，連「共濟社」(The Musons)在內，全被取消。凡加入社會黨者起初皆被處流刑，後來到一九二六年，一切反對黨都不能存在了。祇有法西斯黨是國內唯一的合法政黨。這樣一來，墨氏在早年所預先聲明的話：「一切黨派必須消滅，必須顛覆。我要看見土崩

瓦解的全景呈現於我的四周圍——其他政治勢力的土崩瓦解——俾法西斯主義屹然獨立，莫與之京，現在居然實現了。

法西斯黨的黨員在一九三二年總計達一百萬人以上。在這個階級制度的黨組織之頂點的爲「最高會議」(Grand Council)，以領袖墨梭里尼爲首腦。這個會議的幹部人員都是黨與政府裏的高級官吏。在一九三二年，其人數約有二十。墨氏因有隨時增加幹部人員之數的權力，所以能完全操縱着這個會議，這樣就貫徹了他的一句話：「一個階級制度的組織必須達於針點」。依據法律，法西斯黨的大會議，被認爲「調整政府的一切活動的最高機關」。它的主要職權爲草定新法律，填補其本身之缺額，指定國王與首相的繼任者，審議涉及意國疆土變更的國際條約和派定法西斯主義的行政機關——「全國執行部」(The National Directory)。最高會議的幹部人員兼任內閣大臣之職，墨氏自己在同一時期就身兼八個部長。全國執行部由黨內書記長及最高會議所委任的九個人組成，在「領袖」主席之下每月開會一次。

法西斯黨的基礎有一萬個地方支部，這些支部在每省聯合爲省黨部，並受省評議部與省執行部統轄。省書記派定地方支部書記。全部的組織，恰好作爲法西斯黨在一九二六年十月所採取的新憲法中所述政治學說的例證，其說如下：「法令與體統是不可少的，否則就不能訓練能力與教育人民，但這種法令與體統必須由能够綜攬權力、職務、機能與功勞的最高地位加以剖明與指導」。

因爲法西斯黨最高會議，爲實際上的一切目的，成爲意大利的政府，所以上議院與下議院迅速地失掉了重

要性。雖然法律之創制仍須得到兩院的同意，但墨梭里尼已採用了先取行動然後使「受過訓練的」國會加以追認的手段。選舉的方法之有利於法西斯黨，使下院不能俯首聽命。有時該黨在上院也碰到反抗，原來上院的議員是皇室的親王及國王所任命的人，其任期為終身的。可是墨氏能夠隨時奏請國王儘量任命新議員，以投票之數制勝反對派。例如，在一九二八年，有三十七個新添的上院議員是因墨氏的命令而被任命的。

當政體的變遷正在進行的時候，墨氏以「澄清」意大利為己任。反法西斯黨的律師被剝奪資格了，與現政府為敵的著名人物被監禁或放逐了，凡在外國非議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僑民的財產被沒收了，全國的大學都為法西斯黨的教授所據了，——這一切不過是澄清的進程的一部分。墨氏在意大利人民報上宣稱：「此間無反對黨插足之地」。

起草新刑法的工作於一九二六年開始，完成於一九三一年。死刑本已在一八九〇年被廢止，現在又恢復了。凡謀害「國王、王后、太子或首相之生命或自由」者，皆處死刑。為父母者不得以「社會主義者或其他叛逆者」之名名其子女。離婚業經限制，假面跳舞會在所禁止，呪詛者立遭逮捕，酒館必須於午夜閉門，主張節制生育者即犯刑事罪。向外的移民被限制了，凡未經許可擅越邊境者應開鎗阻止之。鎮壓反法西斯蒂運動的祕密警察隊，稱為「鎮壓反法西斯蒂運動義勇團」(Organizzazione Volontaria per la Repressione dell' Antifascismo，簡寫 O. V. R. A.)者，仍舊存在，並經加以編制，使直接對墨氏負責。

墨梭里尼相信意大利將來的偉大是在青年的手中，於是下令全國的青年必須受良好的訓練。因此他組織

了三個穿制服的團體，自八歲至十四歲的兒童入「巴利拉」(Balilla)。(註一)十四歲至十八歲的少年入「前衛」(Advance Guard)，十八歲至二十一歲的少年入「少年法西斯蒂」(Giovine Fascisti)。這三個團體的團員約計一、三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三二年的統計)。他們都受軍事上、體格上、道德上和宗教上的嚴格訓練，以及關於法西斯黨的目的與功勳的知識。他們必須學習「少年法西斯黨的十誡」，其第十條如下：「你所應第一寶貴的事情就是「領袖」的生命」。前衛團員則從「保國義勇民軍」的軍官受高等的軍事教育。(註二)在一九二六年，祇有這些補助團的「畢業生」，始得加入法西斯黨。

(註一)巴利拉是一個熱那亞童子的綽號，他是在一七四六年從事反抗奧軍運動的少年英雄。

(註二)法西斯黨的民軍對國王宣誓盡忠，但它的最高統領是墨梭里尼。它是補充正規軍的志願兵。這隊兵都穿黑衫制服並有復雜的禮節。約有三〇〇、〇〇〇民軍是時常在動員中的，他們被作為一種特別警察隊以保衛公安並防備危急。意大利盛行強迫兵役制，就一般而言，凡青年團體預備的軍事訓練，民軍則授高深的軍事訓練。

至於組織婦女為法西斯蒂團體的工作不甚着重，因為墨梭里尼認為婦女應留居家中，充其量祇宜從事於社會公益事業。(註)約有十萬婦女是「婦女法西斯黨」(Feminine Fasci)的黨員，此外還有兩個團體，一為 Piccole Italiane 是十二歲以下的女子所組織的，一為 Giovani Italiane 是十二歲以上的女子的團體。在國外，屬於法西斯黨的小團體約有六百個。它們都受羅馬總部的特別祕書長的管轄。

(註)一九三二年在美國洛杉磯所舉行的世界運動大會沒有意大利的婦女參加。然而男運動家所表現的優越成績，使意國當局對於婦

女的體育不得取較好的態度。期望意大利的男女運動家都能在下屆的世界運動大會（定於一九三六年在柏林舉行）有代表參加。

建立合作一體的國家

大戰前，一種所謂「工團主義」(Syndicalism)的學說已在意大利的工人中得到強固的立足地，它主張推翻現時的政治制度，建設一個以經濟團體為基礎的政府。在大戰時期中，許多工團主義者，由羅遜宜(Rossoni)這般人領導着，漸漸浸染了熱烈的國家主義，並為國家盡忠來擊敗外敵。在一九一九年，這些國家主義的工團主義者與國家主義的法西斯黨人聯合起來和共產主義苦鬪，因為他們都是堅信私人財產的權利的人。兩黨博得勝利的結果後，羅遜宜開始組織法西斯蒂的企業組合，以對抗社會主義的職工組合運動。他又希望改革意大利的政治制度，俾代議制以有組織的經濟利益為基礎，而非根據於地理上的政治單位。法西斯黨的工團主義者與信奉法國工團主義祖師索勒爾(Sorel)的學說的人大有區別，他們承認「資本家階級在社會上是生產的。」希望「階級合作」而反對階級戰爭，並準備給與生產者團體在政府中的地位。羅遜宜的運動進行得很迅速，到一九二五年，意大利工業雇主聯合會承認法西斯蒂的企業組合為勞工的唯一代言者。到一九二六年，法西斯蒂的企業組合共有會員二、四〇〇、〇〇〇人。墨梭里尼於是決意把它們抓在手內。

依據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的法律，十三個企業組合（其中六個為雇主的，六個為工人的，一個為知識階級

的)得到法律上的地位。此外的組合，如能代表某工業中雇主或工人百分之十的人數，亦可組織，但政府官吏不得參與之。每一生產界祇准有一個企業組合，其決議對於工人與雇主均有拘束力。企業組合又取得訂立集合契約的專獨權利，並得向從事於其工業的人徵稅，不問納稅人是該組合會員與否。企業組合不得與任何國際團體聯合，並須受「組合部」(Ministry of Corporations)的直接管轄。此部設於一九二六年七月，墨氏為第一任部長。每個聯合會在各省和各地方都有分會。(註)

(註)下列為十三個企業組合：工業、農業、商業、海上與空中運輸業、陸軍與內河航行業、及銀行業等組合，工人與雇主各占其一，此外尚有一個知識份子(包括專門家與藝術家)的組合。

法律又禁止工人的同盟罷工與雇主的同盟休業，承認集合的勞工契約之效力，並設立十六個勞工法院，一經判決便不能上訴。祇有在政治上為法西斯黨地方當局所承認的人，得為企業組合的會員。再者，此種會員對於非會員得享受取得職業之優先權。在此項法律通過後不久，在熱那亞(Genoa)開辦了一所訓練工團主義的辦事人員的特別學校。此項行動的表而宗旨，是在將「對於誠實的人可成爲一種理想的職業而對於不誠實的人可成爲一種生利的事業」的職務「擡高到職業神聖的地位」。然而這種訓練課程的效果，顯然是在使組合部更能牢固地把握住企業組合。這個學校的畢業生自然會傾向於代表政府的利益而非代表企業組合會員的利益。在一九三〇年，雇主的企業組合有會員一、一八七、八二八人，但代表着四、三二七、七六〇個雇主。工人的企業組合有會員三、〇九三、〇〇五人，但代表着八、二二二、五四八個勞動者。在一四三、九四〇個「知識份子」

中，有七五、七九〇人爲會員。

一九二六年的法令又規定設立稱爲「協會」的聯絡機關以調整各企業組合的活動。有好幾年，因爲技術上的種種困難，竟使這個計劃不能實現。到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墨梭里尼爲一調停各團體間之爭執以謀國家生產之利益」起見，乃發起「全國社團會議」，以十三個企業組合、政府，及雖在企業組合外而爲合作的團體如「工餘聯歡社」(Dopolavoro)的代表組織之。(註)

(註)「工餘聯歡社」創辦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它是一個俱樂部性質的團體，專門供給工人及其家屬體育上與智育上的休養的種種便利。這個團體獎勵衛生、教育與藝術，凡持有社員證者得減費入戲院觀劇並參觀博物院與展覽會。在一九三一年，其社員達一、六二二、一四〇人。

全國社團會議奉命調整現有的機關，監督職業介紹局，獎勵生產，解決各企業組合間之糾紛，並設立執行職務之社團。爲管理方便起見，該會議的全體職員分爲七科，略與上述七種主要的企業組合相當。依據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的命令，該會議的七科改變爲七個社團，其工作與前此該七科所完成者相同。這樣一來，這七種主要生產業的雇主與雇工都被團結爲一個組織，它同時又是受組合部支配的國家行政代理機關。事實上，組合部握有任命並撤換各社團的總理的權力。

當時意人希望由設立全國的企業組合而置之政府監督之下的舉動，會大大地改良勞工的狀況。然而這一方面的進步，實比所預料者來得慢。因之羅遜宜勸墨梭里尼設法通過勞工法以改進工作狀況。一九二七年四月

二十一日，即假定的羅馬建立紀念日，墨氏公佈了此項法律，其最後的條文是他自己草定的。勞工法中宣稱：「意大利國家爲具有優越於其構成份子之個人或團體所具有的目的、生命與行動方法之組織。它是道德上、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統一體，此統一體，惟有法西斯蒂政府足以完全實現之。」一切生產的目的在於「生產者之福祉與國力之發展」。勞工是受國家保護的「社會義務」。不過國家祇在「私人之開創力有所缺乏或不足時，或國家之政治利益被牽涉時」，可以干涉。

勞工法的其餘條文大抵關於保證工人的公平待遇。夜工的工資當高於日工工資。零件工作應每十四日付錢，其限度並須提高，務使通常勤勉的工人能够得到標準的工資。星期日成爲法定的假日，各工人每年照常領工資的假期亦經規定。非因本人之過失而被開除的工人應得解雇賠償金。勞工契約不能因企業換主，兵役或短期疾病而破棄之。

政府又爲本身規定如下之目的：「第一、完成災害保險；第二、改良並擴充產婦保險；第三、創立預防職業疾病與肺病之保險，以作一般健康保險制之初步；第四、改良預防非自願的失業之保險；第五、採用爲年輕工人所設的特種養老保險。」以「教育與訓練，特別是職業教育」，規定爲「企業組合的主要職務之一」。可是，儘管有勞工法之制定，意大利工人仍不免懷有許多顯然爲合理的不平之感，他們以爲一直到現在，政府表面上爲謀有效的生產之利益，已大大地顯出了對於雇主的偏袒。

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又通過了一件法律，這使意大利成爲具有代表經濟界各業的立法機關的第一個大國。

下議院的議員名額自五百六十人減至四百人。議員由全國選舉，把全國作為單個選舉區。議員候選人八百人由在羅馬開會的十三個企業組合的全國執行會議指定之。每個企業組合有指定若干候選人的權利，每一產業界的雇主和雇工得選定同數的被推舉者。例如農業雇主聯合會與農業雇工聯合會各得指定九十六人。此外的兩百個候選人則由特別挑選出的文化團體與慈善團體指定之。然後再由法西斯黨最高會議於此一千個候選人名單中遴選出四百人。

最高會議得隨意增加自己的人名，或甚至於拋棄全部名單而代以新者。當最高會議已決定了滿意的「四百人」時，就將業經認可的名單公佈。在選舉日，投票者拿到載有下面一個問題的投票紙：「你贊成法西斯黨最高會議所指定的議員名單嗎？」答案非「是」即「否」，不得反對名單中的個人。如果所投的票的過半數寫的是「是」，這四百人就當選了。如果過半數的票是「否」，就必須重新舉行選舉，其手續較前複雜。

普及選舉權被此項選舉法所廢止了。投票權祇限於繳納企業組合費，或繳納至少達一百里拉（一里拉等於五·二六分）之稅，或從國家或公共機關收受薪金或薪俸，或為公認的宗教之牧師的人。婦女被摒除於國民選舉權之外，有選舉權的男子必須年齡滿二十一歲，如已結婚而有子女者，祇須滿十八歲便可以了。這樣一來，在四千二百萬的總人口中，原有的三百萬之譜的選舉民減少到九百五十萬。雇主的人數雖少於工人，但其所出代議士卻與後者相等。全部的選舉辦法是非民治的，但法西斯黨正以此自豪。他們認民治政體是一種衰微的象徵，與強固、統一和全國一致的國家不相合。他們又認為民治政體會為「十九世紀的良好統治方法」，但在

二十世紀卻就不適宜了。

在一九二九年之初，各企業組合及其他團體的執行會議開過一次會，根據新法律指定第一屆選舉的候選人墨梭里尼的姓名赫然首見於各名單上。法西斯黨最高會議於是精細審查那張一千人的名單，並選定具有相當資格且有「可靠的法西斯主義之信仰」的四百人。這張名單即行公佈，至三月二十四日，選舉人乃得投票承認或否認全部名單。凡有意投「否」票者必須用特製的投票紙。在公佈名單日與選舉日之間的時期內，法西斯黨黨員，自墨氏以下，進行着有力的選舉運動。反對言論在所禁止。就是教皇（他自從簽訂最近的和約後已與意大利政府言歸於好）也慫恿天主教徒投票稱「是」。幾有百分之九十的合格投票人都參加投票。有八、五、九、五、五九票稱「是」，祇有一三七、七六一票稱「否」。反對票大多數來自北方的大城市，那裏是早年法西斯主義的力量所在之地。顯然可見大部分的選舉民表同情於墨氏整頓國內秩序並從實際的與實在的立足點觀察事件的政策。

法西斯黨在國內的功業

意大利王國的經濟情形在法西斯黨執政後起初十年內經過一般的改良。使預算保持平衡的困難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就完成了，此後國庫大率常有盈餘。數目很少的戰債不久就償清了，所欠美國和英國的債務也分別在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六年備有充分的資金來付還本利了。意國貨幣「里拉」在大戰前本來值一元五分之

一到一九二七年則經固定爲一元十九分之一了。

然而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二年的時期內，當世界的不景氣每況愈下的時候，意大利政府亦覺得必須減少薪俸，裁減官職，採取其他緊縮政策並募集鉅額的國內公債了。在一九三二年，失業者的人數達一百萬以上，但政府集中各種可利用的力量和宣傳方法來打破難關。墨梭里尼暫時強行降低房租和食物價格以幫助各地方人民渡過經濟恐慌的時期。生產者被迫調節生產額，銷路和物價，工人的工資，如未經企業組合的中央委員會的許可，不得減低。政府又特別設法減少本國對於外國棉麥和煙草的輸入的依賴，一面在國內或非洲殖民地努力生產這幾種主要產物。關於煙草的生產，頗爲順利。比較不收效的，雖然是更壯觀的，還是政府所佈置的「小麥戰爭」。

爲增加國內小麥的生產起見，意大利舉行了好幾次種植小麥的競賽，其獎品由政府捐贈。其中有一次，墨氏私人的田地（在喀益塔 *Carpenta*）獲得第三獎。「領袖」馬上被認爲一個很不錯的耕田人，他自己也力圖爲意大利農夫的好榜樣。他在一九二八年接受獎品的時候說道：「如果我們要避免已使其他民族苦惱不堪的經濟難關和人口統計學上的凋零，現在就是貢獻幾十萬萬「里拉」於農業的成熟時機了」。政府又鼓勵農業合作社的設立。農業信用銀行也創辦了，以現代耕種方法教授農人的種種特別便利也由當局供給了。以圖解指示增加農作物產額的方法的影片送到各農村開映。同時又發起一個運動來減輕索麵與通心粉在意大利日常食品中的重要性，因爲這兩種東西的製造需要巨量的小麥。

此外，政府採取有力的方案來增加意大利在世界貿易和旅行業中的一份。在一九二六年，一個半官辦的「國家出口研究所」成立了，其目的在增進對外的貿易。汽船業得到很大的補助金，關於發展海運業於巴爾幹各口岸，俄國、土耳其和印度的事情，政府特別賣力。到一九三一年，爲節省經費與增加效能起見，三大海運公司合併爲一。意大利的造船所替俄、希臘和南美諸邦建造戰艦，長期在工作着。

許多海底電線業經敷設，無線電工業得到獎勵，提高的關稅則也通過了。一九三〇年的法律將汽車入口稅加了一倍，這使美國汽車製造業者很爲惶慮，並使意大利飛也脫（Fiat）汽車公司在實際上能够壟斷本國的市場。但汽車大王福特（Henry Ford）終得在米蘭設立了一個汽車分廠。意大利又與許多國家簽訂商業條約，最近的是與俄羅斯（一九三一年）、匈牙利（一九三一年）和奧地利（一九三二年）所訂的。在和蘇俄所訂的商約中，意政府擔保俄國在意國購買貨物得賒帳百分之七十五。在一九二九年，意大利領導歐洲從事於水電力的發展及紗線與絲工業。

自對國家富源作特別調查後，竟發現新的礦源。大規模的開拓計劃，尤其是在坎利納和龐丁兩區原（Cannina and Pontine Marshes）的，已準備進行，所耗於植樹計劃的金錢與人力也很多。鐵路業務業經大事故，用電力推動的列車正在試行，開車時間表嚴守不誤，在戰前平均每年達一百萬元的免票之數被減至無足輕重的分量。有幾條航空線得到政府的資助。在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二八年之間，所承辦的公共工程達三千之譜，到一九三〇年，即「向羅馬前進」的八週年，又開始再造兩千的計劃。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一年，所耗於公共工

程的金錢總計八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二年所進行的復需四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政府爲維持法律與秩序起見，曾以撲滅西西利的祕密結社或「黑手」黨的任務付託於巴勒摩（Palermo）知事摩利（Mori）。他於一九二七年開始他的職務，四年後，他向政府報告已將該黨撲滅。

法西斯黨在施政的進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阻礙之一，就是人民的不識字。在一九一一年，約有百分之四十的意大利人是文盲，其比率南方人高於北方人。法西斯黨對於這個問題用種種方法來解決它，如增加教育經費的預算，嚴格施行強迫十四歲以上的國民入校肄業的法律，及採用新的教授法等。這樣一來初等學校的學童人數自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三、二〇〇、〇〇〇增加到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的四、三〇〇、〇〇〇，再者，全國各學校的教科書都經過嚴格的審查，凡與法西斯黨的政治上經濟上或國家主義的抱負不合的課本全被禁止採用，以便「用法西斯主義的健全精神」來培育兒童。此外，整套法西斯蒂的新教科書亦經編著了。

學校成爲宣傳法西斯主義的最好地方。根據意大利的法律，凡教員得因其政治見解與政府的主張相反而撤換之。在一九三一年，成人不識字者還不到百分之二十五，意大利一共有二十五個大學和許多傳授專門知識與職業教育的「高等學院」。私家與半官方又屢次設法獎勵法西斯蒂的新藝術，因爲墨梭里尼有一次說過：「沒有藝術就沒有文化」。然而一直到現在，這一方面的進展還不十分顯著。

從上面看來，在法西斯黨的指導之下，實質上的進步是可觀的。但我們一想到意大利大部分仍舊依賴外國的資本，實際上沒有煤、鐵、油或磷酸礦物，比較上很少木材和糧食，就很難看到國家的組織是以工業與機器爲基

礎的意大利要如何纔能够稱雄於世界。

意大利人民目前所有的一筆大家當就是國家的訓練。他們時常要受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智力的紀律的鞭策。他們的格言是「沒有爲個人着想的事情，一切都是爲意大利」。哲學家景泰爾（Gentile）說道：「法西斯主義的意義即在對於生活認真。生活就是勞作、努力、犧牲與苦幹；我們所習知的生活是一種無娛樂之事，無娛樂之时的生活。在我們的前面總有一種有待實現的理想，不讓我們休息的理想。我們沒有可以浪費的時間。就是在我們睡眠的時候，我們也須稱述所付託於我們的才能」。可是，就是在夢中還規定須得擔負政治職務，是否便足以制勝意大利在物質的資源上的天然障礙，還待將來看呢。

阿爾托——阿地基（前南提羅爾）問題

法西斯黨所有最困難而未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求得前南提羅爾（South Tyrol）的圓滿統治。和平會議爲了戰略上的理由，不但將意大利人所居住的南提羅爾一部分稱爲特稜提諾的地方交與意大利，並且將幾乎全爲二十五萬德人所住的一部分也給了它。在移交的時候，和會的意國代表提托尼（Tisoni）在本國下議院演說道，他敢向新歸意大利的人民擔保「他們的語言和文化團體當被尊重，他們的行政官吏當享受我們的開明而民主的法律之一切特權」。這個諾言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二年之間祇有一部分被遵守。當法西斯黨執政的時候，它就完全被忽視了。法西斯黨對於這些少數德國民族的政策可概括於墨梭里尼的一句話裏面：「我

們將使他們變成意大利人」。

化德人爲意人的手續是很有趣的，並且是有力的。德人所住的地方被置於羅馬所派知事的管理之下。意大利文被規定爲法庭及一切公共機關如鐵路、銀行、水電、煤氣公司的公用文字。祇有說意語的公民可以當陪審官，雖然尚有許多土人既不識意文，又不懂意語。但一切法律與命令獨用意大利文公佈，前任的官吏大多數被罷免，代以不諳德語的意人。一切碑銘、招牌、告白、目錄、時間表、菜單等等都須用意文。凡鄉村、城鎮、河流、山嶺或谿谷原有德文名稱者，全被改爲意文名稱，使土人與遊歷者如墮五里霧中。一切地圖、指南、圖畫郵片及廣告必須載有意文的稱號，其中有許多是非常不適當的。舊有的德文名稱甚至於不得見於新名稱後面的括弧中。

「提羅爾」一名稱被廢止了，該地更名為阿爾托——阿地基（Alto-Adige）。凡使用「提羅爾」或「提羅爾的」之字眼者必受重罰。該地所有一切德文報紙多遭封禁，祇有一種除外，而那一種還是由一個意大利人編輯，用爲法西斯黨的宣傳刊物的。許多地方旅行社與高山登覽俱樂部全被裁撤，其財產統撥歸「意大利高山登覽俱樂部」（Club Alpino Italiano）。那個重要的德國銀行被解散了，而代以意大利土地信用銀行。政府又盡力將意大利人移居於德人的區域。居民被迫捐贈金錢來建築意大利英雄的紀念碑，同時德國的英雄如發爾忒·豐·得·服革爾凡得（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與和斐（Andreas Hofer）的塑像卻被毀壞或打倒了。

在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六年之間，一切德國學校全被封閉。在一九二八年之初，即在教授宗教課程的時間，

亦禁用德文，但是年之終就解禁了。凡用德文唱歌，用德文私人授業及表示反對法西斯黨的見解之事，在所禁止。所可異者，縱令全國其餘地方的意大利人都可學德文，獨獨舊德屬南提羅爾的居民被剝奪這種權利。

最使提羅爾人難堪的，就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的命令，其中規定將一切姓氏「重新意大利化」，據法西斯黨當局的意見，這些姓氏「早經譯成其他文字，或因襲用外國文拼字法或增加外國文語尾而失去了本來面目」。同樣，「凡本屬於一地方的家名，出自地名業經譯成他種文字之處所，或被外國文拼字法混淆者，應恢復其意文格式」。一切國民當注意官報（Official Gazette）所載的目錄以查出彼等此後所應取的姓名。凡以已正式改為意大利文的姓名從德文格式者，當科以重金罰款。許多提羅爾人，其祖先已留居該地一千三百年者，都被頒賜連他們自己也常常難於發音的姓名。

諸如此類的政策引起德、奧兩國再三的抗議。禁止使用德文於教授宗教課程的命令之公佈更惹起奧國總理宰伯爾（Seipel）的非常強硬的怨言。墨梭里尼對於此種層出不窮的「干涉」，大動肝火，於是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三日作挑戰的言論道：「下一次我將使行動來說話……一個自尊的國家決不能容忍此種干涉」。他對於奧國所提議將此事提交國聯解決的意見，報以冷笑。奧國細味墨氏的語意，乃大為惶恐，宰伯爾馬上解釋他的意思祇關於這個情形的文化方面，決無意於干涉意大利的內政。

在一九三〇年，意、奧簽訂了和好與仲裁條約，此舉蓋謂奧國至少暫時已放棄代提羅爾人打抱不平的主張。但提羅爾人本身，約二十五萬大無畏的農民與山居者已在他們祕密流行的歌詩中發誓，「在自由的陽光重新

照耀於山上，而我們在自由的德國南方復爲提羅爾人之前，決不罷休！

政教妥協

一八七〇年，法國拿破崙第三下令撤退駐在羅馬（教皇僅存的政治領土）以保護教廷的法國軍隊。法人去後，意軍即開來奪取這個「永恆之城」（The Eternal City）。教皇庇護第九（Pius IX）略作抵抗，但不久就下令大開城門，任敵侵入。於是羅馬成爲意大利的首都，而五十九年來爲意國不安之因的「羅馬問題」亦隨之發生。

庇護自認爲受無理的武力壓迫的犧牲者，並排斥意大利政府。意大利國會爲討好教皇起見，乃通過教皇保證法（Law of Papal Guarantees）（一八七一年）。此項法律擔保教皇及其繼任者永久保有聖彼得教堂、梵諦岡（Vatican）與拉忒藍（Lateran）宮殿及岡多爾福（Gondolfo）之別邸。它又給與教皇在其所有地內之主權，承認其身體爲不可侵犯，且有派遣並接見大使之權，准其自由使用意大利的鐵路與郵電機關，並許以每年約六四五、〇〇〇元的優待費。

庇護第九不理這件法律。他不肯承認意大利政府未經談判所擬的單方面協定，因爲如果教會與政府之間的「暫定條約」（Modus Vivendi）祇是國會所通過的法律，那末它也就可以隨時被以後的國會取消。再者，假使教皇的身份可以由意政府的法律來規定，他就會成爲意大利的臣民，且被剝奪本身的威嚴，這是從他的傳統

地位（非屬一國的國際宗教之元首）所生的。教皇於是退居於梵諦岡宮，自號爲「篡奪者的囚徒」，不承認薩伏依（Savoie）王朝，並命令意大利天主教徒不得積極參與該王國的政治。庇護第九的繼任者繼續施行這個政策，其結果一般一面欲爲忠順的天主教徒，一面又想做愛國的公民的意大利人發生嚴重的「良心衝突」。這個爭鬭使許多有本領的天主教徒不能爲國家宣勞，且斷絕了天主教左右政府政策的勢力。

歲月推移，政教的危機漸漸不大劇烈了。有識的意大利人「克盡國民的義務，可是仍自稱爲天主教徒」。政府想了種種方法來表明政府並未認教皇爲意國的臣民，但認爲外國的君主。庇護第十於一九〇五年特准天主教徒參加國會的選舉。可是「羅馬問題」依然是墨氏所謂「國家的肉體中的一根刺」。

當法西斯黨柄政的時候，他們覺得教會與政府間，宗教的信仰與政治的義務間有如此嚴重的衝突，實足使國家的權力變弱。他們又覺得，宗教必須使之爲法西斯主義之用，而不當使兩者如水火之不相容。並且天主教着重個人的訓練，特別投法法西斯黨之好，政府於是進行若干妥協的步驟。十字架復被置於課室了，宗教課程成爲初等學校的必修科了。軍隊中派有教士了，神父的薪俸也提高了。

同時教皇庇護第十一（Pius XI）覺得長此趨於極端是不智的，他並且確信他決不能期望其他國家給與援助，因之也準備結束這個爭鬭。然而他要意大利首先提議，並堅持進行談判時須保守秘密。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雙方着手「非正式的」磋商。一九二八年意政府強迫天主教的童子軍加入「巴利拉團」的舉動有一個時期，須有使談判終止之虞，但當政府規定天主教神父得授與「巴利拉團」每週一小時的宗教功課時，教會就軟化

了。

雙方的談判差不多經過兩年半的時間，終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得到順利的結果。最後的細目是由首相墨梭里尼和精明的主教長加斯帕里（Gasparri）規劃成功的，前者代表意大利，後者代表教皇。所訂協定共有三件，總稱爲拉忒藍和約（The Lateran Accord）。其中包括政治的條約一件，親和條約（Concordat）一件，及財政的協定一件。雙方復於六月七日在梵諦岡宮交換批准書。

政治的條約是關於教皇的國際地位的。教皇在這件條約裏面認爲「羅馬問題」已得到最後的和不可變改的解決，並承認薩伏依王室統治下的意大利王國。意大利則因由梵諦岡城之建立於羅馬教廷的「完全所有權，專有與絕對的權力及統治權」之下，向教廷擔保「絕對的與有形的獨立」以及「在國際關係中的無疑的主權」。

梵諦岡城有面積一〇八·七英畝，人口六百以上，其中有一百是瑞士人。這個城中除羅馬教廷的權力外不能其他的權力，惟意大利的警察可以一直站崗到聖彼得廣場會議廳（這是唯一公開的地方）門口的石級階下。教皇的身體被宣佈爲「神聖不可侵犯」，他有派遣與接見外交代表的權利。「意大利始終擔保在任何情形下准許各國（連交戰國在內）與羅馬教廷自由通信，並准許世界各處之主教自由覬見教皇，不受阻礙」。教皇則聲明「決不與聞國與國之間的一切政治爭執及爲解決此種爭執的國際會議，惟爭執國一致向之請求調停時不在此限」。因有此項聲明梵諦岡城之領土「在各種情形中」當被認爲中立的與不可侵犯的。

親和條約規定教皇與意大利之將來關係。羅馬天主教爲「意大利之唯一國教」。遴選大主教與主教之權屬於羅馬教廷，但在指定候補者前，當以其姓名通知意大利政府，俾可確定政府從政治的立足點對於此項指定並無異議。政府當支付教士之薪俸，主教於就職前須宣誓盡忠於國家，國王與政府。天主教教會得自由施行宗教的權力於屬於教會的事件，國家於教士傳教之必要時，由當局者一方面給與彼等保護。換言之，國家當襄助施行羅馬教法律於天主教徒。國家又承諾修正民法中在信仰與道德之事件上與羅馬教法律相牴觸之數章。這大半指婚姻與教育的制度。

國家認婚禮爲一種聖禮，結婚時如已遵守關於預告與登記之手續，祇須舉行宗教之儀式即足。至於普通的禮節，凡天主教徒與非天主教徒都可任意行之。天主教徒中的離婚問題則歸教會解決。宗教課程從前祇爲初等學校的必修科，現在同樣強迫教授於中等學校了。教授此課的人必須爲受國家薪俸的教員或「教會當局所認可的」神父。可是教會不得干涉通常的課程或學校的管理。「天主教徒行動社」及其他宗教團體由國家承認之，惟以他們不從事政治活動並將其事業限於「傳授與實行天主教教義」爲條件。最後，「羅馬教廷乘機……重申禁令，命一切教士不得加入或參與任何政黨」。

在關於財政的協定中，意大利應允於批准和約後立付三九、三七五、〇〇〇元之款及五二、五〇〇、〇〇〇元之五釐公債。此種款項由教皇接受爲「教廷與意大利之財政關係（發生於一八七〇年之事件者）之最後清償數」。

互延兩世之久的政教衝突就此告一段落了。自茲以往，照墨梭里尼的話說，「國民就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是國民」。或如教皇所說，「上帝復歸於意大利，意大利復歸於上帝」。教皇不久就從梵諦岡宮出來爲意大利王室與世界祝福。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下議院將一八七〇年占領羅馬的紀念日從國家假日表上抹去，而代以拉忒藍和約的簽字日。

一九三一年，政府與教會間又有新的困難，這是因爲兩者對於各個的勢力範圍的問題發生齟齬之故。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庇護第十一頒佈了關於勞工的通諭。因爲這封通諭係公佈於教皇利奧第十三（Leo XIII）頒佈勞工通諭（*Rerum Novarum*）之第四十週年，故稱爲四十週年通諭（*Quadragesimo Anno*）這裏面深以「全部的經濟狀況已成爲非常艱苦，殘酷和無情」爲悲。教皇主張「公平的」工資，力言工人應得若干財產，並以爲工資勞動者在資本家的企業中應「分有若干種所有權，管理權或利潤」。共產主義被稱爲「討厭的東西」，社會主義與天主教是勢不兩立的。庇護極痛心於「可怕的失業之災禍」，並以之一部分歸咎於「過度的自由競爭」。

然而教皇恐怕他這種反對無限制競爭的怨言，被認爲贊成法西斯黨的制度，於是加一句道：「所可懼者，新的企業組合與合體的制度具有過分的官僚性質與政治性質，再者，儘管它有幾種普通的利益，它仍冒着達到特殊的政治目的而非有助於提倡較善的社會制度之險」。庇護又斷言「各種原來互相連接的好制度之破壞，已使社會實際上祇由各個人與國家而成」，而這句話祇能適用於意大利與俄國。

教皇的這種觀念是法西斯黨所不喜的。他們認為教皇對於經濟的與社會的事件，沒有下判斷之權。反之，庇護則以為教會決不能放棄它對於民族的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幸福加影響力的權利。因之政府與教會間的裂痕馬上顯然了，除此種爭論外，還有關於意大利的兒童教育及天主教徒團體的活動的意見衝突。不久，法西斯黨生開始毀壞教會的財產，踐踏教皇的畫像並攻擊神父。墨梭里尼藉口天主教徒行動社從事政治的活動，乃於一九一一年五月三十日封閉該社所有的一切會館，次日，又解散一切與法西斯黨無直接關係的天主教徒團體。

庇護否認「行動社」干與政治並譴責政府違背拉忒藍和約。他在一封公函中指斥法西斯黨的關於兒童教育的主張之不當，以法西斯黨「甚至於強迫幼童幼女舉行的」宣誓為「不法」，並慨嘆「以國家為偶像的真正邪教」之成立。他又訴說意大利的兒童正在被勸誘荒廢禮拜功課以便參加軍事訓練與運動。法西斯黨答覆他道，教皇既為外國的元首，他就沒有權利來干涉純屬內政的事情。墨梭里尼則宣稱「兒童一達學齡，即單屬於國家。教會不能分有之」。他又責備天主教徒行動社受業經解散的天主教徒人民黨的黨員的支配，這般人正在祕密準備謀顛覆法西斯黨。

有一個時期似乎一九二九年的協定會被扯碎了，但墨梭里尼和教皇不久就採取了合理的態度，並實行妥協。互相表示好意以後，到一九三一年九月，耶穌會的神父羅薩（Enrico Rosa）（一個激烈的反法西斯黨者）被免去意大利天主教徒所辦一種主要的評論雜誌的編輯職務，同時首先控告天主教徒行動社反法西斯黨的喬黎埃梯（Giuriatti）少校亦「辭掉」法西斯黨祕書長之職。此外，教皇將一千五百所重開的天主教徒行動社

俱樂部，交與每個主教管區的主教管理，不像從前一樣交與世俗人。法西斯黨答應將來重新排定軍事訓練與運動的時間表，俾不致與星期日的禮拜功課相衝突。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墨氏親自覲見教皇。這樣一來，在拉忒藍和約簽字後的第三週年紀念日，最新的政教妥協又經「正式奉獻」了。

國家主義與人口

我們已經再三指出，法西斯黨人是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他們正在力求恢復古代羅馬的國威，其中許多人並且讚美戰爭為國家的力量與元氣的象徵。法西斯蒂的文學充滿着如下的表現：「為戰爭三呼！」「戰爭萬歲！」「戰爭的本能是屬於人性的。」「戰爭是最有益的神祕表示。」「戰鬥為萬事之源。」一位「倔強的」大政論家卡利 (Cali) 寫道：「尚武的精神是意大利人的基本性質；這不是法西斯黨的發明，也不是戰後的態度。試查歷史，找得出我們沒有打過仗的一刹那時間嗎——無論為誰而戰，為何事而戰，都不關重要。」墨梭里尼本人在意大利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Italiana) 裏面所作關於法西斯主義的論文中，說道：「祇有戰爭將人類的精力帶到最高的水準，並將高貴的印捺在有膽量從事戰爭的人的身上。」

雖然目前意大利當局所表現的好戰熱狂比法西斯黨上臺後起初幾年的聲勢不大顯然，可是遊歷意大利的人仍為瀰漫於國家的與地方的活動之各方面的軍事空氣所驚。在一九三二年，意大利自誇本國的空軍居於世界的第四位，軍備費則居第五位。這樣一個尊崇戰爭並想如古羅馬帝國一樣擴大疆域的國家自然需要龐大的人

口。

意大利在一九二七年的人口估計爲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弱。據說墨梭里尼在那一年曾經向國會演說道：「如果意大利欲有所爲，而見重於世，則於本世紀下半葉之初它必須以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的人口出現。先生們，如果我們辦不到，我們就不能造成一個帝國，反而會變成一個殖民地。」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寫道：「在鍛鍊過，培厚過和開闢過的意大利，還有一千萬人的插足地。有六千萬意大利人纔會在世界歷史上占重要的地位。」

意大利政府根據「無數量即不能有質量」的學說，乃嚴厲禁止避妊術的傳授，重新限制向外移民，並課獨身者以重稅。在另一方面，各種想得出的宣傳方法都被利用來獎勵結婚與多生兒女，法定的結婚年齡規定爲男子十六歲，女子十四歲，在一九三二年，新婚的夫婦都得減出車費百分之八十乘國營鐵道的火車往羅馬遊覽。到一九三二年，估計的人口已增至四二、二〇〇、〇〇〇人。

在一個天然資源有限的國家，極端的國家主義與不絕增加的人口壓力合攏起來大概會成爲擾亂國際政治的原因。以祇有一二〇、〇〇〇方哩的面積，意大利的人口密度幾乎一方哩已至三五〇人，人口每有增加，生活程度降低及普遍窮困的危險亦必相應增加。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殊不足吸引外來的移民，甚至於如羅馬與那不勒斯之間的傍廷隰原(Pontine Marshes)那樣大的開墾地，也祇可望其容納十萬人。儘管政府運用英勇的和聰明的方法來增加國內供給糧食的能力，意大利的民食問題在最近幾年中變成更嚴重了。唯一的解決法

似乎在於土地的擴張——帝國主義。法西斯黨人未嘗不感覺到這一層，這從他們需要更多地方的無數暗示中可以看到。他們的感覺就是說，「意大利的人民必須在意大利的土地上爲意大利的富強而工作」，而「人口統計學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種種理由證明意大利的擴大疆域的志願是正當的」。

在哲理上，法西斯黨人也認帝國主義爲正當。我們再引用墨梭里尼的話來說：「在法西斯蒂的學說中，帝國不僅僅是土地上，軍事上和商業上的表現，並且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表現……法西斯主義認走向帝國的趨勢——即國家的膨脹——爲生機或活力的表現……」。這種精神已時時使意大利的外交成爲困難的事情。

法西斯黨的外交

在外交範圍內，法西斯黨政府總算有很大的成功，足以掩蓋該黨柄政前之歷任內閣所表示的「柔弱無能」。墨梭里尼採取一條勇敢的，有時是好戰的外交陣線，並使意大利深信本國爲世界強國之一。同時他又極着重陸海空軍的軍備。

也許意大利的外交關係中最困難而最感威脅的就是對法的關係。墨氏在戰後最初幾年中，很不高興看到成千成萬的意大利人羣集於法國去找職業。當法國鼓勵意國僑民歸化法國的時候，他更加惱怒了。法國也似乎有一個時期特別優待那般因不喜或畏懼法西斯主義而離開意大利的亡命客。再者，意大利人裏面顯然有一個明晰的感想，以爲全在法國的掌握中的科西加（*Corsica*）、薩伏衣（*Savoie*）、尼斯（*Nice*）和突尼斯（*Tunis*）諸

地應該「歸還」於意大利。法西斯黨人以意大利在和平會議的「正當」要求之被忽視及本國之不能取得任何委任統治地特別歸咎於法國。兩國曾經競爭西部地中海的霸權及海軍軍備的優勢。此外，法意的國交有好幾次因為意大利與法國的同盟國（尤其是巨哥斯拉夫）常起爭鬪而受損。在一九三一年，意大利一個高級官吏表明「小協商」（Little Entente）的特色為「在法國的將領之下的軍事同盟」。雙方在法意邊境上都曾從事於廣大的軍事準備。

土地為意大利所覬覦的國家不僅是法國一國而已。有一次墨梭里尼直指英屬馬爾太（Malta）島為「未恢復的意大利」之一部分，而瑞士政府也曾因法西斯黨人頑強地嚷着「歸還」用意大利語言的體基督那（Ticino）而大感煩惱。在一九二八年之春，英、法、西班牙三國邀請意大利共同管理摩洛哥西岸的坦支爾（Tanzier）自由城。

墨氏有一次說道：「西方有許多已具定形的民族國家，我們除派勞工往那裏去外，不能別有奢望——雖然甚至於派遣勞工一事有一天也會被禁止或限制」，因之他盡了種種力量來鞏固意大利在東歐的勢力。前面已經討論過，在一九二三年，羅馬確定地保有了多得卡泥斯羣島（Dodecanese Islands）。同年，法西斯黨人以極脆弱的口實想從希臘取得科佛（Corfu）島。阜姆則於一九二四年確實地拿到了。與東歐和中歐諸國所締結的友好，中立與商業的條約，亦經陸續簽字。

一九二五年七月，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簽訂了商業協定，依此協定，巨哥斯拉夫的國民在意大利取得若干

商業權利意大利則可以在巨哥斯拉夫某某幾個地方保有土地並許在巨國的意國商號得輸入本國的工人巨國人民對於意大利這種有力的「侵入」，反對的很多，所以這件協定到一九二八年纔得批准。此項反對論調一半由於嚴重的南斯拉夫領土回復運動的發展，這般領土回復主義者的目標即在從意大利取得達爾馬提亞的大部分。此外，隨着又發生好幾件暗殺案和暴行，於是兩國的關係在非常緊張之下挨過去。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的爭鬪，其實就是對於亞德里亞海霸權的爭奪，更因意大利確立其保護權於阿爾巴尼亞而劇烈了。（註）

（註）見下節。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在一九二四年所簽訂的五年友好與中立條約至一九二九年滿期時未經續訂。

在一九三一與一九三二年，意大利鞏固了它在戰後的親交政策之定向。它和法國、波蘭及小協商諸國日益疏遠，漸漸對英、德、奧、匈、土及美國表示友好。（註）墨梭里尼在「向羅馬前進」的第九週年紀念日（一九三一年十月）對十萬民衆演說，主張（一）爲謀以前的中歐同盟國與意大利的利益而修改和約；（二）重新整理賠款及協約國間的戰債；（三）成立多瑙河流域的協調以改良中歐與東歐的經濟狀況；及（四）馬上進行裁軍。六個月後，法西斯黨最高會議頒佈了關於這四點的文告。

（註）意國外交大臣葛蘭第（Grandi）於一九三二年聘問美國，次年，意國參與華盛頓二百年誕辰祝典。同年，意大利貸與土耳其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以資助該國的三年工業計劃。

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外交大臣葛蘭第特別聲明重行分配北非土地之必要。他說，「假使在大戰結束時意大利的同盟國於分配委任統治地的當兒已藐視了它，它現在就必須更加苦幹，來表明它爲文明的利益計在殖民

地所能盡的真正力量」在作此項聲明後的兩個月內，墨梭里尼再度自兼外交大臣之職。他的目的顯然是在使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更加有氣力。

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

一九一二年與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的結果之一，即為一個新國家的出現：阿爾巴尼亞（Albania）。德國尉德諸侯威廉（William of Wied）被選為阿爾巴尼亞國王（Mpret）。他沒有多大才幹，不能統治這個多山的國家和它的頑強的人民，所以當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就逃回德國。在戰爭期中，阿爾巴尼亞是正式中立的，但奧人、意大利和塞人都利用它為公共戰場。在巴黎和會，意大利想取得阿爾巴尼亞為委任統治地，可是威爾遜大加反對，並叫土人組織自己的政府。

一九二〇年一月，一個不穩固的臨時政府成立了，它集中它的力量來驅逐外國軍隊。到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意軍撤退，是年十二月，阿爾巴尼亞成為國際聯合會會員國。一九二一年，大使會議為阿爾巴尼亞劃定暫時的疆界。後來又經國際調查團加以變改，最後經過一九二六年的幾次國際協定之簽訂，確定為現在的界線。阿爾巴尼亞的面積約一七、四〇〇方哩，其人口在一九三二年估計為一百萬以上。

臨時政府的生存常在風雨飄搖之中，但在大局混亂的當兒出現了一個著名的人物，即名阿默德·佐古（Ahmed Zogu）的年輕的回教徒親王。一九二二年，佐古為阿爾巴尼亞首相，一直做到一九二四年六月，然後被

主教諾利(Nico)趕下臺，並被迫亡命國外。諾利會肄業於哈佛大學，爲阿爾巴尼亞獨立的希臘教會的首領，他不能維持國內的秩序，凡所設施，祇爲自己的顛覆開先路，所以不到年底就下臺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佐古回國，諾利逃往意大利。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阿爾巴尼亞宣佈成立共和國，間接選出的國民議會選舉佐古爲第一任大總統，任期七年。

佐古就總統職後，着手鞏固自己的權力，但不久他就覺得非向意大利乞求經濟的援助不可。一九二五年，因意大利的倡議，成立了阿爾巴尼亞國家銀行。此後不久，意大利貸與新共和國一千萬元之款，以阿爾巴尼亞之關稅收入爲擔保。接着又有其他的交易，意大利馬上居於支配阿爾巴尼亞的優越地位，並因之而控制着俄特蘭陀海峽。巨哥斯拉夫自然極力反對此種凡足以危及其出入地中海之自由的計劃。我們當記得，構成舊塞爾維亞人對於奧匈聯合帝國之不平的，正是這個要因。

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時期內，阿爾巴尼亞以意國的借款並在意人所組織的團體稱爲 *Spartan* 者的監督之下實行了許多內部改良，同時阿爾巴尼亞的陸軍亦由意國的軍官改編。佐古在一九二六年又遇到一次嚴重的革命，乃再度向意國求援。這一層，墨梭里尼預備答應——但須有代價。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兩國簽訂了提蘭那條約 (Treaty of Tirana) 依據其中條款，「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認爲凡謀危害阿爾巴尼亞之政治的、法律的與土地的現狀之亂事皆有反兩國相互的政治利益」爲保障此項利益起見，兩締約國「承諾彼此援助與合作」。兩國「又承諾不與其他國家締結凡足損害他方之利益的政治協定或軍事協定」。條約後

面所附一函復給與意大利遇阿爾巴尼亞請求時干涉該國之外交與內政的權利。

巨哥斯拉夫大爲此種事變所驚，乃乘邊境上發生事故作某種軍事準備。一九二七年六月，當巨哥斯拉夫派駐杜拉佐（Durazzo）使館內的一個職員因犯偵探嫌疑被逮時，巨國和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係就告斷絕了。意大利卻偏袒阿爾巴尼亞，戰事似乎迫在眉睫了。後經幾個中立國家出面調停，這件事總算未訴諸武力，但巨哥斯拉夫此刻切於向法國訂立同盟了。此舉完成於十一月十一日。翌日，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也簽訂了二十年的軍事防守同盟。

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佐古自立爲阿爾巴尼亞國王，號佐古一世（Zog I）。次年，一個意大利公司從新王取得了重要的煤油開採權，一九三〇年，兩國又訂立一個協定，據此協定，意大利銀行得監督阿國的幣制。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滿期的提蘭那條約，也續訂了。

那個小王國依然是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兩國間的糾葛的隱伏原因，特別因爲佐古有好幾次暗示過謀殺本人的陰謀正在巨哥斯拉夫境內進行着。一九三一年二月，佐古方在維也納就醫，有一天幾乎被他的兩個政敵狙擊而死。一九三二年九月，有三十五個阿爾巴尼亞人，大多數爲知識份子，被判犯有謀害國王及企圖建立共和國之罪。儘管巨京柏爾格雷德（Balgard）屢次否認佐古仍諷言，此種不幸的事件係巨國所鼓勵。然而，因有意——阿的同盟條約，意大利在亞得利亞海兩岸的優勢終究得到擔保。

第十四章 西班牙

歷史的要因

地圖表明着西班牙白格拉那達 (Granada) 失陷時 (一四九二年) 起就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那時許多本地的基督教君王 已克復回教民族摩爾人 (Moors) 於七一一年與七一八年間所占領的土地了。然而實際上，西班牙人 很少或簡直沒有統一的語言，思想或習慣，完全不是一個純粹同一的民族。一四六九年亞拉岡的斐迭南 (Ferdinand of Aragon) 與卡斯提爾的伊莎伯拉 (Isabella of Castile) 的結婚 (此舉預兆西班牙兩個大王國的合併) 大為當時的幾個政治家所反對，因為這兩個民族間有很大的差異。非常阻塞的地理狀況及因對抗摩爾人 所致的幾百年孤立的邊境形勢，產出了一種高傲的地方觀念的結果。在各時代，外國的侵略，有如十九世紀之初拿破崙 的入犯，曾經帶進一種好戰的初期國家主義，但通常「地方的稗官野史仍舊是一般人的精神生活的中心與來源」。愛國心，在西班牙 似乎還是「一種反映着該國地理上之區分的地方事件」。

構成早期的現代西班牙 之人口的兩種最實際的成分，是猶太人和摩里斯柯人 (Moriscos)。(註) 前者常為國王的收稅吏，在商業界頗為活躍，並且知道如何將其資本投於最生利的企業。摩里斯柯人 具有他們的祖先寄

居北非洲時所得的經驗，很熟練於灌溉與開墾的技術，並盡過很多力量來改良畜產物並增廣棉花的種植。這兩種民族被武力驅逐後——猶太人被逐於一四九二年，摩爾人於一六〇九年——（大半爲了宗教上的緣故），所留下的人民完全不同了，他們的領袖酷好冒險和炫耀，頗有輕視勞動爲不名譽和不莊重的事情之傾向。

（註）格拉那達失陷後留在西班牙的摩爾人稱爲摩利斯阿人。

那般在其他國家成爲中等階級的民族構成分子，在西班牙就常常以爲勞力祇適於異教徒和猶太人。至於有些不顧流俗的憎惡而從事於商業的人則爲經濟上和社會上的無能力所累。因爲寺院與貴族通常都被豁免賦稅，又因爲多數的土地藉國王的賞賜或購買漸漸歸於這些享有特權的階級，所以對於殘存的商業和工業所課的稅必然是苛重非常。雖然他國的統治者很巴給中等階級，大多數西班牙的君主都阻礙其發達。非常保守的軍隊與教會倒被認爲王國的柱石。一直到查理十三世（Charles III）朝代（一七五九——一七八八年）中等階級纔稍稍擡頭，但也祇是一個短時期的事。

同樣的短視在殖民地方面亦很顯然。祇求開發殖民地的礦物而不注意於其農產的慾望，使美洲的西班牙人和國內的同胞一樣大受影響。他們在新世界中所最關心的是貴金屬而非穀類；是山嶺而非肥沃的流域；是寺院而非貿易場；少數寧擇耕種與畜牧爲職業的殖民地人民，都被許多重商主義的法規所阻撓和限制了。

就是在它的黃金時代，它本身也包藏着衰微的原因。西班牙在十六世紀的榮華大都得力於少數有爲之君的宵旰勤勞和不勞而獲的金銀之從美洲流入，但這種光輝在以後數世紀中就不能維持下去了，因爲政府當局

不能使其經濟狀況適應變遷的世界經濟情形。他們又不將所流入的貴金屬變爲有永久利益的媒介物，或作商業與工業的投資，而以之浪費於奢侈的賽會及花費很大的外交政策與宗教政策。

關於西班牙自一五〇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發展所受的腐蝕的影響，列舉起來是一張很長的目錄。軍事上重大的損失，大批殖民地冒險者的向外移居少年男女聚集於遍地皆是僧院與尼菴討生活的熱誠，流俗對於外國僑民的敵意（甚至於在查理士三世朝代因政府的鼓勵而來西班牙者亦受同樣的嫉視），礦產的比較貧乏，及文盲的百分數之過高，這一切都足使西班牙王國在經濟上和社會上變弱。從經濟的立足點看來，天主教教會的勢力特別有礙進步，因爲它堅定地維持政治與社會的現狀。

在這幾百年中，政府又袒護牧羊業而特別歧視農業。一個很有勢力的畜牧公司（The Mesta）係開辦於中古時代，到十九世紀中葉仍存在。西班牙人不注重土壤開墾的責任大部分當由該公司負之。政府又特許該公司使用廣大的「王家牧羊場」，人民不得耕種或圍圍其一寸之地。因之，「自四月起，大羣的羊每年蹂躪卡斯提爾，到九月纔回到所從而來的地方」。

所以，西班牙的經濟生活，在發現美洲與美西戰爭之間的大部分時期內，是以飢餓不安、物價昂貴、腐化、財政失其均衡、賦稅制度之大不平等、政府之干涉商業、流行的地域主義及衰敝的貴族傳統等現象爲特徵的。一八九八年之敗績（指美西戰爭）祇是不健全的過去所生的不幸的和當然的結果。

我們記住以上所述西班牙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種種困難的大略情形，就不難明白該國在二十世

紀初年的悲慘的光景。自一八九八年的戰爭結束至世界大戰開始的十五年中，國內幾乎不斷地呈現着騷亂的現象，如暴衆之攻擊教堂，寺院與警察隊；大罷工；戒嚴法；殖民地之叛亂；政治暗殺；憲法保障之停止；及無數的軍事陰謀。一直到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此種不穩的徵候纔暫得中止——於是又發生在大戰中究取何種途徑的問題，這個問題重新激起了全國人民的不安和紛爭。

西班牙與世界大戰

雖然在一九一四年，國王阿爾方朔十三世（Alfonso XIII）（他的母親爲奧人，妻子爲英人）很難決定同情於那一方面，西班牙人民卻馬上分爲兩個相對的黨派。許多知識分子及一般具有自由主義趨向及反君主與反教士的思想的人，贊成擁護協約國的主張。全體的保守分子則大概表同情於德人，其中有些人並且反對法人在摩洛哥的勢力，及法國對於教會在國家的地位的態度。那般愛國家也是親德的，他們一想到英國之霸據直布羅陀（Gibraltar）是戰爭的結果而非由於自動的割讓，就很痛心。

在種種情形之下，最安全的決定辦法就是保守中立，一九一四年十月，西班牙國會（Cortes）就這樣議決了。這個政策的聰明，在交戰國兩方都開始向西班牙訂購大批軍用品的時候，便顯然可見。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西班牙的輸出之額溢輸出之額甚多，它在一九一三年的貿易差額是不利的，入超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到一九一八年就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出超了。然而在一九一九年之後，情形又反轉過來，變爲入超。

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激增的工業與運輸業，當能使西班牙比較繁榮和安定，其實全不是那回事。在大戰時期中，就換了七個內閣，此後五年內，旋起旋仆者又有十來個。無論自由黨的，保守黨的，或聯合的政府，都不能措國家於盤石之安，或使有進步。此種不安的現象，可追溯到四種主要的發展：(一)勞動階級的不滿和漸起的過激主義；(二)強有力的地方主義者與分離派的運動之存在，尤其是在加達魯尼亞 (Catalonia)；(三)軍人議會 (military juntas) 之干政；及(四)鎮壓西屬摩洛哥的叛亂的軍事之繼續不利。現在必須將這四個要因加以詳細的討論。

國內的不安和殖民地的戰敗（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

雖然勞工的不安是全國的普遍現象（特別是在一九一六年後），在加達魯尼亞卻最為顯著，那裏經濟的困難和地方主義者的不滿合攏來使反政府運動格外嚴重。^{〔註〕}在一九一七年，加達魯尼亞（特別是以工業著名的巴塞羅那省 Barcelona）發生代價很大的罷工。七月十七日，國會中加達魯尼亞的議員申斥政府，並在巴塞羅那省舉行特別會議，要求關於統治和待遇本區域的種種改革。他們訴說，巴省的工業不勝苛捐雜稅之重負，而出自此種重稅的國課，非被浪費於國都馬德里 (Madrid)，即為種種公共改良而消耗於他省。

^{〔註〕}加達魯尼亞位於西班牙的東北部，由四省而成，包括巴塞羅那的工業中心，土人都用加達魯尼亞方言。

加地議員舉行會議後，接着就發生巴省的大罷工，結果當局不得不使用機關鎗來恢復秩序。此外，政府又允

許擴大地方分權制度，普選參議員，及廢止政府停止憲法之保障與解散國會的獨斷權力，以圖和緩人心。然而這種讓步來得太晚了。大戰一告終，西班牙的混亂日益增加，激盪於歐陸的民主政治之波浪鼓勵着人民提出許多改革的要求。危急的事件很迅速地連續發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加地的國會代表團發佈了一篇宣言，要求建立「自治的加達魯尼亞政府」，設有自己

的議會，負責的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加地的語言當成爲「唯一的國語」，該區域應聯合「其他西班牙民族成立一個聯邦國家，專管外交、陸海軍、幣制、度量衡、貿易、關稅、交通等事」。這般地方主義者希望將這篇宣言書呈遞於在巴黎和會的威爾遜總統，但他們恐怕政府的武力和王國其餘區域的輿論反對，因之此舉未能實現。反之，一部分分離派人卻強硬地宣佈非博得絕對的獨立不止的決心。

這篇宣言所引起的騷動還沒有平息，另外一個總罷工（一半爲社會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的宣傳所挑起）又在巴塞羅那爆發了。於是一切憲法上的保障皆因之被停止，使事情更糟者，文職機關與軍事當局又因爭執終止罷工的方法，大起衝突。街市戰於罷工者，破壞罷工者，警察與兵士之間，發生了大流血，其他地方也有同樣的慘劇。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西班牙雇主聯合會揚言欲發起全國的同盟休業運動，除非政府運用中和的手段來待遇雇主與工人。一九二〇年顯然爲真正恐怖的一年，到一九二一年三月，首相正從事於調和國會中幾派人的工作時，忽然爲人暗殺。

內閣的存在既常爲勞工的事變與地方主義者的搗亂所危，更因許多軍人議會的活動而愈不穩固了。這些

軍官所組織的議會批評政府的政策，企圖干涉民政，並從事妨礙政府關於摩洛哥局面的策略。他們的惡作劇非常使人難堪，首相摩拉（Maura）不能復忍，乃於一九二二年一月設法解散他們。可是國王反對此舉，因之內閣又倒了一個（註）

（註）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軍人議會終被解散。

在這幾年中，西班牙軍隊在摩洛哥征勦叛黨里夫人（Rif）的戰事又告失敗。軍隊打敗仗的次數愈多，所課於國內人民的捐稅愈重，而兵役、檢查制度和對於個人的限制的壓力也愈大。這個危局終於一九二二年達到極點，那時前任摩洛哥高等委員貝倫伽（Berenguer）將軍發表了攻擊政府的驚人文字，並要求審判他自己的行為，作為徹底調查殖民地軍事大失敗的一方面。他責備內閣犯有溺職，無先見之明，及怠忽之罪。

貝倫伽的控告，加上人民的感覺——以為摩洛哥戰爭已損折若干萬生命和幾百萬佩斯大（Peseta，西班牙銀幣名），把全國的忿怒激到白熱的程度。此外，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安努爾（Annual）地方所發生的辱國事件（在此役中，阿布的·克利姆（Abd-el-Krim）所統率的幾千里夫人把一枝西班牙的精銳軍隊打得大敗，殺死二二、〇〇〇人，生擒一〇〇〇人，西軍司令西爾維斯德（Silvestro）將軍自戕），促成了一個新危機。於是國會指定了一個二十一人之委員會，在畢伽梭（Picasso）將軍主席之下，從事調查政府的行為。

當十萬兵士仍在摩洛哥慢慢地和叛軍抗戰的時候，畢伽梭委員會舉行了幾次會議並審查在西班牙和摩洛哥所得的證據。到一九二二年夏天，該委員會草成報告書，並以之提交內閣會議。報告書的內容關係很重要，所

以馬上就被禁止公佈。

雖然報告書所列舉的罪狀和意見未經披露，不過大家相信其中大概牽涉到很多最高官吏，甚至國王本人亦在內。報告書中似乎建議對於在摩洛哥的若干將領及在國內的幾個大臣應處死刑。國王則被指摘犯有直接傳送攻擊令於西爾維斯德將軍，而不以之由陸軍部及摩洛哥最高司令部轉達的過失。當時謠傳該項報告書主張改變國體。其餘的告發條款有關於西爾維斯德將軍的酗酒，幾個軍官之擅離北非職守而赴本國瑪拉加（Malaga）地方之宴會，某將軍之私設商店於得土安（Touan）以便出售盜得之軍火，及兵士時時被迫以重利向軍官借錢以購買他們自己的食物等等的。

當人民曉得那篇報告書不但被祕而不宣，其中的條陳大概會為政府所忽視的時候，全國紛紛舉行抗議的會議。再者，國會與報界此刻亦要求馬上公佈告發條款的全文。政府恐怕發生政變，乃急行解散國會，並下令開始選舉。然而新選出的國會的脾氣，與舊國會初無異致。

使當局更感困難者，即國內又連續發生工人的罷工及過激派的暴動。單在巴塞羅那一地，截至一九二二年九月止的那一年中，街市戰與復仇行動雇主與工人的傷亡之數共為七七一，其中死者三三七人，傷者四三四人。地方主義者的運動亦有增加，法西斯黨在意大利奪得政權的消息更使人心奮激。所以，當巴塞羅那省總督里維拉（Riviera）將軍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三日起而推倒政府，停止憲法之施行，並自立為西班牙的軍事獨裁的時候，一般人毫不驚異。里維拉為鞏固其獨裁權力起見，於本人外另委八個陸軍上將和一個海軍上將組織執政

內閣。雖然當日推翻政局的策略，顯然爲針對西班牙的古舊政制而發，而非不利於國王，但那時誰也不曉得他的計劃實際上是爲國王阿爾方朔所知並且得他同意的。國王曾經小心地藉故訪問法國，待政府顛覆之後就立回首都馬德里，然後要求里維拉自立於軍人政府之上並提出必要的改革。

獨裁政治（一九二三—一九三〇年）

厄斯得拉侯爵（Marquess de Estella）里維拉以一八七〇年生於加的斯（Cádiz）。當美西戰爭之際，他從軍於古巴和菲律賓作戰，自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則在摩洛哥作戰。在一九一五——一九二三年的時期內，他歷任加的斯、馬德里和巴塞羅那的總督。他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和仁慈的人，所以有好幾次和高級長官發生衝突，爲了反對不必要的屠殺摩洛哥的兵士。事實上，他有一次曾經主張退出北非洲——大概以作直布羅陀之交換品。

自奪得獨裁的政權後，里維拉立刻下令解散新近召集的國會，擄取大部分關於摩洛哥辱國之役的重要文件，嚴格檢查新聞與言論，廢止陪審制，掃除地方自治的殘跡，發行國庫券以舉借內債七千萬元，並採用「國家、君政、宗教」的標語。他對於宗教的眷顧，馬上博得了強有力的天主教教會的好感。

他不久發現要建立一個強固的，同時又能使人民滿意的政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民衆對於獨裁制與君主政體的敵視因種種不幸的事件，如省議會之被解散，摩洛哥的危難之無止境，人民犯小過者之被科重罰，及幾個

共和黨人（尤以著名哲學家烏那孟諾（Unamuno）為著）之被放逐等等日漸增加。再者，極端的檢查制度觸怒了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其中有許多人開始口誅筆伐來抨擊政府。例如在一九二五年之初，有幾千萬分著名小說家伊本納士（Ibáñez）所寫的反君政的小冊子，從飛機上散發於西班牙各城市。

然而，自一九二五年開始，里維拉將軍就採用了博取輿論對於獨裁制的贊助的政策。自政變以來施行的戒嚴法令於一九二五年廢止了。三個月後，政府慨然以巨額的年金資助海運業與造船業。十二月三日，軍人執政被裁撤，代以文人內閣，閣員皆為「愛國同盟」（*Unión Patriótica*）的分子，這個同盟是由里維拉贊助而創立的新國民黨。此外，政府又用種種方法求得實業界的好意，如設置（一九二七年）全國工業生產統制委員會，祇有該機關可以核准新工業的創辦或舊工業的擴展或改變；訓令（一九二七年）西班牙煤炭消費者應從國內供給額中取得其需要額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通過扶助商業航空的法案；及設立全國經濟部。

除上述者外，政府又盡了很多力以仲裁解決勞工的紛爭，分裂若干大地產，並推廣國民教育。為討好加達魯尼亞人起見，保護的關稅稅率也提高了。自從全國勞工聯合會的幾個領袖被任命為公務員以後，得到了一部分勞工階級的擁護。國民參政會亦經召集（一九二七年九月），以代業經解散了四年的國會，作為對於立憲主義者的讓步。參政會的議員四百人皆由政府直接或間接任命之，其本身祇有諮議的權力，但到一九二八年，它奉命起草新憲法，以代替雖經停止施行但仍為有效的一八七六年的舊憲法。

為求得國家主義者的擁護計，政府實行強硬的外交政策。一九二六年八月，西班牙與意大利簽訂了友好條

約，其中規定任何一方遇他方受第三國（假定上爲法國）攻擊時應保守善意的中立。一個月後，西班牙送達通知於國際聯合會，述明退出國聯的意思，因爲國聯拒絕了它的任國聯行政院常任理事的要求。（註）最後，摩洛哥的局勢轉好，政府已能操縱一切，雖然這個結果大半由於阿布的·克利姆一方面戰略上的失算。

（註）見下章。在一九二八年，正在規定的退盟通知兩年之期屆滿前，西班牙復通知國聯，願仍爲會員國。

阿布的·克利姆因欲遂行其對於摩洛哥國王一稱號的要求，並附帶報復法人干涉其軍糧運輸之仇，乃鑄成同時攻擊法軍與西軍的大錯。法軍因在裝備、編制、指揮和資力上都占優勢，並有西班牙的援軍加入，所以不難將殖民地的戰事很順利地加以結束。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阿布的·克利姆投降了，在次年内，里維拉遂能宣佈摩洛哥業經完全「肅清」。那時西班牙已耗去了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軍費，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十年之期內，每年損失的生命平均爲一萬三千人。

儘管政府有以上的成就，一般不安的徵兆仍非毫無。在一九二六年，礮兵團中因爲憤於將士的升級非由資格與功績，而由奧援，發生兵變。同年，建立獨立的加達魯尼亞的陰謀幸爲法國警察所撓，幾個越過邊境的分離派領袖遭法警逮捕。在一九二八年，另有一個陰謀——顛覆里維拉的陰謀在巴塞羅那敗露，而一九二九年一月間又發生提烏達·累阿爾（Chindad Real）的礮兵團的叛亂。變兵反對不公平的擢升方法並要求廢除獨裁政治。政府爲懲罰叛亂計，將該團臨時解散，且將礮兵學校停辦。六星期後，幾萬大學學生因反對嚴厲的檢查制度及馬得里工科學生之受虐待，實行大罷課。事情因大學之被封閉及若干教授之遭罷黜祇有弄得更糟，不久，政府認爲

必須暫時關閉馬得里、薩拉曼加(Salamanca)、法拉多利(Valladolid)和其他城市的一切高等學校的大門了。再者，在這幾年中，謀刺國王與迪克推多的案子層出不窮。經過這些表現，共和主義的潛流漸漸得勢。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八日，經過六年多的危難之後，里維拉突然辭職，和他突然上臺一樣。他辭職的原因很多，身體的孱弱，本人與國王的齟齬，常有的混亂，幾千大學生因政府對於天主教學校的徇私而重起的學潮，及十七個新近任命的司令官之不肯表示對於本人的信任，在使他灰心，非下臺不可。他在告別書內臚陳他的功勳，如肅清摩洛哥，掃除恐怖主義與分離主義，恢復國家的繁榮與威信，及召集國民議會等是。然而他的政敵以爲他功不掩過，他們着重他的忽視立憲的主張，不能終止政界的腐化，挽救財政與經濟的恐慌，和洗刷西班牙在世界的眼光中的污名。(註)

(註)里維拉將軍於辭職後還不到一個月就在巴黎逝世。他的遺體被迎回西班牙，並受國葬的榮典。

里維拉退休後，繼任首相者爲貝倫伽將軍，這位將軍就是在一九二二年要求調查摩洛哥事件的人。他對於國王很忠心，但缺乏領袖的才能，所以被注定失敗。雖然他就任後就放鬆新聞與言論的檢查，並對於學生的要求取妥協的態度，可是當着世界的不景氣，他不能夠使國家趨於繁榮，爲一切勞動者找到職業，及以麵包施於饑饉的人。在他的計劃還沒有擬定的時候，巴塞羅那、馬得里、薩干塔(Sagunto)和其他的城市又發生學生的騷擾和風潮，對於幾個市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活動與無能的控告如雪片飛至。復次，一部分加達魯尼亞人因不耐隨現政府而至的困苦艱難，猛烈地進行「加達魯尼亞主義、自由主義、民主政體和共和主義」的運動。

國王和他的內閣在一九三〇年拚命設法恢復人民的信任。國民參政會雖被解散，但政府許於一九三一年舉行新國會的選舉。政府爲扶助農人起見，下令停止小麥之輸入。對於製造品所徵收的稅率也提高了。阿爾方朔誓言將來軍隊中的陞遷當以資望與功績爲定。里維拉政府「非法」所科的幾種罰金則經發還。政府對於人民言論與集會的自由亦作若干讓步，並禁止警察沒有證狀搜查住所。

但以上一切都是徒然的。增加的言論自由適足以表明共和主義的思想已成爲燎原之勢。人民不再希圖王室的恩典了；他們祇是要求國王遜位。一九三〇年九月，馬得里的鬪牛場有兩萬民衆舉行大會，狂呼建立共和國。一個月後，巴塞羅那大學的學生公然大喊「打倒國王」的口號。十二月間，軍隊中又起叛亂，這一次是航空隊的兵變，接着一個南方窮地主之子，柴謨拉（Zahora）所領導的，尙未成熟的共和革命爆發了。到是年之終，有一萬反對君政的人被捕下獄。（註）

（註）阿爾方朔對於「大學城」建築計畫的資助，更使共和黨人、反教會派人和社會主義者憤怒，他們認爲這一個天主教徒的新的偉大學術機關之建築，實爲一般「開明的知識份子」所已建立的文化中心之打擊。

至此，我們也許應該略一言及阿爾方朔第十三的性格。這個布邦（Bourbons）與海布斯堡兩王室的後裔是位頂傲慢專橫的人，同時也很勇敢，於遊戲競技無所不精，並有巧答之才。他喜歡攬權獨斷。「國會的無生氣和政客的卑劣」在他的眼睛裏是輕蔑的對象。第一，他自稱爲西班牙的愛國者，有一次他曾暗示一切重要的問題是關於西班牙的，而非關於王國或共和國的。他在位多年的環境非常人所能堪，假使換一個柔弱的人來處他

的地位，也許早已退讓或逃走了。

到一九三〇年，王國的繼續存在顯然有賴於三種力不足恃的因素：大部分軍隊的忠心（軍隊中每三百人有一將領），殷富的地主與教會的擁護，及反對派的內訌（當時已有二十三個共和黨的組織）。反對延長舊政體之生命的人大概有以下幾派，一為地方主義者和分離派，他們不贊成將政權集中於首都馬德里；一為社會主義者和「新工業主義者」，他們渴望改變社會與經濟的制度，使適應二十世紀的需要；一為知識分子，他們到處鼓吹，反對教會的勢力及中古狀態的精神生活；一為共和黨人，他們深恨軍人的權力和保王黨人違背憲法的行為。一九三一年早被注定為思想不同的各黨派間決鬪的一年。

西班牙共和國

一九三一年二月，首相貝倫伽恢復其前任者於一九二三年所停止施行的憲法，並下令舉行國會選舉。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人民對於這個消息卻報以憤怒。差不多一切反政府的黨派都聲明他們除投票召集國民議會外，拒絕從事任何選舉。他們又無意於參與復活一八七六年的憲法的運動。貝倫伽因之辭職，柄政了剛好一年，由海軍上將阿士那（Aznar），另外一個忠於王室的人繼任。他上臺後，就頒發命令，預備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先舉行各省市的選舉，然後全國選舉新國會，以便草定一個新憲法，雖然是君主政體的。

不幸四月十二日的市區選舉造成共和黨的勝利。這使當局大為狼狽。阿士那也因之辭首相之職（四月十

三日)於是柴謨拉代表共和黨的議會聲言,除非國王遜位,將有武裝的革命十四日,阿爾方朔在喀他基那(Cat. Valencia)買棹離國,逃往法國他並未正式遜位,祇是『停止王權之行使』讓本國人民自由決定到底是保存王國或另建共和政體。可是柴謨拉馬上宣布成立共和國,被推為臨時大總統,並以行政權委託於以前選定的溫和派共和黨人與社會黨人的聯合內閣。(註)

(註)柴謨拉總統在早年是一個君主主義者,曾經三次為王國內閣的大臣。然而,當里維拉獨裁之際,他就改奉共和主義了,到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他領導那一次沒有成熟的共和黨的革命,遺在上面已經提到。

新政府規定六月二十八日為選舉國會的日期,並擔保進行土地與教會的改革,保障個人的自由,及允許地方自治。雖然大多數政黨決定等待選舉的結果發表後再採取重要的步驟,臨時政府在本身成立後最初十個星期內卻忙於鎮壓反共和運動和共產黨的騷擾,籲求加達魯尼亞的分離派不要損害國家的統一,及通過緊急的預備法律。許多從前王室的官吏皆遭監禁,貴族的權利亦被廢止,共和國國旗則改為紅黃紫三色。(註)

(註)在廢止的四千二百種貴族權利中,約有三百五十種是屬於大公(Grandes, 西班牙的最高一級貴族)的,這般大公享有當國王前不脫帽的特權。

其他兩種嚴重的發展,使新政府於選舉前不得不加以注意。第一,有些教會職員籲求天主教徒祇投願意保護天主教者之票時,反教會的亂事就促成了。全國的教堂,寺院和尼菴都被焚燬和搶劫,值幾千百萬「佩斯大」的財產大遭破壞,各教派(特別是耶穌會)的會員的生命亦在堪虞。柴謨拉政府對於此種直接行動的計劃不

大表同情，到後來終究宣布了戒嚴令，企圖儘速恢復秩序。

第二，一部分加達魯尼亞人，大半爲過激的工人（他們恐怕將來的國民議會是保守的或充其量是溫和的，他們又認任何馬德里政府爲可憎的），宣布成立自治的加達魯尼亞軍政府，選舉馬西亞（Maçia）爲總統，並草定自治法（Statute of Autonomy），作實際獨立的準備。所以，自始就顯然，西班牙的「愛爾蘭問題」會起而擾亂共和國國內的和平，有如它在王國一樣。再者，加達魯尼亞的運動鼓勵着其他區域（特別是巴斯克州 Baïque 與加里西亞 Galicia）也向中央政府要求多量的地方自治權。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各處人民羣集於投票的地方，從事於一九二三年後第一次的全國選舉。議員候補者代表着二十五個黨派，其政見各各不同，自極右的君主主義至極左的共產主義。投票的結果又證明了君政派的大敗及共和派的勝利。社會黨獲得一百十七個席次，成爲新國會中最大的一黨。主張鞏固共和國並完成許多改革的急進黨則居第二位，有九十三個議員，四百七十個席次的其餘之數則爲其他十二個黨所分有。雖然此次選舉祇准男子參加，選出來的議員中也有兩名是女子。議員中大多數爲青年人，僅有十四人從前曾當過議員。國會開會後，先議決維持柴謨拉所派定的臨時內閣的政權，然後進行討論共和國的憲法。當憲法草案正在一條一條的被接合攏來的時候，內閣則致力於解決更直接的問題。它盡了很大的力量來穩定貨幣，遂行行政上的緊縮政策，並增加政府的辦事效能。有一半文職官吏被罷免，其餘留下來的的人的薪俸則增加了五分之一。柴謨拉總統費了很多的口舌，纔說動加達魯尼亞州的議員留在國會，並答應先成立關於中央政府的權力的協定，然

後商議關於地方的，蓋當時加達魯尼亞州民衆投票的結果大半贊成前述的自治法。即令如此委曲求全，政府終不得不於九月間派遣一萬兵到巴塞羅那去討平過激派與地方主義者聯合的作亂。

此外，政府又得與羅馬教廷進行關於革命初起時教會財產所受的損害及共和國的將來政策的談判。因為西班牙全部非天主教的人民還不到三萬，所以政府與教皇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當國會於十月間採取廢除國教，驅逐耶穌會會員，沒收其財產，並禁止各教派中人傳教或經營商業等決議案的時候，大總統柴謨拉就辭職了（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他的行動乃表示對於他所認為不當如此嚴酷的條件的抗議。

行政元首之職於是落到阿紮那（Azaña）的身上，他是急進黨的黨魁，並做過柴謨拉政府裏的陸軍總長。他做陸軍總長的時候，因能使軍隊民主化並使之從政治的爪牙變為國家的干城而博得盛名。國會對於他的能力與忠直既很信任，所以賦與他鎮壓叛亂與暴動的非常權力。

十二月九日，國會最後公布了新憲法。它雖是以德國、俄國和墨西哥的藍本所草成的，卻是現代最合乎民主政體的根本大法之一。西班牙被稱為『各階級勞動者之民主共和國』。政府包括一院的國會，國會議員由年齡滿二十三歲，不分性別之一切國民，以平等、直接、祕密的投票權選舉之，任期四年。共和國的總統由全體國會議員所組織的選舉團與同數（四七〇）的民選選舉人共同選舉之，任期為六年。總統職不得連任，凡現役或預備軍官、教士或任何國家之王族中人均不得為總統候選人。總統的權力是很大的，但其行為非經內閣閣員一人副署，不發生效力。總理與內閣閣員有廣大的權力，直接對國會負責。再者，國會於每年中祇可被停會兩次，於每一總統

任期中祇可被解散兩次。

新憲法中關於社會與文化的事件，打破傳統法式的地方很多。國家教會沒有了；完全的信教自由業經規定了；婚姻得以雙方之同意或因任何一方具有正當理由之請求解除之；教育脫離宗教而還俗了；人民的各種自由，除在國家緊急之時外，得到保障了；本國所有一切藝術的和歷史的寶物皆置於政府保護之下，政府得禁止其輸出或要求收用之。戰爭『被否認爲國家政策之工具』，大總統雖具有宣戰的權力，但『除遵照國際聯合會盟約中所規定之條件外』，及除在用盡其他一切非戰爭的防禦方法而歸失敗之後，不得行使此權。

爲使西班牙成爲人民享有社會上之公平與均等機會的國家起見，憲法中規定本國的一切財富皆屬於國家經濟的利益。國家得『參與發展並調整各種工業與企業』，使一切公共事業供國家之用。國家可以以適當的賠償，收用各種的財產，不問其原來的所有權屬於何人。工作成爲社會的義務，國家負有保護工人農民與漁人的責任。

關於地方自治，憲法祇承認自治的區域與國家之完整性相合這一點，這使一般主張地方完全自治的人大失所望。凡欲自治的區域必須將地方的憲章提出於國會，請求批准，國會得以施行某種國家法律的權力委託於地方機關。

依據憲法後面所附特別規定的『暫時處置』，國會有權選舉第一任憲法所定的大總統。此項暫行規定於十二月十日實行，國會的選擇落於柴謨拉身上，他以前辭去過臨時大總統之職。到這個時候，國會本應解散並頒

佈選舉新國會的命令，但國會不這樣做，反決定繼續行使其職務。原來一般議員恐怕總選舉會表現人民對於它本身的政策的反感，並且覺得草定憲法的國會也應該延長其任期，以便開始使憲法的原则見諸實行的立法程序。

國會的最動人聽聞的行爲之一，即宣布廢王阿爾方朔第十三犯有叛國的大罪。他所有在西班牙的一切財產都被沒收，其本人如再踏入西班牙的國土，即受「永遠監禁」之刑。王家的苑囿公開開放，有幾處宮殿被改爲官署或公共建築物。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耶穌會被解散了，其含有財產，價值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者，由國家收有。次年九月，政府頒佈一件法律，命將此項財產分配，以爲社會公益事業之用。此外的耶穌會所有物，估價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者，則未能充公，因爲這些財產都是以私人的名義而保有的。自然，各個耶穌會會員不久就離開本國了。國會特於一九三二年的聖金曜日（耶穌受苦日）舉行了一次會議，其意似乎在再加着重正流行於共和國的新精神。

政府企圖扶助國內的工業，把關稅更加提高，雖然西班牙的關稅壁壘在歐洲已經算是最高的了，但同時西班牙又和許多國家商訂了特別的商業條約。那個「橫斷大西洋公司」（Compañía Transatlántica）因爲老是不入敷出，終被解散了，西班牙的橫渡大洋的航業亦告停頓。駐外的軍隊業經裁撤，發展西屬摩洛哥的政治與經濟的計劃已在開始。儘管經費不足和教員的人才缺乏，在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二年中，開辦了七千五百所的新學校。然而這一方面的工作有待完成的還是很多，因爲西班牙的文盲依一九三一年的統計仍在百分之四

十五以上。土地的改革進行得很慢，但在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國會通過了一件法案，規定以五二、〇〇〇、〇〇〇英畝的土地（從前爲大地主所有者）分配於公共農場。到一九三二年之終，西班牙之民尚未見經濟的繁榮，因此有很多人批評，在這個窮困的時候，大總統的每年薪俸和應酬費竟達一八〇、〇〇〇元是不應該的。

我們當然不能期望那般自治派團體會滿意於憲法中所給與的地方自治之讓步。在一九三二年四月，有十萬加達魯尼亞人集會要求馬得利政府馬上承認該州領袖所草定的自治法。和愛爾蘭的新芬黨(Sinn Feiners)一樣，加達魯尼亞人也組織了一個黨，叫做「我們自己」(Nosaltres Sols)並常常作示威運動，其紛亂無時或息。從六月到九月，國會反復辯論地方自治法案，終於九月八日承認加達魯尼亞的自治法。此項法律由總理阿紮那公佈於巴塞羅那（九月二十五日），成千成萬的加州人歡聲雷動。

自治法給與加達魯尼亞以下各項：得使用其本地的語言，國歌與旗幟的權利；得設立邦政府（亦有總統與國會）；得以加州文字與西班牙其餘各州正式通函的權利；及徵收稅項，創立學校制度，與施行國家法律於該州的特權。巴斯克州、加里西亞及其他非屬於卡斯提爾的區域此刻更堅持要求同樣的自治權了。由許多西班牙人看來，似乎這個共和國最好能改變成爲一個聯邦制的國家。

一九三三年就在眼前了，當斯之際，西班牙共和國很可以回顧它的許多成功的事業而引以自豪。但同時它必須向遼遠的前面注視，前面有亟待解決的內部建設，地方主義者的紛爭，及各經濟黨派和文化團體間相衝突的利益。

第十五章 德意志

從帝制到共和政體

一九一四年的秋季，德意志帝國政府向帝國議會提出大戰信任案，那時候所有的政黨，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一致投贊成票。但是，當着國家的生死關頭，這一種齊心的擁護決非對於政府平時的一般政策的贊同表示。帝國的許多政制頗遭反對：總理大臣是對德皇負責，而不是對下議院負責的。上議院的議員係受幾個聯邦的統治者委任而對他們負責，並非受人民委任而對人民負責。德皇居於普魯士王的地位，事實上支配着上議院，上議院則比帝國議會具有較大的權力。普魯士邦內的不合民治精神的投票制度，早已受到批評的襲擊，在普魯士較富的公民比較貧的公民具有較大的投票權。最後，社會立法和勞工改革不能完全與二十世紀的需要並進。當時雖有這些不平，然而大多數德意志人民仍在一九一四年準備羣策羣力來衛護祖國而反抗他們所認為無法無天的仇敵。

大戰既繼續進行不停，由數週延長而為數月，由數月延長而為數年，人數激增的社會黨黨員漸認這種戰爭為帝國主義者與資本主義者的投機，而不是一種自衛的需要。社會民主黨內分明發生裂痕，在一九一五年春季

就更顯然了。以孚利德里區·亞伯特 (Friedrich Ebert) 和腓力普·晒得曼 (Philip Scheidemann) 爲首領的大多數黨員，深信應繼續支持大戰；哈斯 (Hugo Haase) 所領導的少數黨員反對再予政府以戰時信任。哈斯於一九一六年之初在國會中宣言，他和他的黨徒絕對反對戰爭因任何原因而延長，一年之後，這般人組織了一個獨立社會民主黨，主張馬上實現不割地的和平。

有些激烈分子甚至認哈斯的一派爲過於保守。這些同情於共產主義的人們在李普克尼希 (Liebknecht) 和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領導之下，抨擊大戰，主張建設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制。一九一六年一月，李普克尼希開始印行反對大戰的信札而署名爲「斯巴達卡斯」(Spartacus) 因此他的黨徒漸以斯巴達卡斯黨著名。該黨首領之終被監禁，並未減少他們的騷動程度，特別因爲軍隊未能早日博得勝利的和平，這種失敗漸漸把社會黨大多數黨員和厄爾士柏格爾 (Mathias Erzberger) 所領導的天主教徒中央黨的好感也失去了。

一九一七年七月，總理大臣柏特曼·和爾味 (他自一九〇九年卽任此職) 辭職了。他的繼任者米哈亞力斯博士 (Dr. George Michaelis) 在報告戰爭勝利或改善不佳的收穫方面，並不比柏特曼更有能力。因此，三個月之後，米哈亞力斯讓位於巴威 (Bavaria) 邦的總理，一位學問淵博的教授，赫特林 (Herlitz) 伯爵。赫特林拒絕實行民治精神的改革，甚至在戰敗的保加利亞退出戰爭之後，也是如此，這種態度使他在一九一八年不得不退休。最後，開明的巴登邦諸侯瑪克斯 (Prince Max of Baden) 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二日組織了一個中和的聯合政府。社會黨多數派的兩位領袖，晒得曼和寶厄 (Baumbach) 也加入內閣。瑪克斯決定施行廣大的改革，希望挽救

搖搖欲墮的霍亨索倫 (Hohenzollerns) 氏的皇座，但是在他得到任命的時候，一般不滿的空氣已成爲不吉的預兆了。

其時協約軍的封鎖正在破壞德人的糧食供給。收穫的不佳使情形更壞，特別是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間的『萊蕪冬季』時期內。民衆饑寒交迫，僅僅富人能够暖衣飽食。同時藉戰爭獲取不正當利益的事情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再者，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替可憐的德國人樹立了一種令人鼓舞的榜樣，而俄國の間牒正忙於從事破壞的宣傳工作。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兵工廠已發生罷工。這次的罷工雖經當局嚴厲制止，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繼續有第二次罷工，而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又發生帶有政治目的的第三次罷工。在柏林和厄森 (Essen) 地方有五十萬人民在最後一次罷工的時候會脫離工作達一星期之久。罷工者不會有暴亂舉動，但政府決心嚴厲處置爲首滋事者，有許多會因在主要工業中占有職業的關係而被免除軍役者現在都被遣往前線，作爲懲罰。這些人在前線竟成爲向兵士散播反叛思想的危險分子。

德國的海軍也不安靜了。他們被圈在軍港中已有數月，水兵們除閱讀革命主義的書籍並窮究其哲理外，簡直無事可做，他們對於酗酒的軍官又發生惡感。軍官們則因久不活動而憤慨，其中有許多人雖曾呈請德皇委派他們到陸軍中去服務，可是徒然。其時，一般有思想的德人已明白，英國人民決不致受潛水艇戰役的影響而成餓殍，而海軍大將提庇磁 (Tirpitz) 最近組織的那個愛國的祖國黨所預許的許多擴張領土之諾言非但可笑，且永不能達到。並且，美國的參戰畢竟擔任了協約國方面大部分的工作。

當盧登道夫在一九一八年的大進攻完全失敗的時候，就已預示霍亨索倫皇朝的崩潰。餉精缺乏，軍備不足，而惑於激烈宣傳的德國軍隊已準備脫離戰爭，回到家鄉。他們絲毫不想再爲了皇帝或爲了資本家作更大的犧牲了。此時瑪克斯充滿着勇氣，施行了許多改革，把德意志變爲君主立憲國。於是皇帝成爲有名無實的元首，僅僅是統一的象徵罷了。內閣採用責任制，國會具有決定宣戰與媾和的權力。人民得到言論、出版與集會的自由，政治犯則經宣告大赦。在普魯士邦復預許了選舉制的改革。最後，瑪克斯與威爾遜開始休戰的談判。他小心地指出，新德意志政府是一種「人民的政府，人民在憲法和實際上握有決定國事的權力」。

將近一九一八年十月之終，國內時常聽到皇帝應即遜位的聲浪。因爲威爾遜堅持，只要帝國政府當權一日，他祇能討論德國的降服而不能談判和平，所以許多德國人漸認威廉爲和平的障礙。十月二十三日，哈斯在國會要求德皇遜位。翌日，社會黨大多數派諾司刻（Noske）提出同樣的請求。各報紙迅即響應這種呼聲，在二十九日晚，社會黨大多數派首領施特曼要求瑪克斯設法使威廉遜位。是夜，德皇僅向總理大臣遞送最後一分鐘的通知書後，即從柏林逃往軍隊大本營所在的斯巴（Spa）地方——避免流行性感冒（指革命）的危險！

其時，海軍根據地的基爾（Kiel）發生了（十月二十八日）一件不幸的事情。當各方謠傳休戰談判的結果大概會強迫德國將艦隊交與協約國的時候，德國的軍官決定先發制人。他們寧願向英國艦隊施一突然的——也許是勝利的——攻擊，而在此攻擊中求一英武而榮譽之死。但是，被預定參加這次戰鬪的八萬水兵，卻無意於成爲捐軀的英雄。他們表示願意守護德國各海岸，抵抗英國的攻擊；但在休戰談判進行之時，他們拒絕參加這種

整個自殺的險舉。結果就發生兵變，繼之以逮捕、槍殺和紅旗高舉。不久，叛亂的精神延及基爾的工人，在那裏有各種革命會議組織成立，要求霍亨索倫遜位，特赦以前兵變中的首領，及平等的選舉權。其他城市都學基爾的樣，到十一月七日，沿德國北海岸一帶，要求設立共和國的呼聲是很普遍的了。

政府希望將這些局面的發展隱瞞德國的其餘部分，但是徒然。十一月七日，慕尼黑地方舉行了大隊示威運動，一位屬於獨立社會黨的主筆埃斯納（Kurt Eisner），即乘此機會要求以武力推翻巴威王朝，維忒斯巴哈（Wittelsbach）王和他的家族匆忙逃走，人民就組織了農工兵的會議。八日，巴威邦成立了一個以埃斯納為總統的『民主的和社會的共和國』。在柏林和德國各主要實業中心，同樣的會議也紛紛建立，共和的宣言也到處公布了。的確，這種運動所蔓延的地方很廣，故秩序並未發生大衝突。社會黨多數派的首領深懼許多黨徒的歸附於更激烈的獨立黨，乃警告瑪克斯，除非德皇在十一月九日之晨遜位，他們就要辭去政府職務，要求廢去威廉，並宣佈實行總罷工了。

在斯巴的威廉不肯聽從總理的央求。他堅決盼望陸軍幫助他保留皇位，甚至不惜違反德國人民的願望。但是，參謀本部終說服了他，要軍隊爲了他和德國人民交戰，是不可靠的。在著名的斯巴會議（十一月九日舉行）席上，就是與登堡也認爲遜位似乎是最聰明的步驟。正在亞伯特和晒特曼造訪總理官邸，宣告社會黨的最後通牒限期已滿的時候，瑪克斯從斯巴得到德皇正在考慮遜位方式的消息。所以，當亞伯特允許維持秩序並召集國民會議的時候，瑪克斯就覺得把政府交與亞伯特是很妥當的。

十一月十日的早晨，德皇威廉逃往荷蘭，皇太子不久也去了。然而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霍亨索倫先生（指威廉）繼以他自己的和全族的名義送出完全遜位的詔書。到那個時候，所有各邦的諸侯都已逃亡，帝國遂一變而為聯邦共和國，暫時歸六個人民委員的會議統治。這個人民委員會是由二個社會黨多數派領袖和三個獨立社會黨領袖，在亞伯特與哈斯共同主席之下組成的。以前在帝國政府服務的許多下級職員為愛國心所激動，仍繼續在新政府內供職，但斯巴達卡斯黨人，復在已出獄的李普克尼希與盧森堡領導之下，拒絕與現政府合作。人民委員以演講和傳單懇求人民維持秩序，視人類生命為神聖不可侵犯，並保護私人財產。

斯巴達卡斯黨之反對設立中產階級的或社會主義者的共和國，同他們以前反對帝國一樣熱烈。他們利用他們的機關報「紅旗」和他們的恐怖行為，奮力阻止國民會議的召集，他們希望至少使國民會議延遲到他們的策略能威嚇大多數人民，迫之接受共產黨專政的觀念之時舉行。

社會黨多數派和獨立社會黨從前為了終止大戰的問題而分裂，現在遇到這樣一個政敵，它們似乎應該可以重新聯合一致了。但在兩派疏遠期內，獨立黨變成更激烈的了，此刻他們又贊成將工業迅速社會化並收歸國有，且主張國民議會選舉延期舉行，直到社會主義者的統治權已趨鞏固，絕無被傾覆之可能的時候。社會黨多數派以為工業國有政策須緩緩進行，竭力主張對於財產所有者應予補償，並欲用投票的方法早日表示一般人民的意見。

選舉日期的問題最後由各會議的全國大會解決了。地方會議都模仿着柏林和慕尼黑兩地的兵士工人所

組織的會議，在德國全國出現了。牠們又往往僭取政府的權力。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這些會議的全國大會舉行了。在舉行時，社會黨多數派大喜過望，因為大會議竟把共產黨徒摒除在外，並決定早日舉行國民議會選舉（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惱怒的共產黨徒希望在這些行動中看到反革命的萌芽出現，乃煽動柏林的水兵與海軍陸戰隊叛變。在當局用武力制服反叛分子的時候，獨立社會黨黨員一致辭去政府的或各邦的職務。這種情形使社會黨多數派能够以忠實的擁護者充任空出的職位——甚至填補六人委員會中的缺額。

在等候選舉日期到臨的當兒，人民委員會必須完成回來的軍隊的復員事宜，不願聯軍的繼續封鎖而設法避免饑餓，制定數種立即實施的經濟與社會的改革方案，並遏制極右派與極左派的活動。許多德國人之渴望法律與秩序，他們的愛國心和願意接受任何適當的政府（只要它能安穩地行使職權）的傾向，在在使內部統治的問題此所預期的較為容易解決。但是，為預防斯巴達克斯黨方面作難起見，人民委員會準備了一枝裝備齊全的軍隊約三千人，以帝國時代的軍官為指揮。

其時，斯巴達克斯黨也組織了武裝隊，徜徉於大城市的街上，準備隨時暴動。這些極端派的「發言者」就是「斯巴達克斯」李普克尼希他自己。他對於凡是缺乏徹底的共產主義的事情都不滿意。這個運動的「智囊」是一個殘廢的波蘭籍猶太女人 盧森堡，她由於婚姻關係而成爲德國公民。共產黨徒選定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至十二日這一週爲奮力推翻政府的日期。

爭奪政權的衝突在正月六日星期一達到了高峯，當時有一羣二十萬同情於斯巴達克斯黨和獨立社會黨

的武裝工人在柏林的中心集合。假如這些人有剛毅的領袖，領導他們，政府或竟毫無抵抗而顛覆。因為那幾個人民委員，自己是出身於工人階級的，深懼遣派軍隊攻打他們的同類。他們彼此推諉不肯負起應付危局的責任，到後來終由諾司刻 (Gustav Noske) 接受了這個任務，他說：「好！總須有一個人做獵狗，我不規避這種責任。」諾司刻是一個富有經驗的罷工組織者，不怕對付工人的，但他在當時只有幾千人可用以對抗龐大的武裝暴衆。這真是政府的幸運了，在決勝負的千鈞一髮之際，過激的領袖竟使人民大失所望。一位屬於共產黨的記者譏諷地描寫那危急的一天的事件道：

自清晨到九點鐘，民衆矗立在冷風與迷霧裏。首領們在此處或彼處坐着從容討論。迷霧消散了，民衆卻繼續站立着。但是首領們依然在討論。正午到了，飢寒也隨着來了。而首領們仍討論着。民衆憤火中燒；他們要求做一件事或說一句話以和緩他們的焦急。但沒有人知道應做什麼事或說什麼話，因為首領在討論着。迷霧又起了，黃昏也隨着到了。民衆沮喪地回到家裏；他們原期望幹許多大事，結果他們沒有幹什麼。因為首領們討論……他們討論着，討論着，老是討論着。

共產黨隊伍與警察或軍人之間的巷戰天天繼續進行，直到一月十五日纔止，在那一天，李普克尼希和盧森堡都被逮捕——在送往監獄的途中就被槍決了。「斯巴達卡斯週」的目標未能成功，而斯巴達卡斯黨運動遂瓦解了。一月十九日，國民議會的選舉在比較寧靜的空氣中舉行了。

韋瑪議會的工作

在三千五百萬合格的，年齡在十九歲以上的男女公民之中有三千餘萬人依照規定的代表比額投票。到選舉的時候，許多舊政黨都經改組，有幾個且已另立名稱。以前的保守黨依據保皇黨的黨綱而改組，稱爲德國國家主義黨。以前的國家自由黨的右派，大多數是重要的商人，則在史德理斯曼領導之下改組爲德國人民黨。此黨雖然贊成帝制，卻爲了顧到內部的和平與國家的統一而準備擁護共和政體。

在厄爾士柏格爾領導之下的中央黨，暫時變更他們的黨名爲基督徒民主黨，但不久仍恢復原有的名稱。他們贊成設立民主共和國，制定保障人民權利的法案，和進行多量的社會立法。以前的國家自由黨左派與進步黨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新的民主黨，以銀行家施顯特（Hjalmar Schacht）爲首領。民主黨贊成設立中產階級的共和國，反對軍人的官僚政治重臨，預許爲工人謀法律上的保障，並主張檢舉利用戰爭牟利的人。社會黨多數派重新採取社會民主黨的名稱，繼續主張財產和工業的逐漸社會化，而獨立社會黨卻力主財產和實業應迅速收爲國有。已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改稱德國共產黨的斯巴達卡斯黨拒絕參加議會的選舉。

當計算選舉結果的報告時，社會民主黨爲議會中最大的一黨，因爲它在四二一席中佔有一六三席。中央黨得八八席，民主黨得七五席，國家主義黨得四二席，獨立社會黨得二二席，而人民黨得二一席。其餘十席歸於四個少數黨。有三十六個女子當選。爲保護大會以防任何可能的羣衆暴動起見，亞伯特乃於二月六日在安靜的韋瑪（Weimar）城召集國民議會。

國民議會在指定的一天集會，立刻採取以前所草定的臨時憲法，以爲統治的基礎。於是六人委員會交出它

的政權，社會民主黨，中央黨，和民主黨所組的「韋瑪聯合內閣」就成爲正式政府。二月十一日，國民議會選舉亞伯特爲共和國(Reich)的大總統。亞伯特以前是海德爾堡(Heidelberg)的馬鞍匠，自與晒特曼爲溫和的社會黨的共同首領後，纔漸露頭角。他在就職的誓詞中，自稱爲「工人階級的兒子，在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中長大的」。他說，他既爲總統，當自認爲「全體德國人民的法定代表，而不是一個政黨的首領」。晒特曼被任爲國務總理，而藍遭(Brockdorf-Rantzau)伯爵(他未加入任何政黨)爲外交部長。

國民議會當前的有三重任務：打消國內的反對，與協約國媾和，並爲共和國制定永久的憲法。諾司刻居於國防部部長的地位，處理第一項的任務。其時德國有許多礦區與鐵路工人的罷工，並且到處發生衝突。在一個國家主義黨黨員暗殺埃斯納(Kurt Eisner)之後，慕尼黑地方成立了共產政府。諾司刻決定斬釘截鐵地「和那般瘋子總算帳」，他藉了幾個卸職的軍官的幫助，猛力進行撲滅全國的激烈運動，結果到一九一九年的夏季，有一萬五千工人悉遭殺戮。此後，就不怕有來自這一方面之糾紛發生了。

進行講和顯然是更難的任務。議會中各黨派耗去寶貴的光陰於彼此以戰爭的失敗互訐，而沒有一黨準備接受協約國在五月七日所提出的條約的確，晒特曼寧願辭去國務總理之職，而不願承認這種條約。但因協約軍揚言如德國議會拒絕這些條款將有嚴酷的懲罰，故除接受外，無選擇的餘地。因此，在六月二十三日，恰在限期將滿之前，韋瑪議會的代表終接受了這個條約。

國民議會的最後一種任務，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以二六二票對七五票通過採取憲法而完成的。

此項憲法的條文是依據普墨斯 (Preuss) 教授所擬的草案制定的，他是一個民主黨黨員而為反對各邦權利者在最後的投票中，社會民主黨、中央黨和民主黨贊成此項憲法，而獨立社會黨、人民黨和國家主義黨則加以反對。亞伯特於八月十一日簽署了這個牠包括一八一條條文的憲章。

憲法將最高的權力歸諸人民，並闡明『Reich』為各共和邦（稱為 Länder）的聯合政府，（註一）聯邦政府對於外交、殖民、外來之移民、國防、鑄幣、關稅、郵電等事宜，具有通常的中央權力。此外，它又有制定關於下列各項之法律的最高權：即鐵道和水上交通、救濟貧民、保護產母、寡婦和孤兒、保護動植物、利用天然富源、保險、教育、保護工人和審查電影。中央政府又得對數邦指示施行國家法律的最善方法。（註二）憲法中訂有保障人民權利的習慣條文，並規定二十歲以上的男子與婦女都有依據代表比額的選舉權，婦女與男子在公民資格上處於絕對平等的地位。

（註一）在一九二〇年，德國有十八個這樣的共和邦。一九二九年後，普魯士邦與瓦爾德克 (Waldeck) 邦合併，所以只有十七邦了。

（註二）減少各邦的權利到最低限度的趨勢不久引起了衝突，尤其是在中央政府與巴威邦之間，後來前者稍有讓步，再者，若干巴威人因爭執各邦權利的問題脫離了中央黨，另組一個新的巴威人民黨。

憲法中有一條規定，大總統應由人民普選，任期為七年，凡年齡在三十歲以上的德人都有被選充此職的資格，可以連選連任。總統得因下議院三分之二票數的彈劾，由人民複決罷免之。如總統在民衆複決中失敗，他必須去職，永不能再當選為總統；如人民仍擁護他，他的任期就從投票之日起繼續七年。德共和國不設副總統。

國民議會之厭惡獨裁政治，在它對於行政首領的實權所加的限制上可以看出，蓋在理論上，這種實權是很廣的。總統得代表國家委派並接見大使簽訂條約，任命並罷免政府的一切官吏（關於官吏之遴選，法律中並未另行規定），他又為海陸軍大元帥，得用武力使各邦履行憲法所加於它們的義務，並有大赦之權。他可以解散國會，但此項行動的藉口只能使用一次，而新的選舉必須在六十日之內舉行（第二十五條）。在國家緊急時期，總統有權停止憲法中某種保證之施行（第四十八條），但必須以此種非常處置立即通知國會，經國會要求後，各該項保證應廢止之。然而，因為他的命令非經國務總理或主管部部長的副署是無效的，所以總統在實際上僅能依照內閣的意志運用他的職權，而內閣本身是對於下議院負責的。

國務總理有權決定政府的一切政策並遴選內閣的閣員，他是由總統任命和罷免的。各部部长不必為國會的議員，但他們直接對國會負責。內閣之辭職必經國會投不信任票後始可實行。內閣之決議案應由大多數表決通過，國務總理在贊成與反對之票數相等時有權投票決定。設在勒不士格地方的最高法院祇有有限的最初裁判權，牠的主要職務在為上訴的裁判所，以擔保法律的統一解釋。普通的司法問題歸各邦自行決定。

最高立法機關是國會（Reichstag），議員由人民選舉，任期四年。一九二〇年後，國會選舉是根據了巴登的代表比額制舉行的，依照此制，每個政黨有六〇、〇〇〇票就可獲得一席代表。因為選舉者的人數時有變動，代表人數也隨了每次選舉而變動。雖然這個計劃能保障少數的權利，但牠有幾個重要的缺點。所有代表是依照政黨所開名單上的名次當選的，名列前茅的人自然有獲勝的最好機會。候選人與選舉人之間絕無接觸，而選舉人

祇能就政黨名單投票而不能爲個人投票。這種手續，很容易使政黨機關能夠爲牠們所愛的人員獲取職位。

國會必須在選舉後三十日之內集會。在國會休會期間，所有外交事宜和內閣的設施分別由兩個常置委員會監督辦理。國會得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上議院所否決的法律，但遇此項情形時，總統得於三個月內請求國民複決之。凡有十分之一的合格選舉人簽署請願書，要求制定某種法律時，國會必須立刻予以通過，或者交付國民表決之。

上議院是代表各邦的，稱爲聯邦議會 (Reichsrath)。牠可以維持國會所通過的一般法律，但不能否決之。然而涉及各邦的任何法案之通過，需要牠的同意。每邦得選舉代表至少一人於上議院，較大的各邦在其人口每七〇〇、〇〇〇人中可以有一個代表。可是，因普魯士邦佔壓倒一切的勢力，所以規定任何一邦不得有超過全數五分之一的代表。上議院的代表同時是各邦內閣的閣員，受各邦政府的俸給。上議院與國會不同者，它永不被解散的，雖則它的組織常有更改。在每一次戶口調查之後，上議院的議員人數就變動了。在一九三二年，上議院有六十八位議員。

德國沒有國家資助的教會，保障宗教的自由。教育歸各邦監督辦理，教員被認爲公務人員。國民應受強迫教育，直到十八歲爲止。私立學校祇在少數例外情形中容許設立，並且是爲了顧及宗教課程的緣故。憲法規定學校應授關於藝術，最新的科學發明，與國際和平等科目。自然，在此種方案能夠全完實施之前，在立法和籌款方面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憲法中的經濟條文可以顯出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的影響。一切私人財產必須用以「謀取公益」。『爲滿足建築住宅的需要，促進移民和開墾事業，或改良農業起見』地產的公用徵收在法律上是許可的。適於社會主義化的私人企業，得於給予相當補償後轉移爲公有。憲法中又定有防備疾病、年老、失業、和災害的國家保險制度。憲法第一六五條是關於一種曾在德國及他處盛行一時的有趣現象——工會運動的：

工人與僱員之法定代表團體應爲保護他們的社會與經濟的利益而設立，此種團體即地方工會，依照工業區域的劃分而組織之區工會及全國工會。

區工會與全國工會應與僱員代表及工界其他有關部分之代表聯合，從事組織各區經濟委員會與全國經濟委員會，以完成一般之經濟任務，並協助行政機關施行特殊之社會主義化法律。

關於社會與經濟政策之法案，應於提出於國會之前由內閣送交全國經濟委員會徵求意見。全國經濟委員會本身亦有提出此種法案之權。政府如不贊同此種法案，仍須提交國會討論，並附政府觀點之說明。全國經濟委員會得派遣會中委員一人爲代表列席於國會，擁護所提之法案。

全國經濟委員會大半因爲本身組織不健全的關係——牠有勞方、資方、消費者和政府的代表——未能盡其職能。在實際上，牠對於國會已變成關於經濟問題的顧問委員會了。牠難得舉行全體會議，但是牠的三個分部，分別掌管財政、社會事業、和政治事件者，卻常常舉行常會。

憲法既經通過，國民議會所因召集的工作，就告完成了。但是，那個團體非但不解散，反而移到柏林的國會大

廈（一九一九年九月三十日），自行宣佈爲共和國的正式立法機關。總統亞伯特的任期被延長了，在一九二二年，又經國會通過連任，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爲止。

共和政體的維護

在採取憲法後若干時期，德國的共和政體是不很穩固的。當政府集中牠的力量於撲滅共產黨徒的時候，從前的軍官，普魯士的貴族黨（Junkers）舊保守黨與其他不畏死之徒，竟趁此機會設立了幾個強有力的保皇團體，如「正誼社」（League of the Upright）和「鋼盔團」。保皇黨擬就了對於共和黨人和國民議會聲討的長篇罪狀。據說，畏葸的共和黨人在大戰的最後數月中陰損帝國的兵力，使德國得到不可避免的戰敗。攻擊國民議會的接受凡爾賽條約，並容許協約國的各種委員會來蹂躪本國。有些人深怕政府當局或許將所謂「大戰的罪犯」引渡於協約國審判。最後，德國有很多人感覺，國民議會曾拒絕舉行正式的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以防與登堡當選爲國家的最高首領而爲保皇黨開復辟的先路。

一九二〇年三月，在卡普（Wolfgang Kapp）博士所計劃的政變陰謀（Putsch or Coup）中，反動派的活動達到了頂點。卡普博士出世爲新約刻人，是東普魯士農業信託銀行的創辦者，在大戰期內曾以猛烈攻擊柏特曼的儒怯政策並幫助海軍大將提庇磁（Tirpitz）組織祖國黨而著名。他在革命時期沒沒無聞，但自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他常和廢皇的心腹如盧登道夫和提庇磁輩通消息。柏林提督兼陸軍中高級將官的呂特徵茲

(Luttwitz) 將軍和陸軍少校佩勃斯特 (Pauß) 都醉心於卡普的有力的復辟計劃。這三個人自己統率了八千兵士，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清晨從陸軍營房向柏林前進，走了十二哩路。諾司刻僅有二千人可用以抵抗陰謀者，結果亞伯特政府逃往德勒斯登 (Dresden) 接着再逃到司徒嘉德 (Stuttgart) 以求安全。

卡普未能盡量利用他的機會。他非但不能自居於強者的地位，反而與他的敵人力求講和。在應取迅速行動和大膽冒險之處，他一味手足慌亂，猶豫不定。但他的一星期的統治趨於顛覆的主要原因，實爲工人的態度。亞伯特發出鼓動人心的宣言後，全國的工人就舉行總罷工。水、電、煤氣和電車等等公用事業都停止了，甚至鐵道的交通只在必要的地方纔得照常進行，俾人民不止受到不當的困苦。卡普自己的信徒現在向他嘲笑了，他乘了飛機從柏林逃到瑞典，留下一篇自誇功勳的冠冕宣言。然而他不久就回來了，並向當局投降了，結果未及受審即死在獄中。呂特微茲則逃往匈牙利，佩勃斯特則在奧地利求庇護。顛覆政府的威嚇就這樣過去了。

雖然政府暫時戰勝了反動派，它不久又遇到左派的攻擊。獨立社會黨慫恿工人繼續總罷工，直到可恨的諾司刻（他前曾組織軍隊槍殺工人）辭職，直到政府軍隊解散，並直到正式的國會選舉舉行之時方止。政府在這種壓力之下接受了諾司刻的辭呈，並定一九二〇年六月六日爲舉行國會選舉的日期。

在這次選舉之中，組成韋瑪聯盟的三個穩健的共和政黨大爲失勢，從三二六席落到二二五席，社會民主黨單獨失去了五十席。反之，國家主義黨、人民黨和獨立社會黨比在前次選舉中多得一二四席，共產黨也選出了兩個代表。在這第一次正式選舉的共和國會之中，就有代表人民黨、中央黨和民主黨的聯合政府組織成立。一位著

名的中央黨黨員非則拜喜 (Konstantin Fehrenbach) 成爲國務總理，他曾任韋瑪議會的議長。

卡普事件並未終止反動派對於「出賣」祖國者復仇的企圖。他們對參與和平條約之簽署的人們，幫助或通消息於駐在德國的各種協約國委員會的人們，及被認出爲社會主義者的人們，開始作恐怖行動。猶太人與天主教徒也在受攻擊之列，危害亞伯特和晒特曼的生命的陰謀亦在進行。中央黨首領厄爾士、柏格爾曾在一九一七年極力主張不割地的和平，後來又以財政部長的地位施行激烈的財政方案，在一九二一年八月被暗殺了。接着在一九二二年六月，那位聲名顯赫的猶太人刺諾 (Walter Rathenau) (他是一個成功的實業家和具有慧眼的政治哲學家) 也被狙擊了。他人很年青、幹練、有魄力並且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在做軍需署署長和建設部部長的時候，已表現出有非常的辦事能力，他的早死對於共和國是一種不可挽回的損失。政府鑒於局勢的嚴重，乃停止憲法上各項保障條文的施行，並通過保衛共和國的特別法律來對付這些暴行，但是騷動仍繼續着。

一九二三年，另一推翻現政府的陰謀即盧登道夫——希特勒的政變運動在巴威醞釀了。盧登道夫將軍——「政界的不可能者」(impossible in politics) 和希特勒——一位奧地利人(他希望摹倣墨梭里尼的向羅馬前進而向柏林前進) 想出一個奪取政權的計劃，但不久就與考斯道夫、卡爾 (Gustav von Kahr) 所領導的巴威叛黨發生衝突。結果，整個事件變成爲最不名譽的「酒館混戰」，牠的唯一結果就是使受窘的當局增加煩惱。實在，當局除對付反動派外，尚有其他有待解決的問題。現在只一提其中較紛亂的，即有賠款法，比侵入魯爾，馬克價值猛跌，失業人數激增，工廠倒閉，飢民和可能的「赤禍」問題。

幸賴經濟的關係和人民的愛國心合成堅強的黏力，共和國的生命纔得苟全，否則德國或竟成爲齋粉了。同時在政治形勢上亦有一線希望，即社會民主黨與獨立社會黨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重行結合，而爲聯合社會民主黨，保證維護共和政體，反抗共產主義與反動，並保護工人的幸福。

財政的面面觀

以前德意志帝國政府對於大戰深信可以早日博得勝利的結束，以致毫不注意爲付償鉅額戰費而增加的捐稅。當局反而寧願依賴人民的愛國心和信任心，使他們購買大戰公債，並依賴印刷機。國家銀行(Reichsbank)在事實上有權接受國庫券和證券以爲添增的紙幣之保證物。自然，結果稅率是提高了，而那種非常時期收入的來源如「大戰利益稅」和「買賣總額稅」也產生了；但是德國在實際上祇能以直接徵收的稅項供給它的戰費百分之五左右，舉例言之，英國卻能以此種稅供給它的非常經費百分之二十以上。當大戰終了的時候，市場上的馬克五倍於一九一三年所有的。然而，因爲外界不明瞭確切的事實，並因爲會有一個時期大家很信任德國有迅速恢復原狀的能力，故在一九一八年之終馬克仍有牠的票面價值的一半——即每個馬克以前值二三·八二分，現在值十二分。

可惜這種情形不能維持長久。大戰期內限制貨物最高價格的非常法律現在是撤銷了，物價漸漸飛漲，和市場上通貨的充斥成了正比例。有許多金子已被送往中立國家，交換軍需品，現在真正感到它的缺乏了，這種實情

等到發現德國在戰時的貿易入超達一百二十億元美金時更爲顯然。國內原料的儲量降低到最低點，而國家的全部經濟組織已趨凌亂，因爲在大戰期內各種工業和工廠曾被改組以應軍事緊急的需要。德人當着這種薄弱的通融力，不利的貿易差額和巨數的賠款，要得到僅能維持最低生活的食品與原料，唯有依靠紙幣而已。

就是在這個危急的局面之下政府對於一般因大戰牟利者和大資本家仍猶豫逡巡不敢課以重稅；又爲了某種原因，不動產與所得稅稅額之估定，仍以膨脹而起伏不定的紙馬克爲根據，而不根據現金。這樣一來，捐稅的繳納額在到期應付時往往比在估定時所預料的真價低得多。現金的短缺與紙幣的膨脹循環增加不已，一月一月地過去，其爲害也愈甚。在一九二一年六月間，國家銀行開始付出現金貼水，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圓美金（通常僅值四·二馬克）可以買得七〇〇〇馬克了。

在法比軍隊占領魯爾期內，危機更增高了。法人之握有數十億的德國國家銀行鈔票，及德政府的企圖藉紙幣的印行以補助被占區域內賦閒的愛國工人，完全毀壞了德幣的價值。只有奇蹟纔能阻止住馬克如雪車的下滑，其如無奇蹟發生何。當局限制國人購買外國幣的嘗試，爲時已晚，不能得到任何顯著的結果。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初旬，一六〇、〇〇〇馬克可換美金一元，到了月底，就須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纔換得一元了。紙幣印刷所馬上覺得很難供應紙幣的需求，特別因爲一九二三年夏季政府的稅收百分之九十多是拿紙張當錢取得的。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政府所欠國家銀行的債約計有一萬九千萬兆（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當紙幣昇到頂點的時候，國家銀行雇了二千人，專門任爲紙廠、印刷所、和運輸局的監督人員，同時有三十三所紙廠，一三三所印刷事務局，和一七八三個印刷所忙到最高速度，以供應增加的鈔票之需要。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的中旬，在柏林美金一元值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在科倫 (Cologne) 值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夸爾 (四分之一加侖) 牛乳的售價爲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甚至還不易買到。即私家公司和個人也自動印行『非常時期兌換券』——總值好幾萬萬兆馬克。最後，要標明鈔票的最高價值，以償紙張成本和印刷費都變成很困難了，尤其因爲印鈔票時必須加以細緻的美術裝飾。

這種經濟崩潰的結果是非常不幸的。商借款項和訂立契約幾乎已爲不可能之事。中產階級受苦最烈，因爲他們的債務人乘此機會收回債券，贖回抵押品，並償還鈔票。前此從投資和儲蓄中可穩得的收入變成分文不值，許多希望依賴這種收入而生活的人現在不得不向已極擁擠的勞工市場中尋求職業。職工協會沒有能力盡牠們的通常職責，因爲牠們的基金也是分文不值了。反之，一般資本家卻因工價低與原料成本賤的關係，大獲利益，他們並將所得的盈餘投資於比較安穩的外國證券。大批『夜來滿天飛』 (Fly-by-night) 的小本經營就依賴賤幣的供給成立起來，但牠們剛剛成立就倒閉了。人民都貯藏貨物，而每人都力求以他所有的馬克交換具有較穩價值的貨物，這樣一來，『馬克如潮水似地變成貨物了』 (Flucht aus der Mark in die Ware)。

在一九二三年秋季，德國人民實際上廢棄了馬克，而當時的情形比大戰期內任何時間更爲惡劣。農夫拒絕把他們的農產物運向城市；商人關閉他們的商店；工資是毫無標準的，工資的增加當然比物價的飛漲落後；成千

成萬因戰爭而殘廢者和以前依賴一定的收入生活的都而有菜色。饑餓者的騷動成爲普通的景象，外國軍隊在魯爾的活動，分離派人在萊茵地與巴威的運動及共產黨徒在薩克森（Saxony）與其他地方的得勢使紛亂更甚。德國的內閣旋起旋仆，國家似乎已瀕於瓦解的境地。最後，在一九二三年九月，政府宣布全國戒嚴。

當局深懼德國陷於完全崩潰，乃決定（一九二三年十月）施行最後一個拚命的計畫，俾人民可藉此自拔而出於污泥。依照這個計畫，應設立一種新幣制和一個新銀行，預算當使之平衡，工業當使之恢復一部分，奉命施行這些奇蹟的人，爲財政部長路得博士（Dr. Hans Luther）與一個銀行行長，現兼新幣制總裁的社顯特博士。這兩個人既具有非常的權力，的確，穩定了馬克的價值——雖然對許多德國人和外國投機商人，又是一種不幸的財政上的犧牲。

不值錢的紙幣之印行停止了，而一個特殊的仁登銀行（Renten bank）也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開幕了。這個銀行發行一種新的臨時通貨，稱爲仁登馬克（Renten mark）指定的票面價格等於大戰前的金馬克。以德國全部農業和工業的財富爲抵押的擔保品。這種馬克發行了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此數稍稍超過大戰前德國市面上流通的馬克總額之半。仁登馬克與紙馬克相輔而行，其比率爲一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這樣，「無中生有地……產生了一種錢幣，它的價值因人民的信仰心而趨於穩定」。

預算的平衡全靠無情的但顯然爲必要的辦法。戰爭賠償的要求被拒絕了，成千成萬的公務員（其中有許多人曾受終身的委任）略得酬報或絕無酬報而被辭退了（註）薪金皆經減少，公家一切借款暫告停付。政府並

提高稅率，開始以現金爲根據計算稅捐的繳納，並制定較優的徵收制度。最後，除通常的不動產稅之外，又對出租的房屋，工廠和農業建築物附加新的「房租稅」。

（註）聯邦政府將各種公務機關的人員約三三〇、〇〇〇人解了職，包括鐵路與郵政人員在內；各邦和各市又辭退了四〇〇、〇〇〇餘人。

這些法令中有許多後來必須都經廢止或修改了，但那是達到了它們的直接的目的——直到預算平衡和通貨膨脹停止以後的事。當（一）道威斯計劃發生效力（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德國獲得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的外國借款；及（三）魯爾撤兵的時候，一般的情形也比較樂觀些了。接着取仁登銀行而代之的新國家銀行創立了，而新鑄的國家馬克（Reichs mark）也替代了仁登馬克。到一九二五年七月五日爲止，紙馬克可
以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對一的比例兌換國家馬克。

自然，人民的痛苦尙未解除。對紙馬克釐定很低的兌換價格一事，毀滅了許多小資產的人家。流動資本的一時缺乏，使利率不得不超過百分之四十。因爲有許多公司破產並因人民不再需要貨物拿來貯藏。故失業情形更爲惡劣，但局面的安定和人民的信任心到底恢復了若干，在經濟復興的路上，也減少了很多荆棘。

失望與希望

在緊接大戰的數年中，悲觀的巨浪激蕩了德國的人民。他們在戰敗之中，覺得世界正在崩潰，文化已到末日。

大家都很憂鬱，許多有思想的人只能在形而上學的思考和神祕學說之中，得到慰藉和庇護。好像爲運命注定一樣，這般切望追求精神愉快的人們在德國恰巧得到許多適切而深奧的哲學論文。

這些著作中之一種爲歧舍爾林 (Kaysersling) 伯爵所著的兩卷一個哲學家的旅行日記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雖則第一卷在一九一四年就在印刷人之手，而第二卷僅在大戰期內經過修改，但最後完全之本直到一九一九年方始出版。歧舍爾林對於歐洲不能再保持一種富有生氣的興趣，因爲它畢竟「祇代表人類精神的一小平面」，而切望「爲新的勢力所影響」，他就開始閒暇的旅行，環遊世界。他在旅程中的觀察，證實了他對於心靈的至高至上與精神圓滿的德性的優越之信心。「明心見性的捷徑是航海環遊世界」一如我所預料的，他的日記讚揚亞洲好靜深思，不慌不忙的生活，而公然指摘紛紜擾攘的西方，鄙棄西方的「不承認有不變動的事物」而「以可以量計的名詞表示事物的價值」。

但是，這位哲學家十足是西方人，故仍以爲個人主義是有益的，而他所願意目擊興起的「新人物」應爲唯心的個人主義者，也就是一種「具有亞洲的內心而滲以基督教的歐洲之生氣」的人。歧舍爾林以爲要使西方文化得救，不需要知識而需要智慧。一般人對於這些觀念的響應是浩大的，至少有一個時期是如此，所以他的兩卷日記竟銷行幾百萬餘冊，接着德極斯達 (Darmstadt) 地方創辦了一個「智慧學校」 (School of Wisdom) 以教養哲人。在許多德國人看來，東方的神祕學說和智慧的追求，實爲無希望的世界中唯一的安慰。

此外，斯本格雷 (Oswald Spengler) 的巨著西方的衰落 (Decline of the West)，對將來抱悲觀的人們

的影響，甚至較哲學家旅行日記尤爲重要。雖然這部書也是在大戰爆發之前胚胎的，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當德國軍隊依然勝利的時候寫完的，它卻很投一九一九年和以後的失望而懊喪的德國人之好。著者以其對於哲學、文學、史學、數學和術藝的淵博的知識，說明歷史過程的循環性。他把歷史認爲是許多個文化周而復始的一種運動，每一個周而復始的文化都在春季萌芽滋長，到冬季枯萎消逝。每個周期的末端和它的開端一樣冷面無情，不易感動。自古以來已有三個這樣的時代降生而消逝了：印度時代（開始於基督降生前約一八〇〇年），古希臘或羅馬時代（從基督降生前約九〇〇年起），和阿剌伯時代（引進基督教時期和回教時期）。西方時代（約從基督降生後九〇〇年開始）現在走進了它的冬季，而已經註定在未來更多世紀度過之前，就要死亡了，那時『將不再有西方文化，不再有德人、英人或法人』。

雖則著者堅以爲他這部書的本旨並非一種悲觀的預測，但各界人士漸認西方的衰落爲說明西方霸權之衰亡的一種很有根據的預言。因爲這樣，它很有聲價，並得到很廣的銷路。在此書中一般憂鬱的人們證實了他們的恐懼，而覺醒迷夢的人們也由此得到世事無謂的證據。

戰後德國所通行的書不獨是悲觀主義和宿命論的著作。關於戰爭的原因，阻止戰爭的方法，或戰勝的策略之書籍，銷售以千萬卷計。當時又風行傳記與言行錄，著作者多爲覺得對於本人過去的行動有解釋或辯護之必要的官吏，及以前曾與皇室多少發生關係的人們。最可異者，雖然威爾遜爲德國通國所常常討論到的人物，反沒有他的詳細的德文傳記，直到和平條約簽字後十多年方有。

記載與描寫戰事和前線生活的書籍更是汗牛充棟，其中有許多種並銷行了很多版。雷馬克 (Remarque) 所著的西線無戰事 (Im Westen nichts Neues) (一九二九年) 和他後來所著的，更成熟而更有思想的歸路 (The Road Back) (一九三一年) 兩書風靡了全國人民。關於各種神經病和精神病的心理分析研究和心理學的小說為銷路最好的書籍之冠；戲劇的著作，如欲為成功的作品，也須具有悲劇的與恐怖的性質。在藝術方面，這種精神也反映出來，「表現主義」或「藝術中的直接動作」之推行於德國，亦比在其他地方為徹底。關於機械、死亡、命運、精神錯亂之沈鬱性的，幾何的和奇異的種種表現都很時髦。

那時確是德國國民心理變化史上一個憂鬱的時期。刺忒諾說：「昏夜降臨了歐洲」，他說了這句話不久，就在柏林的街上被刺了。

這種失望的態度成為德國老年人或中年人的特質——他們所抱的愉快與前途穩定的好夢給戰神炸得粉碎。但這種態度在青年人中並不普遍。因為他們的計劃未遭顛覆，他們的計算也未受破壞。他們不過從戰爭時期的飢饉、貧困、專制的束縛與限制上得到反省，他們認和平是樂觀的一種原因。這一羣青年人斷言，大戰所以發生，實由於他們的年長者之盲目的愚蠢，宿命論的暗中摸索，以及無知、因襲、思想陳腐的結果。但青年人自己卻是另一種材料造成的。他們相信自己決不會盲從人家沿着毀滅之路前進。他們會利用以前的犧牲者的經驗，懂得在將來的危機中怎樣處理自己。(註)

(註)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好的討論見 G. P. Gooch 所著 Germany (1927) 一書。

青年人的抗議並非單向年老一輩的人提出，並且也向整個工業化的文化提出，這種文化很容易把個人埋葬在機械與集團組織之下。少年德國所尋求的模範是「在生活比較簡單之時，並在國民的創造衝動尚未被國家的偶像崇拜所掩蓋之前的舊德國」。雖然這種運動力求「同過去時代發生新的接觸，但他並不是反動，因他只對從前時代的精神表敬意，並非對從前時代的形式表敬意」。

有如普魯士在一八〇六年戰敗後受拿破侖的凌辱一樣，德國青年現在覺得國家的復興須依賴國民的較高的精神與體格之發展。古時德人的自由簡單生活，認為就是療治國民的失望與麻木的良方。體操、森林空氣、日光、歌曲，這些都是恢復信仰與希望的必要物。因此，一個有組織的 *Jugendbewegung* 或青年運動——它在一九一四年之前早有相當的進展——引起了新的興趣，並吸引了幾百萬的新來者。斐雪 (*Karl Fischer*) 在一九〇四年所創辦的「候鳥會」 (*Wanderzigeuner*)，現在成爲一個偉大的國民團體，而德國的森林地與深山報以歡呼的回聲。習俗與限制被拋在一邊了，自由統治了一切。異性伴侶間的不自然的界限除去了，父母的監督權減少到最低限度。(註) 這種運動促進了德國青年的健康與理想的普遍發展，並對整個國家供給了一種亟需的樂觀主義。

(註) 有些皈依新自由的人提倡了裸體運動並創辦裸體會社，但其中祇有少數能够永久存在，其餘都是曇花一現的。

正如德國人的祖先愛好體力和敏捷的競賽一樣，德國的現代青年人也擇取競技爲發洩好動的精力的嗜好。在每個運動場中，德國人力求博取超過其他國家運動員的記錄，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三二年的世界運動會都

引起了迥異尋常的興趣。西米林 (Max Schmeling) 爲獲得全世界重量拳賽錦標的第一個德國人，他被敬爲新的力量的象徵。奧舍姆 (Fraulein Cillie Ausem) 是一九三一年威木布爾敦 (Wimbledon) 網球錦標的獲得者，因此她成了全國崇敬的女英雄。

這種運動也有牠的弱點。有時候，自由與放縱相混同了。當時一部分青年中有一種趨勢，好嘲弄行政當局並輕視老年人或白髮人。許多青年的組織同政治團體、宗教團體，或重視階級的團體混爲一體，友愛應該盛行的地方反而時常發生痛苦與爭鬪。惡劣的經濟情形與一九二九年後國際間所顯露的日有增加的惡感，逐漸使正在發育的青年男女更加疑惑，究竟他們的樂觀是否正當，他們的肌肉與理想是否具有充分的力量足以重建文明。結果，許多青年人對於年長者所犯的愚蠢的批評，比從前和緩得多了。

政黨與政治（一九二四年——一九三二年）

一九二〇年當選的國會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解散了。在牠的會期之內，四位國務總理——衛司 (Wirth) 博士、庫拿 (Cuno) 博士、史德理斯曼 博士和瑪克斯 博士——都會努力恢復秩序並鞏固共和國。但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四日的選舉中，這幾個人所隸屬的中和政黨在票數方面損失甚重，而左右兩極端派卻大有所獲。總理瑪克斯 (中央黨) 因此辭職，總統亞伯特 乃商請國家主義黨的領袖組織新的聯合政府。國家主義黨的反動性辭——此黨的若干黨員建議以提庇磁 爲國務總理——不久激使亞伯特 重召瑪克斯 糾閣，結果他組成

了另一個中和的聯合政府。

這個內閣在國會中所能操縱的人數並不甚多。因此，當它必須得到全數三分之二的大多數以求通過道威斯計畫所規定的某種鐵路法律時，政府就要求國家主義黨予以擁護，而許以幾個閣員位置，作為酬報。國家主義黨雖公然反對道威斯計畫，竟應諾政府的要求，准許牠的黨員對於尚未決定的那種法律自行斟酌投票。於是有很多國家主義黨黨員投贊成票，使所盼望的法律得以制定。然而，當政府企圖履行關於邀請國家主義黨黨員加入政府的諾言的時候，其他政黨激烈反對，以致國會終被解散，政府明令規定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七月舉行新選舉。

在這次選舉中，中和的政黨因保皇黨與共產黨失利而獲到許多席，但國家主義黨也選出足額的代表，使組織政府之事成為困難的問題。在十二月十一日，瑪克斯因不肯容納國家主義黨黨員加入他的內閣而辭職了，直到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中央黨——人民黨——國家主義黨的聯合政府繼在路德博士領導之下組織成功。雖有國家主義黨加入內閣，但當外交部長一職落於史德理斯曼博士之手的時候，政府仍然施行協調的外交政策。史德理斯曼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起就在每一個政府之下不斷地掌管外交部事務，直到他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中逝世為止。

在路德內閣組成後數星期，總統逝世了（二月二十八日）。亞伯特曾努力於保衛國家，引導牠度過六個困難的年頭。他在艱苦情形之下宵旰勤勞，忠於工作，並很盡心為他的國家和工人階級謀利益，雖受很多私人的辱

罵，仍鼓着勇氣忍耐。他沒有受過任何高等教育，而能在這個非常尊重學校訓練的國家陞至最高的地位，設非有超凡的本領，何克臻此。成于成萬的工人認他爲良友與保護者，他們的成爲共和國的忠實擁護者，實由於他是一個忠誠的共和黨員所致。因爲憲法中沒有副總統的規定，所以現在必須舉行德國首次的總統普選了。

依照德國選舉法，總統的選舉必須全國投票，候選人如得到全國所投之票的大多數，即爲勝利者。倘使在選舉中沒有一個候選人得到這樣一個大多數，必須舉行第二次選舉。雖然任何政黨可以推舉新的標準「持票者」（即候選人），但沒有淘汰候選人的事。第二次選舉的結果歸於獲得多數票的被推舉者，不論他是否得到大多數。一九二五年的選舉就必須藉助於這種複選制，因爲在第一次投票（三月二十九）中，沒有一個候選人是勝利的。第一次投票的票數分配如下：

查爾斯 (Jarree) (國家主義黨和人民黨)	一〇、四一六、六五八票。
柏藍 (Braun) (社會民主黨)	七、八〇二、四九七票。
瑪克斯 (中央黨)	三、八八七、七三四票。
塔爾曼 (Thälmann) (共產黨)	一、八七一、八一五票。
赫爾帕喜 (Hellpach) (民主黨)	一、五六八、三九八票。
赫爾特 (Held) (巴威人民黨)	一、〇〇七、四五〇票。
盧登道夫 (極端國家主義黨)	二八五、七九三票。

共計

二六、八四〇、三四五票。

在第二次選舉舉行之前，兩個政黨的聯合成功了。中央黨、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他們在第一次選舉中所得之票幾乎達到全數百分之五十——現在聯合推舉中央黨的首領瑪克斯。幾個右派政黨，曾得全數約百分之四十三票，現在也聯合起來，但他們並不重推以前的候選人中的一位，而遴選年高望重的興登堡元帥。共產黨拒絕與其他任何黨派聯合，他們單獨重推塔爾曼。

結果，一種生氣蓬勃的選舉開始了，每一個政黨努力於吸引幾百萬合格的投票者——他們在三月的競選中放棄了他們的選舉權——到投票處去。這次投票於四月二十六日舉行。此次比第一次幾乎多三百五十萬票，而這個數目的大多數都為興登堡所得。最後的結果報告有一四、六五五、六四一票歸於這位七十七歲的老將軍瑪克斯得到一三、七五一、六〇六票，塔爾曼得一、九三一、一五一票。共產黨之拒絕參加中和黨的聯盟，在某一個意義上實使右派候選人的當選成為可能，因為瑪克斯與塔爾曼兩人所得的票如果合計起來，就比右派所得票數為多。

興登堡的當選在許多地方被認為對於共和政體的打擊。外國報紙，尤其是法、美兩國的，多大聲疾呼，作此項評論，並毫無顧忌地預言這位元帥一定會迎回威廉第二，恢復黷武主義，而使世界重陷於戰爭。幾個挑撥是非的壞蛋甚至主張用武力阻止那位當選的總統就職。然而，興登堡在就職時就宣誓無條件擁護共和國的憲法，他的中庸和平的政策不久不獨博得了德人的信任，並得到了全世界的信任。他也許願目睹帝國的恢復，但他無意違

反他對於共和國的誓言。他既寧肯採取德國的政策而不用一黨的政策，所以能夠調和德國國內的許多派別，而把一羣以前的仇敵融合起來。全世界迅速地忘却大戰期內大家對於他所說的壞話，他的八十歲生辰（一九二七年十月二日），成爲全世界向他表示尊敬之意的時節。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路德內閣總辭職了。它因批准洛迦諾條約，而突遭國家主義黨厭惡，並因內閣問題失去了他黨的擁護，在路德重又組織另一內閣之前，共經過六個星期，且發生總統獨裁制的威脅。不久，這個政府爲了國旗的小問題，也傾覆了（一九二六年五月）。

繼起的瑪克斯內閣在沒收前皇族的財產以供國家之用的問題上經歷了一番可怕的奮鬥。法庭對於這個問題早發表了各種不同的意見，皇族的要求大都被維持了。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此案被交付國民複決。贊成沒收的超過一千四百萬票，只有五十萬票反對沒收。然而，因爲國民複決須得有整個合格的投票團體的大多數表示贊同始能成立，結果表決沒收所需還差五百萬票。

瑪克斯總理覺得他的內閣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有改組的必要，且須容納幾個國家主義黨黨員加入內閣。是在中央黨贊成此舉之前，國家主義黨還得答應擁護共和國，贊成史德理斯曼的和平政策，並承諾與國聯合作。這種接洽結果並不順利，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國會就遭解散了。

在五月二十日的選舉之中，國家主義黨在票數方面損失甚巨，而社會民主黨卻增加了他們在國會中的議員達一五二席。瑪克斯的中央派與右派分子的聯合政府因此辭職。六月二十八日，社會民主黨黨員赫爾曼·米

勒(Hermann Müller) (他曾在九年前簽署凡爾賽條約)組織了一個臨時的「人才內閣」。他是一九二〇年以來，第一個以社會黨黨員資格出任國務總理的人。臨時內閣祇在較永久的內閣組成之前盡其職能，當時大家希望這個永久內閣最好由社會民主黨、民主黨、中央黨、人民黨、巴威人民黨的「大聯盟」組成。各黨間的爭鬧拖延得很久，以致最後的聯盟到一九二九年四月方始結合成功。其時，米勒仍任國務總理。上述五個政黨中的每一個在新內閣中所佔的閣員席同它在下議院中的勢力相準。

米勒的統治並不安樂，預算方面有莫大的困難，政府之接受楊格計畫頗引起國家主義者的反對。其時政府中對於一種特稅和修正的所得稅，發生激烈的辯論。失業情形變為異常嚴重，閣員對於應如何構成一種可實行的失業保險計畫一問題，意見很為紛歧。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七日，米勒內閣辭職了。三天之後，中央黨首領布魯寧博士組織了一個新的溫和的聯合內閣。(註)

(註)一九三〇年七月，民主黨與人民黨之中有幾個年青的黨員組織國家黨。十一月，民主黨解散了，國家黨成為它公認的繼承者。在同此數月中，國家主義黨因胡根堡博士所領導的幾個反動派的退出而分裂，這般反動派贊成恢復皇國而反對國聯。這個團體組成保守人民黨。

新內閣願意繼續施行前任內閣的各種溫和政策，這就是，履行一切國際的任務，在實施最嚴格節約政策時準備救濟農業，依照史德理斯曼的原則應付外交問題。自從史德理斯曼逝世之後，外交部長之職於一九二九年十月歸他的好友之一庫爾斯(Julius Curtius)擔任。政府在任期內時時發生搖動，內閣之數次召於傾覆，僅僅

因爲反對黨自身分裂，或因與登堡以解散國會爲恫嚇，並揚言欲依照憲法第四十八條於爭論不止時自居於狄克推多地位統治德國所致。一九三〇年七月，在國會斷然拒絕政府的預算案之後，總統就實行他的恐嚇了。立法機關解散了，經命令規定在九月十四日舉行新選舉。其時，政府在遏止國家收入的日益減少的企圖中，施行了幾個非常預算的法令。

一九三〇年九月的選舉中，有二十七個政黨推舉候選人，其顯著的特色即爲兩個極端派，共產黨與國家社會黨的得勢。在所投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票之中，共產黨得四五八七、〇〇〇票，幾乎比在一九二八年所得的多百分之四十。同時，牠在國會中的議員名額，從五十四席增到七十六席。最驚人的是國家社會黨的收穫，他們在國會中的代表從十二席增至一〇七席，而所得的普選票數從八〇九、〇〇〇票（一九二八年）增加到六、四〇〇、〇〇〇票以上。他們此刻在下議院成爲第二位的最大團體，僅次於有一四三席的社會民主黨。在分析國家社會黨（他們也被稱爲法西斯黨，希特勒黨或國社黨）這次勝利的因素之前，必須先述及該黨的早年歷史和它的首領希特勒的種種活動。

希特勒主義

這個國家社會黨的未來領袖，以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生於上奧地利，爲一個沒沒無名的關吏之子。希特勒的父親要他入政界做文官，但他不依從父親的志願，儘發揮他繪畫的才能，後來跑到維也納去研究建築學，成

爲建築師。但是他在投考繪畫學院時未能及格，僅設法做了一個裝飾師和圖案設計匠以維持生活。

他時常和同行工人辯論，尤其是關於政治和經濟問題，他執意不肯參加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他說他既不明瞭它的宗旨，又不贊成它的方法。結果，他以本人不能得到和保持一種職業之咎歸於社會主義者的好謀——或者因爲這個關係，他後來痛恨馬克思主義，並且，因爲他平常把過激主義與猶太教併爲一談，認社會主義者的運動爲國際猶太民族支配工人的一種企圖，所以他又變成堅決的反塞姆族者。

在一九一二年，希特勒到慕尼黑度日，當大戰爆發時，他得到巴威邦當局的允許加入巴威軍隊，赴前線作戰。他顯然不願參加奧——匈的隊伍，因爲他非難奧——匈聯合帝國是幾國民族所組成的國家而不是一個民族的國家，他在西線上很能盡職，受了槍傷，中了毒氣，得過鐵十字獎章。

一九一八年的德國革命事件使這位軍人充滿了怨恨，他在那個時候依然不甚著名。直到一九二三年，始爲人所知，那時他同了盧登道夫和其他的人參加（十一月九日）推翻政府的企圖，但失敗了。希特勒以共犯謀叛的罪名，被判處五年徒刑，但在獄中住了幾個月就被釋放了。他由於列入巴威軍隊的兵籍失去了奧地利的國民資格，並因謀叛和判刑之故在德國也好久不能得到國民資格。於是這位世界上最愛國的團體之一的領袖，竟有好多年（直到一九三二年）是一個無國可歸的人。

希特勒從監獄內出來後，即將新生命注入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這個政治組織是他在一九一九年所協助設立的，並在他被迫不得活動的時期內漸就衰微。希特勒的六個老同事之一，後來充德國社會黨經濟顧問的工

程家斐得 (Ottofried Fodor) 曾在 1920 年 2 月爲這個團體起草了一個大膽的而不切實際的黨綱「二十五點」後來卒經希特勒於 1930 年在他所著的自傳我的奮鬥 (Mein Kampf) 中將這個黨綱加以擴充。

依照這個黨綱的宣言希特勒黨的最後目標爲建立「第三國家」(註一)也就是一個大德意志在這個國家中所有「日耳曼族血統的人民，不論其信仰如何」都應聯合爲一個國族，這些人民包括奧地利、荷蘭、波蘭、捷克斯拉夫和亞爾薩斯地方的德意志人。然而猶太人卻被認爲外國血種。(註二)這個「百世大計」注視到下列各項：廢除凡爾賽條約與聖澤曼條約；反駁協約國所加於德國的戰罪；再將賠款數目加以激烈的修改；再取殖民地以爲自給自足之助；排斥非德意志血種的人民及在 1914 年 8 月後遷入德國的僑民；對於國民的職業和適當的生活狀況予以政府的擔保；廢止不勞而獲的收入和高利率；沒收因大戰所得之利益；將托辣斯和大百貨公司收爲國有；改革農村與取締地價投機；國家對於老年人和國民的身心發展加以妥善的保護；凡不危害國家安寧與道德的宗教信仰完全自由；與其他大國軍備平等。德國在大陸的霸權當以與英意聯盟並在將來與法(德國的主要仇敵)俄(德國將來開拓殖民地的最近出路)開戰這兩種國策來實現。復興運動的口號爲「諾狄族主義」(或北族主義 Noricism)和反塞姆族主義 (anti-Semitism)。

(註一)第一國家爲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第二國家就是共和國。

(註二)希特勒自己是一個天主教徒。

國社黨有縝密的組織，而以卐字形爲黨徽。同意大利的法西斯黨一樣，他們有繁縟的儀式和軍禮。普通黨員

——在一九三二年達七〇〇、〇〇〇人——按月付小數目的黨費，在開會時務須到場，通常並須擔負入場費。在一般黨員之上有衝鋒隊（Sturmabteilungen），大部分為德奧大學的學生和畢業生，他們被指定擔任特殊職務，例如保護國社黨會議和搗毀過激派的集會。一九三二年四月，政府因為這些衝鋒隊時常憑藉暴動為手段，把他們解散了，但終於允許他們重行組織。普通黨員和衝鋒隊都穿褐色襯衫，佩紅白色臂帶，繫黑卐字章。黨中復有一小羣警察（the Schutzstaffeln），他們充國社黨首領的衛隊，並執行特別困難的使命。他們穿黑色襯衫，上面飾有白色頭蓋。

為便利黨的宣傳運動起見，他們把全國分為二十六區，每一大區再分為若干小區，每個小區由六個以上的受過訓練的演講員主持之。希特勒他自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演說家，能够感動聽衆，但這種電感結果的產生是由於他演說的態度，並非由於演說的內容。同墨梭里尼一樣，希特勒能利用一種顰眉蹙額的表示和磁性的人格，得到收穫。他在德國的婦女界和國家主義的青年中很得人心，這般青年組成了希特勒青年團。

希特勒主義的主要柱石之一，是中產階級中戴白領的一部分。以收入與生活標準而論，屬於這一類的三、五〇〇、〇〇〇人之中有許多實在無殊於無產階級。但是，他們與工人不同，並不向社會主義者要求經濟的救濟。階級的自尊心使他們向別處求助，而希特勒主義似乎供給他們一種可能的幫助。同他們一樣境況不佳，一樣不願承認與無產階級有共同利害關係，並一樣準備試驗國社黨的救國策者，復有數千從前的軍官，陣亡兵士的寡妻，和退休的商人。

此外，並有其他許多熱心贊助國社黨的人士，希特勒黨的反塞姆族的立場得到許多職業界中人的同情，他們深切感覺猶太人在法律、醫藥、銀行和工藝各業中的競爭。零售商店的店主們——他們的生計為大信託公司與百貨商店的活動所危害——贊成國家社會黨所主張的政府保護小商人的計劃。失望的農民，尤其是在德國南部的，對於國社黨也加擁護。在一九三一年六月，農民的全部債額估計為三十億元美金，並因為這些農民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對私人財產的態度不表同情，所以他們齊集於國社黨的旗幟之下。

大學學生與畢業生又為國社黨的力量的一來源。在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三〇年間，全國中大學生的數目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千萬失業的知識分子漸覺得他們在現行制度之下的命運毫無改進之希望。在他們看來，凡是破壞舊制的計畫，似乎都不無光明的前途，他們大都贊成停止賠款的付償，再度獲得殖民地，擴大國家的軍隊。最後，一般深懼共產主義之進展甚於恐懼國家社會黨之溫和的反資本主義的實業家也擁護希特勒主義。斐得在某一次會細心指出國社黨所建議的托辣斯之社會化，並不以「我們的重工業的真正創造者——如克虜伯（Krupp）、啓道夫（Kirdorf）、泰森（T. Jysens）、曼尼斯曼（Mann smann）和西門子（Siemens）等人的公司」為目標。

勞工區域和幾個較強的天主教區域，於希特勒很少擁護。在一九三二年，他的黨徒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是來自勞工階級的，甚至在這一羣中仍有大部分無疑地是為借重國社黨的勢力有得到職位的希望所引動而來，並非因為政治上的信仰而加入。

將近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的選舉的時候，國社黨儘力利用政府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德國猛醒』和『工作與麵包』被採用爲選舉運動的標語；在投票前兩星期之內先後舉行超過三〇、〇〇〇出席人數的集會。國社黨演講員時常向他們的聽衆提醒德國被奴役和政府諂事協約國的情形。『戰罪的謊言』被他們猛烈攻擊，而賠款一節也遭駁斥。演說者所講的內容通常很空泛，在所預許的諾言方面也不一致，對於言語的矛盾一點也絕不認爲邪惡。希特勒的選舉宣言慫恿投票者『把那些陷他們的將來於悲苦的人送給魔鬼』。

投票者在抗議當時的不良情狀並抗議當局之顯無能力補救那種情狀之中，把前所未有的票數投在極右派和極左派方面。可是布魯寧總理仍能在國會中集合充分的中和派的擁護力量，維持其職位到一九三二年五月。

在一九三二年前半年，布魯寧向許多政黨的首領建議，由國會延長興登堡總統的任期，這樣一來國家可節省選舉的經費並避免麻煩。希特勒反對這種建議，於是定三月十三日爲選舉日期。興登堡和希特勒都是候選人，後者因受任爲布藍士外喜 (Brunswick) 邦駐柏林使館的隨員而成爲德國國民（二月）。塔爾曼又爲共產黨的候選人，極端國家主義黨則推舉厄斯忒堡 (Theodore Duestenberg) 爲候選人。

這個選舉運動是生氣蓬勃的，並引起外國的深切注意。興登堡獲得一八、六五〇、七三〇票，距當選所需的大多數僅少百分之一的一半，而較與他票數最相近的希特勒多得七、二五〇、〇〇〇票。塔爾曼居第三位，得四、九八三、〇〇〇票。於是在四月十日，舉行複選，人民重又投票。這次興登堡總統以在約計三六、五〇〇、〇〇

○的總票數中幾有六、〇〇〇、〇〇〇票的多數，重又當選連任。甚至巴黎也歡呼與登堡爲所有候選人中「最穩妥」的一個，他就在八十五歲那一年開始他的第二個七年任期。

在總統競選後兩星期，希特勒黨在許多邦的選舉中大有所獲，尤其是在普魯士邦。這些進展一部分由於布魯寧的社會黨——中央黨所採取的反國社黨的手段。衝鋒隊被解散了，褐衫制服被禁穿了。反之，許多德國人民漸漸感覺總理以緊急命令爲治的制度很少成就。失業的數字繼續增高，國家預算的短少竟達美金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並且布魯寧的和平外交政策實際上對於德國毫無補救。德國的種種請求未經各國注意，法、英、美三國和國際聯合會並無願和柏林政府合作解決歐洲的種種困難的表示。國家主義黨因此大聲疾呼，要求採取更有效的舉動，於是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布魯寧內閣就總辭職了。

總統遴選（五月三十一日）巴本（Franz von Papen）上校爲新內閣總理，這個人就是在美國中立時期內在該國被控有不法活動的人。巴本選擇了一羣保守的人爲他的同事。新政府顯然不能在國會（一九三〇年九月所選舉）中統馭大多數，後者遂立被解散。政府規定於七月三十一日召行新選舉。其時國社黨又獲准許穿上他們的褐色衫並恢復他們的軍隊組織，而國防部長施萊赫（Kurt von Schleicher）和政府中其他領袖也在開始公然主張德國在軍備與安全保障上應與他國受同等待遇了。

國會選舉的結果，使希特勒黨得到二三〇席，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增加了一二三席。再者，他們所得的普選票數倍於前次國會選舉中所得的。社會民主黨獲得一三三席，中央黨得九七席。國會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召

集了，希特勒的副手之一被選為議長。在經過數次組織的事情之後，國會就休會至九月十二日。當它重新集會的時候，國務總理立即把它解散，規定在十一月間舉行另一選舉。巴本深懼這個國會將對政府在九月五日所着手的經濟復興計劃投票否決（此項計劃擬從國庫中撥款借與實業界，俾商業可以振興，失業可以減少）。在這一情形中，總理已得到興登堡總統的充分協助。反之，他被法西斯黨與共產黨斥為獨裁者和不合憲法的總理。

一如所預料的一樣，十一月六日的選舉不能使任何一黨或任何政黨集團具有支配國會的勢力。但是，國社黨的總票數竟失去約二、〇〇〇、〇〇〇票，而共產黨反多得了七〇〇、〇〇〇票。所以，內閣似乎可以繼續它不受國會限制的統治，因為總統堅持國會的議員必須是一種能在他辭退內閣之前擔保施行一定的政策的人。我們在此處可以注意，總統和總理如能和諧合作，就可以創立這一種「合乎憲法的獨裁制」，對於這種獨裁制，國會很少干涉的權力。

經濟的復興與衰落

大戰前的德意志帝國是一個富有效能而組織嚴密的經濟機構，它有肥沃的土地，豐富的基本原料，智力甚高的工業領袖，熟練而耐勞的工人階級，很發達而很調整的鐵路網與水道網，海外的財產繁盛的運輸事業，獲利的國外投資，很多的市場和絕好的國際信用地位——這一切都是它的富強之資。然而，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間的大戰使這錯綜複雜的經濟機構完全凌亂了，而致國家有全盤的整理與修補之必要。

不僅大戰使德國蒙受巨大的物質損害及千百萬國民的死亡或殘廢並且和平條約也剝奪了德國十分之一的人口和八分之一的疆土。這個戰敗國又損失五分之一的煤，三分之二的鐵鑛儲量，十分之七的鋅，十分之一的製造廠，七分之一的農產，全部的殖民地 and 國外投資，大部分的商船，和幾乎全部的國外商業契約。此外，這個年青的共和國又須對付嚴酷而敵視的歐洲（它對於德國的復興阻礙多而幫助少），並忍受主要工業區域魯爾之暫被占領。殘破的德國祇在一方面是幸運的：它毋需重建戰毀的區域，因為大部分實際的戰事是在外國的疆土上開火的。

德國在緊接大戰的數年內，經濟情形日益降低，直到隨一九二三年的崩潰而達到最低點之時方有起色。然而，正在國家瀕於土崩瓦解的時候，政府與人民團結一致，來努力挽救祖國的光榮並重建它的經濟組織。此後不久就有上進的趨勢，這種趨勢平穩地繼續了六年，直到一九二九年。在那一年，工業產額的總量竟達到超過一九一三年所有的之一點。在工業的發展，生活的標準和潛伏的偉大各方面，德國似乎是僅次於美國。

這個戰敗國的「工業的開花」，是許多原因的結果。德國貨幣和鈔票在外國的巨額銷售，通貨膨脹政策的採用及紙幣的整批拒絕付價，增加了國家的真實財富約二十億元。它從外國資本的大宗流入上也得到益處，尤其在道威斯計畫實行之後。德國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這個時期之內所欠的外債——國家的、地方的和私人的——總數達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其中約有百分之七十是從美國來的。這種借款雖大部分馬上又被輸出，以付償賠款，但其餘部分都利用於工業的復興與擴充。

有助於經濟復興的另一因素爲「合理化運動」之流行於德國工業界和商業界的各方面。德國人把美國工業的非常發達歸功於合理化的觀念與大規模的生產，他們深信只有同時採用這兩種政策方能導向經濟的更生。泰羅 (Taylor) 與福特 (Ford) (一爲工業效能的「鼻祖」) 在德國人眼中都成爲英雄了，他們於是推舉專家到美國去研究美國的方法與制度。

早在一九二一年，德國設有「全國效能改進局」(National Efficiency Board) 牠的任務爲研究、分析、並力求解決德國工業界所遇到的許多工商業問題。其他從事研究提高農業、管理和建設的工作效能的公私機關也紛紛設立。明細言之，合理化運動的目的在於使生產品與原料標準化，採用科學方法的管理與設計，傳佈職業的指導與訓練，獎勵托辣斯與聯合公司的設立以防止重複與同歸於盡的競爭，並調整全國的生產程序。

合理化的結果使人民有可驚的儲蓄。在各種工業之中，每一個人的平均產額在一九三〇年比在一九一三年高出百分之二十。以煤業而論，一九二五年中五六二、〇〇〇人可生產一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噸煤，而在一九二八年，經過很可觀的合理化之後，五五六、〇〇〇人可生產一五一、〇〇〇、〇〇〇噸。汽車業的雇員數目從八七、〇〇〇(一九二五年)減到八三、〇〇〇(一九二七年)，但是出品的價值在同一時期從七七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到九〇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家大銀行在一九一四年雇用三三四人經營九〇八〇戶帳目，而在一九二七年，只需二八四人辦理一八、九一六戶帳目了。在農業和其他工業界也有相似的结果。合理化也有它的缺點，這是沒有人能够否認的。這種運動之推行有時趨於極端，而德國人自己也漸漸談到

有「將合理化運動加以合理化」之必要了。並且，某某數種方法在美國產生滿意的結果，事實上不能擔保這些方法在歐洲情狀之下也一定同樣有用。德國人將無限的希望放在合理化的價值上，使他們毫無限制地肆行借債和投資，以致到後來證明不易償還。當供過於求的時候，對於較小規模生產就難加以調整了。反對這種制度的最強理由，或者就是失業人數因之而大為增多。縱然有這些弱點，要之合理化運動在德國的經濟復興過程中，仍為主要的因素。

此外，德國工業的勃興當歸功於煤，化學家與同業同盟，亦即一位有經驗的觀察者所謂「*Triumvirate of Coal, Oil, and Iron*」(德共和國縱然損失大量的煤藏，卻毋需慮及動力的供給，對於鋼鐵工業的需要也能供應裕如。鑛山的廣行整理與機械化，連同開鑛技術的增高使生產率提高到可比大戰前的程度。德國目前的疆界以內的煤鑛區在一九一三年產出了一四〇、八〇〇、〇〇〇噸的煤，但在一九二七年就產出一五三、六〇〇、〇〇〇噸。此外，為補償黑煤儲量的損失起見，價值較低而容易得到的棕色煤或褐炭的生產大為激增。那種煤的產額從一九一三年的八七、〇〇〇、〇〇〇噸增至一九二七年的一五一、〇〇〇、〇〇〇噸。因為褐炭的價值僅等於煤的五分之一，所以許多褐炭都變成電的來源，然後輸送為廉價的、有效的和直接的動力。

德國的化學家素以精熟和巧妙著聞於世，這種名望在大戰期內和大戰之後仍得保持，而德國不久成爲世界最大的化學品輸出國。在染料、藥品、(註)肥料和照相材料的發展方面亦有很大的進步，而在化學合成物範圍內更得到非常的成功。市面上早有合成的金雞納霜替代品，合成的樟腦、靛青、木酒精、硝酸鹽、橡皮、汽油、人造絲、

樹脂和皮革。合成的硝酸鹽的生產，包括液體的空氣的應用，是化學工業中最大的一枝。國內硝酸鹽的產額從一二、〇〇〇噸（一九一三年）增到八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二八年）。智利硝酸鹽入口額的減少也有同樣的比例。這樣一來，德國在工業原料方面依靠外國的程度，迅速地減到最低點。

（註）所發明的藥品中最有價值的「一種為拜耳」[Bayer's]，它是治療非洲睡病的特效藥粉。此藥的發明者「曾拒絕將其製法公開，但若德國得回一塊非洲殖民地，他們願開出一個公用的藥方」。

德人既明瞭聯合托辣斯的價值在於提高生產效能，故寧取「垂直線」的托辣斯制度，就是「把工業程序的各階段與各部分，如煤鑛、鐵鑛、鋼廠和船塢聯合起來」。這種工業的組織之在德國，比在其他國家更為發達，政府對於聯合的程序，加以贊助而不反對。最大的托辣斯創辦者或者要推魯俄·斯丁尼斯（Hugo Stinnes）（一八七〇——一九二四年），那個巨大的「西門子—萊因—易北—叔刻爾脫聯合會」（Siemens-Rhein-Elbe-Schuckert-Union）之組織成立，他實負其責。在斯丁尼斯死的時候，據說他曾於一三八八種企業中有利益關係，並曾操縱德國的生產總額幾五分之一。他擁有土地、森林、旅館、紙廠、避暑地、油田、報館、電氣公司、銀行、煤鐵鑛、銅鑛、鉛廠和其他幾十種財產。在商界中地位僅次於斯丁尼斯者有克虜伯、西門子、刺忒諾、啟耳道夫和泰森。

在德國盛行的聯合組織，不單是托辣斯一種。早在一八七三年，就有一種稱為同業同盟的組織，廣泛地說來，「它是各種獨立的企業的聯合會，其設立之目的在為共同利益調節價格、生產、市場或規定買賣的條件，或單為以上之兩種或數種目的」。這是一種自願的「經濟設計」，為蘇俄五年計劃中所包含的強迫經濟設計的前驅。

在大戰之前夕，德國有幾百這樣的同業同盟，但它們在大戰期內用處比較不大，因為巨額的戰時需要品實際上已消除了商業競爭。在大戰後，尤其是在通貨膨脹的全盛時代，同業同盟如雨後春筍一般發達起來。在一九二三年，共有一五〇〇同業同盟。這些同盟組織濫用牠們統制買賣和價格的能力，最後政府迫過了（一九二三年十月）同業同盟法（Cartel Law），規定他們的活動應該公開並須受政府的監督與指導。從此以後，同業同盟對於國內經濟制度的影響力就衰落了。但在國際同業同盟的組成中得到補償的進展，尤其是在鋼鐵軌、與炭酸鉀工業方面。統制生產與價格的最大國際機關為大陸鋼業同業同盟，它代表德、法、比、薩爾、盧森堡、捷克斯拉夫、奧地利與匈牙利。但是國際同業同盟組織能否永久存在，似乎是很可疑的，因為它很難使會員國遵守受限制的產額，而要使他們在過度生產時繳納罰款，那是更難了。

除以上所提及的使德國經濟復興的原因與成就之外，必須再提到其他幾個項目。政府所給予的助力（金錢的其他種的）並不限於工業。造船業和其他主要企業也得到政府的幫助。凡爾賽條約將德國商船的噸數減到五〇〇、〇〇〇噸以下，而其中大半為沿海岸的船隻。因此重造船一事急不容緩了，而人民也加緊從事。政府以低微的利息墊付造船商人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資鼓勵，並貸與船塢補助之款，使它們能以低廉的代價和迅速的效率造船。

在一九一三年，德國商船的等級僅次於英國。到了一九二〇年，它在全世界商船中占第十二位，在西班牙與丹麥之後。至一九三〇年它又昇到第三位，次於英、美所有的噸數約在四百萬以上。這個數目雖僅等於大戰前德

國商船噸數的五分之四，然而現有的船隻都是很新的，其建築也是最新式的。在一九二九年，德國下水的船隻的噸數超過其他任何國家，而在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〇年之間，北德魯意輪船公司的兩隻新船「布勒門」(Bra-men)與「歐羅巴」(Europa)號打破所有橫渡大西洋的船隻的速率紀錄。

在輕氣船事業方面，德國同樣昇到優越的地位。「大徐泊林」(Graf Zeppelin)飛船在一九二九年八月環航全球，僅以少於十二天的日期飛畢航程。並且，德國因被禁止製造軍用飛機，就發展商用飛機，這些飛機在安穩與速率方面，達到引人妬羨的紀錄。在德國科學界的最大成就之中，可以提及的就算柏林的德國博物院，它或者竟是世界上最優良的工藝學的博物院了，在那裏參觀者可以看到新舊式機器的最簡單和最複雜的作用。

最後應提及的一項，即德國從許多美國公司駐德分店所受的好處，例如大摩托公司 (General Motors) 福特汽車公司 (Ford) 基利斯雷公司 (Chrysler) 科達克照相公司 (Kodak) 奧替斯電梯公司 (Otis Elevator) 麥根塔勒鑄字機公司 (Mergenthaler Linotype) 和美國金錢收入自記器公司 (National Cash Register) 皆大有助於德國。這些企業不獨將巨量的美國資本輸入德國，並雇用德國的工人，利用德國的原料。德國人遵守並摹倣那些公司的方法，又欣然採取美國的有些好想頭，如連環店，「五分與一角」物品商店。現成衣服，和咀嚼橡皮糖的嗜好。柏林在事實上以它的「洛克散」(Roxxy) 式的戲院、汽車、機器、和摩天的屋宇，通常使美國遊歷家詫為歐洲中最美國化的一個城市。

但是德國的經濟復興沒有持久的命運。即使在繁榮與樂觀達到高度的時候，預示衰落將近的因素已呈現

了這些不利的發展包括以下各項：大戰期內所耗盡的供給物補置甚緩；商借外債日益困難；賠款問題不斷爭執；對於以前的俄國大市場和其他戰前的重要主顧，無力完全取回；政府方面對於海陸軍軍用品缺乏需要；德國鄰近的新興小國和美、英、法等國方面，對於德國時存猜忌的態度並定有很高的關稅壁壘；德國人有減少裸麥與番薯的消費而喜食小麥與菜蔬之趨勢，因之使許多農夫陷於收成過剩而致負債的命運；以及由於合理化的進步，減少了對於人力的需要。

此外，失業的大學畢業生與工人（包括穿寬袴與帶白領的兩類人）的人數逐漸增加。在一九三〇年後世界不景氣的數年中，這種情勢更形劇烈，到一九三二年，在德國的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弱人口之中，計有六、五〇〇、〇〇〇失業的人數。失業保險制度與慈善的佈施似乎完全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這樣即供給了過激的共產黨和反動的希特勒黨宣傳運動的絕妙資料。

國務總理布魯寧的政府（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二年）因有總統與登堡的幫助，很英武地奮力應付這個危機，但是國際的情勢阻礙了解決國內困難的任何辦法。政府雖有很重的賠款負擔，但仍在較寬裕的時期內把大宗金錢用於種種可讚美而非必要的福國利民計劃，同時仍能使每個國民的賦稅負擔低於英國或法國人民所負的。政府認這種辦法是正當的，以為它是消弭革命與獲得全國人民忠實擁護的唯一方法，但姑不論其動機如何，這種政策使國家不得不對於外債有不當的依靠，總是很危險的。未來的崩潰已被注定難免了，它祇待外部情形使再借外債之舉不能實行時就實現了。

當德國政府與奧國政府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宣布訂立一種經濟條約的計畫（這種計劃有使兩國趨於合併的氣味）時，法國就集中所有的財政和外交的力量來阻撓這種行動。法國將以前在應用德語的國家中所投的資本，一律收回，並規定新借款須以政治條款（這是對方所不能接受的）為交換條件。法國又從英國銀行支取巨額的準備金，以防止英國的幫助借債國。因此，英國覺得要繼續貸與德國短期借款是不可能的。德國乃從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得到些微幫助，但德國的財政已近於破產，非有國際的一致行動，就無法救濟。

我們當記得，在一九三一年六月，美國胡佛總統對於各協約國的戰債，建議國際延期付償一年，並提出可展期付償的賠款項目。這樣一種辦法確實施行了，其有效期間從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起，到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為止。然而在一九三二年，德國總理布魯寧以明確的措辭宣稱，即在延期付款期限屆滿之時，德國也沒有力量重行付償賠款。賠款之按年輸出，須賴有利的貿易差額，可是德國在目前關稅與商業處處受限制的情形之下，決不能積儲這種有利的差額。

在一九三二年六月至七月間所舉行的洛桑賠款會議，絲毫不能解決這種進退維谷的困難情形。德國總理巴本不久又反復申述布魯寧的宣言。德國在經濟停滯的時候，決不能再付賠款。

外交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德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使本國重得加入國際團體，仍為具有良好地位

的一分子，這個目標所以緊要，不獨因它是保護被解除武裝的弱國的手段，並且也是德國經濟復興所依賴的商業復興所急需的。然而，德國一般政治家在國家的新方向究應向東抑仍向西（向蘇俄抑向協約國）的問題上，分爲兩派。寧願向東的一羣，主張與布爾塞維克聯盟，反抗壓迫的條約限制。傾向於西的一羣則贊成履行條約上的義務並與以諂的仇敵修好。

最初，似乎親俄派的見解可以獲得勝利了。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德國與俄國派赴熱那亞會議的代表在刺帕羅（Rapallo）地方訂定了承認蘇俄的協定和通商條約。四年之後，刺帕羅協定的原則重又在柏林所訂的友好與中立條約中加以確認。但是那時德國外交政策的東向趨勢，因受一羣主張「履行條約與修好政策」的外交家的影響而暫時陷於停頓。他們以史德理斯曼博士爲領袖，他時常被認爲俾士麥之後最偉大的現代德國政治家。

史德理斯曼是一個啤酒商之子，以一八七八年五月十日生於柏林，長大後在柏林和勒不士格地方讀書，專研究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他是有組織手腕的人，年方二十三歲的時候，就充薩克森（Saxony）朱古力糖製造廠協會的祕書。二年之後，他爲創辦薩克森製造廠聯合會的主動者之一，這個團體組織的目的在於改組本地的衰微工業。在一九〇七年，史德理斯曼以國家自由黨黨員資格被選舉爲國會議員，十年之後，他就成爲此黨的首領——這黨是大商業家的黨。在大戰期內，他主張戰事應積極進行，在革命之後他把他的黨徒改組爲德國人民黨，這黨贊成帝制，但爲顧到和平統一與商業復興起見，願意擁護共和政府。他在一九一九年居於韋瑪議會的議員

地位，投票反對接受凡爾賽條約。

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史德理斯曼被任爲國務總理，但國內的騷動（尤其在德國南部）和外國軍隊之占據魯爾迫使他在數月之內就下台了。他的繼任者衛司總理委他爲外交部長，他在以後十個內閣之中繼續任此職位，直至一九二九年十月他死的時候爲止。史德理斯曼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點（那時和平條約業已簽字）就是與法國修好和德國重新加入國際團體，爲一個平等，自由，而受人尊敬的夥伴。他是一個富有天才，誠實而機警的演說家，不久得到一般人民的信任與尊敬，雖則在國內外都有許多仇敵。一九二六年，他同白里安、張伯倫三人在洛迦諾會議對於世界和平有所貢獻，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金。他一生患病，當他漸入老境時，愈感公務的繁重困難。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他以一篇理直氣壯，但語弱聲疲的演說挽救了米勒政府，使之得免因失業保險問題而傾覆。翌日，他就逝世了。

他居於外交部長的地位，負責停止魯爾區內的消極抵抗政策。他曾以十分流暢的演辭，極力主張採取道威斯計畫，這樣即爲魯爾撤兵，恢復德國的誠實信譽，及商訂許多有利益的商業條約開一先路。他的最大的事業是與洛迦諾條約（一九二五年）的商訂與德國的加入國聯（一九二六年）這兩件事有關係的。

洛迦諾的故事，在前面已經說過的，（註）當追溯到緊接大戰的數年，卽在那時，在老練觀察者看來，法德如仍繼續猜疑彼此的行動，法國如仍時常怕懼德國的復興與復仇，而德國如仍怕法國對於萊因地帶和對於它的經濟力量有所陰謀，很明顯歐洲就難有永久的和平。史德理斯曼曾屢次向法國建議簽訂一個保證的條約，在一九

二五年他的建，得到法國的贊同，結果就有洛迦諾協定。

(註)見第八章「日內瓦—洛迦諾—巴黎」一節。

史德理斯曼在發起洛迦諾條約之後，就進行向國會取得對於他行動的核准。這件事終於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完成了，戰勝了國家主義黨的激烈反對，後者對於亞爾薩斯—洛林的喪失尚耿耿於懷。與登堡、社會民主黨，和一羣大實業家皆為他的後盾，這些實業家覺得與法國發生更和睦的外交關係或可改善商業關係。在十二月一日，條約正式在倫敦簽字，同日，協約國為表示對於德國信任起見，開始撤退科倫區域的駐兵。因為洛迦諾公約 (Locarno Pact) 須在德國加入國聯時始生效力，所以德共和國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就向國聯請求為會員國。國會則定於三月召集特別會議。(註)

(註)附在德國的請求書之後的為各國在洛迦諾所同意商訂的說帖，大意謂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祇「在與會員國的軍事情形相合並顧及其地理上的地位之範圍內」始對於該會員國有拘束力。這一層是德國所堅持的，因為被解除武裝的共和國不願於國聯對一個大陸上的國家採取行動時成為戰場，或於法蘭與俄國戰爭時讓法國軍隊越境通過。

德國自然要向國聯請求在行政院得一常任理事的位置作為它加入國聯的一種條件。然而使它驚訝的，在它進行這種手續之後，西班牙、巴西、波蘭、中國、捷克斯拉夫和波斯也提出同樣的要求。因之立即引起一個複雜的局面。史德理斯曼堅持德國之加入國聯應不受任何國際的磋商之拘束。但是因為西班牙與巴西恰巧在行政院中占有非常任理事的位置，要給德國以常任理事的位置，非得到它們的同意票不可。使事情更糟者不久大家都

明白張伯倫正在擁護西班牙的主張，而白里安正在幫助波蘭。史德里斯曼最後宣稱，假如他早知道這種陰謀顯然與洛迦諾條約之商訂有關係，他就決不會簽訂那些條約了。行政院中的瑞典代表安登博士隨着也宣稱：他不願對波蘭請求常任理事一提案投贊成票，因為所有的糾紛情形都是違反國際盟約的精神的。瑞典堅持着這個立場，雖然有一個國家以取消以前向它所提出的大批電話機的定貨單，而另一個國家又以宣佈廢棄已與它訂立的商業條約爲恐嚇，也不爲所動。

國聯大會和行政院都不能調解這種種意見，於是國聯就宣告休會，到九月再召集，對於德國的請求並無決議。接着國聯指定一個委員會，從事探討妥協的解決法，各國的代表也紛紛散去，有的很憤怒，有的很失望。德國人民對於他們所認爲不公平的待遇有很大的反感，以至東向政策似乎又引動了他們。就在這個時候，上面已提到的德俄柏林條約簽訂了。

當國聯在一九二六年九月重開會議的時候，各國代表一致投票通過承認德國爲會員國，並推舉她爲行政院中唯一增加的一席常任理事。另一個決議則將非常任理事的額數從六席增到九席，並規定任期爲三年。當時大家預期西班牙、巴西與波蘭將當選爲添增的三席非常任理事，但西班牙與巴西立即通知國聯，它們有意退出國聯。

德國在加入國聯之後，就有令人鼓舞的更進一層之發展。在一九二七年，協約國派駐德國的最後一個委員會被撤回了。同一年中，德人卡斯特爾 (Ludwig Kaat) 被任爲國聯常置委任統治地委員會的委員。一九二八

年，德國又以史德理斯曼的努力，簽字於反對以戰爭為國家政策之手段的開洛格公約。在一九二八年的國聯大會中，重開賠款談判的一條路也闢出了，最後的結果就是採用楊格計畫（一九二九年）和完全撤退萊因地的軍隊（一九三〇年）。

在史德理斯曼逝世之後，有一個時期他的繼任者和他的好友庫圖斯博士繼續施行他的外交政策，但後者在一九三一年，因為與奧地利訂立經濟同盟的企圖未能成功，辭了外交部長的職位。此後，外交上的勝利就不常有了。希特勒黨和其他國家主義者的活動結果，與法國在外交上堅持不變的強硬政策，使兩國間的外交關係益增困難。在一九三二年，巴本內閣，尤其是國防部長施萊轍，對於軍備平等與解除賠款重負的問題，採取更堅決的立場，但歐洲似乎尚無給予讓步的準備。

雖然激怒德人的戰後種種不平之事已在一九三二年之終消除了，但仍有許多足為煩惱因素的問題存在着。如德國東部邊界的問題，（註）與奧地利合併的問題，重取殖民地的問題，否認德國獨負戰罪的問題，與列強軍備平等的問題，及重行修改賠款項目的問題。這些問題似乎必須在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實行之前加以解決。

（註）關於但澤與波蘭邊界的討論，見第十七章「波蘭」一節。

第十六章 海布斯堡皇朝的兩個繼承者

奧地利共和國

(甲)崩潰(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年邁的奧皇兼國王約瑟逝世了。他臨御奧——匈帝國六十八年，到此告一段落，和他登基的時候一樣，這個當兒宇內正在倏擾不寧，干戈遍地。繼其位者就是他的姪孫，這個人的尊號為查理士一世 (Charles the First)，渾名卻叫「查理士末世」 (Charles the Last)。

查理士為人和藹溫厚，且有英雄氣概，但不諳治國之術，復無能力應付當時危急的局面。雖然他往往用心很好，他的決斷卻往往遲鈍，行動也很笨拙。他在海布斯堡皇朝的歷史上最危急的時代忽然成爲皇帝和最高的戰主，是非常不幸的。

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的事件毀損了奧——匈帝國人民的民氣。俄國革命的消息，美國之參加大戰，協約國在後方的巧妙宣傳，在在足以傷害該國人民對於他們的政府的信仰，特別是因爲奧政府遵循一種軍事專制的政策。使事情更糟者，捷克人正在陰謀危害帝國，斯拉夫人與匈牙利人的軍隊中和亞得里亞海艦隊的水兵中

牽起叛變，許多城市裏面的百姓遭遇空前的飢荒。海布斯堡皇朝所碰到的最後一次打擊即發生於維也納街道上的暴衆騷動的時候，他們大聲叫道：「一切權力歸於兵士與工人的會議」，同時維也納國會中的德人代表議決宣布成立一個德人的奧國。

查理士於拚命掙扎，企圖保持他的土崩瓦解的領土之中，頒佈了一篇宣言（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聲稱要組織一個新的奧地利聯邦國，其中各民族當成立一個自治的政治團體。但爲時太遲了。十一月十一日，即與意大利簽訂停戰協定後九日，查理士卒行退位。（註）爲了要不使他本身成爲他所摯愛的人民的自由發展之障礙，查理士毅然答應，不再參與國家的行政。他在遜位之後立刻離開維也納，退居厄喀曹（Eckartsau）地方的城堡中，四個月後，他和他的家屬又亡命於瑞士。

（註）兩日後，他又辭去匈牙利國王之位。

即在查理士離開維也納之前，社會民主黨黨員，基督教社會黨黨員和奧籍德人，已在德人的奧地利以幾乎不流血的革命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十一月十二日，臨時政府頒佈了試行的憲法，宣布奧地利爲共和國，並爲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國的整個一部分。皇帝的黑金兩色旗被改爲紅白紅三色旗，昔爲皇城的維也納則成爲共和國的首都。其時聯合帝國的非德人所屬的部分已成爲捷克斯拉夫與匈牙利兩個新興國，或變爲意大利、羅馬尼亞、巨哥斯拉夫與波蘭的疆土。帝國之崩潰大都未經暴力，大部分的原因，由於查理士的行動，他已解除了他的官吏在他登位時對他所立的忠順之誓。

在奧地利宣布爲共和國與選舉國民議會（一九一九年二月）之際，臨時政府監護着國家的福利。政府的主席由握權的政黨領袖輪流擔任，這些人差不多都是社會民主黨黨員和基督教社會黨黨員，他們無意於讓奧地利成爲一個共產國，因之迅速地鎮壓了許多赤黨的暴動。這般政治家中最傑出的就是鮑爾（Bauer）、阿德勒（Adler）、芮涅（Renner）、宰滋（Seitz）、宰泊爾（Seipel）諸氏，他們都願提早確立法律與秩序。由奧人在戰後所遇到的困苦艱難觀之，這自然是一種有幸的情形。

在軍事的敵對行動結束的時候，成千成萬的捷克人波蘭人與匈牙利人軍隊從前線各處經過奧地利開拔回家。超過一百萬的俄國與意國俘虜也於被釋放後各回本國，雖然他們大多數急於離開奧國，他們往往徘徊道旁，企圖一逞，來補償他的在囚營中所受的痛苦。在維也納，就有許多從前線歸來的飢餓戰士揚言欲起暴動，除非政府給與他們食物和住所。

德人的奧地利是聯合帝國的一分子，亦曾爲比較能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之中心。它從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取得原料和食料，從加里西亞和匈牙利取得穀類，它在亞得里亞海邊有過兩個最好的港口，以製造品出售於帝國各地方及外國。這一切竟因接着軍事失敗而發生的崩潰完全變了。鋼鐵、汽車、鐵路、電氣織物、造紙等大工業及銀行業全歸毀滅了，因爲所有的原料現在都在外國地方，因爲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各鄰邦都建有很高的關稅壁壘來抵制奧國的出產品，並因爲奧國祇能種植它的人口所需要的糧食十分之一。

失業的問題馬上成爲令人膽寒的景象。奧國的各重要組織都因領土喪失的結果人浮於事。奧國的官僚政

治本以冗員太多爲世所詬病，此刻成千成萬的災官都斷了生計。一般郵務員、鐵路人員、銀行辦事員和新聞記者亦然。醫生、教授和商人皆面有菜色，奄奄待斃，那一大羣的陸軍軍官及產業見奪的貴族，更不必說了。

在停戰後四個月內，協約國對於中歐同盟國繼續實行食物的封鎖。奧國因此項行動蒙害最大，在一九一九年，約有四〇、〇〇〇奧國兒童被送往國外（特別是到斯干地那維亞（Scandinavia）三國）喂養。另一批兒童（九〇、〇〇〇人）則於一九二〇年前半年被送出。有一個時期，許多失業的，凍餒的維也納人被遣至維也納森林伐木爲薪，由殷實的居民出資購買，並不是因爲他們需要木材，而是因爲這種辦法似乎是使那般無產民衆有事可做，不致騷亂的權宜之計。當美國的賑濟團來到奧國的時候，情形始略見改善。（註）

（註）這種可怕的景象（特別是在維也納），勞勃脫·牛曼（Robert Neumann）在他的洪水（Flood）這部小說內有生動的描寫。

（乙）國民議會

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之冬使奧國岌岌可危的混亂和破裂，引起了一般人渴望早日恢復秩序與經濟的穩定的心思。因之一九一九年二月的議會選舉，以比例的代議制和普選權爲基礎所舉行者，卒造成中和黨派的勝利。臨時政府於是辭職，以政權讓與「粉紅色的聯合政府」，這個政府的構成分子就是在議會中取得多數席次的都市社會民主黨黨員及鄉村的基督教社會黨黨員。宰滋當選爲國民議會的議長，芮涅則被推爲總理。兩人皆屬於社會民主黨。

國民議會承認臨時政府的宣言，其中大意謂德人的奧地利爲共和國，並且是德意志的整個一部分。接着海

布斯堡皇族被放逐了，它的財產被沒收了，使奧地利的地位適合爲德意志聯邦之一分子的對外政策也擬定了。政府卻沒有盡力商議維持從前與聯合帝國其他部分所成立的經濟協定。在這種情形之下，維也納當局在對德和約公布前從法國外交部忽開協約國決不准許所計劃的德奧合併，不覺大受震驚。

強迫奧地利於一九一九年九月接受的聖澤曼條約，就載有禁止德奧合併的條文，其中並規定此項合併祇有在得到國際聯合會行政會的許可時方能實行。因爲就一般情形而言，行政會的決議案必須經過全體一致的通過，所以合併的希望至少說是可疑的。就是「德人的奧地利共和國」一名稱也須抹去「德人的」三字，而改爲「奧地利共和國」。國民議會此刻除在抗議之下進行制定永久的憲法外，沒有選擇的餘地，制憲之事前經停止過，爲的相同草擬的德國憲法適合。最後，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議會採取了以基督教社會黨人所提出的草案爲藍本的憲法。該黨深恐許多過激的維也納無產階級在中央集權的國家中佔優勢，所以想出一個類似瑞士的聯邦制度。

憲法所制定的政府，包括總統一人和兩院的立法機關。下院稱爲「國民議會」(Nationalrat)以年齡超過二十歲之國民所選舉的議員組織之，任期爲四年。國民議會必須於選舉後三十日內集會，除以該會議本身之決議或法律外，不得使之閉會或解散之。上院稱爲「聯省議會」(Bundesrat)以各省(共有九省)所出代表最少三人最多十二人組織之。該項代表由省議會選舉，聯省議會的權力大都爲顧問性質。總理與內閣對下議院負責，並得以該院之單一決議彈劾之。

兩院合攏來構成聯邦議會，在一九二九年前，該議會有以秘密投票法選舉大總統（任期四年）的權力。在一九二九年，憲法中規定大總統由人民普選。大總統得連任一次，凡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上之公民，除從前的皇族外，皆有被選資格。大總統的每項行動應由總理或適當的內閣閣員副署。憲法中並無副總統的規定。

創制權與限制的複決權亦經規定，特別是在計議變更憲法的時候用得到。省議會保留着很大的地方自治權，在許多事例中，國民議會所通過的法律也都交由省議會施行。司法的尊嚴是政府的主要特質之一，最高法院具有廣大的覆審權。關於社會的，勞工的和農村的改革，國民議會安於草定一個範圍很大的計劃，由各省去執行。根據新憲法的第一屆國會選舉，於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七日舉行。社會民主黨喪失了他們的最多數於基督教社會黨，一部分因為他們自己發生內訌，一部分因為一般人不滿意澤曼條約，另一部分由於反塞姆族勢力的潮流。選舉後兩天，基督教社會黨聯合汎德意志黨成立新政府，這是共和國歷史上第四個政府。十一月二十五日與二十六日，上院議員的選舉舉行了，十二月九日，聯邦議會推選在學術界頗有聲名的亥尼士（Hainisch）為奧國的第一任大總統。同月，奧國獲准加入國際聯合會。

差不多在新憲法被採用後十五個月，奧地利共和國的疆界終經劃定（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奧地利包括九省：部耳根蘭特（Burgenland）、克倫地亞（Carinthia）、下奧地利（Lower Austria）、上奧地利（Upper Austria）、薩爾斯堡（Salzburg）、士的里亞（Styria）、提羅爾（Tyrol）、復拉耳堡（Vorarlberg）與維也納（Vienna）。克倫地亞（Carinthia）的克拉根佛爾德盆地（Klagenfurt Basin）之讓與奧地利而不割與巨哥斯拉夫，祇在一九

二〇年十月十日所舉行的民衆投票之後，投票的結果表明大多數的居民寧願歸奧以後。至於奧國的保有部耳根蘭特，一直到一九二一年之末爲匈牙利所詰難，匈牙利本來駐有軍隊在該區域內，後來因爲大使會議的動議始行撤退。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部耳根蘭特的奧登堡（Adenburg）城內外的居民在一位意大利將軍的監視之下舉行了特別民衆投票，結果該區域卒被判歸匈牙利人。奧國的面積有三二、三六九方哩，人口有六、六八〇、〇〇〇人（據一九三二年的統計）。單是維也納一城的居民就達一、八〇〇、〇〇〇以上。

（丙）狂風暴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年）

在一九二一年中，奧國的經濟情形每況愈下。尤以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之冬最爲嚴重，餓死的人盈千累萬。政府徒知仰助於通貨膨脹的政策，祇使事情更形複雜，奧國的克郎銀幣，額面價格原值二十仙，不久就一元可換三千個了。在一九二一年之初，絕望的政府當局乞求國聯助以款項，以便購買糧食來賑濟嗷嗷待哺的人民。國聯的答覆爲派遣一個調查團以調查奧國的問題。其時有各種國際借款與信用貸款（總計達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及慈善經費（約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暫充急賑之用。

這種可怕的經濟狀況，更促進了與德國合併的運動。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規定舉行關於合併問題的民衆投票的法案，被提出於國民議會。如果該議會議決贊成合併，政府即進行請求國聯給予同意。然而協約國不准舉行民衆投票，並聲言如將該項法案通過，它們必實行懲罰奧國。因之該項議案卒被打消，但有幾個行省以爲即使奧國被禁止與德國合併，此項禁令決不能適用於各個行省。在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提羅爾的民衆投票以

一四五、三〇二對一八〇五之票數贊成合併。薩爾斯堡則於五月二十九日以一〇三、〇〇〇對八〇〇之票數表決合併。當士的里亞與上奧地利準備舉行同樣的民衆投票時，協約國即揚言欲加干涉，中央政府乃加充分的政治壓力於各省阻撓此民衆投票。

一九二一年六月，叔柏爾 (Schöber) 博士成爲另一個聯合內閣的總理，他本是維也納的警察總監和汎德意志黨的領袖。他執掌政權到一九二二年五月，但他在任之時，曾兩次改組內閣。叔柏爾政府費了很多時間從事討論改良的財政方案並取消許多爲從前較急進的內閣所取的傾向於社會主義化的步驟。奧共和國又參加托·羅薩 (Ferdinand Rosa) 的會議，多瑙河流域諸國即在這個會議重新訂正它們的關稅稅則，使彼此有利。依據那條約 (Treaty of Lana)，捷克斯拉夫以五億捷克幣的信用借款給與奧國，奧國則報以友好的保證。但預算案的危機，終迫使叔柏爾內閣不免傾覆。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一個中年的耶穌會教士和基督教社會黨領袖宰泊爾繼任爲總理。他上臺後就與汎德意志黨妥協好叫他們繼續與基督教社會一鼻孔出氣，接着他又遊歷外國，以便爲奧國取得經濟上的幫助。意大利首相法克塔 (Facta) 在這個當兒宣稱意大利當認德奧兩國或奧國與其他多瑙河流域諸國間的任何種合併爲戰爭的導火線。宰泊爾因之不但訪問德國和捷克斯拉夫，並且也訪問英國和意大利，最後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向國聯致送特別的請願書。

國聯行政院經過相當的調查和商討後，向奧國提出一種計劃以待批准，依此計劃，英、法、意、比、捷克斯拉夫、西

班牙與荷蘭當擔保以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克郎（一三一、六九〇、〇〇〇元）的借款給與奧國，爲期二十年。奧國的資產有如菸葉專賣權應用作抵押品，奧國並須保證從事若干種經濟的改革。國聯應委派一個總委員和一個管理委員會（以各擔保國所派委員各一人組織之）駐在維也納，但他們不得侵犯奧國的主權。最後，各國重新擔保奧共和國的土地完整與經濟完整，奧國則重申不放棄本國之獨立的諾言。

奧國國會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批准了上述的計劃，並通過全權法（Law of Full Powers）授權內閣在一九二四年底前辦理一切實行財政計劃的必要事宜。鹿特丹（Rotterdam）地方的親麥曼（Zimmermann）博士被派爲國聯的委員，在一九二四年成立了一種代克郎（Crown）新的貨幣單位——錫令（Schilling），額面價格約值十四仙。財政上的進步很快，在一九二五年，奧國即能有滿意的決算。因之國聯行政會在六月間決定國聯對於奧國的管理應於該月告終。

其他範圍內卻沒有同樣的進步。一般的不安是可驚的，在一九二四年，接二連三地發生社會黨謀刺宰泊爾的事情，六萬金屬業工人的罷工，及嚴重的鐵路罷工。那個耶穌會員總理於是祇好辭職，由另一個基督教社會黨黨員拉美克（Ramik）繼任（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此時亥尼士博士再度當選爲大總統。

在拉美克的任期內，國內的困難情形依然存在，到一九二五年之終，失業的人數超過二十五萬。局面的不安和經濟的停滯重新引起了合併的觀念，一九二五年二月，德奧的主要官吏將這件事提出於馬德堡（Magdeburg）大會當時囑求德奧合併的示威運動非常盛行，以致意大利和小協商國向奧政府警告，要求阻止任何公

然的行動。

一九二六年十月，拉美克辭職，表面上因為與文職官吏發生意見，實際上因為他的政友與一件銀行界的醜事有關聯。繼其任者又是宰泊爾，他不久就和社會民主黨因年老與殘廢者贍養金的問題大起衝突。經過一九二七年四月的新選舉之後，宰泊爾另組政府。七月間，他的內閣遇到瀕於內戰的嚴重局面。我們要明白這個危機，必須略述國內兩個強有力的，敵對的政治組織——「國防衝鋒隊」(Heimwehr)與「保護同盟」(Schutzbund)的發展。

(丁)國防衝鋒隊與保護同盟

從共和國的最早時期起，奧國的工業派與農業派之間即有惡感存在。維也納、奧國東部平原（自維也納南及於維也納——紐斯大得特 (Wiener-Neustadt)）及士的里亞礦區的工人組成工業的無產民衆，有社會主義與反宗教的傾向。這般工人是社會民主黨的核心。其餘的奧國人大多數為農民，保守分子和虔奉宗教的人。他們擁護基督教社會黨和汎德意志黨，極力反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

大戰後，維也納完全落於社會民主黨之手，市政府的權力擴大及於各種很廣的範圍。法律將租金降得非常之低，以致分租的房屋成爲無人過問的滯貨。此外，政府又徵收很高的租金稅，此項收入用以建築市房，以居工人。這種市房的建築頗得當，光線充足，有隙地可透空氣，通常圈有一個引人心目的庭院，其中以著名的社會黨領袖的半身塑像爲點綴。卡爾·馬克思館 (Karl Marx Hof) 於一九三〇年造成，是歐洲最大的公寓，長達五分之

三哩，有住室一千四百間。

市政府又取得公共汽車與電車線及地道，水電系統的管理權。市立的啤酒釀造所，麵包店，冰店和火葬場亦經創辦，火葬場的設立雖遭天主教教會竭力反對，但政府不顧。許多舊校場被改為公共游泳池和運動場。從前的皇宮有幾所被租為事務所，其餘的則被撥充政府各機關的辦公廳之用。

以上一切行為大多數遭保守的農民詛咒，而維也納與內地農村之間的仇恨很明顯地表現於兩個敵對的團體之組織，這兩個好戰的團體就是農民的國防衝鋒隊和社會主義者的保護同盟。國防衝鋒隊或奧國的法西斯黨的政綱，要求打倒維也納的社會黨並與德國合併。在斯泰得爾(Steidle)與普夫利茂(Priemer)兩博士及富有的斯太漢堡(Stahnenberg)親王的領導之下，國防衝鋒隊與德國的希特勒運動相應。國防衝鋒隊約有六〇、〇〇〇武裝的隊員(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其中祇百分之十是工人。

保護同盟計有(一九三一年)受過訓練的團員約九〇、〇〇〇人，集中於工業區域。這個團體似乎保有巨量的軍火和軍用品，儲藏於秘密地點如社會黨報紙的發行所等處，但政府時時搜捕這種私藏軍器的地方。國防衝鋒隊與保護同盟常常安排示威遊行，幾乎在同一地點和同一日子，於是政府不得不盡力設法維持治安。因為根據和約，奧國的軍隊限於三萬人，所以實際上政府在國內祇有極少的兵力。

恰巧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法院陪審官把三個被控謀殺在部耳根蘭特兩個社會黨員的衝鋒隊隊員釋放全國的輿情堅以被告為有罪，在判決後第二日，維也納益千累萬的工人未經初步的警告就實行罷工，他們

廣集於名流所聚的「圓路」(Ringsstrasse)，擊敗勢力較弱的警察隊，並縱火焚燒那所華美的「審判宮」(Palace of Justice)。騷亂繼續了三天，其間死者數十，傷者數百。審判宮被毀壞一部分，很多文件和檔案均付一炬，或被水漬，或零亂散失，各業也暫時歸於停滯。

自經這次劇變後，這兩派有組織的團體衝突益烈，不斷地發生事故。在許多較危險的騷擾中，有下列幾起：一九二八年三月在費爾特扣區，一九二八年十月在維也納新城，一九二九年二月在格洛格尼茲(Gloggnitz)和維也納，一九二九年八月與十一月又在維也納所發生者。在一九二九與一九三〇兩年中，國防衝鋒隊有好幾次揚言要效意大利的法西斯黨進佔羅馬一樣進佔維也納，並推倒他們所認為柔弱無能的國會政府。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三日，普夫利茂博士宣布自立為迪克推多，並命令他的黨徒奪取士的里亞地方的幾所公共建築物。然而奧國軍隊迅雷不及掩耳地打破了這個政變，有幾個領袖不久即遭逮捕。十月，所有一切被告皆經格拉斯(Graz)地方的陪審官開釋。總之，祇要國防衝鋒隊與保護同盟存在一天，奧國是否能享受任何程度的國內安寧，似乎還屬疑問。

(戊)對外問題(一九二七—一九三二年)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這幾年中，奧國總理宰泊爾的心神為重要的德意關係所攝。常常發生的合併問題此刻又突然呈現，在一九二七年，一個德國的和一個奧國的委員會聚在一起從事討論使兩國有相同的刑法的方法。同年十一月，德國總理瑪克斯與外交總長史德里斯曼屢次聘問奧國，表示友好，到一九二八年九月，德國司

法總長又出席於在薩爾斯堡舉行的汎德意志法學家大會。一九二八年夏天，約有二十萬德國人在叔伯特祭日（註）遊歷奧國，兩國又時常有願在政治上和學術上團結一致的表示。可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奧國聯邦議會竟選舉反對合併的米克拉斯（Miklas）為大總統，以繼亥尼士之任。國務總理宰泊爾曾提議修改憲法以便頗得人心的亥尼士可以第三次當選，但他這個計劃終告失敗了。

（註）奧國舉行這個祭典，所以紀念大作曲家叔伯特逝世的一百週年。

一九二八年二月，由於總理宰泊爾與議員科爾布（Kolb）在奧國國會所發表的兩篇演說，其中深表同情於在意大利統治下的南提羅爾的德國人，發生了嚴重的外交上的糾紛，雖然演說者不過對於他們的同胞所處的苦境略表悲憫的意思，意國的駐奧公使立被召回，羅馬與墨梭里尼會商。墨梭里尼作了一篇強硬的警告言論，宰泊爾遂不得不於七月間另外發表較和緩的談話。意國公使乃行回任。

一九二九年四月，宰泊爾突然辭去總理之職，殊出一般人意料。他的退休顯然由於基督教社會黨發生內訌，一般人批評他不該兼為傳教者和政治家，及本人的身體不健康（他在三年後就逝世了）。斯特利魯威滋（Stroop）此刻成為總理，其內閣中有六個贊成德奧合併的開員。他的任期很短，可是艱難多故。一九二九年六月，法國白里安通知國聯，奧國的各種武裝隊伍使它成它鄰邦的威脅。奧國政府對此加以否認，但社會黨黨員指斥政府當局與國防衝鋒隊狼狽為奸。這種詰難激使國防衝鋒隊主張修改憲法，藉此可減輕工業無產階級的權力。當斯特利魯威滋反對所提出的若干修正案時，他的內閣就倒了，於是叔柏爾以一個中和的人才內閣重執政權。

(一九二九年九月)

叔柏爾在試行採取急進派與保守派之中間方針時，遇到若干生死的關頭。十一月，英國外交大臣漢德森告訴他道，奧國如背離國會的政府，英國當認爲對於歐洲安全的威脅。因之叔柏爾在十二月七日很順利地使他所擬的一批憲法修正案得到通過。這些修正案並不有礙奧國的聯邦組織，但將維也納的一部分稅收轉撥於下奧地利的財庫，增強大總統在危急時的權力，以大總統由民衆普選的制度代替國會選舉制，並減輕法院的政治權力。

叔柏爾總理既已採取行動來恢復秩序，就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出席海牙賠款會議，並取得各國的諾言，准許奧國至一九四三年止不再繳付任何賠款。接着叔柏爾訪問意大利（一九三〇年二月），作爲請求外國資助金錢的第一步驟。與墨梭里尼會商後，他和意人簽訂了友好與協調公約，其中規定兩國間如發生任何爭執，當以司法手續解決之。該項公約中毫未提及南提羅爾，但意大利答應將來借款給奧國。叔柏爾又跑到柏林去，蓋恐怕德人有不良的印象，以爲奧意的親密將阻礙兩國可能的合併。他在柏林商訂了一件德奧商業條約。此外，他復聘問英、法兩國，並向國聯保證他當盡力消除本國私行組織的軍隊的危險性。

叔柏爾於回國後依照他的諾言，提出裁軍法案於國會。其中建議將各省對於私藏軍火的監管權轉移於聯邦政府，並加重對於違犯國家軍器法律者的處罰。該項法案於一九三〇年六月獲通過於國會，雖然社會民主黨大加反對，以爲它不過是欺瞞外國的方法，實際上決不足以減輕國防衝鋒隊的活動的危險。然而社會黨因政府

將國防衝鋒隊的參謀長及一九二〇年發生於德國的卡普陰謀案的共犯者帕布斯特 (Walthar Pabst) 放逐國外，也多少感到痛快。

一個月後，叔柏爾看到奧國所急需的公債售完，非常高興。公債總數約達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利息七釐，分二十七年償還。因為此項公債票係照票面九五發行，所以投資購買者實際上可得較高於規定的利率的利息。由於一九三〇年來歐洲所感受的經濟壓迫，奧國的經濟狀況也毫無生氣，雖有公債之發行，仍無補於事。它的貿易差額漸漸不利，失業者的人數在一九三〇年某一個時期一躍而至每四個工人中即有一人。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叔柏爾內閣爲了委任一個國防衝鋒隊領袖爲國營鐵路總理而失去基督社會黨的援助，遂致站腳不住，悄然下臺。在接着的兩年中，奧國換了四個總理，但沒有一個能够消除國家將瀕破產的危險。(註)

(註)爲節省一九二九年的憲法修正案所規定的大總統選舉的費用起見，國會乃於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重又選舉米克拉斯連任總統。

(己)合併運動

法、意、捷克斯拉夫及其他國家所以反對德奧合併，係根據好幾種理由：(一)德國的面積遜於法國，但與奧國合併時，德國的幅員，超過法國。(二)德奧的人口如果聯合攏來將超過法國人口的一·七五倍。(三)如奧國歸併於德國，則捷克斯拉夫（它本身含有三百萬德國人）將一半爲德國的領土所包圍。(四)德奧一旦合併，將使德國成爲意大利的貼鄰，因之或使南提羅爾的問題更趨複雜。(五)德奧合併後，不啻將一塊強固堅厚的巨石橫放在中歐，這從軍事的觀點看來不利於法——捷奧——法——巨的同盟。此外，德國將與巴爾幹諸邦發生直接接觸。

(六)奧國雖煤量很少，卻有豐富的鐵、木材和水電力。德、奧的經濟力量的聯合是非常可怕的。

兩國打成一片，又有若干好處。奧國將在德國有自由的市場，將能與外國訂立較好的商業條約，並可以利用德國的非常發達的買賣制度。德國則將因之使與歐洲東南部的貿易關係大為便利，將能利用奧國的極佳的天然動力，並將使它的軍事力量大大增加。

可是，並非德、奧的全體人民都贊成合併。例如，許多德國的新教徒殊不欲將六百萬以上的奧國天主教徒合併於德國。有些德國人覺得，就全體而論，奧國人在事業中和私人生活中是非常馬馬虎虎的，他們殊不願引這些懶散漢為同伴。他們以為德國已常代奧國受過，上當不淺，決不肯重蹈覆轍。

反之，許多虔信的奧國天主教徒，深恐一旦與新教的德國合併就會喪失教會的勢力。奧國一般人又不喜歡普魯士。奧人除若干較進步的商人外，似乎不希罕普魯士的那種有效能的方法。有些維也納人則擔心與德合併後，維也納的地位將降為二等的省城，到那時它雖有光榮的過去，也不能掩蓋黯淡的現在。(註)

(註)據聞白里安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向法國國會演說時，曾主張下面這個關於少數民族之權利的奇異學說：「諸君常常聽見有人提起少數民族權利的方式。假定在某一個國家中，十分之九的人民把本國從地圖上抹去而作政治上的自殺行為，又假定祇剩十分之一的人非常依戀本國而反對本國消逝，我就說，這個少數人民有權利滿足他們願繼續存在為一個國家的慾望。如以多數人民的意志，強使少數人民聽任本國歸於消失，乃是不可容許的事情。」

那時已有兩個重要的組織成立，從事運動合併。一個是「德、奧勞工聯合會」(Deut. ch. Österreich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 它的會員人數有限，但很重要，設總機關於維也納。這個聯合會的宗旨乃在草擬一種綱領，使德奧的各種團體機關可依照它化成同一之體，並在防止足使兩國的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發生新的差別的任何趨勢或行動。其他一個就是「德奧人民同盟會」(Deutsch-Osterreichischer Volksbund)，它的主要活動集中於德國。它專門從事排演民衆的合併示威運動與於雙方的邊境舉行會議。一九二八年叔伯特祝典所表現的汎德意志的色彩，大部分即是它造成的。

在一九三〇年，合併運動和「回到聯邦的思想」(Heim-ins Reich-Gedanke)，在奧國的官場比在德國更爲強烈。但到一九三一年，經濟上的需要驅使兩國簽訂了一個關稅同盟的議定書。這個議定書大遭法國，小協商國及其他國家反對，它們使用經濟的壓力強迫德奧廢棄此項盟約。此後不久，世界法庭以八對七之票數提出勸告的意見，以爲這件盟約違反奧國在一九二二年所作不危害本國之獨立的誓約。

上述盟約的廢棄雖然弛緩了歐洲的緊張局面，但奧國所蒙的經濟困難仍未解決。在一九三二年，世界目擊奧國——以一個自主的國家竟向國聯乞求給與幾百萬元的信用借款，以便賑濟它的飢餓的人民。奧國拚死命力求從鄰邦得到有利的商業條約，但通常皆無效果。當局徒然藉助於無望的方法來防止本國金子供給額再行減少。各大銀行崩潰了，終致無現款餘剩好用來放賑。

在一九三二年之夏，有幾個國家以金錢貸與奧國，附有爲愛國者所不能接受的政治條件。然而經濟的需要畢竟克勝了其他一切的考慮。八月二十三日，國會以八二對八〇的票數批准了洛桑議定書。這件條約是因國聯

的贊助而草擬的，奧國藉此得到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借款，分二十年償還，但它必須承諾本國在一九五二年前決不與德國在政治上或經濟上趨於合併。力爭接受此項議定書的運動由奧總理陶爾斐斯 (Dollfus) 他是基督教社會黨黨員) 領導着。反對接受者則以叔柏爾博士為首領，此派人包括汎德意志黨、農民聯合會及各種法西斯團體。在辯論此項議定書之中，叔柏爾突然逝世。四日後，議定書卒獲批准。

今日很少人敢斷定奧國的將來，但奧人自己仍舊相信那句很古老的預言：「奧國將永存於世界」——
“Austria erit in orbe ultima”。

匈牙利王國

(甲) 自由主義的失敗

居主宰地位的馬札兒 (Magyars) 民族對於匈國內各受治的民族的不妥協態度，乃為促成大戰後匈牙利的崩潰的要因。正同日耳曼人在奧地利緊緊把持特權地位（甚至在大戰中形勢最劣的時候也是如此）一樣，馬札兒族在匈牙利也頑固地不理會國內少數民族要求政治上和社會上的較自由待遇的呼籲。的確，當查理士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頒布他的奧地利聯邦化宣言的時候，馬札兒人的首領們無意公佈關於匈牙利的同樣告示，就立即宣布一八六七年的「奧斯格萊虛」 (Augsleich) 失效。(註) 他們於是通告各國，匈牙利已成爲獨立的國家，僅因共戴一個君主的關係始與奧地利聯合。不料這種舉動竟激使國會中羅馬尼亞和斯洛伐 (Slovaks)

民族的議員，堅決主張他們也須有同樣的民族自決權利，這真使匈牙利內閣總理驚愕沮喪了。並且當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十月十八日承認捷克斯拉夫和南斯拉夫的獨立時，匈牙利國內的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立即要求同他們的同族人民合併。瓦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註）（一）「奧斯格萊虛」是一種調整一八六七到一九一八年的奧匈關係的公文。

奧地利國內有數量很多的中產階級團體，所以奧國即在分裂危機最高峯時候仍能維持其表面上的秩序，但在匈牙利，保有地產的貴族和奴隸式的農民為數佔全人口的四分之三，就沒有這種自制的工夫。在起初一個短時期內，人民頗有約束，這應歸功於卡羅爾易（Michael Karolyi）伯爵的勢力。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卡羅爾易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會，以國會中的私黨，加上國會外的社會主義派和非馬札兒人團體的適當分子組成。這個革命性質的聯盟以布達佩斯（Budapest）的衛戍軍為後盾，要求委任卡羅爾易為內閣總理，竟達到目的。

這位柄政的伯爵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和共和黨人。他雖出自貴族的門第，並擁有很大的財富，但以從事全民普選和割分大地產的運動而著名。在大戰時期內，他是一個暢談無忌的和平運動者，始終反對德國的政策，並聲言他深懼德國的勝利比奧匈的失敗將有更壞的結果。他比較得協約國的歡心，並希望一經上臺即可為他的國家謀得特殊的待遇。他做總理後的第一件行動即在使（十一月二日）他的屬員得免除盡忠於查理士的宣誓。接着，他在命令匈牙利軍隊從前線撤退並立刻全體復員之後，就前往柏爾格雷德（Belgrade），企圖從法國一方

軍司令官豆斯潘雷 (Franchot d'Esperey) 將軍處得到比較地亞士 (Diaz) 將軍前在朱斯提別墅 (Villa Giusti) 所給予奧——匈的較優的休戰條件。

但是，豆斯潘雷將軍對於卡羅爾易的代表團中不甚嫻雅的團員，率直地表示鄙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又將匈國的領土一部分割與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甚至比較地亞士所指定的還要多些。同日，卡羅爾易接到查理士的上諭，聲明他因讓位不再參與匈牙利的國事，他的失望纔稍稍減輕。就事實而論，這種「讓位」在憲法上是無效的，因為此項公文並未經國會所委的閣員副署，但在最近的將來，牠使卡羅爾易在政治的進程中較易應付。

十一月十六日，匈牙利宣佈為共和國。國家行政會解散了舊有的立法機關，並下令舉行應用普選方法的國民議會之選舉。其時卡羅爾易內閣草定了一個政綱，預許出版自由的法律，陪審制度，集會自由，比額的代議制；農村和教育的改革，政教分離，少數民族問題的公平解決，與鄰國交好，並單獨與協約國媾和。

外交與內政兩方面不利的形勢實際上使這個政綱無施行的可能。國內的少數民族不再斤斤於「權利」；他們期望與匈牙利完全脫離。協約國不但以特別的體諒待遇匈牙利，反而加緊封鎖。自前線歸來的兵士增加了失業和挨餓的人數，而外國的俘虜現在沿着國境騷擾蹂躪。保守派反對分裂大地產的計劃。共產的思想從俄國流傳進來。政府機關中若干猶太人的財富與權力日益增加，這種情形更激怒了反塞姆族者的情緒。一九一九年正月，民族部部長雅斯席 (Oscar Tassai) 的辭職使內閣失去了一位能力最強的份子。不久社會民主黨全體

都遺棄了卡羅爾易，他因此只得將國民議會的選舉延期舉行。

國家行政會在一九一九年正月十一日的會議席上，力圖推舉卡羅爾易爲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臨時總統，以排擠他。在貝林刻（Beinkey）領導下的新內閣頗多弱點，卡羅爾易卽利用此種弱點努力使農村改革法案通過（二月十五日）以恢復他的權力，依照此法，私有地產面積不得超過七百英畝，而政府補助農夫按照戰前地價購買小田產時，分五十分拔還。但是這個改革又來得太晚了。許多農夫反對此項計劃，因爲他們可以在更好的條件之下直接從地主手中取得田地。此外，社會主義者反對此項法律，深恐牠阻礙土地完全收歸國有的進程，而保守階級認爲這是一種等於沒收的辦法。

三月二十日，當消息傳來，巴黎和平會議業已確定把德蘭斯斐尼亞（Transylvania）判歸羅馬尼亞的時候，卡羅爾易受到最後的打擊。因爲國家行政會議或卡羅爾易都不能服從和會的這種處置，匈國總統遂行辭職而亡命國外。一個隸屬於社會黨政府的職員孔飛（Sigmund Kunh）和一個在獄中的共產黨領袖貝羅孔（Bela Kun）預料到卡羅爾易的下場，早已草定計劃，擬將社會民主黨和最近成立的工人與兵士會議聯合起來。這個聯盟取名國際革命匈牙利社會黨並準備隨時奪取政權。當卡羅爾易去國的時候，貝羅孔立刻從獄中被釋，成爲新政府的首腦，並兼外交委員。一位從前做過磚匠的加貝（Alexander Garbai）則當選爲總統。

（乙）赤色與白色的狄克推多制

貝羅孔是一個猶太籍的新聞記者和政治家，大戰期內他在匈軍隊中擔任軍官職務，直到被俄人俘虜入

獄（一九一五年）爲止。在俘虜營中，他同許多俄國革命黨人結交成友，當三月革命發生時，他被釋放出來，成爲克倫斯基（Koronsky）的宣傳局局長。到十一月革命之時，他得到機會與列寧和托洛茨基（Trotsky）相識得很熟。大戰後，他以假造的護照重入匈牙利，並編輯破壞性的赤色新聞（Red News）。他時常與警察發生衝突，有一次竟受傷而被捕入獄，他與社會民主黨磋商聯盟，即是在獄中休息的時候。

人民委員會（孔內閣自稱的名辭）執政之後，即頒行激烈的命令，以革命法庭的審判驅逐政治上的異己者，禁止酒精的出售與消費，組織精強而有紀律的紅軍。一俟將社會民主黨擠出政府之外，立即將教會財產、礦山、銀行、交通運輸工具、雇用二十五人以上的商店、面積在一百英畝以上的地產、和一切超越某某最低限度收入的私人財產完全收歸國有。

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匈政府採取了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正式憲法，並準備向鄰邦宣傳赤色福音。以前的政府所留下來的許多硬幣都運往意國以購買軍火和軍器，而另採一種新幣供國內之用。匈政府又將款項運往維也納供戰場上應用，貝羅孔率領了他的紅軍與捷克斯拉夫人作戰。憤發的革命軍比較不費力地攻克了斯洛伐幾亞的時候，國內的反抗也在「赤色恐怖」之下鎮壓住了，這一件事是由一個名叫柴苗雷（Tibor Szamuely）的流氓所領導的。

共產政府之必歸失敗，在命運上早已決定。農民拒絕任何人以新幣來購買他們出產的糧食，協約國仍維持封鎖政策，結果使匈牙利各城市瀕於饑荒。職工組合主張者因爲工廠缺乏原料而倒閉，並因許多猶太人得到高

級官吏的地位，大爲憤怒。同時益千累萬的反對革命的人，即所謂「白黨」的，在約瑟夫大公爵，柏特楞（Bethlen）伯爵，卡羅爾易的異母兄弟朱理亞（Julius）和從前與——匈海軍的海軍中將和帥（Horthy）等人的領導之下，於法軍佔領區域內的塞革特（Szeged）地方集合起來。雖則在布達佩斯（Budapest）發生的那次未成熟的白色暴動輕易地被鎮壓住了，但一般的不安不久傳播各處，形勢很爲危險。貝羅孔深懼巴黎和會的震怒將轉變而爲對付他的軍事行動，他就從捷克斯拉夫撤退回來，率領他的隊伍抵禦向布達佩斯前進的羅馬尼亞軍隊。這次貝羅孔戰敗了，他最後的希望也粉碎了。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他往維也納——在那裏被安置於瘋人院。他終於設法逃到了俄國。

在貝羅孔遁逃數天後，一個社會民主黨黨員叫倍特兒（Peidl）的出來處理政務，但不久大公爵約瑟夫（Joseph）——他被返國的反革命派推爲匈國的執政——就委派孚利特里虛（Stephen Friedrich）爲內閣總理。哈布斯堡的勢力之死灰復燃，使匈國的各鄰國大大震驚，它們堅持約瑟夫必須退出匈國政府。同時，匈牙利國內秩序的紊亂爲匈國所向未經歷。羅馬尼亞的軍隊，不顧協約國最高會議的勸告，佔據布達佩斯達三月之久，凡能以火車、貨車、或人力運走的物件無不劫掠殆盡。在羅馬尼亞軍離開布達佩斯三天之後，和帥（Horthy）繼約瑟夫爲白色軍司令將軍隊開進匈國都城（十一月十四日）。他以胡斯柴（Huszar）替代孚利特里虛做內閣總理，並與協約國講和。

議會的選舉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舉行了。任何的政黨都沒有得到大多數，但所選的代表中有百分

之九十五是傾向於帝制的。因此，議會在首次集會時即行恢復以前帝制的憲法。因為協約國二月二日的備忘錄阻止哈布斯堡皇族重登皇位，和帥就被指派為總督兼攝政者。此後十二個月中，除內閣的升沈，反動的法律的激盪，和對於猶太人的大屠殺之外，並無其他重要的政治事件。直至伯爵伯特楞於一九二一年四月就任內閣總理，國內始逐漸恢復秩序和安定。

反動既達這樣程度，查理士遂受人慫恿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回到匈牙利復辟。但是，和帥因事前未得議會的同意，拒絕交出政權。此外，各主要協約國提出猛烈的抗議，而捷克斯拉夫揚言除非查理士立即離開匈牙利，即將採取軍事行動。這位哈布斯堡族人在憤惱與惆悵之中回到了瑞士。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他重又啓程赴匈牙利，這一次是乘飛機去的。他在奧登堡下機之後，即率領臨時聚合起來的人衆向布達佩斯進發。和帥力圖諫止查理士從事這種冒險之舉，但未成功；三天之後，當捷克斯拉夫和南斯拉夫開始動員的時候，和帥派了哥麥波上校率領軍隊抗拒查理士入京。查理士不久被擄，押送到多瑙河中的英國軍艦上。(註)小協商各國於是強迫匈牙利議會於十一月通過廢立法 (Dethronement Act)，廢去哈布斯堡皇族並規定以選舉產生國王。十一月十日，匈牙利承諾在選舉國王之前，與主要協約國商議。

(註)查理士和他的家族在十一月十九日被流放到馬得拉羣島 (Madeira Islands)。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他染了海島熱病和肺炎而逝世，享壽僅三十五歲。

一九二二年的上半年，匈牙利國民議會就壽終正寢。它除了締結非常不滿人意的特喇農條約之外，兩年來

實毫無成績可言。牠並未解決國內政體的問題，甚至連它本身繼承者的選舉方法都未制定。和帥和內閣總理柏特楞因此草訂了一件行政的選舉法令，其中大大限制選舉者的人數，並規定鄉區之選舉應以公開投票法替代秘密投票法。再者，政府又施行嚴格的新聞檢查，禁止印行馬克斯·列寧和惠特曼（Whitman）等人的書籍。自然當選加入新議會的代表們泰半是與政府親善的。正統派（Legitimists）想推查理士之子鄂圖（Otto）大公爵為國王，但他們並未得到選舉者的鼓勵。因之柏特楞內閣得免又陷於外交上的糾葛。

那般企圖打倒攝政的極端保皇黨卻不因選舉失敗而懊喪，他們乃從事創設具有法西斯蒂性質的秘密會社，與和帥、猶太人、職工組合派和共產黨抗爭。以上各派的核心即為「馬札兒人覺醒社」和「匈牙利統一協會」，這兩個團體設立的宗旨在於鼓起反對和平條約的運動。有些白色恐怖主義者鑒於意大利法西斯黨在一九二二年的勝利而心動，於是與巴威保皇黨聯合，共謀推翻幾個中歐政府。自然，匈牙利當局是反對這樣冒險的活動的，在一九二二年秋天，匈國議會通過了國防條例。該項條例給予匈牙利王國政府約束過於熱烈的保皇黨的權力。

從一九二一年四月到一九三一年八月，匈牙利政府的真正首領和實際上的獨裁者就是內閣總理柏特楞，號稱「歐洲的怪物」（Sphinx of Europe）者。他是以一八七四年生於德爾斯斐尼亞省熱內業綏格（Geronyeszeg）地方一個貴族而殷富的家庭。一九〇一年，他初次加入國會，不久就顯出他有不可思議的才幹，能在辯論中以極簡潔的句子為任何方面捉住爭論之點。他受世界大戰和特喇農條約之影響，成為貧乏悲苦，因為他是

寧願犧牲德蘭斯斐尼亞的大地產，而不願取得羅馬尼亞公民資格的「自願選擇者」的一分子。

在國防條例通過後數年內，柏特楞鞏固了他的統治權力。一九二五年，政府將人民的選舉權更加限制，採取新的步驟抑止共產黨，對猶太人入大學的名額嚴予限制。國聯對於最後一點提出抗議，認為違反少數民族權利的原則，於是此項法律終得經過修正。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院的議會創立了一個上議院以替代昔時的「上議院議員圓桌會議」(Table of Magnates)。上院的二四四個議員中，大多數是由匈國幾個固有的團體（包括貴族、教士、市政會、商會、其他商業組織和職業團在內）選舉或推定的。其中有幾個經政府加委為終身職，少數高級官吏如陸軍總司令則依職位為當然議員。但是，此院僅具有延擱議案的否決權，對於預算無權過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大戰後的第三屆議會選舉舉行了，與政府親善的統一黨輕易地獲得了勝利。顧及地主、富農、商業團體和教會的利益的種種政策至少仍可繼續施行五年。

(丙) 財政與經濟

當柏特楞內閣就職的時候，牠遇到兩種特殊緊急的工作：使匈牙利脫離小協商各國的干涉，完成匈國財政上與經濟上的改造。當柏特楞在一九二二年設法使匈牙利加入國聯的時候，小協商國的威脅已銳減了。雖則匈牙利以簽字於國聯盟約而默然保證決不企圖強行修改本國的疆界，但牠本身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同時也得到了保障，並且她可以比較安心，不怕她的強鄰的突然干涉了。復次，她在國際團體中的新地位，可以幫助她解決財政上的困難。

當國聯從事於奧地利的財政改造時，匈牙利向國聯賠款委員會請求同樣的幫助。委員會就加以調查，並草擬了一個救濟的計劃，經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國聯行政院所採納。計劃規定：（一）在國聯主持之下借給匈牙利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克郎（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國際借款；（二）制止通貨膨脹；（三）創設具有發行紙幣專權的獨立銀行；（四）分期付款賠款，每年付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克郎，二十年付清；（五）指定海關收入和國家專利企業的進款為借款的擔保；（六）委派國聯主任委員一人。匈牙利在一九二四年二月接受各該項條件，五月，波士頓的大理財家史密斯（Jeremiah Smith）前往布達佩斯充國聯所派的委員。在他指導監督之下，匈牙利王國在一九二五年開始時即設法使預算保持均衡，比根據財政改造計劃所規定的和所預料的早十八個月。因此，國聯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投票決定停止它對於匈國財政的管理權。史密斯的和婉態度和同情心，使他在匈國很孚衆望；他在辭職時，以他的薪金一〇〇、〇〇〇金元指贈匈牙利的貧民。一九二七年正月一日，匈政府改用新幣制單位，「噴古」或「金格雷」（“pengő” or “jünger”）此幣值美金一七·四九分，預算亦繼續表示有盈餘，直到一九三〇年為止。

經濟的改造比較財政的革新更難達到。為和平條約所瓜分的匈牙利，曾經是具有數世紀地位的，界限清楚的地理單位和政治實體。但是，特喇農條約將這個舊王國的土地割去了三分之二，將它的人口奪去五分之三，以致新匈牙利沒有一個海口，缺少木料和水力的來源，僅有很少的鐵道終點。（註）匈國保留着絕妙的鐵路網，以工業替代已喪失的工業的志願——和高率的關稅。

(註)匈牙利現在的面積約計二五、九〇〇方英里，人口依照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的戶口統計爲八、六八三、七四〇人，居民百分之九十是馬札兒人。

匈牙利努力企圖培植新的工業，一部分是成功的，但匈國依然是農業國。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八十二，專供農事和牧場之用。全國人口雖有一半直接依賴田地爲生，匈牙利仍是大地產制的國家。在一九三〇年，農田面積三分之一集中於一五〇〇大地產，同時約七五〇、〇〇〇小田戶，共僅擁有不到二分之一的可耕地。(註)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匈牙利因穀類在世界市場中跌價的緣故損失甚重。

(註)匈政府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命令強迫國內五〇、〇〇〇吉普賽人(Gypsies)放棄他們的遊牧生涯，安居在農場上，用匈牙利語言並納租稅。

匈牙利所以重要，在於它是糧食的輸出國和製造品的輸入國，因爲這種關係，她在促成多瑙河聯盟的任何行動中，佔着戰略上的要害。小協商國、奧地利和匈牙利之間曾舉行過多次會議，以經濟聯盟的問題爲主要的議題。每次會議關於聯盟的事情，都遇到同樣的阻礙。各關係國對於國家的尊嚴和主權彼此猜忌，以致難以達到讓步與妥協。此項聯盟究應採取何種方式一問題，又爲另一困難之點。列強深懼奧地利與捷克斯拉夫的工業將在聯盟中占特惠地位，因而影響到使本國喪失市場，所以對於聯盟計劃都抱冷淡的態度。有幾次，前項會議的不順利結果，致使參與會議的各國之間宣告關稅戰爭。

(丁)復辟與疆界之改正

一九二〇年後匈牙利的外交關係，根本爲皇位問題與和平條約問題所造成。倘使保皇黨內部不分裂，匈牙利法庭對於法西斯蒂運動者的寬厚態度，及柏特楞的保皇情緒，也許可以使帝制的紛議早日得到解決。正統派堅持大公爵鄂圖必須加冕爲皇。鄂圖其時不過是一個小孩——他生於一九一二年——他的復辟運動極爲他美麗能幹的母親席妲(Nia)所主持，她總是不厭煩的設法使她兒子重獲她的丈夫的皇冠。反之，「馬札兒人覺醒社」社員重行集合於大公爵阿德勒希特(Albrecht)的旗幟之下，擬擁戴他爲國王，他是哈布斯堡族匈牙利分枝的後裔。阿德勒希特的大舉也爲他的野心的母親——一位頗具有精神上和物質上的策略的比利時公主所勉勵。

在一九二六年，一切熱心的保皇黨黨員的活動受到暫時的阻止。一般反革命運動者爲籌款實施他們的計劃起見，在一九二五年開始偽製大批法幣——佛郎。當此項奸謀於一年後被發覺的時候，小協商國又驚惶失措，於是匈政府祇好勉強處罰這般犯罪者。許多高級官吏也被牽涉在案內，但政府對他們（他們聲辯的理由是爲了愛國並對法國復仇）處罰甚輕。大多數罪犯被釋放了，其他的人僅被判處短期監禁。

匈牙利鄰國的安寧的心境常常受到擾亂。一九二九年春季，各種謠言蠱起，人心惶惶，以致柏特楞不得不宣稱現政府的形勢在各方面都能令人滿意，只要和帥活在一天，匈政府自然會維持原狀。縱然有這種保證，在將近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時候（那一天正是鄂圖達到成年並依照習慣成爲哈布斯堡族首領的日子），小協商各國又大起恐慌了。到了那天，鄂圖的領袖地位經全體族人（阿德勒希特也在內）加以承認，其時阿德勒

希特因與平民結婚，不能再爲皇位的競選人了。和帥與柏特楞準備應付政變，但當時並沒有任何變動事件發生。鄂圖在他母親所住的比利時境內一小鎮上舉行小小典禮之後，就回到盧芳大學（University of Louvain）讀完他的大學課程。他在簡單的演詞中表示他毫無危害歐洲和平的意思。

改正國界運動的前途比復辟運動更爲慘淡。和平條約不但把匈牙利的面積與人口大大減少，並且將三百萬馬札兒人劃歸它的鄰國。羅馬尼亞得到一百五十萬馬札兒人，捷克斯拉夫約得一百萬，南斯拉夫約得五十萬。此項和平條約在布達佩斯發表的時候，牠的四周圍縛有關的喪用黑帶，同時領土回復主義者的運動突然爆發，此後情形一年緊張一年。在教堂、學校課室、私人住宅、電車、飯店、跳舞場中，各處都掛着舊匈牙利的地圖，失去的土地印成黑色，全圖圍以荆棘的皇冠。這些地圖上都印有『我們能讓牠保持這樣的狀態嗎？』（Maradhat ez így?）這個問題，及『不！不！永遠不能夠』（Nem! Nem! Soha!）的答案。郵票、膠皮圖章、信封、郵片、徽章、廣告、碟子、鈕扣和其他物件上面也都印有這三詞：『不！不！永遠不能夠！』

這種宣傳不僅限於匈牙利國內。它早已大規模地進行於全世界，在英格蘭和意大利兩國尤爲順利。匈牙利領土完整維持會和馬札兒人同盟會——其會員大部分是學生——爲改正國界的事情大事活動，力求取得外國的同情。這個同盟會在英格蘭設有分會，稱爲「牛津匈牙利民族自決聯合會」。凡能在外國提出匈牙利事件的機會，從未錯過。當國聯秘書長德魯蒙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遊歷阿根廷首都倍諾斯·愛勒（Buenos Aires）時，當時的匈牙利居民在匈文報紙上致他一封公開的信，對於特喇農條約竭力抗議。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兩

個匈牙利飛行家爲擴大此項運動的宣傳起見，從紐芬蘭的格里斯（Harbour Grace）港飛到將近他們的目的地——布達佩斯的地點，所乘的是一架單葉飛機「爲匈牙利求公道」號（Justice for Hungary）。

一九二七年夏天，洛忒米爾爵士（Lord Rothermere）所主持的倫敦每日新聞爲匈牙利發起修正國界運動的特殊宣傳。該報通訊員之一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得與墨梭里尼晤談，結果墨氏表示他贊同匈牙利修正國界事實上，墨梭里尼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一九三〇年七月與十月，及一九三一與一九三二年中的演詞中已再三以着重的語氣提到此項問題。在一九三二年，他公然反對法國的霸權，並成爲總括修改條約的主張者。

事實上，意大利和匈牙利在一九二七年就簽訂了友好條約。同年下半年，接着發生從味羅那（Verona）偷運軍火的事件，此項軍火，表面上是運到捷克的一個小鎮，其實是運往匈牙利的。此項貨物標籤上面寫明「機器零件」，引起了聖哥太特（St. Gotthard）邊鎮奧地利海關官吏的注意，於是受到檢查。因爲特喇農條約禁止將軍用品運入匈牙利，所以小協商國就迅速向國聯提出抗議（一九二八年正月）。國聯即加以調查，但因此案或許將意大利牽涉在內的關係，其真相竟不能披露。結果，匈牙利略獲斥責，此事就此打消，但在各國人民心理上，仍留着很久的反響。

使小協商國和法蘭西更驚異的，就是一九二七年後匈牙利、意大利、德意志和土耳其各國之間所商訂的各種友好條約。柏特楞時常走訪上述各國的京都一事，特別引起小協商國與法國的不安。匈牙利和小協商國之間會疊次努力企圖合作，但結果僅引起進一層的惡感，尤其因爲關於各關係國有時虐待馬札兒少數民族的謠言

各處流傳，使惡感更甚。

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內，恢復帝制和修正國界兩種運動頓然衰落。其原因即在匈牙利政府需要法蘭西的財政上的幫助。一九三一年八月，雖然他的統一黨和該黨的同盟各黨能在六月國會選舉中取得下議院的二四五席中的二〇〇席，內閣總理柏特楞辭職了。雖然政府正式公布他的辭職原因為身體不佳，但他所以決心告退，實有其他因素。外面所知道的有以下幾因：(一)一九三〇——一九三一會計年度匈國預算本估計有五〇〇、〇〇〇金元的盈餘，但柏特楞政府所給予國家的反為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虧空；(二)因為受世界一般不景氣的影響和奧地利信託公司崩潰的關係，匈牙利的銀行組織有瓦解的危險；及(三)法國當匈牙利在危機中要求她幫助的時候，她就承諾借款，但以中止修正國界運動為條件。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法國貸與匈牙利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事情在巴黎宣布了，四天之後，柏特楞即行辭職。

新內閣總理為柏特楞的朋友，卡羅爾易伯爵。他雖能設法採行了一種預算案，但為恢復財政和政局不穩諸問題所困擾。國聯因根據匈國的請求施行另一個財政調查，匈牙利由十國銀行團借得了短期借款美金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關於付償外債的部分延期付款期限亦經宣布。當時法西黨的騷擾和共產黨的暴動成為常事，而與捷克斯拉夫與羅馬尼亞的關稅戰爭更增加了困難。一九三二年九月，卡羅爾易內閣在柄政一年餘之後就辭職了，繼任者為貢布爾斯 (Gombos) 內閣。貢閣的就任對於正統派是一種打擊，因為他曾在一九二一年領導一般人從事防止查理士登位。但他出名為熱心於修正國界運動者和親意派。

當一九三二年將近終了的時候，帝制恢復和國界修正兩問題在匈牙利內政和外交兩方面依然居於第一重要的地位。領土回復主義者的運動遮蔽了國內的民治政治的要求，對於歐洲及世界的和平，依然是一種嚴重的威脅。

第十七章 兩個斯拉夫民族的共和國

捷克斯拉夫

(甲)獨立之勝利

從滅亡的聯合帝國 (The Dual Monarchy) 裏產生出來的最健全而組織最完善的國家，就是捷克斯拉夫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包括着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奧地利、西里西亞 (Silesia)、斯洛伐基亞 (Slovakia) 和羅色尼亞 (Ruthenia) 五區域，共佔面積五萬四千二百七十方哩。(註) 從最初，捷克斯拉夫已獲得經濟上的穩定和外人的重視，這對於歐洲的一個新興小國是一種破格看待。這種成就，不僅由於捷克人在戰前已達到一種很高的文化水準，且當歸功於兩位大學教授：馬薩里克 (Thomas Garrigue Masaryk) 和彭尼斯 (Eduard Benes)。

(註) 上述五個區域，前二個以前屬於奧地利，後二個則屬於匈牙利。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西里西亞的斯拉夫族人向稱捷克人，斯洛伐基亞的斯拉夫人則稱斯洛伐克人，羅色尼亞的斯拉夫人稱羅色尼亞人，喀爾巴阡山俄羅斯人 (Carpatho-Russians) 或烏克蘭人。

馬薩里克以一八五〇年生於斯洛伐基亞地方的農家。他雖然出身貧苦，卻能設法受到高等教育，後來在布拉格 (Prague) 爲哲學教授。在一八七八年，他和一位美國女子夏綠蒂·加立格 (Charlotte Garrigue) 結婚，把

她的姓做了他的中間名字。他賴妻黨的聯絡，在美國認識了許多益友。在大戰之前，他是一個著名的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一個自由主義的哲學家，又是一個愛真理和正義的人。他很快就不得與奧國當局的歡心，因為他主張斯拉夫民族爭得國家的和社會的權利。當歐戰爆發時，他決意「拚命反抗奧地利，到死方休」。

馬薩里克覺得，倘使他沒有被捕的危險，他就能為捷克人的解放運動格外效力。所以他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就到意大利去，從事宣傳工作並在各主要協約國中造成一種輿論，其間經過約有四年。在俄國，他幫助組織捷克人軍隊；在美國，他籌募款項；在法國，他設立宣傳的大本營；在各處，他總是努力喚起為捷克人求得獨立的情緒。與國內「革命運動」（在本國則稱之為「爭自由的奮鬥」）接觸的方法則有「祕密偵探部」的有效組織，由馬薩里克的學生和朋友彭尼斯所指揮。

彭尼斯以一八八四年生於靠近比爾森（Pilsen）的地方。他曾求學於布拉格、柏林、巴黎和第戎等處，專攻法律和哲學。他是一個多產的著作家，所寫的都是關於社會、經濟、政治的問題，又是布拉格工藝學校的哲學和社會學教授。同時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崇拜民主政治的人，所以極端反對海布希斯堡皇朝。彭尼斯一聽到歐戰爆發的消息，就覺得奧匈聯合帝國的將來不出兩途：非因戰敗而亡國，即當為戰後革命所顛覆。因之他決定犧牲一切，來實行革命。雖然起初他仍居國內，以便時常將國內所發生的事情通報在國外的馬薩里克，但後來也覺得有逃出本國的必要了。抵達巴黎後，他的外交才能和機智大有助於取得外國民衆對於他們的義舉的同情，並與留在奧

——匈的革命領袖互通聲氣。（註）

(註)在名位上僅次於馬薩里克和彭尼斯二氏而爲捷克共和國創造者之一的人，就是斯捷芬泥克(Milan Stefanik)將軍。他曾在法蘭西指揮捷克軍團。

革命黨當前的任務，是非常困難的。黨中人對於博取自由所應取的途徑意見兩歧。有幾個著名領袖——例如克拉馬司(Kramar)——主張依賴俄國和汎斯拉夫主義，以爲指導或援助。反之，馬薩里克和彭尼斯則贊成傾向西方，從西方各民治國家中乞求助力和鼓勵。甚至俄國在一九一七年脫離戰爭一事，也沒有完全消除這個爭端。此外，革命黨人又須運用智巧和忍耐力來說服協約國，使它們相信捷克人的領袖並不是奧地利的間諜，同時也須把捷克斯拉夫各省的真實狀況報告他們。

爲使在巴黎的領袖與國內的領袖時通消息起見，他們又須想出許多聰明的詭計和策略。這些用計的故事，說來真是動人聽聞，其中充滿着逮捕，間不容髮的脫逃，秘密的會議，暗電的拍發，護照與證書的偽造，牙齒縫裏或煙斗孔中密藏着的極微文書。至於重要的國家機密，都是由素不疑心的奧地利官吏的捷克僕役所洩露出來的。除了上述一切以外，他們還得籌募款項，羅致幹練的新聞記者，編纂各種宣傳文件、小冊子、宣言、檄文等等，營救被拘禁的領袖，並爲設在巴黎的捷克斯拉夫國民會議取得各國的承認，認爲捷克斯拉夫人民的正式發言人。

這許多問題是在他們的剛毅的決心之下，逐一得到解決的。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中，就有成功的第一朕兆了。那時協約國，確把「捷克斯拉夫應劃爲一自治的區域」作爲戰爭的目標之一。於是在一九一八年之秋，當協約國行將戰勝的時候，馬薩里克、彭尼斯和史推芬泥克三人認爲時期成熟，乃於是年十月十八日，發出獨立的宣言。

十日後，布拉格的捷克國民會議，在克拉馬司領導之下，從帝國官吏手中攬得政權。十月二十九日，斯洛伐克國民會議議決與捷克人合併，組織一個統一國家。這個顛覆運動幾乎沒有經過流血。十一月十四日，臨時國會一致宣佈成立共和國。馬薩里克被選為捷克斯拉夫大總統。克拉馬司為首相。彭尼斯任外交總長，史推芬尼克則為陸軍總長，這樣分配再適當也沒有了。後來，克拉馬司和彭尼斯代表這個新共和國，聯袂出席巴黎和會。這樣一來，海布斯堡族的四百年統治就此告終了。（註）

（註）臨時國會僅代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其時幾個少數民族採取超然的態度，暫不參加，日耳曼人希望他們同德國或奧國結合，馬札兒人則深信他們會與匈牙利併合。當捷克軍隊被遣往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佔據德國城市的時候，就大流血了，但馬薩克在耶誕通電中允許對於日耳曼人和捷克人同等看待，於是騷亂就漸漸停止了。

（乙）憲法與改革

捷克斯拉夫的憲法經過制憲委員會近一年的研究，又經臨時國會略加討論後，即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採行了。這個憲法是以美法兩國的憲法為藍本而草定的，其中規定了民主政體和各權分立的政府。憲法的序文上，表明捷克斯拉夫共和國「願意加入國際聯合會，成爲一個開明的、和平的、民主的和前進的會員國」。

衆議院由議員三百人組成，議員年齡至少要滿三十歲，任期六年，都是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女的強迫投票選舉出來的。參議院的議員只有衆議院的人數一半，他們的任期是八年，爲二十六歲以上的國民所選舉。參議員的候選人的最低年齡爲四十五歲。內閣對衆院直接負責。衆院有不顧參院之否決而通過法律之權。參衆兩院每年

應開常會兩次，第一次在三月，第二次則在十月；如遇特別情形，並得隨時召集緊急會議。在兩院休會期間，立法委員會得通過各項臨時法律。關於法律是否合乎憲法的問題，統歸憲法法庭決定之。

大總統由參眾兩院共同選舉，任期為七年。他有不裁可法案之權，並較法國的總統稍為權大。總統候選人的年齡須滿三十五歲。法律上雖准許大總統於第一任滿期後重行當選，但除馬薩里克外，任何人不得連任二次以上。副總統是沒有的。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馬薩里克被選為第一任大總統，到一九二七年，又被舉為第二任。捷克斯拉夫國內的政黨是很多的。一九二九年十月選舉的結果，眾議院裏就有十五個政黨的代表。政黨的排列，第一是根據種族來分的，然後依照他們所代表的經濟利益與宗教利益再來分類。所以該國有捷克斯拉夫和德意志人的黨，各自標名為農民黨，社會民主黨，國家社會黨，和國家民主黨。同樣，又有捷克斯拉夫人和斯洛伐克人的人民天主教黨，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基督教社會黨。共產黨與各種獨立的團體也確立了它們的地位。在這種情形之下，內閣的成立大都依賴於政黨的聯合，實在不足驚異。

這個新興國家所遭遇到的最迫切的內政問題，恐怕要算土地的改革了。在海布斯塔統治之下，各省即有土地集中於少數大地主手裏的趨勢。舉一個例來說，有一個時期，三十三個人保有波希米亞省六分之一的土地，同時三七三、〇〇〇個農人所有的土地，反而不及百分之一。在一九一八年，波希米亞的大地主百分之二，擁有該處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土地，而在摩拉維亞，幾乎三分之一的土地，是歸百分之一弱的地主所管轄，斯洛伐基亞則有一半的土地為一千個人所有。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農田，有四分之一是具有七英畝半弱的面積。全國的

大地主大多數爲德國人或馬札兒人，他們就是以前的統治階級。

一九一九年四月，即採用憲法的前一年，臨時國會開始進行關於土地改革的計劃，這種計劃到今日已漸告完成了。國會又通過了許多法律，規定將所有面積超過三百七十五畝的耕地或超過六百二十五畝的半可耕半不可耕的混合土地，一概收歸公有。凡以前屬於皇帝或海布斯堡皇族中人的土地，也概以充公，不給補償。在其他情形中，所規定的地產補償額多低於該項地產在戰前的真實價值。國家將這樣取得的土地，以最公道的價格和最輕的條件賣給一般小農，和一般並無土地而願取得土地耕種的人。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任何人不得分有三十畝半以上的農地。至於那些不可耕種的荒地，則以之撥與科學機關，合作社、公共團體、地方自治團體和教區。到一九二六年，雖然還有許多土地仍由較大的地主掌管着，但是五十萬以上的國民已經成爲「中產階級的農民」了——他們是直接享有足以維持其適當生活的土地的主人翁了。

大地產的分裂更有一個效果，即促成了政府和羅馬天主教教會的爭執。有許多土地曾經是教會的產業，教會當局自然不贊成政府大規模徵收地產的政策。但，雖則共和國的一半人民都是天主教徒，大部分的斯洛伐克人也虔信該教（捷克人對於宗教信仰反而非常冷淡），一般人民的輿論卻頗有協力擁護政府的趨向。捷克人是異教徒約翰·胡司（John Hus）（他在一四一五年因君士坦司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的命令而遭焚死）的鄉人，在十六世紀就變爲新教徒了——到十七世紀，海布斯堡皇朝纔強迫他們轉信天主教。所以宗教的熱誠已非波希米亞人的顯著特性，所以捷克人對於教會的土地要求，也比較很少表示同情。

沒收地產一事，還不是政府與教會衝突的唯一焦點。在帝國時代，斯拉夫各省的高級教會職員多由德意志人和馬札兒人擔任，他們憑藉了教會的勢力為海布爾斯堡族作僥，這種情形產生了雙方的隔膜。教會的佈道工作通常是用德文與馬札兒人的文字，他們是不用拉丁文的，學校則被認為保皇黨和教士的便利的宣傳機關。共和國因此努力實行「避免教會氣味」的教育，並且廢止學校內的宗教必修課程。在教士具有特別教育勢力的斯洛伐基亞政府不顧教士的激烈反對，設立了幾百所新的國立學校。

當時，政府堅決主張：（一）羅馬教廷應重劃教區疆界，使之符合國家版圖的邊境；（二）捷克人應充高級的教會職員；（三）在斯拉夫人居多數的教區裏，應以本地語代替德語或匈牙利語。國會裏有若干激烈分子和民族主義者要求政府與教會絕對分離。在一九二〇年一月，發生一種所謂「脫離羅馬」的運動，其一部分工作即創立捷克斯拉夫國立教會，它宣佈脫離教皇而獨立，並取消教士應過獨身生活的規定。但是這個教會，幾乎得不到一個斯拉夫人為信徒，捷克人加入的也僅百萬人而已。

到一九二五年，當七月六日那一天（即胡司被焚死的忌辰）被宣佈為全國休假日的時候，政教的衝突達到尖端了。於是教皇把駐在共和國的聖使撤回，共和國也把駐教廷的捷克公使召回了回來。這樣的僵局經過了二年有餘的時期方纔打開，已斷絕的外交關係，乃因雙方妥協而得恢復。一九二八年一月，雙方締結了一個暫定條約。其中規定教區邊界當重行劃分，以便與國境相符合，國家仍繼續付與教士俸給，但應有舉薦主教的發言權，祇有捷克人得被任為主教，所有教會職員須宣誓忠於國家，國語應在舉行某種宗教儀式時使用之。一九二九年，教

皇以「大十字聖章」頒與大總統馬薩里克，作為修好的紀念。

(丙)少數民族問題

捷克斯拉夫有居民一四、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三分之二為捷克人或斯拉伐克人。其餘三分之一包括三、三〇〇、〇〇〇德意志人，七六〇、〇〇〇馬札兒人，四八〇、〇〇〇羅色尼亞人，及若干波蘭人和猶太人。在一九一九年的和平會議，捷克斯拉夫曾被要求簽訂一件少數民族條約，以保護非捷克籍的人民。一九二〇年的憲法又保證一切人民，無種族語言或宗教的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為履行上項諾言起見，政府就為少數民族開辦了幾所特別學校，規定凡遇五分之一居民使用少數民族語言的地方得以該種語言辦理公務，銀行鈔票上則印有三種文字，少數民族在政府裏的發言權亦因採用比額代議制而得到保障。

儘管政府有這些保證和讓步，在對付少數民族的時候，仍舊經歷許多困難。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數百萬德意志人，他們在歐戰前大都屬於上等階級而被捷克人視為壓迫者的，現在成爲一強有力的反對的單位。起初，這般德意志人拒絕參與國會選舉，並百般妨礙國家行政。但到後來，他們纔漸漸覺悟，他們若能積極參與國家政治，就所得利益將更多。馬薩里克對於他們的這種態度，盡力予以鼓勵，在一九二六年，就有兩個德人被任命爲史維拉（Anton Svella）內閣的閣員。至一九二七年，國會中有四分之一的德籍議員，投票選舉馬薩里克爲第二任大總統。自然，德人和捷克人之間總有些不能調和的地方。在一九三〇年，有幾個波希米亞的國家主義者，企圖搗毀放映德國影片的戲院。但是這些趨於極端的人，爲數尙屬有限，並且他們的跋扈行動常爲當局所遏制。（註）

(註) 一如所預期的，以前的地方以德文與匈牙利文爲地名者都改爲斯拉夫文的名稱了。例如，布拉格現在改稱普刺哈(Praha)，而普刺斯堡(Prosbung)改稱布累的斯拉瓦(Bratislava)，卡爾斯巴德(Karlsbad)重稱卡羅維·凡累(Karlovy Vary)。

捷克人與喀爾巴阡山俄羅斯人的關係，比了和德人的關係更爲尷尬。巴黎和會將羅色尼亞劃入捷克斯拉夫的版圖，以便使這個新興國在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有天然的界線，並使捷克共和國與羅色尼亞發生直接的接觸，而造成包圍匈牙利的堅環。雖然依據聖澤曼條約的條款，捷克國應以地方自治權給與羅色尼亞人，但因他們鄙野而落伍的緣故，捷克人有若干時期會斬而不與，據謂深恐該省內受過教育的馬札兒人和猶太人取得統治大權。復次，又因爲天主教教會和馬札兒人支配着羅色尼亞的教育系統，所以捷克政府就急急開辦了幾所國立學校，以羅色尼亞和烏克蘭的方言授課。同時政府宣稱，在羅色尼亞人發展到能任公務的時候之前，重要的政府位置仍由捷克人充任。

改革教育及以捷克官吏替代羅色尼亞公務員的過程非常延長，以致引起羅人的不平。然而在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年，政府通過了改組羅色尼亞全省行政系統並頒賜羅人地方自治權和省議會的法律。這樣一來稍爲和緩了羅人的不滿，但他們仍訴說捷克官員的人數過多，而這般官員的心目中，只以捷克斯拉夫的利益爲前提，很少顧到羅色尼亞的利益。那時，甚至僑居美國的羅色尼亞人也舉行反捷克運動，他們發表文章，責備捷克人無信義並藐視民族自決的原則。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自相仇視，使民族問題更趨複雜。捷克人的人數超出斯洛伐克人幾一倍，比後者較

爲西方化，在政治上也佔優勢。他們識字的人數比斯洛伐克人爲多，多傾向於政治的自由主義和對於宗教的懷疑，他們對於農業的興趣不及對於工商業的來得濃。^(註)而斯洛伐克人卻都是篤信宗教和最保守的農民，這多半由於從前的匈牙利統治者的薰陶。

^(註) 斯洛伐基亞和羅色尼亞的居民，三分之二是直接依賴耕田爲生的，而西方的居民不到一半是依靠農業的。

不久，齟齬與衝突（有時竟至流血）就發生了。斯洛伐克人譴責捷克人壟斷重要官職，並違反一九一八年的匹茲堡公約（Pittsburgh Pact），馬薩里克因要取得僑美的斯洛伐克人對於捷克——斯洛伐克統一計劃的贊助，會在此項公約內允許斯洛伐克人有自治的權利。斯洛伐克人民天主教黨特別急於爲該省取得自治權，免除政府對於學校制度的干涉，並確保教士對於農民的操縱勢力。一九二四年，斯洛伐克人開始了抵制運動，對於捷克人的一切加以排斥。但在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九年之間，發生了幾件緩和紛爭的事情：在一九二六年有兩個斯洛伐克人被任命爲閣員；在一九二八年，共和國與羅馬教廷的裂痕業已彌縫；在一九二九年，給與各省地方自治權的法律發生效力了。但接着又有另外一個因素使爭鬪死恢復燃——即匈牙利人的領土回復主義。捷克人責備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馬札兒人醞釀分離運動，此項運動目的在將斯洛伐克與馬札兒王國重行合併。雙方的爭執在一九二八年的十二月裏達到了危機，那時有一個斯洛伐克議員屠卡（Turka）教授，被指爲領土回復主義者，後以充當間諜和叛國的罪名被判處十五年監禁。當此案審訊之際，及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的時期中，斯洛伐基亞地方感到極度的不安。後來最高法院維持了原判，一時的騷動亦趨平靜。但不久謠傳居

卡在獄中備受虐待，於是又起糾紛。雖然目前捷克共和國似不致即趨分裂，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齟齬對於國家的統一，終究是一種潛伏的危險。

捷克斯拉夫雖有國內的種種困難和糾紛，但自一九一八年以來，它在文化上確有顯著的進步。捷克人早就相信教育的價值，他們又以遠在一三四八年成立的普刺哈大學而自豪。著名的教育家柯門斯基 (Komensky) [即夸美紐斯 (Comenius)] 一五九二——一六七〇年與宗教改革家胡司是捷克人所崇拜的國家英雄，他們很歡喜稱本國為『柯門斯基的故土』。捷克的學者，受了巴拉溝 (Palacký) 的巨著波希米亞民族史 (History of the Bohemian People) (共有五卷) 的鼓勵，現在正忙於從事考古工作，探求未經德人裝飾的本土古代文化的遺跡。雖然捷克人誇耀他們的音樂家史美搭那 (Smetana) 和特服拉克 (Dvořák)，但他們尚未產生傑出的文學家，有之，也許就是那位創作機器人劇本 (Rosson's Universal Robots 1921) 的卡拍克 (Capek)。捷克人對於競技和運動，也和今日的歐美各國人士一樣非常注重。一九三二年，捷克斯拉夫的競技會和運動會的會員，不下五十多萬人。大規模的露天健身運動和唱歌表演非常盛行。

(丁) 經濟與外交

從經濟的觀點看來，捷克斯拉夫是歐洲最幸運的國家之一，因為它的疆土從未受到戰爭的蹂躪。它承繼了聯合帝國的重要鐵路線及其百分之八十的工業。它雖然只有奧匈的舊壤五分之一，人口四分之一，但擁有前帝國五分之四的工廠（包括著名的波希米亞玻璃與瓷器廠及紡織業），五分之三的啤酒釀造所，十分之九的有

煙煤和五分之三的鐵礦苗。在農業方面，也有同等的良好情形，實際上捷克斯拉夫在糧食上是自給自足的國家。在舊時代，波希米亞出產帝國的百分之九十的甜菜，百分之八十的忽布（hop），百分之七十五的水果。全國的土地有百分之四十二是可以耕種的，斯洛伐基亞則出產巨量的亞麻、玉蜀黍、酒類和煙草。各種礦產如鋅、銅、鉛和銀亦甚豐富。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這十年中，捷克斯拉夫的對外貿易常能保持出超。它的主要的經濟障礙，就是它所處的被包圍的地位。即使有這種缺點，也因和平條約中允許它在德、意兩國的海口如特里斯德（Trieste）、斯德丁（Stettin）和漢堡（Hamburg）三處出海而得減輕。國內又有八百哩可通航的河道，並在監管易北河（Elbe）與奧得河（Oder）運輸事宜的國際委員會派有代表。

因為本國具有前帝國的各種工業上的設備（這原是用來供給帝國時代龐大人口之需要的），現在的人口決不能完全吸收各廠的出產品，以供自己的消耗。因此，捷克斯拉夫的經濟繁榮，不得不依賴對外貿易及與他的商業關係。它的最好的主顧首推德國，次為奧國，再次為英國和匈牙利，同時它所購的貨物大半來自德意志、匈牙利和波蘭三國。它與這幾個和其他許多國家，早已締結了通商與貿易的條約，並確立了友好的商業關係。如無此種關係，它縱能自給，總不免蒙受經濟上的重大損失。（註）

（註）捷克共和國的幣制單位是克郎，克郎的價格經穩定為美金二·九六分。在一九三〇年一月的海牙會議，捷克的賠款要求額和外債額業經確定。

商業一層並不是捷克斯拉夫希望維持和睦的外交關係的唯一動機。捷克共和國的面積，長度計有六百餘

哩，闊度則從五十哩到一百二十五哩不等。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她的入海之道是靠和約上的規定。它四周圍有五個國家環繞着，其中大多數曾與之有過仇隙。這五個國家就是德國、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奧地利。她的一半國界，是被德國南境和奧國北境所造成的鉗子形夾着的。所以它切望阻止德奧合併的成功。再者，除了喀爾巴阡山與埃爾斯奇堡奇（Erzgebirge）兩區域外，捷克斯拉夫的國界很少天然的屏障。

馬薩里克和彭尼斯（後者自一九一八年來即任外交總長，從未間斷）私人都贊成國際和平與友好的政策，他們所以如此決定，「第一由於（共和國）在歐洲所處的經濟、政治和地理上的地位」。一直到現在，還是進行着這種政策，其聲望大者，約有五端：（一）竭誠擁護國際聯合會，認它為弱小國家的保護者及歐陸的和平與安全所依賴的長城；（二）與俄國保持友好關係，不問其政體如何，因為彼此有斯拉夫主義信仰的維繫和通商的希望；（三）始終不變地擁護產生共和國的和約；（四）贊助英法兩國對於歐洲較大事件的政策，尤其是法國的；及（五）對於中歐事件（特別是涉及最不滿現狀的匈牙利）與巨哥斯拉夫和羅馬尼亞採取一致的行動。我們當記得，捷克斯拉夫在進行第五項政策之中，曾與巨哥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共同組織（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小協商國聯盟。

（註）彭尼斯為一九二四年日內瓦條約（Geneva Protocol）的部分起草者並為一九二五年洛迦諾會議席上最熱心的代表之一。

自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小協商國與奧地利之間的邦交是和好的。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奧捷兩國簽訂了一個商業協定，一九二六年三月，又商訂了友好條約，其中規定：（一）兩國中任何一國遇第三國侵犯時，各應保

守中立；(二)兩國承諾鎮壓本國境內所有不利於對方之任何運動；(三)兩國誓相合作，以防止舊帝制的復辟企圖；及(四)兩國同意以將來彼此之間所發生的爭執交付仲裁。在一九二八年的夏季，巨哥斯拉夫的外交總長建議邀請奧國加入小協商聯盟，但是因為維也納不願加入凡以另一中歐國家——匈牙利為敵視之目標的同盟，所以此項邀請被拒絕了。一九二三年以後，當小協商國盡力為匈牙利借得國聯債款時，各小協商國與後者的關係方得暫時改善。

在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的一个時期中，小協商國的團結，似乎有鬆弛之勢。果然，在將成形的歐洲外交新陣線中有兩個締盟國漸漸傾向法國，第三個則趨向意大利。然而，一九二六年後德奧兩國內合併運動的復活，一九二七年意匈的友好條約之締結（此事發生之後，意國即有軍火運往匈國，而馬札兒人的領土回復運動重又興起）及一九三〇年後巴爾幹各國為改進各該國經濟地位而有組織巴爾幹或多瑙河聯盟的鄭重考慮——這一切給與小協商國的關係一種新生命。

假如小協商聯盟的復活單單是在它們認為必須阻撓奧國或匈國的行動之時發生，那就未免可憐。雖然，這種區域的『諒解』的觀念，後來也許足為組織更密切結合的經濟集團之基礎，此種集團或能享受舊奧——匈帝國各部分因聯合為整個經濟單位而得到的那種經濟利益。

(甲)背景

波蘭爲十世紀末年波爾斯拉夫(Poljany)大帝所創立的一個王國，它在中古時代有過光榮的歷史。然而黃金時期過後，它的勢力和國威就漸趨衰落了。內部的猜忌與紛擾常使一般波蘭人民反去懇求歐洲的貴族來做他們的國王。因爲國王一向是選舉出來的，所以君主一死，就有一場內戰。議會裏的貴族議員有一種特權叫做「自由否認權」(liberum veto)它可使議會不能通過任何法律，除非全場一致同意。再者，波蘭沒有天然的，易於防禦的邊境。到了十八世紀，國內情形愈爲惡劣，遂招致了外國的瓜分。

當波蘭的各鄰邦——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同時在雄主〔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與有馬利亞·德利撒(Maria Theres)女皇、俄國的喀德林(Catherine)女皇〕的統治之下的時候，它的歷史就達到了危機。這三國開始瓜分波蘭，自一七七二至一七九五年，前後共有三次。從此，波蘭在歐洲地圖上，沒有它的名字了。當拿破崙時代，波蘭的一部分曾一度被恢復爲華沙大公國，但維也納會議重又將這個區域分割了。

在整個十九世紀中，波蘭的民族精神繼續在外國的壓迫之下生長，一般波蘭英雄又爲西歐各國（尤其是法國）的革命發揮着他們的才能。在二十世紀，許多愛國的波蘭人終究認清了歐戰是久已盼望的建立波蘭國家的絕好機會。他們覺得，這個產生人豪如大音樂家肖邦(Chopin)和大文學家顯克微支(Sienkiewicz)的民族必定能够獨立起來。他們要感謝協約國的友誼，及畢爾蘇索基(Pilsudski)和帕得勒夫斯基(Paderewski)的努力，波蘭居然復興了。

(乙) 畢爾蘇資基

畢爾蘇資基以一八六七年生於俄屬波蘭，為昔時立陶宛貴族世家子，是在反抗俄皇專制的空氣中長大的。他於遊學數大學並為參加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的活動而被各該大學開除之後，卒在一八八七年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他在那裏一直住到一八九二年。他回來以後，仍繼續從事於革命運動，幫助創立波蘭社會黨，該黨的基本信條為波蘭的自由，而非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八九六年，他又被當局逮捕，監禁在聖彼得堡的「聖保羅與聖彼得牢獄」(The Prison of St. Peter and St. Paul)裏，有五年之久。在這個時期中，他的朋友雖仍時設法與他通音訊，他被當局所嚴重監視。後來有一個醫生藉着替他檢驗身體的機會，幫助他逃脫了。

他逃走的消息傳出後，該城的秘密警察全體出發搜索他，但是沒有把他捉到。據說，他躲避的方法很妙，當全城大索犯人的時候，他正在一家著名的酒館裏用餐，穿得衣冠整齊，接着就「像紳士一般很大方地離城遠去」了。他逃到奧屬波蘭，住在克拉可 (Cracow) 城，一直到日俄戰爭爆發的時候。在兩國交鋒的當兒，他遣返俄國，參加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但到一九〇七年又回到克拉可。他在那裏着手組織並訓練一枝秘密的波蘭軍隊。歐戰爆發時，他就率領了這枝軍隊，向壓迫波蘭民族最甚的俄人進攻。

畢爾蘇資基和他的黨徒所抱的目的，是在利用奧地利為「對抗俄國之刀和抵禦德國之盾」。他們希望利用奧國對波蘭比較寬大的政策，以組織波蘭軍隊，作為謀波蘭獨立的工具。然而波蘭人民不盡抱此見解。其時有一派以德模斯基 (Dmowski) 為首領的，深信波蘭的統一要靠中歐同盟國的戰敗，所以他們寧願站在俄國方面

作戰。還有第三派的愛國者，則以為要取得波蘭的獨立，不必憑藉奧、俄任何一方的幫助。此種見解在僑居國外的波蘭人（尤其是僑美的）中最受歡迎。這一派的最傑出的代表就是鋼琴家帕得勒夫斯岐氏。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六日，「波蘭最高國民委員會」成立於克拉可，它的任務在調整波蘭軍隊的活動並監督管理其財務和政務。此等軍隊是依照畢爾蘇資基的模範隊伍組織的。那般希望俄國援助波蘭統一計劃的人民，也在華沙（Warsaw）組織了一個「波蘭國民委員會」。奧地利當局給與克拉可委員會有有限的承認，並組織兩大波蘭軍團，由波蘭種族的奧國軍官統率之。畢爾蘇資基的軍隊被編為第一軍團的第一聯隊。一九一六年畢氏被任為旅長。

其時中歐同盟國和俄國互相競爭着發表關於波蘭將來地位的高調而空泛的文告。其結果祇足以使波蘭人相信，他們不能希望從任何一方得到滿足，而自救之道只有在於獨立行動。畢爾蘇資基受了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威爾遜總統演說詞（其中力言「各處的政治家都贊成產生一個統一的、獨立的和自治的波蘭國」），及是年俄國完全撤退駐波軍隊一事的鼓勵，乃向他的黨徒說道：「現在俄國已被打敗，其次我們就要去打德國了。」柏林對於此言的答復，就是逮捕畢爾蘇資基（一九一七年七月），遣散波蘭軍隊，和解散最高國民委員會。歐戰告終時，波蘭全境就驟然產生了許多地方政府。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新被德國的社會主義者釋放的畢爾蘇資基，就回抵華沙。他馬上重組波蘭軍隊的軍符，十二月十四日，即成為執政元首。兩天後，畢氏乃將新興的、獨立的波蘭共和國之成立宣告世界。其時在德模斯基領導之下的華沙波蘭國民委員會，已於一九一七年八

月十五日在巴黎設立了大本營。這樣一來，自稱代表波蘭國家的團體竟有兩個。

各協約國在戰爭的狂熱中誤以畢爾蘇資基的「社會主義」與俄國的布爾希維主義混爲一談，至此乃承認在巴黎的波蘭國民委員會，波蘭一般保守的中產階級和農民團體（他們在戰前曾加入一個所謂「國家民主黨」的黨）亦然。反之，擁護畢爾蘇資基的政府的人，都是一般勞動羣衆，急進的農人及風起雲湧的退伍軍人的軍隊。這種奪取政權的競爭，連同鄰國的敵視，地方的分離運動，人民的饑饉以及四年戰事所引起的一般紊亂，似乎在預示這個新國家的不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保持波蘭新近得到的獨立，顯然必需雙方的妥協。

後來，主要的政見的衝突終由帕得勒夫斯岐加以彌縫了，他不但爲本國人民所敬重，且博得西方各國的領袖和人民的信任。歐戰告終時，帕氏尙逗留於美國，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就到了巴黎，十日後，開始漫遊波蘭。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帕氏被任爲國務總理，兼攝外交總長職，其時畢爾蘇資基仍爲執政元首。因爲內閣閣員包納國內各重要區域與重要政治團體的領袖，所以和解是成功了。於是畢爾蘇資基統率了五十萬人的軍隊出發，開始以武力確立波蘭的廣大疆界，帕得勒夫斯岐則赴巴黎列席和會，折衝樽俎之間，爲本國力爭權利。

一般波蘭領袖充滿了擴張領土的野心和取得天然國界的志願，乃力求與再生的國家立陶宛、烏克蘭和新奧的捷克斯拉夫之一部分——加里西亞合併，此外又欲根據人種、語言、歷史或感情上的理由，獲得德俄的土地，多多益善。事實上波蘭確與立陶宛、烏克蘭和俄國發生過戰爭，以戰爭恐嚇過捷克斯拉夫；不理協約國最高會議的忠告；結果，它所得到的疆土是一五〇、〇〇〇方哩，而非它的代表所要求的二八二、〇〇〇方哩。再者，波蘭

因有這種侵略的行動，招致了所有六個鄰國的仇恨。

(丙)國內的政務(一九一九—一九三二年)

我們有戰爭、有債務、有國旗，倘使這都不能成爲獨立的國家，在世界上還成什麼呢？

上引一句是美國羅厄爾 (Lowell) 對於一八四〇年的得克薩斯 (Texas) 州的地位所說感想，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的波蘭也呈現着同樣的景象。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帕得勒夫斯岐辭去總理之職，大半因爲他在巴黎和會中的成就頗爲國人所不滿所致。然而畢爾蘇資基——那時他已成爲波蘭的大元帥——仍保持着執政元首的地位，直到採取憲法(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七日)和選舉總統(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之時爲止。波蘭的憲法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由全國男女所普選的國民議會起草的。雖然國民議會的工作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卽告完竣，它卻把國會的選舉展緩了，同時將支配政府的權力保留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波蘭憲法的大部分是仿照法國憲法的，其中規定設立一個參議院和一個衆議院 (Sejm)，人民具有普選權，衆議員選舉者的年齡定爲二十一歲，參議員選舉者的年齡則爲三十歲，同時採用比額的代表制。大總統由參衆兩院合併爲國會選舉之，任期七年。大總統的每項行爲須經內閣閣員一人副署。大總統如經參議院同意，得於衆議院五年任期屆滿前隨時解散之。因爲波蘭的政黨非常之多，所以政府不久卽藉政黨聯盟的制度而處理政務。在共和國成立後的十二年中，它換了二十二個內閣。

根據前項憲法所選出的第一屆國會，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召集，選舉出那魯托易士 (Narutowicz) 爲第一

任大總統。那氏於十二月十六日就職，但於十八日即被暗殺而殞命。兩日後，吳洗柯維斯基 (Wojciechowski) 被舉繼任。這兩次的總統選舉，畢爾蘇資基就放棄了執政元首的地位，而任參謀總長。

在此後幾年中，波蘭的政局令人回想到昔時王國的衰微時代。國會裏的保守派和急進派鬧成僵局，土地的改革難以進行，財政情形每況愈下，官吏的腐敗幾成風氣。使事情更糟者，總統和參謀總長以前雖為密友，現在卻生隔閡了。事實上，畢爾蘇資基已暫時退休，雖然他仍與軍隊和衆議院裏的左派議員仍有密切的接觸。

這位大元帥漸漸因國會議員的因循策略，立法機關之缺乏具體的成績，及衆院議員於討論時的爭吵不休而怒不可遏了。一九二六年五月，當畢氏的最大仇敵維托士 (Witos) 為總理時，他就公然指斥政府的無能和腐敗，忽視軍隊，和不予社會黨以正式的承認。那時有人諷示，政府將提起司法手續來對付這個「誹謗者」，於是畢爾蘇資基不能復耐，招集了三團軍隊，向華沙前進，這令人回憶到墨梭里尼之向羅馬前進。

經過三天的戰爭（五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死亡的有六百人，受傷的更多，接着畢爾蘇資基即行進京，同時大總統和國務總理都辭職而逃了（五月十四日）。最使他手下所驚奇的，就是畢氏拒絕建立形式的獨裁制，又不接受大總統的職位。他反而慫恿國會選舉他的摯友莫斯科基 (Mosicki) 教授為總統。他自己卻以在巴德 (Bard) 的新內閣中任陸軍總長為滿足。

在此後數月中，畢爾蘇資基與衆議院之間，發生了劇烈的衝突。雖然大多數的議員漸漸討厭畢氏的強硬政策，但畢氏以有軍隊的擁戴和輿論的袒護，頗能強迫立法機關通過幾條憲法的修正案。這些修正案給與總統支

配國家預算的更大權力；准許他以內閣之同意解散國會兩院；並授權總統在選舉新國會前九日之間，對於經濟與會計事項得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內閣的權力亦有擴大，包括幾種立法的職權在內。當衆議院企圖重新申明它本身的權限，實際上並打消內閣的兩次動議的時候，畢氏即要求（一九二六年十月）總統任命他自己爲國務總理。

從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八年六月，畢爾蘇資基保留着總理之職，其間僅因患病略有間斷。他很能藉國會統治一切，因爲立法機關不敢反對他。然而一般人對於這種掩蔽着的獨裁制益增敵視，畢氏乃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以病體難勝繁劇及厭惡衆議院的腐敗和無效能爲理由而辭職。巴德再度上臺爲總理，畢氏則仍長陸軍部。然而誰也不懷疑，這位陸軍部長就是實際的政府首領。

國會所遭遇的困難，並不隨內閣的改組而消滅。反之，畢氏的社會黨，現在也與反對黨聯合起來了。未幾，畢氏對新聞記者發表猛烈攻擊衆議院中一般政客的談話，他說他們是卑卑不足道的陰謀家，「故意制定那種憲法，致將未開化的簡單頭腦所能想出的最大恥辱加之於國內最有名望的人身上」。他並且謾罵那些議員「叫囂如豬獾，行動若無賴」。他又說明他雖然已辭去總理之職，他仍可以「在危急之秋，干與國事」。他要大家曉得，支配波蘭的國際事務的權力，依然在他的手掌之中。

所以，畢爾蘇資基以陸軍部長的資格繼續獨斷波蘭的政策，並力主修改憲法，以便大大地增加國家行政首領的權力。新憲法草案卒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公佈了，大部分是畢氏的兄弟起草的。新憲法規定總統由

人民普選，而不由國會選舉，總統候選人有兩個，一個是由滿任的衆議院所推舉，另一個則由任滿的總統所遴選。元首應有締結條約的專權，否決立法機關的任何法案的全權，召集或解散國會之權，及不必取得衆議院之同意而任命或罷免內閣閣員之權。一九三一年三月，該項憲法就在下院經初讀通過，其最後的採用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一九三二年三月，國會被敦促通過一項法案，授權總統在三年之期中得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之期中，畢爾蘇資基在各方面表示對於國會的輕視，一九二九年一月，他拒絕列席於討論國家預算的正式會議，又不願辯護其軍費要求，但當國會宣布預算案時，他就很嚴酷地加以批評。兩個月後，當財政部長捷可維茲（Zechowicz）因未經認可擅自用超過預算案中規定額的經費八八〇、〇〇〇元而被彈劾時，畢爾蘇資基即自認此項行爲的責任，並向衆議院挑戰。這件案子終究擱置了，但捷可維茲和巴德總理也辭職了。十月，衆議院應接室內有五十個武裝軍官向畢氏致敬，不聽議長要他們離去的吩咐。國會的召集往往因總統的命令而延期，而對於反對的聲音，都以各種橫暴的行動使之沈寂。畢氏又大聲疾呼道：「最使波蘭陷於危境的人就是那般議員！」正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的選舉舉行前，政府依照了所謂「肅清」政界的計劃逮捕了九十個議員。

在這五年中，換了六個內閣，都在畢氏的操縱之下處理共和國的政務。這幾個政府，因為構成份子多爲軍人，就有『將校內閣』（Cabinets of Colonels）之通稱。畢氏的統治國家，平常總須與國會裏的多數敵黨相周旋，但當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與二十三日的選舉的結果，他的黨徒（他們組成一個『非黨同盟』（Non-Party

Union) 在衆議院的四百四十四席中獲得二百四十七席，並在參議院的一百一十一席中獲得七十四席時，他纔放心了。他們的勝利似乎不全是由於獨裁制之得人心，而當歸功於親畢派的選舉官吏的幹練與手腕。一九三一年五月，畢氏的摯友萊司托 (Prystor) 上校被任爲國務總理。

一九三二年過完了，陸軍部長畢爾蘇資基仍在獨攬大權。他有軍隊，總統和內閣爲後盾。國會中的多數議員都贊同他增強行政首領在憲法上的權力的企圖。主要的反對黨領袖，連三任總理的維托士在內，都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以謀叛罪受審判後關在牢裏了。然而他的健康漸漸衰弱了，使他不得不常常到氣候比波蘭較溫和的埃及或他國去作長期的休養了。

(丁) 財政與經濟的改革

波蘭也和它的許多鄰國一樣，在戰後數年中很受到財政膨脹與經濟不穩定的痛苦。戰爭的蹂躪，對俄兵端的綿延，五穀的歉收，農村狀況的不安定，及少數民族問題的糾紛，構成對於共和國之生存的嚴重脅威。這種危機卒激使衆議院採取斷然的行動。在一九二三年，就成立了一個專家的混合內閣，以總理兼財長革拉白斯基 (Grabski) 爲首領。這個政府受有穩定國家金融的非常權力，它從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柄政，一直維持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革拉白斯基努力進行制止波蘭馬克的繼續跌價。他採用節約政策於政府各部，削減國有鐵路的補助金，提高稅率，加徵幾種稅項。政府拒付大部分國債，解散新近組織的「波蘭國家借款銀行」，另行創辦一個新波蘭銀

行。貨幣單位則改用金「士洛第」(Zloty) 其價值與金佛郎相等。紙幣的發行亦經宣佈暫時停止了。

可惜這些改革都沒有成效，這使財長大失所望。它們都過於猛烈，並加重人民的負擔。一九一四年的收穫非常不佳，以致大宗糧食反須仰給於進口，生活費也因而飛漲了。約在同時，因有少數民族問題的爭執，德國也停止購買波蘭西利亞的煤了。自與德國商訂商業條約失敗後，兩國的關稅戰爭遂於一九二五年六月開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與十二月，波蘭曾為對英美所欠債務準備付息基金，一九二五年二月又向美募得債款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但這兩件事只能算是暫時的救濟。一九二五年七月，「士洛第」的價格開始下跌，四個月後，總理革拉白斯基就辭職了。他的兩位繼任者，史克尋斯基 (Skrzyński) 和維托士 (V. Witos) 都不能恢復金融的穩定。

當「士洛第」跌到祇值原價一半的時候，史克尋斯基政府就聘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教授甘末勒 (Kemmerer) 氏前來研究波蘭的財政情形，並請其建議改進的方案。此項聘請曾於畢爾蘇賓基獨裁時期內得到認可。甘末勒委員會經過兩星期的研究，就貢獻了若干綜括的意見，其中有許多經波蘭政府於一九二六年採用了。(註)

(註) 甘末勒委員會指出波蘭的預算經費有百分之三六·五是軍費，而國家警察與邊境防衛軍的經費尚不在內。

較穩健的貨幣原則之引用，一九二六年的收穫的豐富，及外國對於波蘭煤的需求之增加（因是年英國發生煤礦罷工），在在使波蘭有走進繁榮時期的好望。一九二七年十月，波蘭借得七二、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作穩

定金融用的外債，同時又敦請美國財政部次長查理斯·杜威（Charles Dewey）為財政顧問和波蘭國家銀行的理事。國家的預算自有共和國歷史以來，到現在纔得第一次的平衡。「士洛第」的金價格則經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日的法令確定為一一·二二分。

在此後五年中，畢爾蘇賓基獨裁的政府頗能維持「士洛第」的穩定價格，並使國家的常年預算收支相抵。當杜威於一九三〇年十月辭職回國時，波蘭的財政似乎已走上平衡的路了。一九三〇年後的世界經濟恐慌自然也影響到波蘭，特別是在它的糧價跌到二十世紀的低點紀錄之時。然而因為政府在支出上力求樽節，一九三二年的預算尙能保持平衡，沒有藉助於通貨膨脹。這一年中波蘭每人的財富約及法國每人的財富三分之一。

差不多和財政問題一樣急迫的就是農村境況的問題。一般社會主義者和過激的農民，受了俄國榜樣的影響，無疑地贊成將波蘭全國的大地產分裂並重行分配土地。前俄屬波蘭和加里西亞的農民特別要求多得土地，以維持一家的生活。復次，美、德兩國的限制移民律，又增加了人數日增的波蘭無產民衆的痛苦。

保守的地主與過激的農民之利益衝突，及國會中左右兩派的勢均力敵，竟使補救方案的採用遲延了六年之久。一九一九年的土地改革法案（翌年即獲通過）從未施行，一九二三年雖又有一件土地法案提出，但內閣卻因此傾覆。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國會卒通過了一件法案，規定逐漸分割大地產，每年以二〇〇、〇〇〇公頃（四九四、二〇〇英畝）為度，限期十年。其中又規定，國家之徵收土地只能在自動的分配不能達到最低標準時作為最後採取的辦法。地價的付償，一半以現金，另一半以公債票。雖然兩極端派（左右派）都不滿意於此項

法律（對於此法所提出的修正案有六百條以上），但它已證明為將來的法律所可據以制定的折衷方案。

財政和土地的問題既然多少得到解決，波蘭的經濟也就有了確定的發展。新的鐵路固有加築，舊的鐵路亦經改良，實際上國內所有可耕種的土地都在墾植，新造的房屋添了幾萬幢，整個的生產也增加得很快。然而市場之不足，顯然為共和國的主要障礙。戰後關稅的增高，和一九三〇年的不景氣，使這種困難越發加重。到一九三二年，失業也成為波蘭的嚴重問題，雖然它祇有五分之一弱的人口直接依賴工業為生。政府對於過激的勞工運動取締甚嚴，因為波蘭與俄為貼鄰，此種運動之發展似有雙重的危險性。

（戊）少數民族

因為一九一九年中屬於波蘭國籍的人民，還不到它的全人口四分之一，所以在巴黎的協約國最高會議要求該國政府簽訂了一個關於少數民族的條約，擔保該國境內一切民族（不論其是否屬於多數）有平等的公權與政權。（註）居住波境的少數民族應有自由入籍或離境之權，政府無論如何不得褫奪其生命或財產，並不得干涉其信奉宗教的自由。對於在任何區域組成人口之「一大部分」的少數民族，須保證其有創辦學校並享受國家的教育補助金之權。少數民族的語言得在商界、法院、公共場所和宗教儀式中使用，不應加以限制。凡遇上列各種特權被侵害時，可向國聯行政院控訴。波蘭雖接受這些義務，但有一個時期，它對於少數民族所施的壓迫，似不亞於以前俄、德、奧三國之對待他們那樣。

（註）波蘭的人口在一九一九年為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在一九三二年則約有三一、〇〇〇、〇〇〇。

波蘭國境內最大的少數民族團體，就是東部加里西亞的羅色尼亞人和烏克蘭人，他們的人口占全人口七分之一。其次要算猶太人，波蘭各地都有他們的蹤跡，占全人口二十分之一。再次的少數民族為德國人，他們占全人口二十五分之一。在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四年之間，這些少數民族所處的地位非常危險。波蘭的民族主義者中又發生很大的反對少數民族條約運動，但是不大順利。他們宣稱此項條約既未經美國批准，實際上不生效力。雖然一九二二年九月波蘭政府通過了一件法律，給與東部加里西亞(Galicia)若干地方自治權，但是羅色尼亞人民仍對波蘭的統治政策深懷不平。「一貫的行政方針的缺乏，移殖波蘭兵士於徵收的土地之企圖，及新出茅廬的，毫無經驗的，和能力薄弱的行政人員之充斥於該區域」，這一切在在足以證明波蘭國家要把東部各省實行波蘭化的野心。一九二四年的情形更為惡劣，以致俄國政府向華沙提出了強硬的抗議，並引起世界對於此事的注意。俄國自稱有關心這般人民所受待遇之權，因為蘇聯境內有很多烏克蘭人。

雖然波蘭以傲慢輕蔑的態度答復蘇聯的牒文，總理革拉白斯基卻於一九二四年七月設法通過了三種法律，都是關於使用少數民族的語言於行政官署、法院、和學校的。波蘭語被確認為國語，但遇辦理公務與司法事件之必要時，准許並用烏克蘭語，立陶宛語和白俄語。各私立學校得以任何一種語言授課，凡遇非波蘭籍之少數民族至少占人口百分之二十五的區域內有四十個兒童的父母們請求時，該區域內之公立學校亦應以該少數民族的語言授課。然而教授地理和歷史時，無論如何應強迫使用波蘭語。

政治上的反對有一個時期延緩了這種法律之適用。但即在施行的時候，幾個民族團體間的關係，依然不能

和諧。羅色尼亞人以待遇不公，常發怨語，其中有些人且組織了一個「烏克蘭軍人會」，從事運動東部波蘭與俄國合併。波蘭政府譴責該團體怠工，乃取戡亂的斷然處置。一九三〇年，少數民族哀呼的聲浪為國聯行政院所聞，它就將此事交付一個「三人委員會」討論。

當三人委員會將各當事人所呈送的相反報告加以研究時，波蘭的局勢愈增惡劣了。烏克蘭的農民漸漸集合起來，從事於如不納租稅之類的反政府運動。政府認為有鎮壓之必要，乃遣派軍隊前往拘捕運動的領袖，一面迫令服從法律。一九三二年九月，當局解散了那個號稱有四十萬黨員的「烏克蘭急進黨」，其理由則謂該黨參加共產的和反波蘭的活動。這種繼續不寧的狀態，使三人委員會在造送報告書於國聯行政院之中，不得不屢次請求延長時間。

比羅色尼亞人的難題麻煩略少的問題，為波蘭國內猶太人的問題。猶太人在歐戰後的幾年中，也受到嚴酷的壓迫。政府責備他們為親德派或親俄派，毫無波蘭人的愛國心，拒絕遵從波蘭國的生活標準，重視經商的贏利，在重視國家幸福之上。他們常為遭人襲擊和暗殺的犧牲者，甚至不能享受一九二四年的語言法律的利益。那時關於猶太人受虐待的謠言盛傳國外，以致英美兩國派了兩個調查團，到波蘭去從事調查。最後，在一九二五年六月，波蘭當局和猶太人訂立了和解的協定，即所謂華沙宣言（*Declaration of Warsaw*）。

依照該項協定的條款，猶太人經由他們的政治代表允諾承認他們對於波蘭國家應盡的義務與責任，並將他們的反對策略限於國會與憲法的常徑。政府為報答猶太人起見，允許對於猶太人的教育和經濟利益多加注

意，又制定幾種法律，給與猶太人語言及宗教的權利，和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准許猶太人所設店鋪於星期日照常營業，以代替星期六；並減輕對於猶太人的小本經營所課的特稅，因為此種特稅影響於猶太店主者甚大。波蘭政府又答應不在星期六舉行選舉，俾信奉正教的猶太人不致被剝奪選舉的權利。在此後數年中，尤其是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裏，又有反塞姆族的運動發生，但是這些法律實質上改善了關於猶太人的一般情形。

少數德國民族的問題涉及兩項的爭論。第一個是小部分佃農的問題，他們受了德國政府的援助，曾移殖於前普魯士所屬波蘭。大戰後，波蘭人打算將這般外來的殖民驅逐出境，且不補償他們的土地損失——他們的土地是根據從德政府所得的特殊契約而保有的。但是德政府就替它的國民將此事件控訴於國聯行政院，要求賠償。波蘭政府否認國聯行政院有干涉此事的權力，於是爭論又被提出於世界法庭。世界法庭判決國聯有過問之權，並向波蘭致忠告的意見，大意謂波蘭應尊重德籍人民的私有權利。結果，華沙政府卒允許賠償被逐的德民的損失。

第二個困難是關於上西利西亞 (Upper Silesia) 工業區內德籍人民的地位的問題。該處的少數德國民族高聲抗議波蘭人的虐待和不公平的歧視，尤以關於教育的機會方面。他們組織了一個團體，運動改善他們的狀況，一方面又請求德政府予以同情。據說，波蘭人曾加各種壓迫手段於少數德國人民（自檢查新聞至威脅行動），特別是在選舉的時候。又說，波政府對於非波蘭籍的居民，未予相當的保護。柏林政府屢次促催國聯對這種糾紛加以注意。一九三一年，德波兩國的代表又在國聯行政院會議席上對西利西亞的問題作激烈的辯論。整個的爭

論其實涉及修改德國東部疆界的較廣問題，這個問題存在一日，對於東歐的和平是一種威脅。

(己)但澤與波蘭迴廊

我們當記得，巴黎和會曾規定把德國的但澤港，變為一個自由城，由波蘭掌管經濟權，一般政務則由國際聯合會監督。雖然那時全城的居民幾乎盡是德國人，但和會認為這種辦法最足以解決給與波蘭出海之道的問題，並足以使波蘭與西歐各國發生商業上的關係。國聯抱定了這宗旨，就要求但澤的人民草定憲法，並與波蘭訂立一件關於他們與該共和國的將來關係的協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九日，遂有波蘭—但澤協定（*Polish-Danzig Agreement*）的簽訂，六日後，但澤自由城即正式成立了。但澤憲法於一九二二年五月得到國聯行政院的最後批准。

根據前項憲法協定，與一九二一年附加的條約中的規定，但澤自由城由一個衆議院和一個參議院統治，其行政權則由國聯委任的「高等委員」執掌之。該委員又為受理波蘭與但澤間爭議的初審法院性質的官吏，但爭議兩方，皆有向國聯行政院上訴之權。波蘭負自由城的外交事務的責任，並有監督其海關之權。但澤海港如事先未得國聯的允許，不得用為海陸軍的根據地。波蘭與但澤兩地之間可以完全自由通商。海港局由五個波蘭人民，五個但澤人民組織之，並以一個中立國人民為主席，其職務在管理港口事務並照顧雙方的權利。該城對於少數民族的權利（尤其是波蘭少數民族的），應予擔保。總而言之，波蘭具有管理自由城的經濟和外交的權力，而居民享有很多的自治權。

波蘭與但澤的關係曾一度緊張，這一層無待我們指出。在自由城成立後的五年中，高等委員所判決的案件，幾達五十餘起。國聯行政院也常常接到它們的上訴案件，甚至世界法庭也被驚動來解決雙方的爭議。經濟與政治事件間的界限之難於劃清，兩民族間相沿的仇隙，及但澤人民的深懼波蘭政府終將併吞該城，一切都足使目下的局勢成爲危險的情形。再者，但澤人又深以波蘭在格台尼亞（Gdynia）開始築港計劃爲隱憂。

華沙當局爲減少波蘭商人與運貨者對於但澤港種種設備的依賴起見，乃藉法國的一個資金與建築企業組合的助力努力推進格台尼亞的發展，這個地方距但澤的西北角僅有數哩。波蘭希望擴展這個港口，俾可每年把握一千五百萬噸以上的運貨。但澤居民自然非常憂懼鄰境的這種經營，因爲它將奪去他們的運業。德國國內的人民對於但澤人的困苦常常表示同情，而希特勒黨人更表示他們的決心，要將他們所認爲凡爾賽條約的顯然之錯誤，一舉予以糾正。

但澤的西南面，有一條狹長的地帶，長度約有二百六十哩，平均的闊度約有八十哩，這條地帶的一部分以前屬於西普魯士與波森（Posen）兩省。維斯杜拉河（Vistula River）就在該地帶內通過，這條河是東部中歐的商業渠道。凡爾賽條約規定將該地帶劃歸波蘭管轄，結果德國的土地被分成兩個不相啣接的區域：東至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德國本部，與東普魯士。這種疆土的轉移，在協約國方面是認爲非常正當的，他們的理由是：『東普魯士的德人不到二百萬，他們於設法使本土與德國連接之中所有的利害關係，其重要比不上整個波蘭國於取得入海通道之中所有的利害關係』。

因有『波蘭迴廊』(Polish Corridor)之建立，波蘭就成爲完善的經濟單位了。反之，從經濟與軍事上的觀點看來，德國卻變弱了，它要在波羅的海區域伸張勢力，也感覺困難了。至於東普魯士的命運，更爲乖蹇，因爲它在迴廊區域內不再享有銷售糧食、牲畜、木材和馬匹的自由市場了。一九二一年四月，柏林和華沙互派代表，訂立了一件協定，其中規定波蘭應准許德國的人民與貨物自由經過迴廊，往來於德國本部與東普魯士之間。然而這種辦法還不能算爲滿意。德國人之希望不用護照，且不受稅關檢查的煩擾，而通行該地者，必須乘了『加封的』特別車走過。坐在這種車子裏往往感到非常不舒服。

德國本國人對於波蘭人虐待住在迴廊裏的少數德人的事情，更懷不平。至於該地的波德人民孰多孰少，在一九一八年還沒有準確的統計，但在今日，無疑地是波蘭居民占大多數。華沙政府曾經勸誘該地德人離境，往往直接加以驅逐，一方面又獎勵波蘭人民移殖到該區域內。在一九三二年，在那裏的德籍居民，恐怕只有十萬人了。波蘭迴廊的問題，就是德、波兩國交惡的最重要元素。這兩國的商務條約，多年來沒有議妥，無非因爲迴廊的爭議和少數德籍人民的問題未得解決所致。在一九二五年的洛迦諾會議中，德國斷然拒絕保證不侵犯波蘭的國界。自此以後，德國政府常常指出東部邊界有加以修改的切要。但是波蘭聲稱它的經濟生命有賴於迴廊之保留，它的同盟國——法國對於它這種見解力予擁護。附帶說一句，波蘭在迴廊地帶所耗於商業和軍事之經營的一筆大款子，即由波蘭政府向法國的兩大軍火製造廠(Schneider-Creusot)所借得。

(庚)維爾那：另一個疆界爭執

在中古時代，維爾那（Vilna）是立陶宛大公國的首都。後來，當波蘭與立陶宛因兩國皇家婚姻關係而聯合的時候，維爾那的文化與經濟，漸漸為波蘭人所操縱。自波蘭於十八世紀被瓜分以後，維爾那就歸俄國治理，約有一百二十五年之久。

經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俄國革命後，立陶宛人乃宣佈獨立，並在維爾那設立新政府。接着兩國發生戰爭，一九一九年一月，俄國共產黨軍隊進佔該城，但是又為波蘭軍隊擊退。其時，因為巴黎和會沒有劃定立波邊境的界線，協約國最高會議乃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規定所謂「寇純界線」（Curzon Line）的臨時邊界，將維爾那劃歸立陶宛。那時波蘭尚在與俄交戰，就接受了此項規定，但祇認為暫時的處置。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二日，俄國依據莫斯科條約（Treaty of Moscow）確定把維爾那讓與立陶宛了。

俄波戰爭終了的時候，波蘭人就以戰勝為理由要求取得維爾那，結果與立陶宛發生武裝衝突。接着國聯委派了軍事調查團前赴出事地點，制止戰爭。一九二〇年十月，兩國政府因國聯的勸說，締結了蘇瓦爾吉協定（Agreement of Suwalki），因此「寇純界線」略經修正後又被雙方接受為臨時的邊界，而維爾那仍歸於立陶宛。十月九日，即前項協定發生效力的前一天，波蘭的一個山賊齊立各維斯基（Zeligowski）率領了一萬五千人的雜牌軍隊，突然佔領該城。雖然華沙政府聲明不負此項行動的責任，但齊立各維斯基卻被波蘭人民呼為「波蘭的英雄」了。立陶宛即以此事訴諸國聯，請它主持公道。國聯有一個時期開玩笑似的準備付諸該地人民投票表決。然而到一九二一年三月，國聯行政院就向這兩個爭執的國家，建議舉行直接談判。當談判結果失敗時，

行政院又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三日規定了另一個臨時的疆界——這一次卻把維爾那劃歸了波蘭。次年三月，「大使會議」承認這個疆界爲永久的國界。

波蘭和立陶宛之間的戰爭狀態，自一九二〇年十月以來即存在，直到一九二七年纔告終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國聯行政院又不得不注意這個局面，當時立陶宛訴說在維爾那城的本國人民被波人虐待，波蘭也訴說在立陶宛的本國人民被立陶宛人同樣虐待。國聯遂請求舉爾蘇資基元帥與立陶宛的國務總理到日內瓦來開談判，結果締結了一件協定，立陶宛答應終止「戰爭狀態」，波蘭則允諾尊重立陶宛的完全獨立和領土完整。然而就立陶宛一方面而言，維爾那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一九二八年春季，在哥尼斯堡（Königsberg）舉行的波立會議，並未有成就，兩國的邦交，依然非常緊張。

一九二八年五月，立陶宛政府公佈新憲法，其中把維爾那確定爲立陶宛的首都，雖然它的政務仍在科甫諾（Kovno）處理。立陶宛這種行動，大爲國聯行政院所譴責，於是又定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舉行第二次哥尼斯堡會議。可是會議的結果依然失敗，因之維爾那的爭執，對於歐洲的政治仍爲易起糾紛的因素。

（辛 外交）

自波蘭復興爲獨立國後，它的對外關係，大半是於與鄰國在地理上的接近而形成的，這些鄰國對它都有敵意，至少是不友好。它的東面是蘇俄，北面是立陶宛和東普魯士，西面是德國，所以波蘭將它的主要希望放在軍事同盟和仲裁條約上，以求保障它的安全。一九二一年，它與羅馬尼亞和法蘭西訂立了同盟，與捷克斯拉夫締結了

中立條約。一九二二年，又與各小協商國建立了友好關係。三年之後，又與芬蘭、拉特維亞、愛沙尼亞、捷克斯拉夫和奧地利等國商訂了許多仲裁條約；與羅馬尼亞重締同盟；與巨哥斯拉夫訂立友好公約；接受洛迦諾協定；並與羅馬教廷簽訂和好條約。

一九二九年，波蘭、蘇俄、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和羅馬尼亞贊同李維諾夫議定書（Litvinov Protocol），因此開洛格公約不問別國簽訂與否在這五個簽約國立即發生效力。一九三一年，波蘭又與俄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與法蘭西和羅馬尼亞重結同盟。在這一年中，我們又看到波蘭從法國一個企業組合訂借了五千萬金元的款項，以完成從波屬上西里西亞到格台尼亞港的一條重要鐵路。同時，波蘭對於叔伯爾和庫圖斯兩博士會商的德奧關稅同盟計劃提起反對的呼聲。

若干國家曾在波蘭的提倡之下努力進行「波羅的同盟」（Baltic Union），它包括波蘭、拉特維亞、愛沙尼亞、芬蘭和立陶宛在內。這種聯盟對於各締盟國當有顯然的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但這一方面的工作還沒有什麼進展。俄國反對任何足使波蘭在波羅的海操霸權的計劃，立陶宛對於波蘭也不懷友好之意，芬蘭則漸漸傾向於斯干的那維亞的方位，而不願加入波羅的同盟。

在一九三一年之終，波蘭的常備軍計有二七〇、〇〇〇人，佔世界陸軍的第四位。在海陸軍軍費上它可居世界各國的第九位。一九三二年的波蘭預算案中，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經費為軍備所吸收。它的財源也很涸竭，因為波蘭共和國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

第十八章 蘇俄

帝制時代

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是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全俄皇帝與專制君主』。他所統治的帝國，幾占全球的陸地面積六分之一。他的領土共有八、七六四、〇〇〇方哩，西起中歐，東至太平洋，北自北冰洋，南迄裏海、高加索、波斯與中國。這個廣闊的幅員，居民約達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將近半數為真正的俄羅斯人，或大俄羅斯人。其餘則為小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波蘭人、芬蘭人、拉特人(Latvians)、土耳其人、蒙古人、亞美尼亞人(Armenians)、猶太人及其他。這許多種族不同的人民的文化程度非常高低不齊，從最文明的歐洲俄羅斯貴族與知識階級以至於過着半野蠻生活的西伯利亞土人。

據一九一四年的統計，在俄皇統治之下的每一千個俄羅斯人中，有十七個貴族，一二五個商人和市民，及八〇〇多個農民。直至一八六〇年為止，這些農民，除少數例外，都是農奴，受着封建法的種種限制寄生於政府或私人所有的田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一八五五——一八八一年）登位後，就陸續頒佈了敕令（以一八六一年三月所頒佈者為最後的），廢除農奴制度，並規定土地的重新分配。依照他的命令約有一半歐

俄的可耕地被分派於各村(миль)，每個農人都有權利爲本身的利益耕種屬於本村的田地之一份。政府則整款給貴族，以賠償其土地的損失，但人民當於若干年中備資付還國家。

除掉因個人自由的給與所生的某種顯明的利益外，一八六一年後的俄國尙留有許多磨難，使一般農民的境況非常悲慘。被釋放的農奴往往不能靠所分得的一份田地自食其力與贍養家屬。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此種困苦每況愈下，蓋分配地的增加，不能同農人人口的繁殖並駕齊驅。農民每年收入的大部分，全被各方面吸收而去，如匯款於政府以償地價；繳納本村本省與國家所徵收的苛重的直接稅與間接稅；經過層層剝削，已無多可餘。農民也沒有改良其保有地的信心，因爲改良的費用浩繁，非他們的力量所能勝任，況且村政府往往按期重新分配地段。此外，村政府所制定的規章條例多半十分嚴酷，一般農民如未經准許不得離開本村而遷往城市。

以上種種惡弊，有些或因政府於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爆發後所陸續頒佈的田地均分法令，稍獲減輕。這些法令所規定的事件中，有豁免農民所欠的地價，減少村政府對於村民的權力，並給與村民公然要求本村所保有的田地中本人名下的一份的權利等項。這樣一來，農民成爲財產的直接所有者，他可以依自己的意思使用，出租或出售其田地。

由若干比較有進取心的國人看來，這些新的機會極投本人之好，他們於是趕快利用此項權利，成爲獨立的農夫。有許多農民，「依嗜好與習慣都是些小耕作者，切於購買或租借田地，有時甚至於起而強奪之」，就馬上爭先恐後地求得「租借田地的機會，而租價之高，往往使其勞作的報酬，還不如他們在鄰家田地耕耘所得的工資」。

有些人簡直不能『在更個人主義的制度下保持他們的所有地，遂以之售與鄰人，自己則成爲代人耕種的農夫或跑到城市裏去找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顯然可見農民的狀況到一九一四年還沒有充分改善。在大戰的前夜，仍舊可以找到幾百萬農戶正在過着極貧困的生活，並貪求更多的田地。

俄國的二、五〇〇、〇〇〇工人的境況也和農民一樣可憐。他們遭受着所有工業革命初期的那種不幸，他們又被不開明的政府抑制着，不能表示他們的痛苦。有些工會被破壞了，罷工運動常常受到無情的鎮壓，而關於社會問題的法律也比較少。其結果一般工業的無產階級熱心地諦聽宣傳改革的人的話，又因爲工人聚集於工廠與陋巷，所以很容易在他們中間鼓吹革命。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之際，工人早已在聖彼得堡、莫斯科、科甫諾（Kovno）、里加（Riga）及其他城市以大罷工和騷亂表現他們的憤怒，到一九一四年，他們似乎在準備另外一個暴動了。

俄國的農民與工人裏面文盲的百分數，冠於歐洲各國，而人民之爲一種猛烈的白蘭地酒（Vodka）這種酒含有百分之四十酒精）的奴隸，也是一種毒害。雖然酒類的販賣早爲國家之專利，以便徵收酒稅並減少隨着私人售賣酒精而至的罪惡，但酗酒仍是普遍的現象。所以，就全體而觀，民衆是鄙野而兇猛的，並且充滿着對於上層階級的畏懼與毒恨。在國家支配之下的希臘正教會，雖在農民中有很大的勢力，然而它是帝政的最忠順的擁護者，它顯然很少作過提高人民文化程度的功夫。

俄羅斯帝國在大戰前夕的政局是非常不穩固的。箝制言論的行爲早已著聞於世，警政方面也極爲殘暴。沙

皇尼古拉斯二世這個人很不適於行使專制權力於這個廣闊的領土。他雖是秉性良善，且愛國家，但爲人庸懦無能，並易聽信人言，爲所左右。他特別受制於那個神經質的皇后亞歷山達拉(Alexandra)，她本人又受一位西伯利亞的『僧人』叫做拉斯蒲丁(Rasputin)的所操縱。對於拉斯蒲丁的來歷有許多傳說，但似乎他具有催眠的魔力。他所以能迷惑皇后，使她受本人的支配，就因爲祇有他能够撫慰那個患血友病並有奇癬的年輕太子亞歷西斯(Alexis)。據說，拉斯蒲丁的一句話就足以任命或罷黜一個大臣或將軍，但他的大權顯然不是完全爲了國家的利益而發揮的。那時俄國的全局就有不吉的兆頭，特別是因爲要維持專制政治，就需要堅強而有決斷的領袖。它決不能在一個優柔寡斷的皇室與一個目不識丁的投機者的指導之下繼續存在。

一九〇五年的暴動的結果，尼古拉斯給與了人民一個國會(Duma)。這個國會的權力殊有限。再者，所制定的選舉法，使國會中的保守派常占過半數的人數，因之政府於繼續施行其傳統政策時，毫不發生困難。在一九一四年，國會全體，除五個議員外，都很愛國地擁護政府參加大戰的決議。那五位持異議的，屬於社會民主黨中自稱爲布爾扎維派的議員，(註)立被逮捕，流於西伯利亞。

(註)戰前俄國的「急進派」有以下數派：一爲立憲民主黨，或稱 Cadets，該黨的黨員即一般中等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商人，他們贊成採用英國式的責任政府；二爲社會革命黨，其構成分子大半爲農人，由中等階級的改革者領導着，宗旨在以土地移交農民，並主張用恐怖手段來實行農業的社會化與集合化；最後爲(馬克思派的)社會民主黨，它以工人爲主力，主張廢除私有財產，由大眾管理生產。

社會民主黨於一九〇三年在倫敦開會時，黨中人對於黨的紀律、組織及與非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合作與否的問題發生兩歧的意見。一

派人以列寧爲首領，贊成採取嚴格的紀律，集體的組織，並完全與中等階級分開，不受其幫助。其他一派則寧擇比較鬆弛的組織，且反對容納非無產階級的「同情者」。大會於是以此兩派的意見交付複決，結果投票贊成列寧一派的見解的人居大多數。列寧一派人不久號爲布爾扎維黨 (Bolshevik) 此字出自 Bolshinstvo 意謂「大多數」，而其他一派則稱門塞維克黨 (Menshevik) 此字來自 menshinstvo 意謂「少數」。

儘管俄軍在戰爭的最初幾星期中略獲勝利，不久就很顯然，俄國若將戰事延長下去，就會遭受困難。俄國對於大戰無充分的準備，成功的障礙則甚大。國內的工廠很少，因之軍備時虞不給；缺乏充分的運輸設備；前方的將領都是些闕茸無能之輩，而皇后與文職貴族又常常干預軍事；政府各部幾皆腐化不堪；當時並有高級官吏實行叛國的謠傳。因之德軍不久就能夠屢次大敗俄軍，這更使俄軍的士氣一蹶不振，並使俄國的工業組織大爲紊亂。在開戰後起初三年中，俄皇一共召集了一千五百萬人從軍——這個數目是不必要的，並且也沒有如許軍用品和糧食來維持它。因之有幾百萬農夫被迫離開田園，拋棄耕耘與收穫的生產事業而從事於破壞工作，而這幾百萬人必須用國帑來養活。因爲兵士的每日口糧在許多情形中超過各個農人在平時的消費量，所以糧食的需要額比平時多得多。此外，政府又得以巨款津貼兵士的家屬。

俄國的鐵路系統復不能擔任戰時的運輸。在一九一四年，帝國祇有五萬哩的鐵路軌道——僅及美國的五分之一，雖然面積大於美國三倍。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迅速地載運軍用品到前方，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關於戰士的可怖狀況及巨大的傷亡之數的謠言漸漸洩露於後方，同時國內飢饉與災禍的慘聞亦遍傳於戰壕。

戰時對於貨物的需求之殷，及各城市中所發生的許多罷工的勝利，在在使物價飛漲，一九一六年俄國政府的歲出視戰前各年度高出了四倍，雖然多數的額外支出係取償於協約國的借款，但稅收仍須加重，通貨膨脹的政策亦須實行，其結果物價更因之而激漲。同時，政府爲便利動員計，早已開始禁酒，這樣一來，大宗的酒類販賣稅就無形犧牲了。

儘管情形如此惡劣，當局仍毫不注意人民所提出的關於開明的政策與內閣責任的要求。官吏竭力設法挫折民衆的運動，即令此種運動的動機有助於戰事，亦所不顧。事實上，內務大臣普洛托坡坡夫（Protopopov）有一次竟拒絕某省議會的提議——使軍隊得到若干安樂的提議，他以爲「俄國人民所提出的任何方式的自動合作都不免會傾向革命」。當軸者同時露出他們對於下層階級的戒心，並保持一種不妥協的和反動的態度。尼古拉斯本人則畏縮逡巡，對於任何種方針狐疑不決，祇是以維持一切事物的現狀爲心滿意足。到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妖僧拉斯蒲丁被一個少年貴族狙殺，但這件事無補於時局。

俄國舊政體的敗亡的劫運，第一次的朕兆爲一九一七年二月彼得格勒（Petersburg）的工廠總罷工。這個罷工引起無產階級的無組織的，無計劃的，但很偉大的示威運動，這般人已因戰事的綿延，軍隊的敗績，生計的困窮及物價的昂貴而不能復耐了。該城的警備軍奉命驅散羣衆的時候，卻不肯對一般示威者放槍，事實上他們已和人民聯成一氣了。那時俄皇如能趕快召集京城外的軍隊來鎮壓暴徒和國會（國會也正在表示亂動的精神），或答應自由黨員所提出的改組內閣並建立責任政府的要求，他也許可以避免，或至少展延，危機的降臨。然而尼

古拉斯不能當機立斷。他既決意不作任何讓步，又不毅然採取神速的行動，祇是觀望形勢，無所事事，又安得不敗呢？

一九一七年的兩次革命

俄皇的優柔寡斷漸漸激使國會內外一般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傾向於革命的立場，並資過激派再好也沒有的宣傳材料。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之初，各大都會均有民衆的暴動，鄉村中的農民亦大起騷亂，同時國會中猛烈地攻擊政府犯有叛國之罪。最後，在是月十一日，俄皇嚴命國會議員一齊歸家，又命彼得格勒的工人停止罷工。這種愚笨的敕令祇有促成革命。

國會拒絕解散。它反而推選了一個委員會，從事領導反抗專制的革命。同時國會外的社會主義者和其他過激分子組織了「彼得格勒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會議）」，邀請全國的工廠與軍隊派代表來商議一切。國會的委員會與這個蘇維埃答應彼此合作（至少暫時合作），三月十四日，以頭腦較新的親王李窩甫（Львов）爲首領的臨時政府就產生了。內閣閣員的大多數爲立憲民主黨黨員。其中最急進的一位，就是社會革命黨黨員克倫斯基（Kerensky），他是蘇維埃的代言人及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副主席。

三月十五日，沙皇尼古拉斯承認新政府，遜位於其弟米卡益爾（Michael）大公。可是米卡益爾拒絕接受皇位，他要等人民根據普遍的、直接的和祕密的選舉權所選出的國會決定俄國將來的政體。尼古拉斯與其家屬於

是成爲囚徒，被幽於彼得格勒附近擦斯科業·謝羅 (Tsarskoe Selo) 地方的皇宮，這樣，建立於一六一三年的羅曼諾夫 (The Romanovs) 皇朝遂壽終正寢。

臨時政府成立後立刻頒佈命令，撤消新聞檢查，釋放大批政治犯與宗教犯，承認工人加入工會與罷工的權利，並修改陸海軍的軍紀法，使合乎人情。大多數文官與軍官都答應在新政府下服務，因爲俄皇本人已承認新政府的地位。再者，各協約國步美國的後塵，立刻給與承認。事實上，協商國的外交家當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反而安心了，因爲他們早已風聞俄帝國政府因俄後的德惠，已在計議單獨與德國媾和。

儘管有這種好的兆頭，李窩甫政府卻被注定爲短命的，因爲它的存在全靠國會中的革命黨人與彼得格勒 蘇維埃之間不相稱的聯合。國會之欲推倒俄皇，祇爲了一個理由，即因他未能盡力應付戰事，而工人一方面卻大半爲了要終止戰爭纒起來的。不特此也，蘇維埃要求徹底修改俄國的財產保有制度，這是國會中大多數溫和派所不能表同情的。最後，當臨時政府企圖以聳人聽聞的學說和主義來解決其困難問題的時候，蘇維埃迅速地完成了強有力的中央組織，分遣人員往全國各重要地點設立支部，到處散播煽惑的宣傳，並催促勞動者，陸軍與海軍派代表到中央蘇維埃。

彼得格勒蘇維埃於三月十四日頒發了一道著名的第一號命令，訓令陸軍與艦隊不要理睬任何與蘇維埃規章的臨時政府的軍令。陸海軍的兵士也很快地設立了地方革命委員會，管理一切補助的軍器。這些軍器之處置與使用權祇在各地方委員會確定其不致危及革命之利益時，纔委託於軍官。軍隊中的紀律因此大受破壞，兵

士方以他們新近獲得的『責任』而揚揚自得，有些不能把握變遷的局面的意義的軍官，往往立刻被槍決。此外，兵士中又發生勢不兩立的狼鬪，因為有些人情願照舊矢忠於其長官，另一羣人則不肯作戰，且自動開拔回國。

李窩甫內閣之不能應付方興的難局既漸漸顯然，閣員中的溫和分子遂相繼辭職。到七月間，原先被任命的人祇剩三個，連克倫斯基也在內。事實上，克倫斯基已崛起為陸軍總長及政府首領，他用他的口才和巧妙的國會程序力求恢復國內的秩序，一面繼續進行對於中歐同盟國的抗戰。然而到這個時候，就是社會革命黨的政府也為民衆所不滿了，民衆所渴望的是和平的復臨及對於國家生產機關的直接管理。克倫斯基的切望展延國民議會的選舉，使人民減少了對於他的根本動機的信心。

在一九一七年的秋天，俄羅斯顯然瀕於另一個革命。兵士正在表演也許可稱為世界軍事史上最大的兵變的一幕悲劇。農民一覺得沙皇與地主勢在必倒的時候，就起而強奪土地，有時平和地過去，但常常經過慘酷的流血。城市中的許多工人，起初本為求得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時間而罷工。現在變為更激烈了。他們當中有些人甚至於要取得完全的工廠管理權，且不顧資本家的所有權而接辦生產機關。為使他們的理想更有力量起見，他們組織了地方蘇維埃，並自動編成武裝部隊，號為赤衛軍。那些隸屬於俄國的民族，尤其是烏克蘭人與芬蘭人，則乘此大混亂的時機進行獨立，同時德國與奧匈帝國的軍隊雲集於俄國的西疆。當着這種局勢，克倫斯基雖給與舊省議會（Zemstvos）較大的地方自治權，確立普選權，預許遠大的社會改革與經濟改革，仍不能使任何部分人民滿足。

一九一七年六月，因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提議，舉行了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到會的代表約計一千人，其中有社會革命黨人，門塞維克派人，及布爾扎維派人，後者僅居少數。大會以激烈的演說恣行攻擊帝國主義，並主張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大會最大的成就，則為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派定。這個機關有委員三百人，算是一種蘇維埃國會。其領導者為二十人的主席團，其中大半為社會革命黨人和門塞維克派人。

布爾扎維派人雖在大會中為他黨的人數所勝過，仍不斷地組織地方蘇維埃，並以極大的活動力激動人心來反對克倫斯基。他們藉德國的金錢與間諜之助，傳播他們的思想於戰壕，工廠與農村。他們到處喊着「和平！土地麵包！」的口號，並預許以自由給與國內的被壓迫民族。指揮這個運動的人就是「布爾扎維主義之父」列寧，他曾經靠德人的保護從瑞士潛回本國。德國人所以幫助俄國的革命黨，並非出於對同情他們的理想不過為要加速地暗中損害俄國的國脈並結束東線的戰事而已。協約國之未能依照克倫斯基的提議重新闡明他們的戰爭宗旨，亦不利地反響到克倫斯基所處的地位。

布爾扎維黨的活動在七月間暫時受到挫折，那時克倫斯基已順利地撲滅了無政府黨的暴動，這個暴動雖經列寧極力反對，卻對於一切反政府派的活動發生不利的反作用。然而九月間科尼羅夫（Kornilov）所領導的推翻政府的運動（同樣歸於失敗），不但使布爾扎維黨能够恢復失地，且足以增大該黨的聲價。

科尼羅夫是一個有本領的軍略家，因為他既有能力，又秉性仁慈，並曾從奧國的監獄中奮勇逃出，所以在軍隊中頗得士心。他做過克倫斯基政府的陸軍總司令，握有幾乎毫無限制的軍權。有一個時期，似乎他和克倫斯基

打得火熱，並且共同計劃建立一個強固的中和政府，以便制止內亂並繼續抵抗中歐同盟國。然而，當科尼羅夫始向彼得格勒進軍的時候，克倫斯基驚惶失措，他於是火急調到幾枝軍隊，親自帶了去會晤那位將軍。科尼羅夫的人聞知這個局勢，不肯跟他再向前進，政府因之兵不血刃就得救了。克倫斯基於憂慮不安之中，曾經召集赤衛軍來援助，又因為赤衛軍中的兵士大半為布爾扎維黨人，所以該黨的威望在人民的心目中大有增加。

最後，布爾扎維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黨員大會（到會者有陸海軍兵士與工人的代表）議決推倒現政府。十一月六日與七日，彼得格勒被該黨依預定計劃以武力奪得，政府中人皆遭逮捕，祇有克倫斯基漏網。該黨特行選定這個日期為發難之日，以便於事成後好舉行第二屆全俄蘇維埃大會，此會已定七日召集。所以，當大會開幕的時候，它的面前已經是「既成的事實」(fait accompli)了。會中既有過半數的布爾扎維黨黨員，故大會馬上自立為俄國的最高機關。

第二次革命的精神立刻傳佈開來，俄國各處的地方蘇維埃陸續奪得政權。當時（十一月）大會另行指定了一個受布爾扎維黨支配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一個行政機關，稱為人民委員會議（The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者。這個人民內閣的主席就是列寧，同時托洛茨基為外交人民委員，萊科夫（Рыков）為內政人民委員，史丹林（Сталин）為工農視察人民委員。

人民委員會議所當着手之政綱如下：（一）與中歐同盟國立刻媾和；（二）肅清各地的叛亂並打破舊帝國滅亡後即在進行的分離運動；（三）完全修改國家的經濟的，社會的與政治的組織，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制以統治

國家至全國人民準備參加共產政府時為止；及（四）使無產階級的革命蔓延於全世界。同時，新政府必須照料目前線歸來的兵士，並供給食物與住所於各城市中的難民。

爲保證新政府之善意見，拖延已久的國民議會的選舉卒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行了，這個日期是克倫斯基所預定的。不料這第一次普遍的、直接的、和祕密的選舉之結果，大獲勝利者竟爲社會革命黨，這使布爾扎維黨非常惱怒。社會革命黨在議會中得到四一二個席次，布爾扎維黨僅得一八三席，其他幾個黨派所得者更少。如果這個政府是有責任的一種，布爾扎維黨就決不肯將其權力讓與多數黨。然而他們無意於危及他們將來的政權，所以他們延緩議會的開會期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並於此際力求鞏固他們的力量及恫嚇敵黨。

儘管布爾扎維黨使用這種策略，議會於開會時仍選舉社會革命黨人爲主席，並否決布爾扎維黨所提解除各階級人民（工人除外）的武裝的議案。布爾扎維黨的議員於是離開議場，次日，該黨以武力解散這個「反動的」議會，同時指斥社會革命黨「領導着中等階級與工人的革命爲敵」。那些露出反布爾扎維黨傾向的地方議會亦遭解散，其領袖人物多被監禁或放逐。於是工人階級專政的制度，表面上要維持到全國民衆能够理解並自動接受共產主義的利益時爲止者，就如此取曇花一現的民主政體而代之了。寫到這裏，我們且將兩個最著名的人民委員的一生經歷作一鳥瞰，這也許是有興味的事罷。

列寧與托洛茨基

佛拉德米·伊力奇·烏拉諾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別稱列寧(Lenin)，以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生於喀山(Kazan)省之信比爾斯克(Simbirsk)(今名列寧斯克Leninsk)。烏拉諾夫一門雖屬於貴族，但素以具有自由思想及過激的傾向著名，佛拉德米的哥哥亞歷山大(Alexander)即於一八八七年因犯共謀殺害俄皇的罪被處絞刑。另一個兄長和兩個姊姊常常受警察的監視，佛拉德米自己則於入學一個月內爲了參與學生的暴動被喀山大學開除。

若干年後，他得入聖彼得堡大學肄業，並於一八九一年獲法學士的學位。當時他全神貫注於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Das Kapital)，堅信祇有社會主義能够「引導俄羅斯人民走上自由之路」。他於是加入了一個過激黨，成爲黨中最活動的份子之一，這樣的大膽妄爲終使他從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〇年被流於西伯利亞。在放逐的當兒，他和一位有本領的女同志，克魯普斯喀耶(Krupskaya)結了婚(一八九八年)，他以後一生的革命事業，得力於他共甘苦的內助者不少。

一九〇〇年，他往瑞士，此後除於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之際曾回國作短期的逗留外，一直到一九一七年都漂流在國外。在這十幾年中，他編輯過激派的報紙，周遊德、奧、匈、法、英諸國，每到一處，即與當地著名的改革家訂交。在一九〇三年，他成爲社會民主黨布爾扎維派的領袖，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他的長兄亞歷山大烈士的英靈始終是

他的嚮導和安慰。「列寧」一名本來是他的哥哥的別號，他就襲用了它。

列寧的容貌頗為癡陋：身材矮胖，頭頂光禿，滿面鬚髮。他從來不曉得貧窮的實際苦痛，但他所過的生活很中庸簡單，工作勤勞且有秩序，常常運動，鍛練體格。他對於本人的權力與能力，充滿着自信心，自知智力迥異常人，並具有鐵的意志力和不可撼動的決斷心。最不可及者，列寧這個人完全沒有自私自利的心，遇到關於政策的事件，卻毫不妥協，毫不遲疑。他頂恨無益的討論，而他估量對手時的沈着與巧妙使他成爲辯論中的勁敵。「他也許是唯一的言簡意賅的革命作家」。

這位布爾扎維派人的領袖是一個實在論者。雖然他看見這個世界現出本相，但他「決不逃到山林的幽處，遺世獨立」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是罪惡的化身，世界革命爲最高的目標。要完成對於前者的破壞而達到後者的境界，一切手段都是正當的。列寧不是一個可愛的人；他是一個可敬畏的首領。

一九一七年，德國人准許列寧乘了關閉得很密的車回到俄國，以便他從事顛覆臨時政府的宣傳。他精細地計劃着推倒中等階級的政體，並留心於蔓延各處的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這些運動自經幾次暴動後已入於建設的方面，此刻正在企圖鞏固由破壞所得的若干社會的與經濟的結果。列寧經過幾個月的活動後，決定開始行動的時機已到，十月間，他使他的黨徒悟到同樣的見解。十一月六日與七日，革命遂行爆發。

列寧的最能幹的助手之一就是萊夫·達維多維區·布琅泰因 (Lev Davydovich Bronstein)，別號爲雷翁·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 者。托洛茨基以一八七九年生於給爾孫省 (Kherston) 是一個刻苦耐勞而家

道小康的猶太農人之子。他祇受過八年的學校教育，但他酷好讀書，漸漸自己養成一個能文之士。他在童年所看到的人類不平等與不公平的事例深銘於他的靈敏的心中，當他還年輕的時候，就受到一般過激的思想家的影響。他於離校後一年即因參與組織南俄工人聯合會被捕。在一八九八年與一九一七年之間，他過了四年的鐵窗生活，被充軍於西伯利亞兩次，又在國外住了十二年。

他和列寧一樣，漫遊過中西歐，其間曾講學於比法德，並寫了許多文章和小冊子。當布爾扎維派與門塞維克派發生裂痕的時候，他有一個時期領導着一羣中間派人（托洛茨基派），直至三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後纔投到列寧的一方。大戰時，他被驅出法國和西班牙，流到美國，在紐約住了幾年，然後企圖回國。在途中，他被拘留於海利法克斯（Halifax）地方的集中營裏面達一月，但經克倫斯基緩頰後，即被釋放。

托洛茨基的丰采較列寧為動人。他的面貌的特徵即在隆準，高額，厚脣，黑眼睛，鬚曲如波的頭髮。他好誇耀，並喜人面諛，但不失為一個不屈不撓的工作者和卓絕的組織者。他信仰紀律與系統，打定強大的紅軍的基礎的人就是他。他又是一個多產的著作家，筆墨也很生動。一九二九年，他在自傳上寫道：『我的有意識的一生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完全為革命的奮鬥所佔據。假使我必須從頭再經過一遍，我當毫無猶豫地取同一的途徑。』

外戰與內戰之終止

我們當記得，俄國與中歐同盟國之媾和是以簽訂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The Treaty of Brest-

Литовск)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 來完成的。(註) 依據這件條約及兩件補充條約的條款俄國當放棄五〇〇、〇〇〇方哩的土地及六六、〇〇〇、〇〇〇人民，並須賠償巨款。這種規定雖是很苛刻的，但欲求愈於此者，殊不可得。因為當時俄國所處的地位決不能繼續戰爭，而德國趾高氣揚，毫無慈悲之心。再者，條約的締結至少可以使布爾扎維黨能够集中精力於整頓內政。

(註) 見第三章。一九一七年，布爾扎維黨通告廢棄俄國所曾參與締結的祕密條約，並將其原文公佈，但俄國與中歐同盟國的談判祇在協約國拒絕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意見(即以民族自決及「不割地不賠款」的原則為基礎商和約)後纔開始。

內政中最急之務，即在應付正起於各處的許多反對革命的運動。三年以來(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布爾扎維黨完全從事於與貴族、教士、溫和的共和黨人、投機分子、帝俄時代的官吏及擁護地方權利者所領導的反對黨作生死的決鬥。有一個時期，幾個反革命派，出於戰略上的動機，暗中受入犯的德軍所幫助。後來協約國也派遣兵士，贈送金錢與軍火給他們，以便用於反抗「赤黨」。

協約國之干涉俄國的內政，有幾個理由。他們希望恢復中等階級的政權來重建反抗德國的東戰線。他們要從德人或布爾扎維黨的手中保存積貯於穆耳曼斯克(Murmansk)和阿堪遮(Archangel)的軍用品，這是他們從前所交與俄軍使用的。他們又為布爾扎維黨於一九一八年一月所發表的取消俄國一切外債的宣言所激怒。所以，協約國的封鎖擴展到俄國；協約國與美國的陸軍分遣隊也開到了穆耳曼斯克，阿堪遮與海參威；當土耳其退出戰爭的時候，法軍就轟擊並奪取敖得薩(Odessa)，同時英軍進攻巴庫(Baku)。(註) 以前從奧——匈

軍隊中逃到俄國的幾萬捷克兵與斯拉夫兵此時亦成爲布爾扎維黨的敵人。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芬蘭及外高加索諸邦的民族主義派和反社會主義派乘此混亂的機會宣佈各該地的獨立，羅馬尼亞則襲入那個物產豐富的比薩拉比亞省 (Bessarabia)。(註二)

(註一) 日本則派了幾萬人開到西伯利亞的南部與東部，以爲等待甚久的奪取該地的機會終究到了。協約國中若干政治家所以贊成武裝干涉，大概因爲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缺乏同情。

(註二) 見第十九章。

外國軍隊凡至一處，即與當地反布爾扎維黨的土人隊伍共同設立反革命的政府或『白』政府。在穆耳曼斯克和阿堪遮的四周圍，有『北俄臨時政府』的組織。前帝俄黑海艦隊司令科爾察克 (Kolchak) 海軍大將藉協約軍與捷克兵士之助在鄂木斯克 (Omsk) 建立了『全俄政府』。在俄國南方有鄧尼金 (Denikin) 將軍的政府，後來又有胡蘭吉 (Wrangel) 將軍在南烏克蘭與克里米亞 (Crimea) 所設立的政府。此外，朱丹尼區 (Judenich) 自立爲『俄羅斯西北政府』的首領，設大本營於波羅的區域，同時曼涅亥謨 (Mannerheim) 將軍取得芬蘭東部和卡累利阿 (Karelia) 的統治權。虎視眈眈於邊境，企圖從蘇維埃攫取土地與權力的人，則有波蘭將官哈勒 (Hall) 及哥薩克兵大將裴脫盧拉 (Petlura)。

在起初看來，似乎布爾扎維黨人會被這許多敵人打倒。赤衛軍雖很精強，但寡不敵衆，況且在某一時期，列寧的黨徒祇據有彼得格勒、莫斯科及近畿數省。

然而有兩個要因使布爾扎維黨得利。第一，外國軍隊對於確爲有待俄人自己解決的事件的橫加干涉引起了很多愛國者的不平，他們於是羣起幫助赤黨來驅逐外人。第二，許多農民雖不懂布爾扎維黨的經濟學說，且不喜歡該黨徵發穀類的政策，但他們更討厭白軍的活動。白軍每進展至一地，即開始白色的恐怖，並表示要恢復革命以前時代的地主與農夫之舊關係的決心。在這兩種惡事——徵發政策與地主特權主義之中，農民顯然寧擇前者，他們覺得，徵發政策畢竟是一時的，將來終會停止施行；但地主特權主義，如經恢復，即可成爲永久的毒害。因之在布爾扎維黨拚命掙扎的最初幾年中，俄羅斯民衆在各方面盡其膽量阻撓反革命黨的進行。

當赤白衝突達於高峯的時候，布爾扎維黨如將廢皇及其家屬繼續幽禁於擦斯科業·謝羅，似乎是很危險的，因爲該城也許會因而成爲反動派的集合地。因此他們把羅曼諾夫一家囚徒移到內地，最後安置於業卡忒林堡（Ekaterinburg）的烏拉爾（Ural）鎮。政府本想將來公開審判廢皇，以托洛茨基爲檢察官，但當科爾察克所統率的白軍於一九一八年夏天進攻到業卡忒林堡鄰境的時候，當地的蘇維埃官吏大起恐慌，他們乃於七月十七日下令將廢皇尼古拉斯與廢后亞歷山達拉及其一子四女一齊槍決。這件不幸的事被赤色政府的反對黨舉爲空前的殘暴的例子，但我們評判此事時，必須記着，凡可與俄國的革命較量範圍的其他革命，極少是未經處死傷君而能安然告成的。

光陰一月一月地過去，布爾扎維黨漸漸造成了兩種強有力的武器，用以抵制國內外的反對黨。該黨柄政後不久，爲撲滅反革命黨起見，設立了一個『抵抗反革命投機與怠工之非常委員會』，這個機關從其俄文每字的

第一字母簡稱爲“Cheka”(契卡)。托洛茨基深信「恐怖政策爲工人階級的意志與力量的表現，它在歷史上是正當的手段」，該機關的首領德壽興斯基（Dzerzhinsky）似乎很贊成這句格言。自社會黨於一九一八年八月謀刺列寧的事件發生後，布爾扎維黨就開始了真正的「大恐怖」。

「契卡」是一個權力很大的、祕密的、革命的裁判所，它可以隨意要求、拘捕、並執行死刑，嗣後祇須將其活動情形造冊報告人民委員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至於這個機關所處死的人數，沒有可靠的統計，但被殺者至少必有幾萬人——也許幾十萬人。無論如何，反對黨的背脊骨被折斷了，小資產階級與知識階級的勢力也幾乎泯滅了，而無產階級與農民依然爲支配的階級。

那些反動將領與外國軍隊則由紅軍來對付，紅軍是托洛茨基的組織天才的結晶品。在一九一九年，托洛茨基已經編成了十萬精銳的軍隊，大部分由帝俄時代的愛國者軍官所統率。布爾扎維黨的軍隊既漸有力量，協約國就慢慢不熱心於繼續他們的武裝干涉了。不特此也，白軍的復仇的與失面子的行動使若干西方國家的外交家覺得討厭，他們後來對於恢復帝政的運動，止於供給軍用品和少數軍官而已。在一九二〇年之夏，英、美、意三國開始解除對俄的封鎖。

紅軍力求於一九二〇年之終恢復國內的和平。它的第一次大勝利係發生於對抗朱丹尼區的軍事，到一九一九年十月，朱丹尼區被逐出彼得格勒的鄰境，退至愛沙尼亞。愛沙尼亞馬上把他趕走，到一九二〇年二月，它和俄國在多爾巴得（Dorpat）（即塔圖 Tartu）簽訂了條約。同月，紅軍擄獲科爾察克，立予槍決，他的鄂木斯克政府

亦歸消滅。先是科爾察克得到一枝捷克人的生力軍的援助，實際上已支配着西伯利亞鐵路及海參威與伏爾加河（Volga River）之間的許多大城市，但他不能深入歐俄，且以此喪生。自一九二〇年七月至十月，俄國和立陶宛、拉特維亞、芬蘭及波蘭陸續簽訂了和約。

對波蘭人（他們想擴展他們的邊境到一七七二年的界線）的戰事特別困難，因為波軍一部分由法國的軍官統率着，其軍需品亦多半由法國供給。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他們進占基輔城（Kiev），但赤軍此時已經集中並將敵人逐退到華沙的城門口。再經過幾個月的交鋒後，雙方在里加（Riga）訂立了和約（十月十二日），並劃定了折衷的疆界。當斯之際，鄧尼金將軍亦在南俄敗績。他因為要繼續抗戰，乃於他治下的民間實行徵兵制，甚至於強迫赤軍俘虜在他的旗幟下作戰。到一九二〇年春天，他辭去總司令之職，讓與胡蘭吉將軍擔任，自己則亡命國外。胡蘭吉在克利米亞頗能負隅頑抗，一直守到十一月，接着也逃出俄國。經過六年不斷的戰事後，俄羅斯纔重睹和平。

然而這個一九二〇年的「俄羅斯」祇含有從前帝國疆域的一部分，雖說是一個大部分。波蘭、芬蘭、拉特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外高加索、比薩拉比亞及西伯利亞的東部都獨立了，或在外國的占領之下了。所餘的俄羅斯祇是幾個自治的共和國與區域的聯合體，這個聯合體自一九一八年的春季以來，即稱爲「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 S. F. S. R.）。那四個沿波羅的海的小邦，波蘭及比薩拉比亞似乎永遠喪失了；但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時期內，其他的區域全收復了。

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一年之間，布爾扎維黨的同情者陸續在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以及外高加索的亞塞爾拜然（Azerbaijan），亞美尼亞（Armenia）與喬其亞（Georgia）諸邦奪得政權。後三邦受了俄國的慫恿，乃聯合成立『外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隸於布爾扎維黨的各邦（此刻共有四個）的代表在莫斯科簽訂了合併的條約。此約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發生效力，這個新聯合國遂定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U. S. S. R.）（註）

（註）當四伯利亞在協約軍占領之下的時候，位於貝加爾湖之東的那部分已成立為「遠東共和國」。然而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即最後一部分日本軍撤退後一個月，該地的國民議會就議決馬上合併於蘇俄。

聯合國的各邦至少在理論上仍享有很多自治權，並保留『自由脫離聯合國的權利』。新國的正式國名刪去了『俄羅斯』三字，因為希望非俄羅斯人所居的其他國家以後也可以加入蘇聯。在一九二四年，兩個中亞細亞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烏士比基斯坦（Uzbekistan）與土耳其曼尼斯坦（Turkmenistan），果然加入了聯合國的第七邦，塔德其基斯坦（Tadjikistan），則於一九二九年獲准加入。儘管說這七個共和國彼此平等，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居主宰的地位。這個情形也是必然的結果，因為蘇聯的十分之九的面積及十分之七的人口係包括於這個構成分子的範圍之內。

蘇聯七邦及蘇聯本身的憲法，都是依照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做造的，後者為全俄蘇維埃第五次大會於一九一八年所採用，並於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三〇年之間加以擴大的。

蘇聯的政治組織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的基本理論就是共產主義，(註)它的許多思想可追溯到馬克思與昂格爾 (Engels) 在一八四八年所發表的共產黨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由布爾扎維黨人看來，共產主義是一種哲學，也是一種方法。就哲學上講，它的宗旨在廢除私有財產並將一切生產與分配的機關歸諸公有，以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它的方法，為在工人的有組織的獨裁制之下的社會革命，第一步為國家的，第二步為國際的。此種原則就是歷屆蘇維埃大會所據以採用或修正俄國的根本法的動因。

(註)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布爾扎維黨採用了「共產黨」的正式名稱，到一九二三年，又改稱「全蘇聯共產黨」(C. P. S. D.)。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於是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所頒佈的「工人與被掠奪者之權利宣言」後，宣布俄羅斯為工人與農人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其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完全操諸工人、農人、哥薩克兵及紅軍代表的蘇維埃。一切土地、森林、礦產、牲畜、工廠、商店、銀行、及生產、交通與運輸的機關均為工農國家的財產。為撲滅所謂社會的「寄生蟲」起見，勞動被規定為國民的義務。憲法中的特別條款向工人保證宗教意見與無神觀念的自由，及享受自由與普遍教育的權利。禁止對於少數民族的壓迫，凡寄居於俄國，奉公守法的外國工人應有本國工人的同樣特權與權利。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權力存於全俄蘇維埃大會，大會休會期間，則存於全俄中央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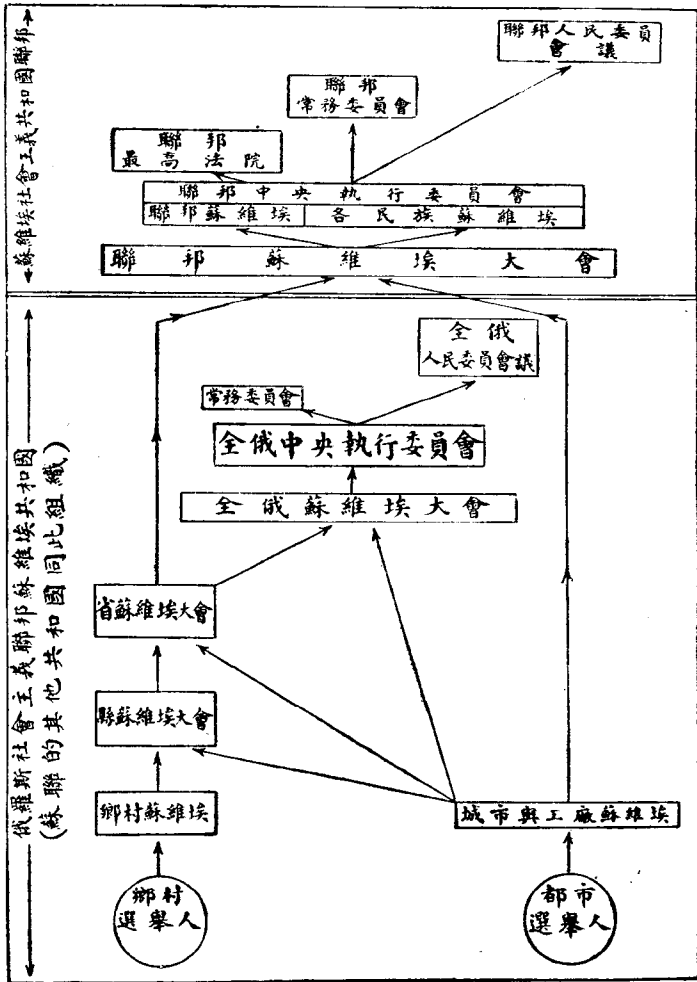
行委員會。全俄大會由各城市蘇維埃的代表，根據於每二五、〇〇〇投票人舉一代表之原則所選出，及各省蘇維埃的代表，根據於全體民衆中每一二五、〇〇〇人舉一代表之原則所選出，共同組織而成。因爲所產生的大會過於龐大（共有代表一千人以上），於辦事上不能運用如意，所以大會派定了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以爲「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之最高立法，行政與監督機關」。

這個執行委員會約有委員四百人，負有「指揮工農政府」之責，具有頒佈法令與決議案，統一並調整全國的立法與行政，及派定一種號爲人民委員會的內閣等等權力。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重要性的增加與全俄大會的勢力的衰落適成正比例。全俄大會起初常常開會，接着每年祇開一次，到現在則變爲兩年一回，開會時照例批准執行委員會所制定的一切。

又因爲中央執行委員會也嫌人數太多，不能充分發揮工作的效能，所以它於一年中祇舉行會議幾次，將事務管理權及對於人民委員的監督權留給約四十人的常務委員會。「人民委員會議」(Sovnarkom)在常務委員會的嚴密監視之下實行統治國家的實際工作。每個人人民委員有一副委員襄助辦事，並對人民委員會議，常務委員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人民委員會議的一切法令必須呈送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待批准或廢止。全體人民委員包括重工業與輕工業、勞工、財政、工農視察、中央統計行政、教育、衛生及社會公益各委員。

地方的權力則操諸地方蘇維埃之手，但受中央政府的嚴密監督。各城市由根據於各該地方全人口中每一千人舉一代表之原則所選出的都市蘇維埃統治，代表的選舉以行業或職業而非以地理上的分區爲基礎，各

蘇維埃政治組織圖



種職業中的人民皆分別投票，各不相混，如鐵匠為一羣，織工另為一羣，餘類推。關於操家政的主婦及無所屬的工人，則有特種的分區法以濟其窮。在鄉村與小鎮中，農人、家庭工人、教師及醫生齊聚一處選舉代表，計每一百人選

出一人。通常的選舉方法爲舉手。

在城市鄉村蘇維埃之上的蘇維埃的代表選舉用間接選舉法。鄉村蘇維埃派代表於縣蘇維埃大會，縣蘇維埃繼之派代表於省蘇維埃大會。全俄大會的代表則從省蘇維埃大會中選出。城市與工廠蘇維埃得直接選舉其代表於全俄大會，但同時復可以指派出席於縣會與省會的代表。城市工人所以有較直接的代議權，則因他們爲共產黨的心髓之故。

全國男女，凡年齡達十八歲，並爲從事生產之工人，或此種工人之管家，兵士或海員者，俱得選舉。此項定則同樣適用於土著及居住俄國的外人。以下各種人，除掉偶有的例外，都被剝奪選舉權與任公務之權：（一）爲獲利而雇用工人者；（二）恃非得自其直接勞力之進款爲生者；（三）私營商人，貿易者與商業經理人；（四）僧侶與教士；（五）舊時官吏，及帝俄時代的警察隊，憲兵隊與祕密偵探隊之雇員與事務員；（六）瘋癲者，低能者與罪犯。根據此項規定被剝奪選舉權的人數歷年不同。在最近幾次的選舉中，全國城市人口年滿十八歲者約有百分之七，鄉村中約有百分之四，曾被剝奪選舉權。

蘇聯中其餘六個共和國及蘇聯本身的憲法（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採取）和剛纔所述的一個憲法相同。蘇聯的最高權力機關爲全聯邦蘇維埃大會，其代表由各共和國城市蘇維埃與省蘇維埃根據於每二五、〇〇〇都市選舉人及每一二五、〇〇〇鄉村居民得舉代表一人之原則選舉之。因爲照這種辦法所產生的大會約有兩千個代表，所以它每兩年祇開會一次，會期約一星期，以便認可「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TSIK）與聯

邦人民委員會的工作。全聯邦大會與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輪流在各共和國的首都舉行。再者，執行委員會有七個主席，每個共和國出一人。在一九三二年，擔任首席主席者爲出身農夫的加里寧（Kalinin）。

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全聯邦大會休會期間，具有無上的立法權與行政權，它是由兩個團體，即聯邦蘇維埃與各民族蘇維埃組成的。聯邦蘇維埃爲全聯邦大會所選出，有四百多個會員，各依人口比例代表七個共和國。各民族蘇維埃有會員一百四十人，由各該共和國之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但須經全聯邦大會認可。此種民族蘇維埃之設立不僅正式承認蘇聯包括着許多不同的民族，其意並在保全這些民族間的文化與語言的差異。（註）

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每年集會三次，其兩機關各自開會和表決。在休會期間，委員會的權力委託於二十七人的常務委員會，其中九個由聯邦蘇維埃派定，九個由各民族蘇維埃派定，還有九個由兩個蘇維埃的聯席會議所選舉。此項常務委員會監督聯邦人民委員會的工作。後者的委員亦由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但共產黨有斷然操縱委員人選的勢力。

（註）全聯邦政府的命令與宣言係以聯邦的六種主要文字公佈。

聯邦人民委員會會議由下列人員組織之：主席一人，副主席數人，最高經濟會議主席一人，及外交、陸海軍、國內外貿易、運輸、郵電、工農視察、農業、勞工、財政和國家設計與統計的人民委員各一人。上述的人民委員職位中有幾個具有聯邦全境的管轄權，各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中並無與之對合者。其他的人民委員則與各共和國的人民委員分有同等的權限。一九三二年的聯邦人民委員會會議主席爲莫洛托夫（Molotov）。

隸屬於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司法機關則有聯邦最高法院。該法院的職權如下：（一）給與各共和國的最高法院「關於聯邦一般法律的問題的指導解釋」；（二）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抗議各共和國最高法院所下的與聯邦法律相牴觸或違反他邦利益的判決；（三）判決各共和國之間的法律衝突；及（四）審問被控犯有關於其職務之罪的高級官吏的案件。

俄國的政治制度有四種最顯著的特色：

第一，雖然蘇聯是一個聯邦的國家，中央政府（明細言之，即設有常務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之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卻有非常廣大的權力。它可以制定關於任何事件（自戰爭與和平到衛生與公共健康）的法律。各共和國雖有許多會議和官吏，但祇可自由制定關於地方事件的法律。

第二，因為布爾扎維黨認為各個人對於政治問題的態度皆視其經濟地位與職業而定，所以代議制以職業的而非地理的基礎為憑藉。他們的根本觀念頗與盛行於法西斯蒂的意大利的相同，所不同者在意國資本與勞動同樣得到承認而已。

第三，選舉法是非常間接的。蘇聯的農民與聯邦人民委員會議相隔六層，都市工人則僅隔四層。因之，根據俄的辦法，許多非共產黨員的代表在連續的選舉中漸漸被淘汰，最高的當局很少受人民的拘束。最後，在布爾扎維黨的政制中，權力是不分開的。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連同其附屬機關，擁有最高的立法、行政與司法權。

共產黨

蘇維埃政治組織的基礎石及其權力的來源就是全聯邦共產黨。沒有後者的指導，「蘇維埃即不能決定一切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該黨在一九三二年的黨籍名冊載有二、五〇〇、〇〇〇黨員與預備黨員。黨員的百分之七十爲大俄羅斯人，每七人中有一婦女。在一九三〇年，差不多十分之七的黨員是工人，其餘則爲農人、雇員、公務員與知識份子。

除正式的共產黨外，還有三個後進的共產團體，其入籍者共達八、〇〇〇、〇〇〇以上青年與兒童（一九三二年）這三個組織包括「十月團」（The Octabrists）（註）爲八歲與十歲之間的小孩的團體；「先鋒團」（The Pioneers）爲十歲至十六歲的男童與女童的團體；及共產主義青年團（The Komsomol）爲十六歲至二十三歲的男女青年的團體。現在全聯邦共產黨的新黨員大半來自青年團的卒業者，但非每個卒業者都可入黨。就是工人階級的青年在加入前，也須受六個月的試驗，取得至少兩個有相當地位的黨員的簽名保證，並經地方黨部議決承認。無產階級的出身足爲入黨的特別資格，而有中等階級之背景者，往往難邀容納。

（註）該團之號爲十月團，所以紀念布爾扎維黨的革命，依照俄國的舊曆，那次革命係發生於一九一七年十月。

有七八千已登記的共產黨員屬於號稱「老布爾扎維黨員」的一羣，這些人都是在帝俄時代很活動的革命份子。他們大都受過教育，且有才智，所以能夠獨占黨中和政府中大多數重要位置。他們對於後輩黨徒加以嚴

格的紀律和教訓，毫不寬假。『各候補黨員的心中，都深印着一個觀念，以為必須為黨的福利而完全抑制一切私人的感情。』凡共產黨員必須完全受上司的指揮，必須絕對服從命令，必須毫無問題地以身赴事，不論何時何地，必須專用其閒暇於傳佈共產主義的福音，並且必須時時準備以生命保護革命。

黨中的監察委員會每年清除黨員約百分之二。開除黨籍的理由有下列各種：酗酒，不道德，缺乏宣傳主義的熱心，脫漏黨捐，不付債務，做禮拜，或與中等階級締交。凡圖利用在黨中的地位以增進個人的境遇者，一被發覺，即受除名的處分。這種人被通稱為 *Shkurniki*，或祇顧外皮的人。列寧則喻之為紅蘿蔔，因為他們的表面是「紅」的，骨子裏是「白」的。自然，不是一切違背黨規的行為都應受開除的處分。有過失的黨員往往被申斥或降級。

在一九三二年前，每個共產黨員的薪水每月不得超過一五元；是年則大有增加。然而許多黨員的實在收入比較很大。官吏都可領取特別旅行費，有時且享有住所和汽車。凡能表明有著作能力的人常常因其文藝宣傳的工作受到相當的報酬，即分有出售其著作品所得的利潤。黨員還有其他好處。如有資格擔任政府和黨中的重要職位及在政府因糧食不足而頒發取糧證時得受優先的待遇。共產黨員的子女亦有受大學教育的優先權。我們一看共產黨員入黨後所負的義務之繁重，也許可以放心大膽的說，俄國一定還有很多在政治上雖無所依歸，但是表同情於布爾扎維黨主義的人。

共產黨的組織，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所採取的憲法中有詳細的規定。這個像金字塔的黨的結構的下層有四萬個地方「細胞」。這些細胞選舉代表出席每兩年舉行一回的全黨大會，大會因過於龐大，不適於辦事，故祇

核准它附屬的許多委員會的工作和決議案。(註)這些委員會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後一機關有委員二百人，每三月舉行會議一次，負有鞏固黨的統一及維持黨員的紀律與忠誠的任務。

(註)除地方支部及大會外，共產黨的階級組織還包括有各郡、省、市區的委員會。但沒有代表聯邦中七個共和國的分黨。

中央委員會——共產黨的實際指揮機關——由七十來個委員及同數的交替者組成。它雖然時常開會，它的職權其實是由兩個小局和一個祕書處執行的。一個是組織局(Organisation)由十二人組成，負有規定入黨條件，升遷與降黜，及監督宣傳工作的責任。它隸屬於另一個局——政治局(Politbureau)，此局有委員九人(一九三二年)，有權決定黨與政府的一般政策。祕書處則負責於『日常組織與執行的工作』。因這三個機關的全體職員是密切連接的，所以黨中的權力非常集中。列寧一直到死(一九二四年)，是政治局的主席。

共產黨的首腦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史丹林於一九三二年擔任此職，他同時又是政治局、組織局和祕書處的委員。凡遇決定黨的政策時，他的話是最重要的意見。因為黨是『政府的舵』，所以他是蘇聯的實際獨裁者。在過渡時期中，俄國採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一面準備着將來實行徹底的共產主義。為擁護這種制度起見，共產黨藉助於各種憲法上的和憲法外的方法。它是俄國可容許的唯一有組織的政黨。凡與該黨無關係而欲任官職者必須安守非黨員的本分。因為可得到的黨內候補者的人數通常有限，所以許多鄉村蘇維埃大半由非共產黨員所組成。但因為遴選高級官吏的間接方法，一定會逐步淘汰最高政府機關中的非黨員代表，所以聯邦常務委員會與聯邦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幾全部為清一色的共產黨員。自然，嚴酷的檢查制度，共產黨員的宣傳，

公開的表決，及敵派人被剝奪選舉權的情形，都大有助於城市中的共產黨候補者。再者，都市中的共產黨營壘在各共和國大會和聯邦大會中比鄉村區域有較大的代議權，這在前面已經指出。況且政府裏的高級官職大多數經該黨為黨內的領袖保留着，外人不能染指。這樣一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許多委員同時也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其中有些人且為常務委員與人民委員。

人民對於共產黨的政策，在所不禁，這恰和一般外國人對於蘇聯的觀察相反。凡是與共產黨的政策一致的積極意見都受歡迎，但這些意見必須從黨內，而非從有組織的反對派發出。政府的檢查制度非常嚴酷，決不容反對黨有機會作反布爾扎維黨宣傳的言論或文字。鎮壓異己的職務由「政治保衛局」執行，這個機關依其每字的第一字母簡稱 O. G. P. U. 它其實是一九二二年所裁撤的「契卡」(Cheka) 的繼承者。政治保衛局的主席以顧問的資格出席聯邦人民委員會。

純粹共產主義的試行（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

布爾扎維黨在俄國政治組織中所遂行的改革已經是一往無前，它最初在經濟範圍內所更新的事情更為革命的，蘇維埃政府於柄政後不久，即遵照黨的訓誡，即下令將土地，天然富源，及生產與分配機關一齊收歸國有。準備打斷資本家對於勞動民衆的非法剝削，它的直接目的就在准許農人依其需要使用土地，並將工廠、礦山及運輸的神種設備交與工人管理。凡是工業與農業的產物都須移交國家，以便視需要分配於人民。譬如農人的收

穫之溢出其需求額者，當用以養活工業的無產階級，而工人的製造品當分配於農人。國家設有最高經濟會議，負責供給原料與燃料於工廠，以食物分配與勞動者，並使農人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製造品。

當這些計劃正在作成定式的時候，政府爲適當地養活工人起見，覺得有規定每日口糧及頒發領取食物證之必要。關於給口糧的辦法，將全國人民依其工作之輕重與效用分爲四類。第一類包括工作繁重的手工人，第四類則爲社會之「寄生份子」，其工作無甚裨益於社會。因爲這些被貶入最低一類的可憐蟲所得的口糧僅及第一類的人的定量四分之一，所以他們多有飢餓至死者。國家全靠對於農人的徵發取得糧食，並且在若干情形中，祇准農人保有僅足養活本身的一部分及爲次年的收成下種。

政府爲緩和各大城市中於一九一八年後所發生的關於供給住所的嚴重情形起見，曾授權地方當局沒收一切分租的小間房屋與大住宅，並使工人與其家屬移居其內。珍珠寶玉及其他貴重品超過規定的最低額者，悉數充公，多餘的衣服與家具亦然。私人的買賣被視爲反革命的活動，對外的貿易成爲國家的獨占事業，同時一切國內外的債務全被一筆勾銷。以交易品代替貨幣的貿易則經獎勵。

希臘正教會自然被剝奪了權力和財產，私立學校也遭裁撤。婚禮成爲社會的儀式，結婚與離婚變成了輕而易舉之事，國家且擔負照料被棄的私生子的責任。婦女在社會上與經濟上與男子立於平等的地位，又因爲家庭生活被認爲資本制度的柱石之一，家庭的關係也有解散的趨勢。

政府原來已計劃擬定一個將一切收歸國有的程序表，並先沒收大的托辣斯，讓較小的商業暫時照舊方法

經營下去。實際上，收歸國有的手續，至少在其最初的階段，是極端任意的，帶有一種懲罰的而非經濟的手段性質。工人大都急於驅逐他們從前的老闆和經理，一面在他們所選出的委員會的監督之下接辦工廠。差不多在每件例子中，工資都增加了，工作時間亦減少了，但因為工人中很少受過管理的教育或訓練，所以工作上殊少紀律和效能。

使事情更糟者，鐵路系統——在大戰的末了幾個月中已經紊亂不堪——此刻卻有完全崩潰的危險了。據托洛茨基的統計，在一九一九年之秋，全國的火車頭有百分之六十是『出了毛病的』，政府的工程師也憂鬱地預言道，再過一年，鐵路的『流行症』如不致於『死亡』，那纔是奇跡呢。因之要運輸從農人方面所徵發的穀類或殘廢的工廠所產的有限製造品，幾為不可能之事。更因政府採取通貨膨脹的政策，物價飛漲一發不可收拾。政府繼續發行紙幣的動機，大概在破壞幣制並強迫人民接受基於物品之交換的經濟政策，同時也在補償政費。

有一個時期，似乎就是最激烈的改革也可以順行無阻。祇要白黨的反革命運動和協約國的武裝干涉存在一天，工人與農人總認這許多改革，為迫於軍事的危急所不得不暫時施行的『戰時共產主義』之各方面。然而一到和平重臨的時候，全部的辦法就漸漸表明為難於實行，它非但不能增加民衆的福利，且足致混亂。

對於共產黨的制度反對最烈者就是農民。即在最初，農民雖非常恐怕地主回來，對於政府所派來徵收其剩餘糧食的使者仍不大與以助力。當危險已屬過去的時候他們滿心想實現一種新發見的繁榮，因為他們誤解地主特權主義的廢除，即等於租稅的終止和取得額外土地的權利。到一九二〇年，事實上他們已占有歐俄的可耕

地百分之九十六。他們決無時間，也毫無意思來諦聽關於土地國有或都市無產階級應分有農產物的學說。

農民既拿出穀類，當然要求以金錢或製造品爲償。不幸這些東西都不能盡量得到。市面上流通的硬幣非常之少，農民也很乖，決不肯接受無價值的紙幣。製造品因進口貨幾乎停止而大感缺乏，工廠亦常患原料不足，設備敗壞和管理不善，而運輸上的種種設備差不多完全破壞了不復存在。農民於絕對失望之中開始屯積他們的糧食，當政府徵發吏降臨時，總託詞貧窮。

政府於試行徵糧政策之中，曾於一九一八年將每村的貧農組成委員會，其任務即在排斥富有的農人並強迫他們交出盈餘的糧食。這種手段祇有釀成鄉村內部的爭鬪，使國家多一種困難，而不足以增加城市中穀類供給額的來源。再者，戰爭與蹂躪，及反革命派有一個時期控制着俄國南部的事實，在在使穀類更加不足。此刻政府絕望地把工人武裝起來，編成「糧食軍」，並叫他們帶着機關鎗，來福鎗和刺刀到鄉村裏去威逼農民拿出他們所屯積的糧食。爲公平起見，每區應根據當時的出產統計交出一定部分，但那般搜索糧食的人往往不顧所定之量，百般誅求，有時竟使農民無餘糧以贍養其家口。

現在輪到農人絕望的時候了。他們於自衛之中決定使用他們所知的唯一有力的武器——消極抵抗。既然他們生存所必需以外的生存，都得爲別人所劫掠以去，那麼他們就儘量減少生產使祇能維持自己生存而止。真像爲運命所注定的，偏有幾個要因來幫助農人減少生產。第一，那時無肥料輸入；第二，國內耕作機器的製造完全停頓；第三，在一九二〇與一九二一兩年中，俄國大旱。

因之一九二一年的穀類收成僅及一九一三年的五分之一。饑饉也發生了——俄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災荒。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蒙着糧食缺乏的影響，餓死的達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城市和鄉村中的情形是一樣可怕的。若非外國（尤其是美國）大發惻隱之心，慷慨解囊賑濟。也許還得死上幾百萬人。

那時工業的狀況幾乎達到最壞點。最高經濟會議完全不能執行它的職務，儘管政府頒佈命令延長工作時間，重新採用零件工作，並懸賞獎勵超過規定的最低額的生產。一九二〇年的工業生產總額仍祇有一九一三年產額的百分之十三。在大戰前的最後一年，所開掘的金屬礦苗有一九二〇年的五十倍之多，煤油的產額則有兩倍，生棉幾及三倍，鋼鐵約二十五倍。

『打倒蘇維埃政府』的呼聲漸漸成爲一九二〇年中工農的會議席上常有的和猛烈的叫喊了，坦波夫省（Tambov）竟有軍隊的叛變。在一九二一年三月曾一度爲布爾扎維主義的發祥地的喀琅斯塔得（Kronstadt）的水兵也叛變了，雖然變兵的大部分是具有農民背景的新入伍者，但這次叛亂使蘇維埃政府悟到政策的改變是刻不容緩的。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它決定實行戰略上的退卻。

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一九二八年）

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的第十屆全黨大會，共產黨員議決採取『新經濟政策』（N. e. p.）他們感覺到他們的熱誠已使他們走得太遠，他們未充分重視農業的俄國所給與工人的專政制度的障礙而盲目前進，農民之關心於

共產學說遠不如他們關心田地與收益的熱切，爲了保存已得到的政治利益，而作若干經濟上的讓步，那也是值得的。這種方針自然難免於退卻，但退卻是一種戰略；它未必是潰敗。共產黨仍舊可以保留政權、運輸制度、對外貿易、銀行事業、及大規模的工業，同時不妨給與人民關於其他經濟方面如地方買賣與漸次提高的工資等級的小讓步。

列寧很想說服人民，共產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一樣能够保障國家的經濟健康。爲了這個緣故他提議共產黨須改變它的戰略，「化襲擊爲圍攻」。他解釋道，「我們不能保留我們所已取得的一切地位，但在他方面講，祇是因爲……我們獲得了這許多地位，所以我們有這許多可以放棄，並能够退卻得很遠，甚至於還可繼續退卻，而不致喪失重要的和基本的東西」。社會主義當加擁護，但自茲以往，它應爲一種實地應用的社會主義——「就時勢之急需所許可的範圍儘量應用的社會主義」。實際上，一種國家資本主義替代了共產主義。

新經濟政策的要點如下：（一）廢止強迫的糧食徵發政策，而代以對於一切農產物所課的賦稅，此稅初以現品繳納，但在一九二四年後，則以金錢；凡超過賦稅之數的產額，可在公開市場自由出售之。（二）私人經營的零售商業，在若干限制下在所不禁，但國家設立許多國營的零售商店，並提倡消費合作社與之競爭。（三）雇用工人不到二十人之小工廠與作場皆解除國有的性質，並可由資本家收回。（四）幣制及錯綜的國立銀行制度皆經恢復，在一九二四年，以金爲本位的「瑟奉奈滋」（Chervonetz 蘇聯的貨幣名，等於革命前的十個金盧布）的表面價格被穩定爲五·一五元（五）爲取得流通的資本起見，共分利益的開礦、製造與運輸的特許權及大規模的農

業與工程計劃都經政府與外國資本家商訂合同出讓，此種合同擔保受讓人的資本不歸國有，並給與國家購買各該資本家的商號的製造品之選擇權。(六)恢復分等級的工資制，給口糧的方法亦經修改；可在政府商店購買的日用必需品的數量仍有限制，但在公開市場添購貨物之舉成爲合法的和可能的了。(七)創辦國營的托辣斯以管理大工業中的生產與分配。(八)廢止強迫工人加入工會的規定。(註)(九)擬定一切工業在有效的、經濟的和國家支配的組織中將來互相調和的計劃。

(註)俄國的工會有二十三個，聯合爲全俄工會中央會議，共有會員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以上。這些工會原來被認爲國家的機關，行使若干政府的職權。然而自一九二二年後，它們的任務即在與地方的和國家的經濟機關商訂集合的契約，以保護工人的利益與幸福。勞工的紛爭大都由仲裁委員會解決。工會的進款（來自會費）約有百分之十，用於發展工人中的文化與教育事業。

有一個時期，似乎新經濟政策會醫好俄國的經濟大病，這是共產黨所引爲欣慰的事。農人種穀的土地增加得很快，到一九二六年，所達的數字幾等於一九一三年的。大多數農人，雖然尚未完全同意於其黨所持土地實屬於國家而非他們所有的觀念，似乎也以納稅及出售其盈餘糧食於市場爲滿足了。在一九二五年，政府甚至於讓步到准許短期租借土地與雇用有限人數的農役的程度。因之有些冒險進取的農人租借鄰家的田地並雇用額外的勞動者。其結果，農民又分爲三個階級：貧窮者，小康者，和富裕者。到一九二八年，當局認知這種情形，乃重新訂定稅則，以便完全豁免農民中最窮的三五%的租稅，薄賦中等的五三%，並重課其餘一二%的富農。

國家殊不欲聽任這般富農養成保有大地田地的強盛階級。政府有一個時期也很寬容他們，這是因爲需要

他們的企業來增加穀類的生產。但他們終須明白，他們活動的日子將要完了，而政府自始就算計了他們的末路。布爾扎維黨早已打定了建立大規模的國家農場與集合農場的計劃，作為抵制富農的手段，同時又為增加穀產的方法。共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英畝的田地被勘定為建立一百五十所國家農場的面積，並盡力取得新式的機器與有志的耕作工人。但在一九二八年前，這一方面的進步是很少的。（註）

（註）共產黨為防止民間非法釀溜劣質的家釀飲料起見，乃於一九二五年取消總禁酒的法令，並恢復政府的伏得卡酒（一種猛烈的白蘭地酒）專賣權。依據一九二九年的法律，禁止於假日販賣酒類。

在工業的範圍內，政府順利地繼續壟斷製造品。有幾百個國家托辣斯或企業組合業經成立，並享有很大的自治權。每個企業組合被置於經理委員會的指揮之下，這些經理為國家的受託人，對最高經濟會議負責。工資的定率由托辣斯與工會直接磋商解決之。贏利的一半歸諸政府，自十分之一至七分之一之數用於謀工人的幸福，其餘則撥充擴展事業費與公積金。在一九二六年，國家托辣斯的製造品約占蘇聯工業總產額百分之七十七，同時合作社占百分之五，外國的特許權所有者占百分之三，私人企業占百分之十五。到這一年，工業的出產額也幾達戰前的水準，雖然數量之多，是犧牲了品質而得到的。

在採用新經濟政策後起初幾年中，私家的買賣非常興盛。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的會計年度中，零售商業的五分之三是由私家商人經營的。然而利用這個機會謀利的人漸失人心，他們馬上被稱為「新經濟政策人」（Nepmen）。政府盡了各種力量來抵制他們，特別利用消費合作社作為制勝他們的工具。無論何人都可加入合

作社，惟教士與富農除外，到一九二七年之春，全國約有二萬八千個消費合作社，其社員共達一千四百萬人。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的會計年度中，這些合作社差不多經營了蘇聯的零售商業之半，同時私家商人支配着三分之一，國家商店占其餘六分之一。國家很希望將它自己的商店的營業早日讓與合作社。

布爾扎維黨向外國資本家所提出的特許權讓與條款非常有吸引力，因之一百多家公司（多為美國的）與蘇俄訂立了合同。然而利用這些特許權時，往往發生困難，到後來有很多合同被作廢或放棄。

雖然新經濟政策大有助於醫療早年共產黨的種種試驗所致的創傷，並漸漸將生產的數字恢復到戰前的水準，但穀類與製造品的價格的懸殊終使人民備嘗艱苦。國家固准許人民依世界的正規市價售賣穀類，但製造品只能按國家托辣斯任意所定的價目購得。所以在一九二八年，穀價祇有一九一三年的價格之半時，製造品的價格卻三倍或四倍之。政府認這種情形為打擊富農的最妙方法，富農遂因之大受損失。

當新經濟政策正在施行的時候，幾個政府所設的特別局開始搜集關於俄國經濟界各方面的統計資料。如此積聚的材料將用以擬定增加生產和加速工業化之進行的五年計劃。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這個「五年計劃」（Pятиletka）開始了，其施行則於一九二九年五月經全俄蘇維埃大會追認。在討論這個計劃的詳細節目之前，我們當略述共產黨的領袖間所發生的嚴重關爭。

黨內的政見與衝突（一九二二——一九三二年）

一直到一九二二年的春季，列寧是蘇維埃聯邦的獨裁者，他占着共產黨政治局主席的位置。他以他的極大的威望與勢力，不但能够造成重要的政府政策，且能防止黨內其次領袖間表面上的不和。列寧在革命時期與革命後的時期內過度的辛勞，漸漸影響了他的健康。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他的身體猝發癱瘓，暫時失去右臂與右腿的功用。病體復元後，他又委身於工作，特別是從事著作，但他不久就覺得有將自己的行政職務付託於友人與助手之必要了，——這些友人和助手就是曾在法國研究法律的卡曼涅夫（Kameney）；他最早的熱心門徒之一的萊科夫（Rykov）及其他幾個忠實黨羽。

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他的健康受第二次的打擊。這一次，他移居莫斯科附近的高爾基（Gorky）村莊，過着苦痛的生活有好幾個月，但因希望他的神異的體格終會戰勝病魔，故毫不沮喪。結局的降臨是出乎意料的。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晚間，他忽然神志昏迷，不到一小時就溘然長逝了。由共產黨大眾看來，他的陵墓（在莫斯科）成爲神龕；由黨內領袖（雖然他們因陡喪導師而悲哀）看來，他的逝世預示着政權的爭奪。（註）

（註）列寧死後不久，彼得格勒就改名列寧格勒（Leningrad）。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俄國的首都即爲莫斯科。

候補爲黨中與政府中最高領袖的人物裏面最傑出的爲托洛茨基與史丹林兩人。托洛茨基是顯著的煽動家，紅軍的總司令，黨中大多數重要機關的著名委員，所以也是在列寧後最爲俄國以外的世界所知的布爾扎維黨人。然而他在黨內有不少的敵人。有些共產黨員對於他的盛氣凌人的勢頭和虛榮心實在不敢領教。其他的人則因他苛於攻擊於他無用的人而討厭他。他又急於開始世界革命而不顧俄國國內的困難情形，並蔑視農民，認

他們太落伍，無助於共產主義之建立，這更使另外一批人對他敵視。布爾扎維黨的「舊赤衛軍」的老兵宿將，則因他直至革命成功的一年還在反對列寧而耿耿於懷，到現在尚未饒恕他。再者，他和列寧在相識之初彼此常用以嘲罵對方的尖酸刻薄的表性形容詞，此刻亦被他的敵人利用來攻擊他，難怪他在一九二四年的抱負是不幸的。

反對托洛茨基的主力，為該黨中央委員會的三個委員：史丹林、卡曼涅夫與齊諾維埃夫（Zinoviev）。這個三人同盟的主角就是史丹林，他是喬其亞（Georgia）地方的農人，真名為約瑟·維塞里阿諾維區·德壽該盧維利（Joseph Visserionovich Dzhugashvili），以一八七九年生於高加索的哥里鎮（Gori）是一個鞋匠的兒子。約瑟的父母為俄皇亞歷山大第三的敕令（此令規定貧兒可為教士）所動，早就決意送他們的兒子進神學校肄業。然而這個粗魯的少年殊無意於成為教士，不久就表明他對於馬克思的親熱遠過於讀聖經。他馬上被神學校開除，接着就投入社會民主黨。

史丹林秉性殘酷、橫施、大膽，並且沈默寡言，入黨後，即以熟練於執行危險的使命見稱，在一般潛伏國內或亡命國外的過激領袖中間，也很有名氣。在他所取的一切別號中，似乎沒有一個能像「史丹林」一名那樣適合他，「史丹林」（Stalin）的意思就是「鋼」（Steel）。在一九〇三年，他是最先遵從列寧指導的布爾扎維黨員之一。此後他始終為這個導師的忠實信徒。『在史丹林的心目中，祇有一個馬克思，他心目中的先知便是列寧』。

儘管他非常狡猾，時時提防，他仍被捕六次，並於一九〇二年與一九一三年之間屢遭放逐。他因體格剛強並

有忍耐工夫，設法逃出牢獄者五次，但最後一次在一九一三年，他被送往北極圈幽禁，直至三月革命後纔獲釋放。俄皇的鷹犬似乎沒有一次認識他是累犯，否則早處以死刑了。然史丹林不顧危險，寧願在國內秘密活動，不肯遣遙瑞士或英國，以圖安全。他不斷地工作，從事寫作文章和小冊子，在大城市中組織革命團體，並偽造銀行紙幣和「攘奪」富人的金錢，以接濟革命黨的經費。

史丹林的身材有六呎高，頭髮深黑，皮膚作橄欖色，狀貌完全是一個亞洲的戰士。在十一月革命後，當布爾扎維黨正爲國內外的敵人所包圍的時候，他博得軍事領袖的名聲。他最大的功勳也許是在防守伏爾加河下游的察里勝城(Tsaritsin) 以禦哥薩克兵一役。爲紀念他的勝利起見，該城的名稱後來被改爲史丹林格勒(Stalin-grad)，同時布黨授與他紅軍的勳章。

當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成立的時候，史丹林被推爲工農視察人民委員(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那時他已經是共產黨的總書記。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他任各民族人民委員之職，以此資格，頗有助於統一幾個高加索小邦爲外高加索共和國和組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他因爲自己是少數民族的一份子，故引保護少數民族的權利爲己任。以上所述就是這個對托洛茨基挑戰的人的簡傳。

這兩個敵對的領袖都自稱爲忠實的「列寧黨徒」。他們倆在一九二四年對於幾個重要的主義論點表示着相反的見解。史丹林認爲資本主義在西方各國根深蒂固，目前要設法顛覆它是勞而無功的事。所以他寧願集中布爾扎維黨的精力於改進蘇聯的經濟狀況，而不欲徒然從事於將西方工業國家的「人民之敵」驅出它的

堡壘。反之，托洛茨基則以為世界革命是刻不容緩的事。

復次，史丹林是農人出身，他覺得，在最後的分析中，俄國的福利究竟有賴於國家的糧食生產者的合作。因之他極力主張確立政府與農民間的良好關係，即令此舉不免延長對於小資本主義的妥協，亦所不顧。然而托洛茨基決無意於等待至農民接受共產主義之時。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的西方的革命比俄國的經濟繁榮重要得多。他祇是要強迫各國的農民屈服於開明的無產階級的統治。最後，史丹林深信要速成俄國的工業化與共產化，殊有利用外國的資本與技術的幫助之必要，托洛茨基則視與西方的金融業者和專家妥協或往來為大逆不道。

互爭雄長的決鬪，於列寧逝世後即行開始，自始史丹林好像就頗占優勢。在他任總書記的長時期內，他已有很大的機會使他的黨羽佔據黨內大多數的重要位置（特別是中央委員會裏面的）。再者，他既被陞擢為政治局主席，以繼列寧之任，就悄悄地與卡曼涅夫和齊諾維埃夫共謀褫奪托洛茨基的陸軍人民委員及勞工與國防會議委員之職。在一九二五年之初，此事卒告成功，此後不久，托洛茨基的許多黨徒亦被逐出陸軍部與海軍部。接着這位失勢的英雄暫時遭放逐於高加索，「以便休養身體」，他回到莫斯科後，祇得到一個小小差事。

托洛茨基既已失勢，史丹林乃企圖與農人及外國的獵取特許權者進行許多妥協。然而他的行為顯然大背共產主義，以致於他的至友卡曼涅夫和齊諾維埃夫，現在也掉轉頭來反對他了。史丹林卻毫無忌憚，反而巧妙地取得一九二五年的全黨大會對於他的行動的同意，並設法將這兩個最後的政敵降黜，且下令阻止他們的反對。他招致了一羣新的擁護者，其中以下列三人為巨擘：聯邦人民委員會主席萊科夫；政治保衛局局長德壽興斯。

基及最高經濟會議委員與真理報（Pravda 共產黨的機關報）主筆布哈林（Bukharin）

托洛茨基在這個變遷的情形中看到恢復他的地位的好機會，乃與缺望的卡曼涅夫和齊諾維埃夫攜手，力圖打倒他的敵人。可是共產黨又爲史丹林的後盾，因爲他很小心地使他的政策表面上祇爲遵行大會的命令，而托洛茨基偏要全黨屈服於他的意志之下。於是這般不從黨命者或「不軌於正者」又受到叫他們停止反對的策略並服從黨紀的訓誡。接着更有一批人被降級，托洛茨基則奉命退出政治局。

當托洛茨基一派入再堅持反史丹林的運動的時候，那個獨裁者即命令政治保衛局從事偵察他們的形跡。他們所有的行動在在被監視着，毫無機會用演說或印刷物來表示他們的意見。托派人既迫得無路可走，乃在郊外和森林中秘密集會，後來終被控組織反對的團體。在一九二七年之末，托洛茨基、卡曼涅夫和齊諾維埃夫皆被開除共產黨的黨籍，次年一月，又被遣送到蘇聯的邊境。

在一個短時期內，史丹林的領袖地位似乎無人敢詰難。卡曼涅夫和齊諾維埃夫後來悔過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他們的請求復職的呈文得到批准。然而托洛茨基倔強如昔，他在被放逐的地方（土耳其斯坦（Turkistan）繼續激發人心來反對這個他所認爲「黨中無比的庸人」的人，他既爲富有經驗的革命黨員，所以很容易設法和他的部下時常接近，這些黨徒中有很多和他一樣不信任史丹林的工人與農人。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之冬，他的活動激起了幾處的騷亂，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當時實在得到白黨的援助，白黨看見這兩個列寧所稱爲「黨中最有天才的領袖」的人內訌，正不勝欣喜。

政治保衛局此刻奉令撲滅反動，逮捕了大批人員。在一九二九年之初，托洛茨基本人被控從事反革命活動及「準備武裝危害蘇維埃政府」。警察下令將其放逐出境，二月，這個悻悻的流犯被押送着越過土耳其的邊界。他定居於君士坦丁堡附近，在短時期內，寫出了一部自傳，其中娓娓敘述布爾扎維黨的革命並對於史丹林主義盡量抨擊。

史丹林所有一切反托洛茨基主義的行動，都經後來黨內的會議正式追認。在一九二九與一九三〇年間，他又很順利地打破了萊科夫與布哈林所領導的「右派分離運動」。這兩個人未遭貶謫，也未被開除黨籍，但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大大地減少了。一九三二年，齊諾維埃夫再度被開除黨籍，於是那個「鋼人」似乎確立了他的無上權力。

有如命運一樣殘酷，可是毫不壯觀，史丹林祇是向前奮進，他決意我行我道來達到馬克思主義的目的——雖徐緩而有把握。他從來不強迫任何人附和他的見解，祇是小心地給人以良好的印象，覺得他的行動不過奉行黨的命令而已，所以在一九三二年，他似乎是大陸各國的獨裁者中最能立於穩固不拔之基的一個再者，他覺得在俄國的少年黨員中，殊有收買人心之必要，因之常常和蘇聯的青年團體接近。由許多青年共產黨員看來，他是一個英雄，其偉大僅亞於列寧。

代替新經濟政策而興的五年計劃是在史丹林的嚴密監視之下施行的。這個計劃完全是對於一九二八——一九三三這五年之期內蘇聯的經濟與文化生活的未雨綢繆。草定之者爲一個特設的國家設計委員會或 Gosplan，此項機關又具有開始和指導施行全部方案的職權。爲依照程序表務使國家的生產，分配與資金之使用的各方面保其均衡起見，乃規定如下：凡工業、農業、運輸或財政之中的重要步驟，如事先未經國家設計委員會認可，均不得進行之。聯邦人民委員會早就聲明過，凡未得國家設計委員會的同意的建議，他們決不會批准它。

(註)

(註) 國家設計委員會由人民委員會議所派定的理事部及幾百個助理員的辦事處組成。它的總辦事處在莫斯科一所指定的大廈內。除了這個中央的設計機關之外，聯邦全境又有許多地方的設計委員會。再者，最高經濟會議亦爲襄助施行五年計畫的行政機關，與國家設計委員會相輔而行。除五年總計畫外，每年又另有一個一年的計畫。

政府希望根據這個計劃在五年之內增加聯邦的工業出產額一三六%，農業產額五五%。油與煤的出產則當加倍；鐵產則三倍。工率當增加三倍，其生產額當在四倍以上（這樣一來，可達到一九一三年數字的十一倍）。此外，又須添設專門學校，雇用外國專家，減低生產費用三分之一，加倍勞工的生產能力，五千五百萬英畝的耕地（代表着全國農民所保有的田地五分之一）當使之集合化。文盲當加以實際的掃除；出版的書籍當大事增加；音樂與戲劇的演奏當普及於各村。

爲迅速發展工業、農業、運輸業、電氣事業與建築業起見，政府預定支撥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

款。其中八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之數應留作伏爾加河與頓河之間的運河 (Volga-Don Canal) 的建築經費；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之數應用在聶普洛斯特洛埃 (Dneprostroy) 地方創辦九十萬匹馬力的水力發電廠之用，還有幾十萬元則用於完成長一千一百哩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鐵路。

俄人又竭力修理和改良運輸的種種設備，以便妥善地分配原料、食料和製造品。舊的鐵路皆經整頓，新的亦在建築，雇員的薪水都提高了，工作也有紀律了。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事業年度中，買票的火車乘客幾倍於一九一三年的人數。汽車運輸的設備亦有發展，但硬地面道路之修築進行得很慢。最後，政府又設法取得外國專家的幫助。它和外國的公司與個人訂立了『技術合作合同』，並向願到俄國來作工的外國熟練工人提出優惠的條件。

這種國家計劃經濟之直接目的，不但在供給俄國人民以充分的貨物，且在造成盈餘之類以輸出國外。最終的目標即在使俄國於可能範圍內自給自足。然而，五年計劃的任何方面，都不是打算在犧牲了工人的健康和幸福而施行。

因為俄國在國外的信用地位並不怎樣好，所以必須在國內籌款來施行計劃。政府所決定的三種主要財源就是國家托辣斯所得的利潤、稅收及內國公債。資本之儲蓄，則用兩種方法——即實行政府各機關的儉約並禁止奢侈品的輸入來完成。每月分爲六星期，每星期分爲五日，凡工人在每星期中都享有一天的開暇。然而此種新訂的曆法祇在關於生產活動的時候纔施行，並非普遍適用。

五年計劃見諸實行後，黨與政府即盡力取得國民的合作。該項計劃之不免使人民感受某種艱苦，是毋庸諱言的，特別是在重新採用部分的給糧制度（一九二八年）之後，差不多各種主要食品的供給都被限制。人民因政府不停地使用演說、報章、無線電、電影、遊行和儀式大事宣傳，極度興奮。各處年輕力強的共產黨員所組織的『突擊隊』於完成此種殆為人力所不能及的生產工作之中，彼此爭奇鬪勝來播散熱誠的空氣。競爭與對抗的精神被他們有系統地利用着，超過生產定額時則給獎品，凡有特別困難的工作先於程序表所定時間完成者，則舉行盛大的祝典。政府的獎勵之大獲成效，可以一事證之，例如馬格尼托高爾斯克（Magnitogorsk）大鍊鋼廠的第一個鼓風爐舉火時，『人民聽到這個消息就好像聞悉前線軍隊大獲勝利一樣歡欣鼓舞』。（註）

（註）該廠位於烏拉爾的馬格尼托山（Magnito Mountain），將來全部造成的時候，即為世界最大的鍊鋼廠，它每年可以產鋼四、〇〇〇、〇〇〇噸。由蘇俄的工人看來，『馬格尼托高爾斯克』成為工業的偉大的象徵，其建築之速幾類發狂。參看 *Current History* Vol. XXXVI, 1932 所載 Sherover, M. M., "Magnitogorsk: Epic of Soviet Labor" 一文。

使一切對蘇俄友好或敵視的觀察者大為驚愕者，在施行中的五年計劃實際上似乎超過了紙上的五年計劃。煤油工業竟於兩年半中完成它的五年的預定計劃。幾個月後，農業機器、汽車和機關車的製造達到一九三三年的定額。泥炭、糖、煤和電氣設備的五年生產目標則於三個月後通過，同時鐵、鋼和織品的產額亦趕過程序表的時間。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鐵路業於一九三〇年四月竣工，先於規定的時間一年多；這條鐵路的建築由一位名叫沙托夫的建築家監工，這個人曾一度因從事過激的活動被監禁於美國。聶普洛斯特洛埃水閘與發電

廠則於一九三二年之夏舉行落成典禮。

農業方面的成績有一個時期似乎是同樣可喜的。雖然五年計劃預測一九三三年祇有二〇%的農民宅地集合化，但到一九三一年，就有六〇%的農場保有地變為集合產了。每個「集合農場」(Kolkhozi)由選舉的理事會管理之。因為差不多全體理事都是共產黨黨員，所以黨與政府實際上支配着集合農場。國家農場的發展一方面，亦有很大的進步。其中最大的一個稱為「巨型」農場，占面積二十五萬英畝。因有此種成就，蘇聯的過剩小麥在一九三一年竟有汎濫於世界穀類市場之勢。消費合作社的社員到一九三二年已達五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在這個時候，合作社辦理着一六〇、〇〇〇所商店，並且祇有百分之五·五的零售商業是在私人的手中。在這種吉祥的情形下，氣壯志大的國家設計委員會開始苦心經營第二個五年計劃——自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的。

然而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情勢大有變遷，而五年計劃的進行也不穩定了。早在一九二九和一九三〇年，已有人注意到五年計劃在它的兩個重要的項目方面後落後：即減低生產費用及增加勞工生產能力。更顯然可見者，即生產的數量是犧牲了品質而得到的。例如在一九三二年之春，一個極大的新工廠，下諾弗哥羅(Nizhni-Novgorod)地方的汽車廠（此廠預期每年當造出一四四、〇〇〇部汽車）關門了——恰在它開辦後三個月。這個春天又發生穀類與牲畜不足的恐慌，及另一個嚴重的農村危機。爲什麼緣故呢？

像五年計劃這樣包含豐富的計劃，任何國家都不能各方面都實現得很圓滿，尤以在工業落後的俄國爲難。

但是有一個時期，所擬定的程序表實際上確被超過。這在建築工程中及以外人之助力設置昂貴的和複雜的外國機器之中尤然。但工廠一經建立，機器一經裝備，就馬上顯出，未經訓練的俄國工人似乎非但不能轉動複雜的機器，且足以損壞之。熟練的和專門的勞工之極度缺乏竟使工廠大半以無經驗的農人濫竽其間。再者，那般免強充當工人的農人多沈湎於麴藥，這種情形從許多工業災害發生的頻繁可以看出。

使有效的生產更受妨礙者即為流行於各工廠的管理方面的德謨克拉西精神。新工廠的正當工作因有許多特權保留於工人而被牽制。本來，欲求大規模的工業得到順利的指揮，就需要十分嚴厲的紀律和最低限度的編組法，然而俄國的制度不然，它准許一種可使工人在開會討論前拒絕施行管理部的命令之辦法。此種共產黨領袖所謂「民主的會議主義之干涉」實為五年計劃的成功之最大障礙。

使事情更糟者，國家設計委員會於其原來的程序表中，未能規定擴張運輸的種種設備。以適應日漸膨脹的工業的需要。因之車站中貨物堆積如山，值價幾百萬元的易壞物品則聽其朽爛於鐵路的終點，而工廠極感原料的缺乏。有一次運輸人民委員會估計，有一千萬噸的貨物被屯積於各地點，以待裝運，但因缺乏貨車和船員，竟不能輸送。再者，五年計劃的若干部分可以在程序表所定的時間之前完成。但其他部分卻不能夠，不能呼應，這也是它的缺點。它使全部方案失其均衡，有時且必須加以複雜的和笨拙的整理。

為維持政府的宣傳在民間所造成的熱誠於永久，並使工人在若干年中能以最高的速度工作起見，就必須有豐足的糧食供給額。可是蘇維埃政府因各種理由，覺得非縮短工人的糧食定量不可。因為俄國的信用和盧布

在國外都沒有相當的地位，又因為它非常需要外國的機器與貨物，它就不惜以任何價格輸出巨量的穀類、木材、煤油及其他國產。政府因欲取得盈餘之額以供出口，乃猛烈地減少人民的口糧，重新採用修正的徵糧制和收穀制，並就其權力所及使用各種加速農業集合化的手段。

政府又以各種特權如減納租稅及信用借款之便利給與集合農場的份子作為歡誘各個農人均分其利益的方法。反之，凡固執成見不加入集合農場者則被課重稅，必須按期將穀類的一定數量交與政府當局，否則被奪去田地。在這種辦法下特別吃虧的人就是一般富農，因為他們不願將他們所有的田地，農具和牲畜與較貧的鄰舍所有的併合，那樣一來，他祇能得到總收益的一份的報酬（總收益之分配係按其在田中所出勞力之數量與質量而定）。

國家所以「清除富農階級」的企圖的最壞一方面也許就是鼓動貧農反抗富農的行為。每個集合農場中設有清除委員會來選擇應被「驅除」的犧牲者，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因此項清除運動所發生的暴行與流血，令人回想到布爾扎維黨柄政的初期。被追捕的富農於是大家聯合起來自衛並進行報復，他們攻擊集合農場的財產，自動毀壞他們的穀類與牲畜，俾不致落於敵人之手。因之成千成萬的富農被流於西伯利亞或北方從事建築道路及其他公共工程。自然，有些膽小的就只好屈服並加入集合農場了。然而在加入前，他們往往屠宰他們的牲畜，寧願拿來飽餐一頓，而不肯以之奉送集合農場。這樣一來，全國的牲畜被殺者共達三分之一，結果一九三一與一九三二兩年中，國內大感肉類的不足。以武力或勸誘迅速進行田地集合化的結果又使蘇聯缺乏用

以耕種廣大田地的必要的農業機器

此種緊急局面及需要孔亟的供給品之不斷輸出在國內所造成的純淨結果，即為一般生活標準的降低，一直低到新經濟政策時期後來幾年的水平線以下。同時勞工的效能與熱誠亦趨衰落，五年計劃的進行停滯不前。蘇俄當局很知道這種不利的影響，乃採取有力的步驟來抵抗它。在一九三〇與一九三二年間，工業範圍內有不少的改革。工作延長了，對於非共產黨的老練工人的歧視不如從前之甚了，工廠管理部對於雇工的支配權增加了，同時工人委員會的權力減輕了。為獎賞工作敏捷的工人並激勵工作遲緩者起見，業經制定等級的工資率。許多新事業已採用包工制，各種工業亦在施行更有效的會計法與管理法。

此外，政府又盡了很大的力量來終止若干種主要食品之按口分配制，並增加其餘口糧的定額。因為食料的價格非常之高，工人即以增加的工資，也難購置定量以外的供給額，所以此舉更為必要。然而，雖有這種妥協，同時對於私人買賣的攻擊，仍舊進行不懈。政府決意取得國民一方面的較大效能與進攻心，但祇以在社會主義制度的組織之內者為限。

在農業範圍內，政府的讓步是同樣概括一切的。田地集合化的進行暫時鬆懈了。集合農場的有力份子（其中有些是從前的富農）得到有責任的管理位置。各農場的純淨收入百分之五，被提作賠償各份子因捐助牲畜與機器於團體而受的損失的款子。農人與小工匠可以直接交換糧食與製造品。同時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數字業經編製，避免重蹈第一次計劃的錯誤的方法，亦經熟慮。

自然，五年計劃的進行對於俄國的外交關係有重大的反響，這是不需說的。因為俄國的貨物以遠低於成本的價格沖入世界市場，所以各國（特別是美、法兩國）大叫道，蘇俄是在「傾銷」其出產品於西方，以便破壞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組織，而為世界革命開一先路。然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若求其真相，恐不如是，蓋布爾扎維黨的主要目的，顯然因為要取得某種極感需要的製造品，所以情願出任何的價格。雖然俄國願意與切求與之通商的任何國家訂立相互的商業條約，但因為缺乏信用與款項，實際上為情勢所迫，不得不在任何條件下出售徵發而來的盈餘貨物。（註）

（註）一個有趣的國際物品交換貿易的試驗，於一九三二年以俄、土條約的方式開始，這個條約規定俄國當出售價值八、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機器於土耳其，土耳其則以同價的原料報答之，交付期為二十年。

俄國在一九三一與一九三二年——這兩年正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失業者人數超過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的時候——實際上感受勞工的缺乏一事實，提出一個不易忽視的論難。這兩種對照的情形給與我們豐富的思想資料。它們似乎表明國家經濟與社會的制度比那種默認無計劃的生產，不經濟的重複，和胡亂的分配之制度有許多優勝之點。在一九三二年，幾乎每個現代國家的當局和人民都在嚴重地討論是否宜於草定和採用他們自己的「五年計劃」。

教育與宗教

蘇維埃政府因對知識分子與專門家及祖護這兩種人的富人大施迫害，使俄國蒙受文化上的大損失。俄國的著名藝術家、優伶、音樂家、歌者、跳舞者、科學家、醫生和著作家大多數產於中上階級；但自這許多天才遭遇死亡，放逐或壓迫後，俄國的文化一掃而空。更壞者，在共產黨上臺的時候，全國的男子幾有三分之二，女子約有八分之七是文盲，因為戰爭與革命阻止了舊國會擬至一九二二年制定強迫的和普及的教育的計劃。

然而布爾扎維黨無意於聽任這種可悲的情形長此繼續下去。他們決定建設一個新的現代文化，不受舊習慣和遺傳法式的損害。他們要教育大眾，並使全國的勞動者及其子女享有前此祇限於少數人的受教養的權利。政府所以下決心來教育大眾，不單因為要糾正從前的錯誤，並且因為他們實覺到大批的無知無識與文盲將阻礙國家實質上的發展，並使社會主義福音的傳佈為不可能。除非人民（特別是農民）都識字，並能吸收關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學問，他們就不能了解或誤解政府所希望着的政策。所以，一般受共產黨支配的新學校都負有三重任務，即啓迪成年人，造就一羣有能力的和熱誠的青年共產黨員來擔任老革命黨員的工作，並養成工程師和其他專門家以填補帝俄時代的技術人員被斥逐後所留下的空缺。

教育的管理權，從前本操諸帝國政府，希臘正教會或私人手中的，現在則大部分歸地方政府掌握了。因之，掃除文盲的運動，全國頗不一致。誠如所料，各大城市以有世界最新式的學校自豪，而偏僻的鄉村區域中卻仍是許多祇有一間課室，沒有黑板，教科書，或良好的教員的私塾。時間與現錢，似乎是改良這種狀況的必要條件。

凡遇必須限制學生註冊之處，總是特別優待共產黨員的子女。非黨員的工農子弟則受次等的待遇，其餘的

兒童祇在有相當的空位時纔得人課室聽講。政府又盡了特別的力量使成年人進工廠學校或大學巡遊講演班肄業。學校中均就可能範圍內聘請共產黨員爲教職員，陸遷的標準亦唯視其在黨內的地位而定，而不按其學問與教授能力。

在一九二一年前，俄國的內外戰爭，財政的困難，和經濟的紊亂，在在使布爾扎維黨不能注全神於教育。然而等到秩序一恢復，這方面的革命『前線』卻大有進步。許多教育領袖中最有能力並且最努力的要算著作家與批評家盧那卡斯基 (Lunacharsky) 與列寧的孀妻克魯普斯喀耶兩人。

到一九二六年，蘇聯的在校學生總數等於大戰前最後一年中帝俄所有的學生人數，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間，初等學校的註冊者幾兩倍半於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之數。再者，在一九三〇年，全國年齡在十歲以上的國民中祇有三分之一是不識字的。一九三〇與一九三一年中入工廠學校，專門學院與大學的學生共達一、四五〇、〇〇〇人以上。一九三〇年的法令規定蘇聯的兒童至少應入學校肄業四年，其最終目的乃在使三歲與十六歲之間的兒童均受強迫教育。(註)

(註)目前出現於俄國的新式課本以伊林氏的新俄初階 (New Russia's Primer) 爲最好的範本，此書的英文譯本係於一九三一年

在美國刊行

政府當局想努力造成一種根據列寧主義的俄國意識形態，它不但依賴學校與教員，並且仰仗舞臺、電影、藝術文學、無線電、音樂及其他各種可用的宣傳方法。雖然戲劇與歌劇的古典作品仍有演奏，政府卻從各方面儘力

用以達革命的目的。官方支配並抑制創作的的事情很多，但新俄羅斯早已產出許多文學、科學與藝術的傑出人物。皮涅克 (Piniak) 也許是青年作家中最有名的一個，他著有荒年 (The Bare Year) (一部神祕的和印象派的作品，敘述饑饉與戰爭之年) 及伏爾加河流入裏海 (The Volga Flows to the Caspian Sea)。李奧諾夫 (Leonov) 的獾 (Badgers) 給與我們關於農民反抗共產黨的理想生動描寫，他和詩人柏德尼 (Bedny) 在國際間有很多讀者。邁歐霍爾德 (Meierhold) 被公認為有非常才能的舞臺導演，愛森斯坦 (Eisenstein) 和坡杜芙金 (Podukin) 所製的影片引起歐美人士的嘆賞。新俄知識階級的其他知名之士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家坡克洛夫斯基 (Pokrovsky) 及生物物理學者拉撒勒夫 (Lazarev)。在一九三二年，布爾扎維黨聘請一個生於俄國的英國樂隊指揮科提斯 (Coates) 來發展蘇聯的音樂。

關於教育一方面的改革已經是激烈的了，關於宗教一方面的更爲可驚。因爲列寧的黨徒認宗教爲『人民的麻醉劑』，所以他們決定永遠排除教士的權力與勢力。希臘正教會被廢除了，它的財產被沒收了，它的許多華美的大建築物非被撤毀，即被改造爲工農的俱樂部和博物院。復次，教會所有對於教育、結婚、墳地、及出生死亡之登記的管理權全遭剝奪。在起初，宗教教育完全被禁，到後來在學校或教堂之外對小羣人傳道是許可的。政府拒絕與教會的僧侶輩發生任何關係，但答應二十多個教區民的集會使用若干被充公的教會財產。

因爲共產黨最初單以希臘正教會爲攻擊的目標，並解除對於其他宗教與無神論之自由傳佈的禁令，所以各種宗教派別如路德派，浸禮教會和美以美派因做了許多社會公益的事業，很快地從東方加特力教中收得不

少改宗的信徒。這種情形激使希臘教會重新活動起來，它實際上已在繼續使農人的心理與生活受它很大的影響。政府覺察到這種不愉快的變遷，馬上限制一切教派在教堂講道，並禁止普遍傳佈無神論以外的宗教教義。反宗教的運動被認為抵抗反革命的運動的一方面，許多「不信上帝的團體」馬上如春芽怒茁。

雖然一般民衆到教堂聽講的行爲在所不禁，但絕對不許共產黨員參加。聖誕節與復活節等紀念日仍繼續遵守，可是不以爲宗教的假日，而祇當作「向例的休息日」。政府刻已盡力將特殊的革命紀念日（如列寧日）來代替它們了。

自然，反宗教的戰鬥最後是否勝利，現在只能臆測。蘇俄對於宗教的再三「驅逐」已引起外國不少的惡感，但我們很少理由可以懷疑布爾扎維黨之認宗教爲壓迫手段而非救世方法，及認共產主義的福音比「上帝的話」更爲有益是否出乎真誠。無論如何，我們留心注視這個「不信上帝」的制度的進展總是有興趣的。

國際事務中之蘇俄

(甲) 共產國際 (The Komintern)

共產主義的最高使命在於四個偉大的革命步驟：(一) 推翻目前的事物的秩序；(二) 暫在世界各國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三) 創立蘇維埃共和國世界聯邦；及(四) 成就全世界的共產社會。使這個大計劃見諸實行，就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國際大會所自課的任務。大會確信布爾扎維黨政府對於宣傳世界革

命的任何工作必予以贊助乃自行組織爲「第三（第一共產黨）國際」（註）草定根本目標表及行動計劃，並選舉齊諾維埃夫爲主席。齊氏保留此職至一九二六年，後由布哈林繼任，布氏則於一九二九年由科干尼茨基（Koganitzky）接任。

（註）第一（社會主義者）國際其實就是國際工人聯合會，是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所組織的，它在一八七六年前曾舉行多次常年會議。第二國際成立於一八八九年，參加者多爲世界各國的社會黨與勞工黨。它的活動實際上因世界大戰而停止，但在一九一九年，它又重行活躍。穩健的第二國際與極端激烈的第三國際彼此之間毫無好感。共產黨的黨歌即稱「國際歌」。其字句爲坡堤埃（Pottier）於一八七一年所撰。

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大多數派有代表駐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機關。蘇聯的共產黨因具有力量與後援，自然操縱一切。第三國際在它的定期大會中曾制定個人與黨員的紀律的鐵則，草定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工作的完全計劃，並鼓勵組織各國的支部。它派出許多演說家與煽動者，設置印刷所，籌集款項，有時且捐助經費於拮据的共產團體。遣派代表監視各國黨員的行爲，決定一切支部所有關於一般事件與特殊事件的政策，並以各種方法激起西方的工人與東方的農民來反對目前的社會與經濟制度。共產國際因之被稱爲「世界革命的參謀部」。

當然，共產國際的革命活動，使資本主義的政府大感煩惱，德國、匈牙利及波羅的諸邦的當局切齒於第三國際，因爲各該國的過激分子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及後來數年中設立或企圖設立布爾扎維黨的地方議會時，它曾予助力。美國也發生一次悲喜劇的「赤色恐怖」，結果有幾百個外國的「嫌疑犯」被放逐到蘇聯，其中有許

多不是俄國人在美國好幾處懸掛紅旗（共產黨的旗幟）的行爲，須受監禁的處分。

到後來，西方各國政府畢竟給與共產黨員言論、出版與集會的自由，惟不得施用暴力和煽惑手段來直接行動。在東歐與南歐及許多亞非兩洲的殖民地，煽惑者一被認出爲共產黨員，即遭逮捕。但有一點，共產國際倒成了歐美政客之恩物，即他們可以把國家的各種禍患皆可輕易地歸咎於『企圖搗亂的赤黨』。可驚異者，許多騷亂，往往不得端緒就被硬指爲莫斯科所指使的。

第三國際與蘇維埃政府自始即密切合作。俄國時常資助革命之舉，並鼓勵第三國際用各種力量在各國搗亂。然而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兩者的合作就不大明顯了。到那個時候，全聯邦共產黨與政府中的許多委員得到一個結論，以爲在進行重要的步驟前，必先鞏固革命的收穫於國內。他們覺得俄國必須依賴資本主義國家供給製造品和專門技術，他們又明白這些要素祇有答應停止赤化的宣傳纔可以得到。因之向來接濟第三國際的款項，即非完全停發，亦被縮減了，政府又盡力使其他國家相信蘇俄政府與第三國際的地位是各自獨立的。（註）至於第三國際之繼續出現於莫斯科，則以其他國家不容許世界共產黨總機關設於其本國境內解釋之。

（註）最近數年中第三國際的常年預算祇達一百萬元以下。但政府中的許多高級官吏同時仍占有第三國際的重要位置。

蘇俄政府爲貿易或其他讓步起見，往往不顧共產國際的猛烈反對，命令國外的代表制止赤化的宣傳。共產國際有時責罵政府不該與國內的小資產階級作種種妥協，但政府中的領袖（如史丹林）對於這種譴責忽然視之，他們覺得唯一有價值的共產宣傳，就是俄國的試驗之成功。至少在現在，他們認五年計劃的完成比世界革

命重要得多。第三國際因之祇有希望在下次的戰爭中得到勝利。正如第一次的大衝突使工人能在俄國大獲勝利一樣，他們預期在第二次的衝突中，會造成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專政。

(乙)衝突與休戰（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

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即在助成世界革命，利用俄國為根據地來開始對於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總攻擊，並幫助布爾扎維黨到處搗亂。再者，他們又盡力感化亞洲的被壓迫民族，使傾向於共產主義，希望他們聯合起來，在蘇俄的領導之下，從事討伐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布爾扎維黨為引起東方人對於他們的正義的同情心起見，乃宣布廢止一九〇七年的英俄協商（此協商將波斯分成外國的勢力範圍），放棄帝俄政府從中國所取得的各種特殊權利與特許權，拋棄在土耳其所享有的一切治外法權與財政權，並懲惠阿富汗人抵抗英國的強權。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他們在巴庫召集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東方民族大會。到會者約有一千九百個代表（差不多代表着四十個民族），很多樂觀的決議案亦經過。但因這些代表僅代表本國的若干分子，而非代表政府，所以在組織東方共產黨同盟一方面，實際上沒有多少進展。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國都沒有被「赤化」，就是在印度，共產黨亦未能支配反英運動。

一九二一年正向前推進，西方的資本主義似乎比從前更加穩固了，而所欲試行的純粹共產主義甚至就在俄國也失敗了。蘇維埃人因此深信此刻殊有鞏固其國內的權力並改良俄國的經濟狀況之必要，乃準備與資產階級的世界進行休戰，這恰和新經濟政策之採用同時而起。資本主義的世界因抵抗過激的宣傳頗得手而大為

安心，並切望與俄國『做生意』，所以也願意從事談判。

這種新的態度的第一個效果，即為臨時英俄商業協定之簽訂（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在兩國締結正式的和約前，此項協定預先設法恢復兩國間常規的貿易與商業關係，惟須雙方排斥一切宣傳家的活動。俄國答應不再鼓勵亞洲人反抗英人，英國則承諾解除對於俄國港口的封鎖，並幫助掃除列強武力干涉時期中在俄國領海所埋的水雷。雙方政府擔保不徵發自對方領土輸入的商品。代表俄國從事商訂這件條約的外交家，是一個幹練的工程師和商人克拉新（Krasin）。

在英國，勞合喬治希望這個協定會引誘蘇俄向英國定購貨物，因之有助於復興英國的工業。其他的英國人士則抱懷疑的態度，有些人且希望蘇俄首先破壞條約。俄人顯然很高興有這樣吉祥的發軔來恢復國際關係。是年將終，俄國已與其他十一個國家（包括德、奧、瑞典、挪威、意大利與捷克斯拉夫在內）訂立了同樣的商約。

雖然俄國已由所與簽訂商約的國家於無意之中給與事實上的承認，（註）它仍非國際團體中有相當地位的一分子。它的外交關係還沒有完全恢復，並且大多數簽字國祇和它交換半官的商業的代表。不特此也，流入俄國的資本完全不足以應俄國的經濟的需要。西方國家之所以長此不與俄國結交，其主要理由即因布爾扎維黨曾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否認過俄國的總額約有八十億元的外債。

（註）事實上的承認即對於一個政府承認其實際存在，但不含有其存在為合法與否之意，法律上的承認則為正當的與合法的存在之承認。

爲了上述的緣故，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趣林（Chicherin）乃於一九二一年十月照會列強，本國政府雖然無論如何決不承認帝俄政府所欠的外債，但仍準備在國際會議將這件事與關於承認本國及外國給與本國信用借款的種種便利的問題同時討論。經過若干躊躇後，卒賴勞合喬治的疏通，俄國被邀請參加在熱那亞舉行的歐洲經濟會議。有幾個西方的政治家覺得齊趣林的照會及新經濟政策之開始（私人買賣得因此恢復一部分）預示着蘇俄政策的轉變——「俄國的熱月」之來臨。

經濟會議於一九二二年四月開幕，俄國的一切債權國，除美國外，都翩然蒞止。雙方談判了好幾個星期，但不能得到任何成議。各債權國要求俄國履行下列各項：（一）承認被抵賴的債務；（二）外人在俄所有私產被收歸國者給予相當賠償；及（三）設立一種保護並執行將來一切契約的司法制度。俄人則主張：（一）完全取消俄國的戰債；（二）立刻給與俄國巨額的外國信用借款；並應允（三）如果承認戰前的對外債務，則協約國須賠償俄國數達五百億佛郎的損失，這是列強武裝干涉時期中俄國所受的損失。關於以上各點的討論，後來（六月）在海牙重新開始，但又毫無結果。

熱那亞（Genoa）會議有一個具體的成功：即俄國與德國簽訂了刺帕羅條約（註）這使從前的協約國大吃一驚。此項條約不但爲莫斯科政府取得一個大國的法律上的承認，並且暫時解除了俄國對於德國所負的債務，開闢了一條或可取得商業協定與信用借款的捷徑，及略爲減少了蘇俄對於倫敦與巴黎的好意的依賴。然而一九二三年德國國會的不定情形有若干時候使俄、德的政治關係或經濟關係不能更有發展。

(註)見第八章。

其時俄國已有與英國破裂之虞。英國的外交大臣寇純 (Curzon) 責備布爾扎維黨違背不在東方作反英宣傳的諾言，堅持俄國須賠償英國，爲了它在內戰時期中曾將英國人處死一名並監禁一名，並要求俄政府收回他所認爲『蓄意的侮辱』的兩封外交文書。當蘇俄當局接受寇純的通牒中所提後面兩條款而否認宣傳反英的罪過時，兩國的關係幸免完全斷絕。

在一九二三年尾，俄國得到了德國和幾個小國的法律上的承認。它於是聲明它期望凡願與本國磋商貿易，特許權或債務的國家先給與無條件的承認；它又拿特別優惠的商業條約作爲『獎品』奉獻於首先給與承認的大國，以資勸誘。意大利首相墨梭里尼對於貿易的興味比在法律上的吹求來得濃厚，所以他決意從這件禮物上得點利益，並馬上安排與俄國的代表開談判。雖然他立刻將他承認蘇聯的意思通知國會，他提議緩發正式的承認宣言，直到他確信俄國必以『一種優惠的商約爲交換的』時候。

當意、俄的非正式談判正在進行的當兒，英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選舉終使勞工黨領袖麥唐納一躍而爲首相。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麥唐納政府給與俄國無條件的法律上的承認。此項消息激使意人趨於迅速的行動。六日後，羅馬當局亦正式承認蘇聯。特別商業條約的談判遂與英、意並時進行。在一九二四年的二月與九月之間，其他八個國家（挪威、奧地利、希臘、瑞典、漢志、中國、丹麥和墨西哥）陸續承認布爾扎維政府。十月，法國也照樣承認了。於是無產階級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外交和平畢竟成功了。

(丙) 曲線的外交政策（一九二五—一九三二年）

隨着一九二四年俄國在外交上的努力而至的好運道，並未延長到第二年。它在一九二四年八月與英國所訂立的條約，關於債務之清算與商業上之信用借款者，卒被繼勞工黨內閣而起的保守黨政府（首相爲包爾溫）否決。與法國商訂貿易協定之舉也枉費心力，這大半因爲布爾扎維黨輕視奢侈品——法國的主要出口貨之輸入。甚至於和德國的關係，在德國簽字於洛迦諾公約（莫斯科政府認此約爲英國對於俄國的陰謀的結果）的時候，似乎也變弱了。（註）

（註）當時世人俱知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非常憂懼俄國之援助反英最激烈的中國共產黨。其他的保守黨領袖如邱吉爾與貝榭赫德（Birkenhead）爵士常常作反俄的長篇演說。據說貝榭赫德曾指蘇俄政府爲「刺客與強盜的議會」。

蘇聯深恐歐洲組織一個勢不可當的集團來對付它，乃力求與鄰邦締結一大批互不侵犯盟約。此種發展的嚆矢卽爲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俄、土友好與中立條約之簽訂。四個月後，俄國又和德國在柏林締結了同樣的盟約。在一九二六年過去之前，它與立陶宛和阿富汗之間也有同樣的協定成立。

以上這些事件使英國的保守黨和法國的普恩加齊一派人大感不快。英俄的邦交更因布黨的工會（不是政府）資助一九二六年英國大罷工的參與者而趨於緊張。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張伯倫警告莫斯科政府，除非俄國停止在歐亞兩洲的反英宣傳活動，兩國的外交關係將再度斷絕。接着，大出一般人的意料之外，英國的警察突然搜查（五月十二日）蘇維埃在倫敦所設的貿易公司（阿柯斯Aicos有限公司）的私室。英人所以有此項

行動，藉口俄人持有英國陸軍部最近失去的祕密公文書。雖然該項文件未經尋獲，唐寧街仍宣稱英政府已發現俄人從事非法活動的充分證據，足以斷絕對蘇聯的外交關係。國會也這樣議決了。

直至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當第二個勞工政府握權的時候，兩國政府方始恢復外交關係。其時俄國從英國所購買的貨物已自一九二四—一九三〇年的一一〇、七〇二、〇〇〇盧布降落到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的四五、一一二、〇〇〇盧布。這個數目又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升至七八、九二五、〇〇〇盧布。

在英俄國交發生裂痕的那一年，法俄關係也發生劇變。法人儘管正式承認蘇聯，對於莫斯科仍採取不友誼的態度。他們因俄國繼續禁止奢侈品的入口及本身無力償還於一九一四年夏天之前所購買的俄國公債，深為憤怒。俄德的親睦，使他們發生害怕，他們就有意認俄國的駐法大使在俄國所發表的談話為公然侮辱，這篇談話大意謂，一旦外國對俄開戰，他當盡自己的本分來鼓勵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兵士與工人加入紅軍。在一九二七年，普恩加齊拒絕蘇聯的關於債務與信用借款的提議，並要求撤回駐法大使拉柯夫斯基（Rakovsky）在這一年的中國當局搜捕北京俄國大使館，俄國的駐波蘭大使又被一個亡命的白黨狙擊。這件暗殺案不過是國外的亡命者對於蘇維埃官吏的幾次攻擊中最嚴重的一次。

以上所述的事變，自然使莫斯科政府大感不安，他們於是力圖安全之法以對抗歐洲的聯合行動。他們和波斯與拉達維亞商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簽字於開洛格公約，並勸引許多鄰邦和本國共同遵守李維諾夫議定書（一九二九年二月）。此後不久，俄國幫助它的友邦意大利與土耳其重修舊好，在一九三一年，它復與意大利續

訂優惠的商約此外又與德國訂立協定（一九三一年）德政府對德國工業界擔保約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俄國信用借款。這是增加於柏林條約（Berlin Treaty）商訂後所給與蘇維埃的同樣信用擔保之上的。

現在輪到法國擔心的時候了。巴黎政府殊為日益增進的俄、德、意、土四國之友誼所驚，並且因法國不能攫取俄國的對外貿易之有利的一份而大不高興。（甚因之它在一九三〇年企圖造成一個反抗俄國的歐洲聯盟。它大聲疾呼道，布爾扎維黨正在「傾銷」其貨物於外國市場，以便打破西方的經濟制度，因之它主張建立一個將俄國除外的汎歐洲同盟。在一九三〇年十月，所有一切自俄國輸入法國的貨物都被置於一種執照制之下，俾政府能在實際上廢止這種入口貨，此後不久，比利時也開始採取了同樣的手段。傾銷的謠傳很快地風聞於其他國家，特別是在英、美兩國。在一九三一年，各關係國之反對俄國的競賣或反對蘇維埃的經濟制度者，羣起極力運動禁止俄國的貨物（特別是小麥、木材和棉花）裝運入口。法國也發出一個建議，預備組織對俄經濟絕交的國際同盟。

（註）在一九三〇年最初六個月中，俄國售與法國約值一七、五〇〇、〇〇〇元的貨物，而祇購回五、〇〇〇、〇〇〇元還不到的貨。

接着俄國與歐洲各國彼此相對的態度又有了變遷。莫斯科政府頗猜疑反共產黨的策路及德國希特勒一派人的言論，這派人斷言俄、德之間不免於一戰。德國感受世界不景氣的痛苦非常之大，因之漸成爲不甚重要的俄國顧主。所以俄國覺得必須盡力在它和法、美兩國的日益繁盛的貿易中取得利益。反之，西歐的國家很快地發覺經濟會議（特別是穀類會議），如果沒有俄國參加，決無效果可言，它們此刻也承認繁榮實在比偏見重要了。

重定國際政策之方位的障礙，似乎在一九三一年的日內瓦會議就掃除了，那個會議所討論的，即歐洲聯邦之組織是否辦得到。在那個會議占着活動地之中心的就是繼齊趣林爲外交人民委員的李維諾夫（Litvinov）。他的從容不迫的態度及心平氣和的言論造成一個良好的印象，他所提商訂資本主義與蘇維埃主義之間的經濟互不侵犯盟約的計劃，也頗引起別人的贊助。

雖然這個提議未經大會採用，進一步的各個發展之途徑已經打通了。法國似乎翻變了它從前的主張。它急於要破壞德意俄匈等國的堅固的戰線，這幾個國正在嚷求修改和約。此外，它需要俄國的煤油，因爲它久已耿耿於英、美之有豐富的煤油儲量，而它自己則幾空無所有。所以法、俄的煤油協定，當爲巴黎政府所引爲第一重要的事情和安慰。於是法、俄中立與互不侵犯條約卒於一九三一年發起，一九三二年簽訂，作爲新的發展的第一徵兆。

其時俄國與國際聯合會之間的關係，亦有所改善。起初蘇俄不願與國聯有任何往來，它並且認定國聯爲資本主義用以對抗共產主義的至上武器。然而到一九二七年五月，俄國卻準備參加以國聯之贊助而舉行的日內瓦經濟會議了，在一九二八與一九二九年，它又派代表出席於軍縮預備會議。在一九二八年的會議，蘇俄代表提議完全廢除各國的陸軍與海軍，使聽衆驚愕不置，但大家都認此項意見不過是布爾扎維黨欲使世界無力抵抗赤色的侵犯的詭計。在一九三二年，俄國參加日內瓦裁軍會議並贊成縮減軍備的各種重要行動——當我們想到紅軍是世界最大的軍隊之一時，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到一九三二年，祇有美國仍舊是唯一不肯承認蘇聯的大國。華盛頓堅持它的決心不與它所指斥爲不履行

國際義務（俄國欠美之債計達幾萬萬元外加利息）並企圖顛覆他國的民主政體的政府有往來，因為俄國所購於美國的貨物遠多於它所售者，莫斯科也不怕長此等待。在一九三〇年，俄國自美國所購的貨物總計約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其出售於美者僅及該數五分之一。然而在一九三二年起初六個月中，美國幾無俄人購貨，他們全在德、意、英定買。在一九三二年九月，據聞為美國人梅倫氏一系事業所操縱的加拿大鋁產有限公司曾與莫斯科成立物品交換貿易的協定，依此協定，價值一、〇〇〇、〇〇〇元的鋁每年當以之交換同價的煤油。到一九三二年之終，一部分重要的美國商人漸漸歡迎本國與蘇聯發生密切的經濟關係與外交關係。

第十九章 東南歐羅巴

歐洲的「魔釜」

久以「歐洲之傷口」著稱的巴爾幹，依舊是充滿着在大陸上無比的不安與擾攘。幾世紀來土耳其的亂政所遺下的紛擾與腐敗之外，在過去的八九十年之間，又加上了由於列強近東政策的衝突和五六種巴爾幹民族主義的敵對所生的種種擾亂。幾百年來，巴爾幹一向做了由亞洲到歐洲的許多不同民族的方便入口，因此那裏的國家疆界是很難劃清的。但民族主義的病菌是愈來愈強的。每一個集團，每一個種族的混合體，都有着，或都以爲有着，自傲的傳說與壯烈的稗史，以及一個未完成的使命。這些使命就常常衝突起來。

這些頑強的巴爾幹民族，在某一種意義上它們應負促成大戰的責任。它們在大戰期中受了嚴重的痛苦，在和平會議裏又引起了劇烈的爭執。而且，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紛擾也並沒有減退分毫。實際上民族主義的要求愈變愈不合理，收復失地的宣傳也更形猛烈，政府幾乎是定期地被推倒，新的敵對同盟線又已結成，陰謀與暴勸比在土耳其政府壓迫下的時代並未有減少。

巴爾幹國家之一，即阿爾巴尼亞 (Albania)，我們在以前已經敘述過。現在我們進而敘述羅馬尼亞、保加利

亞、希臘、和南斯拉夫的最近發展狀況。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在大戰中站在得利的一方面，因此在和會中獲得了相當的報酬。當最後劃定國界的時候，這個王國包括一二二、二八二方哩的面積——比戰前大了二倍以上。它從以前的同盟國俄羅斯與敵國奧——匈兩方面都得到了土地。奧——匈給了它德蘭斯斐尼亞 (Transylvania)，布柯維納 (Bukovina) 的大部分，和特默斯發之巴納特 (Banat of Temesvar) 的一部。從俄國，它以地方會議票決與羅馬尼亞合併的方法，得到了比薩拉比亞，可是這會議，在蘇俄說來完全是被包辦的不足為憑。

蘇俄政府拒絕承認合併，便是羅馬尼亞的友國也不肯即予承認。在一九二〇年十月間，英、法、意、日四國最後成立了一件承認羅馬尼亞的主權的協定，可是因為俄國的反對，這條約直延至一九二二年纔得英國的批准。一九二四年法國批准，一九二七年意國批准，在這三國批准後方始發生效力。在批准未定之時，羅馬尼亞因恐懼俄國的攻擊，迫而與波蘭（一九二一、一九二六、一九三一年）和法國（一九二六年）締結防守同盟。在邊疆的聶斯德河 (Dniester) 的兩岸，駐軍的前哨會數度有射擊之事。

據一九三〇年的調查，羅馬尼亞有人民一千八百萬人，其中包含異族人民四百萬。異族人民中有一百五十萬的德蘭斯斐尼亞的馬扎兒人，一百萬比薩拉比亞的烏克蘭人，七十五萬德人，猶太人數與德人相近，還有二十

五萬保加利亞人。因此少數民族問題非常嚴重，尤其羅馬尼亞人是著名排外的。一九一九年，羅馬尼亞應允簽訂一少數民族條約，這是協約國以否則迫令交還一部分新得土地爲要挾而成就的。這件條約無疑地對於少數民族是有免除差別待遇的利益的，但不公平的怨訴仍舊常可聽得，尤其在匈牙利人中。

匈牙利人所最反對的，是土地法。羅馬尼亞雖在一八六四、一八八九、和一九〇七等年通過了幾件溫和的公用徵收的法律，在一九一四年時約近一半的耕地仍爲數千大地主所有。有些大的地產竟達四萬畝之多，而百餘萬小田產每塊竟不足二十五畝。爲補救這種缺陷並平農民之不滿起見，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及一九二一等年，通過了法律，規定從大地產上沒收五百萬畝，加上一切王家耕地和全部遠離的地主與外籍地主的土地。私產之超過二千五百畝耕地者，均依規定標準縮減，不使多於一千二百五十畝。其補償的方法，則爲發行五十年的五釐國債。國家用如此方法得來的農田，皆以優待條件分配於農民，其價格約等沒收價百分之六十五。

新合併土地中的地產的最大面積，比之「舊王國」更低得多。例如，在比薩拉比亞，私產不得過二百五十畝，在布柯維納爲六百二十五畝，在德蘭斯斐尼亞約三百畝，在德蘭斯斐尼亞，損失最多的是馬扎兒人，因那裏超過二百畝的地產幾乎百分之八十在他們手掌之中。這些法律的施行非常迅速，到一九二四年羅馬尼亞的最大田產也不過一千二百三十五畝，在一九三二年，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是小農田所有者所管轄的了。

改革了的農地情形，當然改善了農民的幸福，尤其是由於同時進行的改良耕作及購買工具，種子與牲畜的合作社之組織。但原始耕作方法的應用仍很普遍，農民就整個階級而言仍是十分貧困。而政府令人民遠離家鄉

移殖於沒收土地一事，也引起了一些不滿。

土地改革於德蘭斯斐尼亞實行的時候，造成了一個擾亂東歐關係足足有十年之久的國際爭端。依特喇農條約，馬扎兒人之居於德蘭斯斐尼亞而希望保留匈牙利國籍，不願成爲羅馬尼亞國民者，可於一年內自由選擇決定。他們在德蘭斯斐尼亞的所有地仍允保有。因此，當羅馬尼亞通過沒收外人地產法律的時候，馬扎兒人提出抗議於國際聯合會，申明他們的被國際條約所保障的財產不應受侵犯。『這項爭執涉及了羅馬尼亞對於它的土地行使主權時，就侵犯了國際承認所造成的外人權利的問題了』。

這爭執，因馬扎兒人控訴羅馬尼亞官吏對於德蘭斯斐尼亞地產的估價不公，並以賤價債券充作補償，於是問題益行嚴重了。他們並指出，有很多富有的匈牙利地主，如首相柏特楞（Bethlen）伯爵都因土地法之實施而變成赤貧。

匈牙利王國爲維護它的忠於祖國的人民起見，向國聯訴請干涉。國聯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努力進行解紛，但羅馬尼亞堅認此事純爲內政，反對國聯或國際法庭的裁判。到一九二八年，國聯遂不得不失望地把手放開，由爭執者自己去直接交涉。此項爭端直延至一九三〇年，方由海牙（正月）及巴黎（四月）兩次討論東歐賠償問題的會議解決；訂定一個所謂「布羅溪（Bocchic）計劃」的公約，由主要協約國，匈牙利，及幾個東歐的國家，同意以直接或間接的方法公共籌集一筆資金，以補償這些財產被奪的匈牙利人。這個妥協解決方法的擬議與成就，大半由於意國和英國的力量。

但是不幸，這紛爭的解決，並未能造成羅匈兩國邦交和睦的大道。匈牙利對於德蘭斯斐尼亞的強烈的收復失地運動，和對於一九一九年羅馬尼亞軍隊劫掠匈牙利的痛苦記憶，橫阻了兩國親善關係的成立。而在羅馬尼亞一方面，因為它是小協商國之一員，所以不問馬扎兒人的願望如何，盡力阻礙海布斯塔王朝的復興，並對於特喇農條約的規定擁護到底。這情狀顯然難以趨向於和平。

繼土地改革之後，羅馬尼亞又有政治的改革，在一九二三年採用了一個新憲法。新憲法雖以舊憲法為範本，但加入了幾種重要的平等與寬容的改革。舊時的三階級選舉制廢除了，普遍選舉制採用了，猶太人可以獲得公民權了，國會的少數代表也經規定了。領有農田的權利只能由羅馬尼亞人民享受，地下富源與森林均經規定為國家所有。下議院議員由全體選民舉出，任期四年；上議院則由終身任期的退職官員與被選者組成。政府不採責任制，國王有權不徵國會同意而任命或罷免閣員。國王並有否決之權。

戰前羅馬尼亞有兩大政黨，自由黨和保守黨。保守黨代表富有的，有地產的，親德的貴族。自由黨則代表銀行業與商工業諸團體的利益，反對任何外國的經濟與財政的控制。(註)自由黨在大戰開始的時候適掌政權，他們雖自始即為偏向協約國的，可是直等到協約國的勝利有了把握並與協約國議妥有利的條件後，方參加戰爭。由於領袖們——布喇挺紐 (Bratianu) 和他的兩個兒子瓊 (Jon) 與文底拉 (Vintila)——的才能，與君主們

——卡羅爾一世 (Carol I) (一八六六—一九一四) 與斐迭南 (一九一四—一九二七)——的贊助，自由黨自一八六六年至一九二八年間，除掉很少的間斷以外，一直能執掌國政。

(註)一九二四年，自由黨通過探礦法，強制外商探礦公司交出半數股份於羅馬尼亞國民。此法主要目的在統制外商石油公司，因其不顧羅馬尼亞之未來幸福而盡量輸出石油。此種立法自使外國投資者顧慮，以致其後一時期內深感外資的不足。

戰後自由黨的地位異常鞏固。他們不僅使國家獲得最後之勝利，並因親德的貴族地主被民衆唾棄，與大地產的分割，他們的政敵保守黨幾乎完全銷聲匿跡了。可是自由黨的政權，不久又遇到了一個新興有力的反對團體，因為地產的分配與選舉權的推及農民已造成了一個真正的政治革命了。

布喇挺紐一黨人引起了許多人民的反對，因為他們的極端經濟國家主義使國家失去了必要的外國資本，他們的高度關稅政策使農民受到了損失，他們的間接稅制使貧窮階級負擔最大的重荷。新獲土地的人民也站在反對的立場。戰後最初八年間，政府的權力完全操於代表「舊王國」諸團體的手中，可是舊王國的人口還不到大羅馬尼亞全人口之半。這是由於斐迪南王堅持委任他所喜歡的閣員，而不顧國會中許多農民的，德蘭斯斐尼亞的，和比薩拉比亞的候補者的意思所致。到了反對勢力漸盛的時候，國內通過了一件新的選舉法（一九二六年），將國會統制權授之獲票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政黨，而將獲票不足百分之二的政黨摒之於立法機關之外。那時在朝黨在選舉時是常得勝利的，由此可見此項選舉法的作用了。

爲使對於這些不平事件的抗議有力起見，馬尼(Julius Maniu)博士——一個有才能的演說家，他在戰前匈牙利國會中曾有過深長的經驗——將幾個意見相歧的團體聯合一致，成爲一個國家農民黨，提出進步的對內對外政綱。這個政黨主張繼續聯絡小協商國，對於鄰國親善，與國聯密切合作。對於國內，它主張地方分權，責任

政府，革除以強力干預選舉的習慣，扶助農民，更開明的勞工法，充分開發天然富源，及歡迎外資。

這個政黨因一九二七年斐迪南王與瓊·布喇挺紐的死亡而得到了極大的機會。文底拉·布喇挺紐繼任內閣首領後，不能如乃兄表現同樣的統治能力。全國各地遂起抗議大會，示威遊行，及反對政府的行爲。一九二八年五月六日，二十萬農民在德蘭斯斐尼亞開會，以馬尼爲首領，通過請求布喇挺紐退職的要求。自由黨雖尙留職數月，但終於布喇挺紐借外債的失敗使他不得不出於辭職。於是新任首相馬尼立即下令重行選舉。在十二月中，他的政黨獲選三百多個代表，自由黨僅獲十三人，其他小黨獲數名。

新政府所通過的法律顯然有另一種新精神，因爲馬尼決意要使羅馬尼亞「置於使西歐諸國趨於繁榮的憲法的基礎上」。新聞檢查制廢除了，國中某數地區的戒嚴令取消了，憲兵隊的人數減少了，反塞姆族的運動禁止了，外國資本亦受歡迎。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間，建造了許多鐵路與公共工程，推廣了教育機會，獲得了大量外國借款，並將貨幣穩定於每圓一百六十七個「來衣」(lei)的平價。一九三一年四月，這個政黨，雖有良善的政績，卒爲國王卡羅爾二世迫之去職。欲明此中原由，必先回溯另一個故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羅馬尼亞的震動一時的新聞，是王儲卡羅爾的放棄王位承繼權，遺棄了他的第二妃希臘公主海倫 (Helen)，和他的情人琉配斯卡夫人 (Mme. Magda Lupescu) 到巴黎去居住。卡羅爾是從小即以不安分聞名的，所以他的母親瑪麗王后 (Queen Marie) 和布喇挺紐氏父子都不喜歡他。他的情奔遂成了通過新的王位承繼法的機會（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新的承繼法取消卡羅爾的承繼權，立他的五齡幼子邁克

爾爲王儲，並組織政團，以備斐迪南崩亡後王儲未成年前統治全國政事。

斐迪南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去世，沖齡的邁克爾（Michael）遂接王位，以太后及布喇挺紐氏主持攝政團。前已述過，到一九二八年末，馬尼和他的國家農民黨繼秉國政。因爲自由黨與卡羅爾不善，國家農民黨遂傾向於請他復位——只要他和海倫言歸於好，而海倫雖和他於一九二八年離異，但堅持不允將婚姻取消。同時，這位出亡的王子在軍隊中是很得人心的。

因此，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六日，卡羅爾自巴黎歸不加勒斯多（Bucharest），並於兩日後重登王位，這是無足爲奇的了。在國會裏，反對承認他爲一九二七年以來合法的國王的，只有文底拉·布喇挺紐的一票。邁克爾遂受王儲的稱號，而爲阿爾巴·朱理雅（Alba Julia）的大公。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文底拉·布喇挺紐死後，最後的反對者也消滅了。

一九三〇年十月，馬尼辭去國家農民黨的領袖而退出政治。表面上的原因是身體不佳，實際的原因或許是爲了卡羅爾的家庭問題。卡羅爾和海倫的和好，漸成不可能，終於海倫被迫出亡。琉配斯卡夫人卻時常居住國內，並常與卡羅爾相去不遠。軍隊雖仍忠於國王，國家農民黨卻漸不滿於他的不名譽的行爲。因此，一九三一年四月，政府遂行改組，而以卡羅爾的昔年教師佐茄（Nicola Jorga）教授爲新政府的領袖。他是一個有名的歷史家，著述豐富的文人，並曾爲五六個政黨的黨員。他在同年六月，下令改選，自任「全國聯合」的首腦。

『全國聯合』自命爲非黨派的團體，主張效率與經濟，反對政黨制度，以爲政黨是腐化與有害的。他們主張

平衡的預算，農業信用銀行的設立，行政的經濟，教育的普及，國防及運輸制度的改善，擁護國聯和一般繁榮與穩定的恢復。選舉競爭中曾有許多暴動，但這位首相的團體終於得勝了。「全國聯合」黨得着了四分之三的下議院席次。

此後一年間，卡羅爾與佐茄作獨裁式的執政，僅以議會多數為掩飾。兩人都是易衝突，少決斷，好虛榮，而強於派別觀念。儘管政府努力於鎮壓反對，情形仍迅速地日趨惡劣。世界的經濟衰落使百業不舉，而政府的不良更增其頹勢。數次與鄰國試訂經濟協定，卒因相互猜忌而未成。至於國外借款的希望也完全斷絕，因為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一個法國財政專家里斯脫（Charles Rist）發表了一篇羅馬尼亞經濟情形的報告，批評政府鹵莽從事於浪費的公共建築與農民債務的增高，以及政府各部冗員的過多，遂至成爲習慣上的入不敷出。此報告公布之前一日，佐茄內閣因政策失敗而辭職。略經遲疑後，國家農民黨在隈大·佛愛扶（Alexander Vaida-Voevod）領導之下重組政府，七月間舉行改選。

果不出預料之外，國家農民黨於選舉中獲得勝利。它在下院三八七座位中得了二七七，全數選票中得了百分之四十五。隈大·佛愛扶博士繼續執政一時後，到一九三二年十月讓職與馬尼博士，後者最近重又回復做國家農民黨的領袖了。他的行動對於羅馬尼亞大致可有更平民化的設施。

保加利亞在羅馬尼亞之南，也是和南斯拉夫、希臘及土耳其鄰接。在斐迪南王統治下的時候，保加利亞加入大戰站在中歐同盟國的一方面；前面我們已經述過，這一失着，在涅宜條約（Treaty of Neuilly）中已付了代價。這條約使它失去了廣大的土地，限制它軍隊只能有少數的自願投軍的隊伍，強迫它交付一部分煤產及牲畜於敵國，並加以重大的賠款。金錢的賠償起初定為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佛郎，分三十七年付清。由於國中經濟情形的貧困，此數在一九二三年減為四分之三，支付時期延長為六十年。一九二八年嚴重的地震災害後，這個規定也成了不能實行，於是再將數目減少，同時並由國際聯合會給與七釐借款金，元二千七百萬。此問題在一九三〇年又重在海牙及巴黎的會議中討論，其「最後」解決，規定由保加利亞訂約認付總數四一五、二四三、八〇八金佛郎，於三十六年分期付款。

保加利亞的人口有五、八二五、〇〇〇，它的土地有三九、八一四方哩。約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民為保加利亞人，他們大都是勤懇的農民階級，既沒有時間來怨訴戰爭的失敗，也不會用外交手腕以減少戰敗的負擔。土地比較貧瘠，耕種方法也很幼稚，畜牧植林的集體所有制又不能有良好的效果，工業更是微弱，可是保加利亞人卻仍盡力履行條約的要求。到一九二七年，他們十分滿意已經把協約國的束縛全部解除了。

保加利亞如能有一個直接通海的出口，它的經濟情形的進步一定可以更為迅速。當一九一九年協約國把保加利亞的愛琴海岸奪掉的時候，他們允許設法給它一個通過外國境界，可以充分應用的出路。在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時，曾討論到以希臘的一個海口借給保加利亞作運輸之用的問題。一九二四年，希臘和保加利亞訂

了一個草約，劃出一條希臘的走廊地帶，在國聯監視之下，由保國在愛琴海岸喀瓦喇（Kavala）地方建港應用。後來因為保國堅決要求對於這走廊的完全主權，而希臘堅持不允任何土地的割讓，遂未能成爲具體的事實。到了一九三二年，這事件就停頓下來了。

一九一八年，斐迪南退位，由他的兒子鮑立斯三世（Boris III）繼祚。這個新王很得民心，被公認爲一個有平民思想的青年，喜歡注意現代的建設，而不喜歡對於大臣們的政務多所干預。在一九三〇年，他和意大利的佐凡那（Giovanna）公主結婚，那時他是三十六歲。

保加利亞的舊憲法還是一八七〇年所制定的，後來經過幾次修改。國會名 Sobrani，是以普選制舉出，任期四年的一院制國會。一切議案均須得君主的同意方能成爲法律。人民五分之四屬於希臘正教，由大僧正會議所統轄，一八七〇年，大半爲了民族主義潮流的原故，保加利亞教會與君士坦丁堡的上級教會分離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遂將保國的教士宣告「破門」，可是到了一九二九年此項懲罰令就取消了。

戰後保加利亞的最值得注意的發展，要算是「綠色」社會主義者的興起。他們都是農民，主張國家扶助農民與社會立法，反對私產的沒收。綠色社會主義者的領袖中最聞名的人物，爲斯端布林斯基（Alexander Stambulinsky）（一八七八——一九二三年），他是農民出身，曾因恐嚇斐迪南王使勿加入中歐同盟國而入獄三年。他在戰後得握政權，簽訂和約，致力於政治與經濟的改造。

農民黨的政綱，尤其是斯端布林斯基的政綱，有以下數要點：（1）與鄰國親善；（2）那般使王國投入戰爭的

政治家應處以罰金及徒刑。(3) 嚴格遵守條約義務，俾外國的勢力得早日除去。(4) 國家扶助農民，沒收國王教會及大地主之土地，以之首先分給由割讓地逃歸的難民。(5) 制定法律限制利潤並徵收所得稅與奢侈品稅。(6) 因國家缺乏人力與財力，而條約又禁止徵兵，男女老幼對於公共工程及城市事業有無代價的從事勞役的義務。

以上這些政策的實現，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間都有了一個端緒，但斯端布林斯基的嚴酷的獨裁方法造成了許多政敵。他的唯一目標是農民階級的利益；爲了實行他的計劃，他操縱選舉，逮捕反對派領袖，封閉大學，排斥教會，嚴厲檢出版物與言論。某一次，他曾當衆演說，申明農民黨要「繼續主持國政，直至將國中爲害的頑固黨驅除淨盡，工農階級亦驅除了他們的害蟲，即律師、銀行家、利潤生活者、閒惰的政客及爲惡的空論家時爲止」。

反對黨方面，有軍隊的領袖，資產階級，知識階級，和若干穩和的農民黨分子。有人認斯端布林斯基和俄國布爾扎維黨同樣過激，而一般國家主義者對於他與舊敵的妥協態度，又深感不滿。一九二三年六月，發生了一次政變，他於是被迫去位；繼之握政權的是一個白色政府，是在蘇斐亞(Sofia)大學的村柯夫(Alexander Tsankov)領導之下，由許多教授、律師和軍官們所組成的。這個新聞以一個代表，農民黨與共產主義者以外各政黨的「民主聯合」爲後盾。斯端布林斯基去職數日後，即被暗殺，其後兩年半之間，這個資產階級的政府，運用昔日綠色黨被人指斥的同樣方法，把斯端布林斯基已成事業的大部重復破壞。

假如農民能立即集合，重以武力維持他們的勝利，他們尙易重獲政權。可是，在被人襲擊之後，他們組織的進行太緩慢了，結果只能運用暴動暗殺等手段。政府所受到的震動當然也很大，於是他們想把反對黨一網打盡。許多暴動之中最猛烈的一例，要算是當一個被恐怖黨暗殺身死的軍官舉行殯儀時在蘇斐亞的聖涅豆里亞教堂 (Cathedral of St. Nedelia) 中爆炸的一個炸彈。這炸彈，據說是共產黨員所投放，殺死了一百五十人，幾危及參與殯儀的全體開員的生命。

一九二五年末，由於軍隊的鎮壓，雖已恢復了秩序的外觀，可是顯然柯夫政府不能再持久了。一九二六年一月，一個資產階級的新內閣，以「民主聯合」的領袖馬其頓人里亞奇夫 (Andrei Liapchev) 爲首腦，繼之握政權。這個內閣主張與國聯及鄰國合作，改革財政與教育，平衡預算，舉辦墾殖事業與公共工程，地方自治，並與反對派協調。數千政治犯於是被釋放，出版檢查廢除，並准許亡命者返國。

雖然暗殺與暴動因施行這種政策而得暫息，許多政治的不滿仍行存在着，人民蠢然思動，一九二八年冬季，遂有農民整隊赴蘇斐亞京城的謠傳。穩健的農民黨此刻採取了根據憲法的反對策略，不久與民主黨、國家自由黨及急進黨相聯絡。(註)後來這四黨聯合成一集團，名曰「國民集團」，在一九三一年六月的選舉中戰勝了里亞奇夫及「民主聯合」。依照事前的約定，勝利者分配政府位置，民主黨得百分之五十，農民黨得百分之二十五，自由黨得百分之十五，其餘爲急進黨所得。一九三一年十月，民主黨員墨鄉諾夫 (Nicola Mushanov) 出任首相兼外相。一年後，他承認有改組內閣的必要，但仍能保持位置。

(註) 急進黨主張婦女選舉權，國家補助貧民，及採用複決權。

保加利亞戰後的外交，大半是以馬其頓問題的枝節為決定的。馬其頓是一個疆界未定的區域，包含發達 (Varlar) 及斯特魯馬 (Struma) 兩河的肥沃流域，它的位置在希臘、保加利亞、及塞爾維亞之間。數世紀來此地一直為土耳其所統治，可是在戰前，這三個國家都以歷史及語言的理由各認為本國所有。三國都在馬其頓的教會及學校中作廣大的宣傳，使該地的二百萬人民相信是真正屬於這國或那國的。保加利亞人的努力似乎最有成功，一九一二及一九一三年巴爾幹戰爭的結果，使它獲得該地大部分的統治權。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卻把該地的大部分給與了希臘與南斯拉夫，僅留一角與保國。於是立刻即有許多馬其頓人從他們的希臘與南斯拉夫統治者之下逃入保加利亞。保國不僅是他們的避難之所，並且是宣傳馬其頓自治或獨立的根據地。

這個統一與獨立運動是由「內部馬其頓革命黨」為領導的。這個團體於十九世紀之末成立，以米海羅夫 (Ivan Mihailov) 為首領。黨員組成武裝的別動隊，以在國際疆界上作恐怖行為與游擊戰爭為手段。保加利亞的軍隊十分脆弱，不足以禦此別動隊，因此邊界常有發生事故的恐懼。其後，希臘一面的馬其頓問題，嚴重性稍釋，原有的馬其頓住民他遷之後，許多希臘與土耳其其交換人口而成為無家可歸的希臘難民就很快地遷入其地。但在南斯拉夫，情形仍甚危迫，因為這個革命黨決意反對塞爾維亞人對於馬其頓人的同化運動。

一九二二年，希臘、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三國，聯合致牒於保加利亞，責令制止希臘及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邊境的騷亂。二年後，希臘政府又抗議保加利亞所屬馬其頓的福藤 (Voden) 村中希臘國民的橫受虐待。這個抗議

生了相反的結果，不久，此村的村長（希臘人）即被暗殺。爲報復起見，一個希臘軍官下令射殺保加利亞人十七名。一九二五年十月，邊疆爭端達於嚴重狀況，守界哨兵的衝突，卒使希臘陸軍總長派遣一個軍團開赴保加利亞五日之中，侵略者即佔有了七十方哩的保國土地。蘇斐亞的執政者不與抵抗，申訴國聯。

國聯的行政院立即召集會議，命令希臘軍隊退出保加利亞，以英、法、意三國軍官所組委員會監視之。戰爭既得避免，行政院就派遣調查團調查紛爭的起因，並建議處理的方法。十一月，調查團報告兩國均非故意冒昧行事，祇是希臘陸軍總長未加研究事實即行下令侵略，不免太莽撞了些。調查團因此建議希臘不僅不能取得其所要求的軍費賠償，並須付給保加利亞二十二萬元，以賠償其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損失。行政院接受這個建議，兩爭執國也無異言，到一九二六年三月，希臘已付清賠款的全部。此事的和平解決，不僅是國際聯合會的勝利，同時也爲保加利亞與希臘二國促進了相互的了解。希臘明白鮑立斯王的政府並非有意要造成邊界上的糾紛。在一九二七及一九二九年，兩國訂立了通商友好條約。同時，許多久懸的財政與財產權的爭執也解決了。

同時在一九二六年，若干別動隊員越過保境到南斯拉夫去攻擊一個市鎮。於是南斯拉夫、希臘和羅馬尼亞又聯合抗議了。保加利亞表示它的歉意，解釋它的實際能力不足以制止馬其頓人的活動，邀請它的鄰國對於邊境治安合作維持。這個建議被認爲妥善，於是彼此開始友好的談話。可是在同一年中，別動隊又殺死了一個塞爾維亞軍官，因此協調又復破裂。這一次，南斯拉夫決定有所行動，因爲保加利亞與法西斯蒂的意大利的友誼日進，這更使南斯拉夫感到不快。其後一年多間，保加利亞邊界遂被封鎖，襲擊與暗殺不斷地進行着。

南斯拉夫在一九二九年建立的獨裁政府不把這邊界問題認真看重，於是疆界封鎖又復取消。這樣又開了重行談判的途徑了。一九三〇年，兩國成立一個議定書，規定邊疆的管理方法，解決了幾個和約所遺下來的麻煩的地域爭執，並規定未來的爭執應以和平的仲裁解決。

希臘和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的訂約，及馬其頓人自身的分裂成米海羅夫派和普洛托澤羅夫派（Protogerovists）這兩個敵對的派別一事實，略為減少了該地的戰爭危險。但是，如果革命黨人重復聯合起來，或一派把另一派征服，或野心的政治家不以理性為歸依而憑着感情與國家主義行事，那麼，馬其頓問題又可以和從前一樣成爲新的妄動，外交的危機，和國際的敵對。所以保加利亞的前途仍是極難捉摸。

希臘

我們當記得，在一九一七年，內閣總理汾尼最羅斯藉了協約國的幫助，但是違反希皇君士坦丁的志願引導希臘加入大戰。後來，他在和平會議席上，爲他的國家謀得了許多領土的酬報，至少得到許多紙面上的酬報。他盼望在他從巴黎回國的時候，得到誠摯的歡迎，這種盼望也並非是不合理的。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他漸爲一般人所痛恨。他在一九一七年獲得政權，全靠協約國的強有力的贊助，這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他強迫希皇君士坦丁讓位於年青的亞力山大一行動，永不能得到民衆的同情。有些人民顯然又記得汾尼最羅斯的政策已使他們陷入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和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三次的戰爭，現在他們既不特別期望爲實現佛爾條約（Treaty

of *Tarbes*) 中所規定在小亞細亞應得之權利起見進行第四次衝突，又不願在三國協商的關於近東問題的計畫中充任英、法兩國的棋卒。使芬尼最羅斯更陷於不利的，就是亞力山大在一九二〇年被他的愛猴所咬而逝世一事，他死後，他的壯大而和藹的父親君士坦丁立即宣稱他準備回國。

所以，芬尼最羅斯派居然會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的選舉中慘敗而次月的民衆投票的結果居然以絕大多數要求君士坦丁回國，是不足驚異的。於是這位總理很謹慎地離開本國，讓歸國的元首從事於反抗凱末爾 (*Mustapha Kemal*) 治下的土耳其人民的戰爭。君士坦丁不僅被環境壓迫着繼續這個戰爭，而且他的地位因協約國拒絕承認他的政府並斷絕軍需品之供給而致搖動。事實上，法國適與英國發生不睦，並且祕密幫助凱末爾派。君士坦丁因此被責應負希臘在士麥拿 (*Smyrna*) 之潰敗，色雷斯 (*Thrace*) 的喪失之虞，和協約國的冷淡之咎。結果軍人要他離國，他在普拉斯戴拉斯 (*Plastiras*) 上校所領導的示威運動發生之後，第二次讓位了 (一九一三年九月)。王位歸於他的長子喬治第二 (*George II*)。

芬尼最羅斯立被召回，好教他在洛桑和平會議 (一九二三年) 盡能力所及把希臘從土耳其的糾葛中救出來。他只得放棄士麥拿和東色雷斯，答應與土耳其強迫交換人民。這樣一來希臘祇剩下四萬九千九百二十方哩的土地，其中約近一半是在一九一二年後增加的。交換人民的結果，有一百多萬難民從土耳其傾入希臘，到一九三二年人口總數竟達六百二十萬。難民的命運是悲慘的，因為希臘覺得要供給這許多源源而來的難民的衣食住，幾乎事不可能。有些賑濟物是由前美國駐土耳其大使毛根翰 (*Morgenhan*) 所主持的國際聯合會移

民委員會供給的。到一九三〇年，約有十四萬五千個家庭已經定居在帖撒利（Thessaly）和希臘所屬馬其頓，但是有許多人民仍舊無家可歸，完全依靠着慈善機關。至一九三二年爲止，用在這些不幸的人民身上的布施費總額已超過七千萬元。

這樣大量人民的被迫交換，發生了一個很艱難的外交問題，即爲清算財產的爭論。這個希土的爭論一直到一九三〇年六月纔得解決，在那個時候，兩國簽訂了一個條約，規定兩國互相否認雙方難民對抗的要求，又共同允許土耳其人民照舊居住在西色雷斯，希臘人民照舊居住在君士坦丁堡。此外，希臘承諾付償土耳其一百二十萬五千元，作爲沒收屬於「不可交換的」土耳其人的土地之賠款。這些有妨國交的障礙物既經掃除，兩國人民乃於同年十月訂立一種友好、仲裁、中立、和海軍同等的條約。

雖然希臘的土地只有十五分之一是可耕種的，人民主要的職業仍爲農業。開發十分豐富的鑛源的步驟已經在進行。有如其許多歐洲國家的情形一樣，廣大的重造森林的計劃也開始了，許多美國公司都被邀請來設計墾荒，特別是在發達河一帶地方。政府當局希望把有歷史價值的奧林帕斯山（Mt. Olympus）改造爲略仿美國式的國家公園。（註）所從事的公共工程需要大宗款項，但是希臘在國際上的信用地位是好的，所以訂立借款契約並沒有困難。在一九二七年，國幣（drachma）被固定爲一·二五七七分，在一九二八年，新設立的希臘國家銀行開始營業了。

（註）希臘人的生活優美如畫，這可拿自治的亞陀斯山（Mt. Athos）僧侶共和國爲代表。這個地方佔有一百二十方哩，是由一個希臘總

喬治治的，它被免除租稅，並且是該地希臘正教的僧院的不可割讓之產業。婦女不准入境遊覽。

喬治第二的統治，以混亂與不安著稱。國內盛行極端的新聞檢查制度，軍隊中常有處決犯人之事，而保皇黨與芬尼最羅斯派（他們的大多數不久表示傾向於共和）之間的衝突愈趨愈有復仇心了。最後，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芬尼最羅斯派在選舉中獲得勝利之後，要求國王和王后離國，同時國會決定將來的政體。海軍大將孔度立的斯（Paul Koundouriotis）被任命為攝政者，次年三月，國會宣布廢去王朝並成立共和國。這種行動復由一九二四年四月的民衆投票加以擁護，攝政者變為臨時大總統。

在共和政體下的政治現象，顯見得和在君主政體下的一樣杌隉不寧。不久，孔度立的斯被潘格羅斯（Panagos）將軍奪去政權，接着後者又被康狄立斯（Condylis）將軍驅逐下臺。於是孔度立的斯再度柄政，維持他的動搖的總統位置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十二月，他因病辭職，由柴米斯（Alexander Zaimis）繼任，柴氏在當選時是上議院議長，並做過八次內閣總理。新元首既是國會選出來的，似乎共和國已站在很穩固的地位了。然而，喬治王從未正式退位，祇是在不加勒斯多作寓公，顯然在等待機會捲土從來，並始終為國內保皇黨黨人的首領。

其時已離開本國，隱居故鄉克里特（Crete）的芬尼最羅斯又於一九二八年回來，領導着自由黨博得選舉中的勝利，這次的選舉非常不幸，種種暴行與綁架候選人的事件是它的特色。這位國家元老遂第五次成為內閣總理。此番他柄政幾年，到一九三二年五月纔下臺，在任期內完成了很多重要的改革。表面上的秩序總算得以

恢復各種公共工程業，經猛力進行，農業得到資助，教育制度與公共衛生行政皆有改善，工人保險法經過討論，最後的債務清償方法已與美國商妥，賑濟難民的新借款到手，與諸鄰邦和從前的協約國間的友好關係亦經確立，以上一切都是他的成績。汾尼最羅斯似乎很贊成巴爾幹聯盟，作為趨向於完成法國白里安所主張的汎歐羅巴計劃的一種步驟，但是國家主義者的妬忌心常常阻礙這一方面的進展。

儘管有政府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希臘共和國在一九三〇年後的經濟繁榮有江河日下之勢。對外貿易減少了，失業增加了，直到最後，總理決定停付外債，並利用這樣節省下來的金錢於公共工程的建築。然而此種辦法充其量不過有暫時的價值，而汾尼最羅斯於未解答這個經濟之謎時就退避賢路了。接着經過七個月的長時期，希臘才有另外一個比較穩定的政府組織成立（此番又是汾尼最羅斯為總理），這正反映着那時歐洲一般不安定的狀況。

戰後希臘的外交問題是很棘手的。它與土耳其對於和平條約的條款所發生的困難，及與保加利亞所發生的關於馬其頓局勢的糾葛，前面早已述及。與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國交，有一個時期也是煩惱的。意人於一九一二年的土意戰爭後，即統治着愛琴海中的多得卡泥斯羣島，這引起希臘人的大規模的領土回復運動，因為這些島嶼上的居民大半為希臘人。然而意人為了軍事上和國家主義上的理由，堅持不肯交還這些土地，特別因為希臘不願把別的好處來交換。一九二三年，當時有幾個意大利軍官幫助劃定阿爾巴尼亞南部與希臘北部之間的界線，兩國的國交情形更加嚴重可危。

由希臘人看來，所爭執的幾點之決定，大多數都偏利於意大利的被保護國阿爾巴尼亞。不論這種責難是否真確，四個意大利委員終在希臘國土上被暗殺了。羅馬馬上向希臘政府送致哀的美敦書，這使人回憶到一九一四年奧國向塞爾維亞提出的最後通牒。意國所提出的要求為正式道歉，賠款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准許意大利的使館武官協助逮捕兇手，此外還有幾項。接受此項哀的美敦書的時限為二十四小時。希臘拒絕其中幾項，以為侵犯它的主權，並籲求國聯援助。

在國聯能够採取行動之前，意大利便砲轟並占領科佛島（Corfu），殃及很多被招集在該島的阿美尼亞難民。同時意人對於國聯公然干涉此項爭執的意向，大表不快。因此國聯圓滑地把這件事交與巴黎的大使會議辦理。這些外交家於適當之時期判決希臘在暗殺案中犯有過失，但意國的美敦書未免太苛刻了一點。所以大使會議建議希臘應向意國道歉，給與死者軍人的禮遇，緝拿並懲處兇手，付償賠款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意國軍隊則退出科佛。大使會議的意見經兩國容納，於是意、希的國交漸有改善。在某一個意義上，這種結果是國聯的勝利，但它也很確鑿地表明國聯對付大國，不能像對付小國一樣容易和有力。

希臘與南斯拉夫的主要爭執起自一九一三年希臘與塞爾維亞的條約，在此約中，前者已允許給予後者薩羅尼加港內的自由地帶。大戰的發生，使最後的協定不得不延擱下來，但在一九二三年，兩國簽訂了一件新條約，規定給予南斯拉夫在薩羅尼加（Salonica）自由地帶（占面積九四、〇〇〇方米突）五十年的保有權。這個區域仍受希臘的法權與警政的監督，但其海關由南斯拉夫管理，往來於該自由地帶與南斯拉夫之間的貨物

應免徵稅。此項協定於一九二五年施行，但其效果不佳。

南斯拉夫人訴說，那個地帶的廣袤太小，不能供牲畜運輸的便利；羅尼加與他們的邊鎮基美基里（Chab-Sheil）之間那段長四十八哩的鐵路管理腐敗；列車的速度太慢，以致易壞的貨物常受損害；並且運費定得過高。因為此時希臘正切於與這個鄰邦訂立可比戰前的希臘——塞公約的同盟條約，所以雙方的談判在一九二六年重開了。同時鐵路上的運費頗有減少，車務方面亦經改良。雙方所訂立的協定規定擴大自由地帶一萬方米突，委派南斯拉夫人一名為鐵路的理事，將將來一切關於那條鐵路的爭議提交法國的仲裁人。然而這個協定從未經過批准，因為商訂該協定的希臘政府於商訂後馬上就被推倒了。

這兩個民族之間的惡感顯然日有增加，直到芬尼最羅斯於一九二八年重新柄政時纔有所改善。他在最早的時候聘問南斯拉夫首都柏爾格雷德（Belgrade），並促成一九二九年的談判的重開。這一次兩國的政治家的努力總算得到成功，雙方所接受的妥協條件如下：（一）那個自由地帶仍限於原有的面積；（二）那條鐵路應仍由希臘完全管理；（三）希臘當付與南斯拉夫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金佛郎，以清償南國人民對於那條鐵路的一切權利要求；（四）車務應再加改良與整理；（五）運費應減至公平的水準；及（六）將來所有關於該地帶或該鐵路的一切爭論應提交兩國共同委派的公斷人或提交國聯仲裁。

這樣一來希臘跳過了有妨親善的對外關係的最後一個大障礙物。芬尼最羅斯馬上竭力利用這種順適的情勢，而與意大利（一九二八年），南斯拉夫（一九二九年），保加利亞（一九二九年），和土耳其（一九三〇

年）分別締結了友好與和協的特別條約。這些條約殊有助於緩和俾擾不寧的巴爾幹的緊張局面。

南斯拉夫

一九一七年夏季，一羣南斯拉夫的領袖人物，代表塞爾維亞及奧——匈帝國的南斯拉夫諸省者，會於科佛，訂立了一件公約，宣佈他們建立一個新國家，一個「立憲的，民主的，國會的王國」，亦即所謂「塞爾維人——哥羅西亞人——斯洛文人的王國」(Kingdom of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的願望。這幾種民族從來沒有結合為一個國家過，每個民族都切欲保留某種特權。現在他們大家同意以塞爾維亞人統治王國，並採用適當的國旗，雖然他們三族的舊國旗仍可以隨時升懸。再者，因為塞爾維亞人慣於用賽利爾的字母(The Cyrillic Alphabet)，而哥羅西亞人和斯洛文人卻使用拉丁文，因此規定兩種文字都同樣保留。又因塞爾維亞人大多數信奉希臘教，哥羅西亞人和斯洛文人大半信奉羅馬教，而回教徒亦有一、六〇〇、〇〇〇人，因此這三教都得到平等待遇的保證。國民議會應儘速用普遍的，祕密的，和直接的選舉制選出。但是這個公約裏面並未表明將來的政府究係單元制抑聯邦制，這個忽略被注引起很大的困難。

新國家是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依照這些概念，在塞爾維亞老王彼得統治之下，組織成立的。然而實際的統治者卻是彼得的兒子亞歷山大。他自一九一四年後曾經做過他父親的攝政，並於一九二一年以他自己的權利成為君主。就其最後的組織言之，這個王國包括前塞爾維亞、蒙特尼格羅、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達爾

馬提亞哥羅西亞、斯洛文尼亞及卡尼鄂拉(Carniola)士的里亞、特默斯發的巴納特和保加利亞的西部等地的一部分，總計有面積九六、一三四方哩。在一九三一年，它的人口計達一三、九〇〇、〇〇〇人，其中百分之四六六塞爾維亞人，百分之三七是哥羅西亞人，餘則爲斯洛文人。此外並有幾十萬羅馬尼亞人，而德國人和馬扎兒人各占五十萬。哥羅西亞人比之塞爾維亞人與斯洛文人西方化得多，而哥羅西亞的首城紮格勒布(Zagreb)也比塞爾維亞的京城柏爾格刺得來得「摩登」。

差不多從塞——哥——斯王國得到獨立的生存之初起，人民就爲了建立那一種中央政府問題分成兩派。將新國家看做大塞爾維亞(Greater Serbia)的一派，贊成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單元政府，號令出自柏爾格刺得。主張這種見解的首要人物，爲年邁而矍鑠的首相帕希區(Nicolja Pašitch)(一八四六——一九二六年)，他在大戰發生時曾任政府的首領。反對中央集權的是哥羅西亞的農民黨，其領導者爲拉地區(Raditch)(一八七一——一九二八年)，他是一個短小精悍，感覺銳敏而近視的人，又是一個激烈而奇怪的演說家，爲哥羅西亞人的自治隨時準備犧牲生命的人。

各派都有論據提出。帕希區聲辯道，從匈牙利取得的幾個區域的落後情形，使地方自治成爲反常的事。他又說，塞爾維亞人因人數衆多之故，事實上一定會支配政府，這也是應該公認的事實。最後，改造的問題嚴重得很，需要最愛國的和一致的動作，這種動作由一個中心點——柏爾格刺得所指揮。拉地區對於這種抗辯置若罔聞。他說明哥羅西亞人前在奧大利統治之下，已享受過相當程度的自治，因此有繼續管理他們自己事務的權利。他又

指出哥羅西亞人比塞爾維亞人進步，所以不應隸屬在他們之下。他又提醒帕希區道，哥羅西亞人與塞爾維亞人的聯合完全是出於自願的，所以他們至少有制定他們自己地方的法律之權。

這個問題酣鬪了兩年，國王拒絕召行國民會議的選舉，除非疆界的爭端已經得到了調整。最後，待至一九二〇年之末，召行選舉的命令發出了。拉地區的哥羅西亞農民黨選出代表五十人，但是這些代表遵從他的訓令拒絕就職。所以這個國民會議，大部分由穩健的民主派和帕希區的急進的塞爾維亞黨徒組成。在一九二一年，拚命反對聯邦而贊成「保守」的對內政策的「急進派」，進行採用一種滿足他們酷愛的希望的憲法。許多穩健派中止最後的投票。

這個憲法規定了完全的中央政府集權制。舊的省界皆被取消，地方議會亦經廢止而代以一個全國國會，即一院制的（Skupshina）。人民有普遍選舉權，但只能選舉國會議員和少數地方官吏。再者，地方官吏應對中央當局負責。用一個有經驗的觀察者的話來說，這種憲法將過度的權力賦與了柏爾格刺得的一羣「無能力的朋黨」之手。

這個憲法被採用之後，南斯拉夫人民所碰到的最緊急的國內問題，便是此項憲法之「修正」。直至一九二四年，哥羅西亞人拒絕參加任何種政治生活。他們同盟抵制國會，並隨地阻撓行政機關。拉地區本人消磨了大部分時間於獄中或國外。然而到一九二四年，他得到這樣的結論：若將破壞的策略在國會中運行，當更見效，因此他允許哥羅西亞的議員出席於國會。結果帕希區政府被迫辭職（一九二四年三月），此後有許多短命的政府此

起彼仆，而代表們在立法機關的樓板上互相投擲的各種攻擊之詞，使這種單調添了不少生氣。國王在絕望中召回帕希區，他竭力進行打倒反對派，以叛國與陰謀之罪名拘捕拉地區，並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下令舉行新選舉。政府憑藉一切強硬的方法以求得勝，但哥羅西亞人和以前一樣選出很多代表。因之反對黨仍舊很有力量，足以打倒政府的許多議案。

拉地區在牢獄裏住了一些時，再行決定改變方法，這一次他宣佈他當承認一九二一年的憲法，並願在國會裏合作，惟須給予他的黨徒在政府裏的位置。內閣決定接受他的提議，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被釋放了。出任教育部長。然而其時私人的情感作用已深深地參雜在爭端裏，以致拉地區不能不對帕希區及其他閣員加侮辱，直至最後合夥又告分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帕希區之逝世非惟不能終止爭論，且又奪去主張中央集權者的最有能力的人物。

國會內和民間的糾紛馬上變為混亂狀態。有幾次不得不請警察走進國會鎮壓代表的打架，街上的騷動和暴行亦漸成常事。至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混亂達於極點。是日，拉地區在國會開始猛烈攻擊，政府的提議批准與意大利所訂立的涅圖諾協定 (Nettuno Convention)，他訴說這個協定，是以哥羅西亞農民為犧牲而妥協的。擁護政府的代表，為這個排斥所激怒，跳起來拿手槍對着哥羅西亞的代表射擊。有兩個被打死，幾個受傷，包括拉地區在內。八月八日，拉地區因傷致命，於是這個已死的領袖成爲一個聖者和一件傳奇。

哥羅西亞的代表們結羣從國會中退出。他們再集於紮格勒布，決定凡是柏爾格刺得的殘餘國會所通過的

法律，一概置之不理。哥羅西亞人在他們的新領袖普利比區維亞（Pribitchevitch）和馬柴克（Matchek）兩人領導之下，與幾個達爾馬提亞的代表聯合起來，揚言欲建立他們自己的國會，與中央政府斷絕關係。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哥羅西亞的人民拒絕參加王國成立十週紀念，當一個軍事總督奉派從事解決全部問題的時候，他的召集地方會議的命令也無人加以注意。自拉地區死後，國會的政府完全崩潰了。南斯拉夫國比較微弱，它的四周圍都是與它不睦的國家（其總人口，比它的要多五倍餘），從這種情形看起來，當時南國的地位是極端危險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亞歷山大王到巴黎去，表面上是為訪醫，當然也為了和法總理普恩加賽商談事情，因為自一九二七年以後，法國人是他的最強的和最親睦的同盟者。亞歷山大從法國回來後，便於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解散國會，廢止憲法，設立嚴格的檢查制，壓制政黨和政黨的活動，禁止人民攜帶軍器和舉行政治的集會，建立一個忠於國王的獨裁制，由他個人負責的內閣執行職務，用號稱無情的齊芙柯維亞（Zhivkovich）將軍為首相。內閣大臣中有塞爾維亞人、哥羅西亞人、斯洛文人、波斯尼亞人和達爾馬提亞人。國王現在是一個專制君主了，他宣稱當國內秩序再得建立和對外的友誼關係恢復之後，各種限制即當馬上除去。

亞歷山大是一個幹練的人和一個有才能的軍官，他懇求臣民忘去他們的地方偏見及為塞爾維人、哥羅西亞人或斯洛文人的出身，只要記牢他們都是南斯拉夫人。為着重這種懇求起見，王國的名稱經國王以一九二九年十月的敕令改為南斯拉夫。以前三十二個行政區域一律取消，另外創立九個新省，拿地方河流的名稱來取名。在六個省份裏塞爾維亞人佔大多數。

一九三一年九月三日，國王頒佈新憲法。其中限制組織政黨，承認三種語言平等，設立兩院的國會，即參議院和衆議院。參議員的任期爲六年，其半數由國王指派，半數民選。衆議員的任期四年，由全國年齡在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子與女子選舉。中央政府有廣大的權力，各省由國王所任命並對國王負責的省長治理之。後來又通過了選舉法，規定所有選舉都用口選，得票最多的政黨在衆議院中可得三分之二的席次。其餘的席次應按得票比例分配於其他政黨，但是凡不滿五〇、〇〇〇票的黨派不得推派議員。同意大利一樣，只有一張全國選舉的名單。

根據新制的第一次選舉，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舉行，並且是祇關於下院的。選舉名單中有一、三三〇個候選人的姓名，其中三〇五名應由人民選出。所有候選人的姓名都被列入國民黨一項目之下，首列的姓名就是齊芙柯維區將軍。國民黨是以前許多大黨併合組成的，三〇五個當選人中有一四五人從前曾與塞爾維亞急進黨攜手，五十七個曾加入民主黨，二八個是哥羅西亞農民黨人。齊芙柯維區因爲連在塞爾維亞人中都不孚衆望，所以只能保留他的首相職位到一九三二年四月。於是他的位置爲他手下的外交大臣名馬林柯維區博士 (Dr. Marinkovich) 所取代，其餘的閣員都沒有更動。

哥羅西亞人力求抵制這種大規模地使政府和人民「塞爾維亞化」的企圖。儘管有嚴厲的監視，他們的不滿仍在許多場合表現出來。即當塞刺耶服城豎立普靈西浦 (Princip) 刺殺與太子斐迭南大公的人) 的紀念碑的時候，也有人吐露憤慨。後來有一個少年南斯拉夫社 (Mlada Jugoslavia) 在哥羅西亞人之中開始恐怖的行動。這個團體所犯的最顯明的不法行爲，便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在絮格勒布城的街上殺害一位著名的歷史家，

紫格勒布大學的教授薩夫萊 (Saffray) 及在一九三二年六月襲擊著名的法學家和哥羅西亞的民族主義者布達克博士 (Dr. Budak) 的事情。這些事變並沒有減少對於地方自治的堅決要求。

這位獨裁的國王所遇到的問題，並非單單民族主義者的困難而已。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因保有的土地面積太小而表不滿，雖然政府當局曾作打破大地產的各種努力。南斯拉夫國家缺少適當的海口，受國內交通系統窳陋的苦痛，以致凡可利用的鑛源都難以開發。再者，這個王國又欠有鉅債，它須負擔戰前和戰後全邦各部分的一切債務。

南斯拉夫的外交關係，在他章中有關聯的地方已經討論過。我們曾經述及它曾爲小協商國之一員，曾反對海布斯堡王族在奧——匈復辟，曾與保加利亞對於馬其頓人的問題發生爭執，曾與意大利因爭阜姆及阿爾巴尼亞和亞得利亞海之支配權而起衝突，並曾與希臘發生關於薩羅尼加自由地帶的糾葛。在這種種情形之下，南斯拉夫堅決地依附於與法國訂立的一九二七年之同盟，法國是它的朋友，保護者和債權者。這時王國與巴爾幹各國之間的真正親善的關係，似乎大部分要靠它自己的境界內先建立了和平與和睦。

第二十章 土耳其人的土耳其

從色佛爾到洛桑

協約國起草的色佛爾條約 (The Treaty of Sevres) 是那聲名狼藉的土耳其皇謨漢默德六世 (Mohammed VI) 所派的代表，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把牠簽署的。當時土耳其政府如果把那簽署的條約加以批准，那末從前具有光榮歷史的鄂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的疆土就要被減縮得祇剩小亞細亞沙漠縱橫，高山林列的不關重要的地方，而與西方的文化和外交遠遠隔離了。但是國運幸有轉機，使之轉變的人物，就是一位少年軍官穆斯塔法氏 (Mustapha)。

穆斯塔法氏出身大族，以一八八〇年生於薩羅尼加 (Salonica)。他在摩拿斯提 (Monastir) 高級小學裏得到獎學金之後，就不再願在該校繼續肄業，而投入了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軍官學校，去過他的軍人生活。他在軍校中，數學的成績很優越，他的教授為獎賞他起見，就賜給他一個名字，叫做凱末爾 (Kemal)，這是表示「完善」的意思。軍人生活頗投穆斯塔法之好，他不久就養成爲一個模範的軍人，同時他很專心於閱讀法國革命文學，並且是一個反對土耳其獨裁政府的人。雖然他的革命傾向無疑地被土皇哈米特二世 (Hamid II)

的偵探知道了，但是他那時尚未畢業，土國警察祇好忍住不遽予逮捕。接着他暫時被放逐到很遠的達馬士革（Damascus）的騎兵隊裏去，這是他一生遭遇中最嚴重的事情。他住在那裏，很有充分的時間去思考惡政的流弊，同時他又組織了一個祕密的政黨，叫做「伐丹」（Vatan）或「祖國」黨。

當一九〇八年少年土耳其革命的時候，凱末爾擔任開往君士坦丁堡的軍隊司令喜芙凱特（Shevket）的參謀長，並強迫土皇哈米特制定憲法。當時少年土耳其的統治機關「聯合進步委員會」的糊塗策略和政治陰謀誘使穆斯塔法氏專心一致於軍務與軍事上的改革。一九一〇年，他到法國畢加的地方研究陸軍的演習。在學成歸國的途中，他在巴黎逗留了幾天，對於東方西方的不同之點，很有深刻的印象。他所最受感動的，就是婦女地位的比較自由，官商生活的進步，和一般教育的普及。

當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土意戰爭之際，凱末爾曾在的黎波里（Tripoli）地方參加作戰，並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中證明了他是土耳其頂優越的將軍之一。雖然他反對土耳其在一九一四年時機未熟的當兒就參加歐戰，並公然疑慮德國最後的勝利，但當世人共知穆斯塔法於一九一五年在加利波利擊敗協約國的聯軍的時候，他已確立他的威名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無怪凱末爾因協約國以莫特洛史休戰協定（Armistice of Mudros）哄騙土耳其（一九一八年十月）而忿怒了。休戰協定裏所列各款異常酷烈，以致應負戰禍責任的聯合進步委員會終逃出首都。穆斯塔法在盛怒之下，在巴力斯坦放下了軍符，急急奔歸君士坦丁堡，旋奉土皇之命往阿那托力亞（Anatolia）

就總監之職，從事處理邊境軍隊復員的事務。他到了那裏之後，就使用他的委扎集合了一個新黨——土耳其國民黨的幹部人員和一枝烏合的軍隊，這枝軍隊的組織據說是包括着：「當地的綠林英雄，俄國的布爾扎維黨人和拔古隄子」。

其時（一九一九年五月），希臘遵照英法決定的步驟，不讓意大利帝國主義者在阿那托力亞地方的企圖着先鞭，遣派了軍隊開到土境的士麥拿登陸。這個著名的海口的被侵掠，激起了土耳其全國人民的愛國心。凱木爾抓住這個機會，從事於統一國內的國民黨黨人的工作。一九一九年七月，他所召集的國民黨大會，就在埃爾斯倫（Erzurum）開會了。大會所討論的都是關於該黨的將來政策。兩個月以後，又在錫伐司（Sivas）召開了第二次大會和其他各種代表大會，對於埃爾斯倫大會的各項決議案予以承認。在這些會議中，還奠定了土耳其國民公約（Turkish National Pact）的基礎，這個公約即為君士坦丁堡國會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所採取的原則的申述，那個國會是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選舉的，其過半數的議員為國民黨人。

公約中共列有六大條款，如沒有它，則「土耳其回教國皇的領土與社會的繼續存在」，即不可能。首列三條是關於適用自決的原則於居住於舊土耳其帝境內的多數土國人民。第四條要求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但贊成開放海峽為「世界商業的交通孔道」。第五條「承認並保證」土耳其少數民族的權利。最後一條要求取消或限止有損土國「政治的，司法的，財政的和其他的事件的發展」的外國條約。公約裏說道：「土耳其在確定其發展方法的事件中，應該同世界各國一樣，享有完全的獨立和自由，因為這是（土耳其的）生命與繼續存在的基

本條件」。

國會裏的國民黨員的希望過奢，他們以為協約國可以允許他們遵着公約內所定的原則進行。在公約採用了不到兩個月內，英將米爾納（Milne）率領了英國軍隊，開赴君士坦丁堡（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五日）宣佈戒嚴，盡量逮捕國民黨的代表，並將其中四十個放逐到馬爾太（Malta）。許多漏網的國民黨代表都羣向阿那托力亞中北部的昂哥拉城（Angora）逃命。他們在昂哥拉設立了一個殘餘的國會，定名叫做「大國會」。當土皇在君士坦丁堡另行召集一個國會的時候，土國就有了兩個統治機關：一個是隸屬於土皇之下而由協約軍維持的；另一個是以土耳其人民的愛國為後盾，並受着將昂哥拉與君士坦丁堡和協約軍分開的高山廣漠的保護的。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昂哥拉國會舉行第一次會議，當即推舉凱末爾為總統，並為「國民軍」總司令。這個國會因決定『在土皇和土國京城被外人統治和佔領的時期內支配土耳其現在和將來的國運』，就着手起草土國的新憲法。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遂採用了一種「基本組織法」；這個組織法，經過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的修正後，將土耳其的主權授與全體國民及昂哥拉國會的議員。議員應由年滿十八歲的男子選舉（一九三一年改為二十一歲），任期四年，行政權屬於總統和責任內閣，司法人員由國會委任之。這個憲法並擬定了改造社會的精密秩序。

當國會從事於憲制的時候，國民軍總司令凱末爾開始驅除駐在國內的外國軍隊的戰役。凱氏此舉博得很好，軍人榮譽，並獲得「征服者」（Ghazi）的稱號。一九二〇年九月，和蘇俄成立了友好關係之後，凱末爾氏即

行侵入最近建立的亞美尼亞人的埃里溫（Erivan）共和國，擊潰亞美尼亞的防守軍，不久就把喀司（Kars）和阿達罕（Artahan）兩個省分行歸併於土耳其的版圖。

其時希臘的三枝軍隊，受了英國海軍的援助，把色拉斯地方的國民軍驅逐出境，並直向東部阿那托力亞進發，遠至烏沙克（Usak）地方。然而希臘軍隊的這種勝利，不久就因出人意料之外的外交發展而遇到挫折。希臘首相芬尼最羅斯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的國會選舉中慘遭失敗。希臘的侵土行爲，芬尼最羅斯實負其責，因爲他要想取得未經批准的色佛爾條約內所給予的土地。再者，英國之援助希臘也不像以前那樣熱心了，同時法國人由於厭惡希臘國王，妒忌英國在近東的發展，並因法國軍隊曾被土耳其國民軍在敘利亞的西北部西里西亞地方打敗而沮喪，所以公然袒護土耳其人了。再後，意大利因爲自己覬覦士麥拿，故對於希臘的冒險行動，從來沒有表示同情。因此列強於一九二一年二月企圖在倫敦以希臘爲犧牲而修改色佛爾條約。後來當士、希臘兩國的要求有不能調和的形勢時，雅典政府就不顧協約國最高會議的勸告，決意爲自國的利益施行原來的條約。一九二一年五月，協約國對於將要發生的土、希臘戰爭，正式宣佈中立。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日，希臘即開始向土國取攻勢，這使他們能在八月底前直抵昂哥拉不過五十哩的薩卡里阿河（Sakharra River）。於是希臘軍隊的進攻之力已竭，不能再有進展。從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軍備不齊但軍心奮發的土耳其人，把兵力超出三倍的敵人擋住了。在凱末爾大勝的薩卡里阿一役之後，希臘軍隊便開始總退卻。他們的退卻是遵着故道的，後來停留在小亞細亞，佔領其大部分區域一整年，但到一九二二年九

月，他們甚至被迫退出士麥拿了。軍力的衰竭，領袖的無能，國內形勢的不隱，以及煽動的宣傳都足以使希臘軍隊的士氣變弱，以致他們覺得不能抵抗土耳其國民軍有加無已的壓迫了，其時土軍已獲得較好的軍備，其熱誠亦隨戰事的進展而有增加。

當穆斯塔法氏在戰勝的盛勢中，計劃着越過海峽，把東部色拉斯（Thrace）的希臘軍隊驅逐出境的時候，他就重與英人直接接觸了。在協約軍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宣佈中立的當兒，曾規定海峽兩岸的特定區域當認為不准有戰事的中立地帶。現在勞合喬治為顧慮達達尼爾海峽（The Dardanelles）的支配權問題，極力主張實行該項中立的規定，並決意阻止土軍在色拉斯與希臘交戰。然而，法、意兩國都不肯做英相的後盾，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法國就和凱末爾黨人訂立了一種協定，允將西里西亞的法軍撤退，並允將敘利亞北部的疆界，加以修正，以利土國。同時土國也承諾對於法國所要求的財政權和開鑄權，及一部分巴格達鐵路的租借，予以好意的考慮。意大利也於一九二二年和昂哥拉訂立了一種協定，根據此協定，土國答應對於意國人民使用小亞細亞，鑛山和公共工程的要求，予以善意的考慮。因此勞合喬治只得單獨行動了，他就派了大批援軍到產那克地方，以阻止土、希軍隊在海峽中立地帶衝突。

在某一個時期，戰事似乎迫於眉睫，但後來英軍司令終勸說穆斯塔法以會議的方式和平解決兩國的爭端。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土、希在木達尼亞（Mudania）簽訂了停戰協定。希臘軍隊奉命立刻退出色拉斯，並將遠及馬立乍河（Marisa River）的色拉斯全境交還土耳其政府。英、法、美、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蘇俄、日本、希臘和

土耳其諸國接到於十一月二十日在洛桑開會的請柬，這次開會的目標，乃在修正色佛爾條約以適應新的局勢。土耳其的和平條約，顯然和它的大戰時期的同盟國所有的不同，將是一種平等的協定，而非命令式的。在第一次洛桑會議開會還不到三星期之前，土耳其的「大國會」就把土皇謨漢默德六世廢去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但要到一整年之後，即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立法機關才宣佈土耳其為一共和國，並一致選舉穆斯塔法氏為第一任大總統。

在洛桑會議裏，土耳其首席代表伊思美（Ismet）明白地昭示各國道：凡是限制土耳其經濟上或司法上的自由的條約，他們一概不簽署。因之大會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實際宣告破裂，但到四月二十四日，會議又得舉行。伊思美堅持他的立場，不肯讓步，不久，英國的首席代表寇純爵士（Curzon）被撤回，代以較為中和的洪保德爵士（Humbold）。會議一直拖延到七月二十四日方纔告竣，其故僅因土耳其人實際上已取得他們在一九二〇年的國民公約裏所要求的一切。祇有摩蘇爾（Mosul）問題，即土耳其和英國所轄伊拉克（Iraq）之間的疆界問題，經會議保留，以待將來解決。

依據洛桑條約的條款，土耳其恢復了遠及馬立乍河之西的東部色拉斯全境，連亞得里雅那堡（Adriano-ple）（現名厄狄耳涅 Edirne）在內。此外，土耳其又得恢復馬立乍河西岸的橋頭堡壘和鐵路中心（在喀拉加克），這是向希臘要求賠款而得到滿足的。君士坦丁堡亦經歸還而成為土耳其領土完整的一部，但是海峽地帶不得駐軍，開放於各國的船舶，不論其裝載的貨物為何種類，在平時與戰時（惟以土國為中立國時為限）都可

通行無阻。倘遇土耳其爲交戰國時，敵國的船舶不得開入海峽，但中立國的船隻，仍不在此例。

在愛琴海中，土耳其保留着印勃洛司島 (Imbros)、鄧納獨司島 (Tenedos) 和兔島 (Rabbit Is.) 等，但多得卡尼斯島、羅特島 (Rodes) 和客司德洛立熟島 (Castellorizo) 都割讓於意大利。愛琴海中的其餘各島，大多數歸於希臘。土耳其和法國在一九二一年所商定的敘利亞邊境則加肯定。大家的意見又規定將加利波利半島 (Gallipoli Peninsula) 上的一塊小區域叫做安紮克 (Anzac Area) 的，永久給與英、法、意三國。在這個地方，英、法、意三國得指派看守人前去看管。一九一五年一役陣亡兵士的墓穴，但這個區域不得加以建築或有防禦工事。土耳其放棄對於利比亞 (Libya)、埃及、蘇丹、巴力斯坦、伊拉克和阿拉伯各王國的一切要求，承認英國的合併賽浦路斯 (Cyprus)。爲酬報土耳其答應改革司法並遵守關於少數民族的權利的規定之諾言起見，一切屈辱條約皆經廢除，各協約國的大戰賠款要求統歸放棄，同時外人管理的海關歸爲自管，對於土耳其的海陸空軍不復加以限制了。在附加的土、希條約裏，又有土、希兩國強迫交換人民的規定。另一附約則規定在東部色拉斯的土、希、保三國的邊境，不得駐紮軍隊。土耳其現在的面積爲二九五、〇〇〇方哩，其人口約達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人以上。土耳其在許多年中此刻是第一次和世界保持和平了，她終究現在可以來把國內整理一下了。

土耳其人希臘人古的斯坦人

土耳其國民黨切於把國內一切非「土耳其人」的民族驅逐出境，特別是要將他們逐出土國的亞細亞邊

部分。因爲一九二三年土國大部分的「非國民」都是希臘人，所以土希兩國政府，在洛桑會議裏便共同商定互換大批人口，主要以宗教的信仰爲基礎。這個建議，是南生博士（Fridtjof Nansen）以國聯近東賑濟監督的資格所提出，作爲解決土希少數民族問題的方法的，並且是在特別組織的混合委員會監視下實行的。

因實行交換人民的進程所致的不幸，真是不可言喻。最難解決的，就是不能決定那一個家族當認爲土耳其人或希臘人，特別因爲他們最初的遷移，發生在一百或二百年之前的。此外，在阿那托力亞還有許多希臘正教的基督徒，他們只會說土耳其話；在希臘國裏，又住有許多只會說希臘言語的回教徒。此外，官吏辦理的失當，向例的殘暴，及怠慢忽略往往是很明顯的，因爲種族的和宗教的深仇痛恨，決不容有對於各階級的公平與人道之待遇。欺詐與舞弊成爲常事，而官吏的漫不經心常致將習居於山中者移殖於平原，而將平原的居民反移殖於山中去

了。

總共算來，約有一、〇〇〇、〇〇〇人被送到希臘，四〇〇、〇〇〇人被送入土耳其。希臘人不幸的遭遇，因爲美國近東救濟會特別集中力量於援助希臘人民，同時雅典政府，因本國是國聯的會員國之一，也能籲求國聯加以援助，稍爲減輕一點。由人口交換而發生的財產爭執，繼續使土希的關係趨於緊張，直到一九三〇年六月纔得弛緩。接着雙方成立了妥協的協定，數月後復有兩國友好條約的簽訂，這在第十九章中已經講過。其時土耳其人又通過了一件法律，禁止以居留爲目標的大批外國人民的移殖。

希臘人被驅逐之後，所餘足爲土耳其人種純一問題的最大障礙者，就是百多萬的古的斯坦人。他們居住在

土耳其東部的前阿美尼亞諸省和古的斯坦(Kurdistan)。這些比較草昧的種族（他們的語言頗近波斯語而與土耳其語較異）仍舊爲忠於部族的精神所灌注。而無土耳其國家主義的色彩。這般古的斯坦人種久已是土耳其的人民中最難駕馭的，他們在新土耳其其下依然囑強得很，尤其是因爲色佛爾條約所許予他們的獨立希望被洛桑條約擊得粉碎以後。一九二五年二月，當土耳其當局以叛亂罪名逮捕幾個古的斯坦人的時候，一般的不安結晶爲公然的背叛了。但是這個暴動馬上經當局撲滅，殘暴是免不了的，六月，叛黨首領被處死刑。

這次事件似乎真正增加了全國的團結。一般忠心的土耳其人羣起爲中央政府的後盾，政府乃藉此機會增強國內的軍事統治權，箝制君士坦丁堡一家多少帶批評態度的報館的評論，廢除一般仍在國民中潛勢力的法師，回教僧及其他宗教的或半宗教的官吏的職位和鮮明的服裝。

一九三〇年又發生一起嚴重的古的斯坦人的暴動，當時政府認爲非常緊要，即遣派了五萬五千人的軍隊和很多飛機，去鎮壓那些叛徒在叛亂的過程中，土耳其政府譴責波斯當局疎於巡邏土、波邊境，並准許古的斯坦人退入波斯國境。在一九三一年，當若干古的斯坦人企圖從波斯越境而入土國的時候，兩國間的不睦愈有增加了。然而在一九三二年的上半年，土、波邊境的問題略獲調整，這是互相有利益的。現在，土耳其除有古的斯坦人的民族運動的可能威脅以外，它已免於任何少數族的紛擾或領土回復主義者的麻煩了。

凱末爾就任總統以後，決意廢去一切腐舊的制度和方法，並提高土耳其的國家地位，使達西方文化的水準。他爲了實行這種改造起見，採取了獨裁的政策。許多槍決與處絞的事情亦隨改革之進行而發生。土耳其人民受慣了昔日的專制和殘暴的手段，所以凱末爾的方法，在他們看來毫不新奇，也並不足使他們特別生長。因此，大多數土耳其人民，都把這位獨裁總統的政策，予以承認了，行兇的行爲，亦一變而爲罕見的事情。

凱末爾成功的一大原因，就是他能够常常在某一時期之先採取一個大步驟。他的改造是一件繼一件而起的，祇是按部就班地做去，毫不遲延。他遵此而行，故雖有反對，決不致形成如公然反抗那樣可怕的事情。然而總免不了有幾次暗殺獨裁者和推翻共和國的陰謀。這些陰謀中最嚴重的就是於一九二六年，又於一九三〇年在士麥那發覺的。這兩次的主要叛徒都被迅速地處決了。

在土耳其，像在意大利一樣，人民的國家主義超越了對於自由或民主政治的渴望。這種精神，又在在意俄兩國一樣，是非常有勢力的，所以在一九三〇年八月以前，國內祇有一個政黨，即「國家主義人民黨」，該黨的總理就是凱末爾，他在一九二七年時取得指定國會的一切候選人之權。因有這種辦法，外國人就批評土耳其的選舉並非選舉，而是「選擇」，尤其在凱末爾總統說出下面一句話之後：「統一基本的原素，所以國內同時不能有對立的學說，也不能有對立的政黨。」

一九三〇年八月，凱氏准許一位著名的開明政治家白伊氏 (Ali Fethi Bey) 在國會內組織一個反對黨。因此白伊氏就組織了「自由共和黨」，此黨主張政府不宜帶有過於顯明的國家主義色彩，國家對於各種事業

上應少加干涉，並且還主張出版和言論的自由。在那年的十月裏，國會中的自由共和黨在所提不信任政府的動議上，只能獲得了十二票，於是白伊就把他這個政黨解散了，然而他的一小羣黨徒繼續結合起來，成立了「獨立黨」。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國會選舉的結果，「人民黨」在「大國會」裏取得三百零四席，所有的候選人皆由凱末爾所指定。其餘十三席落於「獨立黨」之手。那位在土希戰爭時做過凱末爾參謀長並在洛桑會議代表土耳其的伊士美將軍，仍繼續擔任國務總理之職（他是在一九二五年三月被任命的）。穆斯塔法氏已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被一致重選為第二任的土耳其大總統，後來又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被一致推舉第三任的大總統了。

宗教的改革

土耳其大國會於一九二二年廢止土皇之權位的時候，並沒有同時廢除「卡利發脫」(Caliphate)所謂「卡利發脫」，就是土皇在回教徒世界中所占有的宗教領袖之地位。雖然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土皇謨罕默德六世被廢去了，但他仍舊保有回教教主的位置。直到那年十一月十八日，他逃出國境後，國會纔選舉他的堂弟美希德(Abdul Mejid)代替他為回教教主。這位新教主沒有直接的政治權力，但因他是鄂斯曼朝的一個主要人物，並因國會會宣佈土耳其國是「卡利發脫的立足場所」，所以那些虔敬的回教徒實際上不能夠將他的

職位從其傳統的政治糾紛中分開來。因之一個鄂斯曼 (Osman) 朝的回教主，在新土耳其是一種不合宜的人物。爲了此種關係，國會乃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廢除土耳其的卡利發脫，並將前統治者的家族中一切人員，都加放逐了。

卡利發脫的廢除在整個回教徒的世界中是一樁重要的事情。土耳其人既奪去回教徒的教主。同時不啻廢除了所有回教徒的精神上的領袖的確，就是在世界大戰之前，也有一般非鄂圖曼回教徒（如波斯的回教分派 Shi'ahs）是不承認卡利發脫的，可是卡利發脫的職位和特權究竟不全等於泡影。事實上，自土耳其宣佈廢除後，正不乏希冀得到這個空位的人。漢志國王，埃及王，摩洛哥蘇丹與孟買的阿加汗 (Aga Khan) 都在表示他們要取得此項銜頭的志願。但是儘管有這種爭取之事，或正爲了這個原因，卡利發脫仍爲一種未屬於任何人的尊位。凱末爾對於那般非土耳其人回教徒的抗議，有下列的覆文發表：

「數世紀來回教徒所懷的夢想，以爲卡利發脫應爲包括一切回教徒的伊思蘭政府，從來沒有證明有實現的可能。這種夢想反而成爲各信徒間的紛爭，紊亂與戰爭的原因。大家仔細一想，就會明白這個真理：各派回教徒之責任是在各自安排他們自己的政府。他們之間的真正的精神之維繫即爲「一切信徒皆兄弟」一信念」。

依照着凱末爾所持的方針，在每一時期祇制定一個大改革案的政策，所以經過修正的一九二四年四月和一九二五年十月的憲法仍予回教以國教的地位。接着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土耳其國會一致通過一項法令，將憲法中規定回教爲國教的一條刪去。因此回教之被容許於今日的土耳其和其他宗教的被容許一樣。此後土

耳其的官吏就職時，不復以上帝之名，而惟以本人之名譽與共和國之名義宣誓了。雖然大多數官吏爲回教徒一事實使回教保持某種尊嚴，但政府不因任何人信仰回教而予以特殊權利了。

隨後宗教的儀式也稍有變更。人們在跑進回教寺院之前，可以不必把鞋子脫下了。許多寺院現在設有座位，舉行儀式的時候，也可以奏音樂了。這些舉動若發生在數年之前，就要被認爲大不敬，而犯死罪，於此可見穆斯塔法移風易俗的魄力多麼堅強，也可見土耳其人民渴望「現代化」的心思多麼熱烈。但是我們要注意，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的冬季，近士麥拿的門尼門（Menemen）地方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宗教暴動，那裏有一羣回教僧人企圖恢復卡利發脫，但未成功。

婦女的地位

僅僅次要於對於宗教的改變態度的事情，也許祇是這種改革狀況的一面的，要算土耳其婦女的地位之變遷了。在一九二五年，制定了許多法律，廢止了一夫多妻制，規定人民結婚必須登記，並授與總統批准離婚之權。實際上，除了需要許多婦女的工作的農村外，土國人民的經濟情形使一夫多妻的制度即在鄂圖曼帝政時代，也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普遍。但是那種制度是爲回教經典所認可的，所以大家都遵從了。以前，一個土耳其人只要把「我與你離婚」。這種公式反復地說上三遍，就能和他的妻子離婚。但是現在的土耳其婦女，也和西方各國的婦女們一樣有婚姻權利了。凱末爾總統差不多馬上利用他新得的離婚權，與他的結褵不過三年的妻子拉蒂菲

(Lutfe Hanım) 解除婚約，拉蒂菲是一位有錢的，受過教育的，和歐化的婦人，並且是土耳其的一個著名的女權主義者。她在做總統夫人的時期內所以與凱末爾的家庭不相投合，她的混身政界的傾向顯然當負大部分的責任。

從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起，婚姻登記成爲強迫的性質，但得附加宗教的儀式。男子結婚的法定年齡是十八歲，女子爲十七歲。婦女戴面紗是隨意的事情，西式的服裝也採用了。這樣一來，土耳其婦女不必再裝束得像「棺材形的一束白布」了，除非她們自願如此。婦人與女子都要求受教育了，而外人開辦的學校馬上感到不能容納這許多追求學問的人的困難。婦女們可以和她們的西方姊妹一樣從事於一切職業，婦女組織的會社也盛行一時。在一九二九年夏季，政府因土耳其婦女協會的數度請願，把市區選舉權給予了婦女，到一九三〇年，她們又得供職於市政機關。

土耳其一位典型的新婦女，就是伊狄勃氏 (Halide Edib)。她是第一個得到大學學位的土耳其女子，著名的著作家和小說家，伊斯坦部爾 (Istanbul) 大學的西洋文學教授，在幾次戰役中做過凱末爾的幕僚，又是一個熱心於社會事業的人。她後來因和凱末爾政見相左，就離開祖國，在外國成爲一個受人歡迎的講師。她的自傳和其他著作，都是關於土耳其在建立共和國的進程中對內對外奮鬥的完美記錄。

法律的改革和教育的進步

土耳其人生活狀態的變遷，使政府不得不將一切舊法典（連神聖法或 *Sharia* 包括在內）完全撕去。所以在一九二六年，國會採用了三種新的法規：民法、刑法和商法，各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國的法律為根據。三年後，那部仿照德國法律最為逼真的新土耳其刑法，即發生效力。土耳其之採取西方的法律制度，就一九一四年不平等條約的廢止，與洛桑條約之確認此項行動看來，是有重大的國際意義的。新土耳其的司法機關，有七百多個法院，頂上的為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推事有三十二人，分為幾組，分別處理人民對於第一審法院的判決提出上訴的各種案件。司法部負責發現人民所有的正當冤抑，並以立法與司法機關最近制定的法律公佈於全國。

土耳其政府所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就是教育人民的問題。依據法律，七歲到十六歲的孩童，都要受強迫教育，但是經費的不敷，教員和校舍的缺乏，阻礙了此項法律之充分施行。雖然初級小學的學生人數在總人口一三、七〇〇、〇〇〇中還不到五十萬，但是一九三一年的小學校，比在一九一四年確增加了兩倍。至於高級學校的數目及入校的人數當然比較地又少了。大學的情形也還不見有起色。然而到一九三二年，國內的文盲據說已經從百分之八十五降到百分之四十二了。

一九二六年，土耳其採用了西洋新曆及以「二十四小時為一日」的鐘表。一九二八年五月，又通過了一件法律，規定在十五年內採用拉丁字母。全國報紙奉命在八個月內廢除舊的阿拉伯字，否則封閉之。從一九二九年

一月一日起，凡以阿拉伯文字印行的書籍，禁止出版和銷售。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後，歐洲的計數法被普遍地採用了。一九三一年三月的法律又規定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正式採用米突制度。

土耳其政府的一切官吏以及銀行與公司店鋪的首領，都規定須每日進國立的特別學校數小時，讀新編的“abc”課本。到一九三二年之終，實際上一切公函文件及教育資料，都是採用拉丁文寫的。不到四十歲的土耳其人，都被強迫學習寫讀的功課。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後，識字的文憑成爲取得「公民權利的」一種必要條件。最足爲新土耳其之表徵者，即爲政府的無線電臺被用來助進這些計劃一事。有一次政府的廣播電臺宣佈過：「鄂圖曼語言，已隨鄂圖曼帝國壽終正寢了，它的阿拉伯字使我們的言語不能發揮獨立的精神。我們以前採用它，不過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我們已經和它搏鬥，力求排除它，而我們的語言與文學已在這種奮鬥中喪失了力量。牠是不能適合表現現代文化的需要了。凡遇使用專門術語的地方——在銀行界、商界、科學界、現代哲學界、心理學界、和藥物學界——新體的文字是必要的。」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土耳其發行了一部標準的新字典，其中約有二萬四千個字。這些新字的來源分明都是土耳其的，而非波斯或阿拉伯的。政府對於在公共場所和小學校裏教授宗教課程的事情，加以嚴格的限制。在一九三二年，又實行一種計劃，強迫全國人民採用正式的姓氏。爲表明「知識解放」起見，顏帽和頭巾——虔敬的回教徒之特殊記號——一概禁止冠戴。

「土耳其的有爲的土耳其人民」

據說有人向一位保加利亞的外交家問起他對於土耳其共和國的領袖的意見，他回答道：「他們正在努力工作，並非如我們所想像，土耳其人是不能工作的。」土耳其人在帝政時代，從事於工商業的比較少。一般羣衆，不服兵役的時候，如果他們不太貪懶，多喜歡在田裏工作。因此，有如「商業」的事情，幾乎完全爲帝國內他種民族所壟斷，尤其是那般希臘人猶太人和阿美尼亞人。但是從共和建立後，顯然發生了一種新的精神了。一般國民黨員願意，在土耳其境內，只有土耳其人的勞力、資本、所有權、和生產。完成這種計劃，前途的障礙自不在小，但是經濟情形的壓力不久使經商的中等階級逐漸興起來，他們的核心就是一羣來自希臘的難民，其中有好些人從前已從事於商業了。然而，因爲大多數土耳其人民仍舊以農爲業，政府也就煞費苦心使那些阿那托力亞地方的農夫，成爲有能力的耕種者。迄今爲止，進步是遲緩的，但有很好的前途。

土耳其已與許多國家如英、美、蘇俄、意大利訂立了商業條約。阿那托力亞的大農地已由政府出資拓殖。特別由政府機關業經設立，以研究農業、商業、航業、和工業。政府對於工作勤勞的農家給予住屋，同時也補助他們耕牛和農具。凱末爾和墨梭里尼一樣，自己也有一塊模範田，公餘之暇，捲起了衣袖，在田裏操犁而耕。此外對於農業生產方面，又有種種鼓勵的方法，如農家所用以自食的一切穀類，概予豁免租稅。強迫軍役的期限被減爲十八個月，這件事獲得了農民的不少好感。

一九二九年，國會議決支撥巨款，爲整頓公共工程之用，把實施計劃的年限展到十二年，計劃中包括鐵路、海港、灌溉、墾拓和公路等等的建設事宜。政府聘用了瑞士的工程師，以監督這些工程的完成。一九二九年十月所採用的保護關稅政策，促進了土耳其的幼稚工業。最重要的工業發展是紡織廠，軋棉機廠，煉糖廠，以及鋸木廠。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土耳其的製造品的價值，自二千萬元增至五千萬元。各工廠內和少數農地上所用的大量機器自然必從外國輸入。土耳其的主要出口貨爲煙草、水果、糧食、棉花等物，將來交通發達，運輸便利的時候，無疑地還可以開發銻、錳、煤、銅、鎳和石油的豐富儲量，以利民生。

土耳其有一種趨勢，大概爲了效能之故，要把幾種重要的工業，由國家管理。政府現在已取得鐵路和大部分商輪的所有權。它又有煙草、食鹽、火藥、火酒的專賣權，同時開設了許多供給海陸軍衣服的軍衣廠。國營合作社的創設，也在鄭重考慮中，土耳其對於外國人民，給予不少特許，大半爲取得資本和專家的意見而出，但當局無時不留意於保障它的政治和經濟的獨立。

許多土耳其的城市都膨脹得很快。例如昂哥拉（它的名稱於一九二九年經政府正式改爲安卡拉 Ankara）（註）在大戰結束時的人口祇有五千人，到了一九三二年，已經幾乎有八萬人了。該城人口增加的原因，當然是由於它的政治地位的重要。凱末爾又以鐵路將首都與海濱連接起來，從事撲滅附近一帶溼地的蚊蟲的運動，着手於衛生、道路、警政、和人民生活狀況的改革，並進行首都美化的工作。甚至凱末爾和其他英雄的塑像——一向被認爲崇拜偶像的——也樹立起來了。影戲館，音樂院和歌舞場，已與電車路線及陰溝的建築，並駕齊驅。

(註)土耳其的國家主義已引起許多地名的變更，所改的名稱純粹是土耳其式的，這常使外國人大感不便。君士坦丁堡現已改稱伊斯坦
部爾，士麥拿則改爲伊士米爾 (Izmir)。

土耳其儘管有上述的許多經濟上的進展，但它還不懂得繁榮的意義。五穀的歉收，人民的惰性，政府借貸外資的躊躇（因恐本國的金融爲外人所扼）在在足令物質上的進步遲緩。最近，當收穫稍有起色的時候，世界市場上農產物的跌價又使土耳其也蒙着同樣不幸的影響。直到一九三〇年，貿易的差額總是不利的。

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嚴格的節約」一詞，成爲政府各機關的座右銘。文職機關的人員和薪俸都有裁減。對於外國的入口貨，則課以重稅。政府又作種種企圖從事全國總動員的節儉運動，勸告人民在可能範圍內不用外國的進口貨。穆斯塔法以身作則，自己穿了土耳其的土布衣服，同時以菩提茶代替咖啡。爲平衡一九三二年的預算起見，政府覺得非徵收所得稅不可，大抵收入較少的人繳百分之三十，每年有三千六百元以上的進款者繳百分之四十三。土耳其自與蘇俄及意大利訂立特別優惠的商業條約和金融條約以後，本年的經濟情形，已見略有進步了。

土耳其的國際關係

大戰後各協約國所給予土耳其的苛刻待遇，及國聯對於一九二五年的土（耳其）——伊（拉克）疆界爭執所下的於土國不利的判決，使土耳其的國家主義者非常猜疑西方。此種情形，一部分促成了戰後土、俄之間

所發生的親密關係，在一九二八年前與土耳其訂立過友好與仲裁條約的國家，實在祇有俄國一國。條約裏面載有互相擔保中立和互不侵犯的諾言，它是在一九二五年簽訂而在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三〇年修正的。在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盛傳俄、土、波斯、阿富汗和埃及有共同締結非亞同盟之意。但此舉並未實現，大半因為土耳其太關心於它的西方化的計劃，無暇認真考慮與東方各國的團結。

後來俄人的共產活動在土耳其發生了不利的反應。一九二九年七月，有二十四個土耳其人爲宣傳共產被處監禁。八月，凱末爾發表一篇演說，揚言欲「毀滅」一切從事於反動的政治活動的人。結果土耳其和俄國疏遠了，同時西方各國因土耳其打消布爾希維黨在國內的勢力，也對它表示友好的態度。這兩件事合攏來竟使土耳其漸漸有意加入國聯爲會員國了。在一九二七年，國際常設法庭，對於因法國郵船「蓮」號與土耳其一隻汽船互撞而生的兩國責任問題之爭執，下了有利於土耳其的判決。翌年，土耳其政府與意大利訂立了友好條約。一九二九年六月，又與法國訂立了一個新協定，土耳其與敘利亞的邊境即依此協定再經改正。土耳其對於西方的懷疑態度，卒因這些和其他事件完全冰釋了。一九三二年七月，土耳其共和國接受了國聯邀其加入國聯的請帖。

根據洛桑條約的條款，鄂圖曼帝國戰前的債務，當分派於在一九一二年曾爲該帝國一部分而因巴爾幹戰爭與世界大戰的結果已與帝國分離的各區域。依據一九二八年六月土耳其與其債券所有者所締結的協定，土耳其答應付償一九一二年十月鄂圖曼帝國的債務總數的百分之六二·二五，並允付一九一二年以後土耳其政府所負債務的百分之七六·五四。此項協定業經土耳其國會於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批准。

土耳其曾積極從事於促進巴爾幹聯盟的運動。它已數度與保加利亞、希臘、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磋商此項計劃，僉以爲此種聯盟協定當爲政治上的和諧及經濟上的提攜而訂立。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到二十六日的七天中，安卡拉政府自任巴爾幹會議的主人，所有上列各國都派代表與會，從事討論設立巴爾幹關稅同盟等類的事情，並商訂巴爾幹諸國之間互不侵犯的公約。這次會議的主要成績就是設立巴爾幹國際總商會與巴爾幹國際煙草總局於薩羅尼加兩事。此番土國的計劃所以不能奏效，其最大的障礙似乎在於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受了引誘，等待機會與奧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拉夫締結多瑙河聯盟。

戰後土耳其和美國的關係有若干時期是特別的。雖然這兩國沒有彼此宣戰過，但其外交和商業的關係是斷絕的，有待於成立一種新的條約協定。在洛桑會議所簽訂的土美修好與通商條約，曾在美國參議院中經過幾次的辯論，結果仍在一九二七年一月遭否決了。美國一般反對批准此約的人，搜集了許多可疑的論點，宣稱此約並未履行威爾遜氏所判予阿美尼亞的賠償額（此項判定會爲已廢止的色爾佛條約的一部分），它又未能確認土國依據一八三〇年的條約所給予美國的治外法權（其他列強已承認此種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且未維持已歸化美國的若干土耳其人民之美國國籍（根據國際法，土耳其有採取此種立場的完全自由權）。

同時，土耳其對於無約各國，都加以特別苛重的關稅。後來經濟的利益終勝過外交上的種種考慮，於是土美兩國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訂立了一種暫定條約，規定恢復兩國的外交和領事的關係。次年五月，美國又把一九一九年派駐土耳其，代表美國利益的高等委員，改爲大使。該項暫定條約後來經過幾次的修正。規定「最惠

國」待遇的商業條約又經兩國於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一年簽訂了。

土耳其國民黨人在發展本國的進程中所完成的改革真是令人驚訝的，但是他們的事業離終止之期尚遠。
國務總理伊士美在一九三一年說過：「我們必須多做工作，我們還得工作一千年」。

第二十一章 中國與日本

中國革命的經過

距世界大戰爆發還不到三年前，泰西各國聽到亞洲各帝國中最大最守舊的一個（中國）革命成功的可驚消息。自從一六四四年後，滿清統治中國達二百七十年之久，到現在方始喪失統治權力，而帝制變成共和政體，至少在表面上具有了歐洲的國會制度。

數百年來，中國在政治、經濟和知識方面都形落後，同時泰西各國各方面皆有長足的進步，漸執全世界無上威權。在帝制時代之下的中國政府，是貪污而腐敗的；她的社會方面的進展異常迂緩。教育的機會僅限於少數人，而且已經完全不合於現代的需要。飢荒、疫癘和水災增加中國的混亂。最不幸的一件事就是外國人可以以他們自己利益為前題開發中國的天然寶藏富源。許多官吏不特不保衛疆土，反而對侵略者諂媚，允許他們闢租界，享專利，管理關稅，租借土地並容許他們在中國疆土上設立他們自己的法律和法庭。

在一八九〇年和一九〇〇年之間，中國發生兩種運動，目的都在於補救清室的顯著弊端，並減少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活動，但都未成功。一八九八年，一羣樂觀的而愛國的知識分子勸年青的清帝光緒施行廣泛的改革

方案，但因為他們主張激烈，這些改革的失敗，早在預料之中。中國的情形過於落後了，決不能以一束敕令立即使之現代化，而政府的驟然施行廣泛改革的嘗試，引起騷動與反動。在反動的時期內，出於慈禧太后的鼓勵，使民衆對於「洋派」的一般不快轉變爲驅逐「洋鬼子」的一致行動。但是，結果產生了義和團之役，但亂事的結果，不過惹起了八國聯軍的入犯和巨額賠款的需索而已。

入了二十世紀之後，當中國人明瞭日本因西方化而有非常的改革的時候，中國學生留學外國者日益增多。居於中國南部的青年男女出洋留學者尤多，這個地帶是最後屈服於滿族而又爲時常與外國人接觸的區域。最初，成千成萬的學生到日本去留學，因爲日本距中國比較近而其語言又比較類似。但是日本學校常常不能使中國學生學得充分的知識技能，結果許多人都喜歡到別國去留學了。其中有些人到美國去，在華盛頓政府歸還中國一部分庚款之後，到美國的人數更多，並即以此項庚款爲留學官費的經費。一八九八年，中國學生留美者計六人，一九〇五年增至一〇六人，一九一〇年六五〇人，一九一八年一五〇〇人。

這些青年與外國人接觸並觀察泰西文化之後，漸漸引起一種熱烈的愛國精神。他們一羣人之中有幾位，後來就成了中國的領袖。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中國的失敗，以及外國人的侵略，更激發中國人的愛國精神。在中國人眼裏看來，滿族究竟不脫異族的意味，所以從一八九〇年起就有人組織強有力的秘密運動，目的在於推翻從前的征服者。

滿清政府感覺民衆具有廣泛的不滿，復目睹日本在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以戰勝俄國震驚世界，也受

到這個例子的教訓，於是在一九〇五年重又施行另一改革方案。牠廢止科舉的八股文考試，採用關於政治、經濟和歷史的策論。到了一九〇六年，憲政改革的七年計畫已訂就大綱，並規定召集國民會議。但當依此方向所進行的改革尚未有相當進展時，三歲的溥儀就繼承皇位了。他的父親攝政王是一個守舊的政客，他竭力設法阻礙政治的改革運動，並且把中國當時最有能力的軍事家袁世凱免去了協辦大學士之職。

全中國的政治改革運動者現在逼起活動，國民會議確於一九一〇年在北京開會了。雖然這個會議在次年即遭解散，但牠已促使政府發出命令，於一九一三年召集國會。一九一一年又發生了幾次反清室的暴動。其時有軍隊的嘩變，地方自治的運動及人民對於政府繼續給予外人租借地的行為的反對，不斷爆發。攝政王不得已重又起用袁世凱，但袁世凱深覺反抗強有力之革命運動實為不可能之事，力勸清室遜位。一九一二年二月，這個建議經清室採納了，統治中國二百七十年的滿族告了結局。但是，溥儀被許保持皇位的稱號，他繼續居住皇宮到一九二四年。

同時，在一九一二年正月一日，南京臨時國會推選孫中山先生（一八六六——一九二五）為臨時共和政府的總統。他是熱心愛國而極有能力的學者。他爲了他自己激烈的思想，一生的大部分光陰不得不消磨於亡命的生涯。他是國民黨的創辦者。自一八九五年後，他就努力組織國民黨，從事於政治與社會的改革。

孫中山先生深信中國既有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礦藏農產豐富，必能爲人類謀幸福。他深知中國人民必須求得政治上經濟上的平等，方能恢復國際的地位。一九二四年，他把他的思想綜合起來，成爲三民主義一書。這本

書是演講的體裁，內容包括民生主義、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他向民衆宣傳「生存的權利」與「生活的權利」。他在當選爲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即表示爲了謀國家統一起見，他願意退休，讓位於袁世凱。其時袁正握有北方兵權。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當選爲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袁主張設立強有力的行政首領和軟弱的國會或甚至取消國會，而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卻贊成給予人民廣泛的普選權，設置強有力的國會，而行政長官的權力應嚴加限制。於是兩派漸生意見。

國會（一九一三年四月間召集）裏面的國民黨議員，堅決不撓地投票反對袁世凱和他的政策。彼此惡感益深，直到袁向大不列顛、德意志、法蘭西、俄羅斯和日本的銀行團商借「善後借款」二五〇〇〇〇〇鎊之後，國民黨在同年七月間，進而企圖推翻袁世凱。「第二次革命」毫不費力地被撲滅了。袁在十一月將所有國民黨的議員一概逐出國會。一九一四年正月，國會全體解散，袁世凱開始施行獨裁制，（至少在北方）直到一九一六年爲止。此後，他發起洪憲帝制，擬自立爲帝，但未及三月，即告失敗。一九一六年六月，他患病逝世了。

袁逝世後，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黎竭力擁護共和政體，並重行召集國會，但他不能支配全局。爲了參加大戰和繼續給予外人特權的問題，中國裂爲南北兩派。中央政府因徵稅困難，遂以中國鑛產和實業利源向外人抵押巨款，並迅速地浪費淨盡。在一九〇九年與一九一四年之間，單單日本一國借給中國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又借了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一筆鉅款。

一九一七年六月，國會復遭解散。七月，保皇黨企圖復辟。後來，國民黨在廣州設立護法政府，與北方政府對抗。

其時各省遍設督軍，使情形更爲複雜。他們各霸一方，並有統治全中國之想，復各自徵收地方稅賦，並不交與北方政府。廣州政府宣稱爲人民的合法代表，但北方政府得到外國政府的承認和借款，它們依然企圖獵取特權和特殊利益。

二十一條

日本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向德意志宣戰。此後不久，她佔領膠州灣——德國在一八九八年向中國租借的。日本爲達到她的目的起見，運兵到中國，在距膠州灣百里多之遙的中立地帶登陸。不但中國的中立因此被破壞，日本軍隊並且強迫當地農民服役。當德國的要塞陷落，中國人要求日本撤退軍隊的時候，日本人卻於一九一五年正月十八日以二十一條向袁世凱提出。這二十一條，分爲五組，如經實行，將使中國成爲日本的保護國。歐洲列強時正爲大戰戰事所攝，無暇東顧，實予日本解決中國問題的「千載一時之良機」。

日本軍事當局要求袁世凱嚴守秘密。但關於二十一條之消息不久漸漸洩露出來，北京報紙紛紛討論。列強遂質問日本，東京政府否認有破壞中國主權之要求，並宣布經過刪改的十一點簡單條文。中國政府隨即披露二十一條全文，於是日本不得不聲明略去的幾條僅爲「請求」。然而，袁世凱同時得到通知，這些請求實具有正式要求的效力。

美國和其他列強對於日本這種舉動提出抗議；它們決不承認違反它們權利的任何中日協定，但在一九一

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國經日本以戰爭從事爲要挾，就與牠簽訂了兩種條約。這兩件公文包括二十一條原有內容的修改條文，但對於中國主權略予尊重，其中並附有規定這兩個條約在簽字之後即發生效力的條款。因爲中國國會從未批准這兩種條約，中國人民堅決認爲牠們不發生效力。依據這兩件條約，日本得到南滿和東內蒙古的特殊利益，在東三省建築鐵路的選擇權，南滿與吉林——長春鐵路的九十九年租借期，一切借款的取舍權，開掘煤鑛鐵鑛的權利，及其他許多經濟的特權。國民黨極力反對這些協定的簽訂，並宣布他們決不予以承認的意志。

中國與世界大戰

從歐洲各國開始衝突之後，中國即深懼日本利用機會以支配中國。北京政府因此兩次（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一五年）企圖加入協約國一方對德宣戰，但每次均經日本設法阻止。日本不願中國組織精強的軍隊，集中她的資財，或出席世界和平會議。在一九一五年五月的中日條約簽訂之後，北京政府重又表示參加世界大戰之願望，但日本仍竭力阻止，直到一九一七年爲止。此後，日本爲了某種良好的原因，改變了她的政策。

協約國在一九一七年的軍事形勢是很危險的，因此向各方要求增援，不獨向美國並向遠東。但自大戰開始迄今，遠東各國很少幫助，蓋中國仍守中立，而日本的行動實際上僅限於佔領德國的租借地和出售軍用品。協約國希望日本或能出海軍相助，護送船舶經過地中海。中國或可供給勞工，在後方服務。因此各該國的首都之間彼

此交換文書，商議此事。

一九一七年二月，日英簽訂了密約：日本允許遣派軍艦入地中海，英國則承諾在和平會議席上贊助日本對於山東的要求和佔有德國以前所轄的赤道東太平洋各島。法國也承諾擁護日本的主張，日本則允許鼓勵中國參加世界大戰並取消德國在中國的一切權利與特權。俄國不久也同意於類似的協定，而意大利聲言「對於此事毫無反對」。

日本在完成這些買賣之後，立即變更她的政策，力勸中國與德國斷絕關係。美國在四月參戰之後，也勸中國與德絕交。再者，北京政府其時爲了德國潛水艇重新活躍，在擊沈法艦時溺斃中國勞工五百人，頗覺懊惱。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北京當局對德與宣戰。於是廣東政府亦行宣戰。（註）

（註）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美國與日本交換了一種文書，即稱爲藍辛—石井協定（Lansing-Ishih Agreement）者是雙方重新擔保尊重所謂中國的「門戶開放」，即各國國民在華都有商業和工業的均等機會。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特別是在與其領土毗連的地方」。此項協定因美國的提議於一九二三年四月作廢。

雖然德國船隻多被奪取而送往協約國，但中國之參戰對於戰事並無影響。然而，在大戰之後，中國得到派代表出席和平會議之資格，總統徐世昌（他是在一九一八年十月爲北方軍閥所選舉的）選擇了很有能力的代表團（其中南北人士都有）往巴黎出席會議。中國的全權代表對於外國侵略，有一致的反抗態度。

在巴黎和平會議席上，自從日本向大會提出要求：德國以前在中國山東所佔的租借地及所有的特殊權利，

應歸日本時，中日的糾紛就推演開來了。中國代表團因有國內人民的電報爲後援，並聞國內羣情洶湧，故堅執反對。兩方各不相讓，曾有一個時候，日本表示那個區域既然是日本從德國人手中奪得的，就應先從德國取得自由處置權，然後可以之歸還中國。

美國總統威爾遜有一個時期贊助中國方面的論調。但勞合喬治和克雷蒙梭堅持他們爲祕密條約所束縛，不得不爲日本的後盾。此外，日本代表團表示，除非達到他們的願望，他們決不簽署和約。結果，日本如願以償，取得山東及太平洋內的德屬地的管理權。中國因此拒絕簽字於凡爾賽和約，後來與德國單獨另訂和平協定。中國因簽字於對奧的聖澤曼條約之故加入國聯爲會員，大違日本之意。

華盛頓會議

當日本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的時候，民衆遊行示威，猛烈反對。中國南北皆成立學生會，從事演講，對於政府的親日官吏，大加攻擊，認爲國賊。商人與銀行界竭誠協助學生運動，他們所用的方法爲抵制日貨——中國最有力量的武器。此項政策使日本的出口貨數量大減，東京政府大爲憂慮，它於是履行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對威爾遜的諾言，開始磋商將山東歸還中國。中國拒絕此項提議，轉向全世界呼籲，請求財政上與外交上的同情和協助。但是，外債因爲中國的信用地位已完全降落，已不能舉借。在這個時候（一九二一年），美國哈定（Harding）總統發出邀請於書八國，請它們來參加華盛頓會議，討論限制海軍並解決太平洋和遠東的國際問題。

美國召集此項會議有好幾種動機，美國國務院切望結束英、美間的海軍競爭和中、日間的爭端。此外，美國感覺日、英續訂同盟的問題在一九二一年又將發生。國務院又注意到日、英的遠東政策是一致的，而英國逐漸不尊重門戶開放的原則——這個原則自經海·約翰 (John Hay) 於一九〇〇年發表以來極為美國商人和外交家所寶貴，因此很覺得不安。美國希望此項會議或可防止英、日妨害美國利益的聯合行動。

被邀請參加華盛頓會議的國家包括在遠東有利益的一切國家（除了俄國）：大不列顛、法蘭西、意大利、葡萄牙、荷蘭、比利時、中國和日本。以上各國政府除了日本都願意出席會議。日本提出一個條件：「會議中不得討論已成的事實或純關於某國的問題」，此項條件如經接受，她方肯出席會議。

華府會議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幕，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閉會，共商訂了七個條約，其中兩個是關於海軍軍備問題的，其餘五個則關於太平洋和遠東問題。（註）此外還有兩個，關於山東和雅浦 (Yap) 的條約，僅有由關係各國在會議之外簽訂。

（註）海軍條約不僅規定軍備的限制，且涉及太平洋要塞的限制。英和日本協議維持她們的屬島和海軍根據地的現狀。在若干區域，例如阿留西安羣島，完全禁止設立要塞。

英、法、日、美之間的兩種四強條約 (Four-Power Treaties) 是簽訂了。在第一種中各關係國保證互相尊重關於她們在太平洋的屬島的權利。第二種條約中規定：假使這些權利受其他任何國家的侵略行動所威脅時，「各簽字國均應彼此完全坦白交換意見，以便達到一種諒解，對於這種緊急形勢單獨或共同採取最有效的解

決辦法」這兩件條約的有效期間爲十年，但除經任何簽字國先十二個月通知終止外，得自動續訂之。

條約中所包含的保證項目，恰與其時一般的意見相反，並不強迫各簽字國彼此保護在遠東的屬地。然而，這些條約反使英、日同盟成爲過去。這一點使加拿大和澳洲欣慰，這兩個自治領地極關心於日、美開戰時英國在同盟條約之下所應履行之義務。

華府會議出席諸國簽訂了九國公約 (Nine-Power Treaty)，其中保障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并重申門戶開放的原則。各簽字國允許「不贊助各該國人民之間所訂的任何協定，希冀在中國造成勢力圈或在中國疆土某部分享受特殊機會」。此條是否對於各國和其國民有拘束的力量，並無明文規定。中國保證在中國鐵路上——尤其是關於旅客和貨物運費——「不行使或准許任何種不公平的分別待遇」。列強承諾在戰爭時尊重中國爲中立國的權利。此項公約自然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但牠僅適用於將來，而對於各國已有的利益，並未加以抑止。

第二九國公約使中國享受了比以前所有的更大的關稅管理權，六國公約把太平洋中以前屬於德意志的海底電線分給美國、大不列顛、日本、法蘭西、意大利與中國。在華府會議所簽訂的其餘條約是由中、日、美三國間分別商定的。

中、日協定規定日本將德國以前在山東的財產權歸還中國，而中國付與款項，以補償日本從一九一四年以來用於改良膠濟鐵路的經費。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即簽訂此項協定後二十二個月，日本始將山東半島歸還中

國管轄。但是，由於種種不幸的國際「事變」，日本又於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三年中派遣軍隊到濟南和山東省的其他地方。

日美條約是關於雅浦的。雅浦島前爲德意志所佔有，後來雖經威爾遜抗議，仍成爲日本的委任統治地。華盛頓政府切望將這個島嶼收歸國際所有，因爲輻合於雅浦的海底電線爲美國通中國的兩道電線之一，又是由美國通荷屬東印度的唯一電線。日本又進行移動中，美線的上海終點到那罕島，這件事使美國更感不快。在華府會議，復訂立了一種協定，其中保證美國人民在所有太平洋中日本的委任統治島上的經濟權利，並容許美國人自由敷設並使用從關島(Guam)至雅浦的海底電線，或「美國或其人民以後所可敷設或使用的任何海底電線，與雅浦島連接者」。

華府會議所成就的事業的價值實難估定。關於中國，可以說列強對於門戶開放原則重又約定遵守，而中國政府恢復了若干已喪失的自治權。山東是歸還了，中國得因此喘息片刻，她如有能力，就可以借此機會重建積弱的國家。中日協定簽訂之後，日本隨即對中國採取所謂「友好政策」，此項政策一直維持到一九二七年春季。在幣原男爵領導之下的中和的民政黨企圖調和中日的利益，不假借武力或陰謀。但是，當田中男爵所領導的政友會繼起執政的時候，政府又重複採用「積極政策」。

華府會議席上所簽訂的海軍協定與防禦協定大大地緩和了英美日間之緊張狀態，使這三強至少暫時能夠對於準備太平洋戰爭之外的事務多加注意。未遑俄國參加會議，實在是不幸的事，因爲蘇俄是遠東的重要大

國而她的合作似乎爲對於太平洋國際關係作任何永久之決定時所必要的。(註)

(註)華盛頓諸條約直到一九二五年夏季方生效力。法蘭西爲最後批准的一國。

現代中國的教育

自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內部歷史，是以各省行政的紛亂顯著的。數十位將軍以總計一、三〇〇、〇〇〇人的軍隊蹂躪城市鄉村，並使中國的許多天然富源歸於荒廢。此外，到處皆有水災和饑荒以及共產黨與共產黨的爭鬪。但是，在上述紊亂之中，有兩種分明的進步現象；一種是教育，一種是有組織的民族運動。

舊時中國的教育僅歸少數人享受，中國文字含有成千成萬的象形字，極難學習。在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之後，尤其是在一九一九年之後，社會人士曾努力從事於識字運動。最初，有一羣改革家企圖採用三十九個注音字母，但是，由於種種關係，這種字母證明不合於實用。於是，有位美國留學生思想家胡適博士起而提倡白話，以代替古時的文言。

爲促進國語運動並使之普遍化起見，胡適和其他白話運動領袖利用國語寫作詩文、小說、歷史和高級的文學作品。一九二〇年一月，北京政府教育部被說動頒佈命令，規定初級小學一、二年級的教科書必須用國語編輯。後來，又規定所有政府公文都須用這種普通文體。

另一位美國留學生晏陽初博士，在一九二二年發起民衆教育運動，目的在於使當時的文盲認識一千個簡

單而普遍應用的中國字。爲傳授此種字於農人和工人起見，他訂就四本簡易教科書，祇要每天讀一時，四個月即可讀畢。此書每冊僅售大洋五分，到一九二八年，即銷售了有十四版之多。感謝這種設計，百萬人民因此得到學習讀書的機會，要不然他們依然是文盲。

進一步的中國教育之發展，就是一般人士漸漸注意於歷史、政治、經濟、哲學和文學方面的外國著作。上海商務印書館成立於十九世紀之末，它刊印了一種包括兩千冊中國及世界名著的叢書，全部售價不過一百元美金。
(按即萬有文庫第一集)

雖然社會人士對於教育很爲熱心，但因爲缺少經費，學校的設備多不完全。在一九二五年，計有六百萬兒童入初等學校肄業。此外教會學校又吸收了五十萬。但幾有十分之九已達學齡的男女兒童不能受到正式教育。一九二九年，中國共有三十四所國立大學和十六所高等專科學校。

與教育發展同時並進的，就是學生漸成爲一種運動的重要份子，這種運動的目的即在使中國脫離外國勢力的羈絆和傳統的桎梏。一九一九年，學生領導着全國，對於凡爾賽條約和主張簽訂此項條約的官吏，加以嚴厲的攻擊。後來，許多愛國運動也同樣在學生的指導之下進行。可是，雖則這種活動可以使中國猛醒，但熱誠而暴躁的青年決不能獨負改造中國的重任。已解放的青年男女所表現的精神固足以鼓勵人民，唯尙需要成熟的領袖人才。學生運動多少是受國民黨的指導的，特別是在國民黨有權力管理全中國的教育之後。

國民黨的勝利和種種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在一九一七年國民黨和南方的愛國人士曾設立護法政府於廣東。這個政府積極反對仍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指揮之下行使職權的北京政府的行動。國民黨由孫中山先生領導着，並受了他的主義的激勵，數年來努力奮鬥，目的在使北方歸國民黨統治並統一全國，其所用工具大都為武力與宣傳。這種企圖會得到俄國一部分的幫忙，它放棄了大部分沙皇時代在中國所得的特權，並亟欲找一個共同打倒西方資本主義的幫手。俄國於是派了一位能幹的外交家鮑羅廷到中國。居然不辱使命，得到了非常的成功。同時俄國復派有大使長駐在北京。

一九二四年五月，北京政府與莫斯科簽訂了一種協定，俄國允許放棄中國的治外法權，拋棄未付的庚款，不在中國境內宣傳共產，並擔保將蒙古（自拳匪之亂後即為俄國所強佔）還與中國。於同日簽訂的（五月三十一日）另一中俄條約規定滿洲中東鐵路——一八九六年由中俄共同投資建築者——應當仍由兩國共同管轄，直到中國能以資本贖回全線時為止。一九二四年六月，孫中山先生採取鮑羅廷的建議，創辦黃埔軍官學校。不久俄國派了一個軍官團到中國來，訓練國民革命的軍隊，軍官中最露頭角的便是嘉倫將軍（Blicher, Galen 是他的假名）。

將近一九二五年時，國民黨中顯然分爲兩派。穩和的右派對於左派的共產主義者不表同情，要求與俄國斷

絕關係。孫中山先生頗能調和兩派的極端意見，使之團結一致。於是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氏——他繼孫中山先生而為國民黨之首領——與俄國脫離關係，清除黨內共產黨份子。同時北京政府與俄國的關係，亦因後者在中國的赤化機關的宣傳活動，大趨緊張。

剛在與俄國脫離關係之前，國民黨的勢力已幾乎及於全中國。這種顯著的成功，一部分是由於蔣介石氏之軍事技能，一部分是由於俄國顧問的幫助，一部分也是出於經過嚴密組織的以北方軍閥及帝國主義為攻擊目的之有力的宣傳運動。不過，勝利的結果，終竟因黨內的分裂而毀壞了。

共產黨力圖損害蔣氏之聲名，并推進種種暴行，使之感覺棘手，最嚴重的就是一九二七年三月的南京事件。在國民革命軍佔據南京之後，左派份子依照預定的計劃，攻擊南京城內外國居民的生命財產。列強自然要求賠償，日本則派遣數千兵士登陸，保護她在山東所有的廣大利益，但共黨的搗亂反使蔣氏蒙其利，商人和實業界領袖越發擁護蔣氏了。

蔣氏的勝利的結果，使他能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在南京設立國民政府。二月之後，國民革命軍克服北京，廢止北京政府，更北京為北平，南京成為國都。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依照此項組織法，最高行政單位為國務會議，十月十日，蔣介石當選為國府主席，其地位等於大總統。一九二八年之末，國民政府得到歐、美各國及日本的正式的承認。

蔣氏居於國府主席的地位，遇到困難的任務。他努力統一中國，聘請德國及美國的專家，幫助從事於復興的

大業，使成爲強有力的國家。但匪亂的勦伐隨時需要他親赴前敵，以致他對於內政的計畫，屢受阻礙。秩序的紊亂和水災饑荒的常臨給予共產黨活動的機會，他們希望推翻南京政府，而代以蘇維埃政府，蔣氏積極勦共，繼續在江西指揮軍事達數年之久，後來終於大功告成。

國民政府在內政方面已感多事之苦，而外交上亦發生糾紛。國民黨自清共之後，防範布爾塞維黨的宣傳甚嚴。而中東路問題又使俄國感到更進一層的不快。一九二九年六月中，滿洲中東路俄籍職員因有宣傳共產黨嫌疑被中國當局搜查，數百人被捕入獄或遣送回國。於是蘇俄當局亦大捕僑居俄國之華僑，入獄者計有千餘人，多以爲報復，因此中俄斷絕外交關係，開始軍事行動，彼此小有接觸，結果俄國打了勝仗。莫斯科政府堅持她必須恢復根據一九二四年的條約的權利。

在中俄衝突達到最高峯的時候，美國及簽字於開洛格公約的四十一個國家勸告中俄應用和平方法解決爭端。這種動議對於任何一方都無影響，而蘇俄反以美國素與她無正式來往而忽進勸告，表示駭異。幸而中俄兩國後來成立了和平的協定（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彼此派遣代表舉行會議。此事結束未久，一九三一年九月又發生嚴重的中日衝突。

東三省的經濟利害關係

中國久爲歐美與日本投資和經商的爭逐場所。購買政府公債、建築鐵路、設立工廠、棧房、教會設備等，雖有無

數外貨輸入國內。經濟專家會估計外國人在中國所投之資本，大不列顛佔百分之三十七，日本佔百分之三十四，俄國佔百分之十，美國和法國各佔百分之五。因此外國在華的商業甚盛，中國對外貿易的價值平均每年達美金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註)

(註)美國投資於中國工廠計美金一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教會事業計美金四三、〇〇〇、〇〇〇元。美國人所購中國鐵路公債計要而美金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元，而在煤油及鋼鐵業方面亦有相當投資。美國在一九二九年向中國之出口貨達美金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而由中國輸入之入口貨計美金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元。雖則日、美的商業關係現在比中、美的更爲鉅大，但中、美將來的商業關係前途無限，因爲中國的人口要比日本多五倍。此即爲華盛頓政府竭力維持門戶開放原則的主要原因。

從經濟的觀點看來，中國各部分中最有希望的，首推東三省。這個非常有價值的區域共有三八〇、〇〇〇方英里的面積，二九、〇〇〇、〇〇〇人口，最近在國際事務上佔居重要的地位。所產穀類、煤、鐵、金、銀、鉛、銅均甚豐富。境內並有三千里長的鐵路，船運海口極爲便利。一九二八年，單單東三省的出產品佔中國出口品總數三分之一，佔全部入口的五分之一。東三省長官張學良氏對於中央政府維持忠誠的態度。

在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九年之間，山東與北方諸省人民移居滿洲者達四、七〇〇、〇〇〇人之多。其中有許多在稍有積蓄之後即返內地。但至少有一半數人仍住該地，成爲永久的居民。一九三一年之末，中國居民之數約佔東三省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

不過，世界大多數工業國在東三省都有財政的或商業的利益。俄國和日本並且自以爲她們有特殊的權利。

俄國因投資於中東路而爲此路的半主人翁。這條鐵路是從西方到西伯利亞的海參威的最直接的交通要道。並且，布爾塞維黨在外蒙古行使着很大的政治權力。住在外蒙古的精悍的馬兵，無疑能够相當抗拒具備新式武器的軍隊，因爲坦克車和重砲在此地面完全失其效用的。

日本人在東三省轄有一條鐵道，就是南滿鐵路。此線長約七百英里，終點在日人所管轄的大連灣——即東三省大部分外貨輸入必經之處。南滿鐵路公司建有城市和最新設計於該路沿線。這條鐵路的最重要的營業項目，就是載運中國移民往來於東三省。

東三省的外國銀行業幾乎爲日本的公司的獨占事業，在一九三二年之初，日人在東三省的投資總計達十億元。它在滿洲既有如此廣大的經濟所有權，所以它有更重要的理由要求他國承認其在東三省之特殊利益。爲了解此項動機起見，必須先研究日本帝國的經濟狀況。

日本的經濟問題

在十九世紀中葉，日本猶爲中古式的國家，具有封建時代的傳統法式極力避免與西方各國接觸。但是，到十九世紀終了之前，日本終被找尋商業新出路的西方人「開放」了，同時日本人摹仿侵入者的方法並採取了他們的商業見解了。其時歐美人將現代工業介紹到島國來，於是日本也像西方列強以前一樣，漸有向外發展的急切需要。工業化的日本開始尋找低賤原料的來源，以供工廠應用，覓求市場以出售她的剩餘的製造品，並物色投

資場所，以便利用她的積蓄的資本，它又為她的工人謀衣食，並為她的過剩人口求出路。

在世界大戰時期，日本的經濟情形遇到特別順利的轉機。協約國向日本購買大宗軍火，日本與亞洲、非洲和美洲發生新的商業關係，而日本商船在世界船業中佔居了重要的地位。在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一八年之間，日本工業所用的馬力增加了一倍，工廠中的工人人數也增一半。此種活動的結果，日本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時期內，獲得貿易盈餘達美金二十億元之多。

大戰之後，日本的商業漸有衰落之勢。各交戰國復能從事於製造平時的需用品，再在國外市場與他國競爭。在這時候，日本的對外貿易佔居全國商業總額三分之一，（註）為日本繁榮的主要條件，所以出口商業的跌落，對於日本國家的經濟情形，是一種重大的打擊。

（註）在美國，此項比例是十分之一。

在大戰停止後若干年，因為美國正在新的繁榮時期中，成為日本絲貨的大買主，所以日本的出口商業數字仍能維持比較高的水準。大戰後，全世界的絲產百分之四十是日本出口品，而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運往美國的。但是，因為人造絲和其他絲的代用品的用途日益推廣，加之全世界不景氣，對於日本的絲和其他出產品的需要便大大的減少了。與一九二九年相比較，一九三〇年日本的粗絲出口在量的方面損失了百分之十八，在價值方面損失了百分之四十五。日本為減低出品的成本起見，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放棄了金本位，但就其關於增進國外商業一層而言，所得結果是失望的。

在一九三〇年，日本帝國疆土（包括朝鮮在內）的面積約佔二六五、〇〇〇方英里，比美國的得克撒斯州稍大。它的人口有九二、〇〇〇、〇〇〇。在日本本部（面積一四八、七〇〇方英里，人口六五、〇〇〇、〇〇〇），人民百分之四十直接依賴田地爲生，而田地只有六分之一是可以耕種的。失業人數約達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國債自一九二〇年以來增加一倍，達美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這種情形之下，就不難了解何以物產豐富，有無限開發機會，地理上最近和具有軍事上重要性的東三省，今成爲日本所覬覦的目的物。自一九一五年提出二十一條後即開始了的工作，在她的政客看來，現在是一舉而完成的時候了。一九三一年似乎是她的最好的時機。（註）

（註）從日本的殖民的觀點看來，東三省的價值是很可疑的，因爲該地的氣候在冬天太寒冷，殊不適於日本人居住。在一九三二年，移居東三省的日本人，還不到全部人口百分之一。關於日本殖民的理論，似乎專爲向外國人宣傳而出。

中日衝突（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中國的情形照例的杌隉不寧。國民黨內各派分子，互相控訴，並從事於軍事行動。水災與饑荒繼續在剝奪百萬人民的食住。共產黨到處宣傳，外國的干涉增加了糾紛。

其時世界各國政府都同樣遇到許多困難問題。失業、農民困苦、關稅壁壘、過激運動、捐稅之減輕、債務之延期

付債、安全保障、軍縮、選舉，這些問題都需要西方人的深切注意。因此日本在同樣許多問題的壓迫之下，覺得實現它在東三省的「正當權利」的機會已成熟了。那時似乎西方各國，就是不贊同它的計劃，也決不會採取武力的反對。

在日本，海軍部與陸軍部的地位與在其他各國的不同，這兩個機關實際上是不附屬於內閣的，軍部的領袖可以無須經過尋常的內閣手續直接覲見日皇——他部部长如欲覲見必須經過這種手續。而且日本軍隊在世界大戰中的傷亡之數甚少，休戰後他們成爲世界主要的陸軍部隊，且爲最驕誇的軍隊之一。

日本軍隊久已疑忌內閣，並特別疑心政黨分子。牠認爲一九一八年以來所採用的內閣責任制度和一九二五年所施行的普選制度沒有多大好處。軍人對於許多政客都視爲有陰謀並自私自利的人，認爲他們僅關心於商人、銀行家和持有公債者的前途幸福。反之，軍人自承特別關心於農民與工人的幸福；他們又宣稱，如將東三省變成日本的大的農業殖民地，和工業發展地，國家的困難就立刻可以解決。實際上他們與另一羣銀行家和實業家攜手——就是那般的東三省有財政上的利害關係的人，的確，南滿鐵路總裁是日本軍事長官之一。一種勝利的軍事冒險，自然可使驕傲的戰士增加光榮。

在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二年期內，軍部從內閣攫得政權。雖有一部分「大商業」家懼怕列強使用經濟的報復來抵抗日本的侵略，但千百萬人民爲民族的自尊心和個人的貧乏所驅使，都站在軍部方面。許多具有法

西斯蒂性質的會社成立了，大家一致要求以武力達到經濟安定與繁榮，而不依賴空泛的條約了。（註）

（註）在一九三〇年二月與五月之間，日本的狂熱的愛國者刺殺了一個大銀行家一個財政大臣和一個首相。首相是在家中遇刺的，凶手為青年士官學生和軍官，他們後來投警署自首。他們聲言他們所以幹此事，目的在表示對於自私的和叛國的政府政策的愛國抗議，因為政府的政策專顧及富有的商人階級的利益。

這真是中國的不幸了，一九三二年中東三省發生的兩件事使日本得到進兵的藉口。第一，日本軍官中村在內蒙古失蹤，第二，九月十八日，南滿鐵路上一小段鐵軌被炸藥毀壞。究竟何方應對這兩件事負責，現在尚無切實證據可以證明，但守衛南滿鐵路的日本軍隊即以炸毀鐵軌事件稱為中國兵士所為。於是日本軍隊未經先行通知外務省即開放機關鎗，並將大部分東三省區域佔領。

在日本軍隊邁進之前，中國軍隊就迅速撤退，接着南京政府向世界呼籲求助。東京外交家馬上從驚訝中醒過來羣起幫助軍事當局，他們指出東三省長官之建造與南滿鐵路平行的鐵路，有背於一九〇五年的條約。在該條鐵路建築時，日本當局沒有說什麼話，現在卻向世界申訴，以為這條鐵路的建築，對於日本在滿的利益實為一種軍事上的威脅，且將使南滿鐵路與大連港的中滿關稅大部分移至中國所管理的鐵路與港口之手。

當中國以此案交付國聯和美國，請求解決的時候，日本軍隊藉口勦匪，進佔中國疆土甚速。在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在東三省直接管轄的區域祇有一、四〇〇方英里，鐵路祇八百英里。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它竟佔領了二〇〇、〇〇〇方英里的土地和二、〇〇〇英里的鐵路。日本更作種種企圖來顛覆張學良氏的權力，並醞釀地

方分離運動。忠於中國的官吏都被撤換而代以「日本的友人」。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日本軍隊設立偽滿洲國，而以清室廢帝溥儀爲執政。其後三個月內，兩個日本銀行借給偽「滿洲國」美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二年五月，日本爲經營滿洲所用去的軍費達美金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這樣的行動卻促成了中國的團結。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廣東政府表示與中央精誠合作。其時蔣介石氏願犧牲一己地位爲國家謀利益，故提出辭職，但對於政事仍保持有很大的勢力。國內學生舉行反日運動，異常熱烈，海外僑胞也踴躍輸將，匯款到中國以資助祖國對於侵略者的防禦。

在日本進佔瀋陽和其他東三省大城市之後，中國人民又使用他們的最有力的武器，抵制日貨。因爲中國爲日本的主要顧客，每年購買其出口貨總額四分之一，所以這種經濟絕交影響日本的實業甚大。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到十二月，日本運到中國的貨物比較一九三〇年同一時期低落百分之六十五，而在一九三二年一月運到中國之日貨較一九三一年一月又少了百分之六十八。在中國北方的日本織造廠泰半倒閉。同時日本公司的中國經理和雇員紛紛辭職，佔中國水道航業四分之一以上的日本的船業公司或停止營業或繼續腐蝕。中國各日本銀行無事可做，小本經紀的日商大多先後破產。

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海的日本僑民請求東京政府派遣海軍來示威，以消弭反日運動。日本海軍歡迎這種請求，想利用這個機會，步東三省日本陸軍的後塵，獲取光榮，並可藉此在國內恢復固有的威望。於是大批軍艦被派

赴上海，威迫華人取消排貨運動。中國的經濟戰爭乃碰到日本的海軍戰爭。

在數天內，日本海軍陸戰隊在上海登陸，並奉命實行佔據該城中日本僑民所居的地點。日陸戰隊在遵行此項軍令之中，就與當地中國守衛軍衝突，上海之戰就此發生了。華人的抵抗卻被稱爲「侵略」。東京的外交家又竭力向世界聲言中國的黷武主義的弊端。

中國軍隊（十九路軍）在一位青年軍官蔡廷鍇將軍領導之下奮勇作戰，堅守上海達三十四天之久，這實使日軍驚訝而惱怒。接着十九路軍爲敵人的飛機大礮及雄厚的援軍所挫，開始退卻了。在此次戰爭中，日本軍隊顯然小看了中國軍隊的膽量與戰鬥力，蓋中國兵士師直氣壯，置生死於度外，自然猛勇無比。同時又重視了自己的實力。雨季的來臨使戰事告一段落，到一九三二年五月，雙方開始磋商，結果議定日本撤退軍隊，而中國終止排貨運動。

當時上海之戰殊有將第三國捲入漩渦之可能。上海有各國的僑民，萬一流彈飛入中立地帶，傷害他國僑民之生命財產，則必致引起更大的戰事。幸而當時無重大的國際事件發生，故上海之戰終爲限於中日間的衝突而已。反之，國聯與美國都不能幫助解決這個問題，而事實上東京政府所運用的外交手腕甚巧妙，使日內瓦與華盛頓之見解彼此背道而馳。

有一個時期謠傳日俄爲了東三省問題將發生糾葛。蘇俄深以日本勢力伸入東三省北部並延及蒙古爲慮。

當僞「滿洲國」奪取中東鐵路的中國利益及法國似乎因以前曾投資於中東路的關係或將德惠日本與俄國衝突的時候，戰雲就彌漫於空中了。莫斯科大爲「戰爭熱」所中，接着有三〇〇、〇〇〇紅軍集中於西伯利亞——滿洲邊境示威。這種示威顯然使日本軍隊氣焰稍殺，並使事態不致擴大。然而，東京政府對於俄國所提議的互不侵犯條約，雖有附有優惠的煤油協定的交換條件者，仍躊躇不肯接受。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國聯派了五人的調查團，以李頓爵士(Lord Lytton)爲首領，前來遠東調查中日局勢並建議可能的解決辦法。(註) 這個調查團包括英、法、意、德、美代表各一，當牠正在進行調查的時候，美國國務卿史汀生(Stimson)宣言美國此後決不承認違反開洛格公約而採取的行動所造成的任何局面或條約爲合法。但是，此種史汀生主義不能得到歐洲列強合作的贊同，因此似乎沒有什麼直接的重要意義。

(註) 在糾紛時期，曾有人提議對日本加經濟制裁，因爲日本的行動違反一九二三年的九國公約和開洛格公約。但這種提議未生效果，因爲上海之戰的結果，日本向各國訂購大批棉和軍火，而中國向各國訂購大批絲織品，尤使英、美蒙其利。一九三二年的經濟情形，因急迫的商業需要，不容許此種提議實現。

在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即李頓調查團公布牠的報告書七天之前，日本正式承認僞「滿洲國」，以窘國聯。這種行動的動機顯然在於使國聯對着已成的事實無可如何，然後再說「已做的事情業已成功了」。這種行動在九月二十四日國聯理事開會的時候，引起了國聯行政院主席(此時恰巧是愛爾蘭的伐勒拉)的痛責。

日本在日僞議定書中正式承認僞國。僞國爲報答日本扶植其「獨立」地位起見，許與日本種種特殊權利，

包括「在偽國任何地點駐兵之權」在內。駐東三省的日本軍事首領對於歐美各國的責問，發表公然反抗的宣言來回答，而東京外務省予以微弱的響應。日本金元的價值在這時期內竟跌落一半，這是很堪玩味的。

李頓報告書很平和，語氣謹慎，竭力避免傷害中日雙方的感情。牠的內容可簡單地分述如下：牠對於政府所鼓勵的抵貨運動是否爲「抗禦強國武力侵略的正當武器」，表示疑問；牠建議中日直接交涉，以解決久懸的一切糾紛而由中立的觀察者從中斡旋；又建議中國應在東三省設立自治政府，這個政府僅承認中國的主權；東三省應設置受外人訓練的中國憲兵隊；主張改革法庭並最後廢除外國的治外法權；以爲如將中國所有鐵路統一一包括南滿鐵路在內，當大有利益；並勸告多聘用外國的政治顧問和財政專家。

李頓調查團並進而建議中日應舉行一個特別會議，從事訂立三種條約：（一）關於日本的利益——尤其是在東三省方面的利益；（二）妥協、仲裁和互不侵犯的條約；（三）獎勵中日貿易並抑止抵制日貨運動的商約。雖則蘇俄並未參與此項報告書的編製，調查團仍建議邀請蘇俄參加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國聯行政院議決將此項報告取決於國聯大會十二月的特別會議。該會議又將此事轉交另一委員會，後者應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建議解決爭端的辦法。當這種討論正在進行的時候，日本又侵入熱河，這個區域位於東三省的西南，藏油甚富，並支配着大宗的鴉片買賣。

第二十二章 美國

多難的時期

在一九一六年的總統選舉中，威爾遜戰勝休士而當選為總統。這位勝利的候選人比他的競爭者多得六十萬票；同一個時候，在參議院中佔大多數的民主黨席數從十六席減到十二席，而衆議院中勢力的均衡竟為一羣不屬於任何一黨的超然議員所操縱。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民主黨漸漸失去民衆的同情，一般人對其領袖亦減少信任心。在一方面，人民反對威爾遜總統在第一任期內所施的進步政策——即在通過克雷吞取締托辣斯條例（Clayton Anti-Trust Law）、聯邦準備金條例（Federal Reserve Act）和恩德武關稅則（Underwood Tariff）等類法律所顯示的種種政策——而在另一方面，人民對於政府在大戰期內所運用的獨裁權力頗生反感。的確，一九一八年的國會選舉的結果，共和黨獲勝，又配參衆兩院之權。

民衆將大戰時期後生活程度的增高歸咎於民主黨的統治。大戰的終止及價值達數十億元的政府契約的取消，使國家經濟制度受到部分的崩潰。可是那數百於獲取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幾百的利潤的製造廠家，在戰後最初數年中，對於較適度的贏利尚不能滿意。利用戰爭牟利的營業依然在進行，曾有一個時期，情形變得更壞。

勞工們不論熟練的或不熟練的，同樣要求保持在膨脹的戰時標準之上的工資。一般消費者則負擔很重，因為以購買力論，一九一四年的美金一元在一九二〇年僅等於四角八分了。最受此種情形的痛苦的，首推薪金階級——教士和專業者，他們的長時期的薪額早經先規定了。

復次，大戰期內政府強迫勞資雙方實行的休戰現已期滿，這兩個敵對集團的久被抑制的力量，乃脫離羈絆而相衝突，來勢至為驚人。當資本家又決意讓『公衆受天譴』的時候，煤礦工人（以此為例），就準備坐視工作停滯。在一九一九年中，發生了幾近三四〇〇次的大罷工。同時檢察長帕滿（Palmer），或者因為想做下屆總統選舉中的候選人，喚起一般人的熱誠來搜索各種激烈團體裏的份子，甚至端重的國民也有『亦禍的恐怖』了。此外，許多美國人對於巴黎和會的事態不能滿意。有些人覺得對於德國的待遇未免過於苛刻，其他的人深信美國又將阿諛不列顛人的主見，而英國將從戰事中獲得最多的利益。同情於愛爾蘭者以為威爾遜忽略了愛人的志望，而意大利和希臘的友人則不滿於和會對這兩國的待遇。有幾方面對於和約中關於國聯的一部分表示堅決的反對，許多主要共和黨員則以巴黎和會未邀請他們參加而異常憤恨。因此，當威爾遜將凡爾賽條約提交參議院（一九一九年七月十日）請求批准的時候，獲得同意的希望是很少的。

參議院中各政黨對於凡爾賽和約問題尤其是國聯的問題，不久分為四派：威爾遜的民主黨黨徒主張批准此約，不加修改。其他民主黨黨員，後來在內布拉斯加（Nebraska）的喜斥科克（Hitchcock）領導之下，建議接受此項和約，但須附有某種溫和的保留條件。洛治（Henry Lodge）（外交委員會主席並為總統的私敵）所

領導的大多數共和黨黨員堅持須將此約大事修改。「不妥協」的共和黨黨員則在愛達和 (Idaho) 的波拉 (Borah) 統率之下，反對美國以任何方式加入國聯。

公衆對於凡爾賽和約攻擊的主要目標實在於國聯盟約，尤其是對於其中以國聯會員國資格給與英國的各自治領地的一條，及保證會員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的第十條。威爾遜總統竭力說明：因為國聯的議案須經全體一致通過方能有效，故如無美國的贊同，國聯行政院決不能有所作爲，並且國聯的一切義務是「道德的」而非「法律的」。但是他的反對者卻加第十條以污名，以爲此條對於美國國會所有單獨宣戰和核准美國軍隊的運用之權，大有侵犯。

有些凡爾賽條約的反對者如此誤解第十條，以致使許多人民深信國聯能够強迫美國國會派遣美國兵士前往非洲的沙漠或印度——支那的叢林中作戰。哈維氏週刊 (Harvey's Weekly)就這樣宣稱：「假如第十條的解釋是含有相當意義的，它的意義必然是說，當駐在瑞士的外國人太上政府隨時命令我們派遣軍隊到任何地方作戰，我們就必須遵照辦理。」伊里諾州 (Illinois) 的參議員錫爾曼 (Shermann) 則設辭達到這個結論：「國聯將禁止我們的商貨出口，斷絕我們的交易，摧毀我們信用，讓我們的商船枯朽在碼頭上，關閉巴拿馬地峽運河 (The Isthmian Canal) 命令我們的國會宣戰、徵稅、撥款，招募海陸軍並維持之，並派遣我們的兵士前往地球的任何部分作戰而死，種種端爲了外國行政院要這樣辦而已。」有些愛國者顯然忽視美國的參加大戰，而聲言美國若與國聯發生任何關係，將使國家有背離傳統的超然政策的危險。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就毫不驚異當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九二〇年三月凡爾賽條約被提出國會表決的時候，無論是否附有保留條件，均未經批准。在第二次表決前數星期，威爾遜（他在一九一九年九月間巡遊全國的旅程中突患麻痺病）曾建議在一九二〇年的選舉中將關於國聯的問題交付國民作「偉大而莊重的複決」。

一九二〇年六月，「共和黨推舉總統候選人大會」舉行於芝加哥，四個有當選總統可能的黨員為胡佛，以在戰時為糧食統監著名；伍德將軍，前總統羅斯福的同僚；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州的參議員約翰孫（Hiram Johnson）他這個人也是「不妥協」分子，但很進取；及依里諾州長勞頓（Frank Lowden）農民的友人。當這四個人之間的僵局顯然不能打破的時候，黨中就推舉了一個不知名的，但可博得意外之勝利的競選者——據說是根據於「任何善良的共和黨黨員都可以被推舉……而都能擊敗任何民主黨黨員」一原則。他們就看了俄亥俄（Ohio）州的哈定，他之被推舉實際上已由參議員洛治和黨內其他領袖於一個秘密會議中決定了。此次所以遴選哈定，大概因為這個「溫良的反對改革者」在國內沒有敵人並易於駕馭。該黨黨綱中對於威爾遜的統治非難的地方很多，並建議在「不妨礙國家獨立」的範圍內成立世界和平協定。

六月二十八日，民主黨集會於舊金山。前任財政部長麥克阿度（Mc Adoo）（他是威爾遜的女婿，人家題他的綽號叫「皇太子」），檢察長帕滿（他有「紅疤」的渾號）和俄亥俄州長考克司（Cox）三人，形成三角式的競爭。後來畢竟推舉了考克司。民主黨的黨綱主張「不附保留條件立刻批准和平條約，因為如有任何保留

條件，反使條約的完整受損。』社會黨第五次推舉第勃斯 (Debs) 爲候選人，那時他正在亞特蘭大 (Atlanta) 感化院坐監牢，爲了在大戰期內會從事和平運動。

一九二〇年競選的結果，一方面是受了上述的一切政治的和經濟的要因之影響，另一方面也受了此外幾種重要的因素之影響。就各方面說來，足以左右選舉者，有下列數項：(一)根據一九二〇年鐵路運輸法 (Railway Transportation Act) 的有利條件，鐵路仍歸私有；(二)價值鉅萬的國家財產因停泊於哈得孫河 (Hudson River) 和他處的千百艘船舶（爲應戰時之急需而以極大代價所建造者）之朽爛而化爲烏有；(三)憲法中第十八條修正案或禁酒案的批准與服爾斯提特法令 (Volstead Act) 的通過（一九一九年），該項法令規定凡含有酒精百分之〇五的飲料皆爲「醉人的」；及(四)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或婦女參政權案的批准。

所有候選人，在民間都不聞名。考克司君曾三次任俄亥俄州長，並且做過戴通報 (Dayton News) 的記者，和某公司的律師。哈定君做過麥里翁明星報 (Marion Star) 的主筆，並曾任俄亥俄州代理州長和參議員等職。當時哈定當選的呼聲最高，他爲人很坦白，仁慈，富於宗教情緒，據一位朋友說，「他是在每星期六通夜玩撲克牌的一個最好的人」。在他的口號：「回到常態」中，很好地表示着許多厭倦政治改革運動並「要拋棄一切可成爲各種事物之原因的理想而稍事休息」的人意見。

國際聯盟問題似乎在這次競選中並不佔有何等重要地位，因爲美國那時一般都覺得自顧尚且不暇，更不願去慮及與自身沒有任何密切關係的閒事。哈定對於這問題取模稜的態度，他說他反對「這個」國聯而贊

成組織「另一個」國聯——就是「各國自由結合的團體」。此次共和黨候選人以七、〇〇〇、〇〇〇票的多數而獲得勝利。自從南北戰爭以來，一個會脫離合衆國的一州——田納西(Tennessee)之「傾向共和黨」還是第一次。

在選舉後四個月，威爾遜就離開白宮，他是疲倦了，病了，遭人唾棄了。

「回到常態」

哈定總統本人對於外交事務不甚明瞭，遂以國務院政務委託於較有經驗的休士辦理。這位新國務卿的第一樁要辦的任務，就在使美國與德奧——匈之間的戰爭狀態從速結束。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威爾遜總統曾否決一種兩院共同決議案，這個決議案的用意即在立刻停止敵對行為而不必等候簽訂條約的手續。一九二一年七月，國會復行通過此案，經哈定總統的簽署，宣告戰爭業已終止，美國保留一切根據未經批准的巴黎和約(Peace of Paris)所增的權利與特權。幾個月後，柏林和約、維也納和約和布達佩斯和約(The Peace Treaty of Berlin, Vienna and Budapest)經陸續簽字和批准，美國在每一件中都經擔保協約國與德奧——匈各國所訂的條約內爲它「所規定的一切權利與利益」。

哈定一上了臺，就覺得國際聯合會各會員國對於美國所提解散這個組織而另行設立一個新的團體之意見決不會理會，所以他對於「各國的自由結合」一句話就絕口不談了。在共和黨統治之下，美政府想把國聯完

全忘掉，以致國聯秘書長送致美京華盛頓的公文書和照會差不多有六個月沒有得到美國的任何答覆。美國派駐倫敦的大使曾奉到訓令，叫他通知國聯當局：「美國既未加入國聯，它就沒有答覆國聯的函件的必要。」甚至直到紐約泰晤士報將此種情形披露之後，美國國務院纔正式致牒國聯，承認收到國聯的文件。

在一九二二年初，美國政府對於國聯的態度充分地改變了，它於是派遣非正式的觀察員前往列席國聯會議，惟以此種「會議之討論涉及有關美國的事件時爲限」。此種會議爲關於鴉片販賣問題，海關手續問題與交通運輸問題的。哈定總統雖然漠視國聯，但極力主張美國加入世界法庭，惟以給與美國於遴選法官時與他國同等的發言權爲條件。此項但書是必要的，因爲美國在有權推選世界法庭法官的國聯大會中並無代議權。哈定在國會沒有通過他的建議前就逝世了。

在這幾年中，美國與蘇聯的關係，較之與國聯的關係，更爲黯淡。美國商務部長胡佛堅持說，在布爾扎維黨的經濟制度之下，俄國不能希望「真正恢復生產」。因之它「不會有大量的商品出口，結果也就沒有多大能力可以獲得進口貨」。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毫無要與俄國恢復外交的關係，以便利貨物交換的動機。

然而美國對於下列兩種問題卻不願置諸不問：海軍的建造及太平洋與遠東的關係。一九一六年的美國造艦程序所引起的英、美間的海軍競爭，很嚴重地危及兩國人民的親善關係。兩國的財力都不足以濟用，它們也受不住所釀生的精神痛苦。這件事情因了英、日同盟局勢更趨嚴重，範圍日益擴大。美國所慮的就是英、日同盟，它可使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利益大受威脅。遠東領土現狀的問題因之也可以加以有利的討論。爲了這種緣故遂有一

九二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二年二月的九國會議舉行於華盛頓，會議對於海軍軍備的限制及太平洋與遠東的問題成立了幾件協定，這在前面已經講到。(註)

(註)參見第八章與第二十一章。美國在一九二一年曾向英、法、明、白、聲、言、美、國的煤油公司應在近東國聯委任統治地的油井開採權中享有一份利益。

事實早就顯然，哈定總統在內政中所採取的「回到常態」政策，就是回到麥金萊 (McKinley) 和漢那 (Hanna) 的政策，這兩個人為提倡大商業和保守主義的卓越使徒。在一九二一年，財政部長梅隆 (Mellon) (賓夕法尼亞 (Pennsylvania) 州的一個有錢的銀行家) 建議大事減低所得稅稅率——尤其是對於較高的收入所徵收的。他提議將最高收入的附加稅從百分之六十五減到百分之二十五。美國國會顯然尚未準備實現這樣的常態，它不過廢止了過高的贏利稅並規定附加稅的最高額為百分之五十(一九二一年)接着通過了(一九二二年)退伍軍人的津貼法 (Bonus Bill)。哈定總統卻將此項法律加以否決，其所持理由如下：(一)此法未載有籌措所需款項的規定；(二)美國軍人一向沒有求得津貼的願望，直到美國軍團創立時(一九一九年)始有是項提議；及(三)政府在分配款項與給予老弱殘廢者補償金之中，已非常慷慨。在同一會議中國會又通過了高率的福特納——馬肯貝爾關稅稅則 (Fordney-McCumber Tariff) 以代替一九一三年的恩德武法 (Underwood Act)。此項法律授權總統於經過關稅委員會調查後，認為美國現有的稅收，不能使本國的生產費用(即成本)與競爭的外國的生產費相等時，得將所規定的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稅率，增加或核減之。

在一九二二年，回到常態的路一部分被阻塞了，因為有六十萬煤礦工人和三十萬鐵路店員的罷工。在這兩次罷工中發生很多暴動，檢察長多厄替 (Taugherty) 得到芝加哥法官的鎮壓鐵路工人的訓令，此項訓令實際上完全禁止各工會會員的一切活動。擾亂治安之罪多加諸過激分子和專門煽動者身上，因之一般民衆對於工人此舉都不大表示同情。

其時國會銳敏地感覺到另一個問題，就是農人的經濟苦境。在歐戰期內，農田工業化的過程進展至速。戰時糧食的需要使每畝田地都有利可獲，祇要人去種。那時的農人因之大事借款以便多購田地，多買機器。在一九一九年，美國全國農田的總收成，與十年前的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相比較，竟值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是到戰後，美國農人反負了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債。

甚至即在戰時的繁榮時期，一般農人祇賺得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六而已。所以當棉、麥、穀類及牲畜的價格於一九一九年後的商業衰落中趨於暴跌的時候，農人就陷於絕望之境了。他們雖然經營了幾個十分圓滿的買賣合作事業，但是他們沒有調節生產和制止價格下傾的組織。在一九一九年，每一英斛耳的小麥價值二元一角四分，但到一九二三年，祇有九角三分。關於其他的農產物，情形也相髣髴。反之，運費卻繼續飛漲，地方稅率比一九二二年的竟超出三倍。農人借款的利息，又必須照付，否則他們就將被取消贖取抵押品的權利了。

農民在絕望之中轉向政府求救濟。於是國會中創立了一個「農集團」(Farm Bloc) (一九二一年) 以代表西部農民的利益。這般農民對於修改的稅率，運貨業的補助金或移民法案（這些法案是東部各州的議員

所焦慮的)都不加以重視。在一九二一年與一九二三年之間，國會通過了許多救濟農村的法案，大半用於禁止糧食投機，增加農民信用借款的便利，並徵收農產進口稅。然而，遇着加拿大、澳洲及蘇俄的穀類的激烈競爭，這些法案都未能解決美國的農業問題。

一九二三年六月，哈定總統和他的家屬出發遊歷全國和阿拉斯加，這次旅行是不幸的。當他動身的時候，他的健康並不甚好，迨抵阿拉斯加(Alaska)即發大病。歸次舊金山，遽爾謝世(八月二日)。他致死的原因，無確據證明，但我們可以相信，他的死或許直接或間接由於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的官場舞弊有關，這個舞弊案甚至超越格蘭特(Grant)時代所發生的醜聞。

首先被發覺的舞弊案為退伍軍人局局長，哈定的友人佛白司(Forbes)所幹的。根據參議院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佛白司以官吏資格所為的各種行動是「最為浪費的、輕浮的和不正當的」，他耗去公款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佛白司就爲了這些罪行被判處有期徒刑，關在勒汾衛司監獄裏。

此外參議員惠勒(Wheeler)所主持的調查委員會又發覺檢察長多厄替(他也是哈定的朋友)在司法部裏時交結了一羣名譽很糟的人，且對於一般騙子和違禁販酒者未能實行檢舉。當多厄替拒絕調查委員會到他的辦公廳搜索其他證據的時候，柯立芝總統就把他革職(一九二四年三月)。

最大的舞弊案涉及政府煤油儲蓄池被私行出租一事。哈定似乎簽署了一件命令，准許海軍部長登貝(Denby)將設在加利福尼亞州歐而克山(Elk Hills)和華明的梯北脫(Teapot in Wyoming)二處的石油

池的管理權（這兩處的石油是在前總統塔夫脫和威爾遜時代儲作海軍之用的）移交內政部長福耳（Fall）。福耳以反對美國與墨西哥發生友誼關係而著名，他又是一個「矯飾牧童姿態和藐視改進黨與保守派」的人。在一九二二年，福耳沒有公開標價，就以梯北脫的油池租給辛克萊（Sinclair），而以歐而克山的租與獨亨納（Doheny），兩者政府所抽的採油稅都極低微。

不久，煤油的氣息在政府官員的衣服上嗅着了。於是參議員發爾喜（Walsh）所支持的調查委員會又找出一個驚人的舞弊案的端緒。據調查的結果，纔曉得辛克萊曾資助一九二〇年共和黨競選運動的大宗費用；獨亨納曾在一九二一年借給福耳一〇〇〇、〇〇〇元，並無擔保品和利息；後來福耳又從辛克萊處借得二五、〇〇〇元的款項，還收受過煤油業人送給他的許多值錢的禮物。他很聰明，在這件舞弊案沒有洩露之前，就在一九二三年辭職了，接着就隱居於以「借款」所購買的一所大牧場裏。福耳去後一年，登貝爲了不要使政府因他不在意公家利益而爲難，也就辭職了。

在一九二四年，政府對福耳、辛克萊和獨亨納以註銷租約和行賄陰謀的罪，提起公訴。政府在一九二七年獲得第一點的勝利，最高法院宣佈租約無效並令歸還油池。其時五年已經過去，在這五年內，承租者自然已經大獲其利了。在其他訴案中，原告卻不十分順利，或者因爲政府對於這幾件案子未加緊催促。獨亨納和辛克萊兩人都能够說服陪審官，他們並未犯陰謀或欺詐的罪，他們的行爲完全出於愛國的動機。他們自辯道，油池裏的油或因附近的居民掘井之故被吸引乾涸了；油池租約上的條件對於政府是有利的；而未經開採的油井對於海軍畢竟

沒有多大益處。然而辛克萊終以雇用私探蒙蔽陪審官並拒絕答覆參議院調查委員會所提出的問題而鑄成大錯。他遂以侮辱法令之罪被判處三個月的徒刑。福耳經過數度審問後，亦於一九二九年十月被定為有罪，判處一年的監禁和一〇〇、〇〇〇元的罰金。牢是坐了，但罰款未繳。

大戰後的這種「犯罪波浪」並不限於官場。私人的犯罪漸成為每日的譚話資料，不過官場犯罪的範圍較大，而人民犯罪的範圍較小罷了。在一九二一年中，據說全國每日必發生一件盜劫銀行的重案，而芝加哥的汽車每二十二輛中必有一輛（在紐約則每三十輛中必有一輛）被竊。當時「美國各城市的盜竊保險費定率高於英國的十五至二十倍」，而「美國的殺人案比英格蘭和威爾斯（Wales）的多十六倍」。手槍和機關鎗是戰後的犯罪者所用的武器。投恐嚇信勒索金錢的風氣一時盛行，成為非法收入的大宗來源。在美國發生的許多暗殺案，以及在歐洲所犯的，似乎都是一般在大戰期內受了一些使用步鎗的初步訓練的人所幹的事。（註）公眾有好多多年已看慣了每天報載大批人被礮彈、鎗子、毒氣、刺刀和手榴彈殺死的消息，現在再看見鐵甲車裝運着金錢和貴重物品在各大城市的街衢中駛過，也就認為司空見慣的景象而不大受驚了。

（註）這種情形在雷馬克的歸路（The Road Back）中有痛切的描寫。

「安全和穩健的」政策

在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宣誓繼哈定為美國總統的人，在美國不很著名。這位繼任者就是柯立芝。他以一八

七二年生於威爾滿 (Vermont) 地方。他畢業於安麥司特大學 (Amherst College) 於一八九七年就在諾坦普吞 (Northampton) 開始研究法律，接着廁身政界，屢獲升遷，後來做到了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的州長。柯氏是一個靜默的、節儉的、勤懇的和嚴肅的人，從不主張新奇的或激烈的事情以驚世駭俗；當他看見大多數人向着一定的方向行動時，也決不退縮。

他在做馬薩諸塞州州長的時候，以善於應付一九一九年波士頓 (Boston) 警察的罷崗而第一次引起國人的注意。那時他召集了該州的民軍恢復秩序，並且諭告警察說：「不論什麼人，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都沒有破壞公共治安的罷工權。」柯氏在解決此項事件中所盡的力，其評價人各異辭，但至少他的朋友歡呼他為「沈默的鐵人」，到了翌年，他所隸的一黨就授與他副總統的候選資格。雖然他是一般諷刺畫家和諧謔者所愛好的人物，但他對着不虞之譽與求全之毀，仍漠然無動於中。他是「沈着而如職務一樣固執」，並且他「完全贊成十誠」。柯立芝上臺後維持前任的內閣，不更加動，並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首次致文國會，申述本人的方針為節約為貫徹他的主張起見，他就把一九二四年國會通過的第二件津貼法案 (Bonus Bill) 予以否決，這件法案規定一種預付保險費政策的制度，在二十年之期屆滿時，本金歸於持票人。此項法案這一次雖經總統否決，仍得通過。同年，所得稅更有減少，而一種限制甚嚴的移民律，即國民來歷法 (National Origins Act) 被採取了。此法直到一九二九年纔完全發生效力。其中對於北歐各國的移民稍加優待，限定每年入境的僑民祇許有一五四、〇〇〇人，但完全排斥沒有資格為美國國民的亞洲人。最後一項規定引起許多外國人的惡感，尤其是日本人。

柯立芝在一九二四年獲得共和黨的推舉爲總統候選人。以規劃賠款計畫著名的道威斯將軍則被推爲副總統候選人。民主黨的候選人爲大衛斯 (Davis)。他是西佛琴尼亞 (Virginia) 州的一個不知名的保守者。大衛斯於民主黨的一〇二票未能把麥克阿度 (William G. McAdoo)和紐約州長史密司 (Alfred Smith)二人的相持之僵局打開後就被推舉了。從大眾的觀點看來，大衛斯與銀行大王摩根 (J. P. Morgan)的關係無疑地爲他被推舉的要因。

第三黨（進步黨）以威斯康星州 (Wisconsin)的參議員拉福來脫 (La Follette)氏爲首領，亦於一九二四年時加入競選。那般深表不滿於兩大黨以保守沾沾自喜的態度而欲對之投反對票的知識分子，「背叛的」共和黨人和進步主義者都被此黨吸收去了。然而進步黨所得的票數還不到五百萬，因之隨競選而消逝了。柯立芝得着許多口號的幫助，就大獲全勝，他計得總票數的百分之五十四，有七、〇〇〇、〇〇〇票的多數。（註）

（註）自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美國政治舞臺因幾個老領袖之死亡稍呈澄清之狀。羅斯福已卒於一九一九年，威爾遜與洛治則在一九二四年逝世。拉福來脫與布賴安 (Bryan)、第勃斯 (Debs)、聾勃爾 (Gompers)和坎農 (Cannon)等人亦相繼去世。

柯立芝總統的第二任期內，沒有什麼驚人的國內立法。國債減少了，附加稅降低到百分之二十，對於收入較少的國民所課的所得稅，也略有減輕。同時又通過了幾件幫助農業生產和買賣的法律，可決了一大筆款子以充防止密士失比河 (Mississippi)泛濫之用。救濟農民的麥克那萊——蒙琴法案 (McNary-Haugen Bill)則經總統否決，此項法案中有一項主張釐定國內的穀價，否決的理由謂不合於經濟原則。

禁酒法的施行仍為政府最困難的工作之一，蓋此舉不啻以法律來改變數百萬人民的習癖。再者，一般違禁販酒者和私運商人都從違犯此項法律中得到很多的利益，一個大流氓且自誇在某一年中他的機關會因遏止禁酒法令的施行而耗去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費用。雖然美國各地都有這種罪犯的蹤跡，他們最關心的都是從非法製釀和非法販賣酒類所獲得的利益。

在這幾年中間，一般人民對於政治很少興趣，這一層也許可從下述一情形測知——芝加哥講壇報（Chicago Tribune）在吞納打勝鄧浦賽奪得世界的重量拳賽錦標後那一天，就比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國會選舉舉行後的一天多銷去五萬餘份。

外交（一九二三—一九二九年）

在哈定統治的時代，美國的外交政策大都關於因本國參加大戰和否認凡爾賽和約所引起的政治問題的清算。然而在一九二三年後，外交的趨向因人民感到本國在世界的經濟地位有重大的變遷而另有所定了。

直至一九一四年止，歐洲曾經是『世界的銀行家』。在大戰的前夕，英、德、法三國對外的總投資約達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美國的投資總計為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大戰的結果，這種形勢發生驚人的變化。在一九二八年，外國所欠美國人的私債的價值計達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到了一九三〇年，此項數字又昇至一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有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是投在歐洲。

的。同時，歐洲對於美國政府所欠的戰債又增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譜。一九二七年，各外國政府各市區和各公司應付美國人民的債款息金竟達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鉅。在這裏也許可以注意的，在一九二四——一九二八這五年中，美國的對外貿易，每年平均得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國商輪在一九二八年的總噸數為一四、五四〇、〇〇〇。

美國國民自然希望政府保護他們在外國所有的利益，而華盛頓也準備負起這個責任。(註)海軍部長在一九二五年的演說中，對一羣商人說明政府的種種責任道：「要保護美國，我們就必須準備保護它的利益，並且要保護世界各處的美國國旗……一個美國孩子倘在距海岸千里的揚子江岸啼哭，他就可以召喚美國的軍艦，開到那條江裏去保護他，使不止受不當的毆擊」。同樣，柯立芝總統雖然深信「在和平中可以求得解除重稅的負擔的最大機會」，不久也明白表示美國的海外投資當受充分的保護。

(註)政府對於以下三種借款頗有不贊成的傾向：(一)以充不生產的事業之用(如軍備經費)的借款；(二)貸與未備償還對美所欠戰債之國者；及(三)或將用於發展不利於美國消費者的而為外人所有的原料專業者。

在一九二七年，當尼加拉瓜 (Nicaragua) 國發生嚴重的政治紛亂的時候，美國派遣了五千海軍和數隊飛機前往該國。這種舉動表面上是爲了保護美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但在另一方面似乎也爲了阻撓被稱爲盜匪的自由黨人危害地亞士 (A. Dolfo Diaz) 總統的保守政府。美國國務院對於這般保守黨人很表同情，因爲他們從一九一二年以來就對美國親善，並給與美國海軍根據地，及管理尼加拉瓜的海關、銀行、鐵路和建造尼加拉

瓜運河之權。柯立芝大受本國和拉丁美洲的輿論的嚴厲批評，說他所用的方法不對。後來他派了史汀生 (Stimson) 氏到尼加拉瓜去覓求和平解決的途徑。

史汀生設法使一部分自由黨人與保守黨訂立了一個協定，其中規定自由黨須停止進攻，將他的鎗以十元一枝的代價完全交出，並於一九二八年在美國監視之下舉行新選舉。但散定拿 (Sandino) 將軍所領導另一部分自由黨人拒絕此種解決法，並繼續以遊擊的戰術向保守黨進攻，且危及美國人的生命財產。散定拿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季（即在該國首都馬拿瓜 (Managua) 地震之後）特別活躍，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和尼國的軍隊簡直無法把他虜獲。

美國在干涉尼加拉瓜之外，又遇到一樁更嚴重的事情，即與墨西哥的糾葛，發生於墨西哥土地法（根據一九一七年的憲法所通過）之解釋與追溯力。一九一七的憲法將土地與地底富源的所有權授與墨西哥國家，但准許國家將其權利轉讓於墨西哥人民或外國人，惟以外國人承諾於發生關於此種權利之爭執時不請求本國政府保護時為限。一九二六年，墨西哥總統頒佈了幾件條例，規定凡在一九一七年的憲法公佈前取得土地權利的地主，均須將此種權利交換一種新的五十年之「特許權」。很多美國煤油公司，恐怕它們的利益有所損失，就在墨西哥組織了一個「保護美國人在墨西哥權利協會」，對這種土地法令作反對的宣傳。其時墨西哥因要將天主教教堂產業收歸國有，就通過了數件反教會的法律，這樣一來，反使美國人的宣傳輕而易舉了。（註）

（註）在一九二五年，美國人在墨西哥所保有的財產估計達一、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國務院痛斥這些條例，認為侵犯美國的財產權，但參議院於一九二七年一月以七十九對零的票數議決把所爭執的問題付諸仲裁。然而在數天以前，柯立芝總統已聲言美國的財產權不受仲裁之處置，國務卿開洛格氏（他在一九二五年繼休士之任）亦曾譴責墨西哥在美國和中美洲各國宣傳布爾扎維主義並援助尼加拉瓜的革命黨。幸而美國未採取公然的行動，接着政府委任機警的摩洛（Morrow）氏為駐墨西哥大使。過了若干時候後，美國第一個從紐約飛到巴黎中途不停（一九二七年五月）的空中英雄林白（Lindbergh）上校與俄克拉何馬（Oklahoma）的牧童丑角羅吉斯（Will Rogers）同到墨西哥作「表示好意的遊歷」。

摩洛大使抵墨西哥後，即從事搜羅該國一般官吏的觀點，結果他能夠說服他們，使他們相信美國決無破壞自一九二三年外債問題解決後兩國政府間所確立的和好關係的意思。於是雙方都妥協了。美國公司承諾將他們的事件提交墨西哥最高法院處理，最高法院也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宣佈幾種最可憎的土地法和煤油法為違憲。

一九二七年，華盛頓當局又憂慮到居住南京、天津和其他中國大城市內的美國人的生命財產之安全。中國民族主義者和共產黨的活動，對於外國人是一種危險的禍源，於是美國步其他幾個國家的後塵，派遣海軍陸戰隊到南京去實行保護。（當時南京的外國居民所羣聚以資防衛的地方為美孚汽油公司所在的一個小山）後來國民黨確立了他們的權力，並答應對外人加以充分的保護以後，美國的軍隊方逐漸撤退。

要講完美國與一般弱小國家的關係，還必須述及一九二三年春季在智利的聖地哥（Santiago）及一九二一

八年上半年在哈瓦那 (Havana) 所舉行的兩次汎美洲會議。在前一次會議中，美國拒絕了拉丁美洲各國的參與解釋或適用門羅主義的提議。在後一次會議中，「任何一國不得有干涉他國內政之權」的議決案，大抵因了美國的反對，最後被撤銷了。哈瓦那會議又規定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重行集會於華盛頓，以便採取以和平方法調整國際糾紛的各種步驟。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的第二次集會接受了兩種協定，規定以仲裁與妥協方法解決一切糾紛，惟「不受國際法之支配者」不在此例。這兩種協定的批准進行得很慢。

在美國和歐洲的關係中，各協約國間的債務問題佔了顯著的地位，特別因為美國本身對於取回借款問題意見並不一致。(註)在一般主張索取者的論調中，有下列各種：(一)依據商業道德的基本原則，債務的索取為維持契約神聖所必要；(二)如取銷債務，對於美國的納稅人殊欠公允，因為不論歐洲是否照付，戰債必須收回；(三)全部的清償可以恢復美國對於歐洲的誠意的信任，因為歐洲各國並沒有重徵其國稅，他們在北非和近東的戰役及維持巨大的軍備，仍在花費鉅額的金錢。

(註)在一九二八年，英、法、意三國對美所負之確定債額總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原有的債務中百分之七十是大戰期內借的，百分之三十是休戰後借的。

一般贊成取消戰債者的主張如下：(一)因美國參戰最晚，死亡的人數不多，用去的金錢較少，它就可以認此項債務為一種捐助大戰的款子；(二)美國因戰時活動的結果，已成了巨富，它應該以得到新的商業關係和新的市場為滿足了；(三)關於商業倫理的道德論據決不能圓滿解決國際的糾紛問題（例如戰債）；(四)假若美國

全國外貨充斥（歐洲不賣去這些貨物決不能償債）本國的製造廠家勢必遭殃（五）美國如堅持索取戰債，極易招致各國對美的惡感，反之取銷戰債即可增進國際間的和諧。

第三派人的意見則贊成附有條件的取消。據他們說，戰債給與我們保障世界和平，並以數十億金元的代價救活數百萬生命和保存無量數財產的機會，況且這些債款充其量也不過是分期付款的。如欲取消戰債，也未始不可，惟須各受惠國擔保將這樣省下来的錢完全用於教育或經濟方面，而不用於軍事。再者，協約國的債務和德國的賠款也應互相取消；否則有最後一個辦法，即以解除歐洲現有的軍備作為取銷戰債的條件。

華盛頓政府終究擇定了索債的途徑。用柯立芝總統的話來說，協約國既已「借用金錢」，現在自應連同利息償還此款。美國乃與各債務國締結了幾種特殊協定。一九二三年，美國首先和英國解決此事。英國得以低利率分六十二年付還。接着又與其他債務國（從意大利一直到來比利亞）成立同樣的協定，利息更低，最難解決的要算和法國的磋商了，於是在一九二六年的梅隆——貝倫協定（Mellon-Berenger Agreement）草定之前，美國對於法國的借款問題祇得暫行擱置。法國國會直遲至一九二九年纔批准那項協定，它在這間歇的三年中，僅付了息金。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柯立芝總統學哈定的樣請求參議院批准世界法庭草約（World Court Protocol）。經過總統的幾番勸說後，參議院始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予以同意，但附有五個保留條件。最難堪的就是第五條的第二項。這裏面說：世界法庭「如未得美國政府的同意，不得接受任何諮詢的請求，涉及美國有權過問或與有利害

關係的爭執或問題」。世界法庭的各參加國對於這些條件，除此項外，大體都予接受，它們認爲該項保留不會給與了美國一個處於特權的地位。各參加國也提出對抗的保留條件，但美國參議院漠視之。到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柯立芝總統乃宣稱他停止催促參議院准許美國加入世界法庭了。

在柯立芝總統執政期內，美國除有參加世界法庭的問題外，又採取了與國際聯合會增進合作的政策。在國聯所有一切裁軍會議和經濟會議裏，美國都派有代表列席。通常美國所派往國聯參加討論並貢獻意見的代表，是一種非正式的觀察者，但它從不接受任何決議案，以免受拘束。美國在一九二七年曾支出它所應負的一份國聯會議費用一萬七千元，從這一層可以估量美國的參加達到何種程度。這筆款子要比其他任何參加國（英國除外）所出的一份來得多。美國有數百位公民在國聯供職，他們的薪金都由國聯供給，同時有許多美國人主持國聯的疆界、鐵路、河道等委員會，有幾個且被選爲世界法庭的法官。從一九二六年開始，美國自動將最近簽訂的幾件條約的副本送交國聯秘書廳備案，此項手續是各會員國所應辦理的。

在這幾年中，美國又企圖與歐洲各國共同致力於確立世界的和陸於更鞏固的基礎。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九年，美國的財政專家於擬定新的賠款方案之工作中占一非正式的但爲主要的地位。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限制海軍軍備會議是由柯立芝總統建議舉行的。美國和其他各國密切合作的最著例子，恐怕要算簽訂一九二八年的巴黎公約一事了，此項公約反對以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工具。

一九二八年的選舉運動

一九二八年夏季，照例的總統候選人推舉會又舉行了。依美國相沿的習慣，總統不得連任三次，但此次柯立芝的大名又被提出了。當柯氏寫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的是：「我不願參與一九二八年的總統競選」）。交給新聞記者的時候，共和黨中發生了一次紛擾。柯氏此舉引起一部分人對其真意所在的推測，但後來柯氏明白表示，他不要大家認他為可能的總統候選人。

柯立芝既被除外，不久就顯然，總統候選人當屬諸胡佛了。他是一個成功的開鑛工程師，在各大陸得到很多經驗和遭遇，並曾在比利時擔任美國賑濟委員會委員長，在本國做過美國糧食統監，兩任商務部部長，又於一九二七年為密士失比河水災救濟委員會的主席。他的服務成績是彰明顯著而值得頌揚的，他在海外的名譽也很大。首次投票時，他就被推舉了。參議院的共和黨領袖提斯（Chittis）則被推為副總統候選人。

共和黨的黨綱預許厲行禁酒，救濟農村，維持國際間的友誼，並制定鐵路、商品與防止水災的法律。黨綱內照例讚美前任政府的政績。內中有一句說：「節約政策已被昇至為一個施政原則的尊嚴地位」。國家的繁榮，則指為共和黨事業的光輝。

當民主黨的推舉人開會的時候，有一位闡明方針的演說家提醒一般黨人道：「我們在威爾遜統治下的八年光明紀錄，像太陽光之有斑點一樣，與八年的特權和罪惡之黑暗背景相襯而益彰」。所以民主黨的黨綱着重

哈定時代的舞弊案，指摘共和黨的課稅政策，並訴說近年來取締托辣斯的法律已被「阻撓、漠視和違犯」。據他們說，若在民主黨的統治之下這一切就將不同了。此外，他們又預許保護儲水地帶，公平待遇工人，厲行禁酒法令，和採取積極的外交政策。

在這個會議中，候選人的推舉也是在頭次投票時決定的。史密斯氏即為該黨準備推舉的人物，他曾四度為紐約省省長，並且是一個負盛名的政治家，進取的行政家，和堅決的戰士。副總統候選人則屬諸阿肯色（Arkansas）的參議員魯濱遜（Robinson），然而不幸，史密斯是一個天主教徒，又為不主禁酒者，這很有礙民主黨黨內的調和。為了這兩層關係，他是終歸失敗的，尤以西部南部的人民，都不投他的票。

這次競選非常令人興奮，人民所投的票數特別多。兩黨儘量使用無線電播送演說，同時又因有宗教的和禁酒的問題之提出，所以數百萬平素對於政治冷淡的人們也被引起注意。胡佛是一個教友派教徒並為主張禁酒者，他認為禁酒是一種高貴的試驗。他有新教徒的和禁酒的團體做他的後盾。他如三K黨，反天主教會，反猶太人會及排斥外人與排斥黑人的會社——它們也極力運動使民主黨的候選人不得當選。史密斯未受過高等教育，與坦馬尼（Tammany）派有密切關係，外交知識也有限，這些事實都構成被人反對的原素。而史密斯夫人在美國婦女界又不若胡佛夫人有名，所以她的丈夫不能獲得幾多婦女所投的票。反之，美國「主開酒禁」的團體和大部分自由主義者則援助民主黨。

雖然有一五、〇一六、〇〇〇票是向來自「紐約市行人道」的一位（指史密斯）投的，胡佛氏仍以多得

六百萬票而獲勝利。社會黨候選人湯麥士也獲得二十六萬七千票，他是普林斯吞大學的畢業生，在競選時爲牧師。史密斯祇在南部六州及馬薩諸塞州和羅得島獲得勝利，在本州（紐約）反遭失敗。但民主黨的紐約州長候選人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氏卻很容易地在該州獲勝了。競選運動過去後，一個銳敏的觀察者，認爲共和黨的勝利當歸因於「禁酒、成見和繁榮」。

胡佛的統治

新任總統胡佛氏以埋頭苦幹和責任心很重著名。他在安坐白宮的時期內，即明顯地表現着他的能力——一個計劃家和組織家的能力。但不久，他已被人看出缺乏領袖的才幹。有人批評他道：「他能够用極大的手腕經營一部或數部；他能够組織各種力量以應付危急；但他不能指揮一個政黨，領導國會裏的團體，或指導輿論。」他比較不能忍受批評，將他的主要政務委託於各種專家委員會，信賴它們的意見，他所委派的這種團體，比之前任各總統所派的多得多。他在政見上是一個保守者，在經濟學說上，是一個新的重商主義者，贊成高率關稅和大商業。

在最初看來，似乎胡佛的政府將有非常的成功。國會兩院的議員實質上是共和黨人占大多數，內閣是很有能力的，美國全國所有共和黨籍的公務人員大都沒有什麼劣跡可供人誹謗，而整個國家似乎有繁榮的景象。可是胡佛總統馬上遇着幾種非常重大的問題，於是等不到自行擬訂立法方面的建議就迫得召開一個國會的特

別會議。

胡佛在就任詞中，曾指出美國關稅宜有「限制的變更」，農村救濟宜提早實行，各種法律宜嚴格施行。這三個問題的第一第二個總統於一九二九年四月直接交付國會討論。對於法律和秩序的問題，總統委派了一個「施行法律委員會」，以前任檢察長威荷善（Wickersham）為主席，從事徹底調查犯罪的狀況，作為初步手續。到一九二九年美國的「犯罪事業」組織的完善，可謂並世無出其右，以致各市各州當局都自認無法與之抗衡。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國家為犯罪案件每年所花的費用，至少每人要派一百元，也許尚不止此數。犯罪的主要部分是直接或間接與違犯伏爾斯提特禁酒法（Volstead Act）有關的，但那般販酒流氓很容易「買得保護」，所以他們的活動範圍蔓延甚廣，幾於無處無之。這些犯罪者祇有一小部分被當局逮捕（其中有許多是當局認識的），被定罪的更少。後來聯邦政府自己也覺得要處觸犯禁酒法者和殺人犯以監禁，比處罰假造所得稅陳報冊者反來得為難。

所以政府渴盼威荷善委員會的報告書早日造具，但它公布時（一九三一年）的環境已貶抑了它的價值。當時謠詠頻起，謂當局曾加壓力於該委員會，要它和緩所有的判定。此項報告書前後殊欠一致，關於幾種最重要的事件的顯露，也嫌不確實。再者，胡佛又通告國會，他對於其中數項條陳不表贊同，尤其是關於禁酒的一部分。該委員會辛勞的結果可說是令人失望，但有兩事確視前進步了：（一）改革禁酒法的切要業經明白證實；（二）國會因該委員會的勸告，把施行禁酒法的權力從財政部移交到了司法部。

關於關稅事項，國會對於總統所提的『有限制的變更』一項意見置之不理，而迅速地從事於大規模的『搬運木材』（即互相結託以爲援助之謂）賓夕法尼亞州的參議員格藍狄（Grundy）（一個惡名素著的議院外運動者）極力主張競選時的出力輔助應以關稅上的盛情爲報答。司摩脫——赫雷關稅稅則（Smoot-Hawley Tariff）就代替了福特納——麥克肯柏法（Fordney-McCumber Act），那個稅則把二百三十五個品目的稅率減低了，而將八百九十個品目的稅率提高了。胡佛總統不願一千個經濟學者和許多專家（代表兩大政黨的）的忠告，就於一九三〇年五月簽署了那件法案，委託關稅委員會去審查該法中是否有不公允之處。全國人民對於胡佛總統的這種決斷極力反對，外國也採用種種報復方法。因之美國的對外貿易狀況，非惟不見好，反而每況愈下了。（註）

（註）對於外國製造品徵收高率關稅的行動，有擡高本國出品的價格的傾向，尤其是農民所需要的貨品。同時，儘管此項稅則的目的亦爲保護農業，但因國內屢次豐收的結果，農夫所得的農產物價格繼續降低。再者，外國爲施報復起見，不僅對於美國的入口貨課以重稅，並減少購買美國穀類的數量，而多向阿根廷、澳洲、加拿大或俄國購買了。故此項稅則的純淨結果，祇是國外市場的喪失和本國購買力的可驚的減輕。

至於政府所採取的救濟農村的方法，同樣沒有成效。在一九二九和一九三〇兩年中，美國國會拒絕了幾種社債計劃，依據此種計劃，農人得受一種主要農產物補助金的濟助。但依據一九二九年六月的一件法令，卻成立了一個聯邦農政局，此局由十二人組成，有流動基金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農政局的工作，在制止生產過剩，

鼓勵農民合作社的設立，組織穩定幾種糧食的公司——它具有買賣這幾種糧食的暫時盈餘的權力。此項法令的根據點，即在於認糧食的過剩為暫時的現象，可是它所費浩大，在實際上非但不能制止生產過剩，且足以獎勵之。一九三〇年的旱災使農產物的價格稍有上漲，但在一九三一年，它依然跌落了。

美國歷來在外交上的孤立態度，現在給胡佛總統和國務卿史汀生放棄了。一九三〇年，美國成為倫敦海軍條約的簽字國之一，它對於日內瓦軍縮會議，亦盡力加以援助。關於東三省現狀的問題，雖然國聯未能肯定史汀生的宣言——大意謂美國不承認以達犯開洛格公約或其他和平條約而造成的領土的變更，但美國仍舊常常和國聯交換關於這個問題的文書。此外，美國對於拉丁美洲各國經過革命而成立的政府，採取了較寬大的承認政策，而駐在尼加拉瓜的美國陸戰隊也全數撤退了。

其時（一九二九年十月），美國垣街的公債市面崩潰了。是月二十四日，一般心神不安的投機家又向市場拋出一千三百萬的公債票。公債跌落的來原可追溯到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經濟情形的紛亂。在戰爭期內，各種物價大有膨脹。美國除了在戰後有短時期的不景氣外，在一九二〇年依然繁榮。其主要原因，大概因為戰時貨物缺乏及歐洲與拉丁美洲時時準備向美國定購巨量商品，一方面美國人民也願投資於外國公債。結果釀成了一種冒險的投機狂，在這瘋狂的時期內，所有的物價，都是以不自然的方法使之膨脹，而巨量的「紙財產」因以造成物價上漲了，工業拓展了，生產增加了，但都是無計劃和無顧慮的。可是同時，關稅的壁壘築得更高，世界各國對於國際商業在在加以障礙，賠款與戰債的問題依然使國際關係更為惡劣化。戰後膨脹的消逝終究是不可避免的。

一等到美國的投資者對於他們的保有財產擔心掛慮，而外國的購買停止的時候，財政的破產就一定會實現。在美國發生經濟恐慌之後，經濟組織較孱弱的歐洲，也很快地受到不幸的打擊。首先遭殃的為奧國，接着各處都蒙影響，於是不景氣的現象馬上遍於全世界。

總統對於公債市場情形的第一次公開評論，說明這種情形僅為一種無約束的證券投機的波浪的結果。他指出：銀行的地位很鞏固，貨物之屯積並無不當的情形，而「前此被吸收於公債市場借款以作投機之用途」的新資本亦將回到常態的商業用途上。所以他認為現在的困難是暫時的，不久即可恢復原狀。但當情勢益趨惡劣，並影響到全世界的時候（一九三〇年），胡佛又解釋道：這種危機是全世界的危機，其促成的原因顯然非美國的力量所能控制。他爲了要加速經濟的復興，乃於一九三一年提出國際債務延期付償的辦法，規定自一九三一年七月起至一九三二年六月止爲有效時期。此種舉動祇着重了世界的苦境的嚴重性，對於信用的恢復，毫無裨補。

胡佛對於國內的局勢採取了種種有力的辦法來應付，蓋失業的數字激增甚速，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國內賦閒者計達七百萬人之多。國會支撥了一筆巨款，以充興造公共建築物和公路之經費。全國各州市也組織了「失業救濟委員會」，其款項是向各地的慈善人士捐募的。當局鼓勵一般有職業的國民，把他們一部分的工作，分給他們的比較不幸的鄰人去。同時人民紛紛提出五日工作週的要求，但這一方面比較沒有多大的進展。國稅和地方稅稅率也提高了，但在一九三二年年尾，國家預算的短少仍超過二十億金元。

爲弛緩因外國收取現金和私人藏金所致的金融緊急起見，國會乃於一九三二年通過了格拉司—斯底加爾法案 (Glass-Steagall Bill)，以修正聯邦準備金條例的規定，其中准許使用某數種政府公債券，以爲發行聯邦紙幣的擔保品。這樣一來，聯邦準備銀行裏的一部分存金就被提出作爲商業的用途了。再者，那些已用盡附加擔保之證券（此種證券得由聯邦準備銀行貼現，可是仍有償付的能力）的會員銀行，得以約定期票向聯邦準備庫借款。

正在格拉司—斯底加爾法案之前通過了另一法案，規定設立一個「復興基金團」，資本額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由美國政府認募，具有發行三倍於該數的債券的權力。該團得借款與各財政機關或其他機關，作爲資助農業商業工業的用途。各項借款的期限規定爲三年，如得「州際商務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的允諾，也可墊款於鐵路。後來該團的資財增加了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總額達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它的出借力又有擴展，連各州的救濟借款也包括在內，因爲在到這個時候，經濟的破產非但使數千小公司起了恐慌，就是各市各郡各州也惶惶不寧。在該團成立後五個月內，它已墊出一、〇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經過七個月後（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已貸與四、三二四家銀行和信託公司七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大宗款項。

在這不景氣的時候，又有一件事發生，即美國全國失業的退伍軍人於一九三二年結隊向華盛頓前進，要求國會立刻將津貼券兌現。國會不理會他們的懇求，理由是：政府倘以現款付出津貼，將使國家的已不健全的財政

制度益趨緊張。這般「津貼遊行者」於是恐嚇政府，非至他們的要求達到目的時，他們將永遠在華盛頓紮營屯留，後來政府終於調動軍隊將這般請願者驅除。刺刀、佩刀和毒氣都用到了，傷亡者雖不甚多，但一般輿論對於政府的措置，頗加非難。

在這種空氣中，全國正準備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總統選舉。共和黨於六月十四日在芝加哥召集會議，在首次投票時重新推舉胡佛為候選人，並舉寇提斯為副總統候選人。民主黨也在六月二十二日於芝加哥開會。史密斯和紐約州長羅斯福二氏的擁護者經過一番競爭後，後者卒被推為總統候選人。得克薩斯州的加涅(Garnier)則被推為副總統候選人，他是衆議院的議長，其時衆議院因一九三〇年選舉的結果已在民主黨的勢力支配之下。

兩黨政綱裏的主要條目，都是關於禁酒問題的。共和黨所贊成的即後來被通稱為「乾涇」政策的條目，它主張將所提議的一條憲法修正案——其中規定各州對於禁酒有一種限制的選擇權——付諸國民複決，然後由聯邦政府協助其施行。民主黨則倡議將憲法第十八條修正案完全廢除。社會黨重又推舉湯麥士，該黨希望他可藉一般知識分子及不滿於胡佛的保守主義和羅斯福的模糊觀念的人之助，得到很多的票數。

這次民主黨的候選人囊括了選舉的票數，得四十二州的擁戴，獲得六、〇〇〇、〇〇〇票的多數。約有六二〇、〇〇〇票是投於社會黨候選人的，共產黨（它在選舉前自信聲望日隆）則僅收得二二、〇〇〇票。國會兩院都歸向了民主黨，在衆議院中，民主黨竟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多數。

廣泛的興趣

戰後美國的最重要的現象，就是大眾漸漸感到遊歷的興趣，這是繁榮的幸福所造成的。在一八八〇年，一共祇有五萬美國人跑到外國去遊歷，但一九三〇年的數字就增至五十萬。美國一般國外遊歷者所用的旅費，在一九三〇年計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譜。就是在美國國內旅行和賞覽風景者的費用，也祇有上升，而無下落。這種情形可說是完全由於美國鐵路業務的改進，汽車和公路的發達，及航空組織的完備所致。在一九三〇年，每五個美國人裏面有一個備有汽車一輛。有一位觀察者在一九二五年說道：「戰後時期的動的歷史可給汽車寫上一卷或兩卷，對於國家大事，祇須寫一行註腳就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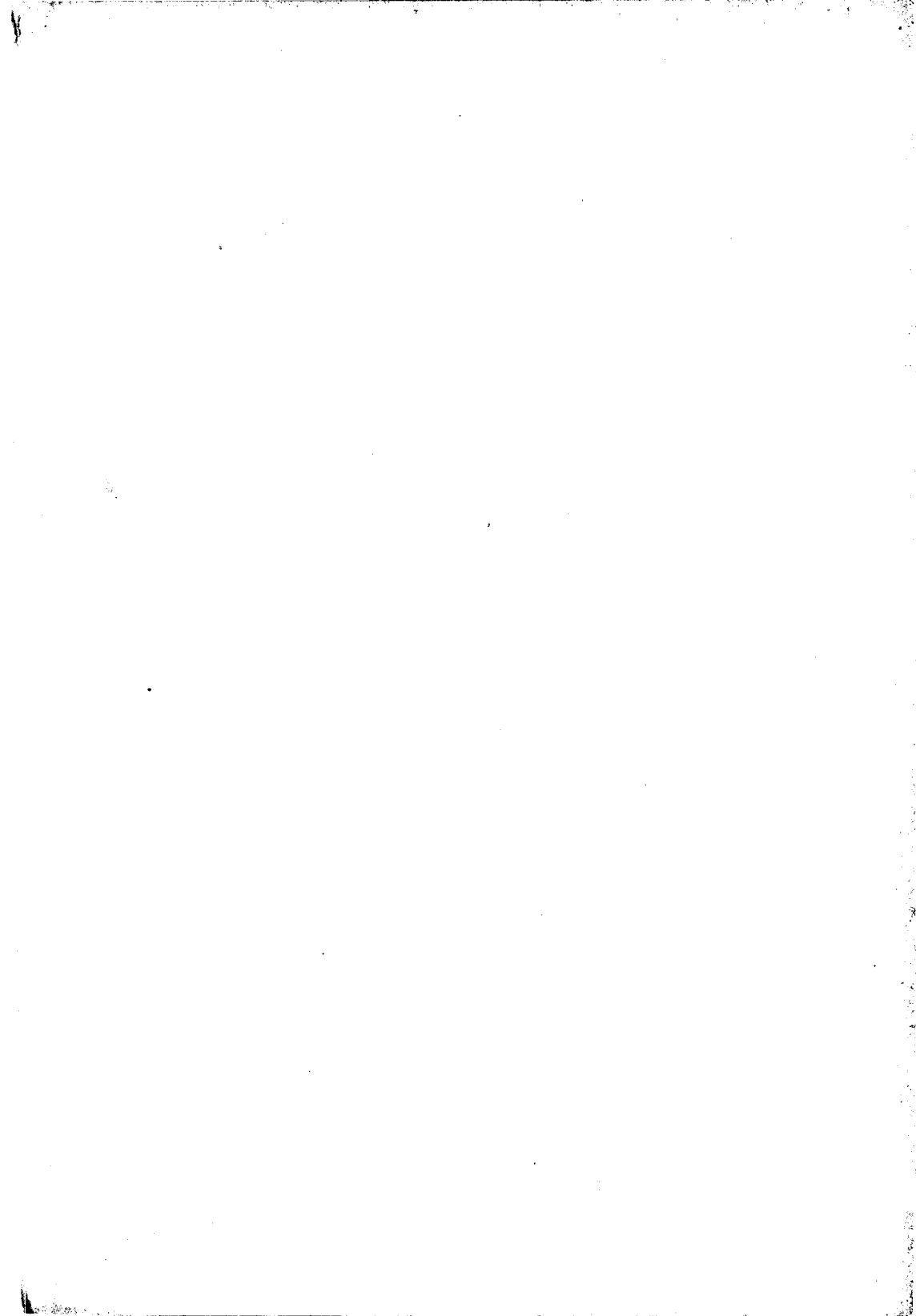
依據一九三〇年的戶口調查，美國家庭所用的無線電收音機一共約有一三、五〇〇、〇〇〇架。此外如公家或私家電話機的數量及其他各種最新式的便利用具的裝置，美國也佔世界的首位。不過在許多情形中，美國家庭的所以能夠買到這些東西，端因「延緩付款」制度的盛行。一般人往往被引誘着購買他們的財力所不能供給的奢侈物品，因為商店的誇大廣告，和店員的花言巧語都足打動他們的心。這種信用消費運動很不自然地促進了繁榮時期的生產，當一九二九年的不景氣開始剝奪大眾的購買力的時候，市場上便充滿了鉅量的過剩貨品。

美國人民對於各種遊戲和運動的興趣也有增無已，千百萬元的金錢都花在發展公私運動場上。「觀客的

競技」如拳賽和足球賽非常流行。凡遇大學間的足球賽，觀衆竟有達九萬人。一九二七年吞納——鄧浦賽（Tunney-Dempsey）的重量拳錦標賽所售門票的收入計達二、六五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三二年的落杉磯（Los Angeles）世界運動會中，美人的狂熱是空前未有的。美國運動家所得的個人或團體的榮譽，比其他任何國家的運動家所得者爲多。

教育之在美人的生活中，也佔重要的地位。戰後各大學的學生人數，增加得非常迅速。在一九三一年，哥倫比亞大學各級註冊的學生，統計有三三、一四四名，它可算是全國大學中最大的一個了。巡遊講演與居家攻讀的課程也非常盛行。雖然「爵士」（Jazz）歌舞的影響在公私生活的各方面都能感到，但人民對於藝術、音樂、文學和戲劇漸有辨別的興味。「一月一書」和「有限版本」叢書的訂閱者，爲數至多。歷史和傳記的著作以及小說和重印的古籍，銷場也很廣大。在一九二七年一年中，美國所印的書籍，總數達二二七、五〇〇、〇〇〇冊。

一般人對於科學上的發展或發明也有熱烈的認識。各種報紙上都另闢科學專欄，與文藝、音樂、戲劇、運動的附刊並行，因爲非如此不足以吸引讀者。美人以其在科學上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獎金者，真是不一而足。一九三一年紐約城恩派亞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的落成可算是美國的企業家、打樣師和建築家的藝術的勝利。這所大廈計有一百零二層，高達一千二百四十八呎。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或許也是美國人對於將來的信心的象徵。



第三篇 最近的局面

第二十三章 歧路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全世界慶祝第十四週年的休戰日。和在往年此日一樣，各處都有演說來紀念大戰的英勇犧牲，表敬意於「無名英雄」，並稱頌和平。大家口口聲聲希望將來沒有戰爭，國際的和睦永無止境。可是，由一個冷靜的觀察者看來，一種完全不同的原動力顯然在發生作用，這些原動力恰好是引起一九一四年的大禍的那一種。不可避免的結論就是說，世界各國正在迅速地走近歧路之口，那裏有一條是導往新世界的路，另有一條是奔向新的世界大戰的路。

我們前面已經看到，國家主義與領土回復主義應負戰爭之降臨的大部分責任。今日的歐洲所包含的國家主義者與領土回復主義者的危險地帶，如不比一九一四年所有的更多，至少也不比那時少。德意志人、奧地利人、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固然不再壓迫他們的鄰邦，但全局已經翻變了，幾毫未改良。領土回復主義依然存在，祇是現在的持此項主義乃是德國、奧國、匈牙利、立陶宛和意大利人而已。民族主義的原則，在波蘭、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意大利和巨哥斯拉夫，仍被破壞，在西班牙與比利時的內部，有強盛的分離派運動，馬其頓人則在嚶求獨立。此

外，在前協約國的海外屬地（例如敘利亞）與印度，自決的呼聲甚囂塵上。關於少數民族的條約與乎受委任統治的義務可說是情形較戰前進步的表徵，但在實際上此種進步是比較微小的。

復次，國家主義的精神似乎一點也不比在一九一四年的稍為減輕些。世界人民固然有若干「國際心」的發展，但同時也生出一種空前的國家尊崇心，尤其是在各派的「法西斯主義者」裏面。一九一八年後得到自由的各小民族，使世界更增加了若干民族間的猜忌、陰謀與惡感。各國爭着行使統治權的貪慾而不顧他國的權利，似乎正是與國家的大小相應着。羅馬尼亞不願列入巴爾幹國家的一類。波蘭要求他國承認它是一個大國。聖馬力諾（San Marino）因被拒以自主的和獨立的國家之資格加入國際聯合會而大怒！

如果軍國主義與軍事同盟是釀成世界大戰的要因，它們必定助成另一個武裝衝突。今日的黷武精神在各方面都有比在一九一四年蔓延得更厲害的光景。它已經扼住了美國及歐洲各國，在東歐與南歐，尤其來得囂張。常備軍因為人數比從前更多，也含有更大的危險性。波蘭、捷克斯拉夫、巨哥斯拉夫、羅馬尼亞、中國，都保有非它力所能及的陸軍定員，而德、意、奧、匈諸國皆以巨大的私練軍隊補充它們的較小的正式兵力。少壯軍人的團體已成為歐洲許多地方的時尚，同時學校亦盛行軍事訓練。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會計年度中，有破產之虞的世界，在軍備上一共耗費了四五十億元的巨款。

有一個時期大家相信歐洲的大專制國的傾覆，即可使軍國主義，秘密外交與軍事同盟終止，但新的民主政治與獨裁制度似乎不見得比舊的帝政不尚武，雖然在若干情形中前者較後者要少穩固些。

縱令軍事同盟已在一九一四年證明爲完全不可靠的保障安全的方法，它在若干地方仍被認爲抵禦外國侵略的護符。因之世界和平還是常常受到它的威脅。戰前時期的三國同盟與三國協商已有三個戰後的「防衛」系統（各集中於法、意、俄三國）取而代之。美國、英國與日本似乎尚無所依附，但我們不能臆斷遇有另一大戰時這三國會保守中立。

經濟的對立與帝國主義曾被舉爲世界大戰的第三個基本原因。此種對立現在還存在，且視前更強烈了。在一個真正的意義上，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休戰預示着軍事的敵對行爲的終止，及不幸的世界經濟戰爭的爆發。在一九一八年以後的許多年中，我們已看到空前的高稅率的普遍賦課，各種入口稅的徵收，非常有組織的「購買國貨」運動的發展，及經濟上的歧視與報復的巧妙方法的發明。自然，戰後的世界經濟範圍內也有幾種確實的進步，例如數件「物品交換貿易條約」(Barter treaties)的商訂，但在這一方面的進步是有限的。各國就可能範圍少買他國貨物而多售本國貨物的企圖，終不能無定限地維持下去。在現代的情勢之下，沒有一個國家是自給自足的，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够自絕於他國而生存。再者，那些欠有賠款與戰債的國家必須從對外貿易中取得利益，否則就不能在年尾有盈餘用來付償這些債務。

使經濟情形每況愈下者，世界各國不知盡力改正社會的錯誤，而祇顧讓工藝上的種種改良急速地繼續下去，它們總有一天自食其報。儘管經濟的事實完全與從前的不同，一般人還是拘守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的放任主義，要不是現在採用某種經濟計劃，完全的經濟災禍似乎是難免的。因爲經濟戰爭和缺乏調節生產與分配的

系統方法的緣故，所以一九三二年世界的失業者的人數竟達兩千五百萬之多。（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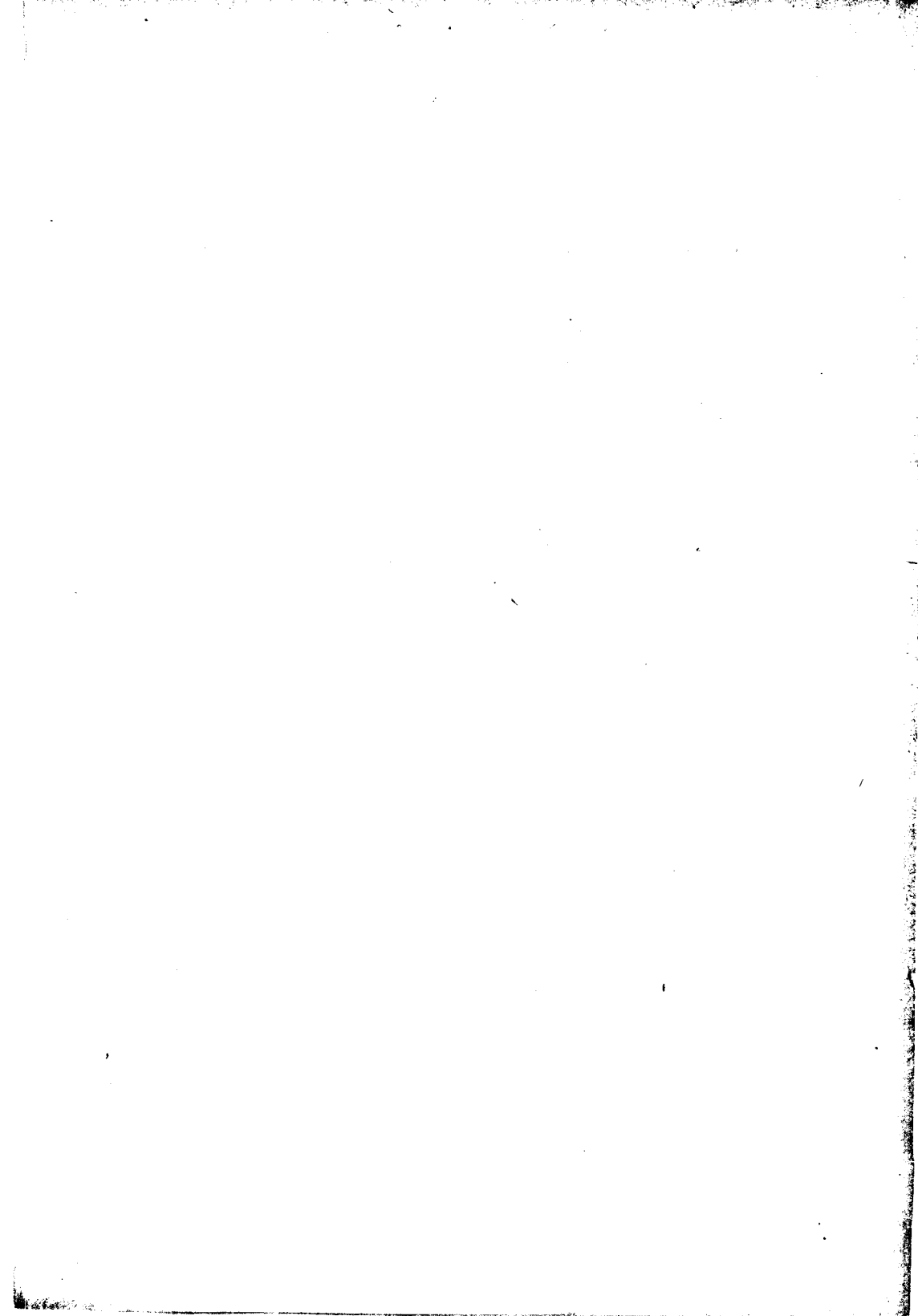
（註）在一九三一與一九三二年，此種未經統制的經濟的流弊強烈地呈現出來，那時美國農業部曾勸告種植棉花的人將每三分之一畝的種棉地加以破壞，以便維持棉產的價格。然而這個當兒正是幾百萬美國人民因無衣蔽體凍得發抖或依賴慈善家的施與勉強度日的时候。不特此也，那時西部的農人正在將其穀類喂養牲口並以小麥當作燃料焚燒，它們不能裝運他們的農產物到市場去，因為世界市場上小麥的價格比成本還低。同樣，幾百萬袋的巴西咖啡全被傾倒於海中，爲了要繼續有利於咖啡豆的種植。

一羣從事於研究並分析美國的工業與農業之發達的技師，早於一九二〇年指出這種經濟情形所具有的危險性。一到繁榮的時期，這些技師又提出忠告，諄諄以採用一種新的社會統制與經濟統制來應付戰後工藝上的大發展爲言，可是大家不加注意，而一般科學家對於一九二九年危機的預斷，僅差誤六個月。當斯之際，世界各國間的經濟戰爭日益劇烈，各國內部所發生的困難遂使共產黨、社會黨與法西斯黨等過激團體和革命組織如春芽怒茁，滋長得很快。

此外還有國際的無政府狀態與秘密外交的問題。國際聯合會與世界法庭的創立以及以會議解決國際問題的方法之盛行，顯然是一個很大的改良。在一九一九年六月與一九三二年六月之間，由三個以上國家出席舉行的國際會議約有五十個，許多足以引起爭鬪的問題亦於友善與妥協的空氣中經過討論而解決了。但此類的進步不是完全可使人安心的。祇要美國與蘇俄站在國聯的組織之外一天，國聯必定沒有多大勢力。再者，秘密的協定仍舊很流行，祇要各國的人民准許他們的外交家用他們自己的話束縛全世界一天，此種秘密外交當然會

繼續盛行。

上述的事實經過這樣草率的摘要後，我們自然可以看見世界又在「向地獄跑了」。賠款、債務、關稅、極端國家主義及對於他國情形的茫昧無知等等的路，祇是到滅亡之路。反之，若遵着導人離開引起世界大戰的種種因素的一條路而行，則前途之光明，似乎不僅僅是一個希望而已。如果各國能够掃除過去的邪惡、不公平與錯誤，忘懷舊恨而重新開始，將來的幸福當不可限量。一般經濟專家實際上大家同意，各國殊有革除大戰的一切遺蹟的必要。政治家也必須有此同樣的覺悟。最後，教育家必須以世界大同與國際和睦的精神培養新世代的青年，否則西方文明的全部結構就不免會崩潰。



最近的發展述要

一九三三年一年中世界大勢的驚人發展，是歷史上所少見的。實際上在地球的各部分，都有非常重要的事件發生，這些事件的意義尙祇能加以揣度。

第一、德國開始了徹底的「全國革命」。一月二十八日，施萊轍將軍於上臺祇六星期後就辭去總理之職，其理由尙未完全明白。兩日後，希特勒起而繼其位，他是德國國家社會黨的領袖，性情暴烈而頗得人心。與希特勒共同加入內閣的爲一羣著名的保守分子，其中以巴本上校及國家人民黨魁胡根堡博士爲巨擘，前者擔任副總理，後者擔任農商部部長。這般保守分子之入閣，是與登堡總統任命希特勒爲總理時的一個條件，使他們可以抑制國社黨的任何「危險的」嘗試。

希特勒政府於豫期三月五日的國會選舉之中，着手對於反對黨（特別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壓迫政策。再者，巴本被任命爲普魯士的政府委員，其地位等於普魯士的總理。在選舉前幾天，柏林的國會大廈幾爲祝融所焚燬，顯然有人縱火。希特勒的黨羽將此事的責任諉之於共產黨，共產黨則以之歸咎於希特勒一派人，說是他們的陰謀，其用意在於使投票人不信任共產黨。無論事情的真相如何，希特勒與胡根堡的擁護者終於三月五日獲得大多數的票，很容易地操縱着下屆的國會。選舉後一星期，與登堡總統下令全國的公共建築物將來必須懸

掛帝國時代的黑白紅三色旗，以代共和國的黑紅金三色旗。

新國會以其占絕對優勢的希特勒派議員於三月二十四日通過了五個法案，規定停止施行一九一九年的憲法並賦與希特勒政府四年的獨裁權力。自茲以往，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總理單獨享有為德國制定法律的權利。他權力的唯一限制，即不能裁撤國會的兩院。政府又特別增設一部——宣傳與啓迪部，以學識與能力兼長的哥貝爾博士（Goebbels）為部長，其職權在向國民和世界說明這種驚人的發展及政府將來或須採取的新政策。（註）

（註）獨裁權力是特別賦與希特勒政府的。倘遇該政府於四年之期終了前傾覆時，被停止施行的憲法仍當重新施行。

國會既已委棄其立法權，乃行閉會，希特勒總理遂進行指導「國家的復活」，亦即在國社黨的保護下從事「調整」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第一步，政府將幾百個非希特勒派的地方官吏與中央官吏加以斥逐，代以矢忠於國社黨的人員，俾中央政府與各邦之間能够密切合作。在普魯士，由一個最好戰的國社黨員，著名的飛行戰士和極端反塞姆族的人戈林大尉繼任巴本之職。

希特勒派公然指斥共產黨、社會黨與猶太人的「叛逆」實負一九一八年的軍事失敗及凡爾賽條約的屈辱之責，乃開始對各該黨與猶太人作有組織的攻擊。凡有左派的政治傾向及「非阿利安人」（Non-Aryan）的後裔者都被逐出公私職位，猶太人的商店皆遭抵制，大機關團體的董事之為猶太人與社會民主黨員者全給「清除」，同時被投入監獄和特別建築的集合營（用以安置俘虜的一種）的人民不下幾萬。此種處置之不免

有暴行是無足驚異的。

政府又實行對於言論界的嚴格檢查與統制，廢除互助團的制度，將退伍軍人的組織（如鐵盔團）和保守的團體（如國家人民黨）逐漸吸收於國社黨內，並解散其他一切黨派（連最有勢力的天主教徒中央黨也包括在內），以求政治上的步伐一致。從一九三三年七月起，國家社會黨成爲德國唯一有組織的政黨，與法西斯黨之在意大利及共產黨之在蘇聯一樣。

在經濟範圍內，希特勒政府卻沒有立刻提出一個確定的計劃。主要的工業大概由政府所暫時委派的國社黨監督人或管理人加以調整，幾個「興辦」事業的新計劃亦經草定，但不着邊際的宣言，繼續多過具體的建議。可是，失業的人數在七個月內卻減去了一百多萬，這大部分由於馬克思派人與猶太人的位置之被希特勒派人奪去，反對雇用已婚婦人的運動，工作時間的減少，及成千上萬青年的加入志願勞動團所致。該團的團員由政府供給食住，以酬其爲政府的某種計劃與大田地所做的工作。被開除的猶太人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姓名，自然不列在公家的救濟名冊上。

有一個時候好像德國的經濟目標會變成一種國家社會主義，但在七月間希特勒就警戒他的黨徒，不得擅自干涉私家經營的商業與工業。他又在此月中指定了一個經濟顧問會，以大實業家波楞（Bohlen）、西門子（Siemens）、泰森（Thyssen）等，通常被認爲全部希特勒運動的經濟援助者爲顧問。復次，在某一個短時期內，似乎政府擬設法與農民分割並解決從前東普魯士的貴族地主（Junkers）的大田產（此種田產在經濟上往往

是落後的，但此後不久，那般貴族地主就確信政府不會強迫施行，相信政府只希望他們秉愛國之心將他們所有的若干田地開放於小農。當達萊（Darre）被任命為農業部部長以繼胡根堡的時候，那般貴族地主有了好的兆頭。這位新部長堅信德國如能以世襲的阿利安種族的，和保有土地的貴族為領袖，國家就會弄得很好。所以他毫無意於離開普魯士的貴族地主與國社黨的感情。

對於猶太人的迫害，頗激起他國的憤怒，並釀成數起對德的經濟絕交。但國社黨有三個理由辯護他們的舉動。德人希望藉此排除最近自東歐移居德國的人民；打破猶太人在幾種職業上（特別是法律界與醫藥界）的立足地；並保持「目前德國人」的純淨血統。因為猶太人祇占德國全人口的百分之一，所以要將他們在職業上限於同樣的比例。為辨認起見，凡祖父為猶太人者皆被類別為非阿利安種。

宗教亦經調整。德政府與羅馬教皇簽訂了一個契約，依據此約，德國境內不准有天主教徒的政治組織，但像「天主教徒行動社」這一類的社會公益團體仍得繼續存在，不受國家的干涉。比較難於解決的，是團結德國新教的問題，該教含有二十九個不同的宗派。經過長時間的談判和興登堡總統親自居間調停之後，大家商定將一切新教徒聯合於德國福音堂，由全國宗教會議統治，並由路德派的主教一人主持之。各宗派出席宗教會議的代表人數以教會組織法分配之，其分配之規定，務使教會的管理權操諸贊助復興運動最力的德國基督徒之手。

德國的種種發展自然會影響到外國。法國人和波蘭人早就害怕德國會馬上進行侵襲，此種恐懼不久就表明為毫無根據，但關於奧地利共和國，卻發生了意外的糾紛。德、奧兩國的國社黨顯然以為要從奧政府奪取權力

並將這個貧弱的小國併合於新德意志，是容易的事。然而奧國總理陶爾斐斯另有他自己的主意。他是基督徒社會黨（相當於從前德國的中央黨）的領袖，並有國防衝鋒隊（Heimwehr），社會民主黨與猶太人爲後援，所以他立定主張與德、奧國社黨的非法的和往往橫暴的策略相對抗。他額求世界給與道義上和經濟上的援助，又在倫敦經濟會議雄辯滔滔地懇請他國增加本國的對外貿易和旅行業，俾奧國可以得到經濟的復興，不致爲需要所迫而屈服於德國的勢力。英國和法國抗議那般過於熱狂的德國國社黨宣傳者屢次侵犯奧國的疆界（意大利亦提出抗議，惟不如英、法起勁），但柏林當局沒有滿意的答覆。在八月下旬，陶爾斐斯到羅馬訪問墨梭里尼，大概從事討論意、奧、匈三國密切合作的計劃。

捷克斯拉夫、巨哥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因恐懼德國的新國家主義並擔心意大利與匈牙利繼續設法達到修改和約之志願的行動，乃力求鞏固一九二〇與一九二一年後三國所締結的小協商的關係。它們於一九三三年二月草定了一個協定，擬將小協商改變爲「較高的國際統一體」，由各該國的外交總長所組織的常置會議指揮之，在政治、經濟和財政的事務上密切合作。同時，和波蘭也成立了密切的關係。

波蘭共和國雖然仍舊堅守不渝的保持一九二二年的法國同盟，現在卻似乎因爲本身單被認爲法國的羽翼而略生厭心了。有好幾次，特別是在重新召集的日內瓦裁軍會議，波蘭所抱的見解竟和它的強大的同盟國的主張背道而馳。然而對於德國的戒心，足使它常常想到法國的道義上和軍事上的援助是必要的。實在，波蘭與蘇俄畏懼德國的心理都是非常之大，所以一般觀察者於九月間斷言俄、波兩國終會訂立軍事協定。

一九三三年起初九個月中的國際關係是以猜忌與敵愾心的混亂紛紜顯著的，但在這種混亂紛紜之中，卻生出兩件有利於世界和平的東西：即羅馬公約與倫敦公約（The Pacts of Rome and London）為撥開籠罩於是年之春的歐洲戰雲起見，墨梭里尼提議西方各大國共同擔保至少一定期間的和平。其結果即為英、法、德、意四國的羅馬公約的簽訂。各簽字國因欲「鞏固各國對於歐洲和平的信心」，一致承諾在一切重要的國際政治與經濟問題上合作並互相磋商，共同努力以求日內瓦的裁軍程序順行無阻，並重新承認國聯盟約第十九條所載的修改和約的原則，同時完全承認第十與第十六條所規定的領土保證與制裁。該項公約的有效時期為十年，除任何簽字國先兩年通知廢棄外，並得自動續訂之，其期限不定。

墨梭里尼最初所草定的公約原文是不很寬泛的，特別是關於修改和約與裁軍兩層。但波蘭與小協商國極力反對，以為這樣的條約不免侵犯小國的權利並足為大國用作擴大帝國主義的勢力的手段。法國祖護它的同盟國的此種見解，因之羅馬公約不得不加修正。再者，小協商國被激勵着提早批准二月的協定，同時俄國（它認這個公約是資本主義國家用以對抗布爾扎維主義的另一個盟約）攫取這個機會來向它的鄰邦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俄國的意見很快地取得立足地，從七月三日至五日，阿富汗、捷克斯拉夫、愛沙尼亞、巨哥斯拉夫、拉達維亞、立陶宛、波斯、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和土耳其諸國的代表在倫敦蘇聯大使館簽訂了兩件協定，即合稱為東歐和平公約（The Eastern Peace Pact）的。

各簽字國確認彼此的領土之不可侵犯，表示它們對於開洛格公約禁止一切侵略的信心，並採取「侵略國」

一名詞的明白定義。凡對他國宣戰，或未經正式宣戰而侵略外國的領土，實行封鎖，或在本國境內幫助企圖襲擊或侵略他國的武裝隊伍的簽字國，即視爲侵略國。舉凡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或其他性質的理由皆不得作爲侵略的口實或名義。

倫敦公約除闡明將來東歐發生衝突時誰爲侵略國外，並達到其他幾種目的。波蘭不必再憂慮俄、德兩方面同時的進攻了。蘇聯承諾不用武力奪回肥沃的比薩拉比亞省了（該省即羅馬尼亞於一九一八年所併吞，此後成爲兩國之爭奪物者）。捷克斯拉夫與巨哥斯拉夫同布爾扎維黨訂立協定，以此爲第一次。俄國現在可以自由貫注全神於遠東的局面了。（註）

（註）九月，俄國又與意大利簽訂了友好、中立與互不侵犯的條約。

在一九三三年中，東亞的事件進行得很快。日本繼續在日內瓦遭受外交上的失敗，卻在華北博得軍事上的勝利。自一月到五月，日軍侵入熱河省和長城之南的區域。熱河被指爲東三省的一部分，因之認爲應劃入偽國的版圖。至於侵入長城南部的理由，據說是爲了要阻止中國軍「侵襲」偽國疆土。因爲日本毫不理睬國聯的各種委員會和副委員會的抗辯與請求，所以中國終究絕望於日內瓦的實際援助，最後接受了塘沽停戰協定（五月三十一日）。根據這個協定，日軍當退至長城之北，中國答應在長城與自天津至北平所劃一線之間，設立廢除軍備的地帶。這個緩衝區由親日的中國官吏管理之。管理的詳細辦法於七月由中日與偽國的代表商定。（註）

（註）雖然國聯爲中國所盡的政治力量毫無效驗，它又設法給與中國技術上的幫助。七月，國聯行政院派定了一個對華技術合作特別委

員會來幫助中國從事廣大的改造計劃。

其時日本以退盟的先兩年通知書送達國際聯合會（五月）通知書上說，「日本政府盱衡情勢，已感覺日本與國聯之間有不能調和的兩歧意見存在，蓋日本與國聯對於和平政策及確立遠東之永久和平之中所當遵守的基本原則，所見實背道而馳」。兩者之間所以發生爭論，因國聯繼續主張至少將東三省在名義上歸還中國，以為解決之法，而日本堅持「偽國」之「獨立」當加擁護。遲至一九三三年九月，「滿洲國」祇得到日本一國的外交上的承認。

政治的與社會的不安決不限於東半球。拉丁美洲的局勢之發展，是以許多變遷，疆界的爭執，和戰爭為特性的。玻利維亞與巴拉圭因爭奪大廈谷繼續交戰，儘管國聯始終不懈地設法致令兩國停戰，以便派遣中立的委員會來調查雙方的爭執，仍是徒然。祕魯和哥倫比亞（Colombia）則於一月間發生衝突，時在一部分祕魯人奪取哥倫比亞的勒提西亞城（Leticia）後幾個月。幸而在五月雙方就停止戰爭，接着國聯派了一個委員會來管理這個區域，以待仲裁的解決。罷工與騷亂，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革命與反革命，這一切都表示着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Ecuador）、祕魯、烏拉圭（Uruguay）、委內瑞拉（Venezuela）的不安狀況。此種常起的混亂之緣因，顯然大半是經濟的，因為南美洲也銳敏地感到不景氣的影響。但是誇張的國家主義對於激起惡感並挑動戰雲一事，也自有它的分兒，而列強的爭奪南美洲的市場，至少有擾亂人心的影響。

最可驚的是接二連三陸續發生於美國的事件。在三月四日，當羅斯福就大總統之職的時候，美國已有三年

半深陷於經濟恐慌之中，失業的人數計達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國家的收入已降到一九二九年所有的一半，幾及百分之四十的農地全被抵押，罷工與暴動成爲常有的事，而各州對於銀業的交易已感覺到非加若干限制不可了。然而新總統似乎很抱樂觀，且有把握。他預言國家一定會「復興並繁榮」，並聲明他要向國會請求「廣大的行政權來打破危急的局面」。

美國人民一致擁護總統的主張。羅斯福（及其夫人）和藹可親，不拘禮節，對於言論界非常客氣，常用無線電和有聲電影與國民作「披肝瀝膽」的談話，這使他博得全國人民的信任和忠心。國會也做元首的後盾，凡總統所提出於國會的重要法案無不按時通過，它又賦與總統極大的權力，使他成爲世界最有威勢的統治者之一。第七十三屆國會在開會期的十四個星期中，通過了許多法令，以資助農民，整理實業，調整鐵路，賑濟失業者，並減少國家預算中可類別爲經常費的一部分。有好幾次，國會曾經猶豫逡巡並妬忌權力日大的行政首領，但羅斯福總統很巧妙地博得輿論界的同情和政界的袒助，所以他無往而不如意。

羅斯福所賴以幫助計劃其事業的人，不單靠本黨的政客和經濟上的後臺老闖，並且有大學教授和技術專家所組成的智囊團。在他當選和就任之間幾個月，早已從事許多「總統的計劃」。因之他能在七月所作的演說中普告國民，自三月四日以來所擬定和所採用的許多建議案，並非一亂堆粗製濫造的方案，而是細心想出的「互有關聯的，合乎論理的整個計劃」之各部分。

我們在這個簡略的敘述中，除枚舉羅斯福上臺後最初六個月中所通過的許多法令外，不能作詳盡的討論。

羅斯福在三月五日宣布了一個全國的銀行假日，並於九日頒佈召集國會的特別會議的命令。國會即於開會日通過一件法令，授與總統整理通貨與信用買賣事件，處罰蓄藏金子者，委派保管人從事協助資產瀕於危境的國立銀行，並發行聯邦準備金債券以償付政府債務等等的權力。是月，又通過下列各件：（一）節約法（Economy Bill），該法核減政府經費每年約五億元；（二）啤酒法（Beer Bill），修正服爾斯提德法（Volstead Act），認可含有重量三·二%或容量四%的酒精的飲料的販賣；（註）及（三）創立「平民勸工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雇用二十五萬青年於公共工程（特別是在森林與國立公園中者）的法令。此外，政府又頒佈行政命令以縮減聯邦官吏之薪俸，裁撤「聯邦田地局」（Federal Farm Bureau），同時將一切農業信用事件交與「農場信用管理部」（Farm Credit Administration）辦理，並重開停閉很久的銀行。

（註）此項法律業經採用，惟尙待各州對於第七十二屆國會所通過之憲法修正案（廢止第十八條修正案並祇禁止酒類之運送於或輸入保留禁酒法律之區域者）採取行動。批准的程序進行得很快，這不但因為一般人反對長此禁酒，並且因為羅斯福總統認酒類為政府的重要稅源。

在四月間，行政機關的行動仍舊猛力勇進。第一道行政命令減少了每年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參戰軍人贍養費和恩給金。第二道禁止人民蓄藏金幣或金票。第三道（四月十九日所頒發）則禁止金子出口，這樣一來就正式使美國脫離了國際的金本位。（註）羅斯福總統於豫期將至的倫敦經濟會議之中，先行邀請幾個外國政府的首領，特別是英國的首相麥唐納和法國的總理赫里歐，到華盛頓作非正式的私人的談話。

(註)在六月間公私契約上的金子條款皆經廢止，但到八月下旬，就准許由鑛中採得的金子出口了。

在五月間成爲法律的許多法案之中，下述四件特別重要。農村救濟法 (Farm Relief Act) 授權政府以所繳地租補償凡自動縮減小麥、棉花與糖類之出產額的農人；對於基本農產物加製課稅；與出產者及加製者訂立買賣合同，以便發現減少畝數之最有效計劃及最善的加製法稅；着手「統制的通貨膨脹」的計劃。通貨膨脹的計劃肯定總統膨脹聯邦準備金信用借款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發行國庫券至附加的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最高額，減少金元的純金成分至百分之五十，並接受約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戰債付款。國會內外對於該項法令的這個特點大爲反對，但政府的權力祇是可有可無的，況且行政官吏再三聲明通貨膨脹政策當「加以統制」。根據該項法令所取的第一步驟，即准聯邦準備銀行購買值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美國政府債券。

華格納失業救濟法 (Wagner Unemployment Relief Act) 規定支撥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之分配於各州，俾用於直接救濟。坦尼西谿谷或筋肉淺洲法 (Tennessee Valley or Muscle Shoals Act) 給與政府開發天然富源和動力的完全指揮權。羅斯福所以主張此法，不但爲了獎勵工業和救濟失業，並且爲了防止因缺乏計劃所致的富源的消耗。最後，聯邦證券法 (Federal Securities Act) 給與政府取締公債票與證券之售賣的權力。

五月的立法成績固然可觀，但六月的立法工作更超過五月的。家宅所有主借款條例 (Home Owners'

Loan Act)就是在六月間通過的，依據此項條例，小家庭所有主得藉聯邦信用放款免受取消抵押品贖取權之手續的橫奪。國會又採取了銀行法，規定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設立聯邦銀行存款保險公司，所投資本爲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由國庫、聯邦準備銀行及會員銀行應募。此外，復有鐵路法之制定，將保有鐵路的公司置於聯邦鐵路調整人（或連絡人〔Coordinator〕）的監督之下，並爲保護工人計立有防備因調整而致失業的條款。六月十六日，羅斯福總統簽字於國家工業復興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此法不久即簡稱爲NIRA或IRA。羅斯福會宣稱「歷史大概會記載國家工業復興法爲美國國會所制定的最重要的法律」。復興法與實行上授權總統設立機關從事「大規模的合作運動於一切工業之中，以便使人民復得職業，縮短工作週，發給短工作週的相當工資，並防止不合理的競爭及不幸的生產過剩」。該法准許停止施行反托辣斯的法律，規定草擬關於各種工業中的合理競爭的特別規章，其中並載有保護勞工的條款，擬就預算經費達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公共工程計劃，此項款子由純淨財產稅、所得稅、公司紅利稅及對於汽油所課重稅中籌募。

羅斯福總統爲完成復興方案起見，於七月十一日設置一個執行會議，以內閣閣員及國會最近所任命的人員如聯邦鐵路調整人伊斯特曼（Eastman），平民勤工團團長費希奈爾（Fechner），與復興處處長約翰孫（Johnson）等組織之。當事實顯明，在草定關於一切工業的規章前必須經過很多時間的時候，政府即於七月二十日供備一種規定較短工作時間與最低工資的「綜合業規」（Blanket Code）要求實業界採用，以待各個

規章之草定。

綜合業規的形式爲大總統與各雇主間所訂立的一種規約。它廢除了十四歲以下的童工，並規定工業勞動者的工作週爲三十五小時，白領勞動者的工作週爲四十小時。工業界的最低工資爲每小時四十分；白領工人則每週十二元至十五元不等，要視事業團體之大小而定。該項規章當施行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或較此略早之日，要視各種工業之特殊規章在何時批准而定。凡遵照該項規章的雇主，得懸置「藍鷹」徽章，作爲與政府合作的證據。依估計，在幾個星期之內，約有兩百萬人因此回復工作，同時還有許多人頗受縮短工作週與增加工資之惠。另一方面，要將該項規章施行於全國各處，殊非易易，有些雇主且被人責難，因爲他們表面上懸置藍鷹徽章，暗中卻違背規章，擅自減少工資或不縮短工作時間。

有待批准和採用的第一件合理競爭的規章，是關於棉織物工業的。其中規定廢止童工，工作週爲四十四小時，最低工資在南方爲每週十二元，在北方爲十三元。其他的規章亦先後訂立，但一般人對於復興制度的許多批評馬上提出了。要使雇主與工人同意於工作時間的相當限度，有時很困難。美國勞工同盟攫取這個機會來袒助工人，增加統一各種工業的力量，並反抗公司聯合會的組織。有時，每一種工業中的雇主，往往自己意見不能一致。（例如在軟煤與煤油工業中），於是政府不得不出而爲仲裁人。罷工的事件仍不斷地發生，且使問題更爲複雜。許多人有這樣的疑問：「最低的工資不也會變成最高的工資嗎？」一旦各種工業根據已批准的規章進行，工人還能够罷工嗎？「集合的訂約權將成爲什麼呢？」較短的工作時間與較高的工資會不會毀滅小出產者

呢？因之勞資雙方不乏反對復興方案者，但在目前，一般的輿情仍贊助着政府。再者，實業界似乎很有進步。

其時政府又忙於應付外交上的事務。當局決意改善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的關係。和海地 (Haïti) 所簽訂的新條約中，規定修正關於財政的協定，並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撤退美國的海軍陸戰隊。與墨西哥及尼加拉瓜的友好邦交亦經維持。比較難於解決的，即關於古巴革命的美國地位一問題。在三月之初，古巴連續發生了革命的騷亂，目的在於傾覆總統馬加度 (Machado)，因為他非常暴虐，且為美國在該島的經濟利益作俵。此外，古巴（它的繁榮大半仰賴糖類的出口）因經濟的恐慌，使人民愈感不安。

四月，羅斯福總統委派拉拉丁美洲事務的副國務卿衛爾茲 (Welles) 為駐古巴大使。一般人期望這個新大使會「幫助」土人達到圓滿的解決，但當衛爾茲承認出任馬加度黨與最積極的反對派 (ABC 學生會) 之間的調停人時，美國國務部就聲明衛爾茲是純以私人的資格行動的。他的調停不大順利，在八月十二日，馬加度從古巴乘飛機遁往巴哈馬 (Bahamas)。繼馬加度為總統者繼為退斯拍對斯 (Cespedes) 博士，他頗受反對派歡迎，他的政府亦經美國所承認。這樣一來似乎古巴已在本國歷史上成就了第一次的叛變，而美國政府也是第一次未干涉古巴的內政。羅斯福總統曾經拉拉丁美洲諸國，他一定會將所有關於古巴局勢的情報轉達它們。然而在九月初，古巴的更激烈的分子，特別是軍隊中的兵士，表演了另一個革命。退斯拍對斯於是辭職，軍人遂僭取政權，其時他們已解除他們的將校的兵柄。在這個當兒，有一大隊美國軍艦集中於古巴領海，一千多海軍陸戰隊兵士則齊集於昆提哥 (Quantico)、佛琴尼亞，整裝待發。美國不肯承認這個新政府（其首領為五人委

員會)，希望那般過激分子覺悟到他們的失敗，而與比較保守的分子攜手，共同設立一個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但古巴的革命會議毫無所畏，他們在九月十日選舉了前哈瓦那（Havana）大學醫學院院長與五人委員會主席委員聖馬丁（San Martin）博士為共和國大總統。當這個時候，在古巴的美國人及若干較保守的土人請求美國實行武裝干涉。

美國除被牽入以上這些事件外，又積極參與一九三三年春夏兩季所舉行的幾個重要的國際會議，特別是世界幣制與經濟會議，倫敦小麥會議，及重開的日內瓦軍縮會議。世界經濟會議於六月十二日在倫敦舉行，其召集係根據前一年洛桑會議的提議，派代表出席的有六十六國，到七月二十七日即行暫時休會。該會議議程上的主要項目即為討論世界的貨幣政策與廢除國際間貿易的限制，也就是最初有破壞議程之虞的項目。

法、意、瑞士、荷蘭、比利時及其他金本位國家成立了一個「金集團」（Gold Bloc）它們堅持凡是關於減少關稅和撤除貿易障壁的談話，必須先使世界通貨能有普遍穩定以後。美國因在數星期前已廢除金本位，所以聲明除非本國國內的幣價漲到相當程度之時為止，決不與他國合作從事穩定貨幣的任何行動。換言之，羅斯福總統將國內情形的改良，放在國際合作之前，因為國際合作的根據足以影響他的復興計劃。英國似乎沒有一定的政策，有時贊成這一邊，有時又贊成那一邊。

自羅斯福總統於七月三日發表有力的宣言後，似乎這個會議就會在未得到一個好處前破裂。美國國務卿與美國首席代表赫爾（Hull）早就預防有這個收場。他拳拳服膺於國際合作的理想，非常反對那種為列強行動

南針的「極端的經濟國家主義」，而不十分確定華盛頓政府能給與助力（美政府顯然以為這個會議是不大重要的），他勸說各國代表繼續開會，希望達到至少關於幾個「安全的」而不致引起齟齬的問題的結論。不幸在其餘幾次會議，大家都不熱心，且乏興趣。於是大會宣告休會，並將重新召集會議的問題交與一個代表七個國家（美國亦在內）的執行委員會處決。

世界經濟會議的具體成就可簡便地概括如下：（一）以具許多保留顯著的國際關稅休戰；（二）八個出產和保有銀子的大國所成立的不以其銀儲量傾銷於世界市場的協定；（三）規定各國家銀行之間及各國家銀行與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之間應密切合作的決議；及（四）主張國際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應直接談判及各國內債權人應有較善的組織的決議。離會的代表又商定關稅壁壘的撤除應為世界最急之要務。因之大家希望各國在休會期中研究關於減低關稅的各種建設。

結果略比世界經濟會議為佳的是倫敦小麥會議的工作，這個會議經過三十一國代表幾個月的磋商後，締結了一個小麥公約（Wheat Pact）。這件公約於八月二十五日經二十一國簽字，五日後，加入簽字者又有第二十二國阿根廷。它的目的在減少世界的小麥盈餘額，限制將來的出產，提高國際市場的小麥價格，改善農人的生活狀況，並準備將來修改世界的關稅稅則。（註）

（註）依八月一日的估計，世界的小麥存貨約有九六〇〇〇〇〇〇英斛（bushel）其中美國占百分之三十六。

輸出小麥的國家，特別是加拿大、美國、阿根廷與澳洲同意接受限制的小麥出口定額，為期兩年（至一九三

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截止)。輸入小麥的國家，如英、法、德、意，則提高其入口定額，不鼓勵增加國內的出產，在小麥價格漲至每英斛 (bushel) 值六十三·〇二分金幣，即漲至較簽訂公約時的價格高出百分之十五的時候，並降低其小麥關稅。最後，各國當指定一個小麥顧問委員會來監視小麥公約之適用。

鑒於世界大局的不定狀況，很難期望一九三三年的軍縮會議的成績會比一九三二年的好。在該會議的夏季休會期中，主席漢德森遍遊歐洲各國的首都，希望本人與各國的總理與部長的私人接觸，會博得確實的結果。但是他雖在各處受到禮遇，卻沒有一處能使他得到鼓勵。

當會議於九月間繼續開會的時候，有一個進步的徵兆，這就是美國的通知，其中表示美國願意聽受國際的視察以求證實本國確守關於限制軍備一事所立的誓約。然而在七月間，美國爲了「使人民有職業」就開始了三年的海軍建築計劃，預備以將近二萬五千萬元的經費建築三十二隻戰艦。日本馬上如響斯應，草定同樣的計劃。再者，在八月的最後一週中，法國總理達拉第 (Daladier) 巡視沿德國邊境新近建築的防禦工事（其經費約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關於此項工事，聯合新聞社 (Associated Press) 的通訊描寫道：

「它的建築很巧妙，軍隊在裏面可以避開敵人的視線，並且受不到礮火的轟擊。塹壕與一連系的穹窿——這是一種礮彈所不能穿過的礮眼，大礮與機關鎗可從其中放射——連接，其間相距一至十六哩。法國軍官相信，從這種如鏈的防禦工事（其中有慘淡經營的地下兵舍，以隧道相通），可以沿邊境敷設連續不斷的阻敵礮火之防禦線。」

自然，以上這些事件所造成的空氣是不利於軍縮之談判的。

附錄

一九三三年十月以來世界局勢的演進

本書作者藍森氏在再版付刊時，關於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九月間的時事發展，曾有專文補充，叫做「最近發展述要」。然自本書出版以後，光陰荏苒，轉瞬又將二十閱月，此二十閱月中世界時事之急劇的演進和驚人的變化，如果沒有一種分析而概括的敘述，似乎不能壓閱讀本書者的願望，這便是草作本篇文字的動機。

一九三三年十月以後，歐陸政治舞臺的主角一個是德國，一個還是法國，前者為實行推翻和約的中堅，而後者則為維持凡爾賽條約的主將，針鋒相對。

德國自大戰後，受凡爾賽條約的束縛，已經有了十五年悠久的歷史，為人民所痛心疾首，自不待言。希特勒的國社黨，就利用時機，起而執掌政權，排除異己分子，這在藍森氏的補編裏已有說明。一九三三年十月以後，希特勒政策的目標，對內在於鞏固已得的政權，把歷史上向有的政治制度大膽地加以改造，實行嚴格中央集權，對外則在於收回失地和掙脫凡爾賽條約的束縛，先之以壇坫的折衝，不成，則於武力準備完成之後，居然自行宣告放棄和約條款。

中央集權的政策，乃鞏固政權之必要手段，故國社黨把它列爲黨綱之一。希特勒在十月下旬便已召集地方總理事會，作集中政權的準備，不過具體的辦法，尙有待於總選舉之後，方能實現。十一月十二日，德國總選舉結果，希特勒獲勝，政權略無問題，於是忙着應付外交，直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始由德國國會通過那有名的聯邦改革法案。這一個法案之所以重要，因爲它把傳統的聯邦制度，根本推翻而加以重建的緣故。該案規定：（一）各聯邦之主權，全部移交德意志政府；（二）各邦政府及民政長，須歸內政部長管轄；（三）授權德意志政府，宣布新憲法；（四）內政部長得頒布補充新憲法之必要條例。二月十四日，政府復下令廢止由韋瑪憲法以各聯邦代表所組成的聯邦議會。又一月餘（三月二十二日），德政府實施另外一種的集權辦法，由內閣通過關於原料品及半化學品貿易的法律，將德國一切進口貿易，置於國家統制之下，這一種辦法頗有類似蘇聯之處。

可是在希特勒集中政權的猛烈過程中，突然遇到一重很大的難關，就是所謂「六卅政變」。在事變發生之前五日，有位德國問題權威美國人史蒂爾，在紐約晚報發表論文，就很替希特勒政府擔憂，怕不久就要傾覆。幸而希特勒也早已發覺，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積極清除黨中叛己分子。黨軍參謀長羅埃姆和希特勒久共患難，可稱希氏的股肱，這次竟做了反對派的主角，被希特勒槍決，此外尙有三處之衝鋒隊長，也受同樣處分。前總理施萊赫將軍聽說與羅埃姆同謀，他在拒捕時中彈殞命，他的夫人也遭害。希特勒一面任命魯賓爲新黨軍參謀長，積極整理衝鋒隊組織，一面接開內閣會議，通過國家正當防衛法律，其效力可以追溯既往，再於會議後晉謁與登堡總統商談一切，這樣總算結束了國社黨裏的內訌和黨外一部分異己分子的覬覦。不過希氏這一次最得力的，還

是要算戈林將軍，在處置政變中，不但能和他前嫌盡釋，而且彼此的意見精神，完全一致。

八月二日總統與登堡去世，同月九日希特勒當選為德國總統，從此希氏以一身兼總統和總理二職，總算是德國法律上和實際上的獨裁者了。

此後幾個月，國社黨差不多傾全力於薩爾的收回。最初和法國商談無條件收回的問題，沒有結果，於是一面向法國竭力宣傳除了薩爾問題外，德法之間絕無其它糾紛，兩國即可相安，一面派遣黨徒積極往薩爾活動，以博投票時的最後勝利。十二月十三日德法兩國在羅馬簽訂薩爾協定，規定遇薩爾歸德時的種種條件。本年（一九三五）一月十三日，薩爾問題經人民投票結果，預測勝利屬於德國。同月十五日，投票揭曉，薩爾歸德。三月一日，國聯薩爾管理委員會正式將薩爾交還德國。如此，形成多年糾紛的薩爾問題，從此告一結束，薩爾的收回和希特勒鞏固政權的政策當然有密切關係的。

薩爾問題解決之後，希特勒的目光仍復移轉到改革政制和鞏固政權方面。本年一月二十四日，政府頒布法律，改變地方制度。其辦法將各邦完全廢止，改為二十二大行政區。魯普士十二行省，每省劃為一區。其餘舊有各邦，則劃為十區。每區設總督一人，廢除舊有之總理制。總督代表政府，掌握行政權，司法權不屬於地方，而屬於中央。此外，還有各鄉鎮制度改革法內，規定國社黨得干預鄉鎮的行政權。同月三十日，頒布第三次法令，將新劃行政區長官的地位重新釐定。該法令規定：「德國中央政府在該區的永久代表，以奉行國家元首所定的政策為其任務。」可知行政長官，同時也為立法者，權限特別廣泛，僅受聯邦國會的節制，以施行元首的政策為其任務，所以賦有發

布臨時命令之權。中央各部部长得直接向總督發布命令，但任免之權則操於元首或由元首所委任之兼任部長。各區政府的官員，由總督向元首建議任免之。總督轄境由元首釐定。普魯士總督之職權，由元首自兼，但得委託他人署理。希特勒對於中央集權政策的勵行，可謂努力推進。

在政制之外，就財政方面言，希特勒的政權也有相當的成功。一九三四年最後九個月中，國家收入已照上年同期增加九四五、七〇〇、〇〇〇馬克，財政地位較前稍形鞏固。據德國財政部政務秘書雷英哈特在德租稅公報上發表，預計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會計年度的預算，收支相抵，尚可剩餘一、〇一五、八〇〇、〇〇〇馬克，所以目前財政，如和一九三三年情形相比較，其收入增加之數約達一、〇四七、四〇〇、〇〇〇馬克。

再就外交方面來敘述德國的行動，無論對軍縮，對奧，對波（波蘭），對東歐公約，或是對米美爾問題，也無論其目的有否貫徹，德國的目標總是無疑地在於收復失地和掙脫凡爾賽和約的束縛，恰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希特勒在總選最後演說詞中所謂：人民必須團結，使廢除和約之目的可以達到。

準此方針，所以當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德法兩國外長在日內瓦初度談判軍縮的時候（按法國的主張：（一）監視軍備，（二）試行四年，（三）試行期間無軍縮），德國便拒絕法國所持和英、美、意在巴黎商得之協定。過了七日（十月六日）德國通知英、法、意、美四國，堅持軍備平等的要求。同月十四日，德國宣布行將脫離國聯及軍縮會議。十六日，因德國退出之故，軍縮會暫行休會。二十一日，德國退出國聯通知書送達國聯。二十六日，德國退出國聯勞工組織。由軍縮會解決軍縮問題既不得要領，於是仍回復各國間直接或間接之個別的談判。十一月二十

五日，德、法兩國開始對於軍縮問題直接談判，直至十二月十二日巴黎柏林間的談判，依然毫無結果。十二月八日，德國正式向法國要求修改和約與軍備平等權。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德對法一月二日的備忘錄予以答覆。（法備忘錄希望德重返軍縮，覓求妥協，其意和上月三十日法外長彭古的宣言以及同月十九日所允許的相同。）內容就若干點提出問題，請法國精確答覆。德、法軍縮談判既無結果，兩國邦交當然也因之而受影響，於是德、法商約談判也告失敗，政府并定一月十九日實施對法貿易限制進口。在如此緊張空氣中，德政府於一月二十二日，備文送英政府，請英國提出新建議，以便於法國備忘錄及德國覆文之間，尋覓折衷的辦法。英、意兩國旋於三十一日先後公布軍縮備忘錄。嗣後英代表艾登於二月二十日赴柏林訪晤希特勒與牛賴資商談軍縮，意見尙稱接近，但同時法國政府於二月十五日駁覆德國（一月十九日）的備忘錄，側重於德國正式軍隊以外的軍事團體與軍隊化的警察，應包括在軍額之內。三月十四日，德政府答覆（二月十五日）法方的備忘錄，其內容要點：（一）堅持德國須完其最低限度的自衛軍備；（二）暗示德國須設立常備軍三十萬人；（三）所謂半軍隊式組織，德國聲明無軍事之意味。四月十六日，德政府致牒英國，說明它對軍縮的立場：（一）接受修正英國備忘錄為討論的根據；（二）最初二年，須有短射程機槍飛行隊以作空防；（三）允德空軍不超過鄰國共有力量百分之三十，或法之空軍力百分之五十，但五年後須逐漸遞進以至平等為止；（四）允對挺進隊加以管理；（五）遵守洛迦諾條約；（六）先解決軍縮，尤其是先解決權力平等問題，然後加入國聯。自此以後，軍縮問題便再無談判的機會了。

使奧國合併於德，原為國社黨基本國策之一。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奧國政府以牒文致送德政府，要求德

國發表宣言，正式承認奧國獨立。次日，德對奧政府之虐待國社黨員，由柏林當局頒布取締奧僑令以作報復，後經奧政府抗議取消，奧總理陶爾斐斯對「愛國前線團」團員發激昂的演說，大略是說全國現決計摧毀國內的恐怖主義，至於來自國外的，當考慮陳訴於國聯。二月一日，德政府乃以牒文覆奧政府，對奧政府的立場，表示遺憾。同日，奧內閣會議將德國覆文提出審查，全體認為不能滿意。奧閣議決定援引國聯會盟約第十一條第二項的規定，以此案提交國聯會請其審理。一提到國聯之後，因德國業已退出國聯，當然無法解決。德國想從奧國方面突破凡爾賽和約之圍，終於因法國，尤其是意大利的干涉，暫時停止活動了，但是希望它撤銷這一個動向，至少在希特勒領導下的政府是不易辦到的。

國社黨在奧國方面的失敗，差幸有波蘭方面的勝利足以相抵。向來德、波二國，因有名的「走廊問題」的糾紛，邦交不很和睦，我們記得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九日，波蘭尚宣言擁護法國對國聯的主張，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向之為仇者，竟一變而為友，波蘭對德的交誼，竟連它同盟的法國都有望塵莫及之歎，這真是外交史上別開生面的一頁。一月二十六日，德、波十年互不侵犯條約在柏林簽字，二月二十四日，經兩國政府批准，當日生效。接着德、波關稅休戰協定成立。四五月間，德、波成立新協定，內容甚秘，但國際界都以為這一種的諒解，對於兩國間的商業及文化很有影響。明乎此，則波蘭在國聯會中所持的見解之常和法國背道而馳，以及拒絕接受東歐公約，都和這一種新的提攜不無蛛絲馬跡之可尋。

再，德國對於東歐和北歐這兩個區域公約的態度，也是如此。因為這兩種公約在於效法洛迦諾條約的精神，

要使東歐和北歐有與西歐相等之和約的效力維持和約所造成的疆域這當然和德國的願望相違。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駐蘇德大使照會李維諾夫，對於蘇聯建議參加波羅的海協定，不予同意。同年九月十日，德國又將關於東歐公約的態度，通知各關係國，婉辭拒絕。這兩件，證明了德國對東北歐方面的政治動向。

德國與立陶宛間因為米美爾問題常發生齟齬。原來國社黨在米美爾的勢力也很可觀，在自治政府內，主席以下的各級人員，布滿了傾德兩政黨的勢力，以至逐漸坐大。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旬，立陶宛政府突將米美爾政府主席施萊貝爾免職，並禁止傾向德國的兩政黨在境內活動，於是引起德國的反感，造成兩國間關於米美爾的糾紛。至於德國何以竟這樣重視米美爾，幾乎和西歐的薩爾一樣的重視，這是因為米美爾所處地位的重要。祇須從它的管理方面去看，便可明白其梗概。大戰以後，米美爾本由協約國大使會議管理，至一九二三年移交於立陶宛政府。嗣後又經列強共同簽訂米美爾條約，許該港在名義上隸屬立陶宛，但規定該港應由立陶宛與波蘭共同使用，而該港應有立法、司法、財政的自主權。所以，論米美爾的直接關係，已經牽涉到德國、波蘭和立陶宛三國，其重要可知。德、立之間的糾紛，始終沒有寧息，直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雙方仍互相攻訐，德方說是立陶宛不應用高壓手段，歧視國社黨人和一般親德者，而立方則謂米美爾的德人本屬少數，從未違反米美爾公約。在行動上，立方大捕國社黨員，治以嚴刑，而德方則停止輸入立陶宛貨物以示抵制。

站在德國的對面便是法國。法國不論對於軍縮，或改組國聯，或與國問題，或對於東歐公約，其見解總是和德國相左的。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法政府對軍縮表示保持合作政策，但不願放棄權利。十一月十四日，法政府答覆希特勒演說，安全無保障，軍備權難允平等。同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二日，法、德兩國對於軍縮問題直接談判，無結果而散。法國於是開始與小協約國作更進一步的團結構成反德陣線。法內閣會議亦正式拒絕與德國直接談判。修改和約與軍備平等問題。祇許在日內瓦國聯範圍內循尋常外交途徑繼續談判軍縮。復由外長彭古發表宣言，希望德國重返軍縮會，覓求妥協。一九三四年一月二日，法駐德大使彭賽遞法法國軍縮備忘錄於希特勒。二月十五日，法政府駁覆德國一月十九日關於軍縮之備忘錄，最注重的一點，仍欲將正式軍隊以外之軍事團體和軍隊化的警察，包括於兵額之內。

但是法國和英國，關於軍縮的見解，也不很一致。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外長巴爾都在衆院外委會答覆質問時，對英國的軍縮備忘錄，表示不滿。同月十七日，法政府答覆英國一月三十日的軍縮備忘錄，要點：(一)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法國人民服役的期間縮短百分之六十六，軍額減百分之二十五，國防經費由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間，減少二十五萬萬佛郎，法國始終主張國際監察下逐步軍縮，至軍備平等為止，如有確實保障，極願加入軍縮公約；(二)英國雖對德之軍用航空及陸軍三十萬的要求提出保留，但仍主張一方增加德國軍備，他方法國逐步縮減軍備，而不予法方以安全保障；(三)半軍隊式組織及軍械製造，須予以監察；(四)對簽訂軍縮公約須以德重回國聯為條件，表示贊同。四月六日，法政府以口頭照會答覆英國三月二十八日的詢問，要點：德重置軍備可予承認，但須有限制，而以完全的國際管理與監視為依歸，並適用於其他各簽字國，同時建議於軍縮委員

會開會之際，英、法間繼續進行討論。同月十七日，法國答覆英國十日的照會，因德國一九三三年至三四年度預算中軍費的擴大，修築多數飛機場於撤除軍備區域，以及正式軍隊以外的軍事團體的整頓，使固有立場不能維持。至此，法、英兩國的見解就彼此分歧了。第一，五月四日，漢德森痛切主張德國重返國聯，次日，巴爾都在軍縮主幹會中，批評漢德森的提議，說邀德重返可以同意，但不得以「走後門的手段」為之。第二，巴爾都在軍縮總會裏，主張應着手安全問題，而英、西門則主張根據英國軍縮計劃成立草約，將已議定各案及必要的新讓步歸納於內。第三，法國熱烈擁護蘇聯的建議，主張軍縮會應改為國聯永久機關，以保障各國安全，而五月四日艾登在主幹會中宣稱不贊同蘇聯的建議，因為將令軍縮會負擔加重。第四，漢德森提出折衷案，主張軍縮與安全兼顧，又西門主張：（一）限制化學戰爭，（二）預算案公開，（三）成立永遠軍縮委員會，而法國於六月六日也提一折衷案，主張軍縮會繼續討論保障國家安全及裁減軍備，但應先解決安全問題，又法對西門預算公開之建議，始終反對，除非預算公開與預算限制同時並行。

上述英、法兩國對於軍縮之分歧的主張，一直到六月八日纔成立妥協的方案。先是，法國得小協約國及蘇聯的擁護，在軍縮會中不斷的與英國代表團相質難，相持不下，經瑞典外長桑特勒代表瑞典、挪威、丹麥、西班牙等六國出任調停，提出安全與軍縮兼顧的折衷案以後，六月八日，法、英、美三國代表團領袖，草成以法國提案為基礎之「法國決議草案修正案」：（一）歐洲已訂有區域協定，當指派小組委員會繼續研究，以便成立類似的新協定；（二）關於軍縮監察及公約實施保障工作，仍繼續進行；（三）對航空小組委員會令其恢復工作，以便取締國

有航空；(四)軍火製造與販賣小組委員會，亦令其恢復工作；(五)總委員會對於以上同時並行的工作，應予以調整；(六)請主席將蘇聯「永久和平會議」設立的建議，提交各國政府加以研究。該項修正案，除意大利不參加及蘇聯與波蘭俱保留外，經大會通過。所謂軍縮問題的討論，至此告一段落，可是關於軍縮政策之英、法、德三國間的基本衝突點，實際上並未消除。

對於意大利改組國聯的主張，英、法兩國的意見雖尙稱沉澱，可是法、意之間的見解又根本衝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八日外長彭古發表宣言，表示國聯改組，主要基礎不容動搖。同月十六日，法、捷談話結束，一致決定國聯基礎不使動搖，軍縮解決須在日內瓦。翌日，法政府表示對改組國聯案態度堅決，極端反對變更現狀。二十日，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在衆院外委會報告時，表示國聯弱點應予改革，基本原則不必牽動。二十二日，英西門抵巴黎，與外長彭古會晤結果，英、法步調一致，共同維護國聯。前總理赫里歐發表宣言，擁護國聯。法、意兩國的感情，爲了改組國聯的問題，始終不能接近，這要等到一年以後（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賴伐爾領導外交，變更外交策略之後，法、意協定纔正式在羅馬簽定，至此法、意的關係總算得到了暫時的調和而告段落。意國因爲在法、意協定中暫時壓足了它各方面的願望，所以就不再提改組國聯的要求了，不過它是否就撤消了這一個主張，現在也無從判斷。

再次，在一九三四年間，奧國獨立的問題，也算歐陸國際政治中一個重大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又是一種現象，可算是法、英、意三國共同對德國的問題。九月十七日，英、法、意三國二次共同宣言，保障奧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此項宣言第一次在二月七日原已發表過的。後來在法、意協定正式成立的那天，在條文中（第二條）又復明

白規定了。

最後，關於中歐與東歐公約的問題。中歐公約之發起者爲意大利，而東歐公約的發起者爲法俄兩國。德國最後表示對中歐公約尚有商量餘地，而對東歐公約則絕對不能參加，同時波蘭亦不願參加。東歐互助公約的意義，欲仿效洛迦諾公約的成規，保證維持東歐現存的各國疆域，這是和德國現政府的政策不相容，波蘭也因為「走廊問題」和德國已有妥協，也沒有多大的需要，所以這個問題得不到好意的成立。不過因這個問題的擱淺，多少促進了法俄間的合作。

我們把法國在國際政治的立場，總算大體敘述過。認爲須補充的祇有兩點：一點是法俄邦交的漸次接近，還有一點是法國在巴爾幹的活動，這兩點都是法國對德國和其它反國聯派所密布的外交網。關於俄國的，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法俄兩國即開始談判商約，至次年一月十一日，法俄商約成立。該約分爲兩部分，很有政治的重要性：經濟部分規定法國允許蘇聯方面以最低限度之關稅率，並規定蘇聯貨物入口額的一定的百分比；法律部分規定蘇聯駐法商務代表團的法律地位，幷定二十四日起發生效力。九月十八日，經法國的竭力推轂，蘇俄加入了國聯。十一月十二日的法俄軍事協定，十二月五日的法俄協定，均先後在日內瓦草簽了。十二月十日，法俄新商約成立。法俄互助公約雖幾經波折，至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始商妥要點，但後來因德國對東歐公約與軍縮的態度，於五月二日趕速成立，至此法俄已形成攻守同盟的局面了。復次關於巴爾幹方面，小協商國的捷羅南不待說，當然是法國的擁護者，不過法國以爲反德陣線，固然很够，但對反國聯的陣線，還嫌不足，於是有所謂巴爾幹公

約的實現。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羅、南、希、土四國外長在希臘首都雅典，正式簽字了巴爾幹公約。公約條文亦於同日發表，其意義為保障簽約各國現有疆域的安全，有效期限五年，僅保加利亞與阿爾巴尼亞二國未加入，前者依然堅持反對和約的態度，後者則因與意國有特殊的關係不允加入。但南斯拉夫，遲至四、五月間尚拒絕批准該約。至此法外長巴爾都又非努力斡旋不可。六月二日與四日，小協商國常設政治會議與巴爾幹公約簽訂國，同在日內瓦開會，討論大局。同月二十日，法外長巴爾都報聘羅、南二國，傳聞對於反對和約派，不無相當關係。其他，則如六月七月間阿爾巴尼亞與意國之驟然失和，九月間因由於南國報紙譏意國軍隊有怯懦的遺傳性，南意邦交發生惡化，以及九月二十七日的南保交歡，南王至保報聘，於巴爾幹問題，均有重大關係。所以土外長於經過保京時，曾發表宣言，亦謂保國實際上已成巴爾幹一分子，可見保加利亞與阿爾巴尼亞亦有被拉入於巴爾幹公約，而由反和約反國聯的陣線中倒戈的傾向。十月七日，馬賽慘案發生，南王抵法報聘，偕法外長巴爾都在途中遇刺殞命，巴爾幹問題的暗潮，至此暫告段落，因為賴伐爾繼巴爾都領導外交之後，他就改變排意而為睦意的政策，以便全力對德，終至於訂結法、意協定，而兩國間重歸於好了。

區域公約之在歐洲，一時成為很時髦的政治工具。一九三四年間，除二月九日，土、希、羅、南四國的巴爾幹公約外，三月九日，意、奧、匈三國亦簽署三國政治經濟協定，完成意、奧、匈三國的協調，因為有這兩個區域公約作背景，所以在馬賽慘案發生之後，在國聯會中法、意各為南、匈的聲援，唇槍舌劍，各不相下，大有恢復戰前約縱連橫的局面。此外，波羅的海三國（即拉特維亞、立陶宛、與愛沙尼亞）協定，亦於九月十二日正式簽字，所標榜的都不外乎互

保和平而已。

所謂積年的和平運動，先之以互不侵犯條約與所謂「侵略國」定義之倫敦協定，繼之以上述各種區域公約的實現，可是戰爭之神迄未爲和平所克服，增加軍費預算案和擴大軍備，已成爲全世界普遍的現象。現在就歐洲主要國家而論：德國於一九三四年一年之間，空軍經費由三百九十萬鎊，增至一千零五十萬鎊。三月二十七日，政府擬妥六、四五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新預算案，四月一日起開始實行，計較上屆增海陸軍軍費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空軍軍費五〇、一〇三、〇〇〇馬克。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政府宣布四月一日正式成立空軍。同月十六日，自動宣布廢止和約軍事條款，恢復強迫軍役制，並由外部通知英、法、意三國大使及凡爾賽和其他簽字國代表。再由德國而返顧法國，那更是洋洋大觀了。一九三四年三月六日，衆院海軍委員會對海軍部長畢特利所提出的一九三四年海軍造艦計劃，加以核准，計鄧開克號式裝甲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二艘及潛水艇二艘。六月十六日，衆院通過國防經費案，計海陸空三部總數爲三十一萬二千萬法郎。七月五日，國會通過建造軍艦案，規定建造鄧開克號式二萬六千五百噸的戰艦一艘，驅逐艦一艘及潛水艇二艘。又海軍部長宣言，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之前，尙將建造主力艦一艘，與意政府的建造三萬五千噸主力艦二艘，針鋒相對。法國之原來軍事預算，僅爲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但國會所通過之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非常軍費，計超過平常的十餘倍之多，法國人民每人須負擔四百二十法郎的軍事費，法國軍費的浩繁，可以想見。不僅此也，十月間陸軍部長貝當向國會要求陸軍軍費，卽所謂國防經費追加預算案八萬萬法郎，也經十二月五日衆院通過了一

九三五年三月四日，政府向衆院提議，於今年年底建造主力艦一艘（大概三萬五千噸），及一千七百噸之驅逐艦二艘，並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之後，即行動工另建戰艦一艘。英國亦不甘落後。一九三四年一月，英在新加坡召集遠東海軍會議。三月四日，空軍預算擴充，一九三四年度空軍預算規定增加四隊。每隊以飛機九架或十二架組成，其中一隊將駐新加坡。同月六日，海軍預算案公布，計總支出爲五千六百五十五萬鎊，較去年增加二百九十八萬鎊，包括建造九千噸巡洋艦三艘、五千噸巡洋艦一艘、航空母艦一艘、驅逐艦九艘、潛水艇三艘、海軍人數爲九二、三三八人。海軍天空戰具費增多二四九、〇〇〇鎊，海軍維持費增多一、一〇三、〇〇〇鎊，新加坡築港費增至八、六九三、〇〇〇鎊，計較前增多了九四二、〇〇〇鎊。同月十三日，下院通過海軍預算案，總數爲五六、五五〇、〇〇〇鎊，較上屆增多二、九八〇、〇〇〇鎊。十六日，下院復通過陸軍預算案，計四五、三七三、〇〇〇鎊，較上屆增多二、九八〇、〇〇〇鎊。六月二十七日，航空大臣宣布英積極擴充空軍至與世界任何國家相埒（現仍居第六）。七月二十三日，上院通過擴充空軍四十一分隊案，二十日下院亦通過上述之案。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澳洲與新西蘭亦積極鞏固防務，澳撥款二千萬鎊，劃一鐵路軌道。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自然是不落伍的。意國的參衆兩院，於一九三四年一月間，曾通過一件海空軍預算案，準備於一九三四年——三五年間，撥用一七二、〇〇〇、〇〇〇里爾建造軍艦。嗣後，因各國擴大軍備的刺激，五月五日，政府亦突然宣布追隨英、美、日、法參加世界海軍競爭。政府撥四萬八千萬里爾之附加款，作爲建造新艦的經費，並準備立即施行，經費由一九三五——四〇年五屆預算中攤派。同月二十六日，墨索里尼向衆院宣布擴充海空軍新計劃，謂意國決依華府海軍條約造足七

萬噸戰艦，決定立即開造，儘一九四〇年完成，又決撥百萬里爾，革新空軍。

歐洲大陸，除法、德兩大系統之外，英意置身局外，而處舉足重輕之勢。英國以「榮譽的孤立」爲立國的傳統政策，而以歐洲和事老爲其維持均勢的手段，所以它並不自立系統，而處處都有它的足跡。意國則不然。意國自揭莫改組國聯之後，即與法及小協商各國的政策背道而馳，接着法外長巴爾都就開始聯絡土、希、南四國，訂立巴爾幹公約，意大利不甘示弱，隨後就和奧、匈二國訂立政治經濟協定，創立另一個系統，以與法國的系統相對立，這在上面已經說過。所以，一九三四年一年之間，意大利對各項問題的主張，和法國總是相左，而和德國的見解倒頗相接近，所以希特勒會一度赴意會晤墨索里尼，後來因爲奧國獨立的問題，意、德又勢成冰炭，雖經希特勒命令停止國社黨在奧的活動，但兩國之間的感情，迄未恢復。另一方面，法國繼任外長賴伐爾乘機改變外交的方針，對意讓步，所以一九三五年一開始，法、意協定便告成立，在這裏面意國得到許多好處，（一）在非之法屬里比亞內十一萬四千方公里之土地讓與意屬里比亞，（二）法屬索馬利蘭轄境貝爾曼特海峽對面之海岸線，讓與意屬愛里德里，（三）自一九一四年以後，在都尼斯境內誕生之意僑得自行選定國籍，境內意大利學校，自一九五五年起，將由法國立法管理之，（四）建議奧國鄰邦與奧國應互訂不干涉及不侵略的協定，德、波、羅亦得加入，遇奧國土地完整受威脅時，各國得與奧舉行磋商，（五）意國得參加自法屬吉布底至阿比西尼亞京城阿提斯阿巴巴的鐵道經營權，（六）根據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五強宣言，關於軍備權平等問題，不得以單方面的行動，變更關於軍備之義務，遇有必要時，兩國得磋商之。意大利總算躊躇滿志了。

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國際上還有一種時髦的政策，叫做和平主義，有時也叫做善鄰主義的。蘇聯標榜和平主義，最爲積極，它除與歐洲多數國家互訂不侵犯公約及倫敦「侵略國」定義公約外，十一月十六日又和美國正式恢復邦交，互換使節。十二月十五日，意、俄互不侵犯條約正式換文，開始生效。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蘇聯與匈牙利正式恢復邦交，互換使節。四月四日，蘇聯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三國，將互不侵犯公約延長十年，由李維諾夫與上述三國公使共同簽字於莫斯科。同月七日，李維諾夫與芬蘭駐蘇大使亦在莫斯科將兩國所訂互不侵犯公約延長十年。五月五日，俄、波互不侵犯公約展期十年，由兩國代表在莫斯科簽字。四個月以後，蘇俄正式加入國聯會，充常任理事。十一月十二日，俄、法軍事協定在日內瓦草簽。十二月五日，俄、法協約草簽。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法、俄互助公約正式簽定。還有自一九三三年六月以來關於中東路讓渡的談判，蘇聯與日、偽兩國先後會議凡五十六次，歷時一年又十個月，中東路買賣協定，終於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草簽，同月二十三日正式簽訂。其內容：(一)售價日金一億四千萬元，(二)三分二以貨物抵付，三分一以現金，(三)三分一之半數現金於簽字日支付，餘分三年攤還，(四)日本以公文保障「偽」方履行支付規定，(五)其他。蘇聯爲和平而努力，以及爲維持和平而讓步，亦可謂煞費苦心了。但是另一方面，蘇聯卻又是一個具備世界最大陸軍（常備軍九十萬餘）及除法國外世界最大空軍（軍用飛機三千架以上）的國家。

第二個提倡善鄰主義的國家，要推日本。日本自退出國聯之後，因外交上之孤立，於是外相廣田於接任之後，大彈其「協和外交」的高調。他的意思要和美、俄、中、英都保持親善的關係，竭力於增高亞洲和太平洋的霸權。

中來推行善鄰政策，不過究竟效力如何，至今還成疑問。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廣田在外相官邸舉行日美懇親會。外務省亦經改組，新設美洲、歐亞兩局及調查部，調整對美、中、蘇關係。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廣田在第六十五屆議會正式開議時，發表外交演說，關於對華、對俄、對美、對英四國，闡明其協調政策。廣田在貴族院預算總會答辯日美問題的質問時，宣布對美諒解計劃，言日美應有充分相互諒解的根本觀念，不應考慮戰爭，須在外交工作上竭力改善彼此的關係，日本因有先知美國事情之必要，特派前荷蘭公使齋藤赴美，儘量懇談，證實美方意見後再加召回，再與軍部協商對策，再度命其赴任交涉實際問題，其計劃如此。當齋藤正在美國活動之際，而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突然發表對華政策的非正式的聲明，反對他國對中國為財政或技術上的援助。同月二十日，外務省發言人，作第二次聲明，謂第一次聲明乃擴充一月二十三日廣田在議會發表的演詞。同月二十八日，日本忽又取消十七日第一次聲明。可是美國因此所得到的又是一種印象，美國於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即對日本送致備忘錄，內稱任何一國尚未得有關係各國之同意，不能希圖在牽涉其他主權國與義務及合法利益之時局中，任意武斷。在如此形勢之下，齋藤居然餘勇可賈，於五月間繼續努力對美諒解問題，并對美建議：（一）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二）根據商業諒解發表彼此友好及不競爭宣言，（三）開始交涉「偽滿」之地位，（四）斐列賓之獨立，（五）足以妨害日美邦交的對華關係，（六）其他，但是美國方面始終不置可否。到了年底將近（十二月十八日），三國海會預談休會（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正式宣布廢止華府海軍條約之後，同日美國海軍艦隊總司令里夫斯大將發表海軍在太平洋操演之空前大計劃，日期為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至六月十日，地點達五百萬方哩。

遍及東太平洋，幾達東方洋面，參加的有軍艦一七七艘，海軍飛機五七七架，海軍飛船「馬康號」，航空母艦四艘，將士五四、〇〇〇人，歸一人指揮，規模空前。這和廣田協和外交的希望很不相符了。準此而推諸其他各國之間，則無論英國保守黨和日本有怎樣的同情，可是英國的遠東海軍會議，終究須在新加坡召集舉行；日、俄之間，儘管可以不發生任何直接的衝突，但蘇聯之注重於東邊的國防，並不稍遜於西境，可以說絲毫不敢懈怠，也不肯放鬆。所以，廣田的善鄰政策，一作了國家利害關係的試金石，想得到滿意的成績，當然很不容易。

其他如擴大軍備的情形，日本當然也不在例外。一九三四年六月間，已傳說日本將擴大明年度軍事預算，此類預算計有二萬七千五百萬元，再加入既定經費四萬二千萬元及因物價高漲而增加之費用一千九百萬元，則僅海軍達七萬一千四百萬元，共計海陸軍預算十二萬六千四百萬元，較本年度多三萬二千八百萬元。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第六十七屆議會第一次開會時，經質問戰三日後，討論十年度軍事預算十億二千萬元。二月十三日，衆院通過十年度預算案。同時，日空軍五年計劃亦經確立，總計需款一六八、六六六、六〇一日元。這是日本軍事預算大概的情形。

中國是一個在革命進程中而又具備着世界最大人口量的國家，它的情形很難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擬，所以它當前的困難，有許多具有世界各國的共同性，然而也有許多是出於它本國民族之歷史上的特殊性。在這些年頭，它不但和世界各國一樣，須遭受不景氣的影響，此外尚須掙脫列強多年來所加的政治與經濟的壓迫，其嚴重與困難可以想見。土耳其看來較中國為整齊，但是經濟建設工作亦是依然在推進中而未達完成，我們看它的

進出口貨，出口的大多數是原料，而進口貨什九都是機件和成品，所以土耳其在經濟方面，還未能十分樂觀。

東西兩半球，有一點偶然相似的地方，那便是東方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西方的中美、南美諸小國的終年擾攘不息，一切政變、罷工、革命、暴動、鎮壓、死傷、無不應有盡有，有主義的分歧，有地盤的爭奪，有牽延不決的流血戰爭。知道了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與共產黨暴動起事的情形，以及各派大學生的衝突，政局的搖動，則南美、古巴的景象，即歷歷如在目前，用不着重複描述。凡是在這些經濟落後的國家裏，無論共產主義者或法西斯主義者，都是非常活躍，蓬勃產生。關於國際間，哥倫比亞之於秘魯，巴拉圭之於智利，都有過爭執，不過其中最別開生面的，還是要推南美、巴拉圭和玻利維亞關於大廈谷的戰爭。這一個爭執，自從一九三二年六月間開始，至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巴拉圭因國聯決議單獨解除玻利維亞之軍火禁令，宣布退出國聯為止，中間經過國聯調查團，汎美大會，及阿根廷、巴西、美人威爾斯等多方之調停，以及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全美洲、合衆國等十二國繼續簽定全美非戰公約，合上年十一月的阿根廷等六國，共計十八國，處如此和平空氣的籠罩下，還是依然犄角互爭，而無法解決，這不能不算爲一件憾事了。

最後，說到北美的合衆國，我們想把它分做復興運動，軍事預算之增加與善鄰主義這幾項來說。

自美國藍鷹運動進行以來，因勞資雙方見解之懸殊，故工潮不時發生。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大工潮，使復興運動很受波折，直至十月六日，形勢始告緩和，據聞有三百萬人恢復工作。同年十一月五日，中西部農民罷羅運動，加入者逾二百萬人，於十八日始告平息。一九三四年六、七月間，工潮復有澎湃之勢。七月十六日，因碼頭工

人要求增加工資不遂，舊金山全體工人總罷工，總數達十萬六千八百名，但罷工者佈置計劃，頗為週到，設立十九處食物鋪，凡工人及其眷屬，皆得於此購物。至十八日下午四時，碼頭工會指導人，宣告終止總罷工。同年九月一日，紡織業總罷工之通告發出，直接或間接受影響者，當在五十萬至一百萬人之間，直至二十四日，經羅福斯總統的調解，大罷工方行取消。又據十二月十七日的統計報告，復興運動中之生產運銷續見減色，購金政策收效亦微。

然雖因上述種種之波折，復興運動還是向前邁進。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政府發表組織國家緊急委員會，整理復興計劃內容，并發行新債九萬五千萬元。羅斯福復核准以三萬五千萬元代價毀棄農田約五千萬英畝新政策。一九三四年六月，羅斯福以咨文送達國會，宣布「明年將為全國樹立一種防止失業及救濟年老之社會保險制度」，實行社會政策。國會也通過了二萬萬元的住屋改良案。一九三五年一月，羅斯福提出預算咨文，內開工賑經費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數目之大，可稱空前。

貨幣政策的改革，為羅斯福復興運動中計劃之一部分。一九三三年十月，總統下令收買黃金。十一月一日，政府決定於二日開始收買黃金，由聯邦準備銀行辦理，同月復在倫敦收買金幣金鎊。二十一日，總統批准了白銀協定，并頒發布告鑄造銀幣。財政部接着下令民間繳出藏金。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總統在參眾兩院提出貨幣改革案，內容：（一）貶抑美元價格的金純分，最少限度為百分之四十，最大限度為百分之六十二；（二）國內的貨幣用金全部移管於財部；（三）利用因貶抑美元價格而產生的資金，設置外國匯兌市場的金買賣資金二十億元（即平準基金）。次日，總統發表實行統制國外匯兌命令三道，阻止國內資金流出，凡銀行私人一律適用。三十一日，總統

又宣布減低貨幣平價（宣布美元價值五角九分零六釐，規定金價自二月一日起，每盎司爲三十五元，新金元將含有十五格蘭姆又二十一分之五之九成純金），此項宣布，使美國在其所有價值二十六萬萬元之基金上，獲利頗鉅，而成立二十萬萬平準基金。據報告，自羅氏取消金本位後一週年，職工及銀行之準備金，遞升至百分之二十五。據農業經濟局報告，謂二月份之農產收入，已較去年同月增加百分之二十；主要業如鐵工、電汽及鐵路等均蒸蒸日上。五月二十二日，總統以銀案咨文送參衆兩院，要旨：繼續增加用銀爲通貨，使準備金達於金六成半銀二成半，并請求以每盎司五角購買白銀，以促成此比價的權力，使完成貨幣政策。六月十一日，參院通過了五月間在衆院通過的畢德門等所提出的白銀法案，但曾加以修正，經衆院再通過和總統簽字後，白銀法案即成爲法律，至此財部乃開始大規模購銀。二十八日，財長毛根籟簽署禁止白銀出口之命令。八月九日，總統宣布白銀收歸國有。至於將白銀價格，逐次提高至每兩七角以上，引起世界各部分尤其是用銀國很大的金融風潮，這都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後的發展了。

關於增加軍事預算方面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總統請國會核准海軍建築費五千四百萬元（自公共工程基金二萬三千五百萬元內撥付造價之三十二艘，不在其內）。接着衆院授權總統增艦。二十三日，衆院通過增加海軍費預算案（二八四、七四七、二四二元）。三十日，衆院通過了文生氏海軍案（該案主張建造新艦一百二十艘及海軍飛機一千一百八十四架）中築飛機費九千五百萬元。同時陸軍部亦宣布其陸軍航空隊的五年計劃，規定於五年內添造新戰鬥機一千架，委派常備軍官四百員，募集飛行員役六千二百人，需費三千萬元以上。

三月六日，文生——拉莫爾的大海軍議案，經參議院通過，規定支出五萬萬元，分五年造成巡艦六艘，潛艇三十艘，驅逐艦六十五艘，航空母艦一艘。二十七日，總統簽署。一九三五年一月，總統提出預算咨文，計三十六財政年度中，海陸軍國防費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為平時美國史上最大之數。二月八日，據報告，政府將向國會提出陸軍現代化之計劃，共需費四〇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同日，在夏威夷羣島中之歐阿湖島上，動工建築大空軍根據地，占地二千二百方里，需費一千八百萬元。同月二十二日，國會通過總統簽署陸軍龐大預算案（三七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又空軍五年計劃開始實施，其最後目的為置有陸軍飛機四千架，海軍飛機二千二百架。三月七日，參院通過增加常備軍數四萬六千餘人，由一一八、七五〇人，增至一六五、〇〇〇人。以上是增加軍事預算的大概情形。

復次，美國亦為主張善鄰主義的國家之一，有人稱之為第三時期的孟羅主義。例如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政府宣布準備一年後撤退海地共和國駐軍。同月十二日，因古巴方面時局略形平靖，所派出之美艦陸續撤回。十一月二十五日，國務卿赫爾赴烏拉圭出席汎美大會。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汎美大會中，美代表聲明對南美外交，採開明的自由主義政策，尊重各國獨立的絕對完整。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中美五國會議，討論經濟同盟的廣大計劃，美國被邀列席。四月二十七日，美國等十二國繼續簽定全美非戰公約，合上年十一月的阿根廷等六國，計共十八國。八月二十四日，羅斯福宣布善鄰政策，為孟羅主義的修正。同日，美古商約在美京簽字，九月三日起施行。

可是美國對於華盛頓海軍條約的態度，非常堅持。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海軍部長史賓生宣言維護華

府海約，謂日本如繼續要求海軍平等，則美國準備擴充太平洋之海軍根據地。八月末，華府負責方面表示，國務院贊成海軍會議延會二年。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單獨廢止華府海約後，傳聞美國的態度，在於防止日本破壞英美協調的政策，而對於海軍噸數之比例的競爭，絲毫不肯放鬆。

就全世界而論，雖然不是完全沒有較為進步較可希望的現象，但破壞的力量太大了，一點點的希望在巨大的災禍的威脅之下，也有岌岌動搖的形勢。這種局面是不會長久的，要不是重演戰爭的悲劇，就是恢復調整和諧的國際關係，使人類的文明進至更高的一個階段。現在的我們，正是處在這一條歧路之口。